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五卷

1875年4月—1883年5月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编译
列 宁 斯大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邓仁娥
设计:尹凤阁 王师颀
装帧设计:程凤琴
责任校对:刘大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五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 2版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

ISBN 7-01-002964-4

I. 马…

II. 中…

III. 马恩著作-全集

IV. A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4549 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AKESI ENGESI QUANJI

第二十五卷

马克思 恩格斯
中共中央 著作编译局编译
列 宁 斯大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4 月第 2 版 2001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29.375 插页 12

字数:754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01-002964-4/A·246 定价:56.00 元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是根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
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
局编译的。

凡 例

1. 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2. 目录和正文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3. 在引文中尖括号〈〉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的,引文中加圈点。处,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着重号的地方。

4. 在目录和正文中方括号[]内的文字是编者加的。

5. 未说明是编者加脚注为马克思或恩格斯的原注。

6. 《人名索引》、《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文献索引》、《报刊索引》、《地名索引》、《名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前 言

本卷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从 1875 年 4 月至 1883 年 5 月的著作。

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开始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资本主义体系的内部矛盾、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相互竞争尖锐化了。第一国际完成了在国际舞台上团结无产阶级力量的历史任务而停止活动,国际工人运动进入向广度发展,以各个民族国家为基地建立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时期。

这期间,马克思继续从事《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写作;恩格斯则继续撰写自 1873 年开始写作的《自然辩证法》,并于 1876—1878 年在马克思的支持和参与下创作和出版了《反杜林论》。他们密切关注当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新发现,并注意利用这些新成就来完善自己的理论。他们还全力支持年轻的工人政党,帮助它们制定科学的纲领和正确的斗争策略、指导它们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本卷收入的大部分文献反映了他们对工人政党和工人组织的关心帮助和理论指导。

本卷首篇著作《哥达纲领批判》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1875 年初,德国爱森纳赫派(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和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为实行合并,共同起草了供哥达合并代表大会讨论的纲领草案。马克思对纲领草案逐段作了批注,批判了其中的拉萨尔主

义观点,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新原理,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第一次区分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并阐明了两个阶段的基本特征和分配原则。他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对消费品的分配只能实行等价交换的原则,即按劳分配的原则,“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见本卷第 18 页)。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的平等权利仍然受到限制,因为“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见本卷第 19 页)。“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见本卷第 20 页)在这里,马克思把生产力的发展、集体财富的极大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看作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后来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他明确地把共产主义社会表述为“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见本卷第 145 页)。

马克思根据对 1848—1849 年革命和 1871 年巴黎公社的经验总结,明确提出未来新社会产生过程中要有一个过渡时期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形式,他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

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见本卷第 28 页)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批判了拉萨尔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应当得到“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的论点,根据自己的再生产理论指出,只有从社会总产品中扣除用于补偿生产资料、扩大再生产、建立后备基金、支付管理费用、满足共同需要、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设立基金等各部分之后,才谈得上在劳动者之间进行消费资料的分配。他还驳斥了“分配决定论”,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见本卷第 20 页)。因此,把分配看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而把重点放在分配上面,是根本错误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是一篇反对右倾机会主义、阐述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作用的重要文献。1878 年 10 月德国帝国国会通过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后,社会民主党实际上已处于非法状态。在这种异常艰难的形势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这封通告信,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战胜困难。马克思和恩格斯严厉批判了党内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阻止右倾机会主义势力对党的政策施加影响。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就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和建设问题作了论述。他们强调,无产阶级群众性的革命政党必须保持“无产阶级的特征”,必须承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见本卷第 362 页)。他们着重指出,这个政党不能为了对旧社会进行修修补补的改良而把自身目标的实现推迟到遥远的未来。他们要求党坚决回击敌人的进攻,坚定不移地同感伤社会主义和其他各种小资产阶级观念进行斗争,屏弃那些博爱的资产者,以保持党的领导的纯

洁性。

在《帝国国会关于反社会党人法的辩论(文章草稿)》中,马克思论述了无产阶级斗争的和平方式与非和平方式的辩证关系。他认为,斗争采取和平方式还是非和平方式不决定于无产阶级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于客观的历史条件;只有“当该社会中的掌权者不用暴力方法来阻碍历史发展的时候,历史发展才可能是‘和平的’”;“但是‘和平的’运动遇到同旧秩序利害相关的人的反抗,仍然会变成‘暴力的’”,当时的俾斯麦政府正是“企图以暴力镇压它所不喜欢的、而在法律上是无懈可击的发展。这就必然要导致暴力革命”。(见本卷第338—339页)马克思在揭露俾斯麦政府利用谋刺皇帝事件诬陷德国社会民主党时,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同无政府主义分子毫无共同之处,并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文章草稿中的一些重要思想也反映在马克思于1878年12月同来访的《芝加哥论坛报》通讯员的谈话中(见本卷附录)。

188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应法国工人党领导人的请求,帮助他们起草纲领,马克思口授了《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草案)》。在导言草案中,马克思阐明了“生产者的解放是不分性别和种族的全人类的解放;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之后才能获得自由”(见本卷第442页)。他还给法国工人党指明了在经济方面的最终目标并提出了包括利用普选权在内的策略原则。

1880年恩格斯应保·拉法格的请求把《反杜林论》中的三章改编成《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发表在法国《社会主义评论》上,并出版了法文单行本;1882年恩格斯又应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请求,经进一步加工后出版德文单行本,改名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部著作全面系统阐述了科学

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主要原理。恩格斯概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发展,说明空想社会主义是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和阶级状况的产物,评述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学说的贡献和历史局限性,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恩格斯分析了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论述了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指出正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两个伟大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恩格斯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见本卷第 402 页),“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见本卷第 399 页)。这一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崩溃和社会主义胜利。恩格斯还评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形式,如股份公司、托拉斯和国家所有制,指出:这些社会化形式是资本家阶级在猛烈增长的生产力要求承认其社会性质的压力下,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不得不采取的。“但是,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见本卷第 407 页)“生产力归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见本卷第 408 页)他认为,要解决这个矛盾,只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由社会直接占有生产资料,这样生产力才有充分发展的自由。他还预言了未来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这部著作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普及,对于各国工人政党掌握科学社会主义,起了重要作用。马克思在该书法文版前言中称它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见本卷第 441 页)。

马克思为法国社会党人草拟的《工人调查表》,共提出近一百个

问题。这些问题有助于全面了解城乡男女工人的生活 and 斗争的经济条件、身体条件、智力条件和道德条件。进行这样的调查,能够确切地了解 and 揭露资本主义剥削工人阶级的种种形式 and 方法,从而使无产阶级政党能够根据十分确切的事实材料来开展 and 领导工人运动。

自 1877 年 2 月底至 1879 年 3 月底,恩格斯在意大利革命工人组织上意大利联合会的机关报《平民报》上发表了《关于 1877 年德国选举给恩·比尼亚米的信》、《德国、法国、美国 and 俄国的工人运动》等五篇文章,帮助意大利工人了解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形势,向他们介绍了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斗争的成就 and 经验,从而指明他们所面临的斗争任务。

本卷收入的多篇文章反映了马克思 and 恩格斯根据英国 and 美国的实际来指导这两个国家工人运动的情况,其中恩格斯给英国工联机关报《劳动旗帜报》写的一系列文章占有突出的地位。

1877—1878 年的经济危机,使得大批英国工人遭到沉重打击,广大工人群众越来越不满现状,越来越关心社会问题,表现了某种政治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应邀为该报撰稿,自 1881 年 5 月初至 8 月初,共写了 11 篇文章。文章所涉及的都是英国工人当时极为关心的现实问题,内容十分丰富。恩格斯在这些文章中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介绍了欧洲大陆各国工人党的斗争经验和教训,研究了这一斗争的发展趋势。在《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雇佣劳动制度》等文章中,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剥削机制的分析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必须以“劳动资料——原料、工厂、机器——归工人自己所有!”(见本卷第 491 页)这个口号来取代“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一已经过时的旧口号;“工人阶级除非成为一切劳动资料——土地、

原料、机器的所有者,从而也成为他们自己劳动的全部产品的所有者,否则就得不到真正的解放”(见本卷第 494 页)。

《工联》这篇文章,评论了英国工联的功过,论述了单有工会组织和经济斗争还不能打破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的原因。恩格斯指出,“两大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必然会成为政治斗争”(见本卷第 499 页);在阶级反对阶级的政治斗争中,工人阶级为了自己在议会里有充分的代表权,以及为了准备废除雇佣劳动制度,必须要有组织,但不是个别行业的组织,而是整个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在《工人政党》这篇文章中,恩格斯希望英国工人阶级不再充当自由党的尾巴,而是要像德国和欧洲大陆各国工人阶级那样,把自己组成一个独立的政党,为取得政治权利、为取得本阶级在立法机关中的直接代表权而斗争。

在《对法国的通商条约》中,恩格斯根据新兴的工业国、特别是美国商品的竞争,英国工业垄断迅速衰落的事实,预言世界工业中心不久将从英国转移到美国。恩格斯在这组文章的最后一篇《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一文中,根据对英国土地贵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的分析,得出结论说:“资本家阶级也已经变得没有能力管理本国巨大的生产体系了……由此我们看到,不单单是我们不要资本家阶级干预就能够把本国的大工业管理得很好,而且他们的干预越来越成为一种祸害了。”(见本卷第 537 页)

恩格斯为美国一家周刊《劳动旗帜》撰写的一组文章《1877 年的欧洲工人》,向美国工人介绍了第一国际解散以后欧洲工人运动的总趋势和主要任务,评述了欧洲各国工人党的斗争和发展,宣传了第一国际的优良传统。恩格斯在第一篇文章的开头就指出,1877 年是欧洲工人阶级“大有收获的一年。几乎所有的国家在组织和扩大工人

政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展。曾经为一个虽小但很活跃的宗派所威胁的团结,实际上已经得到恢复。工人阶级运动愈益在日常政治生活中争得显著地位,而且各种政治事件……都总是这样或那样地有利于这个运动的发展”(见本卷第 163 页)。恩格斯在第四篇文章中赞扬了大革命以来法国工人阶级的光荣革命传统和充当欧洲革命先锋的作用,分析了法国工人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指出 1870 年以来法国农民对帝国的信心开始动摇,农民的这种政治觉醒为法国工人阶级同广大农民结成联盟创造了条件,并肯定“城市工人同乡村农民结成联盟之日正在临近”(见本卷第 179 页)。这组文章的最后一篇详细分析了俄国工人运动所处的环境和运动的发展情况,指出在俄国“孕育着不仅对俄国工人的未来而且对整个欧洲工人的未来都有极大意义的事件”(见本卷第 181 页),不可避免的俄国革命意味着欧洲整个形势将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一定会受到每个国家的工人兴高采烈的欢迎,被看作是向他们的共同目标——劳动的普遍解放——迈出的巨大的一步”(见本卷第 184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关注俄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和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为此他们大量阅读了俄国的文献资料,结识了一些俄国革命者、学者和思想家,深入研究了 1861 年农村改革后俄国的经济、土地制度和社会关系。马克思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四个草稿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等反映了他们对俄国问题的研究成果和对俄国发展道路的思考。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阐述了俄国农村公社的前景和历史作用以及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马克思研究了俄国农村公社的二重性,得

出俄国农村公社发展的两种前途：“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见本卷第 461 页）马克思指出，在俄国全国范围内广泛保存下来的农村公社，“目前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它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为它提供了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见本卷第 465 页）。但是俄国 1861 年的改革以后，由于国家的财政搜刮而被削弱的公社，“成了商业、地产、高利贷随意剥削的任人摆布的对象。这种外来的压迫激发了公社内部原来已经产生的各种利益的冲突，并加速了公社的各种瓦解因素的发展”（见本卷第 463 页）。马克思认为，“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 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见本卷第 469 页）后来在《共产党宣言》1882 年俄文第二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阐明了俄国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前提：“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见本卷第 548 页）

在上述两封信中，马克思坚决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说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按照这种理论，似乎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同一条道路。他反对对历史现象进行简单的类比，指出极为相似的事情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时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他强调，只有对具体的

历史环境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比较,才能找到理解事物的钥匙,如果只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见本卷第146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关注巴尔干各族人民的解放斗争。在《论东方问题》一文中,马克思阐述了关于1877—1878年俄土战争的基本见解。马克思在文章中指出,在这场战争中,无产阶级应该最坚决地站在土耳其人方面,这不仅是主持正义,而且也符合无产阶级本身的利益,“因为俄国人的失败会大大加速俄国的社会变革(变革的因素大量存在),从而会大大加速整个欧洲的剧变”(见本卷第15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同情和关心波兰人民争取民族自由与独立的斗争。他们与波兰革命者保持密切交往,通过各种形式支持和声援波兰人民的革命斗争。收入本卷的恩格斯《在1863年波兰起义纪念会上的演说》和马克思、恩格斯《致日内瓦1830年波兰革命50周年纪念大会》两篇文章,热情赞扬了波兰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前赴后继的英勇气概,赞扬了他们对欧洲革命斗争作出的贡献,同时呼吁他们把自己的斗争同俄国阶级兄弟的斗争联合起来。

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对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尤其是对原始社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本卷的不少材料反映了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恩格斯的《论德意志人的古代历史》的手稿描述了日耳曼民族在民族大迁徙以前的历史概况。恩格斯根据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根据有关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对日耳曼人的居住领域和各个部落的情况,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形成与演变作了概略的叙述。在《法兰克时代》这部手稿中,恩格斯探讨了封建社会初期的所有制关系和法律关系,说明了土地私有制产生的条件是怎样造成的,

地产的集中是怎样进行的,大地主阶级和依附于他们的农民阶级是怎样产生的,国家权力是怎样形成的,以及法兰克国家是怎样一个国家。在《法兰克时代》这部手稿中,恩格斯写了《注释:法兰克方言》一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总结了他对法兰克方言的研究。

恩格斯于1882年作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版附录发表的《马尔克》一文,同他研究德意志人的古代历史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该文中,恩格斯阐述了德国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和德国农民的命运。他指出,小规模的经营,日益变成“一种过时的、不再有生命力的经营方式”,农业“只有进行社会化经营和依靠社会去经营,才可能继续存在”;为此要采取一种更新了的土地公有制,“不但能保证小农社员得到大规模经营和采用农业机器的全部好处,而且能向他们提供资金……依靠公社去经营大工业”,从而使那些由于经营大农业和采用农业机器而被排挤出田野耕作的人,就在农村中从事工业劳动,以免他们因为没有工作而被迫涌向城市。(见本卷第584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以前各种社会形态的分析和论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

本卷中恩格斯为自己亲密战友卡尔·马克思和威廉·沃尔弗写的传记以及为悼念马克思和他的夫人及大女儿逝世写的几篇文章十分珍贵。在《威廉·沃尔弗》一文中,恩格斯介绍了这位“勇敢的忠诚的高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战斗一生和光辉业绩。在《卡尔·马克思》、《马克思墓前讲话草稿》、《卡尔·马克思的葬仪》和《卡尔·马克思的逝世》等文中,恩格斯介绍了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伟大一生,高度评价了马克思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建立的丰功伟绩,特别是他的划时代的两大理论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些文章对我们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具有指导意义。

本卷收入的文献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相应时期有关卷次收入的文献增加12篇,它们是恩格斯的《〈论德意志人的古代历史〉的提纲》和附录中的11篇文章:《格莱斯顿先生和俄国的阴谋》、《格莱斯顿先生》、《大鼓动家的真面目》、《关于俄国对波兰的蹂躏》、《关于〈前进报〉对法国危机的态度的简讯》、《涅瓦河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蒙特斯图亚特·埃尔芬斯通·格兰特-达夫爵士记同卡尔·马克思的会见》、《马克思对保尔·拉法格起草的法国工人党宣言草案的批注》、《关于西班牙社会主义运动的简讯》、《评1881年7月14—19日伦敦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和《对无产阶级的活体解剖》。原第1版相应卷次的《论美国资本的积聚》和《品特是怎样造谣的》,经考证不是恩格斯写的,不再收入本全集;《关于〈平等报〉停刊的声明》,经考证尚无法确定是恩格斯的手笔,因此未收入本卷。本卷收入的所有文献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5卷、1988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7卷和1984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4卷翻译或重新校订的。

参加本卷译文译校工作的有：
王宏道 冯世熹 韦建桦 李其庆

参加编辑资料工作的有：
章丽莉 王栋华 李锁贵 朱 羿 冯如馥
胡永钦 唐春华 沈 延 刘洪涛 李 楠

全卷译文由李成毅、王宏道审定

目 录

前言	1—12
卡·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	3—33
给威廉·白拉克的信	5
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	8
一	8
二	23
三	26
四	27
弗·恩格斯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书导言	34—37
弗·恩格斯 *给纽约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信	38—40
弗·恩格斯 *在 1863 年波兰起义纪念会上的演说	41—42
弗·恩格斯 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	43—62
一	45
二	57
弗·恩格斯 威廉·沃尔弗	63—108
一	66
二	71
三	75
四	79

五	82
六	85
七	90
八	94
九	99
十	103
十一	106
弗·恩格斯 对《公社史》第 29 页的意见(1870 年 10 月 30 日梯也尔先生的停战)	109—113
弗·恩格斯 *关于 1877 年德国选举给恩·比 尼亚米的信	114—116
弗·恩格斯 意大利的情况	117—122
弗·恩格斯 *英国农民要求参加国内政治斗争	123—125
弗·恩格斯 *英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和农村的 集体主义运动	126—127
弗·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	128—139
卡·马克思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	140—146
卡·马克思 *致某报编辑部	147
弗·恩格斯 *德国、法国、美国和俄国的工人运动	148—151
卡·马克思 *论东方问题	152—160
弗·恩格斯 1877 年的欧洲工人	161—184
一	163
二	167
三	171
四	176
五(终篇)	181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布赫尔先生 185—186
- 卡·马克思 *答布赫尔的《声明》 187—189
- 弗·恩格斯 《论德意志人的古代历史》的提纲
(最初的计划) 190
- 弗·恩格斯 *论德意志人的古代历史 191—254
- [凯撒和塔西佗] 193
- [和罗马的最初战斗] 209
- [民族大迁徙以前的进步] 226
- 注释:德意志诸部落 241
- 弗·恩格斯 法兰克时代 255—318
- 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的土地占有关系的变革 257
- 区制度和军事制度 271
- 注释:法兰克方言 283
- 卡·马克思 乔治·豪威耳先生的国际工人协会史 319—326
- 弗·恩格斯 *恩格斯关于他的妻子莉·白恩士逝
世的讣告 327
- 卡·马克思 *帝国国会关于反社会党人法的辩论
(文章草稿) 328—341
- 弗·恩格斯 *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俄国的
现状 342—343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给奥·倍倍尔、威·
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 344—363
- 一 同卡·希尔施的谈判 344
- 二 给报纸确定的立场 351
- 三 三个苏黎世人的宣言 355
- 弗·恩格斯 *评卡尔·布林德《拿破仑亲王与

《欧洲民主》一文	364 — 366
弗·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367 — 414
一	371
二	386
三	395
弗·恩格斯 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	415 — 424
一 关税率	415
二 国有铁路	420
卡·马克思 *关于《哲学的贫困》	425 — 426
卡·马克思 *工人调查表	427 — 436
一	427
二	429
三	430
四	434
卡·马克思 *弗·恩格斯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 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前言	437 — 441
卡·马克思 *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草案)	442 — 443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致日内瓦 1830 年波兰 革命 50 周年纪念大会	444 — 446
弗·恩格斯 *不许通奸	447 — 451
卡·马克思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	453 — 483
[初稿]	455
[二稿]	470
[三稿]	475
[四稿]	481
[复信]	482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致斯拉夫人在伦敦举行的巴黎公社纪念大会主席	484 — 485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致《每日新闻》编辑	486 — 487
弗·恩格斯 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	488 — 491
弗·恩格斯 雇佣劳动制度	492 — 494
弗·恩格斯 工联	495 — 501
一	495
二	498
弗·恩格斯 对法国的通商条约	502 — 507
弗·恩格斯 两个模范市议会	508 — 511
弗·恩格斯 美国食品和土地问题	512 — 514
弗·恩格斯 反谷物法同盟的工资理论	515 — 519
弗·恩格斯 工人政党	520 — 523
弗·恩格斯 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	524 — 527
弗·恩格斯 致《自由》编辑部	528 — 529
弗·恩格斯 棉花和铁	530 — 533
弗·恩格斯 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	534 — 537
弗·恩格斯 *在燕妮·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草稿	538 — 540
弗·恩格斯 燕妮·马克思(父姓冯·威斯特华伦)	541 — 543
弗·恩格斯 *在燕妮·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544 — 546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俄文 第二版序言	547 — 548
弗·恩格斯 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	549 — 558
弗·恩格斯 *《布雷的牧师》译文与后记	559 — 563
弗·恩格斯 马尔克	565 — 584

弗·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德文第一版序言	585 — 587
弗·恩格斯	燕妮·龙格(父姓马克思)	588 — 589
弗·恩格斯	*给《纽约人民报》的电报	590
弗·恩格斯	*马克思墓前讲话草稿	591 — 593
弗·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的葬仪	594 — 601
弗·恩格斯	致《纽约人民报》编辑部	602 — 603
弗·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的逝世	604 — 613
	一	604
	二	608

附 录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 1876 年		
2 月 7 日伦敦工人教育协会成立 36 周年庆祝会		
	上的讲话	617 — 618
马尔特曼·巴里	格莱斯顿先生和俄国的阴谋	619 — 621
马尔特曼·巴里	格莱斯顿先生	622 — 627
马尔特曼·巴里	大鼓动家的真面目	628 — 631
凯斯·奥克莱里	*关于俄国对波兰的蹂躏	632 — 633
	*关于《前进报》对法国危机的态度的简讯	634 — 635
威廉·布洛斯	涅瓦河和博斯普鲁斯海峡	636 — 638
	*《芝加哥论坛报》发表的卡尔·马克思访问记	639 — 653
*蒙特斯图亚特·埃尔芬斯通·格兰特-达夫爵士记		
	同卡尔·马克思的会见	654 — 657
	*法国工人党最低纲领(草案)	658 — 659

政治纲领	658
经济纲领	658
*马克思对保尔·拉法格起草的法国 工人党宣言草案的批注	660—684
*约翰·斯温顿在《太阳报》上发表的卡尔·马克思 访问记	685—688
*关于西班牙社会主义运动的简讯	689
威廉·李卜克内西 *评 1881 年 7 月 14—19 日伦敦 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	690—691
卡尔·考茨基 对无产阶级的活体解剖(由恩格斯 倡议并参与写成)	692—695
注释	697
人名索引	787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846
文献索引	849
报刊索引	881
地名索引	893

插 图

卡·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手稿第 1 页	9—10
卡·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手稿第 2 页	11—12
1925 年上海解放丛书出版社和 1939 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 (作为“马恩丛书”第 10 种) 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一书的中译本、及 1923—1930 年发表在上海《马克思论 文选译》一书、湖南《新时代》杂志、上海《时事新报》副刊	

《学灯》上的中译文	12 — 13
卡·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的第 1 页	141 — 142
弗·恩格斯《论德意志人的古代历史》一文中日耳曼人移 住图	248 — 249
弗·恩格斯《法兰克方言》一文中的日耳曼方言图	300 — 301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通告信手稿第 1 页	347 — 348
1912 — 1938 年我国出版的弗·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 科学的发展》几种中译本和发表在浙江《新世界》、上海《民国 日报》副刊《觉悟》杂志上的中译文, 及 1938 年延安解放社 出版(作为“马恩丛书”第 3 种)的中译本	366 — 367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法文 第一版的扉页	369 — 370
卡·马克思为弗·恩格斯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 发展》法文版所写的前言的最后 1 页	439 — 440
卡·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的手稿第 3 页	457 — 458
载有弗·恩格斯的《卡尔·马克思的葬仪》一文的 1883 年 3 月 22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3 号头版	595 — 596

卡 · 马 克 思

和

弗 · 恩 格 斯

1875 年 4 月—1883 年 5 月

卡·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

卡·马克思大约写于 1875 年
4 月底—最迟 5 月 7 日

载于 1890—1891 年《新时代》
杂志第 1 卷第 18 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5 卷翻译

给威廉·白拉克的信

1875年5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白拉克：

下面对合并纲领的批判性批注，请您阅后转交盖布和奥尔、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过目。**注意：手稿必须退还给您，以便我必要时使用。**^①我工作太忙，已经不得不远远超过医生给我限定的工作量。所以，写这么长的东西，对我来说决不是一种“享受”。但是，为了使党内朋友们（这个通知就是为他们写的）以后不致误解我不得不采取的步骤，这是必要的。

这里指的是，在合并大会²以后，恩格斯和我将要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³，内容是：我们同上述原则性纲领毫不相干，同它没有任何关系。^②

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在国外有一种为党的敌人所热心支持的见解——一种完全荒谬的见解，仿佛我们从这里秘密地操纵所谓爱森纳赫党⁴的运动。例如巴枯宁还在他新近出版的一本俄文著作⁵中要我不仅为这个党的所有纲领等等负责，甚至要为李卜克内西自从

① 这句话在马克思手稿中写在信头上，并标上一个符号+。1891年发表时没有这句话。——编者注

② 1891年发表时删去了这段话。——编者注

和人民党⁶合作以来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负责。⁷①

此外,我的义务也不容许我即使用外交式的沉默来承认一个我认为极其糟糕的、会使党精神堕落的纲领。

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所以,既然不可能——而局势也不容许这样做——**超过爱森纳赫纲领⁸**,那就干脆缔结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行动协定。但是,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应该把这件事推迟到由较长时间的共同工作准备好了的时候),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

拉萨尔派的首领们靠拢我们,是因为他们为形势所迫。如果一开始就向他们声明,决不拿原则做交易,那么他们就不得不满足于一个行动纲领或共同行动的组织计划。可是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允许他们拿着委托书来出席,并且自己承认这种委托书是有约束力的,就是说,向那些本身需要援助的人无条件投降。⁹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在**妥协代表大会以前就又召开代表大会**,而自己的党却在**事后才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¹⁰人们显然是想回避一切批评,不让自己的党有一个深思的机会。^②大家知道,合并这一事实本身是使工人感到满意的;但是,如果有人以为这种一时的成功不是用过高的代价换来的,那他就错了。

况且,撇开把拉萨尔的信条奉为神圣这一点不谈,这个纲领也是完全要不得的。

我将在最近把《资本论》法文版的最后几分册寄给您。排印工作

① 1891年发表时删去了“不仅”二字和“甚至……负责”这半句话。——编者注

② 1891年发表时删去了这句话。——编者注

因法国政府禁止而耽搁了很久。在本星期内或下星期初本书可以印完。前六分册您收到了没有？请把伯恩哈德·贝克尔的地址也告诉我，我也要把最后几分册¹¹寄给他。^①

人民国家报出版社¹²有自己的习惯。例如到现在为止连一本新版的《科隆共产党人案件》^②也没有给我寄来。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卡尔·马克思

① 1891年发表时删去了这段话。——编者注

② 指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75年第2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471—545页。——编者注

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

1.“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而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中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

本段第一部分：“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

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上面那句话在一切儿童识字课本里都可以找到,并且在劳动具备相应的对象和资料的前提下是正确的。可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不应当容许这种资产阶级的说法回避那些惟一使这种说法具有意义的条件。只有一个人一开始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作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资产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硬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因为正是由于劳动的自然制约性产生出如下的情况: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另一些已经

M. Bracke

4. Nov. 2. Jahrgang in der X-ten Ausgabe
Dass ein solches Buch zu spät steht.

Lieber Bracke

zu dem Cultursprogramm

Wiederholt ist es schon bemerkt worden, dass die Kultur- und Wissenschaften in der Zeit der Neuzeit, welche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als Gegenstand der Forschung der Wissenschaften vor sich haben, in der That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als Gegenstand der Forschung der Wissenschaften vor sich haben. Das ist die Sache der Naturwissenschaften, welche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als Gegenstand der Forschung der Wissenschaften vor sich haben. Das ist die Sache der Naturwissenschaften, welche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als Gegenstand der Forschung der Wissenschaften vor sich haben.

Das ist die Sache der Naturwissenschaften, welche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als Gegenstand der Forschung der Wissenschaften vor sich haben. Das ist die Sache der Naturwissenschaften, welche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als Gegenstand der Forschung der Wissenschaften vor sich haben. Das ist die Sache der Naturwissenschaften, welche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als Gegenstand der Forschung der Wissenschaften vor sich haben. Das ist die Sache der Naturwissenschaften, welche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als Gegenstand der Forschung der Wissenschaften vor sich haben.

Das ist die Sache der Naturwissenschaften, welche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als Gegenstand der Forschung der Wissenschaften vor sich haben. Das ist die Sache der Naturwissenschaften, welche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als Gegenstand der Forschung der Wissenschaften vor sich haben. Das ist die Sache der Naturwissenschaften, welche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als Gegenstand der Forschung der Wissenschaften vor sich haben.

Das ist die Sache der Naturwissenschaften, welche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als Gegenstand der Forschung der Wissenschaften vor sich haben. Das ist die Sache der Naturwissenschaften, welche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als Gegenstand der Forschung der Wissenschaften vor sich haben. Das ist die Sache der Naturwissenschaften, welche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als Gegenstand der Forschung der Wissenschaften vor sich haben. Das ist die Sache der Naturwissenschaften, welche die Naturwissenschaften als Gegenstand der Forschung der Wissenschaften vor sich haben.

25

成了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生存。

现在不管这句话有什么毛病,我们且把它放在一边。那么结论应当怎样呢?显然应当是:

“因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所以社会中的任何人不占有劳动产品就不能占有财富。因此,如果他自己不劳动,他就是靠别人的劳动生活,而且也是靠别人的劳动获得自己的文化。”

可是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借助于“而因为”这样的字眼硬接上第二句话,以便从第二句,而不是从第一句作出结论来。

本段第二部分:“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中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

按照第一句话,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就是说,任何社会都不能离开劳动。相反地,我们现在却看到,任何“有益的”劳动都不能离开社会。

那么同样可以说,只有在社会中,无益的、甚至有损公益的劳动才能成为一种行业,只有在社会中才能游手好闲过日子,如此等等,——一句话,可以抄袭卢梭的全部著作了。

而什么是“有益的”劳动呢?那只能是产生预期的有益结果的劳动。一个蒙昧人(而人在他已不再是猿以后就是蒙昧人)用石头击毙野兽,采集果实等等,就是进行“有益的”劳动。

第三,结论:“而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中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

多妙的结论!既然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中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劳动所得就应当属于社会,其中只有不必用来维持劳动“条件”

即维持社会的那一部分,才归各个劳动者所得。

事实上,这个论点在一切时代都被当时的社会制度的先驱^①提出过。首先要满足政府以及依附于它的各个方面的要求,因为政府是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机关;其次要满足各种私有者^②的要求,因为各种私有财产是社会的基础,如此等等。你们看,这些空洞的词句是随便怎么摆弄都可以的。

本段第一和第二两部分只有像下面这样说才能有些合乎情理的联系:

“劳动只有作为社会的劳动”,或者换个说法,“只有在社会中和通过社会”,“才能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

这个论点无可争辩地是正确的,因为孤立的劳动(假定它的物质条件是具备的)即使能创造使用价值,也既不能创造财富,又不能创造文化。

但是另一个论点也是同样无可争辩的:

“随着劳动的社会性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劳动之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劳动者方面的贫穷和愚昧、非劳动者方面的财富和文化也发展起来。”

这是直到目前的全部历史的规律。因此,不应当泛泛地谈论“劳动”和“社会”,而应当在这里清楚地证明,在现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怎样最终创造了物质的和其他的条件,使工人能够并且不得不铲除这个历史祸害^③。

① 1891年发表时这里是“捍卫者”。——编者注

② 1891年发表时这里是“私有财产”。——编者注

③ 1891年发表时这里是“社会祸害”。——编者注

实际上,把这整个行文和内容都不妥当的条文放在这里,只不过是為了把拉萨尔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作为口号写在党旗的上方。以后我还要回过来谈“劳动所得”、“平等的权利”等等,因为同样的东西在下面又以稍微不同的形式重复出现。

2.“在现代社会,劳动资料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由此造成的工人阶级的依附性是一切形式的贫困和奴役的原因。”

这段从国际章程中抄来的话,经过这番“修订”就变成错误的了。①

在现代社会,劳动资料为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所垄断(地产的垄断甚至是资本垄断的基础)。无论是前一个或者后一个垄断者阶级,国际章程在有关条文中都没有提到。它谈到的是“**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生活源泉”这一补充语充分表明,劳动资料也包括土地。

作这种修订,是因为拉萨尔由于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仅仅攻击资本家阶级,而不攻击土地所有者。¹³在英国,资本家甚至多半不是他的工厂所在的那块土地的所有者。

3.“劳动的解放要求把劳动资料提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要求集体调节总劳动并公平分配劳动所得。”

“把劳动资料提高为公共财产”!应当是说把它们“变为公共财

① 马克思起草的《协会临时章程》的原话是：“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编者注

产”。这不过是顺便提一句罢了。

什么是“劳动所得”呢？是劳动的产品呢，还是产品的价值？如果是后者，那么，是产品的总价值呢，或者只是劳动新加在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上的那部分价值？

“劳动所得”是拉萨尔为了代替明确的经济学概念而提出的一个模糊观念。

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

难道资产者不是断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惟一“公平的”分配吗？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的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从经济关系中产生出法的关系吗？难道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关于“公平的”分配不是也有各种极不相同的观念吗？

为了弄清楚“公平的分配”一语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我们必须把第一段和本段对照一下。本段设想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劳动资料是公共财产，总劳动是由集体调节的”，而在第一段我们则看到，“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

“属于社会一切成员”？也属于不劳动的成员吗？那么“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又在哪里呢？只属于社会中劳动的成员吗？那么社会一切成员的“平等的权利”又在哪里呢？

“社会一切成员”和“平等的权利”显然只是些空话。问题的实质在于：在这个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个劳动者都应当得到拉萨尔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

如果我们把“劳动所得”这个用语首先理解为劳动的产品，那么集体的劳动所得就是**社会总产品**。

现在从它里面应当扣除：

第一,用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

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

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

从“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中扣除这些部分,在经济上是必要的,至于扣除多少,应当根据现有的物资和力量来确定,部分地应当根据概率计算来确定,但是这些扣除无论如何根据公平原则是无法计算的。

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另一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

在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得从里面扣除:

第一,同生产没有直接^①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

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一开始就会极为显著地缩减,并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

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

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一开始就会显著地增加,并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长。

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

只有现在才谈得上纲领在拉萨尔的影响下狭隘地专门注意的那种“分配”,就是说,才谈得上在集体中的各个生产者之间进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费资料。

“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有折有扣的”了,虽然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利益。

① 1891年发表时没有“直接”一词。——编者注

正如“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一语消失了一样，现在，“劳动所得”一语本身也在消失。

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于是，“劳动所得”这个由于含义模糊就是现在也不能接受的用语，便失去了任何意义。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全部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各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的一份。他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公共基金而进行的劳动），他根据这张凭证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领回来。

显然，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情况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么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是**平均来说**才存在,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

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要当作尺度来用,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作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作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因此,在提供的劳动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基金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①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我较为详细地一方面谈到“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另一方面谈到“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是为了指出这些人犯了多么大的罪,他们一方面企图把那些在某个时期曾经有一些意义,而现在已变成陈词滥调的见解作为教条重新强加于我们党,另一方面又用民主主义者和法国社会主义者所惯用的、凭空想像的关于权利等等的废话,来歪曲那些花费了很大力量才灌输给党而现在已在党内扎了根的现实主义观点。

除了上述一切之外,在所谓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就产生现在这样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如果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

^① 1891年发表时这里没有“他们的”。——编者注

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围绕着分配兜圈子。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

4.“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它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

前一句是从国际章程的导言中抄来的,但是经过了“修订”。那里写道:“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情”^①;这里却说“工人阶级”应当解放——解放什么?——“劳动”。谁能理解,就让他去理解吧。

另一方面,作为补偿,后一句引用了地道的拉萨尔的话:“对它(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组成反动的一帮。”

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资产阶级,作为大工业的体现者,对封建主和中间等级说来,在这里是被当作革命阶级看待的,而封建主和中间等级力求保持过时的生产方式所创造的一切社会阵地。所以他们并不是同资产阶级一起只组成反动的一帮。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说来是革命的,因为无产阶级本身是在大工业基地上成长起来的,它力求使生产摆脱资产阶级企图

① 马克思起草的《协会临时章程》的原话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编者注

永远保存的资本主义性质。但是,《宣言》又补充说:“中间等级……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

所以,从这个观点看来,说什么对工人阶级说来,中间等级“同资产阶级一起”并且加上封建主“只组成反动的一帮”,这也是荒谬的。

难道在最近这次选举¹⁴中有人向手工业者、小工业家等等以及农民说过:对我们说来,你们同资产者和封建主一起只组成反动的一帮吗?

拉萨尔熟知《共产党宣言》,就像他的信徒熟知他写的福音书一样。他这样粗暴地歪曲《宣言》,不过是为了粉饰他同专制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这些敌人结成的反资产阶级联盟。

此外,在上面这一段,他的格言是勉强塞进去的,它同那句从国际章程中摘来但被歪曲了的引语毫不相干。这纯粹是一种狂妄无耻的做法,而且绝对不是俾斯麦先生所不喜欢的,这是柏林的马拉¹⁵所干的廉价的蛮横行径之一。

5.“工人阶级为了本身的解放,首先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同时意识到,它的为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所共有的那种努力必然产生的结果,将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

同《共产党宣言》和先前的一切社会主义相反,拉萨尔从最狭隘的民族观点来理解工人运动。有人竟在这方面追随他,而且这是在国际¹⁶进行活动以后!

不言而喻,为了能够进行斗争,工人阶级必须在国内作为阶级组织起来,而且它的直接的斗争舞台就是本国。所以,它的阶级斗争不就内容来说,而像《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就形式来说”,是本国范围内的斗争。但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例如德意志帝国,本身又

在经济上处在“世界市场的范围内”，在政治上“处在国家体系的范围内”。任何一个商人都知道德国的贸易同时就是对外贸易，而俾斯麦先生的伟大恰好在于他实行一种**国际的政策**。

而德国工人党把自己的国际主义归结为什么呢？就是意识到它的努力所产生的结果“将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这句从资产阶级的和平和自由同盟¹⁷那里抄来的话，是要用来代替各国工人阶级在反对各国统治阶级及其政府的共同斗争中的国际兄弟联合的。这样，**关于德国工人阶级的国际职责竟一字不提！**德国工人阶级竟然应当这样去对付为反对它而已经同其他一切国家的资产者实现兄弟联合的本国资产阶级，对付俾斯麦先生的国际阴谋政策¹⁸！

实际上，这个纲领的国际信念，比自由贸易派¹⁹的国际信念**还差得难以估量**。自由贸易派也说，它的努力所产生的结果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但是它还做一些事使贸易成为国际性的，而决不满足于意识到一切民族只在本国从事贸易。

各国工人阶级的国际活动绝对不依赖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存在。“国际工人协会”只是为这种活动创立一个中央机关的第一个尝试；这种尝试由于它所产生的推动力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成绩，但是在巴黎公社失败之后，已经不能再以它的**第一个历史形态**继续下去了。

俾斯麦的《北德报》为了使其主子满意，宣称德国工人党在新纲领中放弃了国际主义，这倒是完全说对了。²⁰

二

“德国工人党从这些原则出发，用一切合法手段去

争取建立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废除工资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和——任何形式的剥削，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

关于“自由”国家，我后面再讲。

这样，德国工人党将来就必须信奉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²¹了！为了不让它埋没掉，竟胡说什么“废除工资制度（应当说：雇佣劳动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如果我废除了雇佣劳动，我当然也就废除了它的规律，不管这些规律是“铁的”还是海绵的。但是拉萨尔反对雇佣劳动的斗争几乎只是围绕着这个所谓的规律兜圈子。所以，为了证明拉萨尔宗派已经获得胜利，应当废除“工资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而不是不连同后者。

大家知道，在“铁的工资规律”中，除了从歌德的“永恒的、铁的、伟大的规律”²²中抄来的“铁的”这个词以外，没有什么东西是拉萨尔的。“铁的”这个词是正统的信徒们借以互相识别的一个标记。但是，如果我接受带有拉萨尔印记因而是拉萨尔所说的意义上的规律，我就不得不连同他的论据一起接受下来。这个论据是什么呢？正如朗格在拉萨尔死后不久所表明的²³，这就是（朗格自己宣扬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²⁴。但是，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我即使把雇佣劳动废除一百次，也还废除不了这个规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规律不仅支配着雇佣劳动制度，而且支配着一切社会制度。经济学家们五十多年以来正是以此为根据证明，社会主义不能消除自然本身造成的贫困，而只能使它普遍化，使它同时分布在社会的整个表面上！

但是，这一切都不是主要的。完全撇开拉萨尔对这个规律的错误表述不谈，真正令人气愤的退步在于：

自从拉萨尔死后,在我们党内,这样一种科学见解已经给自己开辟了道路,就是工资不是它表面上呈现的那种东西,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隐蔽形式。这样,过去关于工资的全部资产阶级见解以及对这种见解的全部批评都被彻底推翻了,并且弄清了:雇佣工人只有为资本家(因而也为同资本家一起分享剩余价值的人)白白地劳动一定的时间,才被允许为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劳动,就是说,才被允许生存;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中心问题,就是用延长工作日,或者提高生产率,增强劳动力的紧张程度等等办法,来增加这个无偿劳动;因此,雇佣劳动制度是奴隶制度,而且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越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越残酷,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好或是较坏。而现在,当这个见解在我们党内越来越给自己开辟出道路的时候,竟有人倒退到拉萨尔的教条那里去,虽然他们应当知道,拉萨尔并不懂得什么是工资,而是跟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事物的外表当作事物的本质。

这正像奴隶们终于发现了自己受奴役的秘密而举行起义时,其中有一个为陈旧观念所束缚的奴隶竟在起义的纲领上写道:奴隶制度必须废除,因为在奴隶制度下,奴隶的给养最多不能超过某个非常低的标准!

我们党的代表们竟如此粗暴地践踏这个在党员群众中广泛传播的见解,仅仅这一事实岂不就证明了他们在草拟妥协纲领时是多么令人不能容忍地轻率,多么无耻①!

本段末尾“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这一不明确的语

① 1891年发表时没有“多么令人不能容忍地”和“多么无耻”。——编者注

句,应当改成:随着阶级差别的消灭,一切由这些差别产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自行消失。

三

“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德国工人党要求在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下,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在工业和农业中,生产合作社必须广泛建立,以致能从它们里面产生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的组织。”

在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之后,就是这个先知提出的救世良方!“道路”确实“开辟”得不错!现存的阶级斗争被换上了拙劣的报刊作家的空话——要“开辟道路”来“解决”的“社会问题”。“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的组织”不是从社会的革命转变过程中,而是从国家给予生产合作社的“国家帮助”中“产生”的,并且这些生产合作社是由国家而不是由工人“建立”的。这真不愧为拉萨尔的幻想:靠国家贷款能够建设一个新社会,就像能够建设一条新铁路一样!

由于还知道一点羞耻,于是就把“国家帮助”置于——“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下”。

第一,德国的“劳动人民”大多数是农民而不是无产者。

第二,“民主的”这个词在德语里意思是“人民当权的”。什么是“劳动人民的人民当权的监督”呢?何况所说的是这样的劳动人民,他们通过向国家提出的这些要求表明,他们充分意识到自己既没有当权,也没有成熟到当权的程度!

在这里深入批评毕舍在路易-菲利浦时代为了对付法国社会主义者而开列的、被《工场》派的反动工人所采用的药方²⁵,那是多余

的。主要的过失不在于把这个特殊的万灵药方写入了纲领，而在于从阶级运动的立场完全退到宗派运动的立场。

如果说工人们想要在社会范围内，首先是在本国的范围内创造合作生产的条件，这只是表明，他们力争变革现存的生产条件，而这同靠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毫无共同之处！至于现有的合作社，它们只是在工人自己独立创办，既不受政府保护，也不受资产者保护的情况下，才有价值。

四

现在我来谈民主的一节。

A. “国家的自由的基础。”

首先，照第二节的说法，德国工人党争取建立“自由国家”。

自由国家，这是什么东西？

使国家变成“自由的”，这决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臣民见识²⁶的工人的目的。在德意志帝国，“国家”几乎同在俄国一样地“自由”。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

德国工人党——至少是当它接受了这个纲领的时候——表明：它对社会主义思想领会得多么肤浅，它不把现存社会（对任何未来社会也是一样）当作现存**国家的**（对未来社会来说是未来国家的）**基础**，反而把国家当作一种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的独立存在物。

而且纲领还荒谬地滥用了“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等字眼，甚至更荒谬地误解了向之提出自己要求的那个国家！

“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有了发展。“现代国家”却随国境而异。它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同在瑞士不一样，在英国同在美国不一样。所以，“现代国家”是一种虚构。

但是，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立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只是这种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罢了。所以，它们具有某些根本的共同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谈“现代国家制度”，而未来就不同了，到那时“现代国家制度”现在的根基即资产阶级社会已经消亡了。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在的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否则，即使你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词联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但是，这个纲领既不谈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也不谈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

纲领的政治要求除了人所共知的民主主义的陈词滥调，如普选权、直接立法、人民权利、国民军等等，没有任何其他内容。这纯粹是

资产阶级的人民党⁶、和平和自由同盟¹⁷的呼声。所有这些要求，只要不是靠幻想夸大的，都已经实现了。不过实现了这些要求的国家不是在德意志帝国境内，而是在瑞士、美国等等。这类“未来国家”就是现代国家，虽然它是存在于德意志帝国的“范围”以外。

但是他们忘记了一点。既然德国工人党明确地声明，它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内，就是说，是在自己的国家即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内进行活动，——否则，它的大部分要求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人们只要求他们还没有的东西，——那么，它就不应当忘记主要的一点，就是说，这一切美妙的玩意儿都建立在承认所谓人民主权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只有在民主共和国内才是适宜的。

既然他们没有勇气^①像法国工人纲领在路易-菲利浦和路易-拿破仑时代那样要求民主共和国，——而这是明智的，因为形势要求小心谨慎，——那就不应当采取这个既不“诚实”²⁷也不体面的^②手法：居然向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同时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成、以警察来保护的军事专制国家，要求只有在民主共和国里才有意义的东西，并且还向这个国家庄严地保证，他们认为能够“用合法手段”从它那里争得这类东西！^③

庸俗民主派把民主共和国看作千年王国²⁸，他们完全没有想到，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的国家形式里阶级斗争要进行最后的决战，——就连这样的庸俗民主派也比这种局限于为警察所容许

① 1891年发表时这里是“既然他们不可能”。——编者注

② 1891年发表时删去了“既不‘诚实’也不体面的”这几个字。——编者注

③ 1891年发表时删去了“并且……这类东西！”这半句话。——编者注

而为逻辑所不容许的范围内的民主主义高明得多。

事实上,他们是把“国家”理解为政府机器,或者理解为构成一个由于分工而同社会分离的独特机体的国家,这可以从下面的话得到证明:“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经济的基础**:……交纳单一的累进所得税……”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的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的经济的基础。在存在于瑞士的“未来国家”里,这种要求差不多已经实现了。所得税是以不同社会阶级的不同收入来源为前提,因而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前提。所以,利物浦的财政改革派——以格莱斯顿的弟弟为首的资产者——提出和这个纲领相同的要求,这是不足为奇的。

B.“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基础**:

1.由国家实行普遍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实行普遍的义务教育。实行免费教育。”

平等的国民教育?他们怎样理解这句话呢?是不是以为在现代社会中(而所谈到的只能是现代社会)教育对一切阶级都可以是**平等的**的呢?或者是要求用强制的方式使上层阶级也降到国民学校这种很低的教育水平,即降到仅仅适合于雇佣工人甚至农民的经济状况的教育水平呢?

“实行普遍的义务教育。实行免费教育。”前者甚至存在于德国,后者就国民学校来说存在于瑞士和美国。如果说,在美国的几个州里,“高一级的”学校也是“免费的”,那么,事实上这不过是从总税收中替上层阶级支付了教育费用而已。顺便指出,A项第5条所要求的“实行免费诉讼”也是如此。刑事诉讼到处都是免费的;而民事诉讼几乎只涉及财产纠纷,因而几乎只同有产阶级有关。难道他们应

当用人民的金钱来打官司吗？

在关于学校的一段中，至少应当把技术学校（理论的和实践的）同国民学校联系起来提出。

“由国家实行国民教育”是完全要不得的。用一般的法律来确定国民学校的经费、教员资格、教学科目等等，并且像美国那样由国家视察员监督这些法律规定的实施，这同指定国家为人民的教育者完全是两回事！相反地，应当把政府和教会对学校的任何影响都同样排除掉。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他们会说，他们谈的是“未来国家”，但是这种空洞的遁辞也无济于事；我们已经看到，这是怎样一回事了），倒是需要由人民对国家进行极严厉的教育。

但是整个纲领，尽管满是民主的喧嚣，却彻头彻尾地感染了拉萨尔宗派对国家的忠顺信仰，或者说感染了并不比前者好一些的对民主奇迹的信仰，或者说得更正确些，整个纲领是这两种对奇迹的信仰的妥协，这两种信仰都同样远离社会主义。

“科学自由”——普鲁士宪法中有一条就是这样写的。为什么把它写在这里呢？

“信仰自由”！如果现在，在进行文化斗争²⁹的时候，要想提醒自由主义者记住他们的旧口号，那么只有采用下面这样的形式才行：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可能满足自己的宗教需要，就像满足自己的肉体需要一样^①，不受警察干涉。但是，工人党本来应当乘此机会说出自己的看法：资产阶级的“信仰自由”不过是容忍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已，工人党则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但是他们不愿越过“资产阶级的”水平。

① 1891年发表时这里是“满足自己的宗教需要……”——编者注

现在我就要讲完了，因为纲领中接下去的附带部分不是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在这里只简单地谈一谈。

2.“正常的工作日。”

其他任何国家的工人党都没有局限于这种含糊的要求，而总是明确地指出，在当前条件下多长的工作日是正常的。

3.“限制妇女劳动和禁止儿童劳动。”

如果限制妇女劳动指的是工作日的长短和工间休息等等，那么工作日的正常化就应当已经包括了这个问题；否则，限制妇女劳动只能意味着在那些对妇女身体特别有害或者对女性来说违反道德的劳动部门中禁止妇女劳动。如果指的是这一点，那就应当说清楚。

“禁止儿童劳动”！这里绝对必须指出**年龄界限**。

普遍禁止儿童劳动是同大工业的存在不相容的，所以这是空洞的虔诚的愿望。

实行这一措施——如果可能的话——是反动的，因为在按照不同的年龄阶段严格调节劳动时间并采取其他保护儿童的预防措施的前提下，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

4.“对工厂工业、作坊工业和家庭工业实行国家监督。”

在普鲁士德意志这样一个国家里，应当明确地要求：工厂视察员只有经过法庭才能撤换；每个工人都可以向法庭告发视察员的失职行为；视察员必须是医生。

5.“调整监狱劳动。”

在一个一般性的工人纲领里面，这是一种微不足道的要求。无论如何应当明白说出，工人们不愿意由于担心竞争而让一般犯人受到牲畜一样的待遇，特别是不愿意使他们失掉改过自新的惟一手段即生产劳动。这是应当期望于社会主义者的最低限度的东西。

6.“实行有效的责任法。”

应当说明，“有效的”责任法是什么意思。

顺便指出，在正常的工作日这一条中，忽略了工厂立法中关于卫生设施和安全措施等等那一部分。只有当这些规定遭到破坏时，责任法才发生效力。

总之，这一附带部分也是写得很草率的。^①

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³⁰

^① 1891年发表时删去了这句话。——编者注

弗·恩格斯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书导言³¹

下面这篇文章是我被卷入同一位名叫彼得·尼基提奇·特卡乔夫的先生进行论战时写的。在一篇评论伦敦出版的俄文杂志《前进》的文章(1874年《人民国家报》第117号和第118号)中,我曾经完全附带地提到了这位先生的名字,但是,这一提却惹起了他对我的可敬的敌意。特卡乔夫先生立即发表了一封《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1874年苏黎世),在这封信中,他给我胡诌了一大堆奇奇怪怪的事情,然后,针对着我的极端无知,大谈他自己对俄国实际状况和社会革命前途的看法。这篇劣等作品从形式到内容都带有一般的巴枯宁主义的烙印。该信是用德文发表的,所以我认为值得费点功夫在《人民国家报》上作出答复(见《流亡者文献》第4篇和第5篇,1875年《人民国家报》第36号和以后几号)。我的答复的第一部分主要是分析巴枯宁主义者进行文字斗争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把一大堆不加掩饰的谎言强加在对方身上。对于这个主要谈个人方面的部分来说,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就已经完全足够了。因此我在这里把它略去,而在根据出版社的意见出版的单行本中只留下了第二部分,这一部分主要探讨1861年以来,即所谓农民解放以来俄国

的社会状况。

俄国事态的发展,对德国工人阶级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现存的俄罗斯帝国是整个西欧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根有力支柱。这在1848年和1849年已经非常清楚地显示出来了。由于德国在1848年没有及时促使波兰起义并同沙皇作战(像《新莱茵报》一开始就要求的那样),以致这个沙皇能够在1849年镇压了已经迫近维也纳大门的匈牙利革命,在1850年又在华沙裁判了奥地利、普鲁士和德意志各小邦³²并恢复了旧联邦议会。就在几天以前,即1875年5月初,俄国沙皇正像25年前一样,在柏林接受了他的仆从们的效忠宣誓,从而证明了在今天他也依然是欧洲的仲裁人。西欧的任何革命,只要在近旁还存在着现在这个俄罗斯国家,就不能获得彻底胜利。而德国却是俄国最近的邻国,因此俄国反动派军队的第一个冲击便会落到德国身上。因而,俄罗斯沙皇制度的覆灭,俄罗斯帝国的灭亡便成了德国无产阶级取得最终胜利的首要条件之一。

但是,它的覆灭绝不能从外部引起,虽然外部战争有可能大大加速它的覆灭。俄罗斯帝国内部具有正在大力促使它崩溃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就是**波兰人**。他们经过百年来的压迫,已处于这样的境地:或者起来革命,支持西欧的一切真正的革命起义,作为解放波兰的第一步;或者就只有灭亡。现在他们恰好处于这种境况,即他们只能在无产阶级阵营里寻找自己的西欧盟友。近百年来,他们不断地被西欧的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出卖。在德国,资产阶级一般地只是从1848年起才算数的,从那时以来它始终敌视波兰人。在法国,1812年拿破仑出卖了波兰人,而由于这次背叛,他的远征失败了,皇冠和帝国都丢掉了;资产阶级王国在1830年和1846年,资产阶级共

和国在 1848 年,第二帝国在克里木战争³³期间和在 1863 年都效法了他的榜样。它们都同样卑鄙地背叛了波兰人。就是现在,法国的资产阶级激进共和派还仍然匍匐于沙皇面前,希望用再一次对波兰人的出卖来换得一个反普鲁士的复仇同盟,正好像德意志帝国的资产者把这同一个沙皇尊崇为欧洲和平的保护者,也就是说尊崇为德意志普鲁士兼并地区保护者一样。除了革命工人而外,波兰人不论在哪里也找不到真诚的和毫无保留的支持,因为推翻共同的敌人对他们两者都有同样的利害关系,因为波兰的解放就意味着推翻了这个敌人。

然而,波兰人的活动受到了地域上的限制。这种活动只限于波兰、立陶宛和小俄罗斯。俄罗斯帝国的真正核心——大俄罗斯——几乎完全处于这个活动的影响之外。4 000 万大俄罗斯人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民族,而且经过了非常独特的发展,以致不能从外面把一种运动强加给他们。而这样做也完全没有必要。的确,俄国人民的主体,农民,千百年来在脱离历史发展的泥潭中世代代愚昧地过着苟且偷安的生活,而打破这种荒漠状况的惟一变动,便是零星的毫无结果的起义,以及贵族和政府的新压迫。这种脱离历史发展的生存,已由俄国政府自己通过再也不能拖延下去的废除农奴制度以及实行徭役赎买结束了(1861 年)。徭役赎买这个办法实行得非常狡猾,它使大多数农民以及贵族遭到了不可避免的破产。由此可见,俄国农民现在所处的环境本身,正推动他们投身到运动中去,这个运动诚然在目前还刚刚产生,但是,农民群众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将不可遏止地推动它朝前发展。农民的愤恨不满,现在已经是政府以及一切不满意的党派和反对党派都不得不予以重视的事实了。

因此,下文中说到的俄国,不是指整个俄罗斯帝国,而是专门指

大俄罗斯,这个地区最西的省份是普斯科夫和斯摩棱斯克,而最南的省份是库尔斯克和沃罗涅日。

弗·恩格斯写于 1875 年 5 月
下半月

第一次发表于弗·恩格斯《论
俄国的社会问题》1875 年莱比
锡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4 卷翻译

弗·恩格斯

*给纽约国际工人协会
总委员会的信³⁴

1875年8月13日于伦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致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公民们：

同施派尔书记的信一起寄给我的通告³⁵(6月4日寄出,21日收到),已根据指示发出,为了事业的利益,我做了下面这些事:

(1)此地的工人协会³⁶(德国人支部)已同拉萨尔派合并,并且在接受会员——约120名——方面表现出过多的自由主义,因而只有在希望立即公布机密通知时,才适宜于把这些通知转达给该协会。鉴于这个原因,我把通告转给了列斯纳和弗兰克尔,他们两人同我的意见一致,都认为这个通告的内容不宜于在协会中正式传达,只应当向合适的人传达,并且要秘密地进行,以利于通告中建议办理的事情。因为此地肯定不会派德国工人去费拉德尔菲亚,所以这样做对

实际结果不会有丝毫影响。

(2)当我收到通告的时候,我们的马德里的朋友梅萨(现住巴黎)正好在这里。他对这件事表现十分热情,我把通告翻译给他听了,他认识在巴黎负责为派遣工人去费拉德尔菲亚而筹集款项的委员会成员,所以,凭他那众所周知的实干精神,他大概能够做一些工作。他还要把通告转寄到西班牙去。

(3)我无法把通告寄到比利时去,因为整个比利时的国际是站在同盟分子一边的,而如果让后者知道我们的计划,那肯定对我们不利。在葡萄牙和意大利,我没有任何人的通讯地址。洛迪的《平民报》几乎已经与同盟分子为伍,它会立刻把事情公布出去的。

(4)指示中没有提到德国、奥地利和瑞士,总委员会在这些国家中又有许多直接的联系,所以我就没有在那里采取任何步骤,以免干扰那里可能已经直接采取的行动。

(5)凡是看过通告的人,都对它表示完全赞同,大家普遍认为,通告中提出的召开代表会议的建议是惟一切合实际的建议。但要对这一点进行表决,我们觉得在这里是不可能的。关于此地的协会,我已经谈过。英国所有其他的支部都已停止活动,其中的优秀人物多半都已离开。在丹麦、法国、西班牙,国际直接被禁止,根本谈不上表决。在德国,人们还从来没有对这样的问题进行过表决,而在同拉萨尔派合并以后,同国际保持的本来就很松散的联系已经完全中断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总委员会想要把这个建议变成决定,美国的票数就足以支持它了,况且,我们从可靠的消息来源已经获悉,同盟分子今年也不会(也许永远再也不会)召开代表大会。

(6)是不是可以在展览会开幕前后,在欧洲的党报上刊登一则简讯,内容大致这样:“打算参观费拉德尔菲亚的展览会的社会主义工

人,请到某某地址去同费拉德尔菲亚的党内同志联系”;或者成立“给社会主义工人安置住处和保护他们免受欺诈的委员会”并公布它的地址?特别是后一种做法,看起来是完全正当的,而只要写几封私人信件,就足以使大家充分地了解这样做的真实用意。

致兄弟般的敬礼。

弗·恩格斯

弗·恩格斯写于 1875 年 8 月
13 日

第一次发表于《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选集》1906 年斯图加特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5 卷翻译

弗·恩格斯

* 在 1863 年波兰起义
纪念会上的演说³⁷

公民们：

波兰在欧洲革命的历史上起着非常特殊的作用。西方任何一次革命，凡是不能把波兰吸引到自己方面以及保证它获得独立和自由的，都注定要失败。就拿 1848 年革命来说吧。这次革命席卷的地区，比以前任何一次革命都广阔得多。它把奥地利、匈牙利、普鲁士都卷入了革命的漩涡。但是它在俄国军队所占领的波兰的边界停住了。当沙皇尼古拉得到二月革命的消息时，就对群臣说：“去备马吧，先生们！”他立即动员军队，把它集结在波兰，以便在适当时机越过边界出兵对付叛乱的欧洲。革命者方面也十分清楚地知道，波兰将是一个决战场。5 月 15 日，巴黎人民高呼着“波兰万岁！”的口号冲入国民议会，去迫使议会为波兰的独立而战。³⁸马克思和我当时在《新莱茵报》上要求普鲁士立即对俄国宣战以解放波兰，而且整个德国先进的民主派都支持我们。可见，在法国和德国，人们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决定性的关键在于：联合波兰，革命就保证成功，否则，革命就必定失败。但是，法国的拉马丁、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沙

皇的内兄)以及他的资产阶级大臣康普豪森根本不打算粉碎俄国的力量,他们理所当然地把这一力量看作他们防止革命泛滥的最后堡垒。当匈牙利起义者的推进还没有威胁到维也纳已经获胜的奥地利反动势力时,尼古拉还可以按兵不动,他的军队还可以暂时只限于扼守波兰和威胁普鲁士、奥地利、匈牙利。只有威胁到反动势力时,这些俄国军队才大举入侵匈牙利,镇压匈牙利革命,保证反动势力在整个西方取得胜利。欧洲之所以拜倒在沙皇脚下,就是因为放弃了波兰。波兰确实不同于任何其他国家。从历次革命来看,它是欧洲大厦的拱顶石,因为革命势力或反动势力谁能在波兰站稳脚跟,谁就能够统治整个欧洲。正是这一个特点使波兰对一切革命者说来都是重要的,使我们现在也要高呼:波兰万岁!

弗·恩格斯写于 1876 年 1 月

22 日—2 月 1 日之间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25 卷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25 卷翻译

弗·恩格斯

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
普鲁士烧酒³⁹

弗·恩格斯写于 1876 年 2 月
5 日—20 日之间

载于 1876 年 2 月 25、27 日和 3
月 1 日《人民国家报》(莱比锡)
第 23、24 和 25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5 卷翻译

2月4日,冯·卡尔多夫先生就英国和意大利对德国“酒精”课以重税一事向帝国政府提出质问。他提请议员先生们注意以下一点(见《科隆日报》报道):

“在我国东部和北部几个省,广袤无垠的大片土地,数百平方英里相当贫瘠的土地,由于普遍栽种马铃薯,达到了较高的肥力和栽种水平,而栽种马铃薯又是由于这些地区分布着许多酿酒厂,它们以生产酒精作为农业的副业。过去,这些地区每平方英里约有居民1 000人,现在,有了酒精生产,每平方英里土地可以供养将近3 000人,由于马铃薯的体积大,运输困难,在严冬季节则根本无法运输,酿酒厂就成为马铃薯的必要的销售市场。其次,酿酒厂使马铃薯变成价值很高而易于运输的酒精。最后,有了大量作饲料的残渣,土地变得更加肥沃。每个人只要注意到,尽管德国的酒精税比起世界各国是最低的,例如比俄国低五分之四,但是我们国家每年从酒精税得到的收入大约为3 600万马克,由此就会明白,从这项事业中得到的收入有多么大。”^①

近来,普鲁士的容克们想必是得意忘形了,他们居然敢让全世界注意自己的“酒精工业”,即通常所说的烧酒酿造业。

在上一世纪,德国只酿造少量的烧酒,而且都是用粮食酿造的。诚然,那时人们还不会分离出这种烧酒中含的杂醇油⁴⁰(这一点我们

^① 1876年2月5日《科隆日报》第36号《德意志帝国国会讨论实况》。——编者注

下面还要谈到),因为当时杂醇油这种东西还根本无人知晓;但是人们凭着经验知道,烧酒存放久了,质量会大大提高,烈性会消失,而且饮用后不那样使人酒醉和损害健康。当时生产烧酒的小资产者条件,以及那种比较注重质量而不太注重数量的尚未发展起来的需求,使得几乎各地都能年复一年地将粮食酒藏于地窖,这样,烧酒中最有害的成分经过逐渐的化学变化,危害性较小了。例如,在上一世纪末,我们只在为数不多的城市——明斯特、乌尔里希施泰因、北豪森等地看到规模较大的酿酒企业,而这些地方的产品通常总要注明是“陈酒”。

到本世纪初,农村中酿酒厂的数目增加了,酿酒业开始成为较大的土地占有主和租佃农的副业,特别是在汉诺威和不伦瑞克两地。他们之所以能够找到顾客,一方面是由于烧酒的消费日益扩大,另一方面是由于不断增加和经常作战的军队的需要,而军队又使喝烧酒的嗜好广为传播。于是,在1814年缔结和约⁴¹以后,酿酒业便日益普遍地得到发展,并以上述完全不同于旧城市酿酒业的形式,作为大农业主的副业,在下莱茵,在普鲁士萨克森、勃兰登堡和劳西茨深深地扎了根。

然而,成为酿酒业转折点的是,人们发现不仅可以用粮食而且还可以用**马铃薯**来酿酒取利。于是,整个行业实行了革命。一方面,酿酒业的重心现已最终地从城市转移到农村,而生产上等陈酒的小资产者日益被生产劣等马铃薯烧酒的大土地占有主所排挤。另一方面(这一点从历史上看更重要得多),酿造粮食烧酒的大土地占有主被酿造马铃薯烧酒的大土地占有主所排挤;酿酒业日益从富饶的粮食产区转移到贫瘠的马铃薯产区,即从德国的西北部转移到东北部——易北河以东的**旧普鲁士**⁴²。

这一转折点是在 1816 年发生歉收和饥荒时出现的。尽管以后连续两年收成较好,然而由于粮食持续不断地向英国和其他国家输出,粮价仍然很贵,以致几乎不可能用粮食来酿酒了。在 1813 年,每一奥克斯霍夫特^①烧酒只值 39 塔勒,而到 1817 年则卖 70 塔勒。马铃薯代替粮食之后,到 1823 年每一奥克斯霍夫特烧酒只值 14 到 17 塔勒了!

但是那些曾经因战争和为祖国做出牺牲而据说弄得倾家荡产的易北河以东的穷容克们,从哪里取得一笔资金使他们所负担的沉重的抵押债务变成有利可图的烧酒厂呢?诚然,1816—1819 年的有利行情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一笔收入,由于地价普遍提高,给他们的信贷增加了;但是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爱国的容克们得到的比这更多:首先,得到了各种直接和间接形式的国家援助,其次,还有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情况。大家知道,1811 年在普鲁士,农民徭役的赎免以及农民和庄园主之间的各种纠纷,由法律作了这样的调节,即实物贡赋可以改成货币贡赋,而货币贡赋又可以资本化,清偿这种贡赋的办法或者用现金分期支付,或者是把农民的部分土地转让给庄园主,或者是一部分支付现金,一部分转让土地。这项法律起初只是一纸空文,直到 1816—1819 年,高昂的粮价才使农民有可能尽快地赎免。从 1819 年起,办理赎免手续在勃兰登堡进展得很快,在波美拉尼亚进行得较慢,在波森和普鲁士则进行得更慢。用这种办法从农民身上剥夺金钱诚然是合法的,但却是违背道义的(因为徭役负担是违背道义而强加给农民的);这笔钱没有按照贵族的旧习惯立即挥霍掉,而主要用来建立酿酒企业。在上述其余三省中,随着农民在

^① 德国的旧容量单位,平均等于 206.1 升。——编者注

办理赎免手续时为酿酒业提供了资金,这项事业也得到了发展。可见,普鲁士容克们的烧酒工业完全是靠从农民身上剥夺来的钱建立的。特别是从1825年以后,烧酒工业蓬勃地发展起来。过了两年,到1827年,普鲁士生产的烧酒为12 500万夸脱,即平均每个居民 $10\frac{1}{2}$ 夸脱,总值为1 500万塔勒;相反地,15年前曾是德国首屈一指的烧酒之邦的汉诺威,只生产了1 800万夸脱。

显然,从那时以来,由于某些邦或某些邦的关税同盟没有用关税壁垒保护自己,整个德国简直就被普鲁士的劣等马铃薯烧酒的洪流所淹没。按照批发价格,一奥姆^①(180夸脱)的售价为14塔勒,就是说,一夸脱为2格罗申4分尼!从前痛饮一次要花两三倍的钱,现在只要花15银格罗申就可以整整一个星期喝得酩酊大醉,这样一来,连最没有钱的人每天都可以酗酒了。

这种空前便宜的烧酒价格在不同的地方出现的时间不同,但是在各地几乎都是迅如闪电,它的作用是前所未闻的。我还十分清楚地记得,在20年代末,低廉的烧酒价格突然遍及下莱茵—马克的工业区。例如在贝格区,特别是在埃尔伯费尔德—巴门,许多劳动居民都耽于酗酒。“醉汉们”一群一群地,手挽着手,拥塞街头,吵吵嚷嚷,自晚上9时起,从这家酒馆逛到那家酒馆,最后各自蹒跚回家。从当时工人的文化水平来看,从他们的毫无出路的处境来看,这是毫不奇怪的。特别是在幸福之乡的伍珀河谷,那里60年来一直是一种工业部门取代另一种工业部门,因此,一部分工人即使没有失业,也时时都感到抑郁苦闷,而另一部分工人(当时的染色工人)却得到在当时

^① 德国的旧容量单位,平均等于137.41升。——编者注

说来较高的报酬。既然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伍珀河谷的工人们只能在酒馆里的尘世烧酒和虔敬派教士那里的天堂烧酒之间进行选择，那么无论尘世烧酒多么糟糕，他们还是偏要选择它，这有什么奇怪的呢。

烧酒是很糟糕的。它一旦从冷凝器中流出，就不再继续进行净化，带着它所含的全部杂醇油分送各地，并立即被喝掉。用葡萄渣、甜菜、粮食或马铃薯酿造的一切烈性酒类都含有这种杂醇油，即由高级醇（一种成分与普通醇类似、但含有更多碳和氢的液体）所构成的混合物（如伯丙醇，异丁醇，而大半是戊醇）。所有这些醇类比普通酒精（乙醇）更有害，前者能引起中毒的饮用量比后者小得多。不久以前，波恩的宾茨教授经过多次试验后证明，我国酒精饮料的致醉作用，正如被人赞不绝口的醉后不舒服或较严重的症候和中毒现象等不良后果一样，与其说应当归咎于普通酒精，即乙醇，不如说主要应当归咎于高级醇，即杂醇油。这些高级醇不仅有较大的致醉作用和有害作用，而且决定酒醉的特性。每个人即使不是根据经验，而是根据亲自的观察也会知道，葡萄酒（甚至不同品种的葡萄酒）、啤酒或烧酒对大脑的沉醉作用是多么不同。饮料中的杂醇油越多，这种杂醇油的成分越有害，使人醉得就越厉害，越猛烈。大家知道，同其他烈性饮料相比，新酿造的、未净化过的马铃薯烧酒含的杂醇油最多，而且这种杂醇油的成分也最有害。不言而喻，这种饮料如果饮得非常多，它对于贝格区那样易于激动、血气刚盛的居民所起的作用，也就会异常大。酒醉的特性完全变了。以往每逢举行娱乐活动，最后总是喜气洋洋地结束，很少发生越轨行为，当然，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也常常动起“Kneif”（刀子，英语是knife），现在每逢举行娱乐活动，人们就大吃大喝，结果总是发生殴斗，闹得每次都有人在刀下负伤，因

刀伤致死的事件也越来越多了。教士把这种现象归咎于日益流行的无神论,法学家和其他庸夫俗子把这种现象归咎于酒馆里的狂饮。其实,真正的原因在于突然泛滥的普鲁士杂醇油,它发挥了它那正常的生理作用,并将成百上千的穷鬼打入暗牢。

廉价烧酒的这种剧烈作用持续了许多年,以后或多或少地逐渐缓和了一些。然而它对风尚所产生的影响却没有完全消失;烈性酒比起以往来仍在较大程度上是工人阶级的切身需要,其质量虽然有所改进,但比过去用粮食酿造的陈酒仍然差很多。

其他地区的情况也同贝格区一样。庸夫俗子们对工人中间日益发展的狂饮烈酒的现象发出的怨言,从来没有像 1825—1835 年那样普遍、一致和公开。甚至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在 1830 年事件⁴³期间,恰恰是德国北部的工人们态度冷漠,无动于衷,这种冷漠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否由于烧酒在当时比任何时候都更厉害地支配着他们。一些重大的、特别顺利的起义只发生在葡萄酒产地或德国那些用关税多多少少保护了自己免受普鲁士烧酒危害的邦内。这恐怕并不是烧酒拯救普鲁士邦的惟一事例吧。

惟一导致更带毁灭性的直接后果(但不是对本国人民,而是对他国人民)的一种生产,就是英印为毒害中国而进行的鸦片生产。

当时,烧酒生产急剧发展,日益扩大到东部地区,使德国东北部荒漠的沙地和沼泽地—摩尔根—摩尔根^①地种起了马铃薯。这一生产部门不以造福祖国为满足,还力图使外国也能尝到旧普鲁士杂醇油的甜头。普通烧酒经过再一次蒸馏,去掉其中一部分水分,人们把

① 普鲁士的旧面积单位,约等于 $\frac{1}{4}$ 公顷。——编者注

用这种方法取得的含水的、未净化的酒精叫做“Sprit”，这是从拉丁语 Spiritus 译成的普鲁士语。所有的高级醇都具有比乙醇更高的沸点。乙醇到了百分温度计^①的 78.5°就沸腾，而伯丙醇的沸点为 97°，异丁醇的沸点为 109°，戊醇的沸点为 132°。所以应当说，即使经过细心的蒸馏，至少大部分戊醇，即杂醇油的主要成分，以及部分异丁醇，仍然保留下来，蒸馏时所去掉的，最多只是戊醇和异丁醇的一部分和伯丙醇的大部分，而后者在杂醇油中的含量是很少的。然而就是科学的化学也不能用蒸馏法把上述三种低级醇分离出来，而杂醇油中的戊醇只能用酿酒业中不适用的分馏法才能脱去。况且农村烧酒企业中的蒸馏法相当简陋。因此，毫不奇怪，40 年代初出口的酒精还有大量杂醇油，根据气味很容易判断出来，因为纯粹的或只含水分的酒精几乎没有气味。

这种酒精主要是运往汉堡。以后又怎么样呢？一部分运往那些没有进口税挡路的国家；连斯德丁也参加了这方面的出口；然而在汉堡和不来梅，绝大部分酒精用来伪造朗姆酒。这种酒在西印度有一部分是用甘蔗酿造的，而绝大部分是用制糖时剩下的甘蔗残渣酿造的，由于它的成本低廉，作为群众的一种上好的饮料，是当时能与马铃薯烧酒相竞争的惟一酒类。为了制造“精美”而又廉价的朗姆酒，人们把例如一桶真正精美的牙买加朗姆酒、三四桶廉价而粗劣的勃比斯朗姆酒和两三桶普鲁士马铃薯酒精搀和在一起，这样混合或按类似的比例混合，就能造出所需要的酒来。这种“毒液”——参与造假的商人们自己当着我的面就称之为“毒液”——经过海路运往丹麦、瑞典、挪威和俄国；然而相当大一部分又沿着易北河南运或经过

① 即摄氏度温度计。——编者注

斯德丁运回原来出产上等酒精的地区，一部分在那里被当做朗姆酒喝掉，一部分则从那里走私运到奥地利和波兰。

汉堡的商人不限于伪造朗姆酒。他们以其禀赋的天才率先发现，普鲁士马铃薯烧酒注定在将来要扮演惊天动地的角色。他们试制其他各种饮料，于是到了30年代末，在非普鲁士的德国北部稍微懂得一些葡萄酒的人，都不愿从汉堡买法国的白葡萄酒，因为大家都说，这种酒在那里是用铅糖加甜的，因而具有毒性。不管怎样，马铃薯酒精很快就成了日益发展的伪造各种饮料的基础。继朗姆酒之后，人们又伪造了法国白兰地，这种酒在配制时就需要施用更多的技巧了。不久，葡萄酒里开始掺了酒精，最后甚至根本不用葡萄酒，而只用酒精、水和植物汁（植物汁又常常用化学制剂来代替）制成波尔图葡萄酒和西班牙葡萄酒。在许多国家里，这类做法或者是根本禁止，或者可以说是触犯刑律的，因而人们不敢问津，这就更加促进了这一事业的发展。汉堡却是毫无限制的自由贸易的巢穴，因此，“为造福汉堡”而伪造酒类的做法极其风行。

然而造假酒的垄断没有持续多久。1848年革命以后，当法国的大金融家和一小撮知名的大工业家的绝对统治被整个资产阶级的短暂统治取代时，法国的生产者和商人开始认识到，普鲁士马铃薯酒精的酒桶里潜藏着多么神奇的力量。他们开始在本国的白兰地中掺假，而不再把真货运往国外；他们甚至开始把普鲁士马铃薯酒精大量地掺入专供国内消费的白兰地（为了简便起见，我把用葡萄渣做的各种酒都叫做白兰地），使它变成美味佳酿。因此，在法国广泛消费的惟一的烈性酒类——白兰地大为便宜了。第二帝国庇护这类做法，自然是为了苦难大众的利益，结果到拿破仑王朝崩溃时，我们看到，在法国早先几乎没有酗酒现象，由于旧普鲁士烧酒的功德，现在这种

现象大为流行了。

多年来葡萄的收成不好,1860年的通商条约又为法国打开向英国输出葡萄酒的门户,这对生意的新进展起了推动作用。歉收年份的淡葡萄酒,即使加糖也去不掉酸味,需要加上酒精才能长久保存。因此,人们将这种酒同普鲁士酒精混合起来。此外,英国人习惯于喝浓葡萄酒,现在大量出口的纯真的法国葡萄酒,对于英国人来说来太淡而无味了。普天下哪里还能找到比普鲁士酒精更好的一种东西,来使法国葡萄酒变得既浓又烈呢?波尔多日益成为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葡萄酒的伪造中心,这类葡萄酒在该地变成“精美的波尔多酒”;同时,那里也成了利用普鲁士酒精的中心。

是的,西班牙和意大利葡萄酒。自从法国红葡萄酒的消费(任何一个资产者都不愿喝别的酒)在英国、南北美洲和各殖民地有了十分巨大的增长以后,甚至法国的几乎取之不竭的葡萄酒资源都显得不够用了。西班牙北部几乎全部合格的葡萄,其中包括埃布罗河谷地盛产葡萄的里奥哈的全部收成,都送到波尔多。热那亚、里窝那和那不勒斯也把整船整船的葡萄酒运往那里。这些葡萄酒因掺有普鲁士酒精而能够经受海上运输,另一方面,葡萄酒的输出又使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葡萄酒价格大大提高,从前广大劳动居民每天都可以喝的葡萄酒,现在对于他们已经是可望而不可及了。现在他们不喝葡萄酒而喝烧酒,这种烧酒的主要成分仍然是普鲁士马铃薯酒精。然而,冯·卡尔多夫先生在帝国国会中抱怨说,在意大利这种情况还不能令人满意。

无论到哪里,我们都可以看到普鲁士酒精。普鲁士酒精比德意志帝国政府的手伸得还无比远。在我们看到有这种酒精的地方,这种酒精首先是用来造假。它是使欧洲南部的葡萄酒能够适应海上运

输、同时又使当地劳动居民失去这种葡萄酒的工具。正如阿基里斯的矛枪治愈了它所刺破的创伤⁴⁴一样,普鲁士酒精攫夺了工人阶级的葡萄酒,同时又向他们提供伪造的烧酒作为补偿!马铃薯酒精之于普鲁士,一如铁和棉织品之于英国;这种酒精在世界市场上是代表普鲁士的商品。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社会主义最时髦的行家、同时兼社会主义的复兴者欧根·杜林先生赞扬酿酒业“首先是……(工业)同农业活动的天然纽带”,并得意扬扬地宣称:

“酒精生产的意义如此巨大,与其说对它可能估计过高,不如说可能估计不足!”^①

不言而喻, Anch'io son pittore(柯雷齐语,意即我也是画家⁴⁵),这句话用普鲁士语来说就是:“我也是烧酒酿造者。”

然而,普鲁士马铃薯烧酒的奇妙功绩还远不止于此。冯·卡尔多夫先生说:

“过去,这些地区每平方英里约有居民1 000人,现在,有了酒精生产,每平方英里土地可以供养约3 000人。”

一般说来这是正确的。我不知道,冯·卡尔多夫先生所说的每平方英里有居民1 000人是指的什么时候。过去肯定有过这样的時候。但是,如果不算萨克森和西里西亚省(那里酿酒业与其他工业部门相比,起的作用不甚显著),也不算波森(尽管政府百般努力,波森的绝大部分仍然一心想留归波兰),那么我国有三个省,即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和普鲁士。这三个省占的面积总计为2 415平方英里。

① 欧·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兼论财政政策的基本问题》1876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1817年总人口为3 479 825人,即每平方英里1 441人;1871年总人口为7 432 407人,即每平方英里3 078人。我们完全同意冯·卡尔多夫先生的说法:居民的这种增长主要是酿酒业的直接结果或间接结果。如果我们这里也算上阿尔特马克、经营农业的下西里西亚北部以及主要是德属波森的那部分地区(这些地区的居民可能也同时增加了),那么我们面前呈现的是真正的烧酒产区,同时也是**普鲁士君主制的核心**。而这里呈现的完全是另一个前景。目前,酿酒业表明自己是现代普鲁士的真正物质基础。没有酿酒业,普鲁士的容克们就会灭亡;他们的一部分领地就会被土地大王所收买,这些土地大王就会成为英国式的少数贵族,另一部分领地就会被分割,成为独立的农民等级的基础。没有酿酒业,普鲁士的核心就会是每平方英里只有2 000人的地区,在资产阶级工业发展到足以在这里也取得社会领导权也许还有政治领导权以前,这个地区将不能在未来的历史中起任何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酿酒业提供了另一个发展方向。在只能大量生产马铃薯和土容克而几乎不能生产其他任何东西的土地上,酿酒业居然能够经受得住世界的竞争。在上述各种情况下产生的需求越来越有利于这里的酿酒业,这就使它能够一跃而成为全世界的中心烧酒厂。在现存社会关系的条件下这只意味着:一方面形成了中等地主阶级,他们的小儿子们成为选拔军官和官僚的主要材料,也就是容克们寿命的又一种延长;另一方面形成了比较迅速增长的半农奴阶级,由他们来补充军队中“基干团队”的主要部分。这些劳动群众名义上是自由民,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年契、实物租、住宅条件以及庄园主的警察权力(新的专区法⁴⁶颁布后,这种权力只是改变了形式)实际上已经使他们完全依附于庄园主;要知道他们的状况如何,可以参阅哥尔茨教授的著作。简而言之,普鲁士能够逐渐

消化 1815 年所吞并的易北河西岸的领土, 在 1848 年镇压柏林革命, 在 1849 年尽管爆发了莱茵--威斯特伐利亚起义⁴⁷而仍然领导着德国反动派, 在 1866 年对奥地利作战, 在 1871 年使整个小德意志⁴⁸听从最落后、最保守、最愚昧、而且还处于半封建状态的那一部分德国的领导, 普鲁士所以能够做到这一切, 应当归功于什么呢? ——归功于烧酒酿造业。

让我们回过头来谈一谈帝国国会吧。参加讨论的主要有冯·卡尔多夫先生、冯·德尔布吕克先生以及汉堡联盟的全权代表克吕格尔。这次讨论，几乎给人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似乎我们对普鲁士马铃薯酒精所持的态度是极其不公正的。带来祸患的并不是普鲁士酒精，而是俄国酒精。冯·卡尔多夫先生抱怨说，汉堡工业家将俄国烧酒（正如克吕格尔先生明确强调指出的，这种烧酒不是用马铃薯而是用粮食酿造的）加工成酒精，“冒充德国酒精分运各地，从而使德国酒精的声誉受到损害”。德尔布吕克先生“已经听说，这种偷天换日的做法会遇到很大困难，因为直到现在，还不能像用德国烧酒那样，用俄国烧酒制造出没有气味的酒精”，然而他又小心谨慎地补充说：“先生们，当然，这一点我是无从知道的。”

总之，带来祸患的并不是普鲁士马铃薯酒精，而是俄国粮食酒精。普鲁士马铃薯酒精“没有气味”，即不含杂醇油；而俄国粮食酒精至今还无法做得没有气味，可见它含有杂醇油；当它冒充普鲁士酒精出卖的时候，就使普鲁士酒精不含杂醇油的声誉受到了损害。由此看来，我们倒是以卑鄙的手法并怀着极端敌视帝国的居心来诽谤普鲁士的“不含杂醇油的”酒精了。那就让我们看一看实际情况到底怎么样。

的确，用灼烧的木炭加工可以使烧酒脱去杂醇油。因此，近来出

卖的酒精一般说来含的杂醇油较少。但是，我们这里谈到的两种酒精之间的差别在于：用粮食酿造的酒精可以不费大力就完全脱去杂醇油，用马铃薯酿造的酒精要脱去杂醇油则困难得多，而在大规模生产中实际上几乎根本办不到，就是用马铃薯烧酒做的最纯净的酒精涂在手上也总会留下一股杂醇油气味。由此形成一个通例，药房里用的和做精良甜酒用的酒精，往往是或者至少应当是（因为这方面也有伪制品！）粮食酒精，而决不是马铃薯酒精。

《科隆日报》公布了上述有关烧酒的讨论，几天以后，又在综合新闻栏里（2月8日第一版）引述了莱茵区一位酒徒的一段怨言：

“最好能有办法发现淡葡萄酒里面也掺有马铃薯酒精。诚然，酒后头昏脑胀的严重症状可以证明含有这种酒精，但这已经太晚了。马铃薯酒精含有杂醇油，它那种难闻的气味被葡萄酒的特殊气味盖住了。这是最常见的一种伪造。”

最后，为了安慰旧普鲁士的酿酒者，克吕格尔先生公布了一件令人担心的事实，即俄国粮食酒精在汉堡市场上比普鲁士马铃薯酒精贵4个马克。2月7日，后者的价格在汉堡每100升为35马克；这就是说，俄国酒精的价格比据称被它破坏了声誉的普鲁士酒精贵12%！

了解了所有这些事实，请再看一看这种被诽谤的、“没有气味的”、惟恐自己的声望被破坏的、“不含杂醇油的”、高贵的普鲁士酒精，这种在批发贸易中每升只值35分尼（比啤酒还便宜）的酒精所蒙受的不白之冤吧！如果把那场辩论和这些事实对照一下，不由得产生一个问题：这里是谁被愚弄了呢？

普鲁士杂醇油的恩泽遍及世界各地，因为它同马铃薯酒精一起掺入各种饮料。从摩泽尔和莱茵区的酸而淡的劣等葡萄酒（这种酒加上马铃薯糖和马铃薯酒精就能奇妙地变成勃劳恩别尔葡萄酒和尼

尔施坦葡萄酒),从格莱斯顿通商条约签订以来充斥英国并在那里被称为“格莱斯顿”的劣等红葡萄酒,到印度、中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资产者所喝的沙托-拉斐特酒和香槟酒、波尔图葡萄酒和马德腊酒,没有一种饮料不搀有普鲁士的杂醇油。凡是栽种葡萄以及仓库里存有大量葡萄酒的地方,这些饮料的生产就日益繁荣,那里的生产者就对马铃薯酒精高唱赞歌。可是消费者呢?消费者根据“头昏脑胀的严重症状”就会领悟普鲁士杂醇油的功德何在,并竭力避免领教。冯·卡尔多夫说,在意大利,通商条约⁴⁹实施的结果,是对普鲁士酒精课以过高的关税。比利时、美国、英国则通过高关税,使得向这些国家输出酒精成为不可能。在法国,海关官员在酒精桶上贴上红色签条,以表明这是普鲁士的产品,——法国海关官员确实第一次做了一件有益于公众的事情!一句话,事态的发展竟使冯·卡尔多夫先生绝望地大声疾呼:

“先生们,如果您们想像一下德国酒精工业的处境,你们就会发觉,所有的国家都战战兢兢地将我国的酒精拒于门外!”

当然啰!全世界都已逐渐知道这种酒精所施与的恩德了,而为了避免领教“头昏脑胀的严重症状”,惟一的办法就是根本不让这种劣等烧酒进口。

此外,来自东方的令人沉重而郁悒的阴霾正在侵袭受到排挤的烧酒容克们。俄国这个伟大盟友本是庇护一切古老而又尊严的制度、抵挡现代的破坏性怒潮的最后堡垒和最后屏障,现在,这个盟友也开始生产和出口烧酒,确切地说,是粮食烧酒,而且他们的售价同普鲁士容克们的马铃薯烧酒一样便宜。这种俄国烧酒的生产 and 出口在逐年增加,以前,俄国烧酒在汉堡被加工成酒精,而现在,正如德尔

布吕克先生告诉我们的，“在俄国的许多港口……目前已在建设一批设备最优的企业，以便对俄国烧酒进行加工”；于是他预先提醒容克先生们注意：他们将一年比一年更难对付俄国的竞争。冯·卡尔多夫先生清楚地觉察到了这一点，并要求政府坚决禁止俄国酒精在德国过境。

然而，冯·卡尔多夫先生作为自由保守派⁵⁰的议员，本来可以更正确地判定德意志帝国政府对俄国的立场。阿尔萨斯—洛林的被兼并，以及 50 亿空前浩大的军事赔款，使法国变成了德国任何一个敌人的必然同盟者⁵¹；加以德国所奉行的政策又是希望自己在各地都受人尊重，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令人畏惧，而不是被人爱戴，在这种情况下，它就只有一种选择：或者是也把俄国迅速击溃，或者是充当俄国外交的忠顺奴仆，以确保自己能与俄国结成同盟（只要俄国可以信赖）。由于不能下决心作出前一种抉择，结果便无可挽回地作出了后一种抉择。普鲁士，随之还有整个帝国，又像 1815 年和 1850 年以后那样依附于俄国，而“神圣同盟”⁵²正像 1815 年以后一样，只是这种依附关系的掩饰物。所有这些辉煌的胜利的结果是，德国依然是欧洲马车上的第五个轮子。而俾斯麦竟表示惊讶：德国公众怎么还像过去那样关心国外（决策的真正重点在那里）发生的事件，而不关心帝国政府（它在欧洲是无足轻重的）做的事情或帝国国会（它在德国是无足轻重的）里的演说呢！禁止俄国酒精过境！我倒想看看帝国首相会不会口袋里没有对俄国的宣战书就敢于这样做！当冯·卡尔多夫先生向帝国政府提出这种奇怪的要求时，可以认为，不仅饮酒，而且连酿酒都使人神志不清了。要知道，连那些比冯·卡尔多夫先生更有名的酿酒者最近也做出在他们自己看来根本找不出任何合理的解释的事情了。

不过,十分明显,俄国的竞争使我国烧酒容克们万分恐惧。在俄罗斯内地有大片广袤无垠的土地,那里的粮食就像普鲁士的马铃薯一样价格低廉。加之俄国的燃料大都比我国酿酒区的燃料便宜。一切物质前提都具备。因此,如果俄国一部分贵族也像普鲁士容克们一样,把国家为农民垫付的赎免徭役的钱投资于酿酒企业,这有什么奇怪呢?既然有不断增加的市场,既然粮食烧酒在同等价格或稍高价格的情况下总是比马铃薯烧酒优越,这些酿酒企业就会迅速发展起来,而且在目前就可以预见到这些企业的产品从市场上把普鲁士马铃薯酒精完全排挤出去的时间,这又有什么奇怪呢?这里任何抱怨、任何悲叹都无济于事。只要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它的规律对容克们来说,也像对犹太人一样,是铁面无私的。由于俄国的竞争,神圣的伊利昂没落的日子,①出色的普鲁士烧酒工业从世界市场上消失、而充其量只能在国内市场兜售自己的劣等烧酒的日子即将到来。当普鲁士容克们被夺走了烧酒盔②,只剩下世系纹章盔或至多还剩下军盔的时候,普鲁士的末日就来临了。即便撇开世界历史的整个进程不谈,撇开新战争或变革的可能性、或然性或必然性不谈,单是俄国烧酒的竞争就必然使普鲁士破产,因为这种竞争会摧毁使东部各省农业得以维持在目前发展水平的工业。而那样一来,这种竞争也就会摧毁易北河以东容克们的生存条件,以及在每平方英里土地上生活的3 000个隶属于容克的农奴的生存条件;也就会摧毁普鲁士

① “伊利昂”是特洛伊城的别称,“伊利昂的没落”一语比喻无可挽回的崩溃形势。——编者注

② “烧酒盔”(Destillirhelm)是酿酒蒸馏塔的顶部装置,通常称作“蒸馏头”,此处借喻普鲁士的烧酒工业。——编者注

国家的基础——招募军官、军士和绝对服从命令的士兵的材料，以及形成官僚基本核心的材料，使现时的普鲁士具有特殊性质的材料。随着酿酒业的衰落，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也将崩溃，而没有军国主义，普鲁士就等于零。那时，这些东部省份将由于人口稀少，由于工业隶属于农业，由于还处在半封建状态，由于资产阶级尚未充分发展、普及教育还不发达，而重新退回到它们在德国应占的地位。那时，德意志帝国的其余地区由于摆脱了这种半中世纪式的统治权力的压迫，而可以轻松地喘一口气，并由于它们的工业发展和教育比较先进，也将占其应有的地位。而东部各省将为自己选择较少依赖农业和较少容许封建生产方式的其他工业部门，到那时，就会将自己的军队不交给普鲁士邦，而交给社会民主派。整个世界将欢庆普鲁士的杂醇油毒害终于一劳永逸地被消灭。而普鲁士容克们和最终“溶化在德国里面的”普鲁士邦⁵³只好用一位诗人的诗句来聊以自慰：

歌曲里不朽的一切，
生活中必然毁灭。^①

① 引自席勒的诗篇《希腊之神》。——编者注

弗·恩格斯
威廉·沃尔弗⁵⁴

弗·恩格斯写于 1876 年 5 月
底或 6 月初—9 月中

载于 1876 年 7 月 1、8、22 和 29
日, 9 月 30 日, 10 月 7、14、21 和
28 日, 11 月 4 和 25 日《新世界》
杂志(莱比锡)第 27、28、30、31、
40、41、42、43、44、45 和 47 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5 卷翻译

如果我没有记错,这大约是 1846 年 4 月底的事情。当时马克思和我住在布鲁塞尔郊区的一处地方,我们正好在合写一本书^①,有人告诉我说,一位德国来的先生想同我们谈话。我们看到了一个身材矮小、但很健壮的人;他的面部表情显得和蔼可亲而又沉着坚定;一副德国东部农民的样子,穿着一身德国东部小城市市民的衣服。这就是威廉·沃尔弗。他由于违反新闻出版法而受到迫害,幸免于被关进普鲁士的监狱。第一眼看到他,我们并没有料想到,这个外表并不出众的人,竟是一个十分难得的人物。没过几天,我们就同这位新的流亡伙伴建立了诚挚的友谊,而且我们相信,我们结交的不是一个平凡的人。他在古典古代文化中陶冶而成的才智,他那丰富的幽默,他对艰深理论问题的清楚理解,他对人民群众的一切压迫者的强烈憎恨,他那刚毅而又沉着的气质,很快就展现了出来。但是,只有在斗争中,在胜利和失败的时候,在顺利和不利的时刻,经过多年的共同活动和友好交往,我们才能充分认识到他那坚忍不拔的刚强性格,他那无可怀疑的绝对忠诚,他那在对付敌人、对待朋友和自己时所表现的同样严格、始终如一的责任感。

^① 指《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

威廉·沃尔弗于1809年6月21日诞生在西里西亚弗兰肯施泰因附近的塔尔瑙。他的父亲是一个世代相承的依附农民，同时兼营一家法庭酒店（即乡村法庭用来举行会议的饭店，波兰语叫做 karczma），即使这样，他还得和妻子儿女一起为老爷服徭役。所以，威廉从小就不仅了解德国东部依附农的窘迫境况，而且还有切身的体验。此外，他还学到了更多的东西。威廉谈起他的母亲来，总是特别亲切，他的母亲受过比同等地位的人更高的教育。她激发和培养了威廉对封建主老爷无耻剥削和虐待农民的愤恨。这种愤恨如何在他的一生中汹涌澎湃地激荡，我们在谈到他终于能把这种愤恨公开宣泄出来的那一段生活时就会看到。这个农民的孩子很快就显露出他的才能和好学的精神。要是条件许可，他理应进中学去念书。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克服多少障碍啊！经济上的困难就不用说了，还有老爷及其管事的阻拦，然而没有他们又是什么也办不了的。固然从名义上说，世代相承的依附关系在1810年就废除了，可是封建的苛捐杂税、徭役、领主裁判所和庄园主的警察权仍然照旧保留下来，这就使世代相承的依附关系实际上也继续存在。老爷和他的管事们宁肯让农民的孩子去当猪倌，也不愿让他们成为大学生。但是，一切障碍都克服了。沃尔弗进了施韦德尼茨的中学，后来又进了布雷斯劳的大学。在这两个学校，他都不得不靠当私人教师来谋取自己的大

部分生活费。在大学里,他以特别浓厚的兴趣钻研古典语文学,但他决不是旧学派的那种咬文嚼字的语文学者。他对希腊和罗马的伟大诗人和散文作家有透彻的了解,他们的作品成了他终生喜爱的读物。

就在沃尔弗快要大学毕业的时候,联邦议会⁵⁵和奥地利、普鲁士的政府重新开始了在20年代曾经沉寂下去的对蛊惑者⁵⁶的迫害。沃尔弗由于参加大学生协会,也在1834年被捕;有好多年,他从一个监狱被提到另一个监狱受审,最后判了罪。判了什么罪呢?我认为,他在任何时候对此都不屑一提。不管怎样,他被关进了银山要塞⁵⁷。在那里,他遇见了难友们,其中有弗里茨·罗伊特。——沃尔弗在逝世前几个月曾读到罗伊特的《狱中生活》^①一书。当他知道作者就是自己昔日的难友时,立即通过出版社给他写了一封信⁵⁸。罗伊特立即回了一封十分真挚的长信。这封信现在摆在我面前,它证明,至少在1864年1月12日,这位老蛊惑者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个恭顺的屈膝求饶的人。他写道:

“我关在这里已经将近30年了,我的头发已经变白,然而我还在等待着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以期最终有力地表现出人民的意志,但是有什么用呢?……要是普鲁士人民(至少)能够拒绝纳税,那就好了,因为这是摆脱俾斯麦这伙人和气死老国王的惟一办法。”

在银山,沃尔弗同囚禁在要塞的蛊惑者们一起经受了无数的患难,也分享了小小的欢乐,对此,弗里茨·罗伊特在上文提到的那本书中作了非常生动和十分幽默的描写。在那潮湿的囚室和严寒的冬天,令人稍感慰藉的是,看守这座山崖古堡的所谓驻防人员是一些年老的残废军人,这些人并不那么严厉,有时也乐于收受一点烧酒或者

① 载于《罗伊特文集》莱比锡版第4卷。——编者注

几文酒钱。1839年，沃尔弗终于因健康严重恶化而得到赦免。

他到了布雷斯劳，打算在那里靠教书维持生活。可是他作这种打算并没有得到主人的同意，而主人就是普鲁士政府。他由于被捕而中断了大学学业，因此未能学完规定的三年课程，更没有参加考试。而在那个普鲁士的中国⁵⁹，只有按照规定学完全部课程的人，才被看作是有资格从事专业的学者。其他任何人，哪怕就像沃尔弗那样在古典语文学方面精通业务的人，也只能被拒于专业人员的圈子之外，并被剥夺正式运用自己知识的权利。惟一的希望就是靠当私人教师来勉强维持生活。但是这要得到政府的许可，当沃尔弗去申请时，却遭到了拒绝。要是普鲁士没有波兰人，这位蛊惑者就只好饿死，或者重返故乡去服徭役了。一个波森地主留他做家庭教师；在这个地主家里度过了几年，每提起这几年，他总是感到特别满意。

回到布雷斯劳以后，经过多次交涉和申诉，他终于得到极可尊敬的王国政府的许可做私人教师，现在，他至少可以维持俭朴的生活了。这个几乎是恬淡寡欲的人也没有更多的要求。同时，他又在当时艰苦条件下可能做到的范围内，重新开始了反对现存压迫的斗争。他不得不只限于公布官吏、庄园主和厂主们横行霸道的一些事实，可是，就是这样做，也常常遇到书报检查机关的阻挠。但这并没有使他气馁。在当时刚刚建立的处理书报检查案件的高等法庭里，再也没有比布雷斯劳的私人教师沃尔弗更执著、更经常光临的主顾了。在他看来，最大的乐趣莫过于一旦稍微知道一点书报检查官的弱点，便愚弄书报检查机关，在大多数书报检查官都很愚蠢的情况下，这样做并不那么困难。例如，他在《西里西亚省报》上公开发表了一首悔罪者的“赞歌”，使得笃信宗教的人极为难堪。这首赞歌是他在当时有些地方还在使用的旧赞美诗集中发现的，歌词如下：

“我是一个十足的恶棍，
 我是一个真正老朽的罪人。
 我全身浸透了罪过，
 就像浸透大葱味的俄国人。
 主耶稣呀，请您抓住我这狗的耳朵，
 扔给我一根仁慈的骨头，
 把我这有罪的无赖
 扔到您那仁慈的天国。”

这首歌像延烧的野火一般传遍了整个德国，使不信神的人捧腹大笑，使“地上的安静的人”^①恼怒异常。书报检查官受到严厉的申斥，而政府从此又警惕地注意这位私人教师沃尔弗，注意这个在要塞里监禁了五年也没有制服的不安分的狂妄分子。过了不久，当局就再次找到了对他进行起诉的借口。因为旧普鲁士的立法⁶⁰就像精心设置的一套陷坑、圈套、陷阱和罗网，布满全国，这些东西，连忠顺的臣民也并不总是能够逃避，而不忠顺的人就更容易掉进去了。

1845年底或1846年初，沃尔弗由于违反新闻出版法而受到指控，但违法的情节十分轻微，以致现在我们谁也想不起这件案子的确切情况了⁶¹。然而迫害十分严重，而沃尔弗已经尝够了普鲁士的监狱和要塞的滋味，因此，他便躲开被捕的危险而前往梅克伦堡^②。他

① “地上的安静的人”一语出自圣经《旧约全书·诗篇》第35篇第20节，原意是指信仰上帝的人，这里显然是指当时的虔诚主义者。——编者注

② 恩格斯在1886年版上加了一个注：“根据维尔穆特和施梯伯合著的《1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⁶²（第2册第141页），沃尔弗因‘违反新闻出版法’，于1846年被布雷斯劳高等地方法庭判处3个月的要塞监禁。”——编者注

在梅克伦堡的朋友那里，找到了安全的住所，一直住到在汉堡做好安排、可以顺利地乘船前往伦敦为止。在伦敦，他第一次在一个公开的团体中从事活动，这个团体就是目前还存在的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他在那里没住多久，很快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到了布鲁塞尔。

二

在布鲁塞尔,他很快就在那里办的一个通讯社找到了工作,这个通讯社为德国报纸提供法国、英国和比利时的消息,并且在情况许可的范围内,根据社会民主主义精神对这些消息进行编辑。当《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由我们党掌握的时候,沃尔弗也给该报撰稿。在我们当时创办的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⁶³里,沃尔弗很快就成了最受爱戴的演讲人之一。他每星期都到那里去发表时事评论。这种评论每次都是一篇叙述通俗、幽默,而又十分有力的杰作,特别是对德国的统治者和臣民的狭隘性和卑劣性,进行了应有的抨击。这种政治评论成了他十分喜爱的题材,在他参加的每一个社团里,他都要发表这种评论,而且每次都讲述得同样完美而通俗。

二月革命爆发了,立刻在布鲁塞尔引起反响。每天晚上人们都聚集在市民自卫团和宪兵队占据的市政厅前面的大集市广场上。广场四周众多的啤酒店和烧酒店挤满了人。人们高喊:“共和国万岁!”,高唱《马赛曲》,相互挤来挤去。政府表面上悄然无声,实际上却在各省征召预备兵和休假人员入伍和归队。政府还私下通知比利时最著名的共和派若特兰先生:如果人民要国王退位,国王准备退位;若特兰只要愿意,就可以从国王本人那里听到这一点。后来,若特兰果真听到莱奥波德说,他自己在心里就是一个共和派,如果比利时想成为共和国,他是永远也不会加以阻拦的;他只是希望一切都能

有秩序地进行,不要流血;此外,他还希望领到一笔优厚的养老金。这个消息秘密地迅速传开,使人们安静了下来,连起义也不打算举行了。可是,当预备兵刚一调集起来,大部分军队刚一集结在布鲁塞尔周围(这一点,在这个小小的国家只要三四天就能做到),国王退位的传说就立即无影无踪了。一天晚上,宪兵队突然挥刀冲向集市广场上的人群,而且还乱捕人。正在安安静静地走回家去的沃尔弗,也是最先遭到毒打和逮捕的一个。他被拖进市政厅,在那里再次遭到狂怒和醉熏熏的市民近卫队的殴打。在被拘留几天以后,他被押送出境,来到法国。

他在巴黎没有住多久。柏林的三月革命⁶⁴、法兰克福议会和柏林议会的筹备,促使他首先前往西里西亚,以便在那里为支持激进派竞选而开展工作。他想在我们创办报纸以后,立即到我们这里来,不管办报的地点在科隆还是在柏林。由于他受到普遍的爱戴,还由于他善于进行通俗而有力的演说,因此,特别是在乡村选区,他使激进派的竞选获得了成功;如果没有他,这种竞选是毫无希望的。

这时候,《新莱茵报》从6月1日起在科隆出版,马克思任主编。不久,沃尔弗也来科隆担任编辑部里的职务。他那孜孜不倦的勤恳态度,他那细致周密、一丝不苟的认真作风对他颇为不利,因为编辑部里尽是些年轻人,他们往往因此多给自己腾出个把钟头的空闲时间,相信“鲁普斯^①一定会设法使报纸出版的”。在这方面我也不是没有过错。因此,在报纸出版初期,沃尔弗多半忙于日常工作而很少

① “鲁普斯”是对威·沃尔弗的戏称。“沃尔弗”(Wolff)这个姓氏与德语中的“狼”(Wolf)一词写法相近,读音相同;而“狼”一词在拉丁语中写作“lupus”,读音为“鲁普斯”。——编者注

撰写社论。然而,他很快就找到一条途径,把这项工作也变成了独立的活动。在标题为《国内新闻》的常设专栏里,他汇编了来自德意志各小邦的消息,并以无可比拟的幽默描绘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那种鄙陋无知、目光短浅的狭隘性和市侩习气。同时,他每星期都到民主协会⁶⁵去发表时事评论,在这里,他也很快就成了最受爱戴和最有影响的演讲人之一。

资产阶级在巴黎六月战斗之后越来越愚蠢胆怯,使反动派得以重新聚集力量。维也纳、柏林和慕尼黑等地的宫廷权奸同高贵的帝国摄政王^①狼狈为奸,幕后则是俄国外交在拉线,指挥这班傀儡们表演。于是在1848年9月,这些老爷们行动的时刻到了。在俄国直接和间接的压力下(这种压力是由帕麦斯顿勋爵促成的),第一次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进军以签订可耻的马尔默停战协定⁶⁶而告结束。而法兰克福议会却卑躬屈膝到如此地步,竟批准了这个协定,从而公开地、毫不含糊地背弃了革命。9月18日的法兰克福起义⁶⁷就是对这一点的回答;这次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几乎在同一时间,柏林发生了制宪协商议会⁶⁸同国王之间的危机。8月9日,这个会议在极其温和的、甚至是怯懦的决议中,请求政府采取某种措施,使反动军官的无耻行为不再表现得那样公开和蛮横。9月,制宪协商议会要求执行这个决议,而得到的回答却是任命以一个将军为首的公开反动的普富尔内阁(9月19日),而臭名远扬的弗兰格尔则被任命为边防总司令。这是对柏林协商派发出的两个明显的暗示:他们要么就屈膝求饶,要么就等着被强行解散。群众普遍愤激起来。科隆也举行了群众集会,并任命了安全委员会。政府决定在科隆进行第一次

① 约翰大公。——编者注

打击。因此，在9月25日的早晨，许多民主党人被捕，其中有现任科隆市长，即当时人人皆知的“红色贝克尔”。群情更加激愤。下午又在原来的集市广场上举行群众大会。大会由沃尔弗主持，周围站着奉调前来的市民自卫团，他们并不敌视民主运动，而首先关心的是自身的安全。市民自卫团在回答别人的问题时说，他们在这里是为了保护人民。突然，人们冲进集市广场，喊着：“普鲁士人来了！”当时约瑟夫·莫尔——他也是早晨被捕的，但人民把他救了出来——正好在发表演说，他喊道：“公民们，难道你们见了普鲁士人就四散逃跑吗？”人们回答说：“不！不！”——“那我们就必须筑起街垒！”于是大家立即动手。科隆街垒事件的结局大家都知道。整个运动是一场虚惊引起的，没有遇到抵抗，没有武装（市民自卫团谨慎小心地各自回家了），没有流血，也没有任何结果。政府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科隆宣布戒严，市民自卫团解除武装，《新莱茵报》停刊，编辑们被迫出境。

三

科隆的戒严没有持续多久,10月4日就告解除。11日,《新莱茵报》又出版了。沃尔弗来到普法尔茨的迪克海姆,在这里,没有人来打扰他。同其他好些编辑一样,他也因为谋叛等案件而遭到通缉追捕。可是形势不容我们的沃尔弗在普法尔茨久住,在葡萄收完以后,他又突然来到下制帽坊街17号的编辑部。他就近找了一个住处,不用上街,穿过院子就可以到编辑部。但是,这种囚禁般的生活,他很快就厌倦了。过了不久,他几乎每天晚上都乔装一番,穿上长大衣、戴上长沿帽,借口买烟,乘天色昏暗走出门去。他以为别人认不出他,其实他那很特别的矮壮身材和坚定的步子是根本无法掩饰的。但是不管怎样,他没有暴露自己。他就这样度过了几个月,而在这期间,对我们所有其余的人的追缉都逐渐取消了。最后,在1849年3月1日,有人通知我们说,一切危险都已过去,于是沃尔弗去找预审法官,预审法官也说,整个案件是根据警察局的夸大的报告提出的,已经完全撤消了。

这时候,柏林议会在12月初被强行解散,开始了曼托伊费尔反动时期。新政府的最初措施之一,是使东部各省的封建主对他们占有农民无偿劳动这种有争议的权利感到放心。三月事件⁶⁴以后,东部各省农民到处停止服徭役,有些地区甚至迫使老爷们立下字据,放弃占有这种劳动的权利。所以,只要宣布这种现存状况是合法的,长

期受盘剥的易北河以东的农民便会成为自由人了。然而,自从1789年8月4日法国国民议会无偿地取消一切封建赋役以来,已经过了整整59年,而柏林议会仍然不敢采取同类步骤。赎免徭役的条件是松了一些。可是,规定无偿废除的只是一些最无耻、最令人愤懑的封建权利。然而这个法案还没有最后通过,议会就被驱散了,曼托伊费尔先生声称,政府不接受这个法案作为法律。这样一来,旧普鲁士的徭役农民的希望破灭了,因此,必须影响他们,向他们说明他们的处境。而沃尔弗则是做这一工作的最适合的人,这不仅因为他自己原本是依附农的儿子,幼年服过徭役;也不仅因为他保持着这样的童年在他心里培养起来的对封建压迫者的强烈憎恨;而且因为没有谁像他那样清楚地了解封建奴役方式的各种细节,特别是在西里西亚这样一个封建奴役形式样样俱全、应有尽有的省区。^①

① 从下一段开始直到本章结尾,以及从第四章开头直到“他在文中计算了自从开始赎免徭役以来,光是西里西亚的贵族就从农民那里非法取走了多少数额的现款、财物和地产”这句话(见本卷第81页)为止的内容,在1886年版中均被删除,而代之以这样两段文字:“于是沃尔弗就开始了反封建主的运动,这个运动在《西里西亚的十亿》一文中达到了顶峰,下面我还要来谈这个运动。按理说,这个运动应该由资产阶级来进行,反封建主义的斗争本来就正是这个阶级的世界历史性任务。可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资产阶级没有进行这个斗争,即或进行,也只是为了做做样子。由于德国的社会和政治落后,德国资产阶级处处都对他们切身的政治利益弃置不顾,因为无产阶级已经在他们背后带有威胁性地崛起了。巴黎工人在2月里的模糊的希望和意愿,尤其是他们在1848年6月的四天殊死斗争,不仅吓倒了法国的资产阶级,而且吓倒了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而在德国,在胆小的资产者看来,甚至那些早已在瑞士依法实行的普通民主要求,也会侵害他们的财产、他们的安全、他们的生命。一贯怯懦的德国资产者为了各自拯救私人的

沃尔弗在1848年12月18日^①的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上述内阁声明的文章,从而开始了这个运动。12月29日又登了第二篇更激烈的文章,抨击钦定的《西里西亚地主—农民关系临时调节法令》。

沃尔弗说,这个法令

“是号召邦君、贵族、伯爵、男爵等老爷们在法律的掩护下赶紧对农村居民进行‘临时的’抢劫和掠夺,以便在这种油水多的年头之后,可以较容易地度过清苦的年头。在3月以前,西里西亚是庄园主老爷们的乐土。从1821年以来颁布的各种赎免法,把封建容克们安排得如此地舒适,真是再好也没有了。赎免的规定和实行,无论何时何地都对享有特权的人有利而使农村居民破产,因而西里西亚的容克们从农村居民手里至少得到了大约8000万的现金、耕地和地租。而这种赎免还远远没有完结。由此产生了对可恶的1848年革命的愤恨。农民拒绝继续像驯服的牛马一样给自己的老爷服徭役,拒绝继续支付迄今为止缴纳的各种各样无比繁重的捐税、利息和贡赋。因此,庄园主的钱柜变得可怕地空虚”。

柏林议会担负起了调整这些关系的工作。

“拖延是危险的。这一点波茨坦的权奸懂得,他们也善于用农村居民的血

利益,拯救自己的资本,而牺牲了他们的共同利益,即政治利益。宁可恢复旧的官僚封建专制制度,也不要通过革命道路,在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力量壮大的情况下,经过斗争赢得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胜利,建立一个现代资产阶级国家!这就是德国资产阶级的惊恐叫声,正是在这种叫声中,反动势力取得了全线胜利。

所以,在资产阶级临阵脱逃的地方,无产阶级政党就要担负起斗争的责任。于是,沃尔弗就在《新莱茵报》上同封建主义展开了斗争。但是他没有采用使资产者感到高兴的方式;不,他是真正的革命方式进行斗争的,因此,资产阶级见了那些洋溢着法国大革命精神的文章,就同封建老爷和政府一样地感到惊慌。”——编者注

^① 应为17日。——编者注

汗来填满自己的腰包。什么议会不议会，去它的吧！让我们自己来制定我们觉得最有利的法律！——于是他们就这样做了。在《国家通报》上发表了一道有关西里西亚的法令，这不是别的，而是一个布满陷阱等等的圈套，农村居民只要一陷进去，就永无出头之日。”

接着，沃尔弗指出，这个法令实质上是恢复了3月以前的状况，并且在最后这样写道：

“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老爷们需要的是钱。冬天到了，他们就要举行冬季舞会、化装舞会，还有那诱人的赌博等等。娱乐用的钱过去一向是由农民提供的，今后还要由农民来提供。容克们想至少再组织一次愉快的狂欢节，并且尽可能地利用专制制度十一月的胜利。他们带着一种挑衅的狂放心情赶紧跳舞作乐，是做得对的，因为加里西亚式的风暴⁶⁹，可能很快就要打断上天赐予的这种贵族狂欢之宴。”

1月20日刊登了沃尔弗论述这方面问题的一篇新文章。反动派促使科尔贝格附近的内辛的一个村长克伦格尔同一些短工一起，联名询问国王陛下是否真的打算分配土地，并把土地分给无地的人。沃尔弗写道：

“可以想像，内辛的短工们听到这种打算会吓得要命，连觉也睡不着，怎么，国王想分配土地吗？迄今为止，我们这些短工为每天挣得5个银格罗申而兴高采烈地耕种老爷的土地，而现在却要我们停止打短工，去耕种归自己所有的土地吗？老爷拥有八九十座农庄，总共只有几十万摩尔根的土地，难道还要他们给我们几摩尔根的土地吗？不，我们的短工们一想到这种可怕的灾难，就全身发抖，他们片刻也不能平静，除非他们得到担保，确信实际上没有谁会把他们推入这种无底的苦难深渊，那些威胁着他们的几摩尔根的土地离他们还远得很，并将一如既往地归老爷所有。”

四

然而,这一切还只是初次交锋。1849年年初,在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中间,原先产生的提案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赞同。这个提案要求索回政府在1825年赠给流亡回国的贵族作为他们在大革命时期失去的田产的补偿的那10亿法郎,并把这笔钱用来为劳动群众谋福利。3月16日,《新莱茵报》就这个问题发表了社论,第二天沃尔弗就写了《普鲁士的十亿》一文。

“骑士施纳普汉斯基(利希诺夫斯基)是死了。但在我国,强盗还多得很。波美拉尼亚和边区的容克同普鲁士的其他容克联合了起来。他们穿上了诚实的资产者的圣衣,自称为‘各阶级民众财产保护联盟’——当然,是指封建主的财产……他们的打算无非是,除了别的省以外,还要从莱茵省骗取约2000万塔勒,来塞进自己的腰包。计划倒不坏。东波美拉尼亚的容克冯·塔登-特里格拉夫,容克冯·阿尔宁和冯·曼托伊费尔同几千个土容克一起用莱茵省的钱来偿付自己的债务,莱茵省的居民得到这些容克赐给的这种荣誉,应当感到特别荣幸。”

的确,有一个冯·毕洛夫-库梅洛夫先生,当时被人叫做毕洛夫-库梅尔富尔^①,他想出了一个小小的方案,让上述容克联盟,即沃尔弗所谓的“容克议会”予以采纳,并作为请愿书送给政府和议院——

① 俏皮话:“库梅洛夫”(Cummerow)是姓氏,“库梅尔富尔”(Kummervoll)是德语单词,意为“十分忧愁的”——编者注

这是一个调整普鲁士土地税的小小的方案。一方面,占有土地的农民、特别是西部各省的,抱怨他们缴纳的土地税**太重**;另一方面,东部各省的大地主贵族**根本不缴**土地税,虽然1810年10月27日颁布的法令已经规定他们要同所有其他的土地所有者一样缴纳这种税。容克议会找到了一个消除这**两种弊端**的办法。我们来听听沃尔弗是怎样说的。

“容克们想‘作出牺牲,以便消除目前普遍的不满’。他们是这样说的。谁会料到他们竟是如此地慷慨呢!但是,这是些什么样的牺牲呢?他们建议用大致的估计来确定所有土地的收成,然后再按照这种收成的同一百分率,在全国摊派土地税。这种高尚精神并不怎么伟大,因为他们现在打算做的不过是38年来他们依照法律应该做的事。不过,我们还是往下谈吧。他们要求过去一直在违法逃税的容克和骑士领地占有者——也许是补缴税款吧?——根本不是!他们要求的是,由于那些容克和骑士领地占有者从此开恩纳税,就应当付给他们**一笔相当的款子作为补偿**”(——即付给他们相当于今后应纳税款25倍的数额,作为补偿。)**而那些过去一直被不公正地索取了过高的土地税的人所应该做的——不是收回多缴的款子,而相反地是,为了获准免缴更多的税款**,〈必须根据不同的情况一次付清18倍到20倍的税款,以赎回自身的权利。〉“现在,东部各省的农民,而且除此之外,特别是莱茵省的农民,就要缴纳更重的税了。这样一来,旧普鲁士农民和莱茵省居民现在还要为此付出一大笔钱。而东部各省骑士领地占有者至今却什么也没有缴纳,或者只缴纳了为数很少的土地税……因而,莱茵省居民和农民必须缴纳的钱,就该他们得到了。”

接着他对1848年各省缴纳的土地税和土地面积作了概述,并由此得出结论:

“莱茵省平均每平方英里所缴纳的土地税比普鲁士、波森和波美拉尼亚约高4倍,比勃兰登堡边区高3倍。”

诚然,那里的土壤好一些,但是,

“按最低的计算,莱茵省现在要缴纳的土地税比按平均计算它所应该缴纳的,几乎多了100万塔勒。根据容克议会提出的法案,莱茵省居民却因此要受罚,再要缴纳1800—2200万塔勒的现金,装进东部各省容克的腰包!而国家在这里不过是充当银行家而已。这就是土容克和混蛋老爷们所准备付出的巨大牺牲,这就是他们对财产的保护。照这样一来,每个扒手都是在保护财产了……

莱茵省的居民,特别是莱茵省的农民,同威斯特伐利亚和西里西亚的农民一样,应该及时考虑一下:他们究竟到哪里去弄到钱来付给容克。在现在这种时候,是不可能很快就筹集到1亿塔勒的。

所以当法国农民向贵族索取10亿法郎的时候,普鲁士的贵族却向农民索取5亿法郎!

万岁!柏林三月革命万岁!万岁!万万岁!”

然而,对普鲁士容克的无耻行径,仅仅进行这种抵制是不够的。《新莱茵报》在进攻中寻找并发现了自己的力量。于是沃尔弗在1849年3月22日的报纸上开始发表一组文章,题为《西里西亚的十亿》,他在文中计算了自从开始赎免徭役以来,光是西里西亚的贵族就从农民那里非法取走了多少数额的现款、财物和地产。在《新莱茵报》刊登的许多令人振奋的文章中,只有少数文章像3月22日和4月25日之间发表的这8篇文章那样产生了如此的影响。在西里西亚和东部其他各省,报纸的订数迅速增加;人们要求买个个别几天的报纸,而最后,由于其他省没有莱茵省法律保证我们获得的那种例外的新闻出版自由,在高贵的邦法下面,要重印又根本办不到,因此,人们产生了一个想法,打算在西里西亚秘密地把这8天的报纸全部翻印出来,版面尽可能接近原版,并散发几千份,——这样做,编辑部自然是最不会有异议的。

五

在1849年3月22日的《新莱茵报》上，沃尔弗是这样开始对西里西亚的容克进攻的：

“宫廷容克和土容克的议院刚一组成（1849年2月26日根据钦定的宪法和钦定的选举法成立），立即提出了一个有关调整即赎免封建赋役的草案。高贵的老爷们忙了起来。他们想在会议闭幕之前就向农村居民大肆敲诈一番，以便储存一笔巨款，留到艰难的日子使用，并在他们本人出国以前，就先把这笔款子汇到国外。

他们在柏林三月‘误会’及其直接后果发生以后的最初一段时间，十分惊慌，无法形容地恐惧，因此，他们现在就竭力从心爱的农村臣民的腰包中索取他们所倍觉可爱的定心丸。

对于迄今为止一直是封建贵族和工业贵族的金窖的**西里西亚**，特别应该再次好好掠夺一番，使西里西亚地主骑士的荣耀得到加强和巩固，今后能继续放射光芒。

去年12月钦定的临时赎免法颁布之后，我们就立即指出^①，这个法令只是为庄园主老爷的利益着想的，而所谓小百姓，则在仲裁法庭成立的时候，就被交给豪绅显贵们任意宰割了。尽管如此，高贵的骑士们还是对这个法令不满意。他们所要求的是一个对骑士们的腰包更为惬意的法令。

1848年3、4月间，西里西亚的许多地位显赫的老爷向农民立下字据，写明放弃迄今为止的一切农奴捐税和贡赋。为了使自己的城堡免于焚毁，使自己本人不致成为城堡中某株菩提树或庭院里某棵杨树的特殊装饰品，他们大笔一挥就放弃了他们的所谓正当获得的权利。幸而纸上随便怎么写都可以的。

^① 见本卷第77页。——编者注

这样一来,革命就没有前进,反而陷入了市侩行为和安然等待的泥潭,这时,老爷们便拿出他们立下的放弃权利的字据,但不是为了履行,而是把它们作为证据提交给(刑事法庭),以便对那些造反的农民歹徒进行审查。”

沃尔弗在文中叙述了官僚怎样在总督平德尔的领导和武装流动队的协助下强迫农民缴纳原先的贡赋;农民怎样把希望仅仅寄托在柏林协商议会上面;而协商派先生们不是首先去宣布无偿地废除一切封建捐税,却把时间白白浪费在调查那些美妙的封建徭役和捐税的性质和起源等等上面,等到反动势力大大加强,它就在议会还没有通过任何废除封建赋役的决定以前,把整个议会解散了;后来又怎样钦赐了一个新的赎免法,但是连这个反动透顶的法令也没有使老爷们满意,他们现在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可是骑士老爷们在盘算时并没有征求主人的意见,这个主人是

“西里西亚的农民,但并不是那些拥有三四胡菲以上的土地的农民资产者,而是大批的小农、给地主种菜的和自由的菜农、茅舍贫农以及‘寄居雇农’,他们至今一直是大地占有主的真正的牛马;而且按照后者的计划,他们今后也应该继续充当牛马,只是形式有所不同。

在1848年,这些群众对于无偿废除封建赋役本来是会感到满意的……在取得1848年最后几个月和1849年已过去的几个月的沉痛教训之后,西里西亚农村居民,即那些‘小百姓’就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占有骑士领地的老爷们不应该利用精心炮制的赎免法来强占新的财富,按理说,他们至少应该退还他们利用先前的赎免法而确保自己获得的那一部分赃物……现在,在各地农村,人们正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仅仅最近三十年来,强盗骑士老爷们就从农村居民那里窃去了多少财物。”

计算这个数目并不像法国那样简单,在法国,向全国榨取了10亿法郎即约3亿塔勒的巨款作为补偿,因此,“法国农民知道他们应该收回多少本息。”而在普鲁士,剥削是年复一年地进行的,至今只有

个别的农民知道自己以及自己的村庄付了多少钱。

“现在，人们已对全省作了概算，这才知道农村居民在赎免的过程中部分地以土地、部分地以现金和地租付给老爷们的钱，在8 000万塔勒以上。此外还要加上至今尚未获得赎免的农民每年缴纳的捐税和贡赋。最近三十年来这笔款至少也有16 000万塔勒；加上前面那个数目，共约24 000万塔勒。

农村居民直到现在才知道这些数字，感到眼前一亮，而这种亮光却使封建集团……胆战心惊。他们侵吞了从农村居民腰包里勒索来的24 000万，‘一有机会，我们就一定要收回我们的24 000万’，——这就是如今在西里西亚农村居民头脑里盘旋的念头，这就是已经在几千个村庄里公开提出的要求。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既然一定要谈到对封建赋役的补偿，那么，农民遭到骑士的掠夺，也应该得到补偿，——这种意识就是‘收获’，它很快就会结出果实。这种收获是任何软赐的诡计也消除不了的。即将到来的革命将使这种收获产生实际效果，那时候，西里西亚的农民想必会制定出这样一个‘补偿法’：不仅使被夺去的本钱，而且使‘通常应付的利息’都回到人民的腰包。”

容克老爷们是根据什么“合法权利”把这笔钱攫为己有的，这在1849年3月25日报上刊载的第二篇文章中得到了说明。

“这些强盗骑士的‘权利’是怎样得来的，不仅中世纪的每一页历史，而且直到最近时期的每一年，都提供了最明显的证据。后来，中世纪骑士的剑同法学家和官僚奸党的鹅毛笔杆就结合得再好也没有了。他们的‘权利’，即所谓‘正当获得的权利’，是利用骗子的手法从暴力中制造出来的。拿上一世纪的例子来说吧。80年代在西里西亚，由贵族发起成立了一些委员会，来制定土地清册，也就是规定庄园主和农民双方的义务。……由贵族及其走狗组成的委员会工作得很出色——那是为了贵族的利益。然而地位显赫的老爷们还是远远没有能够到处都建立所谓‘认可了的’（农民承认了的）土地清册。凡是做到这一点的地方，都不过是靠使用暴力或欺骗。……在这类字据中，有些在开头坦白地提到，农民不愿画押（当时只有很少人会写字），所以一部分是用威胁，一部分是直接使用武力来强迫他们在对他们和他们的后代极为不利的字据上签字。根据这些‘正当获得的权利’，骑士老爷们在最近三十年间，在西里西亚把从农民等级的血汗里榨取来的那一笔24 000万塔勒巨款装进了自己祖传的钱柜。”

六

沃尔弗从贵族对农民的直接剥削转到叙述各种形式的间接剥削。在间接剥削方面,国家的协助起了主要的作用。

首先是**土地税**,在1849年,西里西亚还是按照1749年编制的地籍簿征税。列在这个地籍簿中的贵族土地的摩尔根数,一开始就被缩小了,而农民土地的摩尔根数则一开始就被夸大了。每一摩尔根草地或耕地的收入估算为1塔勒,土地税则据此征收。森林和牧场是免税的。从那时起,贵族砍光了整片的森林,开垦了大面积的荒地。而税款却仍旧根据1749年地籍簿上登记的耕地的摩尔根数缴纳!因此,在双方税额不变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荒地可以开垦的农民就承担着极其沉重的负担,简单地说,就是受骗了。不仅如此,

“很大一部分骑士,即**拥有最大的和收益最多的领地的**那一部分骑士,以自己是作为世袭陪臣贵族而‘正当获得的权利’为借口,至今**未缴分文的土地税**。

据我们计算,近三十年来,骑士老爷们单是土地税一项,少缴或根本没有缴纳的,就约有4 000万塔勒(而)这还是真正客气的计算),因此,加上直接从西里西亚农民的腰包里抢去的那24 000万,总共就是28 000万。”(1849年3月25日《新莱茵报》)

接着谈到**等级税**。沃尔弗从一般农民当中随便挑出的一个西里西亚的农民,他

“有8摩尔根的中等土地,〈每年〉要向‘仁慈的’老爷缴纳大量的贡赋,每年

要给老爷提供繁重的徭役，每月还要缴纳 7 银格罗申 6 分尼的等级税，全年（总计）为 3 塔勒。同这个农民对比的，是占有极广阔的土地、占有森林和草地、铁工厂、杂硅锌矿和煤矿等等的仁慈的老爷，例如，头号抱怨派⁷⁰、亲俄派、疯狂地仇视民主派的第二议院议员雷纳德伯爵。这个人每年有 24 万塔勒的收入。他每年缴纳最高等级税 144 塔勒。同拥有 8 摩尔根的农民相比，他每年本来至少应该缴纳 7 000 塔勒的等级税，20 年就应该缴纳 14 万塔勒。这就是说，这 20 年他少缴了 137 120 塔勒”。

沃尔弗把这位雷纳德伯爵缴纳的等级税数额同一个雇农和一个女园丁所缴纳的税款作了比较。这个雇农每年的工钱为 10 塔勒，纳税 $\frac{1}{2}$ 塔勒，即他的纯收入的 5%；这个女园丁每年工钱为 6 塔勒，也要缴纳 $\frac{1}{2}$ 塔勒，即她的纯收入的 $8\frac{1}{3}\%$ ，作为等级税。因此，这 20 年里，高贵的伯爵同雇农相比，少缴了 237 210 塔勒的等级税，而同女园丁相比，至少少缴了 397 120 塔勒。

“根据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艾希霍恩-拉登堡以及基督教日耳曼的其他一伙人的国父般的意旨，国民学校应该（请与 1848 年初以前的艾希霍恩指令相对照）只限于教读、写和最基本的算术。因此，还是准许农民学习四则运算的。但是，要教农民学习各种算法，特别是教他们学习减法，也就是教他们怎样减和扣，这根本不需要国民学校。至少在西里西亚，上帝赐福的强盗骑士从农民身上和从农民周围减去了那么多的东西，使得农民现在一旦有了机会，就能够很出色地对地位显赫的老爷们运用这种减法。”

接着，沃尔弗又举了西里西亚贵族实际运用这种减法的一个例子：熟荒地。

“凡是在上世纪农村业主（即农民）因战争、瘟疫、火灾和其他灾难而死亡了的地方，领主老爷马上就在那里出现，把灾区耕地的全部或一部分当做‘熟荒地’并入自己的农庄。可是，土地税、房屋税以及其他重负，你们这些（老爷们）当然是避免承担的。这些税今后还是要由整个公社或者由新的占有者来缴纳，

而新的占有者往往只得到原来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六分之一或八分之一，但要在得到地契的同时，负担起原来的全部捐税和贡献。你们对公社草地和公社耕地也采用这种办法，例如上述原因使农村在不同程度上荒无人烟的时候，你们就是如此。你们利用这种以及其他各种机会来尽量吞并土地。而公社和农民却不得不承担起公社的、学校的、教会的、区的以及其他各种重负，一点也不减轻，就像公社和农民没有受到丝毫损失似的……农民将会这样来回答你们：你们用什么尺度来衡量，我们也要用同样的尺度来衡量你们。

你们对补偿贪得无厌，竟盲目地撞上了一个真正的马蜂窝，那就是人民对补偿的要求。这些被激怒的马蜂有朝一日飞了出来，那么，除了已知的补偿以外，还有相当大的损害会很容易地落到你们头上！”（3月27日《新莱茵报》）

沃尔弗在接着发表的一篇文章（3月29日）中具体描述了赎免封建负担的程序。全省的这项工作由臭名昭著的总委员会安排，王国的地方专员和他们的助手、王国的土地丈量员和登记员都归这些委员会领导。庄园主或农民一提出赎免申请，这些官员就在乡村出现，而仁慈的老爷们马上就邀请他们到自己的城堡里来，极其慷慨地款待他们，并对他们做工作。

“这种工作往往在先前就已经进行了。由于骑士老爷们在用香槟酒可以达到某种目的的时候是毫不吝惜的，所以，领主们的殷勤努力大都很有成效。”

当然，间或也会遇到廉洁的官员，但是非常罕见，而且即使出现这样的官员，对农民也没有什么帮助。

“例如，土地丈量员一旦被领地占有者或其帮办所拉拢，那么，即使地方专员在他那方面严守法律，对农民也没有什么益处。如果地方专员、土地丈量员和领主老爷像通常那样亲密无间，农民就更加倒霉，而骑士们则可以称心如意了。

旧普鲁士官场特别善于让它的僚属炫示煊赫的权势。现在，王国专员就带着他所拥有的全部权势，出现在聚集于法庭酒店的农民中间。他不失时机地提醒农民说，他是‘以国王的名义’到这里来同他们交涉的。

‘以国王的名义!’农民一听到这句话,眼前就同时浮现出各种阴森森的形象:宪兵、执行官、领主的法官、县长等等。要知道,正是他们始终以这种名义合伙压迫农民,榨取农民的血汗!以国王的名义!这句话在农民耳中就意味着棍棒或监狱,就意味着赋税、什一税、徭役和手续费。确实,这一切农民也是为了国王的名义而不得不支付的。如果专员的这样一段开场白不大有效,如果公社或个别农民在某一点上坚持不同意地主和专员的计划,这个专员就变成奥林波斯山的雷公,对这群受惊的农民连续不断地进行神圣的诅咒,然后又比较温和地补充说:要是你们再这样愚蠢地拖下去,那我就要告诉你们:你们还得为此大大破费!对农民的钱包来这么一个象征性的暗示,往往能起决定性的作用:现在很容易使赋役和酬劳适合庄园主的愿望了。”

接着就着手丈量土地,这时候,被收买的土地丈量员就为了庄园主的利益而欺骗农民。为了估计收益、评定土质等等,请了区长来作鉴定人,而这些人所做的鉴定,在多数情况下也是有利于庄园主的。办妥了这一切并在除去作为废除封建赋役的补偿而划归仁慈的老爷的那部分土地以后,最后确定了留给农民的土地的摩尔根数,于是,骑士老爷们就促使地方专员尽可能地把小百姓的耕地换到最坏的地方。好地并入老爷的土地,而老爷们的那部分在多雨的年头常常积水成涝的耕地则换给了农民。此外,土地丈量员在重新丈量的时候,还变戏法似地使农民损失一部分耕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农民是无力自卫的;谁要提出诉讼,谁就照例会因此而倾家荡产,只有在特别有利的情况下,农民才能争得自己的权利。

事情的结局是,由总委员会起草和签署一切法律调解书或分配共同地产的证书,同时计算费用的总数,而农民的真正灾难也就从此开始了。

“这些计算除了用厚颜无耻这个词以外,没有别的词可以描述。农民可以提出抗议,可以捶胸顿足,但一切都是枉然。别人的眼睛紧紧盯着的正是他的钱包;国库先拿走了自己的那部分印花税,剩下的作为总委员会、地方专员等的

薪俸。这帮官僚都过着养尊处优、寻欢作乐的生活。一些出身寒微的家伙一旦当上地方专员，便利用强盗骑士们的胡作非为，很快也一跃而进入骑士领地占有者之列。至于在总委员会里，决定权操纵在贵族手里，就不用多说了。没有这种决定权，骑士老爷们的事情是不会如此美妙的。”

按照旧普鲁士的好习惯，这些总委员会的一切开支账目是从来不公布的，因此，人民根本不知道，1848年以前实行的封建赋役豁免，究竟使他们花了多少钱。但是，每个公社和每个农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他们是怎样被迫“破费”的。

“例如，有一个小村庄，全村农民共有不到30摩尔根的土地，却不得不付出约137塔勒，作为办理法律调解书的费用；在另一个村庄，一个拥有7摩尔根耕地的土地占有者，要付出的费用不下29塔勒……给强盗骑士们的补偿原来是一道如此美味可口的菜，因此，这道加上了一些基督教日耳曼调料的菜，今后在那些地位显赫的高贵的老爷的餐桌上也是不能缺少的。这东西让人吃了还想吃！——西里西亚的强盗骑士们一面这样说，一面微笑地摸摸自己的胡须，嘴里啧啧地品味，就像土容克惯常做的那样。”

这些文字是沃尔弗在27年以前写的，描写的事件发生在1820—1848年；但是现在读起来，令人觉得这是在描写1861年以后俄国农奴是怎样变成所谓自由农民的。真是分毫不差。两种情况都是处处为了仁慈的老爷们的利益而对农民进行同样的欺骗。俄国的赎买在一切官方的和自由派的论述中，被描绘成是对农民的莫大恩赐，是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进步，与此相同，官方的和民族主义的奴颜婢膝的历史编纂学也把旧普鲁士对农民的欺诈描绘成有解放世界意义的事件，在它面前，就连本来构成这一切豁免原因的法国大革命也黯然失色了！

七

西里西亚贵族的罪行录至此还没有披露完毕。在4月5日的《新莱茵报》上，沃尔弗叙述了普鲁士实行经营自由怎样给强盗骑士们提供了欺骗农村居民的新的机会。

“在有行会约束的时候，农村手工业者和工商业主为了从事自己的手工业或营业，每年都要向仁慈的庄园主老爷缴纳通常都很高的税款。作为酬报，他们享有这样的优惠条件，即庄园主不准其他人从事经营，以保护他们不受竞争。此外，庄园主还得给他们工作做，特别是磨坊主、酿酒厂老板、肉食加工者、铁匠、面包师、酒店即饮食店老板、小贩等等的情况，更是这样。”

实行经营自由以后，对享有优惠条件的手工业者的保护就不存在了，他们到处都遇到竞争。尽管这样，庄园主还是继续征收原来的捐税，他们借口说这种捐税并不是手工业税，而是土地税；而法院也同样偏袒贵族的利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承认这种无理要求。不仅如此。仁慈的老爷们自己也逐渐办起水力磨坊和风力磨坊，后来又办起了蒸汽磨坊，这样，他们自己就对先前享有优惠条件的磨坊主造成了不可抗拒的竞争；但是尽管这样，他们还是若无其事地迫使那些磨坊主继续缴纳过去那种为先前享有的专营权而付的税款，他们或者借口说这是地租，或者借口说这是补偿费，因为庄园主在整修河道等方面做了某些微不足道的事情。沃尔弗举了一个有两盘磨的水力磨坊为例，这个磨坊没有任何耕地，可是每年必须向庄园主缴纳

40 塔勒，而庄园主还开了一个磨坊同它竞争，因而，那个磨坊自开办以来，磨坊主一个接着一个都破产了。这对庄园主就更好了，因为这样一来磨坊就要出卖，而每次易主时，仁慈的老爷都要从出售额中先为自己提取 10% 的过户税！——风力磨坊也完全一样，它只拥有它所在的那一块地，而每年必须向庄园主缴纳 53 塔勒。铁匠的情况也是这样，他们不得不缴纳或赎免先前的专营税，尽管专营权已经取消，不仅如此，那个征税的庄园主还开办了自己的打铁坊，来同铁匠们竞争。——其他手工业者和工商业主的境况也是一样：税款或者按照“法律调解书”予以赎免，或者继续缴纳，可是庄园主的相应的义务，即保护不受竞争的义务，早就不履行了。

到目前为止，只是考察了封建贵族对有产的农民，包括有两胡菲以上土地的农民、直到自由的菜农、自由的茅舍贫农和河谷低地的茅舍贫农所采取的各种剥削形式；所有这些人不管叫做什么，他们至少有一所小茅屋，而且多半都有一个小菜园。剩下的是这样一个人数众多的阶级，他们没有为老爷服务，既没有一所小屋子也没有一寸土地。

“这就是那个赁屋而居的劳动者即寄居雇农的阶级，一句话，就是租房栖身者的阶级，这些人在农民、菜农、茅舍贫农那里租房居住，每年缴付 4—8 塔勒，所租的小屋多半像狗窝一般。这些人有的是出让了自己的土地的农民，即把田产转交给亲属或者出卖给别人，自己留下一份‘养老地’，或者一点不留而居住在那里的小屋里养老的人；而大多数则是贫苦的短工、农村手工业者、织布工、矿工等等。”

怎么对付这些人呢？领主审判权应该为此提供借口，这是一种非常美妙的制度，只是现在由于通过了专区法⁴⁶才应予以废除，在这种制度下，庄园主拥有对自己从前臣民的审判权。随着领主审判权

的实施,仁慈的老爷一旦把自己的某个被告关进监狱,就应该负担其生活费和侦讯费。而这个仁慈的老爷也因此而获得在行使领主审判权的过程中收取的一切诉讼费。如果被捕的是农民,则老爷又向他索回所支出的费用,并且迫使他在万不得已时出卖房屋和田产。为了使自已为某些被捕的赁屋而居的劳动者花去的费用也能得到补偿,庄园主每年向这个阶级中所有归他审判的人征收**保护金**,美其名曰“司法管辖费”。

沃尔弗写道(4月12日《新莱茵报》):

“在那些仁慈的老爷当中,有些人一年收1塔勒就满意了,另一些人征收 $1\frac{1}{2}$ 塔勒,还有一些人则厚颜无耻到如此地步,竟要求这部分农村无产阶级一年付2塔勒。拿这些血汗钱在首都和休养地嫖赌作乐,那就更惬意了。

在无论怎样也榨取不出现金的地方,仁慈的老爷或他的管事就把保护金变成6、10至12个无偿的服役日(赁屋而居的劳动者必须无偿地为仁慈的老爷做满这些日子的工)。最好付现钱!如果赁屋而居的劳动者付不起,那通常就是派执行吏去对付他,拿走他最后的几件破衣烂衫,最后的一张床、桌子和椅子。只有少数仁慈的老爷没有采取这种野蛮手段,没有要求收保护金,但并不是因为这是一种不正当地攫取的权利,而只是因为他们出于家长般的温和态度,不愿意行使这种所谓的权利。

因此,除了少数例外,赁屋而居的劳动者年复一年地遭到无耻的掠夺,使庄园主得以中饱私囊。例如,一个贫穷的织布工,一方面受厂主的剥削,另一方面,每天赚3—4银格罗申的工资,除去向国家缴纳 $\frac{1}{2}$ 塔勒的等级税,除去缴纳学校的、教会的、公社的各种费以外,还得向老爷缴纳1—2塔勒的保护金,这些钱真该叫做血汗钱。矿工和其他一切赁屋而居的劳动者的情况也是这样。

赁屋而居的劳动者从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呢?只有一种好处,这就是当他为贫困、穷苦和暴行所迫犯下偷窃或别的罪行而受到惩罚的时候,他在监牢或感化院里可以愉快地意识到:他和他所属的那个赁屋而居的劳动者阶级早就把相当于监狱费一百倍的钱装进了庄园主的腰包……一个赁屋而居的劳动者缴

了30年保护金(以平均每年 $1\frac{1}{3}$ 塔勒计算)而没有坐过监牢,那就是向庄园主的腰包缴了40塔勒的现款,单利和复利还不算在内。老爷就用这笔款子去支付向地方自治机关(骑士领地占有者的信贷组织)借的1000多塔勒资本的利息。

这些强盗骑士老爷借保护金之名获得了多么丰厚的财源,从下列事实就可以看出:在大多数农村里,赁屋而居的劳动者和房主一样多,而且往往比房主还要多。记得有一个最小的强盗骑士,拥有3块领地,每年向住在他的3个村里的赁屋而居的劳动者榨取240塔勒的保护金,而用这笔钱支付地方自治机关的(以他的领地作抵押借的)6000塔勒资本的利息……

天真的人在看了这一切以后,也许会想,骑士老爷事实上不是已经从他们的由于预收而装得满满的腰包里支付了所需的刑事处罚费用吗?这种天真的想法实在是玷辱了骑士的投机行为。我们都知道20年代和晚些时候的许多情况,当时那些厚颜无耻的骑士不仅向赁屋而居的劳动者征收保护金,而且在需要支付侦讯费和监狱费时,还迫使自己钟爱的农村臣民来承担,其份额有时为全部费用的 $\frac{1}{3}$,有时为 $\frac{1}{2}$,而在许多村里甚至达到 $\frac{2}{3}$ 。”

八

在4月14日的《新莱茵报》上，沃尔弗转而论述**狩猎权**，这种权利在1848年已经无偿地废除了；容克老爷们当时大叫大嚷要求把它恢复或者用“补偿损失”的办法来赎买。

“由于**野兽被敕封为圣物**，所以，人们宁可去枪杀一个贱骨头农民，也不太愿意射死一只兔子、一只山鹑或者类似的享有豁免权的生物。打猎的时候带上从钟爱的农村臣民中挑选出来的驱兽者，并不怎么感到难为情；即使驱兽者中有人被打伤了或者被一枪打死了，至多也只是调查一下，事情就了结了。除此以外，我们还知道，在那个由领主统治的光辉灿烂的时期发生过许多这样的事件，就是高贵的骑士把霰弹射进某个驱兽者的腿部或臀部——这纯粹是为了寻求骑士个人的欢乐。骑士老爷们在真正的狩猎之外，也狂热地进行这种消遣活动。每逢这种场合，我们总会想起一位男爵老爷，他看见一个妇女不顾他的禁令，在老爷的已经收割完毕的地里拾麦穗，就朝她的大腿打了一枪，后来在那一伙上流的强盗骑士们的午宴上，他竟以一种毫不掩饰的扬扬自得的心情叙述自己的英雄业绩……然而，备受钟爱的农村臣民在老爷进行大规模狩猎时却只能得到这样的乐趣，即不得不去充当驱兽者而疲于奔命（服劳役）。每一个业主，即每一个耕地占有者和每一个茅舍贫农都接到一道命令：‘明天拂晓’派一个驱兽者出去多少多少天，帮助老爷进行大规模的狩猎。在10月和11月寒冷潮湿的日子里，一大群穿得破破烂烂、往往是光着脚、饿着肚子的农村居民，在骑士老爷旁边急急地跑着的时候，骑士老爷的心当然会因为狂喜而怦怦跳动了。猎袋上挂着一条教训猎狗和驱兽者的鞭子。而鞭子挨得最多的则是驱兽者……有一些骑士开辟了大规模的养雉场……妇女或者女仆如果不小或者不灵敏，在割草时太接近野鸡窝而惊动了母野鸡，那就要倒霉了……我们自己在年轻时，曾亲眼见过一个农妇由于上述原因，受到一个年轻的强盗骑士

的极其野蛮、兽性十足的凌辱，被打成了残废，可是对这件事谁也没有吭声。他们都是些穷人，要进行控告，即提出诉讼，就需要金钱，而且还需要对司法机关有点信任，但在大多数西里西亚农村居民中，这两样东西有的少得可怜，有的根本就没有。

农民虽然愤怒得咬牙切齿，也只好眼看着骑士老爷带上自己的猎手或者不带猎手，或者只有猎手，在他茹苦含辛耕种的田地上驰驱追猎，肆意践踏和破坏，眼看着他们毫不怜惜任何庄稼，不管是高的还是矮的，密的还是稀的。猎手和猎狗可以在田地里纵横奔驰。如果农民敢于反对，那么，在最好的情况下，他所得到的回答是幸灾乐祸的嘲笑；至于更加糟糕的情况，许多农民都在身遭毒打时体验到了。上帝赐福的享有豁免权的兔子在农民地里寻找白菜来充饥，而农民种树是为了使兔子在冬季不致挨饿……但是这种祸害同赤鹿和野猪给农民带来的危害相比，还是微不足道的，这两种野兽……在西里西亚的绝大多数地区都受到保护。野猪、赤鹿和孢子常常在一夜之间就把农民即‘小百姓’全年赖以维持生计和缴纳捐税的庄稼拱掉、吞食、踩坏。不错，受害者可以起诉要求赔偿损失。个别的人和整个公社也曾试图这样做。至于这种诉讼的结果，凡是在自己的生活中对旧普鲁士的官僚制度、法官状况和诉讼程序哪怕是稍微有一点点了解的人，都想像得出来……在写了数不清的函件、经过无数次传讯以后，如果命运垂青，几年以后，这个农民收到一份宣告贵族败诉的判决书，但是在好好地研究了这份判决书和全盘地计算了以后，他发现自己原来是真正的受骗者……三十年来，耕地逐年加剧地遭到上帝赐福的野猪、赤鹿和孢子肆意糟蹋的村庄，数量在1 000个以上。我们知道有许多决不算大的村庄，单是这种享有豁免权的珍贵猎物年复一年地使它们遭受的损失就达到年均200—300塔勒。”

既然现在贵族要求对这种狩猎权的取消进行补偿，沃尔弗就反过来提出了另一种要求：

“野兽造成的全部损失，上帝赐福的孢子、赤鹿、野猪以及骑士老爷自己三十年来在我们的田地上造成的一切损害，必须全部赔偿；说一个整数，这就是：至少赔偿2 000万塔勒！”

这组文章的结尾（载于1849年4月25日《新莱茵报》）是一篇谈

这个省的波兰部分,即上西里西亚的文章,上西里西亚在1847年秋发生了饥荒,其程度之严重,正像当年使爱尔兰变得荒无人烟的那次饥荒一样。上西里西亚也和爱尔兰一样,突然发生了斑疹伤寒传染病,像鼠疫一样到处蔓延。第二年冬天,它又在这里爆发,而当时既没有歉收,没有遭水淹,也没有发生别的灾害。这是什么原因呢?沃尔弗回答道:

“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大土地占有主、国库(国家)和死手^①手里。只有五分二二的土地在农民手里,而庄园主的徭役、捐税以及国家、教会、学校、区和公社的税收都最不近情理地和最无耻地重重压在这些土地上,而和农民相比,老爷向国家缴纳的最多也不过是一点区区小数……到了交租的日子,如果农民不肯自愿地缴纳,那就靠皮鞭去向农民收租。资本和信贷的缺少,强盗骑士、国家和教会的捐税和赋役的繁多,逼得农民落入犹太人的怀抱,在狡猾的高利贷者设下的圈套中无力地挣扎,直至丧生。

在基督教日耳曼政府及其强盗骑士凌辱和奴役上西里西亚农民的长时期内,农民把烧酒看做是他惟一的慰藉和支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食物。必须给老爷以应有的评价,正是他们把这种商品从自己的酿酒厂里拿出来,以越来越便宜的价格充分地供应给农民……在泽地波兰农民^②的土房子里,斑疹伤寒常年流行,人过着牲畜一般的生活;与此相比,上西里西亚的豪绅显贵们的富丽堂皇的宫廷、城堡和其他产业就显得更加瑰丽了……一方面是财富令人难以置信地迅速积累,‘老爷们’每年获得巨额收入;另一方面是广大群众日益贫困。

农村工人的日工资极其低微:男人5—6银格罗申、妇女 $2\frac{1}{2}$ —3银格罗申就应当算是高工资了。许多人迫不得已,只好为4个、2个银格罗申,甚至为更

① “死手”是中世纪法律判决中的用语,指这样一种法人(特别是教会),其财产在一般情况下不可转让,就像牢牢地握在死人手中一样。——编者注

② “泽地波兰农民”指居住在易北河右岸沼泽地带、占上西里西亚人口绝大多数的波兰农民。——编者注

微薄的日工资而工作。食物几乎只有马铃薯和烧酒。如果工人获得的这两种食物数量还算充足，那么，上西里西亚至少不会发生饿死人的情况，也不会流行斑疹伤寒。但是，由于马铃薯遭到病害，这种主要的食品越来越贵、越来越少，而日工资不仅没有提高，甚至〈还〉降低了，——于是，人们就去吃他们在田野和森林里采集的野草，吃杂草和树根，用偷来的干草煮汤喝，吃死牲畜。他们越来越没有气力。烧酒贵了，而且——质量比以前更低劣了。所谓‘小酒馆老板’大部分是犹太人，他们要向老爷缴纳高额租金，才获准向老百姓出售烧酒。为了增加烧酒的烈性程度，小酒馆老板从前就已经习惯于在搀了适量水而稀释的烧酒里加进各种配料，其中**矾油**起了主要的作用。这种有毒的混合物传播得一年比一年广，随着马铃薯遭到病害而达到极点。农民的胃被干草和杂草做的汤、被生树根弄得很弱，已经不能消化这种药剂。如果我们再想一想农民衣衫褴褛，住宅肮脏而有害健康，冬天遭受严寒，不是没有工做，就是没有力气做工，那就不难设想，这些挨饿的生活条件使得伤寒非常迅速地传播，其情形同在爱尔兰一模一样。‘人们已经瘦损羸弱到了极点！’这就说明了一切。他们不断地被国家和强盗骑士敲骨吸髓、榨取脂膏，以致贫困状况哪怕再稍微加剧一点，就必定会使他们死亡……强盗骑士、官僚特权阶层和上帝赐福的普鲁士王国的整个当权集团，办妥了事情，得到了薪俸，分享了奖赏，而在下面的普通民众阶层中，那些受饥饿和伤寒折磨的人却开始成百成百地像牲口一样死去，而且不断地死去。

业主，即那些拥有房屋，而且占有或大或小的一块土地的人，其状况也并不比短工好多少。他们的主要食物也是马铃薯和烧酒。为了向庄园主、国家等等缴纳赋税，他们不得不出卖自己生产的东西……而且还不得不〈为老爷〉履行家奴的义务，在那里遭受老爷或他的管事的野蛮鞭笞；一面干活、挨饿、挨打，一面眼看着、忍受着强盗骑士和惯于呵斥的官僚特权阶层的骄奢淫逸行为——这就是大部分泽地波兰居民过去和现在的命运……

至于老爷的家奴、雇农和女仆受到什么样的待遇，这从必须服劳役的农村臣民和所谓的雇佣工人不得不忍受的待遇中就可以看出。在这里，鞭子也是强盗骑士的全部福音……

强盗骑士为所欲为，各县的县长都是从他们中间选任的；他们执行领地的和地区的警察职务，整个官僚机构都为他们的利益而工作，而且，泽地波兰农民所面临的并不是德意志官吏（如果真是这样，那也许就太仁慈了），而是使用普鲁士语言并执行其地方法的旧普鲁士官吏。忍受着各方面的剥削、虐待、嘲弄、

鞭笞和被戴上镣铐的上西里西亚农民，最终必然会达到他们现在已经达到的境地。饿死和鼠疫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在这片真正基督教日耳曼人土地上生长起来的最后果实。谁还有能力偷盗，那就去偷盗。这是爱尔兰化的上西里西亚人真正用以反抗基督教日耳曼人和强盗骑士的惟一形式。下一步就是求乞；我们看到，贫苦穷困的人们成群地从—个地方流落到另一个地方。再下一步我们看到的，是那些既没有力气和能力去偷窃，也没有力气和能力去乞求施舍的人。在他们那些铺着霉烂稻草的床上，瘟疫这个死神举目四顾，便会有极其丰硕的收获。这就是百年来上帝赐福的君主政体以及与之勾结的强盗骑士和官僚机构活动的结果。”

和先前一样，沃尔弗要求骑士对农民赔偿，要求无偿地废除一切徭役和货币租税，最后要求分上西里西亚豪绅显贵们的大地产。在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政府统治下，这当然办不到，因而，“上西里西亚的居民也将和过去一样，大批地死于饥饿和斑疹伤寒”，而这一点已经分毫不差地得到了验证，直到上西里西亚的工业在 50 和 60 年代的巨大高涨才使得这个地区的一切生活条件发生了变革，才越来越多地使比较文明的、但是更加深重的现代资产阶级剥削代替了残忍的封建剥削。

九

我们有意通过大段的摘录来介绍《西里西亚的十亿》一文，这不仅是因为文中最清楚地显现了沃尔弗的性格，而且还因为这篇文章真实可信地描述了 1848 年以前在除了莱茵省以外的整个普鲁士，在梅克伦堡、汉诺威和其他一些小邦，以及在整個奥地利的农村状况。在已经实行了赎免的地方，农民受骗吃了亏；但是对于半数乃至三分之二（看在什么地方）的农村居民来说，还要继续为庄园主承担封建劳役，并缴纳捐税，在 1848 年的风暴和随后到来的工业发展时期差不多把这些中世纪的残余也消灭干净以前，是很少有希望加快赎免的速度的。我们所以说“差不多”，是因为在梅克伦堡，封建主义还是以毫不减弱的势头存在着，同时在北德意志的其他落后地区，或许在这里，或许在那里，都可以找到还没有实行赎免的地方。1849 年，在普鲁士无偿地废除了保护金和其他不那么重要的封建捐税；其他的负担废除得比先前迅速，因为贵族经过 1848 年的教训，再加上他们始终难于从桀骜不驯的农民那里榨取能带来利益的劳动，所以，现在他们自己也坚持要赎免。最后，随着专区法的实行，庄园主的领主审判权也告终结，于是在普鲁士，封建主义至少在形式上是被消灭了。

但也仅仅是在形式上而已。在所有大土地占有制占优势的地方，仍保存着大土地占有主的半封建统治地位，甚至在其他各种现代资产阶级经营关系之下，也是如此。只不过这种统治地位的形式有

所改变罢了。在爱尔兰,是另一种形式,那里是小租佃者耕种土地,而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则又是一种形式,那里拥有资本的租佃者使用雇佣劳动者来耕种大片的租地。在北德意志,特别是在它的东部,占优势的贵族统治也采取这后一种形式。大田庄利用家奴和短工来经营,这种经营多半是为了占有者的利益,而很少考虑大租佃者的利益。家奴的地位是由1810年普鲁士颁布的奴仆规约规定的。这个规约如此刻意维护封建关系,竟然明文规定允许老爷对奴仆采取“不重的暴力行为”,然而却明文禁止奴仆对老爷的虐待(除了危及生命或健康的情况以外)进行任何的暴力反抗,违者处以刑罚(《奴仆总规约》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短工部分地是通过契约、部分地是通过盛行的实物报酬制度(住房也包括在内)实际上处在对庄园主依附的地位,这种依附丝毫不亚于奴仆对庄园主的依附;像沃尔弗描述的西里西亚的那种对农村工人和家奴的宗法式的态度,打嘴巴、棒打鞭抽,至今仍然盛行于易北河以东。可惜,普通老百姓的反抗情绪越来越强烈,或者在这里或者在那里,他们已经不愿再继续忍受这种严父般的管教措施。

由于德国至今仍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因而多数民众靠农业生活并且住在农村,所以工人党的最重要的、然而也是最困难的任务,就是向农村工人说明他们的利益和他们的状况。为此要迈出的第一步,是亲自去了解农村工人的这种利益和状况。党内的同志们,在情况许可这样做的条件下,如果把沃尔弗的描述同现在的情况进行比较,将已经发生的各种变化加以梳理,并对农村工人的现状进行描绘,那么,这对事业是会大有帮助的。除了真正的短工以外,小农也同样不应该忽视。1848年以后赎免的情况怎样?农民在这方面是否仍像过去那样受骗?读了《西里西亚的十亿》以后,自然而然

地会提出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严肃认真地回答这些问题，并在党的刊物上公布收集到的材料，这对工人事业来说，比刊登无论多少谈论未来社会组织的详细情节的文章，更加有帮助。

沃尔弗的文章的结尾还使人想到另一个问题。1849年以后，上西里西亚成了德国工业的最重要的中心之一。这种工业，和整个西里西亚的工业一样，主要是在农村，在大的乡村或新兴的城市，远离大城市中心。如果目前的关键问题是要在农村传播社会民主主义，那么，西里西亚，特别是上西里西亚就是最合适的发轫之地。但是，至少上西里西亚对社会主义的宣传来说，看来还仍然是一块处女地。语言不可能成为障碍；一方面，随着工业的发展，德语的使用在那里已经十分广泛，另一方面，有相当多的社会主义者会说波兰话。

现在再来谈我们的沃尔弗。5月19日，《新莱茵报》在出版了用红色油墨印的最后一号以后被封闭了。除了23件悬而未决的关于新闻出版的诉讼案以外，普鲁士警察局还有非常多的其他理由来控告每一个编辑，因此，全体编辑立刻离开了科隆和普鲁士。我们大多数人前往法兰克福，那里看来正准备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匈牙利人的胜利引起了俄国人的入侵；各邦政府和法兰克福议会之间在帝国宪法问题上的冲突，在各地引起了起义，其中德累斯顿、伊瑟隆和埃尔伯费尔德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巴登和普法尔茨的起义还在继续发展。沃尔弗的衣袋里装着一张布雷斯劳的旧委任状，委任他作为历史篡改者施滕策尔的接替人；人们仅仅是在接受“煽动者”⁷¹沃尔弗作为接替人的条件下，才同意“抱怨派”⁷⁰施滕策尔进入议会的。施滕策尔也和所有驯良的普鲁士人一样，当然服从普鲁士政府从法兰克福把他召回的命令。于是，沃尔弗接替了他的位置。

法兰克福议会由于自己的迟钝和愚蠢而失去了在德国曾一度成

为最强有力的议会的地位,竟落到了极端软弱无力的境地,这种软弱无力在这时候,各邦政府、甚至连它自己任命的帝国政府以及它自己,都看得很清楚,它茫然不知所措地站立于正在集结自己武装力量的政府和要求帝国宪法的起义人民之间。只要议会和南德意志运动的领袖们有勇气和决心,一切都还可以挽救。只要议会通过一个决议,号召巴登和普法尔茨的军队来法兰克福保护议会,那就行了。这样,议会就一举而重新赢得人民的信任。而那样一来,就有把握期待黑森—达姆施塔特的军队脱离政府,期待符腾堡和巴伐利亚参加运动;中德意志的小邦也就会卷进去;普鲁士就会自顾不暇,而俄国面对着德国这样强大的运动,也会不得不把后来在匈牙利顺利地进行活动的军队调一部分回波兰。这样一来,匈牙利就有可能在法兰克福得救,另一方面完全有这样的可能:面临着德国胜利发展的革命,人们在巴黎天天期待的那一场爆发,就不会以激进的小市民在1849年6月13日⁷²不战自败而告终。

时机是极其有利的。号召巴登和普法尔茨的军队来进行保卫的建议,是我们大家^①在法兰克福提出的,要军队甚至不经号召就开进法兰克福的建议是马克思和我^②在曼海姆提出的。但是,无论是巴登的领袖,或者是法兰克福议员,都是既没有勇气和毅力,也没有才智和主动精神。

① “我们大家”是恩格斯在1886年版上加的。——编者注

② “马克思和我”是恩格斯在1886年版上加的。——编者注

十

议会不去采取行动，却决定再次发表言论，仿佛它在此以前还絮叨得不够似的，而这一次的言论是通过《告德国人民书》发表的。当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提出了两个草案，其中多数派的草案是由乌兰德起草的。两个草案都写得苍白无力、枯燥无味和软弱不堪，不过反映了议会本身的无能、胆怯和问心有愧。5月26日提交讨论的两个草案，使我们的沃尔弗有机会彻底地向议员先生们陈述自己的意见。这次发言的速记记录如下：

“来自布雷斯劳的沃尔弗：

先生们！我报名发言，反对由多数派起草的、在这里宣读的告人民书，因为我认为它完全不适合目前的情况，因为我认为它太软弱无力，只适于作为一篇文章，登在代表写出这种宣言的党的日报上，而不能作为告德国人民书。由于刚才还宣读了另一个宣言，所以我顺便指出，我对这个宣言反对得更强烈，至于什么原因，我认为在这里不需要多谈。（大厅中央有人喊道：为什么不？）我只讲多数派的宣言；事实上，它写得如此的温和，甚至连布斯先生也不可能说出多少反对的意见，而这恰恰是对一篇宣言的最糟糕的评价。不，先生们，如果你们毕竟还想对人民有一点影响的话，那么，你们就不应该用宣言中采取的那种方式同人民讲话；你们不应该讲什么合法性、合法的根据等等，而应该讲非法性，就像各邦政府那样地讲，就像俄国人那样地讲，而所谓俄国人我指的是普鲁士人、奥地利人、巴伐利亚人、汉诺威人。（骚动和笑声）所有这些人我统称之为俄国人。（非常活跃）是的，先生们，在这个议会里也有俄国人的代表。你们应该对他们说：和你们一样，我们也持合法的观点。这就是暴力的观点，你们还应当附带说清楚，对你们来说，合法性就是以武力、以组织得很好的战斗队伍去对抗俄

国人的大炮。如果一定要发表宣言，那就应该发表这样的宣言：直截了当地宣布帝国摄政王这个人民的头号叛徒不受法律保护。（喊声：遵守秩序！楼座上响起欢动的掌声）对所有的大臣也是一样！（骚动又起）噢，你们别想打断我；他是人民的头号叛徒。

主席（雷）：我认为沃尔弗先生太肆无忌惮了。他不能在这个议会面前把大公——帝国摄政王称作人民的叛徒，因此，我必须叫他遵守秩序……

沃尔弗：我自己也接受遵守秩序的呼吁，同时我宣布，我是想违反秩序的，我宣布，他和他的大臣们都是叛徒！（场内喊声四起：遵守秩序，真粗鲁！）

主席：我只好停止您发言。

沃尔弗：好，我抗议；我要在这里代表人民讲话，说出人民所想的東西。我反对用这种精神写的任何宣言。”

这几句话就像雷鸣一样响彻了受惊的议会。在这些老爷们面前清楚而率直地叙述实际情况，这还是第一次。帝国摄政王及其大臣们的叛卖活动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每一个出席会议的人都亲眼目睹了这种叛卖活动的过程；但是谁也不敢把自己所看到的说出来。而现在来了这么一位毫无顾忌的矮小的西里西亚人，一下子就把他们那按虚礼俗套建成的整座空中楼阁推翻了！甚至连“坚定的左派”也不能不对这种由于直截了当地说明真相而不可原谅地破坏一切议会礼节的行为表示强烈抗议，而这种抗议是通过他们的可尊敬的代表卡尔·福格特先生之口提出的（关于福格特：1859年8月他接受了4万法郎的馈赠，1870年公布的路易-拿破仑付给自己的代理人的款项账单证明了这一点）。⁷³福格特先生用下面那种既是可怜地惊慌失措、又是无耻地欺罔捏造的抗议，充实了争论的内容。

“先生们，我要求发言是为了保护从诗人的心灵流入这个宣言中的明澈澄莹的清流，摒除那种扔进清流之中或者(!)挡住它的去路(!)的可鄙的赃物，我这样做是为了维护这些话，摒除那些在最近这个运动中聚积起来的、使那里的一切有淹没和染污危险的污水。是的，先生们！这是一些污水和赃物，有人用

这种(!)办法把这些东西向着一切只要能被认为是纯洁的东西扔去,这样的情(!)居然能够发生,我表示极大的愤怒。”

由于沃尔弗根本没有谈乌兰德起草宣言一事,而只是认为那篇宣言的内容太软弱无力,所以,人们根本不明白福格特先生的愤怒到底源于何处,他那些“赃物”和“污水”究竟来自何方。实际上这是由下列情况引起的:一方面是回想起《新莱茵报》始终以毫不留情的方式对待福格特一类的虚伪的伙伴,另一方面是痛恨沃尔弗的坦率的发言使这些虚伪的伙伴无法继续玩弄骑墙的把戏。在不得不对真正的革命和反动加以选择的时候,福格特先生表示拥护后者,拥护帝国摄政王及其大臣们——拥护“一切只要能被认为是纯洁的东西”。遗憾的是,反动派对福格特先生并不感兴趣。

就在当天,沃尔弗通过锡格马林根的议员维尔特向福格特先生提出用手枪决斗的挑战,当福格特先生拒绝持枪对射时,沃尔弗就威胁说要揍他一顿。虽然论体格,福格特先生同沃尔弗比起来简直是个巨人,但他还是逃到他的姐妹那里去求保护,没有他的姐妹的陪伴,他哪儿也不露面。沃尔弗放过了这个牛皮大王。

大家知道,在这次争吵以后没有几天,议会自己也确认沃尔弗的话是正确的,因为议会为了在自己的帝国摄政王及其政府面前苟全性命,已经逃到斯图加特去了。⁷⁴

十一

本文已接近尾声。在斯图加特,即便是在符腾堡军队解散国民议会的时候,沃尔弗也仍然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后来他到了巴登,最后,同其他流亡者一起到了瑞士。他选定苏黎世作为自己的居留地,在那里,又立即开始做私人教师,但是,由于那里聚集了大量有文化的流亡者,他当然就遇到了剧烈的竞争。尽管这种情况造成了困苦的生活处境,沃尔弗本来还是会留在瑞士的。但是,情况越来越清楚:俯首听命于欧洲反动派的瑞士联邦委员会⁷⁵决定要逐渐地把所有的流亡者,像沃尔弗所说的那样,“撵”出瑞士。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就意味着迁居美国,而各国政府所希望的也正是这样。如果流亡者到大洋彼岸去了,那就可以摆脱他们而得到安宁。

沃尔弗也常想到迁居美国,许多已经前往那里的朋友都请他到那里去。当他也被“撵”得忍受不了时,已一半打定了主意,于1851年6月来到伦敦,在这里,我们把他留了一个时候。私人教师中间的竞争在这里也很剧烈。虽然沃尔弗尽了最大的努力,也只能勉强糊口。同他往常在困苦的时候一样,他尽可能不让自己的朋友知道自己的情况。然而到1853年底,他不得不欠下大约37英镑(750马克)的债,这使他感到十分压抑;同年夏天,他在自己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1853年6月21日,我不得不在极度 distress(窘困无助)之中度过自己的生日。”

曼彻斯特有一位德国医生,也是一个流亡者,从在布雷斯劳时起就同沃尔弗保持友好的关系,他在曼彻斯特依靠自己的各种联系为沃尔弗找到了一定课时的私人教学机会,使他至少能够以此为生,要不是这样,沃尔弗到美国去的打算这次就要付诸实现了。1854年1月初,他就搬到曼彻斯特去了⁷⁶。起初当然相当困难。但毕竟生活有了保障,而后来,沃尔弗由于自己非常善于对待孩子并且赢得他们的爱戴,他可以指望,只要他在当地的德国人中有了名气,他的活动范围就会逐渐扩大。而结果也正是这样。过了几年,他的物质生活达到了对他自己的要求来说已经十分满意的水平;学生们崇敬他;他为人直爽、忠于职守、和蔼可亲,所以无论老少,无论英国人或德国人都敬重他、喜爱他。由于他的工作的性质,他主要是同资产阶级的,因而在政治上多少是敌对的分子接触;可是,虽然他从来丝毫也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气质、自己的信念,他却很少同那些人发生冲突,即使发生了冲突,结果也能保持自己的荣誉。当时我们大家都同各种公开的政治活动隔断了。反动的立法堵住了我们的嘴,日常的报刊绝口不提我们,出版者对于我们偶尔提出的请求连赐予拒绝都很勉强。看来,波拿巴主义最终战胜了社会主义。在许多年内,沃尔弗是我在曼彻斯特的惟一的同志;我们几乎天天见面,我在那里又经常有机会赞赏他对当前事件的几乎出自本能的准确判断,这是不奇怪的。

沃尔弗是如何地认真负责,对此我只举一个例子。他给自己的一个学生出了一道一本教科书上的算术题。他把答数同所谓习题解答上的答数对了一下,说学生算得不对。但是,当这个孩子把这道题重算了许多次,得出来的还是同样的答数时,沃尔弗便亲自复算了一

遍,发现孩子是正确的,而习题解答上印错了。沃尔弗立即坐下来把书上所有的习题重做了一遍,以便检查习题解答中是否还有同类错误:“这种情况我不应该再发生!”

也正是因为这样认真负责,他还没有活到 55 岁就去世了。1864 年春,由于劳累过度,他犯了严重的头痛病,渐渐地引起了几乎是彻夜不眠的失眠症;这时候,他的医生正好不在;找别的医生诊治他又不愿意。不管别人怎样请求,要他把课停止一些时候或加以限制,都没有用;凡是他已经承担的事情,他就要把它做完。直到他绝对不能工作时,他才间或停课。但是已经晚了。脑溢血引起的头痛病越来越厉害,失眠越来越经常。脑血管发生破裂,多次出现脑血肿以后,他就在 1864 年 5 月 9 日去世了。马克思和我失去了一位最忠实的朋友,德国革命失去了一位价值无比的人。

弗·恩格斯

对《公社史》第 29 页的意见⁷⁷

(1870 年 10 月 30 日梯也尔先生的停战)⁷⁸

除非参加 9 月 4 日⁷⁹事件的人极端愚蠢和虚伪透顶,才会把这一停战消息称为“好消息”。对于普鲁士人来说,确实是个好消息。

梅斯的投降刚刚使普鲁士军队的 6 个军(12 万人)恢复了行动自由。只有像特罗胥和茹尔·法夫尔之流的人才看不到:这支新军队迅即抵达法国中部以后,任何想使巴黎解围的试图都几乎不可能实现;当时不是缔结停战协定的时刻,而是在军事上作最大努力的时刻。要做到这一点,总共只剩下 15 天的时间,但这是极其宝贵的 15 天,是战争的紧要关头。

情况就是如此。

为了封锁巴黎,除 3 个步兵师以外,德国人必须动用全部军队。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后备队,因为这 3 个师占领奥尔良和沙托丹以后,就受到卢瓦尔军团的牵制,而不能起后备队的作用了。在西部、北部和东部,只有一支骑兵部队担负这一广阔地区的警戒和巡逻,因此没有能力抵挡步兵的进攻,守住这一地区。到 10 月底,包围巴黎的德

军战线,在对付城市的这一边已经大大巩固了。但是任何从外部发动的进攻,都必然在开阔地与普鲁士人交锋。只要出现5万人,即使像当时法国所拥有的那样年轻的军队,也能突破封锁并恢复巴黎同全国的联系。但是我们看到,本来应当迅速采取行动,却出现了如下情况。

巴黎政府同意了停战(10月30日),这次停战尽管时间很短,仍然给为了封锁而疲于种种作业和夜间值勤的德军以喘息时机。

从自己方面来说,奥雷尔·德·帕拉丹于11月2日把自己的军团集结在维耶尔宗,打算开往博让西,在那里横渡卢瓦尔河,插入占据沙托丹的普鲁士人(第二十二师)和驻在奥尔良的巴伐利亚人的中间。从维耶尔宗到博让西约45公里,两天之内完全可以到达。但是,据德国的资料(《……军事思想和见解》^①等等)所载,甘必大天真地以为,用火车运送4万人的军团可以像运送单个普通旅客一样迅速。于是他命令将军:不得步行,而用火车把他的军团从维耶尔宗运往图尔,再从图尔运往博让西。将军提出异议,甘必大则坚持己见。结果,卢瓦尔军团不是走了两天,也不是走了45公里,而是乘火车旅行了180公里,费了五天时间,并且不能避开敌人的侦察。该军团一直到7日才在博让西重新集结,准备行动。但是已经失去了三天宝贵的时间,敌人已经对这次调动有了戒备。

这是怎样的日子啊!11月3日,在这最紧要的一天里,普鲁士整整一个旅的骑兵在人数众多的自由射手⁸⁰的进攻下,不得不放弃芒特,退往韦尔。另一方面,法国各兵种的大量兵力从库维尔朝沙特

^① 海·哈讷肯匿名出版的著作《梅斯之战》作者的军事思想和对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见解》1871年美因茨版第185—186页。——编者注

尔方向行军时暴露了目标。如果卢瓦尔军团不是坐火车游逛,而是在 4 日就发动进攻(它完全可以做得到);如果它插入巴伐利亚人和普鲁士第二十二师的中间(这是容易做到的);如果它能利用自己在数量上的巨大优势,将敌人各个击破,然后向巴黎推进,那么,几乎可以有把握地说,巴黎是会解围的。

毛奇无疑十分清楚地看到了危险,因此他决定在必要时采取拿破仑在曼图亚所采取的行动⁸¹,即取消封锁,放弃配置在维勒库布莱的围城炮兵纵列,集结自己的军队以便在开阔地行动,直到取得胜利以后,即从梅斯调来军队以后,再恢复封锁。凡尔赛大本营已经把行李装上车子,整装待发,只待套马启程了(据目击者瑞士上校埃尔拉赫所说^①)。

如果普鲁士人被迫取消对巴黎的封锁,这就可能引起欧洲方面的压力,并导致光荣的和平。无论如何,这一事实一定会首先对欧洲、其次特别是对法国产生巨大的道义影响,最后也会对德国人产生相反的道义影响。至于这一事实的物质后果!巴黎至少可以有 15—20 天的时间,利用通往南部和西部的各条铁路来补给,这就等于延长一两个月的防守时间。还可以赢得同样多的时间在外省组织军队。这些军队抗击敌人时就不再会是纪律松弛、缺乏训练、缺乏装备、几乎是赤手空拳的状况了。要使法国重获胜利的希望,就只有赢得时间。这种机会在 11 月 3 日和 4 日是出现过的,但是我们看到,这种机会被错过了。

让我们继续考察事态的发展。

① 弗·冯·埃尔拉赫(1870—1871 年普法战争期间一个瑞士军人的观察与思考)1874 年莱比锡—伯尔尼版第 220 页。——编者注

巴黎甚至没有打算出击。

在一星期内,从西面向巴黎靠拢的兵力没有作过任何进攻的尝试。这是不奇怪的。这些兵力大概相当薄弱。甘必大责成凯腊特里先生组织西方军团的命令是 10 月 22 日发出的!

只有卢瓦尔军团在 11 月 7 日才在博让西做好战斗准备。一直到 9 日奥雷尔才向库洛米耶的巴伐利亚人发起攻击。巴伐利亚人一看看到从沙特爾方面向他们靠拢的普鲁士第二十二师必然会撤退,他们就退往图尔,第二天,即 11 月 10 日,他们就和这个师在图尔会合。奥雷尔就按兵不动了。同时,从梅斯开来的 3 个军共 6 万人,以强行军从塞纳河方面逼近。从梅斯乘火车来的另外两个普鲁士师(第三师和第四师)已经到达巴黎。现在毛奇有可能把普鲁士第十七师调往图尔,该师于 12 日到达图尔。这样一来,德国的 4 个师,约 35 000 人就做好了同卢瓦尔军团作战的准备。卢瓦尔军团再也不使他们感到不安了。

然而在 11 月 14 日,大批法军从德勒开往乌当,距凡尔赛只有两天路程。毛奇在这一方向暂时只有自己的骑兵部队,不能进行充分有效的侦察,来弄清这支先遣队后面还有多少兵力。当天他又打算放弃凡尔赛并取消封锁(布卢默)^①。但是这一次解决问题已经不以天计算,而是以小时计算了。从梅斯最先调来的一个军(第九军)当天就抵达枫丹白露。第三军定于 16 日和 18 日抵达内穆尔,而第十军定于 19 日抵达约纳河岸茹瓦尼。毛奇把第十七师派往郎布依埃,把第二十二师派往沙特爾,把巴伐利亚人派往欧诺,即穿插到卢瓦尔

① 参看威·布卢默《从色当战役至战争结束时德军的军事行动》1872 年柏林版。——编者注

军团(他给卢瓦尔军团让出通向巴黎的道路)和从西部威胁凡尔赛的军队的中间。这一次奥雷尔按兵不动倒救了自己。如果他开进摆在他面前的缺口,那就会被准备向他的两翼袭击的两路德军所击溃。11月19日普鲁士第二军团的3个军连同在约纳河的后备队占领了枫丹白露和内穆尔。11月20日,曼托伊费尔指挥的第一军团集结在从贡比涅到努瓦永的瓦兹河一线;自梅斯调来的军队从北部和南部加强了对巴黎的封锁。于是,解除这一封锁的最后机会也丧失了,因为特罗胥、甘必大和奥雷尔彼此都犯了错误。他们的错误,可以说几乎像普鲁士队伍那种大受赞扬的准确行动一样,相互加深了。

弗·恩格斯写于 1877 年 2 月
初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33 年俄文第 1
版第 15 卷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5 卷翻译

弗·恩格斯

*关于 1877 年德国选举
给恩·比尼亚米的信⁸²

我亲爱的比尼亚米：

您的驻柏林通讯员大概已将德国选举的一切详细情况告诉您了。我们的胜利使德国和国外的资产阶级胆战心惊：在伦敦这里，整个新闻界都感受到它的反作用。更值得注意的，并不是我们争取到的新选区的数量，虽然值得指出，威廉皇帝、萨克森国王^①和最小的德国邦君（罗伊斯亲王）都居住在由工人社会党人当代表的选区内，因而代表他们本人的也就是社会党人了。重要的是，除了那些我们取得多数的选区之外，无论在大城市还是在乡村，我们虽是少数，也都得到了为数众多的选票。在柏林得了 31 500 票，在汉堡、巴门—埃尔伯费尔德、纽伦堡、德累斯顿各得 11 000 票；不仅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萨克森、不伦瑞克等地的农村，甚至在封建主义的堡垒——梅克伦堡，我们虽是少数，但从农民那里也获得很多票。1874 年 1 月 10 日我们得了 35 万票，而在 1877 年 1 月 10 日，得了至

^① 阿尔伯特。——编者注

少 60 万票。选举给了我们以估量自己力量的工具；根据营的数目，您现在就可以判断，德国社会主义大军有多少个军在选举的日子接受了检阅。这一道义上的影响无论对正在欢庆自己的胜利的社会党，还是对仍漠不关心的工人，以及对我们的敌人，都是巨大的。好在人们每三年一次都要犯下去投票的弥天大罪。主张放弃选举的先生们是可以随便怎么说的，然而像 1 月 10 日选举这样一个事实，要比这些先生们的一切“革命”词句更有价值。我谈到**营和军**，并不是比喻的说法。投票拥护我们的那些 25 岁（最低年龄限制）的男人中至少有一半，也许还要多，都曾在军队中服役过两年或三年，他们会很好地使用针发枪和线膛炮，现在编入了预备役。只要再有几年继续获得这样的成就，那么无论是预备役兵或是**后备军**⁸³（占战时全部军队的 $\frac{3}{4}$ ）都将会同我们站在一起，这样我们就能瓦解全部军事机构，并使任何进攻战都不可能发生。

有人会说，那么为什么你们不使用这些力量现在就来进行革命呢？因为，我们取得的不过是 550 万票中的 60 万票，并且这些选票又分散在各个区域，我们显然会被打败，举行考虑欠周的起义，采取轻率的行动，我们自己就会把一个运动葬送掉，而这个运动只需不长的时间就可以使我们得到有把握的胜利。显然，我们不会很容易地取得胜利；普鲁士人不会让社会主义感染他的全部军队，不会不采取对策；但是，反动和镇压越厉害，掀起的波浪就越高，直到最后把所有的堤坝冲毁。您知道，柏林发生了什么事？上月 10 日傍晚，一大群人（警方自己估计约 22 000 人）挤满了社会党委员会所在的大楼附近所有的街道，由于我们党的组织和纪律极好，委员会最先得到关于选举最后结果的消息。选举结果一宣布，整个人群齐声发出了**欢呼**，

向谁？向当选的人？不是，向“我们的最积极的鼓动者王国检察官泰森多夫！”此人一向以反对社会党人的诉讼而出名，而他的暴力行为却使支持我们的人数加倍增长了。

这就是我们的人对暴力手段的回答，他们不仅不受这些影响，而且甚至向它们挑战，把它们当做最好的鼓动手段。

致兄弟般的敬礼

您的 弗·恩格斯

弗·恩格斯写于 1877 年 2 月
13 日

载于 1877 年 2 月 26 日《平民
报》第 7 号

原文是意大利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5 卷翻译

Verlag von
G. Fischer Verlag
Jena
Druck von
G. Fischer Verlag
Jena

Vorwärts

Verlag von
G. Fischer Verlag
Jena
Druck von
G. Fischer Verlag
Jena

Central Organ der Sozialdemokratie Deutschlands.

№ 32

Freitag, 16. März.

1877

弗·恩格斯

意大利的情况⁸⁴

社会主义运动在意大利终于也建立了巩固的基础，预期会迅速而胜利地发展起来。但是，为了让读者充分了解已经发生的转折，我们应当回顾一下意大利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

意大利的运动最初是在巴枯宁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当工人群众对他们的剥削者充满强烈的但极其模糊的阶级仇恨的时候，在一切有革命工人活动的地方，巴枯宁亲自指挥下的一帮年轻的律师、医生、文人、店员等等攫取了领导权。他们都是被授予各级圣职的巴枯宁主义秘密“同盟”的盟员，这个“同盟”的目的是要整个欧洲的工人运动服从它的领导，从而在未来的社会革命中为巴枯宁主义宗派骗取统治地位⁸⁵。关于这方面的比较确切的材料，在《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⁸⁶（不伦瑞克白拉克出版社版）这本小册子中，有详细的叙述。

当运动在工人中间还只是刚刚萌芽的时候，这样做极为顺利。

巴枯宁主义的激烈的革命词句到处都博得了预期的掌声,连那些在过去的政治革命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人,也被卷入了这股潮流。用巴枯宁自己的话来说,意大利同西班牙一起,已经变成了“欧洲最革命的国家”。⁸⁷而所谓革命,就是大发空论而不做实事。英国的、其次法国的、最后德国的工人运动都是通过实质上是政治的斗争成长和壮大起来的,与此相反,在意大利,任何政治活动都遭到诅咒,因为据说进行政治活动就意味着承认“国家”,而“国家”是一切祸害的总和。于是,那里禁止建立工人党;禁止去争取实现任何抵御剥削的保护措施,如争取正常工作日、限制女工和童工劳动;而首先禁止的则是参加任何选举。与此同时,那里要求人们必须为未来的革命而进行鼓动、组织和秘密工作,一旦革命从天外飘然降临,就应当立刻在没有任何临时政府、完全消灭任何国家机构或类似国家的机构的情况下,单靠(在同盟秘密指挥下的)工人群众的首创精神来进行——“但是请不要问我如何做到这一点!”^①

上面已经说过,当运动还处于幼稚阶段的时候,这一切都进行得极为顺利。意大利大多数城市几乎仍然处于世界交往之外,它们对世界交往的了解仅限于外国人来往这种形式。这些城市向四周农民供应手工业品,并成为向更大范围出售农产品的中介。此外,在这些城市里还居住着占有土地的贵族,他们在那里靠自己的地租生活。最后,还有很多外国人也到那里去花钱。在这些城市中,无产阶级分子人数不多,很不开展,而且,其中还混杂着很多没有经常或固定职业的人,这种情况是由于外国人来往和温和的气候造成的。在这里,那种低声谈论匕首和毒药的极端的革命词句最先找到肥沃的土壤。

^① 引自海涅的组诗《青春的苦恼》中的第八首诗。——编者注

但是在意大利,主要在北部,也有工业城市。只要运动在**这些**城市的真正无产阶级的群众中间扎了根,这种散发霉味的食粮就再也不能满足需要了,这些工人也不会继续受那些失意潦倒的年轻资产者控制了,按照巴枯宁的说法,这种资产者是因为他们“毫无升官发财的前途”才投靠社会主义的。

结果正是这样。意大利北部的工人对于禁止任何政治活动,即禁止任何越出空谈和阴谋活动界限的**实际**的活动,日益强烈地表示不满。德国人在1874年选举中获得的胜利¹⁴以及由这种胜利引起的使德国社会党人实现合并²的影响,在意大利也不再是一无所闻。经历过旧的共和运动的、不得已而屈从于“无政府主义的”叫嚣的人们,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机会来强调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并在《平民报》上表明正在觉醒的反对派立场。这家周报在创办后的头几年主张共和,不久便归附了社会主义运动,并且尽可能地同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宗派活动疏远。正当意大利北部的工人群众终于摆脱了自己的惹人厌烦的领导人、以实际的运动来代替虚幻的运动的时候,他们发现《平民报》是愿意偶尔刊载暗示必须进行政治斗争这种异端邪说的报纸。

如果巴枯宁还活着的话,他就会采取他惯用的方式来压制这种异端邪说。他会硬说那些替《平民报》撰稿的人具有“权威主义”、权力欲、虚荣心等等,对他们进行各种各样卑鄙的人身攻击,并让“同盟”在瑞士、意大利、西班牙的所有机关报喋喋不休地重复这种攻击。然后,作为第二步,他才会证明所有这些罪过都只是那个致命的原罪的必然结果,这个原罪就是承认政治活动这种异端邪说,因为进行政治活动就是承认国家,而国家是权威主义和统治权力的体现,因此谁要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活动,谁就必定是要坚决地为自己争得政治统治权力,可见,他是工人阶级的敌人——那就对他大张挞伐吧! 这种

从已故的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那里学来的方法,巴枯宁运用自如,只是用得过于频繁、过于单调了。不过,这种方法毕竟是保证人们至少可以得到暂时成功的惟一方法。

但是巴枯宁死了,于是秘密的世界政府便由瑞士纳沙泰尔的詹姆斯·吉约姆先生一手操纵⁸⁸。胸襟狭窄的学究占据了那位老于世故的风云人物的位置,并且把瑞士加尔文教派⁸⁹的狂热带到无政府主义学说中来了。他认为应当不惜任何代价格守真正的信仰,而且应当无条件地把这位来自纳沙泰尔的眼光狭小的教书先生奉为这一真正信仰的教皇。《汝拉联合会简报》(该联合会承认自己连200个会员也不到,而瑞士工人联合会⁹⁰拥有5000名会员)被指定为这一宗派的国家通报⁹¹,并毫不客气地“训斥”起信仰动摇的人来了。但是,组织在“上意大利联合会”⁹²中的伦巴第工人再也不愿忍受这种训诫了。去年秋天,《汝拉简报》竟敢命令《平民报》辞退一位不合吉约姆先生心意的巴黎记者,从那时起,它们的友谊就结束了。简报继续指责《平民报》和意大利北部的人抱有异端邪说。但是,《平民报》和意大利北部的人现在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他们知道,在关于无政府状态和自治的说教背后,隐藏着少数阴谋家妄图独断专行地指挥整个工人运动的野心。

“短短四行心平气和的评论竟使《汝拉简报》暴跳如雷,而该报却把事情说成似乎是我们对它大发雷霆,其实它只是使我们觉得好笑。有些人出于病态的妒忌心四处活动,大肆诽谤,乞求别人对我们和我们的朋友表示哪怕是一星半点的愤怒也好。谁要是上他们的当,那真是太幼稚了。这种久已采用的制造^争吵和挑^拨离^间的手法是人们十分熟悉的了,他们玩弄的耶稣会的(罗耀拉^①的)

① 依纳爵·罗耀拉(1491—1556)是西班牙贵族,耶稣会的创建者。——编者注

诡计已不能再欺骗什么人了。”(1877年1月21日《平民报》)

2月26日的报纸把这些人叫做“某些狭隘的**无政府主义**分子而同时(多么矛盾!)又是**独裁**分子”。这最好不过地证明,在米兰,这些老爷已经完全被人认清,他们在那里再也不能为非作歹了。

除此之外,德国1月10日的选举和与此有关的比利时运动的转折^①,即屏弃以往实行的不干预政治的政策而代之以争取普选权和工厂法的鼓动,也推动了整个形势的发展。上意大利联合会于2月17日和18日在米兰举行了代表大会。大会的决议没有对国际的意大利会员中的巴枯宁主义集团采取任何不必要和不恰当的敌视态度。决议甚至表示准备派遣代表参加在布鲁塞尔召开的、试图把欧洲工人运动的各种派别联合起来的代表大会⁹³。但是,决议同时极其明确地提出了对意大利运动有决定意义的三点:

(1)为了推进运动的发展,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这就是说,也必须采取政治手段;

(2)社会主义工人应当组织成为不依赖任何其他政治或宗教党派的社会主义政党;

(3)上意大利联合会在保持其自治的条件下和在国际的最初章程的基础上,把自己视为这个伟大的联合组织的成员,它不依赖于其他一切意大利组织,但是将一如既往地继续证明自己是讲团结的。

总之,提出了政治斗争、组织政党和同无政府主义者分裂。上意大利联合会作出了上述决议,从而彻底地脱离巴枯宁主义的宗派而同伟大的欧洲工人运动采取了共同的立场。而且,因为这个联合会

^① 详情参看恩格斯《1877年的欧洲工人》(本卷第161—184页)。——编者注

分布在意大利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伦巴第、皮埃蒙特、威尼斯省，所以它肯定会获得成功。只要它采用为所有其他国家的经验检验过的那些有效的鼓动手段，巴枯宁主义巫医的帮派活动很快就会显得软弱无力，而意大利南部的无产阶级也很快就会摆脱那些由于成了穷途潦倒的资产者而把领导工人运动当成职业的人给他们戴上的枷锁。

弗·恩格斯写于 1877 年 3 月
6 日—11 日之间

载于 1877 年 3 月 16 日《前进
报》第 32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5 卷翻译

弗·恩格斯

*英国农民要求参加国内政治斗争⁹⁴

6月5日于伦敦

前几天在埃克塞特会堂举行了农业工人联合会代表会议。⁹⁵约瑟夫·阿奇在会上表示坚决反对战争,博得热烈的鼓掌。农业劳动者的政党的领导人公开宣布自己是和平的拥护者,主要是因为劳动者承受战争所带来的牺牲总是比社会其他阶级要沉重。在英国,农业工人还没有正式参加本国的政治生活,然而他们的这种庄严的反战宣言,对左右国家政治的那些阶级也不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农民开始感觉到有必要也直接参加这种政治斗争,因此他们在埃克塞特会堂举行的自己的会议上也——而且主要是——讨论了扩大选举权的问题。他们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仍然是穷苦的贱民等级。所以他们敲击议会的大门,要求进去。他们再也不想做以前那样的人了。显而易见,这种要求遇到了冷眼,这种冷眼来自所有那些把农业劳动者的被统治地位看作英国整个政治经济制度基础的人——这种人不在少数,尤其是在僧侣中间。另一方面,资产阶级议会反对派的代表们已站出来,要将这种农民运动的领导权抓到

自己手里并利用它来消灭正在执政的政敌。这些资产阶级反对派的首领是布莱特先生,他也在埃克塞特会堂的会议上讲了话,他巧妙地避开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而针对现在执政的那些人猛烈地进行政治上的谴责。很显然,社会—经济问题对资产阶级来说是非常困难而又棘手的问题;在英国,贵族在这方面总是不显得特别窘迫,因为贵族与资产阶级不同,它的社会地位并不迫使它处处得为自己的发财致富动脑筋。这一点,劳动者是十分清楚的,因此,当他们想要取得让步的时候,他们对贵族比对资产者抱有更大的希望,他们不久前向比肯斯菲尔德伯爵递交请愿书就说明了这一点。只要今后情况还是这样,只要劳动者还有可能在资产者和贵族之间钻空子来为自己取得一定的利益,在英国就肯定不会出现像其他国家那样激烈的社会主义震荡——在那些国家里统治阶级在劳动者面前完全是一个坚实的、与之为敌到底的反动集团。但是到了劳动者阶级不能再从土地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的竞争中得到任何好处(因为这种竞争不再存在了)的那一天,在英国也会开始真正的革命时期。迄今为止,贵族是利用慈善性质的让步来软化劳动大众的;而现在资产阶级出动了,它顺势抓住劳动者的政治倾向并把这种倾向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以便引导它。我们正面临普选时期;资产阶级急忙在这方面施展自己的本领和诡计,即做政治让步,以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并把贵族排挤掉。无论如何,整个这部由三种社会成分——无产者、资产者和贵族——组成的生活机制,正在促使无产者不再把自己看作儿童,或感伤主义者,而是开始懂得——正如一位演讲者在埃克塞特会堂所精辟阐述的那样——他们同资产阶级和贵族的关系只能是**利害关系**。

正像你们看到的,英国的社会运动是缓慢的、演进的、不革命的,

但总是一个前进的运动。

弗·恩格斯写于 1877 年 6 月
5 日

载于 1877 年 6 月 8 日《平民报》
第 18 号

原文是意大利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5 卷翻译

弗·恩格斯

*英国农业工人联合会 和农村的集体主义运动⁹⁶

6月14日于伦敦

我发现我的前一篇文章是不完全的,因此我认为有义务给你们写现在这篇。我在我那篇文章中向你们谈了6年前由公民阿奇建立的农业工人联合会。阿奇现在由于他建立联合会这一首创活动和他的讲演艺术的特点而闻名于英国:他是一位真正的演说家,有几分不雅,但是在粗俗中见力量。

他是从工资问题开始其宣传工作的。农民每星期工资不超过16里拉(意大利里拉)。阿奇在一些有才干的朋友们的有效帮助下使联合会经过了三四年发展到五万多会员,已能组织起有三万人参加的罢工。罢工圆满成功,在东部各郡每周工资增加了两个半里拉。同时,还采取措施允许农民迁往美国、澳大利亚,或者在英国从一个郡迁到另一个郡。通过这种迁徙的办法,使劳动力减少的地方的工资得到提高。这种斗争一直顺利地开展到1874年。但是在这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曾有人试图提出土地收归国有的问题,例如著名

的经济学家斯图亚特·穆勒早就提出过。还有人提出了普选和人民教育的问题。但是,请你们注意一个极为重要的情况:争取集体所有制运动则几乎完全是那些脱离了公民阿奇的人进行的。阿奇愿意提出的总是那些不触及神圣的土地个人所有制的问题。的确,面对集体主义运动,他甚至倾向于宣传农民和他们的剥削者之间实行某种和解,换言之,他在革命的集体主义思想面前感到自己是保守者,他把他的所有敌对行动仅限于反对上层贵族。为了在议会选举时不至于使租佃农场主成为誓不两立的敌人,他认为多少讨好一下租佃农场主也是有益的。因此,我们不难看到阿奇会进入下议院,从这个意义上讲已经出现一定的宣传工作,阿奇有意接受议员职务。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会妨碍集体主义运动向前发展;确实就连不久前举行的农业工人联合会会议也多少讨论了这一方面的问题。会议承认有必要在农业中进行大规模的改良工作,并表示希望有一部法律,规定将所有可耕地转交给一个代表机关并给所有者以补偿。当然,这种剥夺的办法应当面向那些掌握未来农业发展的人们,使劳动人民受益。

我认为有必要把这个问题给你们讲一讲,因为我希望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者对我们的农业工人联合会的特点和在它领导下开展的运动能有个明确的认识。

弗·恩格斯写于1877年6月
14日

载于1877年6月18日《平民
报》第19号

原文是意大利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25卷翻译

弗·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⁹⁷

第一个给社会主义、因而也给现代整个工人运动提供了科学基础的人——卡尔·马克思，于1818年生在特里尔。起初他在波恩和柏林攻读法学，但不久就专心致力于研究历史和哲学，并且在1842年曾准备争取当大学哲学教师，然而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死后所发生的政治运动⁹⁸，使他走上了另一条生活道路。在他的参加下，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领袖康普豪森和汉泽曼等人，在科隆创办了《莱茵报》，由于马克思对莱茵省议会辩论的批评引起了极大的注意⁹⁹，1842年秋他被聘为该报的主笔。《莱茵报》的出版当然是经过检查的，但书报检查机关对它没有办法^①。《莱茵报》差不多总是能登载那些重要的文章；先是给书报检查官送一些次要的材料让他去删除，一直到他自行让步，或者在第二天出不了报纸的威胁下不得不让步为止。如果有十家报纸有《莱茵报》这样的勇气，而出版人又不惜额

① 第一个对《莱茵报》进行检查的是警务顾问多里沙尔，就是他曾把《科隆日报》上关于菲拉莱泰斯（后来的萨克森国王约翰）翻译的但丁《神曲》一书的广告删去，并且批示说“不应拿神圣的东西搞喜剧”。

外花上几百塔勒排版费的话,那么德国的^①书报检查早在1843年就通行不通了。可是德国的报馆老板都是些卑微胆怯的庸人,所以《莱茵报》是孤军作战。它把书报检查官一个个都弄得一筹莫展。最后,它要受双重检查,在第一次检查之后,行政区长官还要最后检查一次。但是这样也无济于事。1843年初,政府声称对这个报纸无可奈何,就干脆把它查封了。

马克思(这时他已经同后来的反动大臣冯·威斯特华伦的妹妹结婚)迁到了巴黎,在那里和阿·卢格一起出版《德法年鉴》,他以在该刊物上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开端,陆续写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后来他和恩格斯共同出版了《神圣家族。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这是针对当时德国哲学唯心主义的最后一种表现形式所作的讽刺性的批判。

马克思除了研究政治经济学和法国大革命史而外,还总是腾出时间利用适当机会抨击普鲁士政府;普鲁士政府对他进行了报复,1845年春天,它促使基佐内阁下令把马克思驱逐出法国¹⁰⁰。据说亚历山大·洪堡先生在这件事情上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¹⁰¹马克思移居布鲁塞尔,并于1847年和1848年在那里用法文先后发表了《哲学的贫困》,即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的批判和《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同时,他在布鲁塞尔抓住时机创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⁶³,从而开始了实际的鼓动工作。自从1847年他和他的政治上的朋友加入已存在多年的秘密的“共产主义者同盟”¹⁰²后,实际的鼓动工作对于他就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了。同盟的全部组织这时已得到根

^① 在1891年纽约《先驱者·人民历书画刊》上发表时,这里删去了“德国的”一词。——编者注

本的改造；这个先前多少是密谋性的团体，现在变成了一个平常的、只是不得已才是秘密的共产主义宣传组织，变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个组织。凡是有德意志工人协会的地方，就有同盟；英国、比利时、法国、瑞士的几乎所有工人协会的领导成员，以及德国很多工人协会的领导成员，都加入了同盟，同盟在初生的德国工人运动中力量很大。同时我们的同盟第一个强调指出了整个工人运动的国际性质，并且在实践中实现了这点；它的成员中有英国人、比利时人、匈牙利人、波兰人和其他国籍的人，并且还举行了（特别在伦敦）多次国际工人会议。

在1847年召开的两次代表大会上，同盟进行了改组。第二次大会决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起草一篇宣言，把党的基本原则规定下来并公布于世。《共产党宣言》就是这样产生的，它在1848年二月革命前不久第一次发表，后来被译成欧洲几乎所有的文字。

马克思参加了《德意志—布鲁塞尔报》，该报无情地揭露了祖国在警察统治下的太平盛世，普鲁士政府又以此为借口要求把马克思驱逐出境，不过没有成功。可是，当布鲁塞尔由于二月革命影响也开始发生民众运动，看来比利时的时局就要发生突变的时候，比利时政府便毫不客气地把马克思逮捕起来并把他驱逐出境了。这时法国临时政府通过弗洛孔，邀请他重返巴黎，他接受了这个邀请。

当时在巴黎的德国人策划把在法国的德国工人编成武装军团，利用这种军团把革命和共和制度输入德国，马克思到了巴黎，首先就反对这种昏头的做法。因为一方面，德国应该自己来实现自己的革命；另一方面，在法国组织的任何外籍的革命军团，都会被临时政府的拉马丁之流当即出卖给所要推翻的那个政府，比利时和巴登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三月革命以后,马克思迁到科隆,在那里创办了《新莱茵报》。这家报纸从1848年6月1日出版到1849年5月19日,是当时民主运动中惟一代表无产阶级观点的报纸。单从它对1848年6月巴黎起义者表示无条件声援的事实中就可以明白看出这点,为此,差不多全体股东都脱离了这家报纸。《十字报》曾指责《新莱茵报》攻击一切神圣的东西的行为是“粗鲁无礼的钦博拉索山”¹⁰³,因为上自国王^①和帝国摄政^②,下至宪兵都遭到该报攻击,而这一切是发生在一个当时拥有8 000兵员的守备部队的普鲁士要塞内;突然变得反动的莱茵省自由主义庸人们表示了愤怒;1848年秋天科隆的戒严状态迫使《新莱茵报》停刊很久;法兰克福的帝国司法部曾就该报一篇又一篇的文章向科隆的检察官告发,要求进行法律追究,——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报纸在警察的眼皮底下仍然从容地继续编辑和印行,它的销行和声誉随着它对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尖锐攻击愈益扩大了。当1848年11月普鲁士发生政变时,《新莱茵报》在每号报头上号召人民抗税,以暴力对抗暴力。1849年春天,报纸曾因为这一点,另外还因为一篇文章,被告到陪审法庭,但两次都宣判无罪¹⁰⁴。最后,1849年德累斯顿和莱茵省的五月起义被镇压下去了¹⁰⁵,在集结和动员相当大的兵力以后,普鲁士开始了对巴登—普法尔茨起义¹⁰⁶的讨伐,这时政府认为自己已经十分巩固,足以采用暴力来消灭《新莱茵报》了。该报在5月19日用红色油墨印了最后的一号。

马克思又到了巴黎,但在1849年6月13日示威⁷²以后几个星期,法国政府迫使他选择一条路:要么迁到布列塔尼,要么离开法国。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② 奥地利大公约翰。——编者注

他选择了后一条路,迁到伦敦,在这里一直住到现在。

以评论性杂志形式继续出版《新莱茵报》的尝试(1850年于汉堡),不久就因反动势力日益猖獗而只好放弃。1851年12月法国发生政变以后不久,马克思发表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纽约版;第2版于1869年,即战争以前不久在汉堡发行)。1853年间他写了《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最初在巴塞尔,其后在波士顿,近年又在莱比锡印行)。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在科隆被判罪以后,马克思离开了政治鼓动工作,一方面在10年内专心研究英国博物馆图书部中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丰富藏书,另一方面又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稿,该报在美国国内战争爆发以前,不仅经常刊载由他署名的通讯,而且发表了他写的许多论欧洲和亚洲形势的社论。他根据对英国官方文件的仔细研究而写成的抨击帕麦斯顿勋爵的文章,在伦敦被翻印成小册子。

他多年研究经济学的最初成果,就是1859年问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柏林敦克尔出版社版)。这部著作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包括货币学说在内。在意大利战争期间,马克思在伦敦出版的德文报纸《人民报》上既反对当时涂上自由主义色彩、装扮成被压迫民族解放者的波拿巴主义,也反对当时普鲁士企图在中立的幌子下混水摸鱼的政策。同时他还得反击卡尔·福格特先生,因为此人在当时受拿破仑亲王(普隆-普隆)委托,由路易-拿破仑支薪来进行鼓动,以争取德国中立,甚至持同情的立场。福格特蓄意制造最卑鄙的谣言大肆诬蔑马克思,而马克思便以《福格特先生》一书(1860年伦敦版)来回击他。在这本书里,马克思揭露了福格特和帝国的假民主集团中其他先生们的面目,并且根据内部和外部的材料揭发了福格特已被十二月帝国¹⁰⁷所收买。整整10年以

后,这件事被证实了:1870年在土伊勒里宫发现的并为九月政府公布的波拿巴雇佣人员名单里,在字母V^①下面写着:“福格特——1859年8月付给他4万法郎。”^②

最后,1867年在汉堡出版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这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这部著作叙述了他的经济学观点和社会主义观点的基础以及他对现存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进行的批判的基本轮廓。这一划时代的著作的第二版于1872年问世,现在作者正进行第二卷的定稿工作。

这时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又十分壮大了,以致马克思有可能来考虑实现他的宿愿:创立一个把欧美最先进国家都包括进来的工人协会,这个协会无论在工人自己面前或是在资产者及各国政府面前,都会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性质的可以说是活生生的体现,会使无产阶级受到鼓舞,变得坚强,使无产阶级的敌人感到恐惧。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为声援当时再次遭到俄国蹂躏的波兰而召开的群众大会,为提出这项建议创造了条件,建议被热烈地通过了。国际工人协会¹⁶成立了;大会选出了一个临时总委员会,驻在地设在伦敦。从这一届起到海牙代表大会¹⁰⁸时止,每届总委员会的灵魂都是马克思。国际总委员会所发表的一切文件,从1864年的成立宣言直到1871年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几乎都是由他起草的。叙述马克思在国际中的活动,就等于撰写欧洲工人还记忆犹新的这个协会本身的历史。

① “福格特”德文的第一个字母是V。——编者注

② 见《皇室文件和通信》(两卷集)1870—1871年巴黎版第2卷第161页。——编者注

巴黎公社的失败,使国际陷于无法存在下去的境地。国际被推到欧洲历史舞台的前台的时候,也正是它在各地都无法再展开任何有成效的实际行动的时候。事变把它提到第七强国¹⁰⁹的地位,同时又不允许它动员并运用自己的战斗力量,否则就必然招致失败和使工人运动遭受几十年的压制。况且从各方面还出现了一些分子,企图利用协会迅速提高的声誉来满足个人的功名欲或个人的虚荣心,而不了解或无视国际的真正处境。当时必须作出一种勇敢的决定,而作出这种决定并使之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得到通过的又正是马克思。国际郑重决定,它不对那些丧失理智的、卑鄙龌龊的分子的中坚——巴枯宁主义者的行动负任何责任;其次,鉴于国际在普遍反动的局势下不可能满足仍对它提出的过高的要求,而要照旧充分展开活动,就非使工人运动付出许多流血牺牲的代价不可——鉴于这种形势,它暂时退出舞台,决定把总委员会迁到美国。后来的情况证明这个在当时和后来曾常常受到指责的决定是多么正确。这样,一方面任何想假借国际的名义策划无谓暴动的企图被制止了;另一方面,各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之间从未间断过的密切联系证明,国际所唤起的对于各国无产阶级利益一致和相互团结的觉悟,即使没有一个正式的国际联合组织这样一条纽带,仍然能够发挥作用,而这样一条纽带在当时已经变成了一种束缚。

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马克思终于得到了宁静和空暇来重新开始他的理论工作,他的《资本论》第二卷可望不久就能付印。

在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中,这里我们只能谈两点。

第一点就是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以前所有的历史观,都以下述观念为基础: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

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求,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决定全部历史的又是政治变动。可是,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政治变动的动因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没有人发问过。只有在法国历史编纂学家和部分英国历史编纂学家的新学派中,才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至少从中世纪起,欧洲历史的动力是新兴资产阶级为争取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同封建贵族所作的斗争。现在马克思则证明,至今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仅仅是社会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可是,这些阶级又是由于什么而产生和存在的呢?是由于当时存在的粗鄙的物质条件,即各该时代社会借以生产和交换必要生活资料的那些条件。中世纪的封建统治依靠的是自给自足的小规模的农民公社的经济,这种经济自己生产几乎所有必需品,几乎不进行交换。农民公社由好战的贵族保护它们不受外敌侵害并使它们具有民族的或者甚至是政治的联系。当城市产生,而独立的手工工业和最初在国内后来在国际上的商业交往也随之产生的时候,城市资产阶级就发展起来了,这个资产阶级早在中世纪时期,就已经在反对贵族的斗争中争得了在封建制度内同样跻身于特权等级的地位。可是随着15世纪中叶以后欧洲以外的世界的发现,资产阶级得到了一个更广大得多的通商区域,从而也得到了发展自己工业的新刺激;在一些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中,手工业被已经具有工厂性质的工场手工业所排挤,工场手工业又被大工业所排挤,而这种大工业是由于前一世纪的各种发明,特别是由于蒸汽机的发明才可能建立的。大工业又反过来影响商业,它在落后国家里排挤旧式手工劳动,在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创造出现代的新式交通工具——轮船、铁路和电报。这样,资产阶级日益把社会财富和社会权力集中

在自己手里,虽然它在长时期内还被排除于政权之外,政权仍然操在贵族和靠贵族支持的王权手里。但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在法国是从大革命起——它把政权也夺到手了,于是它对于无产阶级和小农说来就成了统治阶级。从这个观点来看,在充分认识了该阶段社会经济状况(而我们那些历史编纂学家当然完全没有这种认识)的条件下,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同样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的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的应有之义此时终于获得了承认。

这种新的历史观,对于社会主义的观点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证明了:至今的全部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中发展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是一直存在的;大多数人总是注定要从事艰苦的劳动而很少能得到享受。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只是因为人类发展的以前一切阶段上,生产还很不发达,以致历史的发展只能在这种对立形式中进行,历史的进步整个说来只是极少数特权者的事,广大群众则注定要终生从事劳动,为自己生产微薄的必要生活资料,同时还要为特权者生产日益丰富的生活资料。对历史的这种考察方法通过上述方式对至今的阶级统治作了自然而合理的解释,不然这种阶级统治就只能用人的恶意来解释,可是这同一种考察方法还使我们认识到:由于现时生产力如此巨大的发展,就连把人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最后一个借口,至少在最先进的国家里也已经消失了;居于统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已

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不但不能再领导社会,甚至变成了生产发展的障碍,如各国的商业危机、尤其是最近的一次大崩溃¹¹⁰以及工业不振的状态就是证明;历史的领导权已经转到无产阶级手中,而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整个社会地位,只有完全消灭一切阶级统治、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才能解放自己;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资产阶级不能控制的程度,只等待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去掌握它,以便确立这样一种状态,这时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

马克思的第二个重要发现,就是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揭示了在现代社会内,在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怎样进行的。自从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价值的源泉这个原理以后,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问题:雇佣工人拿到的不是他的劳动所生产的价值总额,而必须把其中的一部分交给资本家,这一情况怎么能和上面的原理相容呢?不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是社会主义者都力图对这个问题作出有科学根据的答复,但都徒劳无功,直到最后才由马克思作出了解答。他的解答如下: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两个社会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一方面是资本家,他们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另一方面是无产者,他们被排除于这种占有之外而仅有一种商品即自己的劳动力可以出卖,因此他们不得不出卖这种劳动力以占有生活资料。但是一个商品的价值是由体现在该商品的生产中、从而也体现在它的再生产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所以,一个平常人一天、一月或一年的劳动力的价值,是由体现在维持这一天、一月或一年的劳动

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量中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假定一个工人一天的生活资料需要6小时的劳动来生产,或者也可以说,它们所包含的劳动相当于6小时的劳动量;在这种场合,一天的劳动力的价值就表现为同样体现6小时劳动的货币量。再假定说,雇用这个工人的资本家付给他这个数目,即付给他劳动力的全部价值。这样,如果工人每天给这个资本家做6小时的工,那他就完全抵偿了资本家的支出,即以6小时的劳动抵偿了6小时的劳动^①。在这种场合,这个资本家当然是什么也没有得到;因此,他对事情有完全不同的想法,他说,我购买这个工人的劳动力不是6个小时,而是一整天,因此他就根据情况让工人劳动8小时、10小时、12小时、14小时或者更多的时间,所以第7、第8和以后各小时的产品就是无酬劳动的产品,直接落到资本家的腰包里。这样,给这个资本家做事的工人,不仅再生产着他那由资本家付酬的劳动力的价值,而且除此之外还生产**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起先被这个资本家所占有,然后按一定的经济规律在整个资本家阶级中进行分配,构成地租、利润、资本积累的基础,总之,即非劳动阶级所消费或积累的一切财富的基础。这样也就证明了,现代资本家,也像奴隶主或剥削徭役劳动的封建主一样,是靠占有他人无酬劳动发财致富的,而所有这些剥削形式彼此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占有这种无酬劳动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这样一来,有产阶级胡说现代社会制度盛行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和谐这一类虚伪的空话,就失去了最后的立足之地,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就像以前的各种社会一样真相大白:它也是微不足道的并且不断缩

^① 在1891年纽约《先驱者。人民历书画刊》上发表时,这里的“劳动”一词改为“报酬”。——编者注

减的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的庞大机构。

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两个重要事实为依据的。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这两个发现以及有关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其他同样重要的科学发现,将得到进一步的阐述,从而政治经济学中那些在第一卷还没有涉及到的方面,也会发生根本变革。愿马克思不久就能把第二卷付印。

弗·恩格斯写于 1877 年 6 月
中

载于 1878 年在不伦瑞克发行的
《人民历书》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5 卷翻译

卡·马克思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¹¹¹

编辑先生：

关于茹柯夫斯基先生一文的作者^①，显然是一个聪明人，假如他在我的关于“原始积累”的论述中只要能找到一个可以用来支持他的结论的地方，他就会加以引证了。因为找不到这样的地方，所以不得不抓住刊载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注释增补材料里面一段针对一个俄国“文学家”^②的批评性插话^③。我在那里对这位作家提出了什么责难呢？这就是：他不是俄国而是在普鲁士的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的书^④里发现了“俄国”共产主义，并且俄国公社在他手中只是用以证明腐朽的旧欧洲必须通过泛斯拉夫主义的胜利才能获得新生的一种论据。我对于这位作家的评价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是无论如何，决不能从这里理解我对“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

① 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编者注

② 亚·伊·赫尔岑。——编者注

③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根据第1卷德文第1版翻译）1987年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版第750、751页。——编者注

④ 哈克斯特豪森《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1847年汉诺威版第1—2册，1852年柏林版第3册。——编者注

Handwritten text in Cyrillic script, appearing to be a letter or document. The text is heavily scribbled and crossed out with multiple lines, making it largely illegible. Some words like "Литература" and "журнал" are faintly visible.

卡·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的第1页

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①的努力的看法等等。

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的跋里，——而这篇跋是关于茹柯夫斯基先生的那篇文章的作者所知道的，因为他曾经引证过——我曾经以应有的高度的尊重谈到“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②。这个人在几篇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他表示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我的可敬的批评家既然可以根据我同那位俄国“文学家”和泛斯拉夫主义者的争论得出我不同意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的结论，那么，他至少也同样有理由根据我对这位“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的尊重断定我同意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

最后，因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

① 尼·康·米海洛夫斯基文章中的这段话，在马克思手稿中引用的是俄文原文。——编者注

②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编者注

二

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因此,这一章叙述了使生产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从而把他们变成雇佣工人(现代意义上的无产者)而把生产资料占有者变成资本家的历史运动。在这一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尤其是那些剥夺大量人手中的传统的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料并把他们突然抛向劳动市场的变革。但是,全部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的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等等(《资本论》法文版第315页^①)。在那一章末尾,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趋势被归结成这样:“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由于自然变化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所有制¹¹²。在这个地方我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理由很简单,这个论断本身只不过是概括地总结了前面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那几章里

^①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1卷翻译)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770页。——编者注

所作的详细阐明。

现在,我的批评家可以把这个历史概述中的哪些东西应用到俄国去呢?只有这些: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事情就是这样。但是这对我的批评家来说是太少了。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让我们举个例子来看看。

在《资本论》里的好几个地方,我都提到古代罗马平民所遭到的命运。这些人本来都是自己耕种自己小块土地的独立经营的自由农民。在罗马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被剥夺了。使他们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料分离的运动,不仅蕴含着大地主的形成,而且还蕴含着大货币资本的形成。于是,有那么一天就一方面出现了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切都被剥夺的自由人,另一方面为了利用他们的劳动,又出现了占有所创造出的全部财富的人。结果怎样呢?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他们比过去美国南部各州的“白种贫民”¹¹³更卑贱,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制的。因此,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

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卡·马克思写于 1877 年 10 月

11 月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 1886 年
日内瓦《民意导报》第 5 期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5 卷翻译

卡·马克思

*致某报编辑部¹¹⁴

1877年12月19日于
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尊敬的编辑部：

附上从布雷斯劳^①寄来的、让我转寄给您们的一封信。我不认识发信人霍罗维茨；但是，他在信中告诉我，他是社会民主党布雷斯劳支部的成员。

致衷心的问候。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1877年12月
19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64年俄文第2
版第34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25卷翻译

① 波兰称作：弗罗茨瓦夫。——编者注

弗·恩格斯

*德国、法国、美国和
俄国的工人运动¹¹⁵

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正在取得令人赞赏的进展。现在那里共有62种社会主义报刊,其中46种是名副其实的报纸,1种是杂志,15种是工会机关刊物。此外,在瑞士用德文出版的有4种报纸和1种杂志;奥地利有3种;匈牙利有1种;美国有6种。用德文出版的社会主义报刊的总数如下:

德 国	—— 62	} = 75
奥 地 利	—— 3	
匈 牙 利	—— 1	
瑞 士	—— 3	
美 国	—— 6	

可见,德文的社会主义的定期出版物以机关刊物来算,比用所有其他文字出版的总和还要多。在上述数字中,我还没有把大学教授们(讲坛社会主义¹¹⁶者)的多少带点社会主义色彩的报纸计算在内,而指的只是公认的党的机关刊物。

在谋刺俾斯麦^①一事发生以后，有一个资产者写信给我说：“整个（资产阶级的）德国都为俾斯麦没有被刺而感到高兴。”我回答他说：“我们对此也感到满意，因为他为我们效劳，好像为此他得到报酬似的。”你们知道，我是对的，因为要是没有迫害和苦难，要是没有军国主义和不断增加的捐税，我们就不会达到这个地步。

虽然法国的危机¹¹⁷只产生了令人很不满意的结果，但是我认为，这个危机造成这样一种形势，即使得法国社会主义者有可能通过报刊、会议和工会来进行活动以及组成工人党，——而这些就是我们在1871年大屠杀以后的今天所能争得的一切。此外，法国取得两大成就，即农民转向共和国方面以及共和国军队的组成，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杜克罗、巴特比及其同伙的政变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士兵坚决拒绝与人民为敌。

在美国，由于铁路干线全体人员的流血的罢工¹¹⁸，工人问题被提上了日程。这是美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因此，美国创立工人党的事业有了大踏步的发展。在这个国家里，事态发展得很快，我们应当注视这种发展进程，才不至于对不久将会出现的某些重大成就感到突然。

我认为，俄国这个国家，在最近的将来会扮演最重要的角色。由于所谓解放农奴而形成的状况，早在战争以前就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这次大改革进行得如此巧妙，使贵族和农民最后都破产了。随后又实行了另一项改革，这一改革借口让省和县在中央政府不加干涉的相对自由的条件下选举行政机关，结果只是增加了本来就不

^① 指1866年5月7日柏林发生的谋刺俾斯麦未遂一事。——编者注

堪忍受的捐税。

由于各省径直负担自己的管理费用，国家的开支就比较少了，但是收的税还是那么多；因此就另设新的捐税来弥补省和地方的开支。后来还实行了普遍义务兵役制，这又等于新设了一项比其他捐税更重的捐税，这也意味着建立一支新的、人数更庞大的军队。

结果，财政崩溃的局面加速到来了。早在战争以前，国家就陷于破产的境地。俄国大金融财团由于广泛参与了1871—1873年时期的骗人的投机勾当，使国家陷于财政危机。这一危机于1874年在维也纳和柏林爆发，并且长期地破坏了俄国的工业和商业。在这种形势下，开始了反对苏丹^①的圣战^②。由于到处借不到外债，而内债又不能满足需要，只好动用银行的数百万款子(准备金)和发行纸币；结果纸币日益贬值，它的比价很快——再过一两年——就会跌到最低点。总的说来，我们已经看到了俄国的1789年的种种因素，在这以后必然会有1793年。不论战争的结局如何，俄国革命已经成熟了，并且很快就会爆发，也可能就在今年爆发。同巴枯宁的预言相反，革命将先从上层，从宫廷，从没落的和frondeuse [因不满而反抗的] 贵族中间开始。但是革命一爆发，就会吸引农民参加。那时你就会看到连1793年也要为之逊色的场面。只要俄国一发生革命，整个欧洲的面貌就要改变。因为迄今为止，旧俄国一直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庞大后备军；它在1798年、1805年、1815年、1830年和1848年都起过这样的作用。这支后备军一旦被消灭，且看事

① 某些伊斯兰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编者注

② 指1877—1878年俄土战争。——编者注

情将如何演变!

弗·恩格斯写于 1878 年 1 月
12 日

载于 1878 年 1 月 22 日《平民
报》第 3 号

原文是意大利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5 卷翻译

卡·马克思

*论东方问题¹¹⁹

1878年2月4日

……我们最坚决地站在土耳其人方面，理由有两个：

(1)因为我们研究了土耳其农民——也就是研究了土耳其的人民群众——并从而认识到他们无疑是欧洲农民的最能干和最有道德的代表之一。

(2)因为俄国人的失败会大大加速俄国的社会变革(变革的因素大量存在),从而会大大加速整个欧洲的剧变。

情况的发展不是这样。为什么?由于英国和奥地利的叛卖。

英国——我指的是英国政府——比如说，在塞尔维亚人被击溃时救了他们；它以欺骗手段使土耳其人暂停军事行动，因为他们误以为俄国人(通过英国)建议停战，而停战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暂停军事行动。只是由于这样，俄国人才能取得最近一些突然胜利。否则他们的军队会大量饿死和冻死：只是由于开辟了通往鲁米利亚——那里可以获得(即夺取)储备品，而且气候较温和——的道路，本来把士兵充塞在保加利亚的俄国人才得以逃出这个陷阱，蜂拥南进。迪斯累里在自己的内阁中，被伊格纳季耶夫的密友、俄国

奸细索尔兹伯里侯爵，common place的大科夫塔（套话连篇的大祭司）¹²⁰德比伯爵和如今已引退的克纳文伯爵捆住了（现在还捆着）手脚。¹²¹

奥地利阻挠土耳其人获得他们在黑山的胜利果实等等。

最后——这是他们最后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土耳其人在君士坦丁堡没有及时进行革命；因此，旧塞拉尔制度的化身——苏丹①的内兄马茂德—达马德、这场战争的真正操纵者，全然没有变动，好像俄国内阁直接指挥打了一场反对自己的战争。这家伙一步步地使土耳其军队处于瘫痪状态和陷入窘境，这一点连细枝末节都可以得到证明。其实这在君士坦丁堡是众所周知的，这也就加重了土耳其人的历史过失。在这样的极其严重的危机时刻不能奋起革命的人民，是无可救药的。俄国政府懂得，达马德对它有什么价值；为了使米德哈特帕沙远离君士坦丁堡和让达马德继续执政，它比夺取普列夫纳施展了更多的战略和策略。

当然，为俄国的胜利在暗中帮忙的是——俾斯麦。他建立了三帝同盟¹²²，从而约束了奥地利。即使在普列夫纳陷落之后，奥地利只要陈兵十万，俄国人就不得不乖乖地撤兵或满足于极其微小的战果。奥地利的退出立即使亲俄派②在英国占了上风，因为对于英国来说，法国（由于当时的首相格莱斯顿先生促成的色当会战¹²³之后的灾祸）已不再是大陆上的军事强国了。

结果无非就是奥地利的解体，如果俄国的媾和条件被接受，从而使土耳其（至少在欧洲）今后仅仅在形式上存在的话，这一解体是必

① 阿卜杜尔·哈密德二世。——编者注

② 这里特指以威·格莱斯顿为首的自由党人。——编者注

不可免的。土耳其原是奥地利抵挡俄国及其斯拉夫仆从的堤坝。因此,在适当时机人家恐怕会首先要求得到“波希米亚”。

但是,普鲁士作为普鲁士——即就其作为德意志的独特的对立面而言——还有其他的利益:这个意义上的普鲁士是指它的王朝;它是在俄国的“卵翼”下而形成现在这种状态的。俄国的失败,俄国的革命将会是普鲁士的丧钟。

否则,在普鲁士对法国取得巨大胜利并成为欧洲的头号军事强国之后,冯·俾斯麦先生本人大概也不会让普鲁士在俄国面前再一次处于像 1815 年那样的地位,那时它在欧洲国家中是无足轻重的。¹²⁴

最后,对于俾斯麦、毛奇等等这些大人物来说,现在开始的一连串欧洲战争可望突出他们个人的重要性,……这也决不是无关紧要的。

十分明显,普鲁士到时候必将要求“补偿”,因为俄国的胜利全是靠着它才取得的。从俄国人对待罗马尼亚政府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是罗马尼亚政府在俄国的补充部队到达之前在普列夫纳城下救了那些俄国人¹²⁵。现在,卡尔·冯·霍亨索伦必须把俄国人在克里木战争³³之后割让的比萨拉比亚部分领土归还他们,以表示感谢。柏林不会轻易同意这样做,这一点彼得堡是知道的,并且甘愿付给慷慨的补偿。

但是这整个历史还有其他方面。土耳其和奥地利是 1815 年重新修补起来的欧洲国家旧秩序的最后支柱,随着它们的灭亡,这种旧秩序将彻底崩溃。将要在一连串战争(起初是“区域性的”,最后是“全面的”)中出现的这种崩溃,会加速所有这些炫耀武力、外强中干的国家的社会危机并从而加速他们的灭亡。

1878年2月11日

俄国人做了一件好事：他们炸毁了英国的“伟大的自由党”，使它长时间失去执政能力；而托利党则通过卖国贼德比和索尔兹伯里（后者是内阁中真正的俄国的驱动轮）以官方的形式竭力自己杀死自己。

由于1848年开始的腐败时期，英国工人阶级渐渐地、越来越深地陷入精神堕落，最后，简直成了伟大的自由党即他们自己的奴役者——资本家的尾巴。英国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完全落入了卖身投靠的工联首领和职业鼓动家手中。这帮家伙跟在格莱斯顿、布莱特、蒙德拉、莫利之流以及工厂主恶棍等等的后面，为了各族人民的解放者——沙皇的更大荣誉而大喊大叫，可是自己的兄弟被南威尔士矿主逼得快要饿死了¹²⁶，他们却无动于衷。卑鄙的家伙！他们把事情给做绝了，在下院最近投票时（2月7日和8日，“伟大的自由党”的大多数显要——福斯特、娄、哈科特、戈申、哈廷顿，甚至[2月7日]伟大的约翰·布莱特本人——为了避免表决使自己过分丢脸，在投票时丢下自己的队伍不管而逃之夭夭）¹²⁷，下院中仅有的工人议员，而且说来可怕，是直接代表矿工的议员，而且本人就是血统矿工的伯特和卑贱的麦克唐奈，竟然同崇拜沙皇^①的“伟大的自由党”喽啰一致投票！

但是，迅速展示出来的俄国人的计划立即驱散了魔力，破坏了“机械的鼓动”（一张张五英镑钞票就是这种机械的主要推动力）；在这种时候，莫特斯赫德、豪威耳、约翰·黑尔斯、希普顿、奥斯本之流

①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以及所有这些坏蛋要是敢在任何一个公开的工人大会上讲话,就会有“生命危险”;甚至他们的“凭票入场的非公开的会议”也会被人民群众用暴力冲垮和驱散。

但是迟钝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觉醒得太晚了,至少从当前的事件来看是如此……

俄国的外交远不是支持“基督教”对“新月”的荒谬的憎恶。它认为,土耳其虽然在欧洲已被压缩到君士坦丁堡和鲁米利亚的小部分地区,但是在小亚细亚,阿拉伯等地却有巩固的后方,因而应该通过攻守同盟使之受制于俄国。

在最近这次战争中,12万波兰人在俄国军队中起了很大作用;现在除波兰人外还要加上土耳其人,于是欧洲的两个最骁勇的、必定向欧洲报仇雪耻的民族,就都将站到**俄国的旗帜**下,——主意倒不错!

1829年普鲁士的做法正好和现在一样,但当时它充其量还只是欧洲最大的一个小国,而且自认是俄国的保护国。

吉比奇使俄军在越过巴尔干山脉(1829年7月)之后陷入了绝境,对此**毛奇**作了很好的描述。^①当时只有靠外交手段才能解救它。

第二个战役的结局几乎和第一个战役同样糟糕¹²⁸,此后会是 *finis Russiae* ——俄国的末日。因此沙皇**尼古拉**以参加**普鲁士亲王威廉**(当今的德国皇帝)的婚礼为名,于1829年6月10日来到柏林。他请求**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戴着胜利者花冠”¹²⁹的人)对土耳其政府施加影响,向他派出全权代表,以便开始议和。这时吉比奇还

① 参看毛奇《1828—1829年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俄土战争》1845年柏林版。——编者注

没有越过巴尔干山脉，他的大部分军队被阻截在锡利斯特里亚城下和舒姆拉^①附近。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按照同尼古拉的协议，正式派遣**缪弗林**男爵为特命公使前往君士坦丁堡；但要他在那里作为俄国的代理人进行活动。缪弗林简直是个俄国人，正像他本人在《我的一生》这本书中所说的那样；1827年他拟定了俄国人的进军计划，他极力主张吉比奇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越过巴尔干山脉，而他自己则以调停人的身份在君士坦丁堡进行阴谋活动；他自己说，被这次进军吓坏了的苏丹^②将会求助于“他这位朋友”。

在保障欧洲和平的幌子下，他成功地使法国和英国就范；特别是对于后者，他的办法是通过英国公使、亲俄的罗伯特·戈登对他的哥哥**阿伯丁伯爵**施加影响，又通过阿伯丁对**威灵顿**施加影响，威灵顿后来对此懊悔万分。

吉比奇越过巴尔干山脉之后，于7月25日（1829年）满意地收到路西德帕沙关于开始和谈的书面邀请。同一天，缪弗林同雷伊斯埃芬蒂（土耳其外交大臣）^③举行了首次会谈，他以（罗伊斯亲王^④般的）激烈的言词恐吓对方；其间他还提到了戈登等等。在普鲁士公使（在英国公使戈登和法国公使吉埃米诺支持下，他们两个已被缪弗林说服）的压力之下，苏丹接受了下列五项媾和条件：（1）奥斯曼帝国的完整；（2）保留土耳其政府和俄国之间原有的条约；（3）土耳其政府参加法国、英国和俄国之间（1827年7月6日签订的）有关调整希腊事

① 保加利亚称作：锡利斯特里亚和舒门（现在称作：科拉罗夫格勒）。——编者注

② 马茂德二世。——编者注

③ 括号内的说明大概是威·李卜克内西加的。——编者注

④ 亨利希第七。——编者注

务的伦敦公约¹³⁰；(4)切实保证黑海航行自由；(5)土耳其和俄国代办进一步会谈有关双方赔偿的要求及其他一切要求。

8月28日，两名土耳其全权代表，萨迪克埃芬蒂^①和阿卜杜尔·卡迪尔贝伊，在居斯特尔(普鲁士驻君士坦丁堡公使馆武官)陪同下到达阿德里安堡^②，俄国总司令部设在这里大约有一个星期了。9月1日，俄国全权代表(阿列克谢·奥尔洛夫和帕连)刚刚到达布尔加斯，吉比奇没等他们到来便开始了谈判。

但是在谈判期间，吉比奇一直把自己的军队向君士坦丁堡推进。他(不顾自己的困境，或者说得确切些，是由于这种困境)骄横无耻地要求土耳其全权代表在一周的期限内同意下列几点：

布勒伊拉、久尔杰沃^③和卡拉法特的要塞应当拆毁，这些地方本身划归瓦拉几亚。把黑海沿岸的阿纳帕和波季与阿哈尔齐赫帕沙辖区割让给俄国；70万“布尔斯”^④(约12 000万法郎)的战争赔款，缴纳赔款的保证是，将锡利斯特里亚和多瑙河两公国交给俄国人作抵押。给俄国商人大约1 500万法郎的赔款以补偿他们的损失，赔款应分三期交付，每付款一次，俄国军队就后撤一步，先撤到巴尔干山麓，然后撤到这个山脉以北，最后撤到多瑙河彼岸。

土耳其政府对这些条件提出抗议，这些条件同沙皇^⑤关于不提过分要求的保证显然是矛盾的。新任普鲁士公使鲁瓦耶(缪弗林，这位“土耳其政府的朋友”和和平天使，干完自己的刽子手勾当以后，于

① 穆罕默德-萨迪克埃芬蒂。——编者注

② 土耳其称作：埃迪尔内。——编者注

③ 罗马尼亚称作：久尔久。——编者注

④ 当时土耳其一种货币的名称。——编者注

⑤ 尼古拉一世。——编者注

9月5日溜走),和受缪弗林欺骗的吉埃米诺将军以及罗伯特·戈登爵士一道支持土耳其政府的抗议,因为这种蛮横态度违背了约定,这甚至使得“戴着胜利者花冠的人”也感到走得太远了。吉比奇知道,他在军事方面处境困难,于是作了虚假的让步:同意从正式和约中收回关于战争赔款数额的条款;缩减赔偿俄国商人的第一期付款额,因为正像土耳其代表声称的,“最无知的人也知道,土耳其政府无力支付”。和约终于在9月5日签订。¹³¹

欧洲大为轰动,英国非常愤慨;威灵顿大发雷霆;连阿伯丁也在一封紧急电报中指出,和约的每一项条款都包藏着危险,因而力图缔结一项普遍盟约,由所有大国(包括俄国在内)保证东方的和平。奥地利表示赞成;但普鲁士破坏了这个计划,拯救了俄国,使它摆脱了召开欧洲会议对它可能造成的危险。(当时,法国由于查理十世准备实行政变,打算同俄国秘密达成一致;还签订了一项秘密条约,规定法国应该取得莱茵河各省。^①)

这种情况使涅谢尔罗德感到可以放手地干;他给英国大臣们发了一封蛮横无礼和口吻轻蔑的电报,也就是发往伦敦给利文伯爵(俄国公使)的那封电报。

这就是普鲁士当时的所作所为,而如今它又以更大的规模重复了同样的做法。这班霍亨索伦真是好样的霍亨施陶芬!俾斯麦在处理奥地利和法国事务时^②毫不费力地表现了国务才略;反对奥地利时他有波拿巴的保护和意大利人,而在反对法国时他有整个欧洲的支持。此外,他所追求的目的是由形势提出并做好了准备的。

① 马克思《福格特先生》“八:达-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编者注

② 指1866年普奥战争和1870—1871年普法战争。——编者注

现在形势复杂化了,才能也就到了尽头。

卡·马克思大约写于 1878 年
1 月 25 日—2 月 11 日

发表于 1878 年《论东方问题或
欧洲是否应该是哥萨克的?》莱
比锡增补第 2 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5 卷翻译

弗·恩格斯
1877 年的欧洲工人¹³²

弗·恩格斯写于 1878 年 2 月
中—3 月中

载于 1878 年 3 月 3、10、17、24
和 31 日《劳动旗帜》第 43、44、
45、46 和 47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5 卷翻译

THE LABOR STANDARD.

Devoted to the Organization and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People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es must be achieved by the Working Classes themselves.

Vol. III. No. 12.

NEW YORK, SUNDAY, MARCH 3rd. 1878.

Price 3 Cents

过去的一年对欧洲工人阶级说来,是充满事件的一年,也是大有收获的一年。几乎所有的国家在组织和扩大工人政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展。曾经为一个虽小但很活跃的宗派¹³³所威胁的团结,实际上已经得到恢复。工人阶级运动愈益在日常政治生活中争得显著地位,而且各种政治事件,变来变去,结果都总是这样或那样地有利于这个运动的发展,这是胜利临近的可信征兆。

1877年一开始,就迎来了一次胜利,这次胜利是工人曾经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之一。1月10日,根据普选制举行了三年一次的德国议会(帝国国会)选举;这种选举从1867年起就使德国工人党有机会统计自己的力量,向世界显示它的组织得很好而且不断壮大的队伍。1874年,工人候选人获得了40万票;1877年获得了60多万票。10名工人候选人在1月10日当选,还有24人在两周后举行的补选中候选。在这24人中,实际当选的只有几个人,因为所有其他的政党都联合起来反对他们。但是,无可否认的重要事实是:在帝国的一

切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工人阶级运动已经大踏步前进，1880 年下次选举时，所有这些选区肯定都会转到工人阶级手中¹³⁴。柏林、德累斯顿、在萨克森境内的所有工厂区以及索林根都已争夺到手。在汉堡、布雷斯劳、纽伦堡、莱比锡、不伦瑞克，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在威斯特伐利亚和下莱茵的工厂区，所有其他政党结成了联盟才勉强以微弱多数击败工人阶级候选人。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已经是一支力量，而且是一支迅速发展的力量，对于这支力量，国内其他一切力量，无论是执政的或非执政的，此后都不得不予以重视。这次选举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资产阶级大为惊慌失措，尤其是因为他们的报刊过去一直把社会民主主义描写得越来越势单力薄，无足轻重。工人阶级为自己本身的胜利所鼓舞，更加振奋地在所能涉足的每一个战场上继续战斗；而其他国家的工人，正如我们就要谈到的，不仅把德国人的胜利当作自己本身的胜利来庆祝，而且在这一胜利的鼓舞下，也为了在争取劳动解放的竞赛中不致落后而作出许多新的努力。

德国工人党的迅速进步，是它的最积极的参加者付出重大牺牲才赢得的。政府的迫害、罚款，更经常的是监禁，纷纷落到他们身上，而他们也早就不得不做好在狱中度过大半生的精神准备。虽然判刑多半是短期的，从两三个星期到三个月不等，但是，长期的监禁也决不是罕见的事。例如，为了保护萨尔布吕肯的重要工矿区免受社会民主主义毒素的传染，不久前对两位敢于涉足这一禁区的鼓动家各判处两年半徒刑。帝国的具有伸缩性的法律，为采取这样的措施提供许多借口，而在这些法律还嫌不足的地方，法官多半都很愿意把它们加以引申，直到可据以定罪为止。

德国运动的一大优点，就是工会组织同政治组织携手并肩地工

作。工会组织产生的直接利益,吸引着许多本来不关心政治的人参加政治运动;同时,政治行动的一致性把本来相互隔绝的工会团结起来,保证它们相互支援。

我们的德国朋友在德国议会选举中取得的成功,使他们鼓起勇气也到其他的选举中去试一试。结果,他们在帝国的两个较小的邦的议会选举时使工人当选了,他们还进入了相当多的市议会;在萨克森的工厂区,许多市镇都是由社会民主主义的市议会来管理。由于在此类选举中选举权是受到限制的,也就不能指望获得巨大的成就;但是,每争取到一个席位,都有助于向政府和资产阶级证明,它们今后必须重视工人。

然而,有觉悟的工人阶级组织迅速发展的最好证明,就是它的定期报刊的数量不断增加。我们在这方面,也应当跨出俾斯麦“帝国”的疆界,因为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和活动决不仅限于此疆界之内。到1877年12月31日,用德文出版的为工人党服务的定期报刊,总共不下75种。其中在德意志帝国出版的有62种(包括15个工会的15种报刊),在瑞士有3种,在奥地利有3种,在匈牙利有1种,在美国有6种;共75种,比用所有其他各种文字出版的工人报刊加在一起还要多。

1870年9月,色当战役¹²³以后,德国工人党执行委员会对自己的选民说,战争的结果使欧洲工人阶级运动的重心由法国转移到了德国,德国工人因此被赋予更崇高的使命和新的责任,这就要求他们作出新的努力。1877年证明了这是正确的,同时也证明了,德国无产阶级完全能够胜任落到他们肩上的临时领导的任务。无论某些领袖犯了什么错误(错误既多又各不相同),群众自己仍然坚决地、毫不动摇地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他们的品格、组织性和纪律性同德国

历次资产阶级运动表现得十分突出的软弱无力、犹豫不决、奴颜婢膝和畏缩不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德国资产阶级堕落到奴相十足地逢迎“胜利者威廉”、捆起手足降服于独夫俾斯麦的淫威¹³⁵,从而结束了自己的前程,而工人阶级却从胜利走向胜利,甚至政府和资产阶级为了镇压他们而想出来的措施,反倒促使他们前进和壮大了。

二

德国选举在国内的影响是巨大的,然而,它在国外的影响还要大得多。首先,它的影响使欧洲工人阶级运动恢复了六年来为一个虽小但极活跃的宗派的狂妄企图所破坏的团结。

我们的读者,凡注意国际工人协会历史的都会记得,巴黎公社失败以后,紧接着就在伟大的工人组织内部发生了分歧,这些分歧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上引起了公开的分裂,随后导致了解体。分歧是俄国人巴枯宁和他的追随者造成的,他们不择手段,妄图在一个他们只占区区少数的组织中占据统治地位。他们的主要法宝就是根本反对工人阶级进行任何政治活动;他们在这方面走得如此之远,以致在他们眼里,参加选举就是背叛无产阶级的利益。除了直接的暴力革命以外,他们不容许任何其他的行动方法。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这样称呼自己)首先在瑞士生了根,以后便扩展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在那里,他们曾一度真的控制了工人阶级运动。在“国际”内部,他们得到了比利时人的某种支持,比利时人也宣布主张不参与政治活动,虽然是出于别的动机。分裂以后,巴枯宁派保持了一个虚有其表的组织,而且还举行了几次代表大会,在这几次代表大会上,老是那同样的二十几个妄图代表整个欧洲工人阶级的人,以欧洲工人阶级的名义宣布自己的信条。但是,1874年的德国选举,以及德国运动由于它的最积极的成员有九人参加国会而得到的巨大利益,就

已经在“无政府主义者”中间投下了怀疑的因素。政治事件使西班牙的运动被镇压下去了,消失了,连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在瑞士,主张政治斗争并同德国人携手一起工作的那一派日益壮大,并且很快就在数量上超过了一小撮无政府主义者,比例是 300:1。在意大利,进行了一次“社会革命”的幼稚尝试¹³⁶(1874 年在博洛尼亚),“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一行动中无论是在智谋方面或勇敢方面,都表现得不好。在此以后,真正的工人阶级分子开始寻求更合理的斗争方法。在比利时,领导者采取的不参与政治活动的政策使工人阶级失去了实际斗争的舞台,因而运动已完全陷于停顿。实际上,当德国人的政治活动使他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时候,在那些以不参与政治活动为当前口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却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直到最后对没有任何结果的运动厌烦起来;他们的组织被遗忘了,他们的报刊一个个地消失了。这些工人当中比较有头脑的那部分人不可能不被这一对比所打动。不论在比利时或意大利,都爆发了对那种“无政府主义”的和不参与政治活动的教条的反抗,人们开始自问和互问,凭什么为了一种愚蠢的教条主义的缘故而不许他们采用那些恰恰已被证明是最有效的斗争手段?这就是当德国人在选举中取得的巨大胜利使一切疑问得到解决、一切踌躇得到克服时候的形势。这种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不可抵挡的。意大利和比利时都宣布赞成政治活动了。剩下的那些意大利的不参与派,在绝望之余企图在那不勒斯附近再举行一次起义;大约 30 个无政府主义者宣布了“社会革命”,但是警察很快就来照管他们了¹³⁷。他们所得到的,不过是他们自己在意大利搞的宗派运动完全破产而已。于是,妄图控制全欧洲范围内的工人阶级运动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又只剩下了它原来的那个核心,就是瑞士汝拉山区的二百来人,在那里的与世隔绝的山区隐蔽所里,

继续反对世界上其余地方取得了胜利的异端邪说,坚持他们今已亡故的皇帝巴枯宁所建树的真正正统信仰。去年9月在比利时的根特召开世界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¹³⁸(这次大会是他们自己召集的),他们面对着欧洲团结一致的工人阶级各大组织的代表,在会上成了微不足道的少数。这次大会坚决拒绝了他们的可笑的教条和狂妄的要求,并认定大会所拒绝的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宗派,但最后还是对他们采取了宽容的态度。

这样经过了一场历时四年的内部斗争以后,欧洲工人阶级的行动恢复了完全的协调一致,国际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所宣布的政策,已完全被桩桩事件证明是正确的。现在又重新找到了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欧洲各国工人又可以一起坚决行动,相互支援了,这种相互支援就是运动的主要力量。国际工人协会已经不可能存在下去[……]^①他们禁止这些国家的工人参加这类国际的联盟。政府也许可以免去这一切麻烦了。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水平,已经使任何这类形式上的联盟变得不仅是不必要的甚至也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组织不仅完全实现了自己的任务,而且它本身仍然继续存在着,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强有力,它的存在体现于远为更加强大的团结一致的联盟之中,体现于如今鼓舞着全欧洲工人阶级的那种行动上和政策上的一致性之中,这种一致性肯定无疑就是它本身的功绩,也是它的最伟大的功绩。在不同国家的工人当中,甚至在单独一个国家的工人当中,都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观点;但是,再也没有宗派了,再也没有人标榜教条主义的正统性和教条的至高无上了,只有共同的行动计划,这个行动计划最初由国际所草创而

^① 《劳动旗帜》周刊上此处脱漏一两行。——编者注

现在已被普遍采用,因为在每个地方它都是从运动的实际斗争中自觉地或自发地产生的;这个计划既能灵活地适应每个国家和每个地方的各种不同的条件,又能在任何地方都同样保持自己的基本特点,从而保证目标的统一,保证为达到工人阶级自己解放自己这一共同目标而采取的方法的总的一致。

三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已经谈到了同意大利、西班牙、瑞士、比利时的工人运动史有关的值得注意的主要事实。但是还需要再谈一点。

西班牙在 1868 年和 1872 年间,运动扩展得很迅速,当时国际以在那里有 3 万名以上交纳会费的会员而自豪。但是,这一切多半是表面现象,而不是实际情况;多半是国内政局不稳所引起的一时情绪激昂的结果,而不是觉悟真正提高的结果。西班牙国际卷入了 1873 年自治州起义(联邦共和起义)¹³⁹,同起义一起被镇压了。有一个时期,它以秘密团体的形式继续存在,这个团体的核心无疑一直保存到今天。但是,由于这个团体除了派过三名代表出席根特代表大会以外,从来没有显示出丝毫生机,我们也就不能不得出结论说,这三个人代表西班牙工人阶级,就如同从前三个土利街的裁缝代表英国人民一样¹⁴⁰。而我们可以有把握地预言,一旦某种政治上的震荡使西班牙的工人有了重新起积极作用的可能,那么重新开始行动的不会是这些“无政府主义的”空谈家,而是那个由 1872 年时忠于国际、现在等待时机而不搞密谋的有觉悟有毅力的工人组成的小组¹⁴¹。

在葡萄牙,运动始终没有受“无政府主义”的传染,并且同大多数其他国家一样,在合理的基础上发展。葡萄牙工人有为数众多的国

际支部和工会。他们在1877年1月^①举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代表大会¹⁴²，并且办有一份出色的周报《抗议报》。然而，他们也受到那些限制新闻出版自由、结社和公开集会权利的敌对性法律的束缚。尽管如此，他们还在继续斗争，并且现在正在波尔图举行另一次代表大会，他们将能够借这次会议的机会向世界表明，葡萄牙的工人阶级在伟大的全世界争取劳动解放的斗争中占有其应有的位置。

意大利工人的活动也大大受到资产阶级立法的阻碍。借口镇压盗匪活动和分布广泛的秘密盗匪组织而制定的一系列特别法律，赋予政府以极大的任意行事的权力，这些法律被肆无忌惮地用来对付工人协会；协会中较有声望的成员同匪徒一样地受到警察的监视，不经法庭或陪审团审判就被放逐。然而，运动在前进，它的生命力的最好标志，就是它的重心从罗马涅一些受人景仰的但死气沉沉的城市转移到北方生气勃勃的工业城市和制造业城市，这个转变保证了真正的工人阶级分子对一帮混入运动的、过去曾掌握领导权的资产阶级出身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优势。工人俱乐部和工会总是被政府查封和解散，但总是又以新的名称重新组成。无产阶级报刊虽然其中有许多因编辑们受到迫害、罚款和判刑而办不长久，但在每次失败后都又重新一跃而起，而且尽管有种种障碍，还是有一些报纸办得比较久。其中有几个刊物，多半是寿命短暂的，还在宣传“无政府主义”教条，但是这个派别已经放弃了任何控制运动的妄想，并且正在同马志尼的共和派或者说资产阶级共和派¹⁴³一起逐渐地消失。而这两个派别失去的每一寸阵地，都是真正的和自觉的工人阶级运动所赢得

① 第一次葡萄牙工人代表大会是在1877年2月1—4日举行的。——编者注

的每一寸阵地。

在比利时,工人阶级活动的重心也转移了,结果活动本身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875年以前,这个重心是在国内讲法语的地区,其中包括一半讲法语、一半讲佛拉芒语的布鲁塞尔。在这期间,运动受到蒲鲁东学说的强烈影响,这种学说也要人们不参与政治,特别是不参加选举。因此,只举行一些通常都为军队的血腥干预所镇压的罢工,以及总是重复老一套的空话的群众大会。工人对此感到厌烦,于是整个运动就渐渐停息了。但是,从1875年起,国内佛拉芒语地区的工厂城市就以较大的热情参加了斗争,而且像后来很快就证明的那样,是以新的精神参加斗争的。在比利时,没有任何限制妇女或儿童劳动时间的工厂法,因而根特及其附近地区的工厂选民的第一个呼声,就是要求保护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他们的妻子和孩子被迫像奴隶一样每天在棉纺厂劳动15小时以上。蒲鲁东主义空论家反对提出这种要求,因为他们认为这类小事情很不值得忙于虚无缥缈的革命主义的人去注意,但他们的反对没有奏效,并且逐渐被克服了。要求在法律上保护工厂童工成了比利时工人阶级纲领中的一项,迄今压制着政治活动的那套符咒也就随之而失灵。此外就是德国人的榜样发挥了作用,现在比利时的工人,同德国、瑞士、丹麦、葡萄牙、匈牙利、奥地利以及意大利部分地区的工人一样,正在组成一个迥异于并且对立其他一切政党的政党,决心用符合形势需要的任何政治行动谋求自己的解放。

瑞士的大部分工人,即讲德语的那部分,几年前联合成为“工人联合会”,这个组织到1876年年底拥有5000多名交纳会费的会员。除此以外,还有另一个组织,即“格留特利联盟”¹⁴⁴,它最初是资产阶级激进派为了向工农传播激进主义而建立的;但是,社会民主主义思

想逐渐深入到这个分布很广的组织,最后征服了它。1877年,这两个组织联合了起来,这种联合几乎等于合并,目的是组织一个瑞士的工人政党;他们蓬勃有力地行动起来,结果新的瑞士工厂法在全民投票中通过了,这是所有现行的工厂法中对工人最为有利的一个。现在他们正在组织密切的监督,以保证它在厂主们的恶意叫嚣声中仍能真正地贯彻执行。“无政府主义者”从他们的革命优越感出发,理所当然地疯狂地反对这全部活动,斥之为对他们所谓的“革命”彻头彻尾的背叛。但是,他们充其量不过二百来人,而且在这里和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军队的司令部,所以,他们出来反对也就起不了什么作用。——瑞士工人党的纲领几乎同德国的一模一样,甚至是太一样了,连后者的某些不太完善和比较糊涂的地方也吸收了进去。但是,只要在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精神是正确的,仅仅是纲领的措辞问题,那就无关紧要了。

丹麦工人登上斗争舞台大约是在1870年,起初很快就取得了成就。他们同小自耕农的政党结成同盟,在小自耕农中间顺利地传播自己的观点,取得了相当大的政治影响,结果使以这个农民政党为核心的“联合左派”在议会中保持了好几年的多数。但是,运动的这种迅速发展,多半是表面的,而不是实实在在的。有一天,竟发现有两个领导人把向工人募集的党的经费挥霍一空之后失踪了。这件事出丑到了极点,使丹麦的运动至今没有从由此而造成的沮丧情绪中恢复过来。不管怎样,虽然丹麦工人党现在的行动不像过去那样风头十足,但是有一切理由认为,它正在逐步以更实际更持久的影响,代替它现已失去的对群众的短暂的表面化控制。

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工人阶级要同极大的困难作斗争。在那里,政治自由,就新闻出版、集会和结社这些方面而论,降到了同虚伪的

君主立宪制相应的最低水平。法典具有闻所未闻的伸缩性,这使得政府对哪怕是最温和地表达工人阶级要求和利益的行为也能定罪。然而运动在那里也和别的地方一样,正在不可遏制地发展着。主要的中心是波希米亚的工厂区、维也纳和佩斯。^①工人的定期出版物用德文、波希米亚文和匈牙利文出版。运动从匈牙利扩展到塞尔维亚,战前这里出版了一份塞尔维亚文的周报^②,不过战争一爆发该报就干脆被查禁了。

可见,在欧洲各地,不论我们朝哪里看去,工人阶级运动都在前进,不但顺利而且迅速,更重要的是,处处的精神都是同样的。完全的协调一致恢复了,各国工人之间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的经常的和定期的联系也随之而恢复。1864年创建国际工人协会的人们,在那先反对外部敌人、后又反对内部敌人的斗争年代里,一直高举着国际的旗帜,直到它与其说由于内部纷争不如说出于政治必要性而实行解体 and 表面上退却时为止。现在这些人可以骄傲地高呼:“国际已经完成自己的任务;它已完全达到自己的伟大目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在反对其压迫者的斗争中联合起来了。”

① 波希米亚是捷克的旧称;佩斯是布达佩斯市多瑙河左岸地区。——编者注

② 指民主派报纸《民意报》。——编者注

四

我们的读者想必已经注意到,前三篇文章几乎没有提到欧洲最重要的国家之一——法国,其理由是:在前面谈到过的国家中,工人阶级的活动(虽然它实质上是政治活动),同一般政治,即所谓官方政治并没有密切的联系。德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的工人阶级还没有成为国家的一支政治力量。它只是一支未来的政治力量。如果说其中某些国家政坛上的党派——保守党、自由党或激进派不得不重视它,这只是因为从它的迅速发展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无产阶级政党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变得相当的强大,足以使人感觉到它的影响。但是,法国的情况不同。得到外省大城市工人支持的巴黎工人,自大革命以来就一直是国家的一支力量。差不多九十年来,他们始终是进步的战斗大军。在法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大危机中,他们总是走上街头,用一切办法把自己武装起来,筑起街垒,向敌人挑战。他们的胜利或失败都决定着法国以后多少年的命运。从 1789 年到 1830 年,历次的资产阶级革命都是靠巴黎工人去冲锋陷阵的。是他们在 1848 年争得了共和国。他们曾误以为这个共和国意味着劳动的解放,可是当年 6 月惨痛的失败就使他们醒悟了过来。他们在街垒中反抗路易-拿破仑 1851 年的政变,结果再次失败。1870 年 9 月,他们铲除了资产阶级激进派连碰也不敢碰的没落帝国。1871 年 3 月,梯也尔企图夺去他们曾用来保卫巴黎免受外国进犯的武器,使得他们被迫

进行巴黎公社革命和那场拖延了时日并以公社消失于血泊中告结束的斗争。

可见,这个民族的工人阶级将近一个世纪以来,不仅在本国历史上每次危机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还一直是欧洲革命的先锋。这样的工人阶级不能过那种仍然是大陆上其余工人正常行为规范的比较闭关自守的生活。像法国的这种工人阶级,是同它过去的历史联系着的,而且是由它过去的历史所决定的。它的历史,以及它那得到公认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战斗力,使得它同国家一般政治的发展密不可分。因此,不谈法国的一般政治,我们便无法回顾法国工人阶级的活动。

不论法国工人阶级进行它本身的斗争,还是进行资产阶级自由派、激进派或共和派的斗争,在它每遭受一次失败以后,随之而来的总是沉重的政治上的反动,既猖狂又长久。比如,在1848年6月和1851年12月的失败以后,接着就是波拿巴帝国的18年统治,在此期间,新闻出版受到压制,集会和结社的权利被取消,工人阶级从而被剥夺了互相联系和组织起来的一切手段。必然的结果是:当1870年9月革命^①到来的时候,工人们推举不出任何别人来担任公职,只能推举那些在帝国时期曾是政坛上的议会反对派的资产阶级激进派,而这些人当然把他们和他们的国家都出卖了。在公社被镇压之后,对失去战斗力好多年的工人阶级来说,眼前要事只有一件,那就是避免让这样的长期高压统治再次出现,从而避免不得不再去做下面这样的事,即并不是为了本身的直接解放,而仅仅是为了争得一个

^① 指1870年拿破仑第三于9月2日在色当向普鲁士投降后,资产阶级共和派于9月4日在工人群众压力下宣布成立共和国。——编者注

能让他们为最终的解放斗争进行准备的环境去战斗。现在法国有四大政治党派：三个保皇派——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¹⁴⁵，各有一个王位僭望者，——和一个共和派。不管三个王位僭望者当中哪一个登上王位，他肯定只能得到人民中间区区少数的支持，因而他就只能依靠武力。因此，任何君主制复辟必然会带来暴力的统治、对各种社会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压制，而这正是工人阶级应当力求避免的。另一方面，保存现有的共和政府，至少使工人阶级还有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这一定程度的自由使他们能够创办工人报刊，通过集会进行鼓动和组织独立的政党。此外，保存了共和国，工人阶级就不必专门为以后重新争得共和国而战斗了。

因此，另一个证明法国工人阶级具有高度的、本能的政治觉悟的事实就是：当去年 5 月 16 日所有这三个保皇派联合起来进行大阴谋，向共和国宣战的时候，工人们万众一心，立即宣布支持共和国是他们主要的和直接的任务¹¹⁷。毫无疑问，他们这样做是充当了资产阶级共和派和激进派的尾巴。但是，既没有报刊又不能举行集会、既没有俱乐部又没有政治社团的工人阶级，如果不做激进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又能怎样呢？为了争取自己的政治独立，工人阶级如果不去支持那有义务保证全体人民因而也保证工人得到诸如建立独立组织的自由的惟一政党，又能做什么呢？有些人说，在上次选举中，工人本来应当提出他们自己的候选人。可是，即使在工人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哪里又有他们在本阶级内相当闻名而足以得到必要支持的工人阶级候选人呢？不信请看，公社失败以来，政府已经处心积虑地把每个仅仅因在巴黎他的本区内进行个人鼓动而闻名的工人，也都当做那次起义的参加者抓了起来。

共和派在去年 11 月的选举¹⁴⁶中的胜利是重大的。而在随后举

行的省、市选举和补选中又取得了更加重大的胜利。保皇派阴谋集团本来也许不会放过这一切；但是军队的态度十分明确，使他们无力动手。这不仅因为在军官中，特别在下级军官中有许多共和派，而且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士兵群众拒绝反对共和国。这就是改组军队的第一个成果——改组军队废除了雇人顶替的做法，而把军队变成了所有阶级的年轻人的真正代表¹⁴⁷。所以，阴谋不攻自破，无需动用武力了。而这也 very 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因为工人阶级在经过1871年的流血牺牲以后还过于虚弱，在没有完全恢复自己的力量以前，不愿在为了他人的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中再次浪费自己最宝贵的战斗力，或者卷入一系列的激烈冲突之中。

然而共和派的这次胜利还有另一层意义。这次胜利表明，1870年以来，农村居民前进了一大步。工人阶级迄今在巴黎所取得的每次胜利，都由于占法国人口大多数的小农的反动精神而很快就化为乌有。本世纪初以来，法国农民都是波拿巴派。巴黎工人1848年2月建立的第二共和国，被当年12月农民投给路易-拿破仑的600万张选票废除了。但是，1870年的普鲁士入侵，动摇了农民对帝国的信念，而去年11月的选举表明，农村居民群众大都变成了共和派。这一转变具有极重大的意义。它不仅意味着，从此以后任何君主制复辟在法国都是毫无希望的。它还意味着，城市工人同乡村农民结成联盟之日正在临近。大革命造成的小自耕农，只不过在名义上是土地所有者，他们的土地是抵押给高利贷者的；他们的收成要拿去付利息和诉讼费；公证人、辩护士、法警、拍卖官吏是经常出现在他们家门口的威胁。他们的处境和工人的处境一样坏，生活几乎是同样没有保障。如果说，这些农民现在正在从波拿巴主义转向共和国，那他们就是以此表明，他们不再把改善境况的希望寄托于路易-拿破仑

经常向他们许诺但从付诸实现的帝国奇迹上面了。梯也尔对一个“农民皇帝”具有的神秘拯救力的信念，被第二帝国无情地破坏了。魔法已经失灵。法国农民终于有了充分的觉悟，要去寻找长期贫困的真正原因和消灭贫困的实际办法了。既然已开始思考，他们一定很快就会发现，他们得救的惟一办法，就是同那惟一不会从农民目前悲惨处境中得到任何利益的阶级，即城市工人阶级，结成联盟。

可见，不管目前法国的共和政府是怎样地卑劣，共和国的最终确立毕竟使法国工人有了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能够组织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今后不是为他人的利益而是为它本身的利益进行战斗；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还能够同以前敌视他们的农民群众联合起来，从而使将来的胜利由以前那种巴黎对法国的短暂胜利，变为巴黎和外省大城市的工人所领导的法国一切被压迫阶级的最后胜利。

五

(终 篇)

剩下要考察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欧洲国家——俄国。不是因为俄国存在着什么值得一提的工人运动，而是因为俄国的国内外形势非常特殊，并且孕育着不仅对俄国工人的未来而且对整个欧洲工人的未来都有极大意义的事件。

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的政府实行了农奴解放，使绝大多数俄国人民由束缚在土地上的、必须为他们的地主进行强制性劳动的农奴，变成了自由的自耕农。这一转变显然早就是必要的，但其实行的方式却使无论是从前的地主还是从前的农奴都没有得到好处。农民村社得到了份地，这些份地今后要归村社所有，而地主则因为把土地让给村社，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放弃在此以前属于他们的占有农民劳动的权利，而得到赎金。由于农民显然找不到钱来付给地主，于是国家就来干预。一部分赎金的抵偿办法是把农民在此以前自己耕种的土地转交一部分给地主；其余部分的赎金则以政府的债券支付，债券先由国家垫付，农民要每年一次地分期连本带利偿还给国家。大多数地主都把这些债券卖掉把钱花光；这样一来，地主现在不仅比过去穷了，而且还找不到雇工来耕种他们的土地，因为农民决不肯去为他们种地而让自己的田地荒芜。至于农民，他们的份地不仅数量比从前少了，而且常常是少到在俄国的条件下不足以养家糊口的地步。这些份地

多半是从地主土地最坏的部分、从沼泽地或其他不毛之地划给的，而过去属于农民并经他们用劳动改良了的好地，却转归了地主。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处境也比以前大大恶化了。不仅如此，他们每年还必须向政府支付国家为他们垫付的赎金的利息和一部分本金，而且，向他们征收的赋税也在年年增加。还有，在解放以前，农民对地主土地还享有某些共同的权利，如放牧自己的牲畜，砍伐木材用于建筑和其他目的等等。新的办法明文规定剥夺他们的这些权利；如果他们想重新行使这些权利，就得再去同他们从前的地主讲价钱。

因此，当改革使得大多数地主比以前更加负债累累的时候，农民也被弄到既不能死又不能活的地步。欧洲自由派的报刊普遍赞扬和歌颂的伟大解放法令，只不过是将来为革命打下基础，并使这个革命成为绝对不可避免罢了。

政府也是全力以赴地来加速这个革命。贪污腐化渗透于政界的一切领域，破坏着那里或许还会有任何一点做好事的力量。这个贪污腐化的传统，其恶劣程度一如往昔，当土耳其战争¹⁴⁸爆发时，政府每个部门都来了一次大暴露。克里木战争³³结束时就已陷于完全混乱的帝国财政，任其一再恶化。借款一笔又一笔地签订，到后来，除了签订新的借款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来支付旧债的利息。在亚历山大统治的头几年，旧的皇帝专制制度略有缓和；新闻出版得到了较多的自由，建立了陪审制度，由贵族、城市公民和农民各自选出的代表机构，被准许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地方和省的管理。甚至对波兰人也送一些政治秋波¹⁴⁹。但是，公众误解了政府这种仁慈宽厚的用意。报刊变得太直率起来。陪审团竟然把政府原指望它不顾证据而加以定罪的政治犯宣布无罪。地方和省的会议^①一致

① 即县和省的地方自治会议。——编者注

宣称：政府用它的解放法令把国家毁了，这样继续下去是不行的。甚至有这样的暗示：要摆脱迅速变得无法忍受的困境，惟一的办法就是召开国民会议。最后是，波兰人拒绝花言巧语的哄骗，爆发了起义¹⁵⁰，以致帝国动用了一切力量，俄国将军们使出了全部凶残手段，才把起义平息于血泊之中。于是政府又向后转了。严厉的压制重新提上日程。把报刊的嘴堵住；把政治犯送交由专门召集来的法官组成的特别法庭；对地方和省的会议不予理睬。但是已经晚了。政府由于一度表现出恐惧，已经丧失了威信。人们已经不相信它的稳固性，不相信它有能力彻底摧毁国内的任何反抗。未来舆论的萌芽已经破土而出。现在已经不可能使各方面的力量再像过去那样盲目地听命于政府了。议论国事，虽然只是私下里议论，但在受过教育的阶级中间已成为习惯。最后，政府尽管一心想恢复尼古拉统治时期的肆无忌惮的专制制度，但在欧洲面前，还是要装装样子，在表面上保持着亚历山大推行的自由主义。因此，章法上就表现得动摇和犹豫，今天给予让步，明天又收回，然后反反复复地半给半收；政策上就每时每刻变化无常，结果每个人都看清了政府本质的虚弱，看清了它缺乏远见和意志，而一个政府如果没有意志和实现意志的办法，那它就一文不值了。人们早已知道政府做不出什么好事，只是由于害怕才服从它；现在它又表明，它自己也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维持自身的生存，它至少也像人民害怕它一样地害怕人民；对于这样一个政府，人们一天天地越来越瞧不起，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呢？对俄国政府来说，只有一条得救的道路，就是那条摆在任何面临着势不可挡的人民反抗的政府面前的道路——对外战争。于是决定发动对外战争。对欧洲宣布说，这次打仗是为了把基督徒从土耳其的长期暴政下拯救出来，对俄国人民则宣布说，这次打仗是为了使同种的斯拉夫兄弟

摆脱土耳其的奴役，回到神圣俄罗斯帝国的怀抱。

这场战争，经过好多个月的不光彩的失败以后，现在已经由于同样不光彩地——一半靠背信弃义，一半靠巨大的人数优势——打垮了土耳其的反抗而告结束。但是，俄国人夺得欧洲土耳其的大部分土地，这本身不过是全欧战争的序幕。要么是，在即将召开的欧洲会议¹⁵¹上（如果这次会议真的召开），俄国不得不从现在夺得的地盘上大大退却，如此，则巨大的牺牲同微不足道的成果太不相称的情况，一定会使人民的不满发展成猛烈的革命爆发；要么是，俄国必须在一次欧洲战争中保住它新夺得的地盘。像俄国这样一个力量已经消耗过半的国家，政府如果不向人民作重大的让步，就无法使国家度过这样一场战争，不管战争的最终结局如何。而在前面所描述过的形势之下，这样的让步就意味着一场革命的开始。俄国政府即使能够使这场革命推迟一两年爆发，也不可能逃脱这场革命。但是，俄国革命意味着不只是在俄国国内单纯换个政府而已。它意味着，一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就一直是欧洲联合的专制制度的柱石的庞大的、虽然也是笨拙的军事强国将消失。它意味着德意志从普鲁士统治下解放出来，因为普鲁士已经成了俄国的奴仆并且只是依附于俄国才得以存在的。它意味着波兰得到解放。它意味着东欧较小的斯拉夫民族从现在的俄国政府在他们中间培植的泛斯拉夫主义幻想中觉醒过来。它还意味着俄国人本身全民一派生机的开始，同时也意味着俄国真正的工人阶级运动的产生。总之，它意味着欧洲整个形势发生这样一种变化，这种变化一定会受到每个国家的工人兴高采烈的欢迎，被看作是向他们的共同目标——劳动的普遍解放——迈出的巨大的一步。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布 赫 尔 先 生

致《每日新闻》编辑¹⁵²

先生：

据路透社一则电讯报道，

“外交部参事布赫尔先生被任命为会议的秘书兼档案官。”

这位“布赫尔先生”莫非就是在长期亡命伦敦期间出色地充当了已故戴维·乌尔卡尔特先生的坚定追随者，并在柏林《国民报》上每周都要大讲一番后者的反俄理论的那个洛塔尔·布赫尔？莫非就是在回到柏林以后成为斐迪南·拉萨尔的狂热信徒，以致拉萨尔指定他为自己的遗嘱执行人、将一笔每年的收入遗留给他并将自己的著作版权转赠给他的那个洛塔尔·布赫尔？在拉萨尔死后不久，洛塔尔·布赫尔就进了普鲁士外交部，被任命为“参事”，并成为俾斯麦的心腹侍从。

他曾天真地给我写过一封信¹⁵³，约我（自然是征得他主子的同意）为普鲁士的官方报纸《国家通报》撰写有关金融问题的文章。

稿酬条件让我自己决定，同时明确地告诉我，我完全有自由对金

融市场上的活动和活动家们按照我自己的“科学”观点发表意见。这件怪事发生以后,当我看到约翰·菲利浦·贝克尔在日内瓦出版的名为《先驱》的国际机关刊物上总是记录着洛塔尔·布赫尔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缴纳会费时,觉得十分好笑。如果这里没有弄错人,如果真像消息报道的那样,俄国政府和德国政府由于赫德尔和诺比林的谋刺案¹⁵⁴而想对会议提出各国共同采取措施防止社会主义的传播,那么,正是布赫尔先生最有资格向会议证明: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组织、活动和学说同这两起谋刺案毫无关系,就像同大选帝侯号的沉没¹⁵⁵或同柏林会议的召开毫无关系一样;也正是他最有资格证明:在德国到处进行的引起人心惶惶的搜捕和报界爬虫^①的喧嚣扬尘,都纯粹是为了制造舆论,要求选举出这样一届帝国国会,它将乐于最终批准俾斯麦公爵长期以来精心谋划的方案来解决那个矛盾问题,即既要使德国政府享有一个现代国家的全部财源,同时又要重新迫使德国人民接受被1848年风暴摧毁了的古老政治制度。

阁下的顺从仆人

卡尔·马克思

6月12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78年6月12日

载于1878年6月13日《每日新

闻》第10030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25卷翻译

① 指受俾斯麦政府收买的报刊或记者。——编者注

卡·马克思

*答布赫尔的《声明》¹⁵⁶

洛塔尔·布赫尔先生在6月21日《北德总汇报》上发表了一项《声明》，其中首先指出一个令人不愉快的情况，即民族自由党和进步党的报纸都转载了我给《每日新闻》的信^①。布赫尔先生声称，要纠正我所作的一大堆歪曲，必须写3 000行文字。然而要一劳永逸地确定布赫尔所作的“更正”和“补充”有几分真实性，写30行文字就绰绰有余了。

布赫尔先生那封企图诱使我给《国家通报》撰稿的信写于1865年10月8日，这恰恰是普鲁士自由党和进步党资产阶级同冯·俾斯麦先生发生冲突的时期。信中有一段话说：

“至于内容，不言而喻，您只管依照您的学术信念行事；但是，考虑到读者群——*haute finance* [金融贵族]——而不是为编辑部着想，来稿写得只要行家能领悟内在的含义就可以了。”

相反，布赫尔先生在“更正”中却说，他

“询问过马克思先生，是否愿意提供一些所需要的文章，对情况作客观的叙述。

^① 见本卷第185—186页。——编者注

关于马克思先生‘自己的学术观点’，我在信中根本没有谈起过”。

同一封信接着说：

“《国家通报》每月需要一篇关于金融市场(不言而喻,也有商品市场,只要两者无法分开)动态的报道。他们问我能否推荐一个人,我回答说,没有人比您更适合做这件事了,后来他们就请我写信给您。”

可见,布赫尔先生自己已经说得很明白,他是应什么人的请求才动笔同我“通信”的,但他在“更正”中反倒说：

“任何人,甚至连《国家通报》的编辑,都不知道或没听说过这次通信。”

这就是布赫尔先生作更正的方法。下面再举一个典型例子看看他作补充的方法！

在我给《每日新闻》的信中只说到布赫尔先生“天真地”询问过我,但是只字未提我给他的答复。而布赫尔竭力要把这件“怪事”说得平淡无奇,就来给我作“补充”,他捏造说：

“马克思先生回答说,他不给反动报纸写文章。”

我哪会用这类空洞的套话来回答他的信呢？因为在接下来的最后一段话里,他这封信的“内在的含义”不是“只要”说得明了,而且突出地透彻：

“进步党(他指的是自由党或进步党资产阶级)在死亡以前,还会蜕换好多次皮;所以,谁还想在自己的一生中参加国家活动,就必须联合在政府的周围。”

卡尔·马克思

6月27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写于 1878 年 6 月
27 日

载于 1878 年 6 月 29 日《法兰克
福报和商报》第 180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5 卷翻译

弗·恩格斯

《论德意志人的古代历史》的
提纲(最初的计划)¹⁵⁷

- 1)凯撒和塔西佗。
- 2)马尔克制度和军事制度。
- 3)和罗马的最初战斗。
- 4)民族大迁徙以前的进步。

注释

- 1)正文中的。
- 2)德意志诸部落。
- 3)法兰克方言。

弗·恩格斯写于1878年中—
1882年8月初之间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85年历史考证
版第1部分第25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25卷翻译

弗·恩格斯

*论德意志人的古代历史¹⁵⁸

弗·恩格斯写于 1878 年中—
1882 年 8 月初之间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 1937 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1
版第 16 卷第 1 分册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5 卷翻译

[凯撒和塔西佗]

德意志人决不是他们现在所占据的领土上的最初居住者^①。在他们以前,至少有三个种族在这里居住过。

人类在欧洲的最古遗迹,发现于南英格兰的若干地层中,这些地层的年代直到现在还不能确切断定,大概处在所谓冰河时代的两个冰期之间。

第二冰期以后,气候逐渐变暖,人类开始出现于整个欧洲、北非、前亚细亚以至印度。和人类一同出现的,有已经绝种的巨大的厚皮动物(毛象、有直牙的象、毛犀)、肉食动物(穴狮、洞熊)以及现在还生存着的动物(驯鹿、马、鬃狗、狮子、野牛、原牛)。这一时代的工具,表明了很低的文化发展阶段:极其粗糙的石刀、无柄的梨形石锄或石斧、清理兽皮用的削刀、钻,所有这些都是用燧石做成的,这大致相当于现今澳洲土人的发展阶段。到现在为止,所发现的骨骼残骸,使我们还无法对这些人的身体结构作出结论,但就其分布地域之广和到处都有同样的文化来看,可以断定这个时期延续得很久。

这些早期旧石器时代的人类的结局怎样,我们不知道。在他们出现过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包括印度在内,还保存有什么种族可以作为他们在现代人类中的代表。

^① 我在这里主要依据博伊德·道金斯《不列颠的原始人》1880年伦敦版。

在英国、法国、瑞士、比利时和德国南部的洞穴里,大多只是在土壤沉积的最下层中,发现有这些已经灭绝的人类的工具。在这个最低的文化层上面(中间往往隔着一层厚薄不等的钟乳石),发现有第二个有着种种工具的沉积层。这些工具属于一个较晚的时代,它们的制作精巧得多,它们的材料也更加多种多样。石器固然还没有磨光,但在设计和制造上比较实用了。此外,还发现有石制的、驯鹿角制的和骨制的箭头和枪头,骨制的和鹿角制的短剑和缝针,动物牙齿钻孔后串成的项链等物。在某些器物上,我们有时看到很生动的动物画,如驯鹿、毛象、原牛、海豹、鲸鱼等,也有赤身人物狩猎图,甚至还可看到兽角上的原始雕刻。

早期旧石器时代人类和多半来自南方的动物一起出现,而和晚期旧石器时代人类同时出现的,则是产自北方的动物:两种现在还生存着的北方熊、北极狐、狼獾、白兔。这些人大概就是和这些动物一起从东北方面迁移来的,他们残存在今日世界上的后代,看来就是爱斯基摩人。这两种人的工具,不仅个别是、而且整批都是完全一致的;图画也是如此;这两种人的食物,取自几乎完全相同的动物;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我们对已经灭绝的种族所能下的判断来说)是完全一样的。

这些爱斯基摩人(到现在为止,只能证明他们曾生存在比利牛斯山脉及阿尔卑斯山脉以北地区)在欧洲土地上也绝迹了。就像美洲的红种人在前一世纪通过残酷的歼灭战争,将爱斯基摩人驱逐到极北那样,那时在欧洲出现的新种族,大概也逐渐把他们赶了回去,并最后把他们消灭干净,而没有和他们混合起来。

这个新种族至少在西欧是来自南方。他们大概从非洲进入欧洲,当时这两块大陆在直布罗陀和西西里还是由陆地连接着的。他

们处于比他们的前人高得多的文化发展阶段上。他们已经知道耕作。他们有家畜(狗、马、绵羊、山羊、猪、牛)。他们会用手工制作陶器,他们会纺纱和织布。他们的工具虽然还是石制的,但是已经做得很精致,而且大多数都磨得很光滑(这些工具被称为新石器,以区别于从前各时期的工具)。斧子装上了柄,因而第一次可以用它来砍伐树木;这样,就有可能将树干挖成小舟,就有可能乘小舟到达由于陆地逐渐下沉这时已经和大陆分离了的不列颠群岛。

这种人和他们的前人截然不同。他们细心地埋葬他们的死者;因此给我们保存了足够的骨骼和头骨,据此来推断他们的身体结构。长长的头骨、小小的身材(女子身高平均约 1.46 米,男子 1.65 米)、低额、鹰鼻、浓眉、不很高的颧骨和中度发达的颞骨,都可证明这一人种在今天的最后代表是**巴斯克人**。不仅西班牙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就连法国、英国和至少莱茵河以南整个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居民,大概都属于伊比利安种族。在雅利安人¹⁵⁹到达以前,意大利也住着和伊比利安人相似的身材短小的黑发种族。这个种族跟巴斯克人亲属关系的远近问题,现在还很难判断。

微耳和考察这种长长的巴斯克人头骨,最远到德国北部和丹麦^①。阿尔卑斯山北坡上最古的新石器时代的木桩建筑物,也是属于巴斯克人的。另一方面,沙弗豪森则宣称,在莱茵河附近发现的一系列头骨肯定是芬兰人的,尤其是拉普人的¹⁶⁰,而在古代史上,斯堪的纳维亚的德意志人及俄罗斯的立陶宛人和斯拉夫人的北方邻人,只有芬兰人。这两个身材矮小的深色头发的种族,一个是从地中海

① 鲁·微耳和《关于梅诺卡岛头盖骨的报道》,载于《民族学杂志》1878年(柏林)第10卷第418—424页。——编者注

对岸迁来的,一个是直接从亚洲里海北面迁来的,后来这两种人大概是在德国相遇了。这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发生的,还完全没有弄清楚。

在这许多次迁徙以后,终于(也还是在史前时代)发生了最后一个大系统即雅利安人的迁徙,这些民族的语言是以其中最古的一种语言——梵语为中心而形成的。最早的迁入者是希腊人和拉丁人,他们占据了欧洲东南部的两个半岛。其次迁入的或许是现在业已绝迹了的西徐亚人,他们是黑海以北草原上的居民,和米底—波斯部落或许亲属关系最近。接着来到的是克尔特人。关于克尔特人的迁徙,我们只知道这是发生在黑海北面,而且经过了德国。他们最前面的集团,进入了法兰西,占领了直到加龙河一带的土地,甚至征服了西班牙西部和中部的一部分。一面有海,另一面又有伊比利亚人的抵抗,他们不得不停止前进。同时在他们后面,从多瑙河两岸又有其他的克尔特部落向这里涌来。希罗多德正是在海岸上和多瑙河发源地发现了这些克尔特人。他们一定老早就迁移到这里了。法国和比利时的坟墓和其他出土文物证明,克尔特人在占领这一带土地的时候,还没有金属工具;相反,在不列颠,他们一开始出现就已有青铜工具。由此可见,克尔特人从征服高卢到迁入不列颠,一定经过了相当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克尔特人由于跟意大利和马赛发生了贸易关系,才知道了青铜,并且输入了青铜。

在这期间,本身遭受德意志人逼迫的后面的克尔特部落,愈益加紧向前推进;但前进的道路已被封锁,于是出现了向东南方向的回流,这种情形我们以后在日耳曼民族和斯拉夫民族迁徙时期还会看到。各克尔特部落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了意大利、色雷斯半岛和希腊,一部分灭亡了,一部分定居于波河谷地和小亚细亚。在那个时期

(-400年至-300年)^①，在直到加龙河一带的高卢地区，在不列颠和爱尔兰，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在多瑙河两岸，直达美因河和理森山甚至更远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部落的人。虽然德国北部的山河带有克尔特人名称的，比起南部来不那么多，不那么可靠，但是决不能认为，克尔特人只选择了一条通过南德山区比较难走的道路，而没有同时利用那条横贯开阔的北德平原的比較便利的道路。

克尔特人的迁徙，只赶走了本地居民的一部分。尤其在高卢南部和西部，本地居民虽然处于被压迫种族的地位，但当时仍占居民中的多数，并把他们的体型遗传给现在的居民。不仅克尔特人还有日耳曼人在他们新定居的地区，都对深色头发的本地居民进行了统治，这一点可以从这两个种族都有用皂把头发染成黄色的习俗上看起来。浅色头发是统治种族的标志，因此，凡是由于种族混合而失去这个标志的地方，就必须用皂来补救。

在克尔特人以后迁来的是德意志人。德意志人迁徙的时期，我们在这里至少大体上可以比较确实地指出来。这大约在-400多年以前不久已经开始，在凯撒时代还没有完全结束。

皮提亚斯在他-325年左右的旅行记中，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德意志人的最初的一些确实材料¹⁶¹。他从马赛前往琥珀海岸，记载了居住在那里的无疑是德意志民族的古顿人和条顿人的情况。但是，这个琥珀海岸究竟在哪里呢？通常当然都只能理解为东普鲁士海岸，而如果把古顿人称为这个海岸的邻人，这肯定是不错的。但是皮提亚斯记载的里程，和这个地方不相符合，它对北德意志海岸和基姆布里半岛之间的北海大海湾倒很适合。同样被称为邻人的条顿人也

① 为了简便起见，我用数学上的负号(-)来表示公元前的年代。

适合那个地方。那里,在石勒苏益格和日德兰半岛的西面,也有一个琥珀海岸。灵克宾今天还在进行着相当规模的当地采集的琥珀的贸易。此外,皮提亚斯在这样早的时期,就能远航到完全不熟悉的海面,似乎太不可能了,况且,从卡特加特海峡到东普鲁士这一段艰难的航程,在他那些非常详细的记载中,不仅完全没有提到,而且写进去也风马牛不相及。因此,我们应该坚决同意列列韦尔首先发表的意见:如果不是由于只可能住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古顿人这一名称,那么皮提亚斯所说的琥珀海岸就应该到北海沿岸去找。弥伦霍夫更进一步消除了这个最后的障碍,他认为古顿人一词是从条顿人错写而来的^①。

公元前 180 年左右,无疑是德意志人的巴斯泰尔人出现于多瑙河下游,几年以后,他们已在马其顿国王柏修斯和罗马人打仗的军队中当雇佣兵,即最初的雇佣步兵。这是些狂暴的战士:

“一些既不善耕作,也不善航行,也不会从事畜牧以为生计的男人,相反他们只爱好一件事情,一种技艺,就是不断战斗和荡平一切阻碍。”

是普卢塔克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一支德意志民族生活方式的这个最早报道^②。数世纪后,我们在多瑙河以北稍稍偏西的地方又发现了这种巴斯泰尔人。50 年以后,基姆布里人和条顿人侵入了克尔特人居住的多瑙河地区,但被住在波希米亚的克尔特部落的波伊人击退。于是他们便分做许多群,向高卢前进,侵入西班牙,打败了一批

① 参看卡·弥伦霍夫《德国考古学》1870 年柏林版第 1 卷第 479 页。——编者注

② 参看普卢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埃米利乌斯·保罗传》第 12 章)。——编者注

一批的罗马军队,最后,马略消灭了他们那无疑已大为削弱的大军(条顿人是-102年在普罗旺斯的艾克斯被消灭的,基姆布里人则在-101年被歼于意大利北部的韦尔切利),从而结束了他们差不多20年之久的迁徙。

半个世纪以后,凯撒在高卢和日耳曼人的两支新部队冲突起来,开始是在上莱茵和阿里奥维斯特的军队发生了冲突。阿里奥维斯特这支军队代表了七个不同的民族,其中有马可曼尼人和苏维汇人。其后不久,又在下莱茵和乌西佩特人及邓克泰人的军队发生了冲突。这两种人是受到苏维汇人的排挤,离开以前居住的地方,过了三年流浪生活以后,才来到莱茵河的。这两支军队都败于罗马部队的正规作战,而乌西佩特人和邓克泰人,除此之外还败于罗马人的背信行为。狄奥·卡西乌斯说到过,在奥古斯都统治的初年,巴斯泰尔人一度侵入色雷斯;马可·克拉苏在希特勒斯河(现在的马里查河)打败了他们。这个历史编纂学家还提到赫蒙杜利人的一次迁徙,他们在公元初年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离开了自己的家乡,被罗马的指挥官多米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移住在“马可曼尼人的一部分土地上”^①。这是那个时代最后的几次迁徙。在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已经巩固起来的罗马统治,长期地限制了民族迁徙。但是有许多迹象表明,在东北方面,在易北河及理森山那一边,各民族很久还没有定居下来。

日耳曼人这几次迁徙,是民族大迁徙的序幕。这种民族大迁徙,在300年中被罗马的抵抗所阻止,可是到了3世纪末,却以不可遏止的声势,冲过边境上的两条河流,泛滥到南欧和北非,直至公元568年,伦巴德人占领意大利时方才结束。这所谓结束,只是指日耳曼人

^① 参看狄奥·卡西乌斯《罗马史》第55卷第10章。——编者注

所参加的迁徙而言,不是指斯拉夫人,他们在日耳曼人迁徙以后,还在很长时期继续移动。这是名副其实的民族大迁徙。整个整个部落,至少是这些部落中的大部分,带着妻子儿女和全部家当,登上征途。用兽皮搭盖起来的车辆用做住所,并用来装载妇女、儿童和少量家用器具。家畜也赶着一起走。男子都武装起来,编制起来,准备摧毁一切抵抗和防备袭击。白天进行战斗行军,夜晚宿营在用车子做成的堡垒中。在这样的征途上,由于不断的战斗,由于疲劳、饥饿和疾病,人员的损失一定是很大的。这是生死攸关的孤注一掷。如果行军成功,活着的这部分人就可以在异乡土地上住下来。如果行军失败,移出的部落就从地球上消失了。不是在战斗的屠杀中死去,便是因受奴役而沦亡。被凯撒挡住其迁徙的海尔维第人及其同盟者,出发时共有 368 000 人,其中有战斗力的 92 000 人;被罗马人打败后,只剩下 11 万人,这些人,凯撒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破例地把他们放归故乡。乌西佩特人和邓克泰人,是以 18 万人之众渡过莱茵河的;他们几乎全部在战斗中和溃逃中死去了。在这个漫长的迁徙期间,整个整个的部落往往消逝得无影无踪,这是不足为奇的。

凯撒在莱茵河畔所发现的情况,同日耳曼人不稳定的生活方式完全相符。莱茵河决不是高卢人和德意志人之间的一条精确界线。比利时—高卢族的梅那普人在莱茵河右岸的韦瑟尔地区拥有村落和耕地;而莱茵河左岸的马斯河三角洲,却被日耳曼族的巴达维人占据着,同时在沃尔姆斯直达斯特拉斯堡一带,也住着日耳曼族的梵乡人、特里包克人和涅麦特人,他们是从阿里奥维斯特时代起住在这里的呢,还是在更早的时候就住在这里的呢,那就不能肯定了。比利时人经常跟德意志人作战,到处都还是有争议的领土。在美因河和厄尔士山脉以南,那时还没有德意志人居住。海尔维第人是在不久以

前才被苏维汇人从美因河、莱茵河、多瑙河及波希米亚林山之间的地带驱逐出来的，正如波伊人从至今还带着他们的名字的波希米亚(Boihemum)被驱逐出来一样。但是，苏维汇人并没有占领这块土地，他们把这块土地改变成长达600罗马里(150德里)^①的林野，作为他们南面的屏障。凯撒还知道，再往东去，在多瑙河北面住着克尔特人(沃尔克—特克托扎格人)，即塔西佗后来称为德意志族的魁代人。一直到奥古斯都的时候，马罗博杜斯才率领他的苏维汇族的马可曼尼人来到波希米亚；同时，罗马人却把莱茵河和多瑙河之间这一块地区用防御设施封锁起来，让高卢人移住。这样一来，边境墙的那一面大概就被赫蒙杜利人占领了。从这里可以毫无疑问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日耳曼人是经过喀尔巴阡山和波希米亚边境山脉以北的平原来到德意志的，在他们占领了北方的平原以后，才把住在南方山中的克尔特人赶过了多瑙河。

根据凯撒的描写，日耳曼人的生活方式也表明他们还根本没有在他们的领土上定居下来。他们主要以畜牧为生，食用干酪、奶和肉，较少食用谷物。男子的主要工作是打猎和习武。他们也搞一点农业，但只是附带的，采用的方法也非常原始。凯撒报道说，他们的耕地只种一年，第二年总要耕种一块新土地^②。大概是刀耕火种，直到现在，在斯堪的纳维亚和芬兰北部，还采用这种方法：把森林(除森林以外，只有沼泽地和泥炭地，这些土地当时不适于耕作)烧掉，把树根马马虎虎地清除掉，再把这些树根和松过的表层土壤一起烧一遍，

① 一罗马里约等于1.5公里；一德里(地理里)等于7.420公里。——编者注

② 参看凯撒《高卢战记》第4卷第1章。——编者注

然后在这块施过灰肥的土地上播种谷物。可是,甚至在这种情形下,也不应该从字面上去理解凯撒关于每年更换耕地的记载;通常总在起码收获两三次以后,才按照习惯换种新土地^①。非德意志人所有的那种由君主和官吏分配土地的办法,尤其是强加在日耳曼人身上的这种迅速更换土地的动因,所有这些地方,都反映了罗马人的观念。对于罗马人来说,这种土地更换的办法是不可思议的。对于正在定居下来的莱茵河畔的德意志人来说,这种土地更换的办法可能是一种留传下来的习惯,逐渐失去了目的和意义。相反,对于内地的德意志人来说,对于刚刚到达莱茵河畔的苏维汇人来说(这种土地更换的办法主要也适用于他们),这种土地更换的办法却仍然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基本条件,在这种生活方式下,整个民族以当前遇到的抵抗所许可的方向和速度,慢慢向前推进。他们的制度也和这种生活方式相适应:苏维汇人分为100个区,每一个区每年派1000个人去当兵,其余的男子都留在家,耕种土地并照管家畜,到了第二年,他们再去替换那些出征的人。只有在占领了新土地以后,携妻带子的人群才跟在军队的后面向前去。这比起基姆布里人时代的行军生活来,已经是向定居生活前进了一步。

凯撒不止一次地提到德意志人有一种习俗,在面向着敌人即任何异族的那一面,用广阔的林野来保护自己。这种习俗一直盛行到中世纪后期。为保护易北河以北的萨克森人而防御丹麦人的,有艾德河和施莱湾之间的边境森林(古代丹麦语叫 Jarnwidhr),防御斯拉夫人的,有从基尔湾到易北河一带的萨克森林地,而勃兰登堡的斯拉夫名字 Branibor,也是指防护森林(捷克语 *braniti* 是防护的意思。

^① 参看凯撒《高卢战记》第4卷第3章。——编者注

bor 是松树和松树林的意思)。

了解了这一切情况以后,对于凯撒所看到的德意志人的文明发展阶段,不可能再有任何疑问。他们决不是像现在亚洲游牧民族那样的游牧人。游牧民族必须有草原,而德意志人却住在原始森林里。但是,他们同样也远没有到达定居的农业民族的阶段。60年以后,斯特拉本就这样谈到过他们:

“所有这些(德意志)民族的共同的地方,是他们由于生活方式简单而便于迁移,因为他们不从事耕作,不搜集财宝;他们住的是茅舍,这些茅舍他们每天都可以搭起来;他们像游牧人那样,吃的大部分是畜产品;他们还有一点也很像游牧人,那就是他们也用车来搬运自己的财物,赶着畜群,想到哪里,就到哪里。”^①

比较语言学证明,他们从亚洲带来了农业知识。凯撒指出,他们没有忘掉这种农业知识。但是,对于一个穿过中欧森林平原慢慢移动的半游牧的武士部落来说,这种农业不过是一种应急手段和次要的生活来源。

由此可见,德意志人向多瑙河、莱茵河和北海之间新的家乡的迁徙,在凯撒时代还没有结束,或者说是刚刚结束。在皮提亚斯时代,条顿人,也许还有基姆布里人,可能已经达到了日德兰半岛,而德意志人的先头部队或许已经达到莱茵河畔(由于缺乏关于他们到达的任何报道,可以作这样的推断),这和前面的说法一点也不矛盾。只能和经常的迁徙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向西方和南方的多次进军,最后,凯撒看见他所熟悉的最大一个集团(苏维汇人)当时还处于经常移动状态的事实,所有这些只能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在这里所

^① 斯特拉本《地理学》第7卷第1章。——编者注

看到的,显然只是关于日耳曼人向他们欧洲主要居住地实行大规模迁徙的最后阶段的一些残缺不全的情况。罗马人在莱茵河畔和以后在多瑙河上的抵抗,阻止了这种迁徙,把德意志人限制在他们现在占据的领土上,从而迫使他们定居下来。

此外,根据凯撒的观察,我们的祖先是真正的野蛮人。他们允许商人入境,只不过为了向某个商人出卖战利品,他们自己从商人那里几乎什么东西都不买。他们需要什么外来的东西呢?他们甚至喜欢自己那种矮小的弩马,而不愿要漂亮的高卢骏马^①。苏维汇人根本不允许把酒运入境内,认为它会使人身体衰弱。在这方面,他们的亲戚巴斯泰尔人要文明一些。巴斯泰尔人那次侵入色雷斯的时候^②,曾向克拉苏派遣过使节,克拉苏灌醉了这些使节,盘问出关于巴斯泰尔人阵地和意图的重要情报,以后便诱使巴斯泰尔人中了埋伏,消灭了他们。还在伊迪斯塔维索谷地会战(公元16年)以前,盖尔马尼库斯就向他的士兵描述过德意志人,说他们不戴甲冑,只拿着柳条编成的或薄板做成的盾牌,而且只有最前列的士兵才拿着真的长矛,后面的人只拿着用火烤硬并削尖了的棍棒。由此可见,威悉河畔的居民当时还未必知道金属的加工,而且罗马人想必也不让商人把武器偷运到德意志去。

凯撒逝世一百五十多年以后,塔西佗供给我们一本关于德意志人的名著^③。在这本书里,有许多事情看来已经完全不同了。直到易北河,甚至更远,漂泊不定的部落都已安定下来,有了固定的住处。

① 参看凯撒《高卢战记》第4卷第2章。——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99页。——编者注

③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编者注

城市当然还完全谈不到。一部分人居住在村落里,这种村落有的由一些独家院子组成,有的由一些毗连的院子组成;就是在后一场合,每一所房子也是单独建立的,周围都有一片空地。房屋都是简陋地用没有加过工的原木(*materia informi* 在这里指的就是这个,同 *caementa* 和 *tegulae* 相反)盖起来的,还没有使用粗石和瓦。在斯堪的纳维亚北部,现在还有这样的木房,但它们已经不是斯特拉本所说的一天之内就可以建造起来的那种茅舍了。关于耕作制度,下面再谈。德意志人已经有了地下仓库(一种地下室),冬天他们躲在里面御寒,根据普林尼的记载,妇女在里面纺织。可见耕作已经有了比较重要的意义,可是家畜还是主要的财富。家畜虽多,但品种不好,马长得很难看,没有善跑的骏马,牛羊的形体小,牛没有角。食品有肉、奶、野苹果,没有面包。不再经常打猎,猎物从凯撒时代起已大大减少。衣服也非常原始,大多数人以粗布遮体,其余的赤裸着身子(和卡弗尔—祖鲁人差不多),但是最富有的人已经有了贴身的衣服;也使用毛皮;妇女的衣着和男子差不多,但是她们已经常穿没有袖子的亚麻布衣裳了。小孩子都光着身体跑来跑去。有关读书写字的情况不详,但是有一处说到,僧侣已经使用借用拉丁字母创制的鲁恩文字,把它们刻在木杆上。内地的德意志人并不看重金银,罗马人赠送给君主和使节的银器,像陶器一样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小规模的商业交往是一种简单交换。

男人还完全保持着一切原始人所共有的习惯。把家务和耕作看成是没有丈夫气的事情,交给妇女、老人和儿童去做。但是,他们却染上了两种文明的习俗:饮酒和赌博,而且是用从未见过世面的野蛮人那种毫无节制的方式去喝和赌,直至赌到把本人也输掉。内地男人们的饮料,是大麦或小麦做成的啤酒。如果当时已经发明了烧酒,

那么世界史恐怕会有另一种发展过程。

在和罗马领土接界的地区，更加进步了：这里喝输入的葡萄酒，对金钱已比较习惯，当然他们更愿意要那些便于进行小规模交换的银子，同时按照野蛮人的习惯，也更愿意要那些铸有他们早就熟悉的图案的硬币。我们下面就会看到，他们这种小心谨慎是非常有根据的。同日耳曼人的贸易，只在莱茵河岸进行。只有住在边境墙以外的赫蒙杜利人，为了进行贸易，已进出于高卢和雷蒂亚。

这样看来，从凯撒到塔西佗这段时间，是德意志人历史的第一个大段落，在这段时间内，从游牧生活最后过渡到了定居生活，至少这个民族的大部分，自莱茵河起远至易北河以东是这样。各个部落的名称，开始或多或少地和一定的地区结合了起来。但是，由于古人的记载有矛盾，由于名称的变化不定，往往不能说定每一个部落的确切居住地点。而且这样做，也会使我们离题太远。这里，我们只举出普林尼的一段总的叙述就够了。

“德意志人的大系统有五个：温底尔人，其中包括勃艮第人、瓦林人、喀林人和古顿人；第二个大系统是印格伏南人，其中有基姆布里人、条顿人和乔克人。紧靠莱茵河居住的是易斯卡伏南人，其中有西干布尔人；住在这块土地中央的是赫米奥南人，其中有苏维汇人、赫蒙杜利人、卡滕人、凯鲁斯奇人。第五个大系统是和达克人为邻的佩夫金人及巴斯泰尔人。”^①

此外，还有住在斯堪的纳维亚的第六个分支——希列维昂人。

在古人的所有记载中，普林尼的这段文字，最符合以后的事实和

① 盖尤斯·普林尼·塞孔德《博物志》(三十七卷本)第4卷第14章。——编者注

留传给我们的语言遗物。

温底尔人包括说哥特语的各个民族,他们占据了易北河至魏克瑟尔河之间波罗的海沿岸直到内地一些地区;魏克瑟尔河对岸新泻湖周围住着古顿人(哥特人)。保留下来的稀少的语言遗物,使我们毫不怀疑,汪达尔人(他们无论如何是应该属于普林尼所说的温底尔人的,因为他把这部分人的名称转用到整个大系统上去了)和勃艮第人讲的都是哥特人的方言。可能引起怀疑的只有瓦伦人(或称瓦林人),根据5世纪和6世纪的史料,通常认为他们属于图林根人;关于他们的语言,我们一无所知。

第二个大系统是印格伏南人,它首先包括说弗里西安语的各个民族,住在北海沿岸和基姆布里半岛上的居民,非常可能还包括住在易北河与威悉河之间说萨克森语的各个民族;如果这样,凯鲁斯奇人也应该算入这个大系统以内。

易斯卡伏南人也包括西干布尔人这一事实,立刻表明他们是后来的法兰克人,他们住在莱茵河右岸,由陶努斯山脉起,直到兰河、锡格河、鲁尔河、利珀河和埃姆斯河的发源地,北面则和弗里西安人及乔克人为界。

赫米奥南人,塔西佗更正确地把他们叫做赫米诺南人^①,就是后来的高地德意志人,他们包括赫蒙杜利人(图林根人)、苏维汇人(士瓦本人和马可曼尼人—巴伐利亚人)、卡滕人(黑森人)等等。把凯鲁斯奇人也算在这个大系统里面,毫无疑问是一个错误。这是普林尼这方面的全部记载中惟一的明显错误。

第五个大系统(佩夫金人和巴斯泰尔人)已经灭绝了。雅科布·

^① 参看塔西佗《日尔曼尼亚志》。——编者注

格林把他们算做哥特人^①，无疑是正确的。

最后，第六个大系统是希列维昂人，这包括丹麦群岛和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居民。

这样看来，普林尼的划分以令人吃惊的准确程度符合于后来实际出现的德意志的方言的分类。我们不知道有哪些方言是不属于哥特语、弗里西安—萨克逊语、法兰克语、高地德意志语或斯堪的纳维亚语的，即使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承认普林尼的划分堪称典范。或许会有些不同见解的地方，我都在关于德意志诸部落的注释中加以考察^②。

因此，关于德意志人向他们新家乡的最初迁移，我们大致可以这样推断：最先沿着南部山地和波罗的海及北海之间的北德平原腹地推进的，是易斯卡伏南人，紧跟在他们后面但更靠近海岸的，是印格伏南人。在他们之后的，大概是希列维昂人，但他们转向岛屿方面去了。跟在这些人后面的可能是哥特人（即普林尼所说的温底尔人），他们把佩夫金人和巴斯泰尔人留在东南方了；瑞典有哥特人的名字，证明哥特人的个别分支参加过希列维昂人的迁徙。最后，在哥特人南面移动的是赫米诺南人，他们（至少其中的大部分）直到凯撒时代甚至直到奥古斯都时代才进驻他们的居住地，这些居住地他们一直保持到民族大迁徙时期。^③

① 雅·格林《德意志语言史》1848年莱比锡版第1卷第462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41—254页。——编者注

③ 手稿这里有一个用铅笔字作的注：“下一章讲土地制度和军事制度。”——编者注

[和罗马的最初战斗]

自凯撒时代以来,罗马人和德意志人对峙在莱茵河两岸,从奥古斯都征服了雷蒂亚、诺里克和潘诺尼亚以后,双方又对峙在多瑙河两岸。这时,罗马在高卢的统治已经巩固;阿格利巴在全国修筑了军用道路网。要塞建筑了;在罗马的压迫下出生的新一代,成长起来了。奥古斯都时代修建的阿尔卑斯山道,通过了大小圣伯纳德山口,将高卢和意大利直接联系起来,于是高卢就成了从莱茵河征服日耳曼尼亚的基地。以驻屯在莱茵河的八个军团完成征服日耳曼尼亚,奥古斯都交给了他的继子(也许是亲生子?)德鲁苏斯。

边境居民之间的不断摩擦、德意志人的入侵高卢、心怀不满的比利时人和西干布尔人谣传的或实有的阴谋(按照这个阴谋,西干布尔人要渡过莱茵河发动全面暴动),都为战争提供了借口。德鲁苏斯取得了比利时首领们的保证(-12年),在莱茵河三角洲的上方紧靠巴达维亚岛的地方渡过莱茵河,扫平了乌西佩特人的地区和西干布尔人的一部分地区,然后又乘船顺莱茵河而下,强迫弗里西安人向他供应步兵后援部队,并率领舰队,沿着海岸,开到埃姆斯河的入海口去同乔克人作战。在这里,他那些不熟习潮汐的罗马水手,在退潮时使他的舰队搁浅了。只是由于比较熟悉潮汐的弗里西安同盟军的援助,德鲁苏斯才能使舰队脱险而归。

这第一次的进军,不过是一种大规模的侦察。第二年(-11年)

他开始了真正的征服。他在利珀河口下面重新渡过莱茵河，征服了住在这里的乌西佩特人，在利珀河上架起了桥梁，侵入西干布尔人的地区。西干布尔人这时正在和卡滕人打仗，因为卡滕人不愿加入西干布尔人领导的反对罗马人的同盟。以后，德鲁苏斯在利珀河与埃利索河的汇合处，建筑了一个设防的兵营(阿利索)，当冬天临近的时候，又渡过莱茵河归去。在这次归途中，他的部队在一个狭谷里受到德意志人的袭击，费了很大的劲才幸免于全军覆没。这一年，“在卡滕人的土地上，紧靠莱茵河的地方”^①，德鲁苏斯又建立了另一个筑有工事的兵营。

德鲁苏斯的第二次进军，已经包括有一个完整的征服计划，从此以后，这个计划便始终不渝地得到贯彻执行。他首先要征服的地区，已经相当精确地划定了范围，这包括易斯卡伏南人的内部地区，直到同凯鲁斯奇人及卡滕人的交界处，还包括属于这一地区的直到埃姆斯河，尽可能直到威悉河的沿海地带。征服沿海地带的主要任务，交由舰队担负。在南方，阿格利巴创建的、德鲁苏斯扩建的美因茨成了作战基地，在它的邻近，我们应该可以找到那建筑“在卡滕人土地上”的要塞(最近人们正在霍姆堡附近的萨尔堡寻找这个要塞)。从这里起，美因河下游流进了韦特劳和兰河上游之间的开阔地带，占领这个地带，就能把易斯卡伏南人和卡滕人分开。在进攻战线的中心，利珀河所横贯的平原，尤其是利珀河和鲁尔河之间的平坦高原，为罗马主力军提供了最适当的作战线，占领了这个地方，他们就能把要征服的地区分成大体相等的两个部分，同时也就把布鲁克泰人和西干布尔人分离开来。从这个阵地出发，他们可以在左翼和舰队协同作战，在

^① 狄奥·卡西乌斯《罗马史》第54卷第33章。——编者注

右翼用从韦特劳开来的军队孤立易斯卡伏南人的片岩山地,在正面可以阻挡凯鲁斯奇人。阿利索要塞是这个作战线上最突前的设防的据点。它的位置,离利珀河发源地不远,不是在阿尔默河流入利珀河处帕德博恩附近的埃尔森,就是在利普施塔特的近旁,那里最近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罗马要塞。

第二年(-10年),卡滕人看到了共同的危险,终于和西干布尔人联合起来。但是德鲁苏斯进攻他们,至少把他们当中的一部分征服了。不过这种情况可能没有维持到度过冬季,因为次年(-9年)春天,德鲁苏斯再度进攻他们,并且一直推进到苏维汇人的地区(恐怕是图林根人的地区,根据弗洛鲁斯和奥罗修斯的说法,还推进到当时尚住在厄尔士山脉以北的马可曼尼人的地区),然后攻击凯鲁斯奇人,渡过威悉河,直到易北河后才退兵。他蹂躏了所有经过的地方,可是到处都遇到了激烈的抵抗。在归途中,他还没有达到莱茵河就死了,时年30岁。

我们在上面引用了狄奥·卡西乌斯的记载,这里再引斯维托尼乌斯的说法作为补充。他说,德鲁苏斯在莱茵河和艾瑟尔河之间开凿了一条运河,利用这条运河,他带着自己的舰队,通过弗里斯兰和弗莱沃(即弗利水道,现在是从弗利兰岛和泰尔斯海灵岛之间的须得海而来的一条航路)而到达北海。根据弗洛鲁斯的记载,德鲁苏斯沿着莱茵河建筑了50多个要塞,在波恩附近架了一座桥,并且加强了马斯河一线,这样,不论在高卢人暴动时或日耳曼人侵犯时,都能确保莱茵军团的阵地。至于弗洛鲁斯胡吹什么威悉河和易北河畔有要塞和防御设施,那纯粹是信口雌黄。德鲁苏斯在行军时可能在那里挖过一些工事,但是,他是一位精明的统帅,不会留下一兵一卒去驻守这些工事。相反,沿利珀河的作战线上,他建立了设防的兵站,这恐

怕是毫无疑问的。同样,在陶努斯山脉的通道上他也构筑了工事。

德鲁苏斯在莱茵河方面的后继者提比里乌斯,在下一年(-8年)渡过了莱茵河。德意志人都派了和谈代表,只有西干布尔人没有派遣。当时在高卢的奥古斯都表示,只要西干布尔人不派代表,他就拒绝进行任何谈判。最后,当西干布尔人也派来了代表,派来了像狄奥所说的“许多有名望的人物”的时候,奥古斯都却下令逮捕他们,并把他们监禁在帝国内地各城市中;“他们由于对此忧愤而自杀了。”^①第二年(-7年),提比里乌斯又率领军队来到了日耳曼尼亚,在这里,除去若干次无关大局的骚动以外,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镇压的了。关于这个时期韦莱是这样说的:

“提比里乌斯已经完完全全征服了这个地方(日耳曼尼亚),它同有纳税义务的行省几乎已没有什么差别。”^②

取得这种成功,不仅应当归功于罗马人的武器和提比里乌斯备受赞扬的外交“机智”,也许还应当特别归功于把德意志人移居到罗马地区莱茵河沿岸的做法。阿格利巴早已根据一向效忠于罗马人的乌比人的愿望,把他们迁到了科隆附近的莱茵河左岸。提比里乌斯强迫4万西干布尔人迁徙,从而相当长的时期内摧毁了这一强大部落的抵抗力。

提比里乌斯此后在较长时间内不问一切国事,我们也不知道,在这许多年间德意志发生了什么事情。在狄奥的片断记载中,谈到了多米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从多瑙河出发向易北河对岸的一次进

① 狄奥·卡西乌斯《罗马史》第55卷第6章。——编者注

② 盖尤斯·韦莱·帕特库尔《罗马史》(两卷本)第2卷第97章。——编者注

军。但是此后不久,大约在公元元年,德意志人举行了起义。根据韦莱的说法,罗马的最高统帅马可·维尼齐乌斯总的说来成功地进行了战斗,甚至为此还获得了奖赏。虽然如此,提比里乌斯不得不在公元4年,即在他被奥古斯都收为养子后不久,再次渡过莱茵河去重建那摇摇欲坠的罗马统治。他征服了住在莱茵河近处的堪尼内伐特人和哈图阿里人,以后又征服了布鲁克泰人,并且“争取到了”凯鲁斯奇人。韦莱参加了这一次和下一次的出征,但没有作更详细的叙述。暖和的冬天,使罗马军团能够继续活动到12月;以后,他们就住进了在德意志本土上的冬季兵营,大概在利珀河发源地。

次年(公元5年)的进军,是想完成对西部德意志的征服。当提比里乌斯从阿利索向前推进并在易北河下游打垮了伦巴德人时,舰队则沿海岸前进,并“争取到了”乔克人。在易北河下游,陆军和逆流而上的舰队会了师。由于这一次出征的得手,按照韦莱的说法,罗马人在北方的事业似乎已经大功告成了。第二年,提比里乌斯向多瑙河推进,这里,不久以前在马罗博杜斯率领下迁移到波希米亚来的马可曼尼人威胁着国境。马罗博杜斯在罗马受过教育,通晓罗马人的战术,他依照罗马人的榜样,组织了一支包括7万步兵和4000骑兵的军队。提比里乌斯在多瑙河从正面攻击这支军队,而森提乌斯·萨土尔尼努斯则率领军团从莱茵河出发,穿过卡滕人的土地去进攻敌人的背面和侧翼。这时,在提比里乌斯自己的背后,班诺尼人举行了起义。军队不得不撤回,并重新夺回自己的作战基地。战争延续了三年。班诺尼人被勉强打败以后,北德意志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再也不能作侵占马可曼尼人土地的打算了。

德鲁苏斯的征服计划,被不折不扣地坚持了下来;不过为确保执行这个计划,就必须由陆路和海路进军直到易北河边。在对马罗博

杜斯的作战计划中,流露出这样一种思想,就是要把国界推进到小喀尔巴阡山、理森山和易北河一直到该河的入海处。但是这在当时还是遥远的未来的事,而且不久就成为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了。沿韦特劳上去,当时罗马要塞究竟修筑到哪里,我们不知道。从种种迹象来看,这条作战线当时由于有像利珀河沿岸那条更重要的作战线而受到忽视。但是在这里,罗马人显然已经在相当宽阔的地域里安家落户。莱茵河右岸自波恩以下的平原,是属于他们的。鲁尔河以北至埃姆斯河对岸直到同弗里西安人及乔克人交界处的威斯特伐利亚平原,仍然处在军队的占领之下。在背后有巴达维人和弗里西安人,当时他们还是可靠的朋友;再往西去,是乔克人、凯鲁斯奇人和卡滕人,他们在屡次败北以后,在遭到伦巴德人也遭到的打击以后,可以说是相当驯服的。无论如何,在这三个民族那里,当时有一个相当有势力的派别,他们认为只有和罗马结成同盟才能得救。在南方,西干布尔人的武力刚刚被摧毁;他们在利珀河与鲁尔河之间和莱茵平原上的一部分领土已被占领,其余的领土则被罗马人建立在莱茵河、鲁尔河和韦特劳的阵地三面包围着,而且罗马队伍肯定相当经常地在这里开过。最近查明存在着通往利珀河发源地的罗马大道,它们经过高耸的山岭,从新维德通往锡格河,从多伊茨和诺伊斯通往伍珀河,至少到达贝格和马克的边界。再往前去,是赫蒙杜利人,他们在多米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的同意下,占领了马可曼尼人放弃的一部分土地,并和罗马人保持着和平交往。最后,德意志人各部落之间众所周知的纷争,使人们有理由期待,罗马人大概只想再进行几次这样的局部战争,以便把同盟者逐渐变成臣民。

罗马阵地的核心,是利珀河两岸直至奥斯宁山脉一带的土地。罗马军团在营垒的长期驻扎,使这里的人民习惯于罗马人的统治和

罗马人的习俗,用狄奥的话来说,罗马人的统治和他们的习俗使这些野蛮人“好像改造过来了”^①。在这里,围绕着守备部队的营盘,形成了这位历史学家谈到过的城市和市场;它们的和平交往,对于巩固外国人的统治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一切看来都很好,但是结局却全然两样。

昆提利乌斯·瓦鲁斯被任命为驻德意志部队总司令。这是一个突然开始进入衰败时代的罗马人,他反应迟钝,懒散疲沓,安于躺在他前辈们的桂冠之上,甚至想利用这些桂冠来谋取私利。

“他决不是一个不爱金钱的人,他管理过的叙利亚就是证明:他来到这个国家时是个穷光蛋,国家是富裕的,他离开这个国家时是个有钱人,国家却贫穷了。”(韦莱)^②

一般说他是个“性格温和”的人,可是这位性格温和的人一旦被派到一个很不容易勒索的地方,便勃然大怒,因为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搜刮的了。但是瓦鲁斯还是不肯罢休,而且采用了罗马总督和副总督们早就习以为常的方法。首先要尽快使德意志被占领的地方变成罗马的行省,以罗马的政权代替那原来处在军人统治下的本地政权,从而把这个国家变为国库和总督收入的源泉。因此,瓦鲁斯企图“用更快的速度和压力把德意志人改造过来”,他“像对奴隶一样对他们发号施令,像对臣民一样向他们索取金钱”(狄奥)^①。但他在这里所使用的屡试不爽的压迫和勒索的主要手段,是罗马行省总督的最高司法权。他在这里攫取了这种权力,并利用这种权力想把罗马

① 狄奥·卡西乌斯《罗马史》第56卷第18章。——编者注

② 盖尤斯·韦莱·帕特库尔《罗马史》(两卷本)第2卷第117章。——编者注

法强加到德意志人身上。

可惜，瓦鲁斯和他的传播文明的使命，走在历史前面差不多有1500年，因为大约经过了这么多的岁月之后，德意志方才成熟到能够“接受罗马法”的地步。事实上，罗马法及其对私有财产关系的经典分析，在德意志人看来纯属荒谬，因为他们那里正在发展中的少量私有财产，只在他们土地公社所有制的基础上才能拥有。同样，德意志人习惯于根据祖传的风俗，在公开的民众法庭上面，在几小时以内就可以自己作出判决，所以罗马审判程序上的隆重仪式、抗辩和无休止的延期，在他们看来，不外是一种拒绝审判的花招，而围绕着总督的一群辩护士和百般刁难的家伙，不过是一帮十足的强盗——实际上也正是如此。这样，德意志人就必须放弃他们同伴审判同伴的自由法庭，服从于这样一个人的武断判决，这个人用外国话来审理案件，至多是用他们所不熟悉的甚至是完全不适用的法律作为根据，而且他本人就是当事人。依照塔西佗的报道，自由的日耳曼人只有僧侣在极少情况下才有权殴打他们，他们只有在背叛自己的民族时才被处死，在其他的场合，任何过失，甚至杀人也可以通过罚款（杀人赔偿金）来赎罪，他们还惯于替自己及自己的亲属报血仇，这样的日耳曼人现在却要屈服于罗马扈从的鞭子和斧钺之下。而这一切并无其他目的，不过是为国库征收赋税，为总督及其帮凶们进行勒索和贿赂，从而为吸干这个国家的民脂民膏而大开方便之门罢了。

但是瓦鲁斯打错了算盘。德意志人不是叙利亚人。他用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罗马文明，只在一个方面使他们留下了印象。他只向那些被迫跟罗马结成同盟的各邻近部落表明，他们面临着何等不堪忍受的压迫，从而迫使他们达到从来没能达到的团结一致。

瓦鲁斯带着他的三个军团驻扎在德意志，阿斯普雷纳斯带着另外两个军团驻扎在下莱茵，离核心阵地阿利索只有五六天的行程。在这样的兵力面前，只有经过长期周密的准备而突然发动的决战，才有取得胜利的希望。这样，谋反的方法事先就决定了。负责组织这次叛乱的，是阿尔米纽斯。

阿尔米纽斯出身于凯鲁斯奇人的部落贵族，是似乎在本民族中当过扈从队首领的塞吉梅鲁斯的儿子，他青年时代曾在罗马军队里服役，通晓罗马人的语言和风俗，在罗马人的大本营里是一位常见的很受欢迎的客人，他的忠诚似乎不容许有丝毫的怀疑。直至袭击的前夕，瓦鲁斯还是坚决地信任他。韦莱说他

“是一位出身名门，勇敢、机敏，在野蛮人中无可比拟的青年，他的脸上和眼睛里焕发着智慧的火焰，在以前的多次战役里（即在对德意志人的战役里）他始终陪伴我们；他除享有罗马公民权外，已拥有罗马骑士的称号”。^①

但阿尔米纽斯远不止于此，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卓越的统帅。他一经决定要摧毁莱茵河右岸的罗马人的统治，就毫无顾虑地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那些早已为罗马势力所控制的凯鲁斯奇人率领军队的贵族，至少要大部分争取过来；卡滕人、乔克人，特别是直接处于罗马人压迫之下的布鲁克泰人和西干布尔人，也要拉来谋反。尽管瓦鲁斯的勒索已为此事作了准备，但一切都还需要时间；在这段时间内，需要麻痹瓦鲁斯。为了达到这种目的，就利用瓦鲁斯对诉讼的癖好缠住他，并以此狠狠地愚弄他。韦莱说道：

① 盖尤斯·韦莱·帕特库尔《罗马史》（两卷本）第2卷第118章。——编者注

“德意志人虽然非常野蛮,但是十分狡猾,他们似乎生来就好撒谎,谁要没有亲身经历过,对这简直不能相信。他们在瓦鲁斯面前玩弄一连串捏造的争讼把戏,时而毫无根据地互相控告,时而对瓦鲁斯表示谢意,说他以罗马人的公道裁决了一切,说他们的野蛮习气在新的、前所未闻的纪律和秩序的影响下已经开始减轻,说他们以前惯于用武力解决的纠纷,今后可以按照法律和公理来处理了。这样,他们把瓦鲁斯弄到过于大意轻信的地步,他竟然以为自己是个城市大法官在集会中审理案件,而不是在德意志腹地统率大军。”^①

公元9年的夏天,就这样过去了。为了更能保证成功,德意志人诱使瓦鲁斯向各处派遣军队,分散他的兵力;由于这个人的性格和他所处的环境,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狄奥说道:

“瓦鲁斯并不把它的军队,像在敌国所应该做的那样适当地集中起来,而是把他的士兵一队一队地供给要求援助者使用,这些人时而请求派兵防守某一据点,时而请求派兵兜剿盗匪,时而请求派兵护送运粮车队。”^②

这时,主要谋反人,尤其是阿尔米纽斯和塞吉梅鲁斯却始终在瓦鲁斯左右,并且常常跟他同桌吃饭。根据狄奥的说法,瓦鲁斯当时已经受到警告,可是他对他们太信任了。最后,到了秋季,当起义的准备业已全部完成而瓦鲁斯和他的主力部队已被引诱到凯鲁斯奇人的地方直到威悉河畔的时候,一个在比较远的地方爆发的假装的暴动,发出了行动的信号。当瓦鲁斯得到这个消息并且发出进军命令时,另一个凯鲁斯奇人首领、和阿尔米纽斯家族大概有世仇的塞盖斯泰斯向他提出了警告。瓦鲁斯不肯相信他。于是,塞盖斯泰斯又向瓦鲁斯建议,把他本人和阿尔米纽斯及其他凯鲁斯奇人首领都禁闭起

① 盖尤斯·韦莱·帕特库尔《罗马史》(两卷本)第2卷第118章。——编者注

② 狄奥·卡西乌斯《罗马史》第56卷第19章。——编者注

来,然后再出发,说事情的结局会证明谁是正确的。但是,甚至当瓦鲁斯出发,谋反者以集合同盟军然后同他会师为借口而留下来的时候,瓦鲁斯的信任仍然没有动摇。

确实发生了这样的事,但不像瓦鲁斯所期待的那样。凯鲁斯奇人的军队已经集合了起来。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击溃他们自己以前请求派遣来的驻扎在他们那里的罗马军队,然后从侧面袭击行军途中的瓦鲁斯。瓦鲁斯沿着崎岖的森林道路运动,因为在这凯鲁斯奇人的土地上,还没有建筑完好的罗马军用大道。遭到突然袭击的瓦鲁斯,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于是鼓起了勇气,并且从这时起表现出自己是个罗马军队的统帅,不过已经太晚了。他命令他的军队前后靠拢,并且在这狭窄的道路和茂密的森林所允许的范围內尽可能整顿和保护由妇女、儿童、车辆、牲畜等等组成的庞大的辎重队,然后向自己的作战基地进发,这个作战基地我们应该认为就是阿利索。倾盆大雨使遍地泥泞,阻碍了行军,由于辎重队过于庞大,队伍的秩序一再陷于混乱。在受到严重的损失以后,瓦鲁斯来到了一个满布密林的山岭,上面倒是有一块可以勉强扎营的空地;在这里,还相当有秩序地而且按照条令规定安营扎寨,构筑工事。盖尔马尼库斯的军队六年以后来到此地时,还清楚地看到这里“有三个军团工事”^①。瓦鲁斯针对这种情况,下了决心,命令把那些不十分必要的车辆和行李都在这里烧掉。第二天,他通过了一片比较开阔的地带,但又受到非常重大的损失,以致军队越走越散,晚上,再也无法有秩序地为兵营设防了。盖尔马尼库斯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一堵半倒的墙和一道浅浅的壕沟。第三天行军又走过了林木繁茂的山岭,瓦鲁

^① 见塔西佗《编年史》第1卷第61章。——编者注

斯和大多数军事长官在这里丧失了勇气。瓦鲁斯自杀了,军团几乎全部覆没。只有骑兵队,在瓦拉·努蒙尼乌斯的指挥下幸免于难;还有个别的逃亡步兵,像是逃到了阿利索而保全了性命。阿利索本身至少还守住了若干时候,因为德意志人还不会进行正规围攻。稍后,全部或部分守军突出了围困。惊慌失措的阿斯普雷纳斯,大概只作了一段短程的行军去收容突围的守军。布鲁克泰人、西干布尔人和一切较小的民族全都起义了,罗马的统治又被赶到了莱茵河彼岸。

关于这次进军所经过的地区,有许多争论。可能性最大的是:交战之前,瓦鲁斯在林特尔恩盆地,处于豪斯贝尔格与哈默尔恩之间的某处;在第一次袭击发生以后,就决定向代特莫尔德附近的德伦峡谷退却,这个峡谷形成一条经过奥斯宁山脉的平坦而宽阔的通道。这一般来说是传统的看法,和史料以及由战争局势所引起的军事要求都是符合的。瓦鲁斯达到德伦峡谷与否,还不能断定;但骑兵队也许还有步兵先头部队的突围,似乎说明了这一点。

三个军团被歼和整个德意志的西部暴动的消息,宛如晴天霹雳,惊动了罗马。眼看着阿尔米纽斯就要渡过莱茵河并把高卢煽动起来,马罗博杜斯又要从另一方面渡过多瑙河,并带动勉强被压服的班诺尼人加入翻越阿尔卑斯山的进军。意大利的力量已经枯竭,几乎再也派不出任何军队了。狄奥说,在市民中适于服军役的年轻人已经很少了,年岁较大的人又拒不当兵,因而奥古斯都就用没收财产的手段惩罚他们,甚至处死了几个人;最后,皇帝用被释放的奴隶及退伍军人勉强拼凑成几支队伍来保卫罗马,解除了他的德意志人禁卫军的武装,并把所有德意志人从城中驱逐出去。^①

^① 狄奥·卡西乌斯《罗马史》第56卷第23章。——编者注

但是阿尔米纽斯没有渡过莱茵河，马罗博杜斯也没有想要进攻，因此罗马可以毫无阻碍地发泄它对“背信弃义的日耳曼人”的愤怒。我们已经看到，韦莱说日耳曼人“十分狡猾，他们似乎生来就好撒谎”。斯特拉本也这样说，他不知道有什么“德意志人的诚实”和“罗马人的奸险”。恰恰相反。他说克尔特人是“单纯而不做假”，单纯到“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毫无预防地匆忙投入战斗，因而使他们的敌人容易取胜”，谈到日耳曼人时他却说：

“不相信他们，总是有好处的，相信他们，他们就会使你大倒其霉，凯鲁斯奇人就是例证，他们破坏了条约，以伏兵歼灭了三个军团及其统帅瓦鲁斯。”^①

至于奥维狄乌斯那种愤怒而渴望复仇的诗句，就更不必说了。这简直像是读到了沙文主义最盛行时代的法兰西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对于约克的背信弃义和萨克森人在莱比锡附近的叛卖行为¹⁶²，倾吐了满腔怒气。德意志人对罗马人的守约和诚实，早已有充分的认识，那是当凯撒在谈判和休战期间，突然袭击了乌西佩特人和邓克泰人的时候；那是当奥古斯都逮捕了西干布尔人的使节，但在他们未来以前，却又拒绝同各日耳曼部落进行任何谈判的时候。不择手段地欺骗敌人是一切征服民族的共同点，而且他们认为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一旦敌人也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便说那是背信弃义的叛卖行为。可是，用来奴役别人的手段，也应该允许别人用来摆脱奴役。只要一方面存在着剥削和统治的民族与阶级，另一方面存在着被剥削和被统治的民族与阶级，那么，使用暴力的同时使用权术对双方都是必要的，反对这样做的任何道德说教都是没有力量的。

① 斯特拉本《地理学》第7卷第1章。——编者注

尽管在代特莫尔德给阿尔米纽斯树起的凭想像雕成的立像十分幼稚(它只有一点好处,诱使路易-拿破仑在阿利斯附近的山上,给维尔琴盖托里克斯也建立了一个同样可笑的凭想像制作的巨大雕像),然而,有一点仍然是正确的,同瓦鲁斯的会战,是历史上最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之一。这次会战使德意志永远摆脱罗马而取得了独立。关于这种独立对德意志人本身是否有很大的好处,可以作许多翻来覆去的无益争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这种独立,整个历史就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虽然德意志人自此以后的全部历史,实际上几乎纯粹是一长串的民族不幸事件(这大部分要由他们自己负责),因而最出色的成绩也几乎每次都变成了人民的灾难,但是还应该说,德意志人在当时,在他们历史的初期,的确有过好运气。

凯撒用来征服高卢的,是垂死的共和国最后一批有生力量。军团从马略时代起就由招募来的雇佣兵所组成,但毕竟还是完全由古意大利人组成的;这种军团从凯撒以后确实在消亡,是随着古意大利人本身在那急剧扩大的大庄园及其奴隶经营的压迫之下走向消亡而消亡下去的。当时只有采用非常手段,才能把15万人,即25个步兵军团的完整队伍保持住。20年的服役期限并未遵守,服役期满的老兵被迫无限期地继续从军。这是奥古斯都一死莱茵军团就发生兵变的主要原因。塔西佗生动地描写了这次兵变,它在反叛与纪律的奇妙结合方面,使人鲜明地想起菲力浦二世的西班牙士兵在尼德兰的兵变。在这两次兵变中,受君主背约欺骗的军队表现了坚强的团结。我们看到,在同瓦鲁斯会战之后,奥古斯都企图恢复那早已弃置不用的旧的征兵法是怎样徒劳无功,他怎样不得不去找那些服役期满的士兵,甚至去找那些被释放的奴隶,因为他在班诺尼人起义时曾经一度招募过这些被释放的奴隶。以意大利自由农民的子孙来补充军

队,随着意大利自由农民本身的消失而停止了。每一批新加入军团的补充兵员的来到,都降低了军队的素质。不过还必须尽量爱惜这些军团,爱惜这个全部军事力量勉强维持下去的核心,因而辅助部队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了,他们打仗,在打仗时军团只用作后备队,因此,在克劳狄乌斯时代,巴达维人就能够说:行省是用行省的血来征服的。

这种军队对旧日罗马军队的纪律、坚定乃至旧日罗马的战术日益生疏,这种军队日益由行省人民所组成,最后甚至大部分由帝国以外的野蛮人所组成,这样的军队现在差不多已经不能用来进行大规模的进攻战争,很快连较大的攻击战也不能打了。军队的蜕化迫使国家转向防御,开头防御还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但很快就越来越变成消极的防御,最后,进攻的主动权完全落到德意志人手里,他们在从北海到黑海的整条战线上,渡过莱茵河和多瑙河不可遏止地冲杀过来。

当时,即使为了确保莱茵河一线,也要让德意志人在他们的本土上重新领略罗马武装的优势。为了这个目的,提比里乌斯急忙赶到莱茵河,以身作则再加上用严峻的刑罚重整军纪,将整装待发的部队的辎重控制到最必要限度,并两次向西部德意志进军(公元10年和11年)。德意志人回避决战,罗马人不敢在莱茵河右岸扎下冬季兵营。在阿利索和在埃姆斯河河口乔克人土地上建筑的要塞中,是否冬季也保有常驻的守备部队,关于这一点没有谁谈到过,但可以认为是实有其事的。

14年8月,奥古斯都逝世。莱茵军团既不能在服役期满以后退伍,也不能得到军饷,于是他们拒绝承认提比里乌斯,宣布德鲁苏斯的儿子——盖尔马尼库斯为皇帝。盖尔马尼库斯平定了暴乱,恢复

了军中的纪律,并且带领他们向德意志进行了塔西佗所描写的三次进军。这时阿尔米纽斯起来和他对抗,并且表现出自己是个完全可以和对手一比高低的统帅。他设法避免在开阔地区进行任何决战,尽可能阻碍罗马人的推进,并且只在罗马人不能展开的沼泽地带和狭窄小道上攻击他们。但是德意志人并不总是听他的话。好战的热情往往驱使他们在不利的情况下进行战斗,获得战利品的渴望,不止一次地使深深落入陷阱的罗马人幸免于难。这样,盖尔马尼库斯在伊迪斯塔维索谷地和安格里瓦里人边境墙附近取得了两次毫无战果的胜利,在归途中很费劲地从沼泽地的小路上逃了出来,在弗里西安海岸由于暴风雨和涨潮的缘故,战船和人员受到了损失,最后,在16年那次出征以后,他就被提比里乌斯召回了。罗马人深入德意志腹地的远征,从此便告结束。

但是罗马人深知,只有控制通向对岸的渡口,才能控制河流本身。罗马人决不是消极地撤退到莱茵河后面,而是把他们的防御转移到莱茵河右岸去。那掩护着利珀河下游、鲁尔河及伍珀河地区的大群罗马堡垒(这至少在个别的场合下,是和以后的区相对应的)和那从莱茵河扩建到马克伯爵领地边境的军用大道,令人推想到这里曾经有过一个防御工事体系。这些由艾瑟尔河直至锡格河的防御工事的走向,同法兰克尼亚和萨克森之间现在的分界线是一致的,只在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边界上有某些出入。这个在7世纪时大概还在某种程度上保有防御能力的工事体系,或许在莱茵河还阻止了当时正在挺进的萨克森人,这样便划定了他们这一个部落和法兰克人之间现在的边界线。这些极重要的发现是最近几年才在这里(由雅·施奈德)作出的;因此可以预料还会有进一步的发现。

逆莱茵河而上,逐渐扩建起一道长长的罗马边境墙,工程主要是

在多米齐安和哈德良时代进行的。它从新维德附近开始,通过蒙塔鲍尔高地,向埃姆斯伸展,在那里越过兰河,在阿道夫斯埃克附近顺着陶努斯山脉北坡折向西方,包括了韦特劳谷地中的格吕宁根这一极北点,从那里向东南偏南方向进展,在哈瑙以南到达美因河。从这里起,这道边境墙沿美因河左岸直到米尔滕贝格;从此沿着一条只有一个地方有曲折的直线到达霍亨施陶芬堡附近的符腾堡的雷姆斯河。在这里,大概是后来在哈德良时代继续修筑起来的边境墙折而向东,经过丁克斯比尔、贡岑豪森、埃林根和基普芬贝格,并在凯尔海姆上方的伊尔恩辛附近到达多瑙河。在边境墙后面,筑有较小的工事,在稍远的地方又有较大的要塞作为据点。这样封锁起来的莱茵河右岸的这块土地,至少从美因河往南一带,自从海尔维第人被苏维汇人赶跑以后便一直荒芜着;根据塔西佗的记载,这里住着高卢的流浪者和掉队的散兵游勇。

这样,在莱茵河、边境墙附近和多瑙河一带,逐渐出现了比较安定、比较平静的局面。虽然战斗与侵袭仍继续发生,但是双方领土的界线在几世纪当中都没有什么变化。

[民族大迁徙以前的进步]

在塔西佗和托勒密以后,关于德意志内地情况和事件的文字史料便中断了。但是我们却得到了其他一系列形象得多的史料,这就是可以归入我们研究的这个时代的许多古代出土文物:

我们已经看到,在普林尼和塔西佗时代,罗马人跟德意志内地的贸易几乎等于零。但是我们也看到,在普林尼的著作中隐约地提到一条在他那个时代有时就已利用过的、来自卡农图姆(对着马尔希河流入多瑙河的河口)的旧通商道路,这条道路沿着马尔希河与奥得河直通到琥珀海岸。这条道路,和通过波希米亚沿着易北河前进的第二条道路一样,大概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由伊特刺斯坎人使用着,而伊特刺斯坎人曾生活在阿尔卑斯山脉北面的谷地里,这已经被许多文物特别是哈尔施塔特出土的文物¹⁶³所证明。高卢人一侵入北部意大利,大概就终止了这种贸易(约在-400年)(根据博伊德·道金斯的看法^①)。如果这种看法得到证实,那么和伊特刺斯坎人发生这种以输入青铜器为主的贸易关系的,一定是在德意志人之前就占据着魏克瑟尔河和易北河这一地区的那些民族,也就是克尔特人,而德意志人的移入正像克尔特人向意大利的回流一样,恐怕都同这种贸

^① 威·博·道金斯《不列颠的原始人及其在第三纪的地位》1880年伦敦版第466—472页。——编者注

易关系的中断有关。看来只是在这种关系中断以后,才出现了从黑海沿岸的希腊城市沿着德涅斯特河和第聂伯河直通到魏克瑟尔河河口地区的那条更偏东的通商道路。在布龙贝格、厄瑟尔岛及其他地方所发现的希腊古币,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些古币中间,有的是在公元前4世纪也许是公元前5世纪在希腊、意大利、西西里岛、昔兰尼等地铸造的。

当迁徙的民族一旦安定下来的时候,奥得河和易北河沿岸中止不用的两条通商道路一定又自然而然地恢复了。在托勒密时代,看来不仅仅这两条道路,而且还有其他经过德意志的通道也重新得到了利用。在这方面,托勒密的证明中断的地方,出土的文物便接下去加以证明。

卡·弗·维贝格^①把文物仔细地分类比较,在这方面弄清了许多问题,并证明,在公元2世纪,人们又使用了通过西里西亚沿奥得河顺流而下和通过波希米亚沿易北河顺流而下的那两条通商道路。塔西佗早就提到波希米亚那些

“从我国行省去的战利品收购人和商人(*lixae ac negotiatores*),他们由于贪图金钱和忘了祖国而跑到敌人的地区和马罗博杜斯的军营去”^②。

赫蒙杜利人也是一样,他们老早就跟罗马人友好,而且按照塔西佗的说法,他们在德库马特地区^③和雷蒂亚直到奥格斯堡自由地来

① 《希腊人和罗马人通过北方商路同北方交往的研究》,德译者约·梅斯特尔夫《古典民族通过商业对北方各国的影响》1867年汉堡版。

② 塔西佗《编年史》第2卷第62章。——编者注

③ 德库马特地区(*Decumatländer*),拉丁文是 *agri decumates*,位于今莱茵河上游和多瑙河上游之间。——编者注

往,当然也把罗马人的货物和硬币从美因河上游运到萨勒河和威拉河去。再往前去,在罗马边境墙附近,在兰河河畔,也显示出有一条通往内地的通商道路的痕迹。

最重要的道路,看来始终是横贯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的那一条。马尔希河(或叫贝奇瓦河)和奥得河的分水岭,是惟一须要翻越的分水岭,它穿过一个开阔的丘陵地区,海拔在 325 米以下;铁路现在也通到这个地方了。从下西里西亚起,展开了北德的低平原,使得四面八方的道路,都能够弯向魏克瑟尔河和易北河。在西里西亚和勃兰登堡,公元 2 世纪和 3 世纪的时候,一定有罗马商人常住。在那里,我们不仅发现有玻璃罐、小泪壶和刻有拉丁文的骨灰坛(在西里西亚的特雷布尼茨附近的马瑟尔及其他地方),而且甚至有完整的罗马人的墓穴,内有放骨灰坛的壁龛(骨灰盒存放处)(在格洛高附近的纳海恩)。在梅克伦堡的瓦林附近,也发现了毫无疑问是罗马人的坟墓。出土的硬币、罗马的金属制品、黏土制的灯具等等文物,同样证明了贸易往来是沿着这条道路进行的。一般地说,整个德意志东部,罗马军队虽然从来没有踏上过,却到处散布着罗马的硬币和制品;这些制品上面,往往也可以通过在罗马帝国各行省发掘出来的文物上的同一工厂戳记所证实。在西里西亚发现的黏土制的灯具,和其他在达尔马提亚、维也纳等处发现的灯具上有同样的工厂戳记。例如在两个青铜花瓶上都有《*Ti. Robilius Sitalces*》这样的戳记,而其中一个是在梅克伦堡发现的,另一个是在波希米亚发现的;这证明了沿着易北河的这条通商道路。

但在奥古斯都以后的头几个世纪,罗马人的商船也来到了北海。在奥斯特河畔的诺伊豪斯(易北河口)所发现的、属于尼禄到马可·奥勒留时代的 344 个罗马银币和一条大概在那里遇难的海船的残

骸,都证明了这一点。沿波罗的海南岸也有一条海上航线,直通丹麦群岛、瑞典、哥得兰岛;关于这条航线我们还要作更详细的研究。托勒密和马尔齐安(约在400年)所说的各个沿海地点彼此之间的距离,只能以沿那一带海岸航行过的商人们的报告为根据。这些商人从梅克伦堡沿岸到但泽,并从这里到斯堪的亚。最后,在荷尔斯泰因、石勒苏益格、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丹麦群岛及瑞典南部发掘出来的罗马制造的许多其他文物,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些文物的出土地点,离海岸都很近,而且密集。

在同罗马人的这种贸易交往中,向德意志的武器输入占多大比重,很难判断。在德意志发现的大量罗马武器也可能是战利品,在边境上的罗马当局理所当然要竭力阻止把武器输送给德意志人。但是有些东西可能是从海路运去的,特别是运给较远的,例如基姆布里半岛上的民族。

通过上述各种不同道路而输入德意志的其他罗马商品,有家用器具、装饰品、梳妆用品等。家用器具之中,有青铜制的碗、尺子、杯子、容器、烹饪用具、筛子、匙子、剪子、勺子等以及个别的金银制的容器和传布很广的黏土制的灯具。青铜或金银制的装饰品有:颈饰、头饰、手镯、指环和同我们的胸针相似的扣子。在梳妆用品中,我们发现梳子、镊子、耳挖勺等,至于那些用途尚未弄清楚的物品就不谈了。这些制品,按照沃尔索的意见,大多数都是1世纪时在罗马流行的风尚的影响下产生的^①。

从凯撒时代甚至塔西佗时代的德意志人,到使用这些器具的这

^① 耶·雅·阿·沃尔索《当时文献中的北方各国古代史》,德译者约·梅斯托尔夫,1878年汉堡版第109页。——编者注

个民族(纵然可以认为,使用这些东西的只是少数豪门巨富)之间有很大的差距。塔西佗所说德意志人用以“充饥”的那种“既未细心烹调(*sine apparatu*),也不加调味品”的“简单食物”^①,现在则为另一种食物所代替,这种食物在烹饪上已经使用相当配套的设备,此外还有从罗马人那里弄来的各种适当的调味品。他们不再轻视金银饰品,出现了以金银饰品装饰自己的爱好;他们改变了漠视罗马货币的心理,出现了罗马货币流通于日耳曼尼亚全境的情况。至于说到这些梳妆用品,单单它们存在于一个民族那里,不就说明这个民族的习俗在开始彻底改变吗,虽然据我们所知,他们曾经发明了皂,但他们只懂得用皂来把头发染成黄色。

德意志人用什么东西向罗马商人换取所有这些现金和商品呢,对此我们首先是依靠古人的报道去了解,但是,我们已经说过,古人几乎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情况。普林尼说蔬菜、鹅毛、毛织品和皂是罗马帝国从德意志输入的物品。但是,这种在边境上刚刚开始贸易,不能为以后时代提供衡量的尺度。我们所知道的主要商品是琥珀,但琥珀并不足以说明那样遍及整个地区的贸易。构成德意志人主要财富的家畜,想必也是最重要的输出品,单是部署在国境上的军团,就保证了对肉类有大量的需要。在约尔南德时代由斯堪的纳维亚输往魏克瑟尔河河口、再由这里输入罗马帝国的兽皮和毛皮商品,一定在更早的时代,就从德意志东部的森林中找到了通往罗马帝国的道路。马戏团中的野兽,维贝格认为是罗马的航海者从北方运来的。但是除了熊、狼,也许还有野牛以外,那里什么也不能弄到,而狮子、豹,甚至熊,却可以比较近便和比较容易地从非洲和亚洲输入。

^①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23章。——编者注

是不是奴隶呢？维贝格最后近乎羞怯地问道。这想必被他言中了。事实上，除开家畜以外，奴隶是德意志为了和罗马取得贸易平衡而能够大量输出的惟一商品。单单意大利就在城市和大庄园使用着大量的奴隶人口，而这些奴隶中极少有人繁衍后代。全部罗马大土地占有经济都以大规模输入贩卖的战俘为前提，这些战俘是在日趋没落的共和国时代以及奥古斯都时代不断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涌入意大利的。现在这种现象已经结束。帝国已在固定的国境线上转向防御。从中可以征集大量奴隶的战败的敌人，在罗马部队那里越来越少了。必须向野蛮人购买奴隶。难道德意志人不能以贩卖者的身份出现在市场上吗？按照塔西佗的记载，德意志人早就在贩卖奴隶了（《日耳曼尼亚志》第24章），他们彼此之间经常发生战争，他们，例如弗里西安人，在金钱不足时就拿自己的妻子和儿女作为奴隶向罗马人交纳赋税，他们在3世纪的时候（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就已经在波罗的海上航行，并且从3世纪萨克森人的航行开始到10世纪诺曼人的航行为止，除开进行其他的海盗活动以外，他们在北海上所进行的远征，最直接的目的主要是猎取奴隶——猎取奴隶差不多专门是为了贩卖吧？就是这些德意志人，在几世纪之后，不论在民族大迁徙时期或者在他们斯拉夫人作战时期，不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奴隶掠夺者和奴隶贩卖者吗？除非我们必须认为，2世纪和3世纪的德意志人全然不同于罗马人的其他一切邻人，全然不同于自3、4、5世纪起他们自己的后代，否则我们就必须承认，他们也大规模地参加了向意大利贩卖奴隶的贸易，而这种奴隶贸易，当时被认为是相当体面的，甚至是光荣的。这样，那遮掩着当时德意志出口贸易的神秘面纱就脱落下来了。

我们在这里应该回过头来谈谈当时波罗的海上的贸易。在卡特

加特海峡沿岸几乎没有发现任何罗马文物,但在波罗的海南岸直至利夫兰内地,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在丹麦群岛的南岸及内部地区,在瑞典的南岸和东南岸,在厄兰岛和哥得兰岛,却有大量罗马文物。这些文物,绝大部分是属于所谓迪纳里时期的。关于这个时期,我们到下面再谈。这个时期一直延续到塞普蒂米乌斯·谢维路斯统治的初期,也就是说大约延续到公元200年。塔西佗已经谈到苏伊翁人,说他们因有桨划船的舰队而强大起来,他们都敬重财富。^①可见他们大概早就从事海上贸易了。当他们的航海事业首先在大小贝尔特海峡、厄勒海峡、厄兰海峡以及近海航行中发展起来以后,他们就一定要冒险到大海上去,企图把博恩霍尔姆岛和哥得兰岛纳入他们的活动圈内。他们在船只的操纵上一定很有把握,所以能够发展繁盛的贸易,而贸易的中心正是在离大陆最远的哥得兰岛。事实上,到1837年为止^②,在这里已找到了3200多个罗马银迪纳里,而在厄兰岛发现的约有100,在瑞典大陆不到50,在博恩霍尔姆岛200,在丹麦和石勒苏益格600(其中428个是在西兰岛的斯劳厄尔瑟惟一一次发掘中出土的)。对这些文物的研究证明,在161年马可·奥勒留即位当皇帝的那一年以前,流入哥得兰岛的罗马迪纳里很少,但从这一年起直到该世纪末,迪纳里却大量流入该岛。由此可见,在这个世纪的下半叶,波罗的海的航海事业一定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至于波罗的海的航海事业以前早就存在这一事实,已为托勒

① 塔西佗《日尔曼尼亚志》第44章。——编者注

② 汉斯·希尔德布兰德《瑞典的异教时代》,德译者梅斯托尔夫,1873年汉堡版。

密的记载^①所证明,根据这个记载,从魏克瑟尔河河口到斯堪的亚的距离是1 200—1 600 斯达第(30—40 地理里)^②。这两个距离,就布莱金厄的东端和厄兰岛或哥得兰岛的南端来说,大致都是不错的,要看是从里克斯赫夫特角量起,还是从诺伊法尔瓦塞尔或皮劳量起。这两个距离,完全跟其他关于沿德意志海岸到魏克瑟尔河口的距离的说法一样,都只能以海员的报道为根据。

在波罗的海上从事这种航行的不是罗马人,其证明有二:第一,罗马人关于斯堪的纳维亚的所有概念都很模糊;第二,在卡特加特海峡和挪威没有找到过一个罗马硬币。罗马人在奥古斯都时代到过基姆布里海角(斯卡恩),他们在这里看到了一望无际的海洋,这个地方看来始终是他们直接进行海上贸易的终点。由此可见,当时日耳曼人自己航行于波罗的海,进行贸易,并往斯堪的纳维亚运送罗马的货币和罗马的制品。而且事情也只能是这样。从3世纪的下半叶起,萨克森人的海上船队十分突然地出现在高卢和不列颠海岸,他们表现出来的那种勇气和信心,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取得的,事先要长期熟悉大海上的航行。而萨克森人(这个名称,我们在这里也是指基姆布里半岛上的一切民族说的,也就是说还指弗里西安人、盎格鲁人、朱特人)只能在波罗的海上练就这番本领。这是一个没有潮水涨落的大内海,大西洋上的西南风暴在北海大为减弱之后方才来到这里,这是一个伸展得很长的海域,有许多岛屿、海湾和海峡,从这一岸航行到那一岸,至多在短时间内看不到陆地,这真像是一个专为操练新发展起来的航海术而创造出来的水域。被认为是属于青铜时代的绘有

① 托勒密《地理学》第2卷第11章。——编者注

② 大约220—290公里。——编者注

许多桨划船的瑞典岩画,证明远古时这里就存在过海上航行。这里,在石勒苏益格的尼达姆沼地,发掘出一只长 70 英尺,宽 8 到 9 英尺的用柞木板造的船,该船建造于 3 世纪初,完全适合于大海航行。在这里,悄然无声中形成的造船技术和航海经验,使萨克森人和诺曼人有可能日后在大海中实行远征,而且由于这个缘故,日耳曼人直到现在还站在世界一切航海民族的前列。

直到 2 世纪末,流入德意志的罗马硬币,主要是银迪纳里(1 迪纳里 = 1.06 马克)。而且德意志人,正像塔西佗告诉我们的,喜欢他们早就熟悉的边缘为锯齿形并铸有双驾马车花纹的旧硬币^①。确实,在古代硬币中,可以找到很多这种 serrati bigatique^②硬币。这种古币含铜量只有 5%—10%。图拉真已经下令把 20% 的铜搀到银币里去;德意志人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是,当塞普蒂米乌斯·谢维路斯从 198 年起将搀入物提高到 50%—60% 的时候,就引起了德意志人的愤恨。在出土文物中,这种后期的劣质迪纳里只有在极例外的情形下才能看到,罗马货币的输入停止了。只有在君士坦丁于 312 年规定以金索里达(72 个索里达等于 1 罗马镑,即 327 克纯金,也就是说,1 索里达 = 4.55 克纯金 = 12.70 马克)为货币单位以后,货币才又开始输入,从这时起流入德意志的,更多是流入厄兰岛尤其是哥得兰岛的,主要是金币——索里达。这一罗马货币输入的第二个时期,即索里达时期,就西罗马硬币来说,一直继续到西罗马帝国的完结,就拜占庭硬币来说,一直继续到阿纳斯塔西乌斯(死于 518 年)时代。这些文物大部分是在瑞典、丹麦群岛发现的,有些是在德

①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 5 章。——编者注

② 锯齿形的、有双驾马车花纹的。——编者注

国波罗的海海岸上发现的；在德国内地发现的很少。

但是，塞普蒂米乌斯·谢维路斯及其后继者们的铸造伪币，还不足以说明德意志人和罗马人之间的贸易为什么突然中断。肯定还有其他的原因。原因之一显然是政治关系。从3世纪初，德意志人对罗马人开始了进攻性的战争，在250年前后，战争在从多瑙河河口直到莱茵河三角洲全线展开。在交战双方之间，当然不会有正常的贸易。但是，这种突发的全面的顽强的进攻性战争本身，需要加以说明。这些战争不是由于罗马的内部关系造成的；相反，帝国到处都进行着成功的抵抗，而且恰恰在这个时候，在各个极端混乱时期之间，还一再产生过几个强有力的帝王。可见，德意志人的进攻必然是由他们自己内部发生的变化引起的。在这里，能对此事加以说明的还是出土的文物。

在本世纪60年代初，在石勒苏益格的两处泥炭沼泽地发现了一些极重要的文物，这些文物由哥本哈根的恩格尔哈特细心地发掘，在经过许多波折之后，现在存放在基尔博物馆。这些文物和其他同类文物不同的地方是，其中的硬币可以相当确切地认定这些文物的年代。在南布拉鲁普附近的塔施贝格（丹麦人叫 Thorsbjerg）沼地出土的一批文物中，有37枚从尼禄到塞普蒂米乌斯·谢维路斯时期的硬币。在尼达姆沼地（这是一个淤塞的变成了泥炭沼泽的海湾）出土的另一批文物中，有34枚从提比里乌斯到马克里努斯（218年）时期的硬币。可见，这些文物毫无疑问是220—250年期间的东西。但是在这些文物中，不仅有罗马出产的东西，而且还有许多本地制造的物品，这些物品在含有铁质的泥炭水中几乎完整地保存下来了，从而令人惊奇地向我们说明了北德意志在3世纪上半叶时的金属工业、织布业和造船业的状况，而文物上的鲁恩文字，也说明了当时使用文

字的情形。

这里更使我们感到惊异的,是工业水平本身。精致的纺织物、美丽的平底鞋和制作精巧的鞍辔,都说明这个文化阶段比塔西佗时代的德意志人的文化阶段高得很多;而尤其使我们惊讶不已的,是本地的金属制品。

德意志人从亚洲故乡带来了使用金属的知识,这已为比较语言学所证明。他们也许还有过金属冶炼和金属加工的知识,但是当 they 和罗马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未必还具有这种知识。至少公元 1 世纪的著作家,没有任何关于在莱茵河与易北河间有冶炼和加工铁或青铜的说明,他们倒使人得出相反的结论。不错,塔西佗谈到哥汀人(在上西里西亚?)时说他们采铁,而托勒密也说到他们的邻人魁代人制造铁器,但这两种人可能是从多瑙河沿岸重新学到冶铁知识的。由硬币证明是属于 1 世纪的文物中,也没有任何本地制作的金属品,而只有罗马的金属品;如果德意志有自己的金属加工业,那么大量的罗马金属商品怎么还会运到那里去呢?诚然,在德意志也找到过古代的铸型、未完工的青铜铸件和青铜铸件废料,但一直没有发现可以证明年代的硬币;极有可能这些都是前日耳曼人时代的遗痕,是流浪的伊特刺斯坎人青铜铸工干活的残迹。不过,提出关于迁移来的德意志人是否完全忘掉了金属加工这样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全部事实都说明,德意志人在 1 世纪的确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从事金属加工。

但是此时塔施贝格沼地的文物突然出土了,并向我们表明,本地的金属工业有出乎意料的高水平。钮扣、饰有兽头和人头的装饰用的金属片,一顶除眼鼻口以外把全部面孔掩盖起来的银盔,用金属丝编的锁子甲——这需要付出极端艰苦的劳动,因为金属丝一定是预先锤打而成的(拔制金属丝到 1306 年才发明出来)和一个金发箍,至

于其他一些不知是否是本地所造的物品,就不在这里列举了。和这些出土物品相一致的,还有尼达姆沼地出土的、菲英岛沼地出土的以及在波希米亚(在霍若维采)出土(也是60年代初)的物品,如饰有人头的华美的青铜盘、钮扣和带扣等。这些物品同塔施贝格的完全属于一个类型,因此也必定同属于一个时代。

从3世纪开始,日益进步的金属工业一定遍及整个德意志地区;到了民族大迁徙时代,我们说,到了5世纪末,它已达到比较而言很高的水平。不单是铁和青铜,就连金银也经常加工制作了,用金片仿造了罗马硬币,对非贵金属镀金;还出现了镶饰、珐琅和金银丝编织的饰品;在造型往往很笨拙的整个物件上,可以看到有高度艺术性的、饶有风趣的、只是部分模仿罗马人的装饰——这主要是指都有一定特殊外形的钮扣、带扣和胸针说的。在英国博物馆里,来自亚速海滨刻赤的带扣和在英国发现的非常相像的带扣同时陈列着;它们可能是一个作坊的出品。这些制品的风格,虽然往往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但从瑞典到多瑙河下游,从黑海到法国和英国,基本上是一样的。德意志人金属工业的这个第一时期,在大陆上,随着民族大迁徙的告终和普遍信奉基督教而逐渐结束;在英格兰和斯堪的纳维亚,维持得稍久一些。

这种工业在6、7世纪时在德意志人中间传播得多么广泛,并在多大的程度上已作为单独的行业部门分离出来,可由《民族法》¹⁶⁴来作证。铁匠、刀剑铸造匠、金银匠常被提到,在《阿勒曼尼法典》中甚至还说到经过官府审查(publice probati)过的工匠。《巴伐利亚法典》对于在教堂、公爵庄园、铁匠铺或磨坊的盗窃行为课以更多的罚金,“因为这四种建筑物是公用的房子,而且总是开放的”。按照《弗里西安法典》,杀害金匠的杀人罚金要比杀害同一等级的其他人多四分之

一。《萨利克法典》规定普通农奴的价格是 12 索里达,而铁匠(faber)的价格则为 35 索里达。

关于**造船业**,我们已经谈过了。尼达姆沼地出土的船是桨划船;较大的是柞木船,要 14 对人划桨,较小的是用松木造的。桨、舵和水斗还都放在船里。只有在德意志人也开始在北海航行以后,他们似乎才从罗马人和克尔特人那里学会使用船帆。

制陶业,他们在塔西佗时代就已经有了,大概只是手工制陶。在边界上,特别是在士瓦本和巴伐利亚的边境墙以内,罗马人有大规模的制陶作坊,烧在陶器上的工人名字,证明在作坊里面也使用德意志人。关于釉和陶工旋盘的知识以及更高级的技能,必定通过他们而传入到德意志。横渡多瑙河而入侵的德意志人,也知道了玻璃制造法;在巴伐利亚和士瓦本,常常发现玻璃器皿、彩色的玻璃珠和金属制品上的玻璃镶饰,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在德意志制造的。

最后我们看到,鲁恩文字这时已经得到普遍的传播和采用。在塔施贝格出土的文物中,有刻着鲁恩文字的一个刀鞘和一个盾牌的带扣。这种鲁恩文字,我们在瓦拉儿亚发现的一个金戒指上,在巴伐利亚和勃艮第出土的扣子上,以及在斯堪的纳维亚最古的鲁恩文字石上都可以看到。这是一种比较完善的鲁恩文字母,日后便进而形成了盎格鲁撒克逊鲁恩文字;它比后来在斯堪的纳维亚占支配地位的北方鲁恩文字多七个字母,它也表明这是比流传到现代的、最古老的北方语语言形式更早的一种语言形式。再者,这是一种极端笨拙的文字体系,渊源于罗马字母和希腊字母,但是为了便于刻在石头上金属上特别是木杆上,这些字母已经作了改变。圆形的字体被有棱有角的字体所代替;只能写直画或斜画,不能写横画,这都是为了适应木材的纤维。正因为这样,在羊皮纸或普通纸上写这种有棱有角

的字体,是极不方便的。根据我们的判断,这种文字实际上几乎只适用于祭礼、巫术和题词方面,也许还适用于其他简短的通报;只要产生了真正书籍文字的需求(像在哥特人中和以后在盎格鲁撒克逊人中那样),这样的文字就被抛弃,重新改变希腊字母或罗马字母,而只保留个别鲁恩字母。

最后,德意志人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个时期里,在耕作和畜牧上一定也有显著的进步。限制在固定的住地使他们不得不这样做;不定居,人口就不可能激增,以致造成民族大迁徙时期人口泛滥。原始森林中的许多地段一定已经开垦了出来,从这里大概就产生了处在当时德意志境内的大部分“熟荒地”(即带有古代耕作遗迹的森林地段)。关于这方面的特别证据当然是没有的。但是,如果说普罗布斯在将近3世纪末时喜欢为他的骑兵挑选德意志人的马,如果说在不列颠的撒克逊地区排挤凯尔特人的小黑牛的大白牛,像现在所认为的那样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带去的,那么,这就证明在德意志人的畜牧并从而在耕作方面也发生了根本的革命。

我们研究的结论是:德意志人从凯撒到塔西佗时期,在文明方面有了显著的进步,而从塔西佗直到民族大迁徙开始(公元400年左右),他们的进步更要快得多。商业传播到了他们那里,并为他们运来了罗马人的工业品,因而至少也带来了罗马人的一部分需求;商业唤起了本地的工业,这个工业固然仿效了罗马人的榜样,然而它是完全独立发展起来的。石勒苏益格沼地出土的文物,代表这种工业的可以确定其年代的第一阶段;民族大迁徙时代的文物,代表有了更高发展程度的第二阶段。这里有一个特点是,更往西的各部落显然落后于内地各部落,尤其落后于波罗的海沿岸各部落。法兰克人和阿

勒曼尼人以及更晚的萨克森人所提供的金属商品,做工都不如盎格鲁撒克逊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和从内地迁来的各民族——黑海沿岸及多瑙河下游的哥特人、法兰西的勃艮第人。从多瑙河中游沿易北河与奥得河前进的那几条旧商道所发生的影响,在这里是不容否认的。同时,沿海居民逐渐变成了造船的能工巧匠和勇敢的水手;人口数目到处都在急剧增加;被罗马人限制起来的领土再也不够了。首先从遥远的东部发生了寻求土地的各部落的新的迁徙;最后,四面八方蜂拥的人群从陆地和海上不可遏止地涌向新的地区。

注释：德意志诸部落

罗马军队只沿着不多几条行军路线进入到大日耳曼尼亚腹地，而且时间不长，即使那时也仅仅达到易北河。在塔西佗时代以前，商人和其他旅行家到这里来的也很少，并且都没有深入内地。关于这个地方及其居民的报道如此贫乏和矛盾，是不足为奇的，令人惊讶的，倒是我们居然还有这么多的可靠史料。

在这些史料中，那两位希腊地理学家的著作，只有在得到完全证实的情况下才能无条件地加以利用。这两个人都是死啃书本的学者，现今大部分都已散失的材料的收集者，并且按照他们的方式和方法来说也是这些材料的考证整理人。他们没有对这个地方的阅历。斯特拉本竟然认为，那条罗马人十分熟悉的利珀河不是流入莱茵河，而是和埃姆斯河与威悉河平行流入北海。他相当诚实地承认，易北河彼岸的地区他是完全不熟悉的。他依靠那种使人经常想起本世纪初的朴素的理性主义，来解决他史料的矛盾和自己的疑问；而科学的地理学家托勒密，却企图把他史料中所述及的各个德意志部落，配置到自己地图上确定不移的经纬网中精密计算出来的位置上去。不管托勒密的全部著作对当时来说是如何辉煌，但他的日耳曼尼亚的地理却是误人不浅^①。第一，他所利用的资料大多是不确切和矛盾百

^① 托勒密《地理学》第2卷和第3卷有关日耳曼尼亚的章节。——编者注

出的,往往根本就是错误的。第二,他的图画得不对,河流和山脉大部分完全画错了。就好像有那么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柏林地理学家,在1820年前后,认为自己有责任把非洲地图上的空白填补起来,于是就调和了从莱奥(阿非利加的)以来一切史料中的报道,替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安排确定的走向,替每一个民族安排确切的居处。这种要做不可能做到的事的企图,必然使他所利用的史料错上加错。例如,托勒密把许多民族都弄重复了;易北河下游有拉科巴德人,莱茵河中游到易北河中游又有伦巴德人;他知道两个波希米亚,一个住着马可曼尼人,另一个住着拜诺卡姆人等等。塔西佗明确地说,日耳曼尼亚没有城市,但此后不到50年,托勒密居然能举出96处带有名称的地点。其中有些名称,也许是真的地名;托勒密看来从商人那里搜集了许多资料,当时已有许多商人到过德意志东部,而且熟知他们到过的那些地方的逐渐固定下来的名称。虚构的城市锡阿土坦德这个例子,说明其他一些名称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城市,我们这位地理学家大概是由于一个字体差的抄本之故,从塔西佗的“*ad sua tutanda*”[“为了保护它”]这句话中推敲出来的。同时,也有一些异常精确和具有极高历史价值的报道。例如,托勒密是古人中正确指出伦巴德人(诚然用了拉科巴德人这个走了样的名称)居住地方的唯一人物,那里巴登高和巴登维克这两个地名,今天还可以作为他们的证明。他同样正确指出印格里南人居住在恩格尔斯高,那里在莱茵河畔新维德附近,今天还有名叫恩格尔斯的地方。也只有他一个人举出过立陶宛的加林德人和苏迪特人的名称,这些人今天还继续居住在东普鲁士的加林登和苏道恩这两个地区。不过,这些例子只证明他的学问渊博,并不证明他其余的材料都是正确的。更糟的是,正文中,特别是最重要的关于名称的地方,字迹污损得非常厉害。

最直接的史料来源仍然是罗马人，特别是那些亲身到过德意志的罗马人。韦莱曾以士兵的身份到过德意志，而且也是以士兵的身份来写作的，他写作的神气，好像是一个 *grande armée* [大军]¹⁶⁵ 的军官在描写 1812 年和 1813 年的出征。他的叙述连发生战事的地点都无法确定，这在一个没有城市的地区是并不奇怪的。普林尼以骑兵军官的资格，也曾经在德意志服役，而且到过乔克人居住的海岸；他写了 20 本书来描述同日耳曼人进行的全部战争；塔西佗便是从这里汲取资料的。并且，普林尼又是与其说在政治、军事上，不如说在理论上，对于野蛮地区里的事物发生兴趣的第一个罗马人。^①因此，这位罗马的科学的百科全书家根据亲身调查写出来的关于德意志诸部落的报道，应该具有特别的价值。传统的说法认为，塔西佗到过德意志，但是我没有找到一个证据。不管怎样，他当时只能在莱茵河和多瑙河附近搜集直接材料。

为了使[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和托勒密关于各民族的分类彼此协调，并且使它们同其他混乱的古代史料也能协调，曾经有两本古典著作在这方面作了徒然的努力，这便是卡斯帕尔·措伊斯的《德意志人[和邻近各部落]》和雅科布·格林的《德意志语言史》。这两位天才的学者以及后来的研究者没有做到的事情，或许可以看成是利用我们现有的资料无法解决的。资料的不足，从这两位学者不得不建立一些错误的辅助性的理论这一事实中可以看出：措伊斯以为，一切有争议的问题的最后结论应该从托勒密的著作中去寻找，虽然恰恰是他比任何人都更尖锐地指明了托勒密的根本错误；格林以为，

① 在手稿上删去了下列字句：“除此以外，他还是一个自然科学家。”——编者注

推翻罗马世界帝国的那种力量,应该是在比莱茵河、多瑙河和魏克瑟尔河之间这一块地方更为广阔的地区成长起来的,因此多瑙河下游的北部及东北部的大部分土地,应该和哥特人及达克人的土地一起,同样看做是德意志人的。不论是措伊斯的或者是格林的假设,今天都已经过时了。

让我们把课题缩小,设法至少把几个问题搞清楚。如果我们能够把各民族更加概括地划分为少数几个大系统,那就可以为进一步详细研究打下一个牢靠的基础。在这里,普林尼的著作的那段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支点,这个支点的稳固性,在研究的进程中越来越证明是可靠的,无论如何,这比任何其他的说法所碰到的困难要小些,使我们所牵涉到的矛盾要少些。

但是,当我们以普林尼为出发点时,必须拒绝无条件地利用塔西佗的三位一体说和关于曼努斯的三个儿子印格、易斯克和赫明的古代神话。第一,塔西佗自己根本不知道怎样处理印格伏南人、易斯卡伏南人和赫米诺南人;他丝毫没有想把他所一一列举出来的民族纳入这三个大系统。第二,以后也没有一个人做成这件工作。措伊斯拼命要把他认为“易斯泰伏南人”的哥特各民族塞到那个三位一体说中去,因而造成了更大的混乱。他从来没有打算把斯堪的纳维亚人包括在这里面,他把他们构成为第四个大系统。但是这样一来,三位一体说就被打破了,正像普林尼的五个大系统使它被打破一样。

现在,让我们分别来看看这五个大系统吧。

一、*Vindili, quorum pars Burgundiones, Varini, Carini, Guttones* [温底尔人,其中包括勃艮第人、瓦林人、喀林人、古顿人]。

这里有三个民族:汪达尔人、勃艮第人和哥特人自己。关于他们,可以确定的是:第一,他们说的都是哥特方言;第二,他们当时都

住在日耳曼尼亚的最东部：哥特人住在魏克瑟尔河河口和河口彼岸；勃艮第人，按照托勒密的说法，住在瓦尔塔河流域直至魏克瑟尔河一带；汪达尔人，据狄奥·卡西乌斯（他像汪达尔人那样来称呼理森山）说，住在西里西亚。如果按照语言来称谓部落，我们自然可以无条件地把格林认为其方言均源出于哥特方言的一切民族，都列入这个哥特人的大系统中去，这首先包括普罗科皮乌斯明确认为说哥特语的那些地方，正如他认为汪达尔人也说哥特语那样。他们以前的居住地点我们毫无所知。我们也不知道海鲁莱人的住处，格林是把这些海鲁莱人同斯基尔人和鲁吉人一道算做哥特人的。普林尼提到过魏克瑟尔河畔的斯基尔人，塔西佗提到过紧靠哥特人住在海滨的鲁吉人。这样看来，哥特方言在汪达尔山（理森山）、奥得河和波罗的海之间，直到魏克瑟尔河及魏克瑟尔河彼岸，占据了一块相当完整的地区。

喀林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不知道。瓦伦人也引起了一些麻烦。塔西佗把他们和盎格鲁人一起列入供奉纳塔斯神的七个民族之中；关于这七个民族措伊斯已经正确地指出，他们具有印格伏南人所特有的外貌。托勒密却把盎格鲁人列为苏维汇人，这显然是错误的。措伊斯则把这位地理学家所写错的一两个名称，认作是瓦伦人，因而将他们安置在哈弗尔兰，并将他们划为苏维汇人。古代《民族法》¹⁶⁴的标题干脆就把瓦伦人和图林根人等同了，而法律本身却是瓦伦人和盎格鲁人共有的。根据上述种种情况来看，瓦伦人应该算是哥特大系统还是印格伏南大系统，仍然是一个疑问；不过他们已经完全消失，所以这个问题也就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了。

二、*Altera pars Ingaevones, quorum pars Cimbri, Teutoni ac Chaucorum gentes* [另一部分是印格伏南人，其中包括基姆布里人、条

顿人和乔克人]。

普林尼在这里首先指出,基姆布里半岛及易北河与埃姆斯河之间的沿海地带是印格伏南人的居住地。在上面举出的三个民族当中,乔克人毫无疑问是弗里西安人最近的亲属。弗里西安语今天还在北海沿岸、荷兰和西弗里斯兰、奥尔登堡的萨特兰和石勒苏益格的北弗里斯兰占着支配的地位。在加洛林王朝时代,从辛克法尔湾(这个海湾现在还是比利时的佛兰德和荷兰的泽兰省的分界线)到叙尔特岛和石勒苏益格的维德河的全部沿海地区,很可能在更北面的一大片土地上,差不多说的都是弗里西安语;只有在易北河河口两边直到海岸,才说萨克森语。

普林尼说的基姆布里人和条顿人显然是指当时基姆布里半岛的居民,可见他们都是属于乔克-弗里西安语族的。所以我们可以同措伊斯和格林一起,把北弗里西安人看做是古代半岛上的德意志人的直系子孙。

诚然,达尔曼(《丹麦史》)曾经断言,北弗里西安人是直到5世纪时才从西南方面迁移到半岛上来的。但是他没有给他的论断提出任何证据,而他的论断即使在以后的全部研究中也理所当然地完全没有为人注意。

我们是根据惟有为我们保留下古代文物并仍然存在的那个方言,来称呼整个语族的;在这个意义上,印格伏南语首先就等于弗里西安语。不过,印格伏南大系统的范围是否就以此为限呢?还是说格林把他不完全确切地称为低地德意志人的那些人,即除弗里西安人以外也包括萨克森人都归入印格伏南大系统,是正确的呢?

我们一开头就承认,普林尼把凯鲁斯奇人算做赫米诺南人,从而给萨克森人指定了一个完全不正确的位置。我们下面就会看到,事

实上,我们只好把萨克森人也算做印格伏南人,从而把这个大系统看作是弗里西安—萨克森大系统。

这里应当谈一谈盎格鲁人。塔西佗是假定地而托勒密则是肯定地把他们列为苏维汇人。托勒密把他们安置在易北河右岸,伦巴德人的对面;如果这个意见总还有若干正确成分的话,那也只能是指易北河下游的真正的伦巴德人。照这样说,盎格鲁人从劳恩堡大概一直到了普里格尼茨。后来我们就在半岛上发现了他们,那里保存有他们的名字,他们是从那里,和萨克森人一同迁往不列颠去的。他们的语言是现在盎格鲁撒克逊语的组成部分,而且是这种新形成的方言中明显的**弗里西安语**的那一部分。不管停留在德意志腹地的或者失散了的盎格鲁人发生了什么事情,单单这个事实就迫使我们把盎格鲁人算做印格伏南人,并且要把他们列入其中弗里西安人那一支。盎格鲁撒克逊语的与其说是萨克森语式的倒不如说大部分是弗里西安语式的整个元音系统,以及盎格鲁撒克逊语以后的发展在许多场合同弗里西安诸方言发展的异乎寻常地类似,这都应归功于这些盎格鲁人。在大陆上的各种方言中,弗里西安方言现在和英语最接近。例如,英语中喉音向啞音的转变,不是渊源于法语,而是渊源于弗里西安语。英语的 $ch = \text{ç}$ 代替 k , 英语在软元音前用 $dʒ$ 代替 g , 这可能渊源于弗里西安语的用 $tʒ$ 、 tj 代替 k , 用 $dʒ$ 代替 g , 而决不可能渊源于法语的 ch 和 g 。

我们应该把朱特人和盎格鲁人一同归入弗里西安—印格伏南大系统,不管他们是在普林尼时代或塔西佗时代就已经住在半岛上,还是后来才迁移到这里的。格林在塔西佗时代信奉纳塔斯神的一个民族——**欧多兹人**的名称中发现了他们的名称;如果盎格鲁人属于印格伏南大系统,那就很难把这一集团中的另一些民族划入其他大系

统。这样的话,印格伏南人可能已经伸展到奥得河口地区,他们和各哥特民族之间的空白也许就填补上了。

三、*Proximi autem Rheno Iscaevones (alias Istaevones), quorum pars Sicambri* [紧靠莱茵河居住的是易斯卡伏南人(或称易斯泰伏南人),其中包括西干布尔人]。

格林和他以后的其他人,例如瓦茨^①,都已经或多或少把易斯卡伏南人和法兰克人混同了起来。是语言把格林搞糊涂了。自9世纪中叶以后,法兰克王国的一切德意志语文献,都是用一种和古代高地德意志语无法区分的方言写成的;因此格林就认为,古代法兰克语在外国已经死亡,而在本国又被高地德意志语所代替,所以他最后把法兰克人划入高地德意志人之列。

作为对保存下来的语言遗物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格林自己指出:古代法兰克语具有独立方言的价值,它在萨克森语和高地德意志语之间保持着一种中间状态。关于这一点暂时说到这里就够了;法兰克语的情况还非常不清楚,对于它的比较详细的研究,只好留给另一个专门的注释^②。

无论如何,归易斯卡伏南部落所有的领土,对一个完整的德意志人的大系统来说,尤其对一个在历史上起过那样重大作用的大系统来说,显得是比较小了。这块领土,从莱茵高起,沿莱茵河伸展到迪尔河、锡格河、鲁尔河、利珀河和埃姆斯河的发源地直至内地,在北部弗里西安人和乔克人把它同海隔开,在莱茵河河口还住着其他系统(主要是卡滕人系统)残存的民族:巴达维人、哈图阿里人等。属于法

① 格·瓦茨《德国国家制度史》1844年基尔版第1卷。——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283—318页。——编者注

兰克人的，还有居住在莱茵河下游左岸的德意志人，是否还有特里包克人、梵乡人、涅麦特人？这块领土面积所以这样小，是因为克尔特人及凯撒时代以来的罗马人在莱茵河畔对易斯卡伏南人的扩张进行了抵制，同时在他们后面又住上了凯鲁斯奇人，而在侧面，则像凯撒所证明的那样，苏维汇人特别是卡滕人越来越排挤他们。当时在狭小的地面上拥挤着就德意志人的情况来说是稠密的人口，这可由不断向莱茵河对岸的推进来证明：起初是通过大批征服者，以后像乌比人那样用自愿向罗马领土移住的办法。由于同样的原因，罗马人老早就能够轻易地在这里而且也只有在这里把易斯卡伏南各部落为数可观的部分迁移到罗马领土上去。

在关于法兰克方言的注释中所要进行的研究，将提供证明，法兰克人是德意志人的一个内部划分为许多不同部落的独立集团，他们讲一种分裂为各式各样土话的特殊方言，总之，他们拥有一个日耳曼人大系统的一切特征，这正是为了说明他们和易斯卡伏南人是同一类人所需要的。有关属于这个大系统的各民族的情况，雅·格林把必要的话都已经说了。除去西干布尔人以外，他还把乌比人、哈马维人、布鲁克泰人、邓克泰人和乌西佩特人都包括在这个大系统里面，这些人也就是住在我们前面称之为易斯卡伏南人地区的莱茵河右岸的各民族。

四、*Mediterranei Hermiones, quorum Suevi, Hermunduri, Chatti, Cherusci* [住在这块土地中央的是赫米奥南人，其中有苏维汇人、赫蒙杜利人、卡滕人、凯鲁斯奇人]。

雅·格林已经认为赫米诺南人（他采用了塔西佗的比较正确的写法）就是高地德意志人。苏维汇人的名称，按凯撒的说法是包括他所知道的一切高地德意志人在内的，现在他们开始分化。图林根人

(赫蒙杜利人)和黑森人(卡滕人)成了独立的民族。其他的苏维汇人还没有分离出去。如果我们把接下来的几百年间已经消失的许多神秘名称,暂且看做无法解释的而撇开不谈,那么这些苏维汇人还是应该包括下面三个以后出现在历史上的讲高地德意志语的大部落:阿勒曼尼-士瓦本人、巴伐利亚人和伦巴德人。伦巴德人我们确切知道住在易北河下游左岸的巴登高附近,他们离开了其他同部落的人,插在印格伏南人各民族中间;他们这种须要经过长期斗争才能保持下来的孤立地位,塔西佗作了出色的描述,但他不知道其原因何在。我们从措伊斯和格林的著作问世以来,同样也知道巴伐利亚人以马可曼尼人的名称居住在波希米亚,而黑森人和图林根人则住在他们现今居住的地方和南面毗邻的地区。既然在法兰克人、黑森人和图林根人以南,就是罗马的领土,那么除去易北河与奥得河之间、今日的勃兰登堡与萨克森王国的这一片土地以外,就没有其他的地方留给士瓦本-阿勒曼尼人了;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种苏维汇民族——色姆诺南人。士瓦本-阿勒曼尼人和这些色姆诺南人可能是同一类人,他们在西北和印格伏南人为邻,在东北和东面同各哥特部落接界。

到此为止,一切都进行得相当顺利。但是普林尼却把凯鲁斯奇人也算做赫米诺南人,他在这里肯定是疏忽了。凯撒已经把凯鲁斯奇人和苏维汇人明确地区别了开来,他还把卡滕人也算做苏维汇人。塔西佗也不知道凯鲁斯奇人和任何高地德意志人部落之间有着共同性,托勒密同样不知道,虽然他甚至把苏维汇人的名称扩大到了盎格魯人的身上。根据凯鲁斯奇人填补了南面的卡滕人与赫蒙杜利人和东北面的伦巴德人之间的空间这一事实,还远远不足以做出结论,说他们之间有较近的部落亲属关系;虽然,也许正是这一事实,在这里

把普林尼引入迷途。

就我所知，在值得重视其意见的研究者中，没有一个人把凯鲁斯奇人算做高地德意志人。因此，只剩下一个问题：把他们归入印格伏南人还是归入易斯卡伏南人？留传给我们的少数名称，都带有法兰克语的特征：日后用 *h* 的地方用 *ch*，例如 *Cherusci*, *Chariomerus*，用 *i* 的地方用 *e*，例如 *Segestes*, *Segimerus*, *Segimundus*。但是，罗马人从莱茵河方面接受的几乎全部的德意志人名称，看来都是由法兰克人以法兰克语的形式留传给他们的。除此以外，我们不知道，在 7 世纪时法兰克人还发 *ch* 音的这个第一辅音音变的喉音送气音，是否 1 世纪时在所有西部德意志人中间都按 *ch* 发音，而只在以后才软化为大家所共有的 *h* 音。此外，我们也找不到凯鲁斯奇人同易斯卡伏南人之间有任何部落亲属关系，像西干布尔人收容从凯撒那里逃走的乌西佩特人和邓克泰人的残余部分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亲属关系。在瓦鲁斯时代被罗马人占领的并被他们当做行省来对待的莱茵河右岸的领土，也同易斯卡伏南人—法兰克人的领土相吻合。这里有阿利索和其他罗马要塞；在凯鲁斯奇人的土地上，看来顶多是奥斯宁山与威悉河之间的一片土地实际上被罗马人所占领；这块罗马领土的那一面，住着卡滕人、凯鲁斯奇人、乔克人、弗里西安人，这是些因畏惧而被控制住的不大可靠的同盟者，但是在他们的内部事务上却是自主的，而且摆脱了常驻的罗马人的守备部队。罗马人在这个地区遭到抵抗增强时，总是暂时地将自己的侵略行为停止在部落的边界上。凯撒在高卢也就是这样做的；他停留在比利时人的边境上，只是当他相信所谓克尔特人的高卢可靠以后，才跨过这条边境线。

因此，只能依据雅·格林和一般人的观点，把凯鲁斯奇人和跟他们有最近亲属关系的一些邻近的小民族都划归萨克森部落，从而划

归印格伏南人。说明上述观点的还有,正是在古代凯鲁斯奇人的土地上,和流行在威斯特伐利亚的 *o* 相比较,古代萨克森语复数第二格和阳性弱变化中的 *a*,被最纯正地保留了下来。这样一来,一切困难都迎刃而解了;印格伏南大系统也和其他大系统一样,有一块相当完整的领土,只是赫米诺南大系统的伦巴德人,稍微向这块领土内突进了一点。这一大系统的两大支派之中,弗里西安-盎格鲁-朱特人这一支派,占了沿海一带,并且至少占了半岛的北部和西部,而萨克森人这一支派,则占据了内地,可能当时也已经占据了北阿尔宾吉亚的一部分,而在此后不久托勒密在那里第一次提到了 *Saxones* [萨克森人]。

五、*Quinta pars Peucini, Basternae contermini Dacis* [第五个大系统是和达克人为邻的佩夫金人及巴斯泰尔人]。

我们对这两个民族所掌握的一点点知识以及巴斯泰尔人这一名称形式本身,都说明他们是哥特人的同族人。普林尼之所以把他们看成是一个特殊部落,大概是由于他是通过希腊人的介绍从多瑙河下游得到有关他们的资料的,而他对居住在奥得河和魏克瑟尔河的各哥特民族的知识,则是在莱茵河和北海沿岸取得的;因此他就忽略了哥特人和巴斯泰尔人之间的联系。巴斯泰尔人和佩夫金人,都是留在喀尔巴阡山和多瑙河河口长时间内还过着流浪生活的德意志民族,他们为以后的大哥特王国作了准备,而他们就在这个王国里面消失了。

六、希列维昂人。普林尼把日耳曼人中的斯堪的纳维亚人都列在这个总名称的下面。我现在提及他们,只是为了顺序的关系,也为了再度说明:古代的所有著作家都只把群岛(其中也包括瑞典和挪威)划归这个大系统,而把他们排除在基姆布里半岛之外。这样,我

们就有了操五种基本方言的五个日耳曼人大系统。哥特大系统住在东部和东北部。这一大系统的阳性及中性复数第二格都有 *e*, 阴性都有 *o* 和 *e*; 弱变化阳性都有 *a*。现在时(直陈式)变位的词形变化形式, 考虑到辅音音变, 同那些有原始亲属关系的语言, 特别是同希腊语和拉丁语仍然有紧密的联系。

印格伏南大系统住在西北部。这一大系统的复数第二格都有 *a*, 弱变化阳性也有 *a*; 在现在时直陈式中, 所有三种人称的复数, 都有完全失去了鼻音的 *d* 或 *dh*。这个大系统分为两个主要支派——萨克森人和弗里西安人, 但在盎格鲁撒克逊部落里面, 他们又合而为一。在弗里西安人这一支派里面, 又加上了斯堪的纳维亚大系统; 他们的全部名词变化所表现出来的情形是: 复数第二格是 *a*, 弱变化阳性是 *i*, 这是从 *a* 软化而来的。在现在时直陈式中, 单数第二人称最初的 *s* 变为 *r*, 复数第一人称保留 *m*, 第二人称保留 *dh*, 其他的人称也有或大或小的变化。

和以上三个大系统相对的是两个南方的大系统: 易斯卡伏南大系统和赫米诺南大系统, 在以后的表达方式中, 称他们为法兰克人大系统与高地德意志人大系统。这两个大系统所共同的, 是弱变化阳性是 *o*; 极可能复数第二格也是 *o*, 虽然这在法兰克语中不能得到证实, 而且从最古的西部(萨利克人的)纪念碑上可以看出, 复数第四格是以 *as* 结尾的。就我们所能提出的证据证明这一点适合法兰克语而言, 两种方言在现在时变位中是互相接近的, 它们在这方面和哥特语一样, 同那些有原始亲属关系的语言有密切的联系。但是, 整部语言史(从最古的法兰克语极显著的和古老的特点起, 直到这两种方言的现代方言之间的巨大差别止)都不允许我们将这两种方言合而为一; 这正如这两个民族本身的全部历史, 不许可我们把这两个大系统

合并为一个大系统一样。

我在上述整个研究中,只注意到词形变化形式而没有注意到音素的相互关系,这是由于在1世纪和我们最古的语言资料编成的时代之间,音素的相互关系(至少在许多方言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德意志,我只须提一提第二辅音音变就够了;在斯堪的纳维亚,古代歌谣的头韵表明,从编成歌谣到用文字写下歌谣这段时期里,语言发生了何等巨大的变化。在这一方面还需要做的工作,德国的专业语言学家们将来大概都会做到的;在这里去做就只会使这个研究毫无必要地复杂化。

弗·恩格斯
法兰克时代¹⁶⁶

弗·恩格斯写于 1878 年中—
1882 年初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37 年俄文第 1
版第 16 卷第 1 分册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5 卷翻译

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的 土地占有关系的变革

马尔克制度,直到中世纪末,依然是德意志民族几乎全部生活的基础。这种制度在存在了1500年之后,终于由于纯粹的经济原因而逐渐没落下去了。它之所以瓦解,是因为它不再适应经济上的进步。我们将在下面探讨它的衰败以及最终的灭亡。我们将会看到,这一制度的残余在今日还继续存在。

但是,马尔克制度能够维持这么久,是靠了损害它的政治意义。它在数百年间曾经是体现各日耳曼部落的自由的形式。后来它却变成了上千年之久的人民受奴役的基础。怎么可能这样呢?

最早的公社,我们知道,是包括整个民族的。全部占有的土地当初都属于整个民族。以后,彼此之间具有较近亲属关系的一个区的全体居民,成为他们所移住的地方的占有者,而民族本身就只有处置余下来的无主地带的权利了。区的居民又将他们的耕地马尔克和林地马尔克让给各个农村公社(这些农村公社同样是由近亲组成的),同时也把剩余的土地留给区支配。干村在从原始村的旧马尔克中分出土地、成立新的移民村时,情形也是一样。

血统联盟在这里,也和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是整个民族制度的基础;而随着人口数目的增加和民族的继续发展,这种联盟越来越被

人们忘却了。这种情形首先表现在整个民族上面。共同的世系越来越不被认为是实际的血缘亲属关系；关于这一方面的记忆越来越淡薄了，余下来的仅仅是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方言。相反，在一个区的居民内部，血统联盟的意识自然保存得较长久些。因此，民族便成为一种大体上牢固的区与区的联盟了。民族大迁徙¹⁶⁷时代的德意志人，大概就是处在这种状态之下的。阿米亚努斯·马尔采利努斯曾经明白地讲到阿勒曼尼人的这种情形。在《民族法》上，这种情形也是随处可见。萨克森人在查理大帝时代还是处在这个发展阶段；而在弗里西安人那里则一直延续到弗里西安自由丧失的时候。

但是，向罗马境内的迁徙把区的血统联盟也破坏了，而且必然要破坏它。虽然原来打算以部落和氏族为单位来定居，但这是做不到的。长期的流动，不仅把各个部落和氏族，甚至把整个整个的民族都混合了起来。而各个农村公社的血统联盟，也是费了很大力气才维系下来。这些农村公社从而成为构成民族的实际政治单位了。罗马领土上的新区，一开始就成为多少是任意划定的（或者是由业已存在的的关系所决定的）司法区，或者很快就变成这种司法区。

这样，民族就溶化在小的农村公社的联盟之中，而在这些农村公社之间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任何经济上的联系，因为每个马尔克都是自给自足的，它们自己的需要由自己生产来满足，并且邻近的各个马尔克的产品，差不多是完全相同的。因而它们之间的交换，便几乎不可能了。这些小的公社的经济利益诚然都是相同的，但正因为这样，它们彼此之间缺乏共同的经济利益。由于民族[Volk]是由这类清一色的小公社组成的，因而，一个不是从公社内部产生、而是跟它们格格不入地对立着的、并且不断地剥削它们的国家政权，便成为民族[Nation]继续生存的条件了。

这种国家政权的形式,也是由公社当时的存在形式决定的。有的地方,如在亚洲雅利安民族和俄罗斯人那里,当国家政权出现的时候,耕地还是公社为共同的利益耕种的,或者只是在一定时间内交给各个家庭使用,因而还没有产生土地私有制,在这样的地方,国家政权便以专制政体的形式出现。相反地,在德意志人侵占的罗马领土上,我们看到,耕地和草地的各个份地,已成为自主地,成为占有者的只须负担普通的马尔克赋役的自由财产了。我们现在要研究一下,在这种自主地的基础上,一种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是怎样产生的,这种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又怎样——这是常见的历史的讽刺——最终瓦解了国家,而且在它的典型形态之下,消灭了一切自主地。

自主地使土地占有的原始平等不但可能而且必然转化为它的对立面。德意志人的自主地,在旧日罗马领土上一出现,就变成了跟它同时并存的罗马人的地产所早已变成的那种东西,即变成了商品。财产分配日益不均,贫富对立日益扩大,财产日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这是一切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基础的社会的严酷无情的规律;虽然这一规律在近代资本主义生产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绝非一定要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才起作用。所以,从自主地这一可以自由出让的地产,这一作为商品的地产产生的时候起,大地产的产生便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可是,在我们正在考察的这个时代,耕作和畜牧是具有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地产及其产品占当时财富的绝大部分。当时存在的各种动产,自然而然跟随地产之后,同地产一样地日益聚积在同一些人手里。工业和商业在罗马崩溃时期就已经衰落了,德意志人的侵略几乎把它们全部摧毁。留下来的大半都由非自由人和外国人经营,并且仍然是被人轻视的行业。这里随着财产不均的出现而逐渐形成的

统治阶级,只能是一个大土地占有者阶级,他们的政治统治形式也只能是一种贵族统治形式。因而,当我们就要看到,在这一阶级产生和形成的过程中,起作用的往往是,而且仿佛主要是政治手段即暴力和欺诈时,我们就不要忘记,这些政治手段,只是在促进和加速一个必然的经济过程。诚然,我们也会常常看到,这种政治手段如何阻挠经济的发展;这样的事情是相当经常的,而且每次都发生在不同的当事人把这样的政治手段,朝着相反的方向、或者彼此交错的方向运用的时候。

这一个大土地占有者阶级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

首先我们知道,就是在法兰克人侵占高卢以后,那里仍然保留着好多罗马的大土地占有者,他们大都让自由佃农或依附佃农耕种他们的田地并缴纳地租(Canon)。

其次,我们也看到了,王权如何通过侵略战争而在所有移居的德意志人中间成为一种经常的制度和实际的权力;它如何把旧日的全民族的田地变成王室领地,如何把罗马的国有土地也并入自己的财产。在瓜分帝国引起的多次内战期间,由于大量没收所谓造反者的土地,王室领地还不断地增加。不过它增加得快,挥霍得也快;因为国王不断赠送土地给教会和私人,给法兰克人和罗马人,给他的侍从(Antrustionen)或其他的宠幸者。当豪族、巨室、地主、官吏和军事首领所组成的统治阶级在内战中和由于内战的影响而开始形成时,邦君也通过赠送土地来购买他们的支持。罗特^①无可辩驳地证明,所有这一切在绝大多数场合下,都是真正的馈赠,赠送的土地成为自由

^① 保·罗特《从上古到10世纪的采邑制度史》1850年埃朗根版。这是在毛勒以前时期出版的最好著作之一,我在这一章中要多次引用。

的、世袭的、可以出让的财产，直到查理·马特，在这方面才有了改变。

查理掌权的时候，诸王的权力已经全部崩溃，但是还远未因此而被宫相的权力所代替。在墨洛温王朝时由于牺牲王室而创造出来的豪绅显贵阶级，千方百计地促进了王权的毁灭，但绝不是为了屈从于宫相，屈从于他们同一等级的人。恰恰相反。掌握着整个高卢的，正如爱因哈德所说的，是这些

“暴君，他们到处都想进行统治”(tyrannos per totam Galliam dominatum sibi vindicantes)¹⁶⁸。

除去世俗的豪绅显贵以外，主教们也是这样做的；他们在许多地方，攫取了对于周围伯爵领地和公爵领地的统治权，并受到豁免权和教会的牢固组织的保护。随着帝国内部的瓦解，外敌纷纷入侵；萨克森人侵入莱茵法兰克尼亚，阿瓦尔人打到巴伐利亚，阿拉伯人越过比利牛斯山脉而达到了阿基坦。在这种情势之下，仅仅镇压内乱、驱逐外敌，不能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把已受贬抑的豪绅显贵或者把由查理委派去接替他们的后任，跟王室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因为他们旧日的权力是以大土地占有制为依据的，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要的条件就是要根本变革土地占有关系。这一种变革是加洛林王朝的代表作。这一变革的特点还在于：选择这一手段，是为了统一帝国，将豪绅显贵跟王室永久结合起来，从而加强王室，而结果却导致王室的彻底削弱、豪绅显贵的独立和帝国的瓦解。

为了弄清查理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手段，我们必须先研究一下当时教会的占有关系，因为这是当时土地关系的本质因素，在这里，

是不能忽略过去的。

在罗马时代,教会在高卢就已经有了不少的地产,由于在捐税和其他赋役方面享有重大的特权,这些地产的收入就越加多了。不过,高卢教会的黄金时代,是在法兰克人信奉基督教以后才开始的。国王们彼此竞赛,看谁赠给教会的土地、金钱、珠宝以及教堂用具等等最多。希尔佩里克就常常说(见图尔的格雷戈里):

“看,我们的国库变得多么空虚!看,我们所有的财物,全部送给教会了!”^①

贡特朗(他是教士们的宠儿和奴仆)在位时,馈赠简直是漫无止境了。这样一来,被加上造反罪名的自由法兰克人的地产,在被没收以后,大部分变成了教会的财产。

国王怎样,人民也怎样。不论贫富,都没完没了地向教会捐赠。

“神奇地治好了一种真正的或臆想的病痛,实现了一种宿愿,例如生了一个儿子,避免了一种危险,都要给那个教堂捐赠,因为该教堂的圣者表现得乐于助人。在上下层居民中,流行着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向教会捐赠可以求得赦罪,所以,经常的慷慨施舍,就被认为更加必要了。”(罗特,第250页)

除此以外,还有豁免权,它在接连不断的内战、抢劫、没收的年月里,保护教会财产,免遭暴力的侵犯。许多小百姓们也都认为,如果缴纳适量租金而保留他们的使用权,把他们的财产让给教会是妥当的。

但是,这一切对虔敬的教士来说,还是不够的。利用万劫不复的地狱刑罚作威胁,他们可以合法地勒索到越来越多的捐赠。查理大帝早在811年的亚琛敕令¹⁶⁹里,就责备过他们这一行径,并且还责

^① 转引自图尔的格雷戈里的著作《法兰克人史》第6册第46章。——编者注

备他们

“引诱人们发伪誓作伪证，以增加你们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财富”。

他们还诈取不合法的捐赠，因为他们确信，教会除了法律上的特权地位，还拥有足够的手段嘲弄司法。在 6、7 世纪，高卢的宗教会议，对于一切反对给教会捐赠的人，几乎没有一次会议，不是以逐出教会相威胁的。甚至手续上无效的捐赠，通过这一途径也就变为有效，个别僧侣的私人债务，也就赖掉不还了。

“为了不断唤起人们捐赠的兴趣，我们看到，他们采用的手段实在卑鄙。描绘天堂之乐和地狱之苦已经不再见效的时候，他们就从遥远的地方搬来圣徒的遗骨，举行巡回展览，建造新的教堂；这在 9 世纪简直成为一种正式的营业部门了。”（罗特，第 254 页）“苏瓦松的圣梅达尔德修道院的使者，在罗马费了极多的周折，乞求到圣塞巴斯蒂安的遗体，并将格雷戈里的遗体也一同偷走。当这两具遗体放在修道院里的时候，跑来瞻仰新到的圣徒的人，多得像蝗虫一样布满了那个地区，对于求助者，不是一个一个治疗，而是成群结队一起治疗。结果是，修道士们用斗来量金钱，量了有 85 斗，修道院的黄金库存量达到 900 镑。”（第 255 页）

欺骗、魔术、死人特别是圣徒的显灵，都被教会用作骗取财物的手段。最后但也是最重要的方法是假造证件。这种事——我们还是让罗特说话吧——

“许多宗教界人士都在大规模地干……这种营业老早便已开始了…… 这样的营业规模到底有多大，可以从我们所搜集的大量假造文件的数目中看出来。在布雷基尼所引用的 360 件墨洛温王朝文书中，约有 130 件绝对是假的。……兰斯的欣克马尔就利用过雷米吉乌斯的假遗嘱为他的教会弄到许多财产，而这些财产在真的遗嘱里面根本没有提到过，虽然真遗嘱从未遗失，欣克马尔又清楚地知道前者是伪造的。”

甚至教皇约翰八世也企图利用一张明知是伪造的文件霸占巴黎附近

圣但尼修道院的产业(罗特,第256页及以下几页)。

因此采用捐赠、勒索、欺骗、诈骗、造假以及其他带有刑事犯罪性质的勾当而巧取豪夺来的教会地产,在短短几世纪间竟然达到了极其庞大的数目,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现在坐落在巴黎境内的圣热尔门-德-普雷修道院,在9世纪初共有地产8 000芒斯或胡菲^①,根据盖拉尔的计算,面积达429 987公顷,每年收益100万法郎=80万马克¹⁷⁰。如果每胡菲面积平均以54公顷计算,收益以125法郎=100马克计算,那么,在同一时候,圣但尼、吕克瑟伊和图尔圣马丁诸修道院,每处有地产15 000芒斯,面积81万公顷,收益达150万马克。而这还是矮子丕平没收教会土地以后的情形!据罗特(第249页)估计,在7世纪末,高卢的全部教会土地,不是少于而是多于土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这些庞大的地产,一部分由教会的不自由的佃农耕种,也有一部分由教会的自由佃农耕种,在非自由人中间,奴隶(*servi*)必须向主人提供的赋役在当初是没有什么限制的,因为他们并不是有权利的人;但是即使这时,对于定居的奴隶,似乎不久也根据习惯定出了赋役的标准。与此相反,其余两种不自由的阶级,隶农和半农奴(他们当时在法律上有什么差别,没有材料可以说明),他们的赋役倒有规定,内容包括一定数目的人工、畜工,还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收益。这就是从很久以前保留下来的那种依附关系。相反,自由人不在公有地上或者他们的私有地上,而在他人的土地上耕作,这对德意志人来说,却是一件新鲜事。不待说,德意志人在高卢,以及在实行罗马法的整个地区,相当经常地遇到作为佃农的自由的罗马人。但是,他们在占地

① 芒斯或胡菲是中世纪农民的份地。——编者注

时就已安排好,他们自己不要变做佃农,而能够在自有地上耕种。可见,在自由的法兰克人能够变做任何人的佃农之前,一定是由于某种原因把占地时所获得的自主地丧失了,一个特殊的无地的自由法兰克人阶级一定已经形成了。

这个阶级是由于地产开始集中,由于引起地产集中的相同原因而形成的:一方面是由于内战和没收,另一方面多半是由于时势的逼迫,为了求得安全而把土地转让给教会。而教会很快又发现了一种特殊方法,来鼓励这样的转让:它不仅让捐赠者在缴纳代役租的情况下保留他的土地使用权,而且在这以外还租给他一块教会土地。这种捐赠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捐赠者终生保有土地使用权,只在他死后土地才成为教会的财产(*donatio post obitum*);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是,而且以后在国王敕令里也明确规定,捐赠者从教会得到比捐赠的土地多一倍的纳租租种地。另一种情况是捐赠立即生效(*cessio a die praesente*),捐赠者根据教会颁发的文件,即所谓暂时租佃契约,得到教会的多两倍的租地(不包括他自己的土地),这些土地大多是交给他终身耕种的,但也往往只租给他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无地的自由人阶级一经形成,其中有些人也就进入到这种关系中去。答应给他们的暂时租佃,大概在开头的时候多数是为期5年,可是不久也都变成终身的了。

没有疑问,早在墨洛温王朝时代,在世俗豪绅显贵们的土地上,也发生了跟教会土地上发生的完全类似的关系;所以在那里,除了不自由的佃农以外,还移来了缴纳代役租的自由佃农。早在查理·马特统治下,这类自由佃农的人数必定已经很多了,不然,查理·马特所开始的、由他的儿子和孙子所完成的土地占有关系的变革,至少在一个方面,仍然无法解释。

这种变革是以两种新制度为基础的。第一,为了把帝国的豪绅显贵同王室拴在一起,王室领地以后在通常情况下就不再赠送给他们了,而是仅仅作为“采邑”授予他们,仍然终生使用;不过这是带有须要遵守的一定条件的,违反这些条件,就以收回采邑相处罚。这样一来,豪绅显贵本人也成了王室的佃农。第二,为了确保豪绅显贵的自由佃农服兵役,把区的伯爵对移居在他们领地上的自由人的部分管辖职权转交给他们,任命他们当这些自由人的“领主”。这两种变革,我们暂时只来考察前一种。

在制服了谋叛的小“暴君”以后,查理想必便按照旧日的习俗,没收了他们的地产(关于这一点缺乏材料);但是,当他后来恢复了他们的官职的时候,便把这些地产的全部或一部,作为采邑重新授予他们。对于难以驾驭的主教们的教会土地,他还不肯贸然这样做;他撤换他们,将他们的职位赐予对他恭顺的人;在这些人中,不消说,有许多人除去行过剃发式(*sola tonsura clericus*)以外,是毫无僧侣资格的。这些新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现在开始遵照他的命令,将大块的教会土地,暂时出租给俗人。这在过去并非没有先例,不过现在是大规模地进行罢了。他的儿子丕平走得更远。教会没落了,僧侣被人藐视,教皇受到伦巴德人的纠缠,只好依靠丕平的帮助。丕平帮助教皇,协助他扩大教会的统治,给予他种种支持。可是,他取得了报酬,他把绝大部分的教会土地合并于王室领地,只给主教和修道院留下为维持生存所必需的一部分。这第一次大规模的教产还俗,教会毫无抵抗地忍受了。勒斯蒂恩的正教会议批准了这件事,虽然附有限制性的条款,可是从未执行。这些极其庞大的地产,使得已经枯竭的王室土地重新站稳了脚跟,并且大部分用于以后的授予,而这些授予事实上不久便采取了一般的采邑形式。

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教会很快便从这种打击之下恢复过来。同不平的冲突刚一发生,这些上帝的勇士们便立刻故技重演。捐赠又从各个方面源源而来。自由的小农们还处在200年以来的那种水深火热的境地。在查理大帝及其后继者们统治下,他们的境况变得更坏了,许多农民都带着自己的房屋土地,投靠主教的曲柄圭杖的庇护。国王们把一部分赃物退还给一些受到优待的修道院,把大量王室土地送给另外一些修道院,特别是在德意志的修道院。在虔诚者路易的统治下,教会的贡特朗幸运时代似乎又重新降临了。在修道院的档案里,出自9世纪的有关捐赠的材料格外丰富。

采邑,也就是我们现在打算比较详细研究的这一种新制度,还不是后来的封地,但已经是它的萌芽。采邑的授予,一开始就以封主和受封者双方共同的在世时间为限。双方有一方死亡,它便归还所有人或其继承人。旧有关系的更新,必须重新履行一次授予受封者或其继承人的手续。可见,按照以后的说法,采邑在封主死亡时,要归还封主,在受封者死亡时,也要归还封主。封主死亡归还封主这一办法,不久便不使用了,大的受采邑者恰恰比国王还强大。至于受封者死亡归还封主改为授予原受采邑者的继承人,早已屡见不鲜了。在欧坦附近的一个帕特里西阿克(佩西)庄园,由查理·马特作为采邑授予希尔德布兰,在他这一家里,父子相传,经过四代,直到839年,国王把这个庄园的全部所有权赐给第四代受采邑者的弟兄。像这样的例子,在8世纪中叶以后为数不少。

在发生没收财产的所有场合,封主都可以收回采邑。这样的事件,在加洛林王朝统治时期也是非常非常之多的。例如,在矮子丕平统治下的阿勒曼尼亚的暴动,图林根人的谋叛,萨克森人的屡次起义,都导致不断没收;有的是没收自由农民的土地,有的是没收豪绅

显贵的庄园和采邑。在虔诚者路易和他的几个儿子统治之下，虽然契约上有不得没收的规定。但在内战中间，这样的事情仍有发生。还有一些非政治性的犯罪，也会招致财产的没收。

除此以外，倘使受采邑者玩忽了他应尽的一般臣民职责，王室也可以收回采邑；例如，滥用豁免权不交出盗匪，不带自己的甲冑上阵，不尊重国王的手谕等等。

其次，采邑的授予是附有特殊条件的，倘使违犯这些条件，采邑就可收回；当然，这并不牵涉受采邑者的其他财产。例如，在旧有的教会土地授出后，受采邑者未向教会缴纳应付的租税(*nonae et decimae*^①)时，或者是使土地荒芜了，就要收回采邑；在后一种场合，通常先要给予一年的警告期，以便受采邑者在这期间可以改进经营，避免没收的危险，等等。此外，地产的授予，可以附带一定的服役，而且事实上，随着采邑进一步发展为真正的封地，这样的事也就越来越多了。不过，这在开头的时候，完全不是必要的；至少，就服兵役来说是那样。有许多采邑，是授予低级僧侣、修道士、教会的或世俗的妇女的。

最后，也决不排除这样的情况：王室起初授予土地也保留了收回的权利，或者规定了一定的期限，即作为暂时租佃。从个别的材料和教会的做法看来，这是很可能的。但是不管怎样，这种做法不久就停止了，因为以受采邑者须履行义务为条件而授予采邑，在9世纪已经普遍通行。

如上所述，教会过去多半把土地只是作为暂时租佃，在一定期

① “*nonae et decimae*”意为“九一税和什一税”，即收获物和其他收入的九分之一或十分之一。——编者注

间,交给它们的自由佃农耕种。现在得仿照王室的榜样了——我们应该假定,大土地占有者和受采邑者的情况也是如此。教会不但也开始授予采邑,而且这种授予方式竟然如此盛行,以致原有的暂时租佃也变成了终身租佃,不知不觉地带上了采邑的性质,到了9世纪,暂时租佃差不多全都变为采邑者了。在9世纪后半期,教会的受采邑者以及世俗豪绅显贵的受采邑者,一定在国家中已经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一定成为拥有庞大地产的人物,成为以后的下层贵族的始祖。否则,有些人的采邑被拉昂的欣克马尔无理地夺去的时候,秃头查理也许就不会这样热心地关怀这些人了。

我们看到,采邑已经有一些方面在发展起来的封地中重新出现。封主死亡归还封主,受封者死亡归还封主,这对采邑和封地都是一样的。和封地一样,采邑也只是在特定的条件之下才能收回。由采邑造成的社会等级制度,就是从国王起,经过大的受采邑者(帝国公爵的前身),到中等受采邑者(后来的贵族),并且从中等受采邑者起,下至绝大多数生活在马尔克团体内的自由的和不自由的农民,在这样一个社会等级制度中,我们看到了以后的森严的封建等级制的基础。如果说,以后的封地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是一种职田,而且对封地主负有服兵役的义务,那么,后一种情形在采邑上还未发生,前一种情形也根本不是非有不可的。可是,采邑转为职田的倾向已经不可否认地存在着,并且在9世纪,这一倾向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随着这种倾向的自由发展,采邑也就发展成为封地了。

不过,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发生作用的还有另一种因素,那就是区制度和军事制度起初在大地产的影响下,以后在大采邑的影响下发生的变化;而大采邑则是以前的大地产,由于连年内战和与之相连的没收和再度授予逐渐转化而成。

可以理解,这一章里谈的,只是纯粹的、典型形态的采邑;这种采邑当然只是一种短暂的、并非到处同时出现的形态。可是,只有在这种纯粹的形态上来把握它,才能理解经济关系的这样一些历史表现形式,而罗特的主要功绩之一就在于,他去除一切芜杂的附属物,取出了采邑这种古典形态。

区制度和军事制度

上面叙述过的土地占有情况的变革,不能不影响到旧有的制度。它使旧有的制度发生了同样重大的变动,而这些变动又反过来影响土地占有关系。我们先不谈一般国家制度的改革,而在这里只考察一下新的经济状况对于在区和军事这两方面还残存着的旧的民族制度所发生的影响。

在墨洛温王朝时代,我们就已经看到,伯爵、公爵们往往充任王室领地的管理人。不过,只是到了9世纪,我们才确凿地看到,某些王室领地同伯爵官职有了这样的联系:在任的伯爵领取这些土地的收入。从前的名誉官职,现在成了一种由可靠的收入支付俸禄的官职了。此外,我们还看到伯爵们占有了授予他们个人的王室采邑,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言而喻的。这样,伯爵在他的伯爵领地内,便成为一个有势力的地主了。

首先,很明显,伯爵的权威必然要因为在他下面和他旁边出现大土地占有者而受到损害;这些人在墨洛温王朝以及在加洛林王朝初期,对国王的诏令都常常加以嘲笑,对于伯爵的号令,必然要更加不尊重,他们的自由佃农,仗着有势力的地主的庇护,同样往往忽视伯爵传唤他们出庭或征召入伍的命令。这正是以授予采邑代替授予自主地的一个原因,也是旧日自由的大地产后来多半逐渐转变为采邑的一个原因。

单单这样,还不能保证吸引在豪绅显贵土地上常住的自由人履行对于国家的义务。必须作进一步的变动。国王不得不让大土地占有者们,对于他们的自由佃农在出席法庭、应征入伍以及执行其他传统的对国家的义务方面,负起责任,正如过去伯爵对其领地内的一切自由居民负有责任一样。而这只有当国王把伯爵对于豪绅显贵们的佃农的部分管辖权力转让给豪绅显贵时,才能够做到。地主或受采邑者,必须把他自己的人提交法庭;就是说,他们必须经过他的中介而被传唤到庭。他必须送他们入伍;也就是说,必须要经过他来征集他们;为了能够经常负起对他们的责任,他必须拥有领导他们并维持军事纪律的权力。但是,这以前是,当时还依然是佃农对于国王的服务;处罚抗命者的,不是土地占有者,而是国王的伯爵;罚款则归入王室的国库。

这种改革也要追溯到查理·马特。至少是从他那时起,我们才看到教会显贵亲身上阵的习俗;而这一习俗,按照罗特的看法,只有从这里才能得到说明,即查理命令主教们带领他们的佃农参军,是为了保证后者能够应征。毫无疑问,对于世俗的豪绅显贵及其佃农也是如法炮制。在查理大帝统治之下,这种新制度看来已经稳固地确立起来,而且已经普遍推行了。

可是这样一来,自由佃农的政治地位,也起了重要的变化。他们过去不管在经济上多么依附于地主,但在法律上同他们的地主是平等的,现在他们在法律上也成了地主的臣属了。经济上的屈从取得了政治上的认可。地主成为领主、老爷,佃农成为他的 *homines* [人];“主人”成了“人”的长官。自由人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一去不复返了;最下层的“人”的充分的自由,由于世袭地产的丧失早已受到极大损害,现在他们同不自由人又接近了一步。同时,新的“主人”超出

旧日的一般自由的水平也就相应地更多了。新贵族在经济上已经打下的基础,为国家所承认,成为国家机器中正常起作用的主动轮之一。

除了由自由佃农构成的这种 *homines* 以外,还有另外一种人。这就是自愿跟豪绅显贵们发生服役关系或侍从关系的家境败落的自由人。墨洛温王朝的国王们,都有他们的侍从人员,即所谓随从。当时的豪绅显贵们,想必也不会没有侍从人员的。在加洛林王朝,国王的这些侍从们叫做 *Vassi*、*Vasalli* 或者 *Gasindi*;这些称呼,在最古老的《民族法》中还是使用于不自由人的,可是现在却含有通常自由的侍从的意义了。这同一的称呼,也适用于豪绅显贵们的侍从,这样的人,现在已经到处出现,而且在社会和国家中,成为一种人数日益众多、地位日益重要的成分了。

豪绅显贵是怎样获得这些侍从的,这可以从当时的契约程式¹⁷¹中看出来。例如,在一张这样的契约程式(西尔蒙契约程式集第 44 号)中说:

“众所周知,我无衣无食,所以请求您(主人)开恩,我希望受您的庇护(*mundoburdum*——等于监护)并投靠于您。条件如下:您按照我为您服务的情况和应得的报酬负责供给我衣食;而我一息尚存,就要按照一个自由人(*ingenuili ordine*)的样子,为您效劳和听命于您;并且,我终生都无权脱离您的权力和保护,一辈子留在您的权力和保护之下。”^①

这一契约程式充分说明了单纯的、丝毫没有搀杂外来成分的侍从关系如何产生和具有怎样的性质,尤其是因为它描述了一个彻底破产

① 转引自保·罗特《从上古到 10 世纪的采邑制度史》1850 年埃朗根版第 379 页。——编者注

了的穷鬼这一极端的事例。给领主当侍从,乃是出于双方自由的协议——所谓自由,乃是罗马的和现代的法学意义上的自由,它往往跟现代工人为工厂主服务的情况是一样的。“人”投靠主人,主人接受他的投靠。这种投靠用握手和宣誓效忠来表示。协议是终身的,只是在缔约双方有一方死亡的时候,方能解除。仆从有义务完成他主人交给他的所有符合一个自由人地位的劳役。为此,主人必须维持他的生活,并酌情给予报酬。土地的转让绝无必要与此相联系,而且事实上也决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实行转让。

这种关系,在加洛林王朝时期,特别是自查理大帝时起,不但被容忍了,而且受到了直接的鼓励;最后,大概是在847年的一道敕令中,把这一点规定为一切普通的自由人的义务,而且由国家来管理。这样一来,仆从对于主人的这种关系,只有在主人企图杀死他、用棍子打他、强奸他的妻女、或者夺取他的世袭地产的时候,仆从才能单方面解除(813年的敕令)。只要仆从从主人那里接受价值一索里达金币的东西,他便被束缚于主人了;从这里可以再一次清楚地看出,当时的臣仆关系跟土地的授予很少有必然的联系。同样一些规定在816年的一道敕令中又得到了重申,同时附加了一条,即当主人企图非法使仆从陷入非自由人地位,或者能够履行答应给仆从的保护而不履行的时候,仆从便解除这种关系。

在国家面前,这时封君对他的侍从取得了跟地主或受采邑者对其佃农一样的权利和义务。他们对于国王依然负有服役的义务;只不过在这里,在国王同其伯爵之间,插进了封君。他送他的臣仆出席法庭,他征集他们,带领他们征战,在他们中间维持军纪;他为他们负责,并负责按照规定标准装备他们。因此,封君对于他的臣属也就取得了一定的处罚权,这就形成了以后日益发展起来的封地主对其臣

仆的审判权的起点。

在这两种后来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制度中,在侍从制的形成中,在伯爵(也就是国家)对臣属,即对佃农和无地侍从(不久统称之为 Vassi, Vasalli, Homines)的行政权力向地主、受王室采邑者和封君的转交中,在国家这样确认并加强主人对臣仆的实际权力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采邑中业已产生的封地制的萌芽,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国王起,向下经过大的受采邑者到他们的自由佃农,最后直到非自由人,这一种身份等级制度,已成为国家制度中被确认的、正式起作用的要素了。国家承认,没有等级制度的帮助,它就不能存在下去。这里当然要说明,事实上是怎样进行这种帮助的。

区分侍从和佃农,只是在开头,为了证明自由人依附关系的双重起源,才是重要的。不久,这两种臣仆不但在名义上,而且在事实上也不可分地合而为一了。大的受采邑者日益接受托庇于国王的习尚,即不但成为国王的受采邑者,而且成为国王的臣仆。国王认为叫豪绅显贵、主教、修道院院长、伯爵和臣仆亲自对他举行效忠宣誓,对于他是有利的(《贝坦年鉴》¹⁷², 837年, 9世纪较多),而这样一来,一般的臣民宣誓与特殊的臣仆宣誓之间的差别,不久必然就消失了。于是,所有的豪绅显贵都逐渐变为国王的臣仆了。但是,大土地占有者因此而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特殊的等级,成为贵族,并得到了国家的承认,包括于国家制度之中,成为它的正式起作用的一种杠杆。

各个大土地占有者的侍从,也同样慢慢地变为佃农了。除了在主人的庄园里直接供给膳食(而这也只能适用于极少数人)以外,想要保证侍从们的生活,只能将他们安置在土地上,将土地作为采邑,授予他们,别无其他办法。可见,大量具有战斗力的侍从,即豪绅显贵们在战争连绵不断的时代生存的首要条件,只有通过把土地授予

臣仆的方法才能得到。于是,主人庄园内的无地仆从由于大批人居住在主人的土地上而逐渐消失了。

但是,这种新的因素越渗入旧制度,旧制度就必然越受到动摇。以前由国王和伯爵直接行使国家权力的方法,日益让位于一种间接行使的方法;在普通的自由人和国家之间,出现了领主,普通的自由人在人身上越来越效忠于领主。国家机器中最有效力的发动机——伯爵,不得不日益退居次要地位,而他们也的确这样做了。查理大帝在这里的做法,也和他在其他方面例行的做法一样。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在开头的时候,鼓励臣仆关系的扩张,直至独立的小自由人几乎消失为止;但当他看到因此而削弱了他的权力时,他便企图通过国家的干涉重新恢复自己的权力。这在一个如此有魄力、如此威严的统治者之下,在某些场合,是可能成功的,可是到了他的软弱无力的后继者统治的时候,在他帮助下造成的事实的威力却以不可阻挡之势为自己开辟了道路。

查理所喜爱的方法是派出特命全权的钦差大臣(*missi domini-ci*)。有的地方,普通的王室官吏——伯爵——无法控制越来越混乱的局面,特使就应当去加以控制(这一点有待从历史上作更进一步的论证和阐释)。

不过,也还有另一种办法,就是改变伯爵的地位,使他在行使权力的物质手段方面能与其伯爵领地内的豪绅显贵至少势均力敌。这只有使伯爵同样加入大土地占有者的行列才能做到,而这又可以通过两种方法。可以将各个区的若干土地,作为赠予地拨给伯爵官职,由在任的伯爵作为公务来管理,并取得土地的收入。这方面的例子,特别是在档案文件中是非常之多的,并且从8世纪末就已开始了;自9世纪起,这种关系已经很平常了。这样的赠予地,不用说,大多数

都是取之于王室国有土地；正如我们在墨洛温时期早已看到的情形那样，伯爵和公爵往往成为他们辖境内王室国有土地的管理人。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许多这样的例子（甚至还有一份这方面的契约程式）：主教们把教会土地捐赠给伯爵官职，自然，鉴于教会土地不可转让，而采取某种采邑的形式。教会的慷慨可是太出名了，所以在这一里，除非由于严重困难是不能用别的理由来说明的。在邻近的世俗豪绅显贵日益增长的压力之下，教会只有跟国家权力的残余结为同盟了。

这种同伯爵职位连在一起的附属财产（*res comitatus, pertinentiae comitatus* [伯爵财产，伯爵所属物]），起初同授予在任伯爵个人的采邑还是严格地划分开的。就连采邑的授予，也是平常的和很多的；所以，把赠予地和采邑加在一起，原来属于名誉职位的伯爵官职，现在却成为收入优厚的职位了，而自虔诚者路易以后，这种官职同王室其他慷慨的赠予一样，也是特意授予国王想争取或者想靠他们的支持来保住自己的人。例如，关于口吃者路易有这样的记载，说他 *quos potuit conciliavit, dans eis comitatus et abbatias ac villas* [企图通过赠与修道院、伯爵官职和庄园来争取尽可能多的人]（《贝坦年鉴》，877年）。Honor [荣誉] 这个名词，在过去本来是指跟一些荣誉权利相联系的官职说的，到了9世纪却获得同采邑一词完全相同的意义了。于是，像罗特所正确地强调指出的那样（第408页），伯爵官职的性质，也必然要跟着发生一种本质的变化。领主制就其获得公共性质这一点而言，起初是仿照伯爵官职而设立的，被赋予了伯爵的职权。现在——在9世纪后半叶——领主制已经到处盛行，以致伯爵官职有被压倒的危险，它本身只有日益接受领主制的性质，才能保持它的权力地位。伯爵越来越多地、并非没有成效地篡夺了领主对其

所辖区内的居民(pagenses)的地位,而且既涉及他们的私人关系也涉及他们的社会关系。正如其他的“主人们”对待他们邻近的小百姓那样,伯爵也对区内的那些不怎么富裕的自由居民或威胁或利诱,使他们屈从于他,充当他的臣仆。伯爵能够如此滥用他的职权这一简单的事实,最清楚不过地证明,当时残存的普通的自由人要指望从王权及其机构那里得到保护,是多么不可能,这样一来,伯爵就更容易得逞了。受尽了各方面的暴力欺凌的这些自由人,倘使能够找到一个保护人,纵使交出他们的自主地,然后再单单作为采邑收回来,那已经是很幸运了。早在811年的敕令里,查理大帝已经埋怨说,主教、修道院院长、伯爵、法官、百户长,不断地施展司法上的诡计或频繁地征募兵役,使小百姓们遭到破产,直至把自己的自主地奉送或出卖给他们,穷人们只得为自己的财产被掠夺而高声喊冤了,等等。就这样,在9世纪末的高卢,大部分的自由财产已经转入教堂、伯爵以及其他豪绅显贵的手中(欣克马尔,《兰斯年鉴》869年)。稍后,在若干省份,已经再也没有小自由人的自由地产了(毛勒《概论》第212页)。随着受采邑者权力的扩大和王室权力的衰落,采邑逐渐变为世袭,伯爵官职不久也按照习惯变为世袭的了。如果说,从大量的王室的受采邑者当中,我们看到了后来的贵族的萌芽,那么,在这里,我们则看到了从区的伯爵中产生出来的后来的邦君的领土主权的胚胎。

在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这样完全改变的同时,以一切自由人服兵役——这既是权利又是义务——为基础的旧军事制度,外表上一直丝毫未变;只不过在新的依附关系出现的地方,领主插在他的臣仆和伯爵中间。可是,普通的自由人年复一年地越来越无力负起兵役的重担了。这种兵役负担不仅在于个人的服役,被征集的人还要自

理装备,在头半年里伙食也要自备;最后,查理大帝时代连绵不断的战争,使事情超过了极限。负担重到不堪忍受的地步,为了逃避负担,大群的小自由人宁愿将他们剩余的田产,甚至他们自己及他们后代的人身奉送给豪绅显贵,尤其是奉送给教会。查理把那些自由的尚武的法兰克人弄到了这种地步,以致他们宁愿做依附农民和农奴,只求不去打仗。在大多数自由人已经全部或大部丧失了地产以后,查理还要坚持实行建立在一切自由人普遍和平均占有土地基础上的军事制度,而且推行到极端的地步,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如此。

然而事实强于查理的执拗和野心。旧的军事制度无法再维持下去。用国家经费装备和供养军队,在那个几乎没有货币和商业的自然经济时代,就更行不通了。因此,查理不得不对兵役义务加以限制,以便能够保证兵员的装备和给养。这是在807年的亚琛敕令中提出的,当时战争还仅限于国境上的战斗,帝国的继续存在看来大体上还是有保障的。首先,每个王室的受采邑者都要毫无例外地应征;其次,占有12胡菲(mansi[芒斯])的人,必须以甲冑武装起来,因而也要骑马出征(caballarius[骑士],这个词出现在这同一个敕令里)。占有3至5胡菲的人,都有出征的义务。每两个占有2胡菲的人,每3个占有1胡菲的人,每6个占有半胡菲的人,每次需出兵一人,由其余的人负责装备。完全没有土地但拥有价值5索里达动产的自由人,也必须每6人出兵一人,其他5人每人出1索里达,以资助他。征发亦因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在邻近地区发生战争时,必须全部出征,如战地相离较远,则根据距离远近,将人员数目缩减到二分之一至六分之一。

查理在这里显然是设法使旧有的制度适应有服兵役义务的人的已经改变了的经济生活状况,设法挽救还能挽救的东西。然而,这种

让步也无济于事；不久之后，他不得不在“关于征募兵役的敕令”里，再度减免兵役的负担。一般认为，这一敕令早于亚琛敕令，但照它的全部内容看，毫无疑问，要晚于亚琛敕令若干年。它把每出兵一人所需的胡菲数，由 3 胡菲提高到 4 胡菲；占有半胡菲的人和没有土地的人是豁免兵役的，而受采邑者的兵役义务也限制到每 4 胡菲出兵一人。在查理的后继者的统治之下，似乎每出兵一人所需胡菲的最低限额，甚至提高到 5 胡菲。

值得注意的是，征集身披甲胄入伍的拥有 12 胡菲的人入伍，似乎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至少是，必须身披甲胄入伍的命令在敕令里重申过无数次。

于是，普通的自由人日渐消失了。如果说他们日益跟土地分离，已驱使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沦为新兴大地主的臣仆，那么由于害怕服兵役造成直接破产，则驱使另一部分人干脆当了农奴。这种甘于受奴役的过程发展十分迅速，这从当时还位于巴黎郊外的圣热尔门-德-普雷修道院的地产登记册中可以看出。这本地产登记册是由修道院院长伊尔米农在 9 世纪初汇编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修道院的佃农中间，有 2 080 户是隶农，35 户是半农奴，220 户是奴隶 (servi)，只有 8 户是自由人。可是，Colonus[隶农]这个词，当时在高卢，断然是指非自由人。一个女自由人同隶农或奴隶通婚，被认为是受到了褻渎 (deturpatam)，而必须听命于主人(817 年的敕令)。虔诚者路易下令，要(普瓦捷的一个修道院的)“隶农或奴隶，不管他愿意与否，应当回到他的天然的依附地位”。他们往往受体罚(853 年、861 年、864 年、873 年的敕令)，有时获得自由(见盖拉尔《修道院院长伊尔米农的地产登记册》)。这些农奴并不是什么罗曼人。按照研究姓名的雅科布·格林自己的证明(《德意志语言史》第 1 卷[第 537

贞]),他们“几乎全是法兰克人,其数目大大超过了为数很少的罗马人农奴”。

非自由人的人口如此大量的增加,又改变了法兰克社会的阶级关系。除了当时正在迅速形成一个特殊等级的大土地占有者以外,除了他们的自由臣仆以外,现在又出现了一个非自由人的阶级,这个阶级把残余的普通的自由人日益吸收进去。而这些非自由人,有一部分自己曾经就是自由人,另一部分则是自由人的子女;从三代以前或更早的时候起就祖祖辈辈受奴役的人,占极少数。他们大部分人还并不是从外面强行运来的萨克森人、温德人等的战俘;相反地,他们大多数都是土生土长的法兰克人和罗马人。对付这样的人,尤其是在他们已开始成为居民中的主体的情况下,就不像对付世袭的或者外来的农奴那样容易了。他们还不习惯受奴役;连隶农也要受到的体罚(853年、861年、873年的敕令),他们仍然认为是一种耻辱,而不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多次发生非自由人、甚至农民臣仆的叛乱和暴动。查理大帝曾经亲自以暴力镇压过兰斯主教管辖区佃农的一次暴动。虔诚者路易曾在821年的敕令里,说到佛兰德及梅纳皮地区(在利斯河上游)奴隶(servorum)的叛乱。848年和866年美因茨主教管区的仆从(homines)的暴动肯定遭到了镇压。镇压这类叛乱的命令,在779年以后的敕令里一再重复。在萨克森的“斯特林加”暴动¹⁷³,一定也在此列。8世纪末9世纪初以后,非自由人的赋役,甚至包括常住的奴隶们的赋役在内,都渐渐地规定出一定的、不许超过的限度,并且查理大帝在他的敕令里,对此曾有明文规定。这显然是非自由人大众的这种带威胁性的态度导致的结果。

由此可见,这就是查理为取得他的新罗马帝国所付出的代价:消灭了在占领高卢时曾构成全部法兰克人的普通的自由人等级,人民

分裂为大土地占有者、臣仆和农奴。然而随着普通的自由人的消灭，旧的军事制度瓦解了，随着两者的消灭，王权也崩溃了。查理毁掉了他自身统治的惟一基础。他还能勉强支撑下去；可是到了他的后继者们统治的时候，实际上由他亲手造成的东西，就暴露出来了。

注释:法兰克方言¹⁷⁴

对于这种方言,语言学家们作了离奇古怪的阐释。格林认为,它已经溶化在法兰西语和高地德意志语中,但新近的研究者们则认为,自敦刻尔克和阿姆斯特丹起,至温斯特鲁特河、萨勒河、雷察特河止,甚至一直到多瑙河,并且经过移民而直达理森山,都是法兰克方言流行的范围。甚至像莫里茨·海奈那样的语文学家,竟也根据在韦尔登抄录的一个古福音诗¹⁷⁵抄本,编造出一种古代下法兰克语言,而这是一一种略带法兰克语色彩的几乎纯粹的古代萨克森语,——而布劳讷则干脆把一切真正的下法兰克方言,一部划归萨克森语,一部划归尼德兰语^①。最后,阿尔诺德是把里普利安人征服的地区,局限于阿尔和摩泽尔两河分水岭以北的地方,而认为所有位于南方及西南方的地区,开头是由阿勒曼尼人占领,以后又是单独由卡滕人(他把卡滕人也划归法兰克人之中)占领的,因此,他们说的话也就是阿勒曼尼—卡滕语。

首先,让我们恢复法兰克语言区的实际界限。图林根、黑森和美因法兰克尼亚,在加洛林王朝时代曾在 *Francia* 的名称下包括在这个

① 威·布劳讷《论对法兰克语的认识和论高地德意志语辅音音变》,载于1874年《德意志语言文学史资料》杂志(萨勒河畔哈雷)第1卷。——编者注

地区,此外就没有任何理由划入这个地区。在施佩萨特、福格尔斯山和卡尔阿斯滕山以东各地所说的语言,绝对不是法兰克语。黑森和图林根是独立的部落居住的地方,有它们自己的独立的方言;在美因法兰克尼亚居住的是斯拉夫人、图林根人和黑森人的混血人口,其中还夹杂有巴伐利亚人和法兰克人的成分,并且形成了它自己单独的方言。只有把高地德意志语的辅音音变侵入这些方言中的程度拿来作为主要区别手段,才能将这三个语言分支算做法兰克语。但是,我们将要看到,正是这种方法引起了非法兰克人在判断法兰克语言时的全部混乱。

我们从最古的文物开始,并且首先对莫里茨·海奈^①的所谓古代下法兰克语作一个正确的说明。在韦尔登抄录而目前存放在牛津的所谓古福音诗的柯顿抄本,根据海奈的意见,应当是古代下法兰克语,因为这个抄本是在韦尔登修道院写成的,这个修道院虽然仍然是在法兰克境内,但离萨克森边境极近。古时的部落边界,今日还是贝格同马克之间的边界;在处于两地之间的修道院中,韦尔登修道院属于法兰克尼亚,埃森修道院属于萨克森。韦尔登在东面和北面,都跟毫无疑问的萨克森的村庄紧紧相连;在鲁尔河同利珀河之间的平原上,萨克森语言在若干地方差不多侵入到莱茵河一带。有一部萨克森语的作品在韦尔登抄写出来,而且显然是由一个法兰克人抄写的,在这个法兰克人的笔下不时流露出法兰克语的词形——这种情况还远不足以说明抄本上的语言就是法兰克语。除了柯顿的这个古福音诗抄本以外,海奈还举出了一些具有同一性质的韦尔登的断简残编

^① 莫·海奈《古代萨克森语及古代下法兰克语简明语法》1873年帕德博恩版。

以及他认为来自亚琛地方的一首赞美诗译文的残篇，他认为这些也是用下法兰克语写的；但凯伦(《萨利克法典》注解)却直截了当地认定这篇译文是尼德兰语。事实上，这篇译文一方面带有完全的尼德兰语形，但是另一方面，也带有真正的莱茵法兰克语形，甚至还有高地德意志语辅音音变的痕迹。它显然是在尼德兰语和莱茵法兰克语之间的边境上，大约是在亚琛和马斯特里赫特之间的地方译出的。译文的语言要比那两个古福音诗抄本的语言年轻得多。

但是，单单根据柯顿的古福音诗抄本，就足以依照抄本中出现的少量法兰克语形，无可争辩地确定法兰克语和萨克逊语的几点基本差别。

一、在所有的印格伏南方言里，现在时直陈式复数的三种人称的结尾都是相同的，即同样是以一个前面带有元音的齿音字母为结尾；古代萨克逊语结尾为 *d*，盎格鲁撒克逊语为 *dh*，古代弗里西安语为 *th*（这大概也可以代替 *dh*）。例如，在古代萨克逊语中，*hebbiad* 的意思是 *wir haben, ihr habt, sie haben*，同样地，*fallan, gewinnan* 的所有三种人称，都同样是 *fallad, winnad*。在这里，第三人称占据了所有三种人称，但应当注意的是，印格伏南语所特有的那种在 *d* 或 *dh* 之前省略 *n* 的现象，也是所有上述这三种方言所共有的。在一切现存的方言之中，只有威斯特伐利亚方言还保留这种特点；在那里，今天仍然说 *wi, ji, se hebbed* 等等。其他的萨克逊方言同西弗里西安语一样，已经没有这种特点了；它们的三种人称是有区别的^①。

^① 恩格斯在手稿中用铅笔添了这几个字：“和第三人称同第二人称的区别。”176——编者注

西莱茵的赞美诗,同中古高地德意志语一样,复数第一人称结尾为 *n*,第二人称称为 *t*,第三人称为 *nt*。相反地,柯顿的古福音诗抄本,除了萨克森语形以外,还好几次出现完全不同的语形,例如:*tholônd* —*sie dulden*, *gornônd* —*ihr klagt*, 以及命令式 *mârient* —*verkündigt*, *seggient* —*sagt*。而这在萨克森语里,则要求 *tholôd*, *gornôd*, *mâriad*, *seggiad*。这些形式,不单是法兰克的语形,它们甚至直到今日仍然是真正韦尔登的、贝格的地区方言。在贝格语里,现在时复数三种人称也是相同的,不过不是像萨克森语那样以 *d* 结尾,而是像法兰克语那样以 *nt* 结尾。同马克语的 *wi hebbed* 相反,就在边界线上,却说 *wi hant*, 并且与上面的命令式 *seggient* 相同,这里说 *seient ens* —*sagt einmal*。在贝格语这里,三种人称完全相同;布劳讷等人根据这一简单的观察,就不加思索地宣称全贝格山区都属于萨克森语的范围。这种规则,诚然是从萨克森传到这里来的,但遗憾的是,它是按法兰克语的方式来运用,因此,它所证明的,恰恰是它应当证明的事物的反面。

齿音之前省去 *n*, 在印格伏南诸方言里,并不限于上述的场合;这在古代弗里西安语中较为稀少,相反地,在古代萨克森语和盎格鲁撒克逊语中则流行颇广。例如:*mudh* —*Mund*, *kudh* —*kund*, *us* —*uns*, *odhar* —*ein anderer*。那个法兰克人在韦尔登抄写古福音诗的时候,曾有两处把 *odhar* 写成法兰克语形 *andar*。在韦尔登的赋税登记册上,法兰克语形的名字 *Reinswind*, *Meginswind* 同萨克森语形的名字 *Reinswid*, *Meginswid*, 交替使用。相反,在莱茵河左岸的赞美诗中,到处都写的是 *mun*, *kun*, *un*, 只有在所谓利普西乌斯的诠释¹⁷⁷(摘自这部赞美诗的现已遗失的手抄本)中,有一处用 *farkutha abominabiles* 代替 *farkuntha*。同样地,在古代萨利克人的

文物上,姓名中的 *n* 也到处保存着,例如 *Gund*, *Segenand*, *Chlo-*
dosindis, *Ansbertus* 等等;不过,这一点不在考察之内。在现代的法兰克诸方言中, *n* 到处都有(贝格语中惟一的例外是语形 *os* — *uns*)。

二、用来构造成一般所谓古代萨克森语语法的语言文物,全部都出于西南威斯特伐利亚、明斯特、弗雷肯霍斯特、埃森。这些文物上的语言,不但同一般的印格伏南语形有某些根本差别,而且同那些直到今天还作为真正古代萨克森语形而保持在恩格恩和奥斯特法伦的专有名词中的语形也有某些根本差别;相反,它同法兰克语和古代高地德意志语却惊人地一致。因此,新近的方言语法研究者科瑟伊恩直截了当地称它为古代西萨克森语^①。

因为我们在这种研究中差不多仅依赖于拉丁文文献中的专有名词,所以,西萨克森语和东萨克森语之间的可证实的语形差别,为数不会很多。这种语形差别只限于两种场合,但是却具有决定的意义。

(1)在盎格鲁撒克逊语和古代弗里西安语里面,第二格复数的一切变化,都以 *a* 为词尾。相反,在古代西萨克森语、古代法兰克语和古代高地德意志语中,则都以 *ō* 为词尾。但是,真正的古代萨克森语形究竟是怎样的呢?难道这种方言在这里真的背离了印格伏南语的规则吗?

恩格恩和奥斯特法伦的文献作了回答。在 *Stedieraburg*, *Horsadal*, *Winethahūsen*, *Edingahūsun*, *Magathaburg* 和其他许多名称里面,复合词的前一部分是复数第二格,并以 *a* 为词尾。甚至在威斯特伐利亚,词尾 *a* 也还没有完全消失;在弗雷肯霍斯特的赋税登

① 参看彼·雅·科瑟伊恩《简明古代西萨克森语语法》1881年莱顿版第1卷。——编者注

记册^①中,就有 *Aningera lô* 和 *Wernerâ holthâson* 字样,而 *Osnabrück* 一词中的 *a*,也正是古代的复数第二格。

(2)法兰克语的阳性弱变化同古代高地德意志语一样,都是以 *o* 结尾,跟哥特—印格伏南语以 *a* 结尾是不同的。古代西萨克森语的规则也确定是以 *o* 结尾;可见,跟印格伏南语的习惯也不相同。但这一点根本不适用于整个古代萨克森语。甚至在威斯特伐利亚,结尾为 *o* 的规则也并不是没有例外;在弗雷肯霍斯特的登记册上,除了 *o* 之外,还有一系列以 *a* 为词尾的名字 (*Siboda, Uffa, Asica, Hassa, Wenda* 等等);在维干德掌握的帕德博恩的文物¹⁷⁸中,几乎都是 *a*,只有在极例外的情形下才是 *o*;在奥斯特法伦的文献里面,*a* 差不多是惟一的;因此,雅·格林(《德意志语言史》)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能不承认,*a* 和(间接格中的)*an* 是通行于民族各部分之间的原始萨克森语形。*a* 之被 *o* 排斥,也不单限于威斯特伐利亚。15 世纪初,编年史和其他文献中的东弗里西安语的阳性名词,几乎总是以 *o* 为词尾:例如 *Fokko, Occo, Enno, Smelo* 等等,而不是西弗里西安语里个别场合依然保留着的早先的 *a*。

由此可以肯定,西萨克森语同印格伏南语语法规则上的上述两种差别,并不是萨克森语起初就有,而是由外来的影响所引起的。这种影响,可以很简单地由这样的事实来说明,即西萨克森以前本是法兰克的领土。直到法兰克人的主体部分退出以后,萨克森人才越过奥斯宁山和埃格山,逐渐推进到今天仍然是把马克和绍尔兰山同贝格和锡格兰划分开来的那条线。滞留下来的现在已经跟萨克森人融合起来的法兰克人,他们的影响就表现在 *a* 被那两个 *o* 所代替;就是

^① 指弗雷肯霍斯特修道院赋税登记册(9—11世纪初)。——编者注

在今天的方言里,这种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三、流行于鲁尔河到摩泽尔河这一带的莱茵法兰克语言有一种特点,那就是动词第一人称现在时直陈式的词尾为 *n*;在后面是一个元音的情况下,这一点保持得最好^①。例如,(在贝格语里) *dat don ek* — *das thue ich, ek han* — *ich habe*。这种动词形式(*don, han*),通行于全部下莱茵和摩泽尔河流域,至少达到洛林的边境。同样的特点在莱茵河左岸的赞美诗中就已经有了,例如 *biddon* — *ich bitte, wirthon* — *ich werde*,虽然并不是一贯的。在萨利克方言里,没有这个 *n*;在那里,在最古的文献^②中,已经可以看到 *ec forsacho, gelôbo*。尼德兰语也没有这个 *n*。古代西萨克森语,不同于法兰克语的只有一点,即这个 *n* 仅仅出现在一种动词变化(即所谓第二弱变化)上面;例如, *skarwôn* — *ich schauē, thionôn* — *ich diene* 等等。在盎格鲁撒克逊语和古代弗里西安语里,这个 *n* 是完全不存在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就连这个 *n* 也是法兰克语在古代西萨克森语中留下的残余。

除去在文献和其他地方保留下来的许多专有名词以及字迹往往模糊到不能辨认的《萨利克法典》注解之外,我们简直找不到萨利克方言任何其他的遗迹了。但是,凯伦(《萨利克法典》注解)已经消除了相当多的模糊不清的地方,恢复了在一些场合是正确的、在另一些场合是极为可能的原文,而且证明,用以书写原文的语言是中尼德兰语和新尼德兰语的直接祖先。不过,这样恢复原状的材料,当然

① 恩格斯用铅笔在页边上写着:奥特弗里德¹⁷⁹。——编者注

② 指8世纪末或9世纪初萨克森洗礼誓(“Taufgelöbnis”)程式的手稿。——编者注

不能简单地用来解释语法。此外,我们还只有附录于743年查理曼敕令之后的简短宣誓书式;这大概是在勒斯蒂恩的宗教会议上,即在比利时草拟的。在这里,我们一开头就碰见了两个典型的法兰克词:*Ec forsacho* — *ich entsage*。在法兰克人中间,说 *Ec* 而不说 *ich*,即在今日,也还是极其普遍的。在特里尔和卢森堡说 *eich*,在科隆和亚琛说 *ech*,在贝格语中说 *ek*。虽然尼德兰书面语言有 *ik*,但在民间口语里,尤其在佛兰德,人们却经常可以听到 *ek*。在古代的萨利克人名里,例如, *Segenandus*, *Segemundus*, *Segefredus*, 一律是以 *e* 代 *i*。

在 *forsacho* 这个词里面, *ch* 代替了两个元音之间的 *g*;这通常也出现在文物上面(例如, *rachineburgius*),而且直至今日,仍然是从普法尔茨到北海之间所有法兰克方言的特点。关于法兰克语的这两个基本特征——即常常以 *e* 代替 *i* 和以 *ch* 代替元音之间的 *g*——,我们在分别研究各种方言时,再来分析。

作为以上研究的结果(人们还可以拿格林在《德意志语言史》第一卷末尾对于古代法兰克语所说的话和这一研究作比较),我们不妨提出这样一个现在未必还会有什么争议的论点:法兰克语早在6世纪和7世纪就已经是一种独立的方言,它是高地德意志语(即首先是阿勒曼尼语)同印格伏南语(即首先是萨克森语和弗里西安语)之间的过渡环节,当时还完全处于哥特—低地德意志语的辅音音变阶段。同意了这一论点,那么也就承认了,法兰克人并非由于外部环境而结合起来的部落的混合物,而是一个独立的德意志人大系统,乃是易斯卡伏南人,他们虽然在不同的时代吸收了外来的成分,可是也具有同化这些成分的力量。同样,我们还可以认为以下这几点已经证实:法兰克部落的两个主要支派,每一个支派早就有了他们自己特有的方言;法兰克方言已分化为萨利克语和里普利安语;区别这些古代

方言的某些特点在今天的民间口语中还继续存在。

现在让我们来研究这些现在仍然存在着的方言。

一、萨利克语还继续存在于两种尼德兰方言,即佛拉芒语和荷兰语之中,而保持得最纯粹的,是在从6世纪起即已成为法兰克领土的那些地方。关于这点,现在已经不再有任何疑问了。在12、13和14世纪发生的大海啸,差不多毁灭了整个泽兰岛,形成了须得海海湾、多拉特湾和亚德湾,从而使弗里西安人之间的政治联系,随同地理上的联系一起中断,从此以后,残存的古代弗里西安自由,在周围的封建诸侯压迫之下,也都化为乌有了,弗里西安语言跟着也几乎到处都消亡了。弗里西安语言在西部被尼德兰语,在东部和北部被萨克森语和丹麦语所限制,或者完全被排挤;但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在侵入的语言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古代弗里西安的泽兰岛和荷兰,在16和17世纪,成了尼德兰人独立斗争的核心和支柱,正如它们那时已经是国内各主要商业城市的所在地一样。因此,主要是在这里,形成了新尼德兰书面语言,而且采用了弗里西安语的成分,即单词和字形,而这是可以跟法兰克语的基础区别开来的。另一方面,萨克森语言又从东面侵入了以前的弗里西安领土和法兰克领土。若要划出准确的界线,那就要作详细的研究;但是,纯粹的萨利克语,只限于比利时说佛拉芒语的那些地区——北布拉班特、乌得勒支以及海尔德兰省和上艾瑟尔,东面的萨克森语地带则属例外。

在以马斯河为界的法兰西语区和莱茵河以北的萨克森语区之间,萨利克人同里普利安人碰了头。双方的分界线,在这里还要详细地确定,关于这点,我们到下面再说。现在,我们首先研究尼德兰语的语法特点。

在元音上,首先令人注意的是,像真正的法兰克语那样,*i* 为 *e* 所代替,例如, *brenge* — *bringen*, *kreb* — *Krippe*, *hemel* — *Himmel*, *geweten* — *Gewissen*, *ben* — *bin*, *stem* — *Stimme*。这在中尼德兰语里出现得更频繁: *gewes* — *gewiss*, *es* — *ist*, *selver* — *Silber*, *blent* — *blind*, 这些字在新尼德兰语则为 *gewis*, *is*, *zilver*, *blind*。同样,我在根特附近又找到了两个地方,名叫 *Destelbergen* 和 *Desteldonck*;在那里,就是现在也依然把 *Distel* 叫做 *Destel*。在这一点上,在纯粹法兰克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中尼德兰语,和里普利安语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受弗里西安语影响的新尼德兰书面语言,跟它就不大一致了。

其次,还有一点跟里普利安语一致的地方,就是在后面带有辅音的 *m* 或 *n* 之前,以 *o* 代替 *u*,然而并不像中尼德兰语和里普利安语那样一贯。在新尼德兰语中,有 *konst*, *gonst*, *kond*, 同时也有 *kunst*, *gunst*, *kund*。另一方面,也有两者完全一致的地方;例如, *mond* — *Mund*, *hond* — *Hund*, *jong* — *jung*, *ons* — *uns*。

跟里普利安语不同,长音 *i* (*ij*) 在发音上变作 *ei*, 在中尼德兰语里似乎还没有这样的情形。但是,这个 *ei* 在发音上不是像在高地德意志语里那样 *ei* = *ai*, 而是如同真的 *e* + *i*, 虽然并不像丹麦人和斯拉夫人的 *ej* 发音那样窄。书写出来不是 *ij*, 而是 *ei* 的复合元音,发音与此稍有不同。与此相应,代替高地德意志语的 *au* 的,是 *ou*, *ouw*。

元音变异从词形变化中消失了。在变格上,单数和复数,在动词变位上,直陈式和虚拟式,它们都具有同一的词根元音。相反,在词的构成上,元音变异则表现为双重形式:(1)一切哥特语以后的方言所共有的形式,即 *a* 经 *i* 而变为 *e*; (2) 尼德兰语所特有而后来才形成的形式。中尼德兰语,正如里普利安语一样,依然有 *hus* — *Haus*,

brun — *braun*, *rum* — *geräumig*, *tun* — *Zaun*; 复数则为 *huse*, *brune*。新尼德兰语则只有中尼德兰语和里普利安语向所未见的词形 *huis*, *bruin*, *ruim*, *tuin* (*ui* = 高地德意志语的 *eu*)。相反, 以 *eu* 代替短音 *o* (高地德意志语的 *u*), 则已经侵入中尼德兰语了, 例如, *jeughet* 与 *joghet* 同时并存, 新尼德兰语有 *jeugd* — *Jugend*; *doghet* — *Tugend*, *dor* — *Thür*, *kor* — *Wahl*, 而同时还有带 *eu* 的词形; 在新尼德兰语则只有 *deugd*, *keur*, *deur*。这同 12 世纪起在北法兰西语中发展起来的、以 *eu* 代替重读的拉丁语的 *o* 是完全一致的。凯伦指出了元音变异的第三种情形: 在新尼德兰语里, *ei* 是由 *ê* (*ee*) 的元音变异而成的。所有这三种元音变异形式, 都是里普利安语以及其他方言所没有的, 是尼德兰语的一种特殊的标志。

Ald, *alt*, *old*, *olt*, *uld*, *ult* 变为 *oud*, *out*。这种转变, 在中尼德兰语里就已经可以看到了, 不过, 在那里, 既有 *goudin*, *houde*, *scoude* (*sollte*), 同时也有 *guldin*, *hulde*, *sculde*, 因此, 这种转变发生于什么时候, 大致是确定的。这种转变同样是尼德兰语的特点, 至少和大陆上所有日耳曼方言不同; 它在兰开夏郡的英格兰方言里反而还存在着; 例如, *gold*, *hold*, *old*, 在那里是 *gowd*, *howd*, *owd*。

说到辅音, 尼德兰语没有纯粹的 *g* (即意大利语、法语或英语的后舌音 *g*)。这个辅音的发音像强烈的送气音 *gh*, 在某些音结合中, 它和深后舌音 (瑞士语、现代希腊语或俄语的) *ch* 是没有分别的。我们已经看到, 从 *g* 到 *ch* 的这种转变, 在古代萨利克语中就已经出现了。它也出现在一部分里普利安语和一部分在以前法兰克土地上形成的萨克森诸方言里, 例如, 在明斯特兰, 也跟在贝格语里一样, 甚至单词开头的 *j*, 特别是在外来语里, 发音或许和 *ch* 一样, 人们在那里可以听到 *Choseph*, 甚至可以听到 *Chahr* (*Jahr*)。倘使莫·海奈注意

到这一点,那么,在古福音诗中 *j*, *g* 和 *ch* 的常常彼此混用和互押头韵,就不至于使他感到困惑了。

在单词的开头,尼德兰语有些地方还保留着 *wr*, 例如 *wringen* — *ringen*, *wreed* — *grausam*, *hart*, *wreken* — *rächen*。在里普利安语里,也有这一方面的残迹。

从弗里西安语里,采纳了将指小词词尾 *ken* 软化为 *tje*, *je* 的办法,例如, *mannetje* — *Männchen*, *bietje* — *Bienchen*, *halsje* — *Hälschen*, 等等。不过,也有保留 *k* 的,例如, *vrouken* — *Frauchen*, *hoedeken* — *Hütchen*。在佛拉芒语里,至少在民间语言里, *k* 却保留得更好:布鲁塞尔的著名的小人儿¹⁸⁰叫做 *manneken pis*。可见法国人的 *mannequin*, 英国人的 *mannikin*, 都是从佛拉芒语那里借来的。两者词尾的复数均为 *s*: *vroukens*, *mannetjes*。这个 *s*, 我们在里普利安语里还会看到。

尼德兰语同萨克森诸方言,甚至同斯堪的纳维亚诸方言共同的地方,是元音之间、特别是两个 *e* 之间省略 *d*, 例如, *leder* 和 *leer*, *weder* 和 *weer*, *neder* 和 *neer*, *vader* 和 *vaer*, *moeder* 和 *moer* — *Mutter*。

尼德兰语的变格显示着强变化和弱变化词形的完全的混合,而因为复数也没有元音变异,所以尼德兰语复数的构成,只有在极少的场合,才与里普利安语或萨克森语相一致,在这里,也可以看出这种语言的一个很显著的特点。

萨利克语和里普利安语同一切印格伏南方言共同的地方,是 *er*, *der*, *wer* 等主格标志的脱落,即在尼德兰语里是 *hij*, *de* (冠词) 和 *die* (指示代词), *wie*。

如果谈动词变位的话,那恐怕就扯得太远了。上面讲的,将足以

使我们在任何地方将现代的萨利克语言跟相邻的各种方言区别开来。对尼德兰的民间方言进行更精细的研究,一定还能发现许多重要的东西。

二、**莱茵法兰克语**。我拿着这个名称表示其余一切的法兰克方言。我在这里不照老的办法把里普利安语跟萨利克语对立起来,是有充分理由的。

阿尔诺德就已经指出:本来意义上的里普利安人曾住在一块比较狭小的地区,其南面边界大体可用两个同名为赖弗沙伊德的村落(在阿德瑙和施莱登附近)作标志。^①这一点正确之处在于:这样一来,就能在语言方面也把**纯粹的里普利安人的地区**,同真正的里普利安人在其他德意志部落之后或者和他们同时占据的地区划分开来。但是,由于下法兰克语这一名称已经获得了也包括萨利克语在内的另外的意义,所以,我只好把分布在萨利克语区和这条界线之间地区的那组同一语族的方言,统称为里普利安语——狭义的里普利安语。

1. **里普利安语** 这一组方言同萨利克语的分界线,同荷兰—德意志的边境线是决不相符的。相反,在莱茵河右岸,还有雷斯区的大部分属于萨利克语的范围,而在这里的韦瑟尔地区,则为萨利克语、里普利安语和萨克森语接触之处。在莱茵河左岸,属于萨利克语的,则有克莱沃语和海尔德恩语,并且大约延伸到下面这条线:从莱茵河起,经过克桑滕和韦瑟尔之间,南到弗林村(在默尔斯之西),并从那里起,西南到芬洛为止。要想划出更精确的界线,只有到当地去才行,因为经过荷兰不仅对海尔德恩,而且对默尔斯伯爵领地的多年管辖,地图上保留有许多带有萨利克—尼德兰语形的里普利安的名称。

^① 威·阿尔诺德《德意志的古代》1879年哥达版第150页。——编者注

从芬洛地区往上去,马斯河右岸的绝大部分地区大概都讲里普利安语,因此在这里,政治上的界线并未在任何地方穿过萨利克语地区,却总是穿过里普利安语地区,而后者一直伸展到马斯特里赫特附近。在这里,词尾为 *heim* (不是 *hem*) 的地名以及带里普利安语所特有的词尾 *ich* 的地名,大量出现在荷兰领土上。再往南去,便有了带 *broich* (荷兰语的 *broek*) 词尾并有辅音音变^①的地名,例如鲁尔蒙德附近的 *Dallenbroich*, 以及带 *rade* 词尾的地名(锡塔德附近的 *Bingelrade*, 以及那里的 *Amstenrade*、*Hobbelrade* 和六七个这一类的地名); 那已落入比利时之手的马斯河右岸的一小片德意志领土, 则完全属于里普利安语范围以内(试比较距马斯河 9 公里的 *Krützenberg* 和芬洛北面的 *Kruisberg*)。甚至在马斯河左岸, 在比利时境内名叫林堡的地方, 我也发现, 马塞克附近有 *Kessenich*, 马斯河畔有 *Stockheim* 和 *Reekheim*, 马斯特里赫特附近有 *Gellik*, 这就证明这里居住的并非纯粹的萨利克居民。

里普利安语区同萨克森的界线, 自韦瑟尔附近向东南延伸, 逐渐远离莱茵河, 在法兰克语区方面的鲁尔河畔米尔海姆、韦尔登和萨克森语区方面的埃森之间穿过, 直达贝格同马克的边界, 这条边界线至今仍然是莱茵省同威斯特伐利亚的边界。里普利安语区的界线直到奥尔珀以南, 才离开这条边界, 由此向东, 将法兰克语区的锡格兰同萨克森语区的绍尔兰山分开了。再向东去, 很快就到了黑森方言区。

同我称为中法兰克语的那种方言为邻的上述南面边界, 和旧日的阿瓦尔高、博恩高和埃弗利亚等区的南面边界大体相符, 并由此西

① 手稿中用铅笔划掉了“*verschobene*”(“并有辅音音变”)一词。——编者注

去,稍稍偏南,进入瓦隆语的区域。这样划定的领域,包含古代的里普利安大区及其北面和西面邻接的区的一部分。

如上所述,里普利安语在许多方面是和尼德兰语一致的,不过,中尼德兰语却较新尼德兰语跟它更为接近。在里普利安语的发音中,与新尼德兰语相一致的地方是 $ei = e + i$,以 *ou* 代替 *au*;以及 *i* 到 *e* 的转变,这种转变在里普利安语和中尼德兰语里比新尼德兰语更为彻底:中尼德兰语的 *gewes, es, blend, selver* (Silber),即在今日也还完全按照里普利安语发音。同样地而且始终是,在后面紧跟着辅音的 *m* 或 *n* 之前的 *u*,变为 *o*,例如 *jong, lomp, domm, konst*。如果后面紧跟的辅音是 *d* 或 *t*,则这个 *d* 或 *t* 在一些方言中就变为 *g* 或 *k*;例如 *honk* —Hund,复数为 *hōng*;在这里,*k* 变为浊音 *g*,是受到脱落掉的词尾元音 *e* 的影响。

相反,里普利安语的元音变异的情形同尼德兰语有鲜明的区别,同高地德意志语大体是一致的,而在个别的例外场合之下(例如以 *hanen* 代替 *Hähne*),则同萨克森语一致。

词首的 *wr* 变为清音 *fr*,这保存在 *fringen*(将布等等中的水拧干)和 *frêd*(即荷兰语的 *wreed*,意为锻炼)中。

以 *hê, dê, wê* 代替 *er, der, wer*。

变格处于高地德意志语和萨克森语间的中间地位。以 *s* 结尾构成复数是常见的,但几乎从来不与尼德兰语相同;这个 *s*,在当地的高地德意志语中,完全符合于语言发展的过程而变成了 *r*。

指小词词尾 *ken, chen*,在 *n* 之后变成了 *schen*,如 *männchen*,复数与尼德兰语相同,也有 *s*(*männches*)。这两种词形,我们可以一直追寻到洛林。

在 *s, st, d, t* 和 *z* 前的 *r* 被省略了;*r* 之前的元音,在某些方言

中仍然是短音,在另一些方言中则变为长音。例如, *hart* 变为 *hatt* (贝格语)和 *haad* (科隆语)。在这里,由于南德意志语的影响, *st* 变做 *scht*;例如 *Durst*,在贝格语里为 *doascht*,在科隆语里为 *döscht*。

同样,由于高地德意志语的影响,词首的 *sl*, *sw*, *st* 和 *sp* 变成了 *schl* 等等。

像尼德兰语一样,里普利安语也没有纯粹的 *g*。毗连萨利克语的一部分方言,比如贝格方言,词首和词中间的 *g* 也变成了送气音 *gh*,但比尼德兰语要软些。其余的方言都有 *j*。在词尾上, *g* 到处都像 *ch* 那样发音,但不像硬的尼德兰语的 *ch*,而像软的莱茵法兰克语的 *ch*,发音类似硬化了的 *j*。里普利安语所具有的实质为低地德意志语的性质,可由诸如以 *boven* 代替 *oben* 这样一些词语而得到证明。

大部分的清辅音,到处都还处于辅音音变的第一阶段。只有南方方言中的 *t* 以及词中和词尾的 *k*,有时还有 *p*,才具有高地德意志语的辅音音变。在这些方言中, *lôten* — *lassen* 变做 *lôsze*, *holt* 变做 *holz*, *rik* — *reich* 变做 *rich*, *ek* — *ich* 变做 *êch*, *pîpe* — *Pfeife* 变做 *pief*。但 *et*, *dat*, *wat* 和另外一些词,却依然未变。

正是这种并未彻底实现的高地德意志语辅音音变在三种场合下的侵入,成为通常划分中法兰克语和下法兰克语的依据。但是这样一来,原来由一定的语音关系——如上所指明的——而相互联系在一起,并且在民众意识中仍然认为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一组方言,现在却被任意地、根据一种完全偶然的特征硬给分开了。

我说,这完全是偶然的。其他的中德意志方言,如黑森、图林根、上萨克森等方言,每一种方言自身,总的说来,都是处于高地德意志语辅音音变的一定阶段上。自然,它们所表现出的辅音音变,可能在

下萨克森的边界上略少些，而在南德意志的边界上较多一些，但这顶多不过是说明地方性差别的依据。相反，在北海沿岸、马斯河畔以及下莱茵的法兰克语，却绝无任何辅音音变，而在阿勒曼尼亚的边界上则差不多只有阿勒曼尼语的辅音音变；在这两种类型之间，至少还有三个中间阶段。由此可见，辅音音变已经侵入独立发展起来的莱茵法兰克语之中，而将其分裂为若干部分。这种辅音音变的最后痕迹，不一定是消失在过去就已存在的单独一组方言的边界上；它可能是在这一组方言内部死亡的，而实际上正是这样。相反，实际构成方言的辅音音变的影响，像下面所要指出的那样，一定是停止在以前就有区别的两组方言的边界上。*schl*, *schw* 等等和词尾的 *scht*，不也是同样地，而且在更晚得多的时候，从高地德意志语侵入到我们这里来的吗？而这些——至少是其中的 *schl* ——甚至深入到了威斯特伐利亚。

早在部分里普利安方言中的 *t* 和词中、词尾的 *k* 以及 *p* 发生音变以前，里普利安诸方言已形成了稳固的一组方言。此种变化在该组方言的内部可能扩展到什么程度，对于这一组方言来说，过去和现在都纯属偶然。诺伊斯的方言，同克雷费尔德方言和门兴格拉德巴赫的方言，除去外地人完全听不出来的细微之处以外都是一致的。虽然如此，其中一种却据说是中法兰克语，另一种据说是下法兰克语。贝格工业地区的方言，在不易觉察之中，在一步步地转变成西南莱茵平原的方言。可是，它们却据说是属于根本不同的两组方言。每一个住在这些地区的人都很容易看出来，在这里，书斋里的博学者是把他们很少知道或完全不知道的活生生的民间方言，硬套在 *a priori* [预先] 虚构出特征的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里去。

这种纯粹表面上的区别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呢？结果是，人们把

各种南里普利安方言跟其他的方言混杂在一起,成为所谓中法兰克语,而如我们就要看到的那样,南里普利安方言同这些方言的关系,比同所谓下法兰克方言更为疏远。可是,另一方面,结果却留下一条狭长的地带,人们不知该如何去对待,最后,只得将其中的一片宣布为萨克森语地区,而将另一片宣布为尼德兰语地区,这种做法完全不符合这些方言的实际情形。

我们试举贝格方言为例来看看吧,布劳讷毫不迟疑地肯定地称这一方言是萨克森语。这种方言,我们知道,它的直陈式现在时所有复数三种人称完全相同,而法兰克语的远古形式则为 *nt*。在贝格方言里, *m* 和 *n* 后面紧跟着辅音时,其前面的 *u* 总是以 *o* 来代替,按照同一布劳讷的意见,这绝非萨克森语所具有的,而是下法兰克语所特有的现象。从上述这一切特征来看,贝格方言同其他里普利安方言是一致的。它在不易察觉之间,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从一个农户到另一个农户,变成为莱茵平原的方言,而在威斯特伐利亚的边境上同萨克森方言却截然分开了。在德意志全境,恐怕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像这里所见的如此分明的语言界线。语言上的距离是多么大啊!整个元音体系就像是彻底改变了;开口度最宽的 *ai* 直接地与开口度窄的下法兰克语的 *ei* 对立,正如 *au* 同 *ou* 相对立一样;在为数甚多的复合元音和半元音之中,没有一个是相同的;这里是 *sch* 跟德意志其他各处一样,而那边是 *s - ch*, 则与荷兰相同;这里是 *wi hant*, 那边是 *wi hebbed*; 这里是作复数使用的双重形式 *get* 和 *enk*, *ihr* 和 *euch*; 那边则只有 *i*, *ji* 和 *ü*, *jü*; 这里把麻雀[Sperling]用普通的里普利安语称为 *Mösche*, 那边则用普通的威斯特伐利亚语叫 *Lüning*。至于其他为贝格方言所独有的特征就不必谈了,这些特征一到边界上,也都同样突然消失了。

一个外来人最能体会到一种方言的特质，是当他所遇到的人不说方言，而说他更能听得懂的标准德语的时候，的确，我们德国人讲标准德语，大多带有方言的强烈影响。可是贝格工业地区的所谓萨克森居民和莱茵平原的居民（他们应该是说中法兰克语），除去一方稍强的送气音 *gh*，在另一方作 *j* 的发音而外，如非本地土生土长的人，是绝对听不出他们说话的差别的。但是，贝格的赫金豪斯人（来自上巴门，在伍珀河左岸），跟住在东面不到一公里远的马克的朗格费尔德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用的本地标准德意志语，其差别之大，远远超过赫金豪斯人同科布伦茨人之间的差别，更不用说同亚琛人或波恩人了。

对于莱茵法兰克人来说，*t* 和词尾 *k* 的音变的侵入，并未造成一种语言分界的印象；因此，甚至在他们极其熟悉的地方，他们也不得不先想想 *t* 同 *z*，*k* 同 *ch* 之间的分界线在哪里，而当他们越过这个界线的时候，两者的发音，对于他们可以说都是一样地顺口。由于许多带有发生音变的 *sz*，*z*，*ch* 和 *f* 的高地德意志单词侵入方言之中，这就显得更容易了。14 世纪的古贝格法院章程（拉孔布莱《档案》第 1 卷第 79 页及以下几页^①）提供了一个显明例证。在这里，我们看到了 *zo*，*uiss* (*aus*)，*zween*，*bezahlen*；此外，同一文句中还有 *setten*，*dat mutteste* (*nützeste*)；除 *reicket* (*reicht*) 之外，还有 *Dache*，*redelich*；除 *verkouffen* 之外，还有 *upladen*，*upheven*，*hulper* (*Helfer*)。在第 85 页上的另一段里，甚至交错地出现了 *zo* 与 *tho* (*zu*)。简单地说，山区的方言跟平原的方言经常地交错在一起，而丝毫也没有引起书写人

① 参看《下莱茵历史档案》第 1 卷第 1 分册第 79—110 页（由约·拉孔布莱于 1832 年在杜塞尔多夫出版）。——编者注

的困惑。像往常一样,淹没法兰克领土的高地德意志语辅音音变最后的波浪,也是最弱最小的。指出它所达到的界线,的确是饶有趣味。但是,这条线不会是一条方言的界线,它不可能将独立的一组自古就属同一语族的方言彼此分开,也不能给人提供借口,来违反一切语言上的事实,把那些被强行分开了的碎片划入关系较为疏远的方言组中去。

2. 中法兰克语 从上面所讲的可以明显地看出,我认为中法兰克语的北面边界比通常所划定的边界要大大地往南。

莱茵河左岸中法兰克地带在克洛维时代看来曾经被阿勒曼尼人所占据,这个事实促使阿尔诺德研究当地的地名来追寻阿勒曼尼人移居的痕迹;并得出结论说:直至科隆—亚琛一线,可以确定在法兰克人之前曾有过阿勒曼尼人的居民,不消说,这样的痕迹,在南方最常见,往北则越来越少。他说,这些地名表明“阿勒曼尼人曾经短期推进到科布伦茨和亚琛地区以外,并在较长时期之内,占领了韦特劳和南部拿骚的地方。因为带有典型阿勒曼尼语词尾 *ach*, *brunn*, *felden*, *hofen*, *mgen*, *schwand*, *stetten*, *wangen* 和 *weiler* 的名称在纯粹的法兰克地区是根本没有的,而从阿尔萨斯起,却散布在普法尔茨全境、莱茵黑森和莱茵普鲁士,只是越向北越少,渐渐让位于主要是词尾为 *bach*, *berg*, *dorf*, *born*, *feld*, *hausen*, *heim* 和 *scheid* 的法兰克语名称。”(《德意志的古代》^①)。

我们首先研究中法兰克地区的所谓阿勒曼尼语的名称。*brunn*, *stetten*, *felden*, *wangen* 等词尾,我在雷曼的地图¹⁸¹(这就是

① 威·阿尔诺德《德意志的古代》1879年哥达版第140—141页。——编者注

我在这里所用的地图,下不赘述)上,在这个地区内,任何地方也未找到过。*schwand* 这个词尾一次见于温韦勒附近的 *Metzelschwander Hof*,再见于兰施图尔北面的 *Schwanden*。因此,两处都是在上法兰克的普法尔茨,而这和我们眼下研究的问题尚无关系。至于词尾 *ach*——我们沿着莱茵河可以看到圣戈阿尔附近的 *Kreuznach*, *Bacharach*, *Hirzenach*, 科布伦茨附近的 *Rübenach* (在施普鲁纳—门克的分区图^①上则为 *Ribiniacus*), *Andernach* (罗马时代称 *Antunnacum*), 以及 *Wassenach*。因为在整个莱茵河左岸,在罗马时代到处都出现有罗曼语化的克尔特语词尾 *acum*, 例如, *Tolbiacum* — *Zülpich*, *Juliacum* — *Jülich*, 贝格海姆附近的 *Tiberiacum* — *Ziewerich*, *Mederiacum*, 所以在大多数场合下,充其量是词形的选择,即以 *ach* 代 *ich*, 有可能显示出阿勒曼尼语的影响。只有 *Hirzenach* (= *Hirschenbach*) 这一词毫无疑问是德意志语,而以前在分区图上,却写的是 *Hirzenowe*, 即 *Hirschenau*, 而不是 *Hirschenbach*。但是,位于比德里希和莱茵贝格之间、紧邻萨利克边境的 *Wallach*, 却如何去解释呢? 这总可以肯定地说不是阿勒曼尼语吧。

摩泽尔河流域也还有一些 *ach*; 例如贝恩卡斯特尔东面的 *Irmenach*, 特里尔附近的 *Waltrach*, *Crettenach*, 萨尔河畔的 *Mettlach*。在卢森堡有 *Echternach*, *Medernach*, *Kanach*; 在洛林, 只有在摩泽尔河右岸有 *Montenach*, *Rodelach*, *Brettnach*。纵然我们可以承认,所有这些名称都意味着阿勒曼尼人的移住地,它们为数也是很少的,而且其分布地点也并未超出中法兰克地区的最南部。

① 指卡·冯·施普鲁纳《中古史和近代史袖珍地图集》,经泰·门克博士重新修订 1880 年哥达第 3 版。——编者注

剩下的 *weiler*, *hofen* 和 *ingen* 还有待深入研究。

首先,词尾 *weiler* 并不能无保留地算做阿勒曼尼语,而是外省拉丁语的 *villarum*, *villare*, 而且在罗马帝国旧的疆界以外出现, 仅仅是极例外的情形。*villare* 之德语化为 *weiler*, 并非阿勒曼尼人的特权, 只不过是他们的偏爱, 把这种词尾大量地使用于新的移住地而已。只要有罗马的 *villaria* 出现, 法兰克人就不得不把这个词尾德语化为 *wilare*, 后来又变做 *weiler*, 或者完全把它丢掉不用。大概他们有时采用这种方法, 有时又采用另一种方法, 同样, 他们肯定也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以 *weiler* 称呼新的移住地, 不过比阿勒曼尼人要少得多。从亚琛附近的 *Eschweiler* 以及从 *Ahrweiler* 往北去, 阿尔诺德连一个以 *weiler* 为词尾的比較重要的地名也没能找到。不过, 地点的现代的意义, 是无关紧要的; 事实是, 在莱茵河左岸, 以 *weiler* 为词尾的地名一直向北几乎延伸到萨利克边界 (*Garzweiler* 和 *Holzweiler*, 距离说尼德兰语的最近的海尔德恩地方还不到五英里); 在 *Eschweiler* 和 *Ahrweiler* 这一线之北, 带有此种词尾的地名至少也有 20 个。这样的地名, 自然, 最常见于由马斯特里赫特经于利希而抵科隆这一条旧日罗马大道的近旁; 其中有两处, 即 *Walwiller* 和 *Nyswiller*, 甚至位于荷兰领土上——这也是阿勒曼尼人的移住地吗?

再向南去, 在艾费尔高原, 这样的地名几乎一个也没有, 在马尔梅迪地段(雷曼地图, 第 159 图)连一个也见不到。在卢森堡, 这样的名称也很少, 在摩泽尔河下游直到洪斯吕克山的脊背上, 同样也不多见。相反, 在摩泽尔河上游, 这种名字在河的两岸都很多, 向东去更多, 萨尔路易以东, 这些词尾越来越占支配地位。不过, 从这里起, 也就开始出现了上法兰克语言, 而且, 在这里, 任何人也不会否认, 阿勒

曼尼人曾在法兰克人之前占领过这一带土地。

因此,在中法兰克和里普利安领土上,这些 *Weiler*,跟法兰西为数很多的 *villers* 一样,并没有证明这些地方是阿勒曼尼人的移住地。

现在我们来研究 *hofen*。这个词尾更加不是阿勒曼尼人所专有的。它出现在整个法兰克领土上,其中包括后来由萨克森人占领的今天的威斯特伐利亚。在莱茵河右岸只有几个例子:在鲁罗尔特附近的 *Wehofen*,杜伊斯堡附近的 *Mellinghofen* 和 *Eppinghofen*,梅特曼附近的 *Benninghofen*,丁斯拉肯附近的另一个 *Eppinghofen*,在威斯特伐利亚的多尔斯滕附近的 *Kellinghofen*,卡斯特罗普附近的 *Westhofen*,还有 *Wellinghofen*, *Wichlinghofen*, *Niederhofen*,两个 *Benninghofen*, *Berghofen*, *Westhofen*, *Wandhofen* ——所有这些都在黑尔韦格,等等。直至异教时代,在阿格河畔还有 *Ereshofen*,即 *Martis villa* [玛尔斯城],单从战神在这里被称为 *Eru* 这一件事,就足以证明,说这里有阿勒曼尼人是不可思议的;他们自称为 *Tiuwâri*,因之,不称他们的神为 *Eru*,而称为 *Tiu*,以后经过辅音音变,成为 *Ziu*。

在莱茵河左岸,说 *hofen* 是起源于阿勒曼尼语,就更不行了。在这里,又有一个 *Eppinghofen* 在克桑滕的东南方,因而,也许这里已经是属于萨利克人的了,从这里向南去,在全部里普利安领土上,除了孤立的庄户以 *hof* 为词尾以外,到处都群集着 *hofen* 的地名。我们一经踏上萨利克的领土,那就更糟糕。沿马斯河的两岸,从法兰西语言的界线起,到处都是 *hofen*。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可以看看西岸。在那里,我们在荷兰和比利时至少可以找到七个 *Ophoven*,在荷兰有 *Kinckhoven* 等等;在比利时,我们首先看看勒文地段(雷曼地

图,第 139 图)吧。这里在通厄伦附近有 *Ruykhoven, Schalkhoven, Bommershoven, Wintershoven Mettehoven, Helshoven, Engelmanshoven*, 在哈瑟尔特附近有 *Zonhoven, Reekhoven, Konings-Hoven*; 再往西去, 在圣特勒伊登附近有 *Bogenhoven, Schuerhoven, Nieuwenhoven, Gippershoven, Baulershoven*; 极西处, 在蒂勒蒙(蒂嫩)的东面和东北面, 有 *Gussenhoven* 和 *Droenhoven*。在蒂伦豪特地段(第 120 图)至少有 33 个 *hoven*, 大多数都在比利时领土上。再向西南去, *hove*(第三格词尾 *n* 在这里一律省略了)分布于全部法兰西语言的边界线上; 从 *Ninove*[尼诺弗](它自己就是一个罗曼语化了的 *hove*)附近的 *Heerlinkhove* 和 *Nieuwenhove* 起(这中间, 大约还有 10 个, 我都略去了), 到迪克斯迈德附近的 *Ghyverinckhove* 和 *Pollinchove* 以及法属佛兰德的圣奥梅尔附近的 *Volckerinckhove*。*Nieuwenhove* 出现了三次; 这就证明这一词尾仍然活在人民之中。除此以外, 还有许多以 *hof* 为词尾的孤立的庄户。所谓 *hofen* 的阿勒曼尼语专属性, 据此就可加以评断了。

最后, 谈谈 *ingen*。用 *ing, ung* 来表示同一的起源, 这是所有日耳曼民族的共同之处。因为移住是以氏族为单位进行的, 所以这一词尾, 在各地地名上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有时这个词尾, 用第二格复数同一个地方的词尾结合起来, 例如, 明登附近的 *Wolvarad-inga-husun*, 英格兰的 *Snotingaham*(诺丁汉)。有时, 这一词尾的复数即可单独用来构成地名; 例如, 荷兰弗里斯兰省的 *Flissingha*(弗利辛恩), *Phladirtinga*(弗拉尔丁恩), *Crastlingi* 和旧萨克森的 *Grupilinga, Britlinga, Otlinga*。这些名称, 现在大多数都已还原为第三格, 并且以 *ingen* 为词尾, 而 *ing* 则很少见。大多数的民族都熟悉并使用这两种词形; 阿勒曼尼人似乎主要使用后一种, 至少现在是

这样。^①但是这样的词形也同样出现在法兰克人、萨克森人和弗里西安人中间,因此,从出现带有 *ingen* 词尾的地名,便马上断定那是阿勒曼尼人的移住地,就过于冒失了。

上面举出的名称证明,以 *ingas* (复数第一格)和 *ingum, ingon* (复数第三格)结尾的名称,从斯海尔德河到易北河,不论在弗里西安人那里或萨克森人那里,都不是什么非同寻常的事。即在今日,在全部下萨克森 *ingen* 也依然不稀罕。在威斯特伐利亚,单是在鲁尔河两岸,翁纳—索斯特一线以南,除开 *ingsen* 和 *inghausen* 不算,至少可以找到 12 个 *ingen*。只要是在法兰克领土上,我们到处都可以找到以 *ingen* 为词尾的地名。

在莱茵河右岸,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在荷兰,莱茵河畔有 *Wageningen*, 艾瑟尔河畔有 *Genderingen* (在这里,我们排除一切可能是弗里西安的名称);在贝格地区有 *Huckingen, Ratingen, Ehingen* (紧接着,在萨克森的领土上,有 *Hattingen, Sodingen, Ummingen*), 韦尔登附近有 *Heisingen* (格林认为这来自塔西佗的 *Silva Caesia* [凯西亚森林], 可见已很古远), *Solingen, Husingen, Leichlingen* (在分区图上则为 *Leigelingon*, 可见已有上千年之久), *Quettingen* 以及锡格河畔的 *Bödingen* 和 *Röcklingen*, 另有两个以 *ing* 为词尾的地名尚未

① 勒拉赫附近的 *Rümmingen*, 从前(764年)叫做 *Romaninchova*, 所以, 士瓦本的 *ingen*, 许多都是源出于较近的年代(莫讷《巴登地方古代史》第1卷第213页)。瑞士的 *kon* 和 *kofen*, 差不多都是由 *inghofen* 缩写而成的;例如, *Zollinchovun — Zollikhofen, Smarinchova — Schmerikon*, 等等。参看弗·博伊斯特:《简明苏黎世州历史地图集》。在这本书里面,这样的地名,在那代表阿勒曼尼人时代的第三图上,整打整打地出现。

计算在内。莱茵布罗尔附近的 *Hönningen* 以及维德河一带的 *Ellingen*, 构成了同莱茵河、兰河、迪尔河之间这一地区的联系, 这里, 至少也有 12 个 *ingen*。再往南去找就没有意义了, 因为从这里开始就是阿勒曼尼人确曾移住过一个时期的地方。

在莱茵河左岸, 在荷兰的尼姆韦根的上面有 *Millingen*, 克桑滕下面有 *Lüttingen*, 莱茵贝格下面又有一个 *Millingen*, 其次还有 *Kippingen*, *Rödingen*, *Hönningen*, *Worringen*, *Fühlingen*, 都在科隆的北面, 在布吕尔附近有 *Wesselingen* 和 *Köttingen*。从这里起, 以 *ingen* 为词尾的地名, 分两个方向向前伸展。在上艾费尔, 这样的地名很少; 在法兰西语言边界线上的马尔梅迪, 我们看到有 *Büllingen*, *Hünningen*, *Mürringen*, *lveldingen*, *Eibertingen*, 它们成了向卢森堡以及在普鲁士和洛林境内的摩泽尔河上游为数极多的 *ingen* 的过渡。另一条连结线, 则顺着莱茵河及其沿岸谷地(阿尔河地区——7 到 8), 最后又沿着摩泽尔河谷走向特里尔上面一带去, 在这里 *ingen* 占到支配的地位, 不过, 首先是结尾为 *weiler* 的名称, 然后是结尾为 *heim* 的名称把它跟大多数的阿勒曼尼—士瓦本的 *ingen* 分开了。因此, 如果我们按照阿尔诺德的要求, “相互联系地去考虑一切情况”^①, 我们就要做出这样的结论: 德意志境内摩泽尔河上游地带的 *ingen*, 是法兰克人的, 不是阿勒曼尼人的。

一当我们从亚琛附近的法兰西—里普利安语的语言界线开始, 在萨利克语地区探寻 *ingen* 的时候, 我们就会更加明白, 我们在这里无须借助于阿勒曼尼人。在马斯河西岸的马塞克附近有 *Geystingen*, 再向西去, 在布雷附近有 *Gerdingen*。其次, 倘使我们再拿第

^① 威·阿尔诺德《德意志的古代》1879年哥达版第141页。——编者注

139 图勒文地段来看,我们就会看到在通厄伦、圣特勒伊登及哈瑟尔特地区,有 *Mopertingen, Vlytingen, Rixingen, Aerdelingen, Grim-mersingen, Gravelingen, Ordange* (而不是 *Ordingen*), *Bevingen, Hatingen, Buvingen, Hundelingen, Bovelingen, Curange, Raepertingen, Boswinningen, Wimmertingen* 等等。最西部,离勒文不远的地方有 *Willebringen, Redingen, Grinningen*。在这里,联系似乎中断了。可是当我们走进那个目前在讲法兰西语、而在 6—9 世纪之间两种语言在角逐的地区,我们就可以发现,从马斯河起有整整一个法兰西语化了的 *ange* 的地带;这一词形,在洛林和卢森堡同 *ingen* 也相对应;自东向西走,有 *Ballenge, Roclenge, Ortrange, Lantremange, Roclang, Libertange, Noderange, Herdange, Oderinge, Odange, Gobertang, Wahenges*;再稍向西去有瓦夫尔附近的 *Louvenge* 和滑铁卢附近的 *Revelinge*, 它们跟 *Huysingen* 和 *Buisingen*, 也就是跟散布在布鲁塞尔西南、自哈勒到格拉蒙这条语言分界线上的一批二十多个 *ingen* 的前哨联系起来。最后,在法属佛兰德有 *Gravelingen, Wulverdinghe* (就是旧萨克森的 *Wolvaradinges — hûsun*), *Leubringen, Leulinghen, Bonninghen, Peuplingue, Hardingen, Hermelinghen*;在圣奥梅尔附近直到布洛涅后面,有 *Herbinghen, Hocquinghen, Velinghen, Lottinghen, Ard-ingen*, 所有这些,同在这一地区为数更多的以 *inghem* (= *ingheim*) 为词尾的地名,是有显著区别的。

由此可见,阿尔诺德认为是阿勒曼尼语所专有的三个词尾,已经证明也同样是法兰克语的词尾,因此,想根据这些地名来证明在中法兰克领土上,在法兰克人移住之前曾经有过一次阿勒曼尼人的移住,这种企图不得不被认为已经失败了。不过,在这一地带的最东南部,

曾经存在过一种不甚强大的阿勒曼尼人的因素,这种可能性还是可以承认的。

阿尔诺德将我们从阿勒曼尼人转而引到卡滕人。据说,除开真正的里普利安人以外,这些卡滕人在阿勒曼尼人之后和与之同时,曾占据里普利安区以南的领土,也就是我们称为中法兰克和上法兰克的地方。这一点的根据也在于这个地方除去阿勒曼尼亚的地名以外,还有黑森的地名:

“直至阿勒曼尼亚的境界,莱茵河两岸地名的相同是如此怪异而引人注意,如果说这是偶然的,那倒是真正的奇迹了;相反,只要我们假定,移住者把他们故乡的地名也赋予新的住地,就像目前美洲天天都在发生的那样,那么,这便显得极其自然了。”^①

要反对这个论点,是说不出什么理由的。而说真正的里普利安人同移住整个中法兰克和上法兰克地方毫无关系。并且认为我们在这里所见到的只有阿勒曼尼人和卡滕人,这样的结论,就更少有理由来反对了。大部分离开故乡向西迁移的卡滕人(如像过去巴达维人、堪尼内伐特人和哈图阿里人那样),大概从来就是跟路易斯卡伏南人结伴而行的,否则他们究竟移向何处去了呢?在公元最初两个世纪中,卡滕人只是在背后通过图林根人,才同其余的赫米诺南人联系起来;一面有印格伏南族的凯鲁斯奇人,另一面有易斯卡伏南人,而在前面则有罗马人。后来统一成为阿勒曼尼人的赫米诺南各部落,来自日耳曼尼亚腹地;这些部落同卡滕人自数世纪以来被图林根人及其他民族所隔断,因此同他们的关系要比易斯卡伏南族的法兰克人同他们的关系疏远得多,因为数百年之久的战友情谊将他们和法兰

^① 威·阿尔诺德《德意志的古代》1879年哥达版第156页。——编者注

克人结合在一起了。可见卡滕人参加占领该地,是没有疑问的,而把里普利安人排除在外,倒是可疑的。只有在这里没有出现里普利安语所特有的地名时,这一点才能得到证实。但事实恰恰相反。

在阿尔诺德举出的那些作为法兰克语所特有的词尾之中,*hausen* 是法兰克人、萨克森人、黑森人和图林根人所共有的;*heim* 在萨利克语里读做 *ham*, *bach* 在萨利克语和在下里普利安语里读做 *beek*; 在其他词尾之中,只有 *scheid* 是真正独特的。它是里普利安语所特有的,正如 *ich*, *rath* 或 *rade* 和 *siepen* 那样。其次,两种法兰克方言所共有的,还有 *loo* (*loh*), *donk* 和 *bruch* 或 *broich* (萨利克语——*broek*)。

Scheid 只出现在山区,而且照例都是在分水岭的地方。法兰克人在整个威斯特伐利亚的绍尔兰山,都留下了这个词尾,一直达到黑森的边境,在这里,它只作为山名出现,东面直到科尔巴赫。在鲁尔河畔,与古代法兰克语的 *scheid* 相对应的是经过萨克森语改造的词尾 *schede*, 例如, *Melschede*, *Selschede*, *Meschede*; 与它们紧挨,还有 *Langscheid*, *Ramscheid*, *Bremscheid*。在贝格语中常见的这种词尾,在莱茵河右岸直至韦斯特林山都可以看到,再往南就没有了。相反,在莱茵河左岸,不消说,只有到了艾费尔高原才开始出现 *scheid*^①; 在卢森堡,这种地名至少有 21 个;在霍赫瓦尔德山和洪斯吕克山里,它经常出现。但是,正如在兰河以南那样,在这里,在洪斯吕克山和松林山的东面和南面,与之并列地又出现了一个似乎是黑森语化的词尾 *schied*。这两种词形并列向南,越过纳厄河直达孚日山脉,在这

① 在平原上,我只有在比利时林堡的哈瑟尔特东面找到了 *Waterscheid*, 而在这里,如上所述,我们已经看到有显著的里普利安语的混合物了。

里,我们看到,在唐纳山西面有 *Bisterscheid*,在凯撒斯劳滕附近有 *Langenscheid*,在上施派尔南方有 *Breitscheid* 台地,在比奇附近有 *Haspelscheid*,吕策尔施泰因北面有 *Scheidwald*;最后,作为最南面的前哨是在多农山北坡的 *Walscheid*,这比阿尔诺德认为是卡滕人最远的前哨的萨尔堡附近的黑森村,还要往南些。

其次,里普利安语所专有的还有 *ich*,它跟 *ach* 一样,都是从同一个哥特语词根 *ahva* —Wasser 来的;正如 *Tiberiacum* 所表明的那样,两者也都把比利时—罗马语的 *acum* 德语化了,在分区图上写做 *Civiraha*,现在则为 *Ziewerich*。在莱茵河右岸,这样的词尾不太多;鲁罗尔特附近的 *Meiderich* 和 *Lirich* 是最靠北面的;从那里起,这一词尾沿莱茵河前进,直达 *Biebrich*。在莱茵河左岸的平原上,从韦瑟尔河对岸的 *Büderich* 起,到处都有这个词尾;经过艾费尔高原,伸展到霍赫瓦尔德山和洪斯吕克山,但在 *scheid* 和 *roth* 尚未停止出现以前,它就在松林山和纳厄河地区消失了。相反,在这个地区的西部,这一词尾却继续前进,直达法兰西语言的界线,并且更向前去。在特里尔地方,这一词尾为数甚多,我们不去管它;在荷兰的卢森堡,这样的词尾我找到了 12 个;还是在那一边,在比利时,有 *Törnich* 和 *Merzig* (*Messancy* — *ig* 的写法丝毫未变,词源和发音是相同的)。在洛林,摩泽尔河以西有 *Soetrich*, *Sentzich*, *Marspich*, *Daspich*;以东有 *Kuntzich*, *Penserich*, *Cemplich*, *Destrich*, 两个 *Kerprich*, *Hibrich*, *Hilsprich*。

词尾 *rade*、*rad*、莱茵河左岸的 *rath*,也远远超出了它们古代里普利安故乡的边界。它布满了整个艾费尔高原和摩泽尔河中下游的谷地及其旁边的谷地。在 *scheid* 和 *schied* 混用的同一地方,在莱茵河两岸,除 *rad* 和 *rath* 之外,同时出现了 *rod* 和 *roth*,同样起源于黑

森语。只有在莱茵河右岸,在韦斯特林山, *rod* 向北走得更远。在霍赫瓦尔德山脉,北坡为 *rath*,南坡则通例为 *roth*。

向前推进得最少的是 *siepen*,音变为 *seifen*。这个词的词义是指坡陡的小溪谷,现在依然普遍用在这个意义上。在莱茵河左岸,它越过古代里普利安的边界并不远,在右岸,它出现在尼斯特尔河畔的韦斯特林山,还出现在朗根施瓦尔巴赫(朗根赛芬)附近。

研究其他的词尾,恐怕就跑得太远了。但是,不管怎样,自宾根沿莱茵河溯流而上,深入阿勒曼尼人的领土,并且在凡有法兰克人定居的地方到处都有的那无数的 *heim*,我们都可以解释为里普利安语,而不是卡滕语。它们的故乡不是黑森,因为在那里,它们很少出现,似乎是以后才侵入的,而是萨利克和科隆周围的莱茵平原,因为它们在这里出现的次数,跟其他里普利安语所特有的名称差不多相等。

由此可见,这一研究的结果表明,里普利安人绝对没有因黑森人迁徙的浪潮而被阻止于韦斯特林山和艾费尔高原附近,恰恰相反,他们甚至席卷了整个中法兰克领土。而且,他们向西南方发展到摩泽尔河上游地区去的势力,比向东南方到陶努斯山脉和纳厄河流域的势力更大。这也可由语言获得证明。西南方的方言,直至卢森堡和西部洛林,同里普利安语的关系,远比东方——特别是莱茵河右岸——的方言跟它的关系要近得多。西南方的方言可以认为是受到更多高地德意志语音变影响的里普利安语的延长。

中法兰克方言的特征,首先表现在高地德意志语音变的侵入。不单是若干清爆破音音变为送气音(这只牵涉到比较少数的单词,而不触及方言的性质),而是浊爆破音开始音变,造成中德意志语和南德意志语中的 *b* 和 *p*, *g* 和 *k*, *d* 和 *t* 的一种特殊的混合。只有在字首的 *b* 和 *p*, *d* 和 *t*, *g* 和 *k* 不能严格地辨别,也就是在法兰西人特别

地理解为 *accent allemand* [德意志音调] 的地方, 才会使低地德意志人感觉到第二个辅音音变在德意志语言中所撕开的大裂口。这一裂口穿过锡格河同兰河之间, 阿尔河同摩泽尔河之间。与此相应, 中法兰克语在词首有一个 *g*, 这是更靠北方的方言所缺少的, 而在词中和词尾, 则 *g* 的发音等于软化的 *ch*。此外, 北方方言的 *ei* 和 *ou*, 则转变为 *ai* 和 *au*。

几个真正的法兰克语的特征: 在所有萨利克方言和里普利安方言中, *Bach* ——即未经辅音音变的 *Beek* ——是阴性的。这至少也适用于绝大部分, 即西部中法兰克语。像尼德兰和下莱茵无数的其他同名的溪流一样, 卢森堡的 *Glabach* (*Gladbach*, 尼德兰语——*Glabeek*) 也是阴性。相反, 少女的名字却被当做中性名词: 从巴门起, 一直超出特里尔, 人们不但说 *das Mädchen*, *das Mariechen*, *das Lisbethchen*, 而且还说 *das Marie*, *das Lisbeth*。在当初由法兰西人绘制的地图上, 在洛林的福尔巴克附近标着一个“*Karninschesberg*” (*Kaninchenberg*)。可见, 也就是我们在上面确定为里普利安语的那个指小词词尾——*schen*, 复数为 *sches*。

从摩泽尔河同纳厄河的分水岭以及莱茵河右面, 兰河以南的丘陵地带起, 新的一组方言开始了。

3. 上法兰克语 这一地带, 毫无疑问最初是阿勒曼尼人占领的地区(我们不谈更早一些时候它被梵乡人等等占据过, 关于这些人的部落亲属关系和语言, 我们一无所知), 而在这一地带, 也混有较强烈的卡滕人的成分, 对此我们可以承认。但是我们无须重述, 即使在这里, 地名也显示出存在有并非无关紧要的里普利安因素, 特别是在莱茵平原上。语言本身尤其证明是如此。现在让我们看一看最南部的可确定的方言普法尔茨方言吧, 这是同时还有文献存在的方言。在

这里,我们看到了,一般法兰克语在发音上,除将词中间和词尾的 *g* 读做软化的 *ch* 外,不可能读成其他的音^①。在那里,人们说 *Vöchel*, *Flechel*, *geleche* (*gelegen*), *gsucht* — *gesagt*, *licht* — *liegt* 等等。同样,一般的法兰克语单词中间的 *b* 由 *w* 代替,例如, *Bûwe* — *Buben*, *glâwe* — *glauben* (但说 *i glâb*), *bleiwe*, *selwer* — *selbst*, *halwe* — *halbe*。辅音的音变,远不如表面看上去那样彻底,甚至发生辅音的逆转音变,特别是在外来语中,即词首的清辅音的音变,不是向前推进了一个阶段,而是向后倒退了一个阶段;如下面所指出的 *t* 变 *d*, *p* 变 *b*。词首的 *d* 和 *p* 还停留在低地德意志语的阶段,如 *dûn* — *thun*, *dag*, *danze*, *dûr*, *dot*。但在 *r* 之前则不然,例如 *trinke*, *trage*; *paff* — *Pfaff*, *peife*, *palz* — *Pfalz*, *parre* — *Pfarrer*。但是因为 *d* 和 *p* 代替了高地德意志语中的 *t* 和 *pf*,所以在外来语中,词首的 *t* 逆转音变为 *d*,词首的 *p* 逆转音变为 *b*。例如 *derke* — *Türke*, *dafel* — *Tafel*, *babeer* — *Papier*, *borzlan* — *Porzellan*, *bulwer* — *Pulver*。其次,普法尔茨语不许元音之间有清爆破音,在这一点上,只同丹麦语是一致的,例如, *ebbes* — *etwas*, *labbe* — *Lappen*, *schlubbe* — *schlupfen*, *schobbe* — *Schoppen*, *Peder* — *Peter*, *dridde* — *dritte*, *rodhe* — *raten*。只有 *k* 是一个例外: *brocke*, *backe*。但在外来语中则有 *g*,例如 *musigande* — *Musikanten*。这也是借助于辅音的逆转音变而不断扩展的低地德意志语音阶段上的一个残余^②;仅

① 所有的引文都是摘自卡·哥·纳德勒《快乐的帕尔茨,上帝保佑你!普法尔茨方言诗》1851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② 恩格斯用铅笔在空白的右半页上写道:“同奥特弗里德相符”。——编者注

仅是由于 *dridde*, *hadde* 没有发生辅音音变, *Peter* 才能够变为 *Peder*, 因而, 与此相对应的高地德意志语的 *t* 也受到了同样公平的待遇。 *halde* — *halten*, *alde* — *alte* 等词中的 *d*, 同样仍停留在低地德意志语的阶段上。

低地德意志人受到了肯定是高地德意志语的整体影响, 尽管如此, 普法尔茨方言也根本没有接受, 哪怕是我们书面语言所保留的高地德意志语的辅音音变。相反, 普法尔茨语却借助它的辅音逆转音变来抵制高地德意志语的音变阶段, 这一音变阶段是从外面侵入的, 直至今日, 在这种方言之中, 依然显示出它是一种外来的因素。

在这里, 指出一个常被误解的现象是适宜的, 这就是, 方言中的浊爆破音发生了高地德意志语音变的那些德意志人, 把 *d* 和 *t*, *b* 和 *p*, 甚至 *g* 和 *k* 的发音相混淆。这种混淆只要在每个人说他自己的方言时, 就不会发生。相反, 如刚才所述, 例如普法尔茨人在这一点上区分十分严格, 以致当他说外来语的时候, 甚至也实行辅音的逆转音变, 来使它们适应自己方言的要求。仅仅因为书面德意志语的 *t* 同他的 *d* 相对应, 他就把外来语词首的 *t* 变成 *d*, 因为书面德意志语的 *pf* 同他的 *p* 相对应, 于是就把外来语的 *p* 变成 *b*。在其他南德意志方言中, 只要人们讲方言, 就不会把清辅音混淆起来。其中每种方言都有它自己特有的、严格实行的辅音音变规则。但是, 一讲书面语或外国语, 情形便不同了。想把一地方言的辅音音变规则应用到外国语的尝试(这种尝试是无意识的), 跟正确地讲这种新语言的尝试, 发生冲突了。在这种情况下, 写出来的 *b* 和 *p*, *d* 和 *t*, 丧失了一切确定的意义; 因而, 也就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例如, 白尔尼在他的巴黎来信中抱怨说, 法兰西人不能区别 *b* 和 *p* 的发音, 因为他们顽固地

认为,他的姓(他自己的发音为 *Perne*)头一个字母是 *P*。①

不过,还是回头来谈普法尔茨方言吧。高地德意志语的音变可说是从外面强加于它的,直至今日依然是一种外来的因素,而且绝未达到书面语的语音阶段(而阿勒曼尼人和巴伐利亚人则远远超过了它,大体都保持着古代高地德意志语的某种阶段)——仅这一个证据就足以确定普法尔茨语的主要是法兰克语的性质了。因为甚至在更靠北方的黑森,一般地说,音变比较彻底,因而就把普法尔茨语的所谓主要是黑森语的性质,缩小到了微不足道的地步。在紧靠阿勒曼尼语的境界上,在留居下来的阿勒曼尼人中间,如果要以这样大的力量来抗拒高地德意志语的音变,除去本身基本上就是高地德意志人的黑森人以外,至少还需要同样为数甚多的里普利安人也停留在当地。他们的存在除去通过地名以外,还可通过两种一般法兰克语的特征来证明,这就是在单词中间,保留法兰克语的 *w* 以代替 *b*, 单词中间和末尾的 *g* 发音为 *ch*。此外还有许多个别相一致的情况。普法尔茨语中的 *Gundach* — *guten Tag*, 一直通行到敦刻尔克和阿姆斯特丹。正如在普法尔茨,把 *ein gewisser Mann* 说成 *ein sichrer Mann*, 在整个尼德兰则说成 *een zekeren man*。把 *Handschuh* 叫做 *Handsching*, 这是和里普利安语的 *Händschen* 一致的。甚至在 *Ghannisnacht* (*Johannisnacht*) 中,以 *g* 代 *j*, 也是里普利安语的现象,而且像我们所看到的,一直通行到明斯特兰。并且,为全部法兰克人(连尼德兰人也在内)所共有的 *baten* (*bessern, nützen*, 从 *bat* — *besser* 来), 也通行于普法尔茨。例如, *'s badd alles nix* — *es hilft Alles*

① 路·白尔尼《巴黎记述》,载于《白尔尼文集》1862年汉堡—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3卷第19—21页。——编者注

nichts; 在这里, 甚至 *t* 并不像高地德意志语那样音变做 *tz*, 而是像普法尔茨语那样, 软化为在元音之间的浊辅音 *d*。

卡·马克思

乔治·豪威耳先生的 国际工人协会史¹⁸²

有关国际工人协会历史的不实之作为数甚多，最近又添新篇（见今年7月的《19世纪》）。我认为费些笔墨加以剖析不无必要，因为最近出现的这位协会史作者乔治·豪威耳曾当过工人，又当过该协会总委员会委员，人们可能错误地认为他的高论是从一般人接触不到的材料中汲取的。

豪威耳先生的《协会史》一开头就避而不谈以下事实：1864年9月28日我出席了国际成立大会，在会上被选入临时总委员会，此后不久我起草了协会的《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①，章程最初于1864年在伦敦发表，后又经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通过。

豪威耳先生知道这一切情况，然而他为了自己的目的，偏让“一位名叫卡尔·马克思的德国博士”第一次出现在“1865年9月25日召开的”伦敦“代表大会”上。豪威耳硬说，就是在那次会上，所说的这位“博士”曾“因提出宗教观念而播下了纷争和瓦解的种子”。

^① 当时称作《临时章程》。——编者注

首先,国际在1865年9月召开的不是“代表大会”¹⁸³。大陆上协会各主要支部的一些代表在伦敦举行了一次会议,惟一的目的是同总委员会一起商讨1866年9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议程。这次代表会议的实际工作是在秘密会议上,而不是在只有一丝不苟的历史学家乔治·豪威耳先生一个人提到过的什么阿德菲坊半公开大会上进行的。

我和总委员会的其他代表一样,必须争取代表会议接受我们提出的议程。当这个议程发表时,法国历史学家昂利·马丁在给《世纪报》写的一篇通讯里作了如下的评语:

“决定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定于明年召开)议程上各项议题的那种远大的见解和卓越的道德观点、政治观点、经济观点,将赢得欧洲所有拥护进步、正义和自由的人们的一致赞同。”^①

顺便说一下,我有幸替总委员会起草的议程^②有一条是这样写的:

“必须通过实现民族自决权原则和在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重建波兰,来消除俄国佬在欧洲的影响。”

昂利·马丁对这一条文是这样评述的:

“我们可以指出,‘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基础’一语,就波兰而言,意思是很简单明了的,因为在那里,社会结构也像政治结构一样需要重建,在那里,这种基础已经为1863年的无名政府的法令所奠定,并为全国所有各阶级所接受。这也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同正义和自由相一致的社会进步对俄国村社专制制度扩张所作的回答。这个本来属于巴黎人的秘密如今正在成为欧洲各国人民共

① 昂·马丁《国际工人协会》,载于1865年10月14日《世纪报》第11171号。——编者注

② 指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议程。——编者注

同的秘密。”^①

不幸的是，“巴黎人”如此严守自己的“秘密”，以致出席代表会议的两位巴黎代表（一位是托伦，现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参议员，另一位是弗里布尔，现在不过是个叛徒）由于对这个秘密一无所知，恰恰抨击了后来受到法国历史学家如此热情评述的这一项议题。

总委员会的议程上没有一个字谈到“宗教”，然而在巴黎代表的要求下，这道禁菜被列入了为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准备的菜单中，提法是这样的：

“各种宗教观念（是“各种宗教观念”，而不是豪威耳所胡说的“宗教观念”）及其对社会、政治和精神发展的影响。”

巴黎代表提出的这个议题交给他们自己去处理了。事实上，在1866年的日内瓦代表大会上，他们自己也放弃了它，以后再也没有人提起过。

乔治·豪威耳先生的三重神话——1865年的伦敦“代表大会”，“一位名叫卡尔·马克思的德国博士”在会上“提出宗教观念”，从而在国际内部引发一场恶斗——最后又冠以奇谈一则。他说：

“在就奴隶制的废除而写给美国人民的一封贺信的草稿中，‘上帝以同一血

^① 这段话是列入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议程的议题之一。其中“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基础”一语，马克思在1865年12月和1866年6月两次对议程的文字加以整理时，用的都是“民主与社会的基础”。昂利·马丁在文章中援引的也是“民主与社会的基础”，但马克思在本文下文中转引时，“社会的”一词同样改用了“社会主义的”。——编者注

脉创造出所有民族的人’一语^①被删掉了”，云云。

总委员会的确发出过一封贺信，但不是给美国人民的，而是给他们的总统阿伯拉罕·林肯的，他郑重地对贺信表示了答谢¹⁸⁴。我起草的这封贺信没有经过任何改动。信中根本没有“上帝以同一血脉创造出所有民族的人”一语，因此也就无从“删”起。

以下事件清楚地说明了总委员会对“宗教观念”的态度。——米哈伊尔·巴枯宁所创建的同盟¹³³的一个瑞士支部（它自称为**无神论社会主义者支部**），曾向总委员会申请加入国际，得到的答复是：

“总委员会曾经就‘基督教青年会’一事宣布过，它不承认任何有**神论支部**”（见《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总委员会通告》日内瓦版第13页）。

就连乔治·豪威耳先生自己——他当时还没有因钻研《基督教读本》而成为基督徒——之所以同国际终于彻底决裂，也并不是因受“宗教观念”的感召，而是完全出于世俗的理由。在创办总委员会的“专门机关报”《共和国》时，他一心谋求编辑的“高位”。在这次“雄心勃勃的”尝试失败以后，他开始不满起来，劲头越来越小，不久就销声匿迹了。因此，在国际最有事可记的时期他是个局外人。

他明知自己根本没有能力追述国际的历史，但是又很想用一些奇事秘闻来点缀自己的文章，于是就附和所谓克吕泽烈将军在芬尼社员闹事¹⁸⁵期间出现在伦敦的说法，说什么这位将军在牛津街拉脱本广场的黑马咖啡馆里会见了“几个人，幸而是英国人”，以便让他们参与他的“总起义”的“计划”。我有理由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但是

^① 《新约全书·使徒行传》第17章第26节。旧译“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编者注

假定真有这样的事情,这也不过证明:克吕泽烈并没有愚蠢得光临总委员会来兜售他的“计划”,而是明智地把这一殊荣留给了豪威耳先生熟识的“几个英国人”。说不定豪威耳先生本人就是这几个穿麻布衣服的好汉^①之一。这几个好汉凭着他们“幸而”进行的干预,竟然拯救了不列颠帝国和欧洲,使之免于地覆天翻的大动乱。

乔治·豪威耳先生还透露了一个阴暗的秘密。

1871年6月初,总委员会发表了一篇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这篇宣言遭到了伦敦报界的同声咒骂。有一家周刊攻击“恶名昭彰的作者”怯懦地将自己的名字隐藏在总委员会的帷幕后面。为此我在《每日新闻》上声明,我就是宣言的作者。到了1878年7月,乔治·豪威耳先生竟完全像幕后人一样得意扬扬地透露这件已经过时的秘密:

“这篇宣言的作者是卡尔·马克思博士……乔治·奥哲尔先生和鲁克拉夫特先生两人在它(原文如此!)^②被通过时都是总委员会委员,在它发表以后,他们都表示不予承认。”

他忘了补充一句,到会的其余19位英国委员都是热烈拥护《宣言》的。

从那时以来,这篇宣言中的论述被法国乡绅议会的调查报告¹⁸⁶、凡尔赛军事法庭上的证词、茹尔·法夫尔的审判案¹⁸⁷以及那些对胜利者远非敌视的人们的回忆录完全证实了。

像乔治·豪威耳先生这样学识渊博的英国历史学家,对法国的

① 此处套用了莎士比亚剧作《亨利四世》上篇第2幕第4场中“穿麻布衣服

② 豪威耳的原文此处有语法上的疏漏。——编者注

文献,不管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一概不屑一顾,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像发生赫德尔和诺比林谋刺案¹⁵⁴这样的时侯,看到伦敦的大报竟然一再重复它们自己的通讯员、目击者已首先加以驳斥的那些卑鄙诽谤,我实在感到厌恶。

豪威耳先生在谈论总委员会的财务时,简直是极端的势利眼。

总委员会在它公布的1869年向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嘲笑了欧洲警察无事生非的嘴和资本家荒谬绝伦的想像力加在它名下的巨额财富。报告中说:

“要是这些人——尽管都是好基督徒——活在基督教萌芽时代的话,他们一定会跑到一家罗马银行去查查圣保罗账上有多少存款。”^①

厄内斯特·勒南先生——他当然不太符合乔治·豪威耳先生的正统标准——甚至竟认为,用国际支部的情况来说明原始基督教公社¹⁸⁸致力于摧毁罗马帝国的情况,再恰当不过了。

乔治·豪威耳先生作为著作家来看,是结晶学家会称之为“假晶”^②的人物。他表现出的文风只不过是模仿以肚子饱饱钱袋满满为美德的英国有钱人“自来”的思维方式和文体。虽然乔治·豪威耳先生从总委员会每年向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中,抄来一系列有关总委员会财力的“数字”,但是他决不能降低他的“模仿的”尊严来俯察一下这个明摆着的问题:为什么欧洲大陆所有各国政

① 马克思《总委员会向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此处援引的词句略有差异。——编者注

② 一种矿物的形状与其成分以及结晶构造所应具的形状不符的现象,称为“假晶”(pseudomorph),又称“假象”。——编者注

府不是对总委员会拮据的预算感到高兴,而是对“国际工人协会的强大的可怕的组织以及协会几年之间所取得的飞速发展”(见《西班牙外交大臣给西班牙各驻外使节的通令》)感到害怕?具有正常理智的人都要问一问:罗马教皇和他的主教们诅咒国际,法国乡绅议会宣布它为非法,俾斯麦在奥、德两国皇帝在萨尔茨堡会见时叫嚣要对它来一次神圣同盟式的十字军征讨¹⁸⁹,白色沙皇让当时由感情用事的舒瓦洛夫所主管的可怕的“第三处”^①去对付它,可是谁也没有干脆对着这个赤色幽灵挥动总委员会的可怜的进款账来驱赶它,这又是为什么呢?

承蒙乔治·豪威耳先生体谅,他承认:“穷不是罪过,但它使人寸步难行,可怕得很。”我承认他说得对。这样他就更应该为自己过去同国际工人协会的亲密关系感到自豪才是,因为国际工人协会不是靠钱袋的大小,而是靠思想的力量和奋不顾身的毅力,赢得了世界的声誉和人类历史上的一席之地。

然而,乔治·豪威耳先生却以狭隘“庸人”的目空一切的态度,对“19世纪”的“有学有识的读者”说:国际已经“失败”、已经烟消云散了。事实上,在德国、瑞士、丹麦、葡萄牙、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美国或多或少是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政党,全都是国际性的团体,这些团体已经不是一个个稀疏地分散在各个国家、靠一个并非处于中心的总委员会而联合起来的支部,它们本身就是在经常的、积极的、直接的交往中,通过思想交流、相互帮助和共同理想而团结起来的工人群众。

① 指皇帝办公厅第三处,是俄国秘密政治警察中央领导机关。——编者注

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法国工人阶级的整个组织无疑遭到了暂时的破坏,然而现在它又开始恢复了。¹⁹⁰从另一方面看,斯拉夫人,主要是在波兰、波希米亚和俄国,冲破种种政治上和社会上的障碍,参加这一国际运动,目前居然达到如此巨大的规模,这是在1872年连最乐观的人也预料不到的。¹⁹¹由此可见,国际并没有消逝,而只是从诞生的初期阶段转入了更高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它的初衷已经部分地实现。它在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还要经历许多变化,到那时它的历史的最后一章才可以写出来。

卡·马克思写于1878年7月初

载于1878年8月4日《世俗纪事和自由思想进步年鉴》第5期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5卷翻译

弗·恩格斯

*恩格斯关于他的妻子
莉·白恩士逝世的讣告¹⁹²

在此谨通知我在德国的朋友们,昨天夜间死神从我手里夺走了我的妻子莉迪娅,父姓白恩士。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78年9月12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78年9月
12日

载于1878年9月18日《前进
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
报》第110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25卷翻译

卡·马克思

*帝国国会关于反社会党人法的辩论
(文章草稿)¹⁹³

1878年9月16日和17日帝国国会会议

俾斯麦的副手——冯·施托尔贝格讲了四分七秒钟的话。

速记记录摘抄¹⁹⁴

帝国国会。第4次会议。1878年9月16日,星期一。议长:福尔肯贝克。
〔会议十一时三十分开始,三时四十分结束。〕

帝国副首相、国务大臣施托尔贝格-韦尔尼格罗德伯爵:

“现在要做的是……应当设法使这种宣传鼓动将来不能在任何合法性的幌子下进行。”

9月16日会议上的发言摘抄

暗 杀

倍倍尔：“先生们，今天会议开始时，帝国副首相的发言，像前几天陛下的演说¹⁹⁵以及提交给我们的法案的说明一样，特别指出了暗杀¹⁵⁴；今天所有的发言者也都或多或少说到了暗杀，都把暗杀说成是实行这个非常法¹⁹⁶的直接理由，意思非常明显：正是暗杀构成了原因。既然如此，先生们，理所当然应该期望政府清楚而明确地对此表示意见，期望它报告它有了哪些发现，报告它已查明哪些事实可以加罪于我们，证明暗杀犯与社会民主党有什么联系，哪怕是思想上的联系。然而，直到今天根本没有这样做，仅限于空洞的言词和指控。可是有人继续重复那句话：‘社会民主党要对暗杀事件负责’。指控说：‘社会民主党是弑君党’等等……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今天还在沉默。……首先我们非常需要了解，有关暗杀案记录下的大量案卷都包含哪些内容。特别是，我们要求了解，在德国各个地区对我党党员和非党同志，对与暗杀犯甚至一点关系也扯不上的、思想倾向极不相同的人进行了异常繁多的讯问之后查清了哪些情况。最后，由于人们将罪责转移到我们身上，我们就要求澄清问题，特别是成为帝国国会改选和提出这项法案的直接理由的最近一次暗杀的问题……我走出来的时候

[走出《前进报》社，他曾到那里询问诺比林博士的情况，这是(1878年)6月2日夜晚的事情]

对打听到的情况非常满意，几分钟之后，我走到一家店铺的近旁，大吃一惊，看到张贴着一条电讯，内容如下：

‘柏林午夜二时，在后来的法庭审讯中，暗杀犯诺比林供认：他崇尚社会主义倾向，他也多次参加过这里举行的社会主义者集会，他一个星期前就已经打算枪杀皇帝陛下，因为他认为干掉国家元首对国家有益。’…… 抛出这个消息

的电讯带有明确的官方标记。这条电讯我手中有一张，是当局送达《十字报》编辑部的，上面有《十字报》编辑的亲笔注。这条电讯的官方性质丝毫不容怀疑。但是，各种可靠的消息都表明：无论在暗杀的当天还是在当天夜里，法庭根本没有对诺比林进行审讯；关于凶手的动机及其政治信念，也没有找到任何可以作为重要根据的东西。先生们，你们每个人都知道沃尔弗电讯社的情况（赞同的表示），都知道这类电讯不经当局认可是决不能公布的。况且，电讯上还由当局清楚地注有‘官方’字样。因此，在我看来毫无疑问，这条电讯，乃是当局蓄意编造出来作为电讯公之于众的。（听啊，听啊！）这条电讯的内容是官方机构所曾抛出过的又一个最无耻的诽谤，其目的是以最卑鄙的方式怀疑一个整个的大党，给它扣上同谋犯的帽子。其次，我要问，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呢，政府的机关报，所有半官方和官方的报刊，以及跟着它们跑的几乎所有其他的报刊，竟然可以根据上述的电讯成周成月地，日复一日地对我们进行前所未闻的诽谤，竟然可以日复一日地散布什么发现了阴谋、同谋犯等等骇人听闻和令人不安的消息，而政府方面连一次也没有……其实一切都来自政府方面，目的是要使舆论界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些谎言深信不疑；而政府的正式代表们直到此时此刻也不肯对明摆着的疑点做出任何解释……”

然后，倍倍尔转到迫害问题（第 39 页第 II 栏）。

“很明显，他们这一切做法都是为了挑起事端；他们企图把我们弄得怒不可遏，从而引诱我们采取某种暴力行动，很明显，光有暗杀事件还是不够的。如果我们因受到迫害而被引诱去采取暴力行动，那么某些人当然会拍手称快，因为这样一来他们手上就有了更多更有分量的材料来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对付我们，等等”。接着，倍倍尔要求“最终把案卷加以公布，并印出来提交帝国国会，特别是提交审查这一法案的委员会。我现在提出的要求同几天以前在这里提出的要求属于同类性质。那次是在讨论大选帝侯号失事¹⁹⁷问题的时候，我就失事事件提出的要求完全是正当的，得到议院几乎各个方面的赞同，而且海军大臣（冯·施托什）明确表示同意在他职权范围内（！）予以满足。”

〔倍倍尔的要求引起会场上一片呼声：“完全正确！好得很！”〕

普鲁士政府对这一致命的指责作何回答呢？它通过欧伦堡之口回答说：它不提供案卷；根本没有任何指控材料。〕

内政大臣欧伦堡伯爵：“关于第一个问题”

[各邦政府代表们询问“对在此期间已经死亡的罪犯诺比林的侦查”情况]

(1)“关于第一个问题我必须声明,诺比林审判案的审讯情况是否可能或被允许公布的问题,在有人要求提供时应当由普鲁士司法当局来决定。但是,先生们,我可以奉告一点情况,对诺比林进行了一次审讯,据我被告知,他在这次审讯中供称,他参加过社会民主党的集会,他喜欢会上宣讲的学说。考虑到公布文件属于普鲁士司法当局的权限,进一步的情况我就不便奉告了。”

[欧伦堡明确说的只是:(1)进行过“一次”审讯;他不敢说是“法庭”审讯。他也没有说这一次审讯是何时进行的(大概是在子弹穿过诺比林的脑袋流出一部分脑浆之后吧。)]但是,欧伦堡所谓诺比林在这“一次”审讯中讲的话(假定诺比林是处于有责任能力状态的)证明:第一,他没有说自己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也没有说自己是**社会民主党党员**;他只是说,他像其他许多小市民那样去参加过几次党的集会,“他喜欢会上宣讲的学说”。可见,这些学说并不是他的学说。他刚刚接触这些学说。第二,他**根本没有**把他的“暗杀”同集会和会上宣传的学说联系起来。

但是蹊跷的事情还不限于此。欧伦堡本人能够奉告的“一点情况”,他自己就把它搞得令人怀疑,或者说他讲得令人怀疑:“据我被告知,他在这次审讯中供称”。根据这句话可以判断,欧伦堡先生从未看过案卷;他知道的只是听人家说的,他只能奉告他这样“被告知的”一点情况,但是他马上拆穿了自己的谎言。他刚刚说了“他被告知”的一切,紧接着就说:

“考虑到公布文件属于普鲁士司法当局的权限,进一步的情况我就不便奉告了。”

换言之：如果他“奉告了”他知道的情况，就会使政府出丑。

顺便指出：如果只进行过一次审讯，那我们也知道是“在什么时候”，就是在诺比林头上带着弹孔和刀伤被捕的那一天，就是发出臭名远扬的6月2日午夜二时电讯的那一天。但后来政府企图将诺比林案件的责任加于**教皇至上派**¹⁹⁸。可见，审讯根本没有发现诺比林的暗杀同社会民主党有任何联系。

但欧伦堡还没有结束他的自白。他还得

“提请大家注意，早在5月我就站在这个讲台上说过，谁也没有断定，这些行为是社会民主党直接策划的；我就是现在也不能做这样的论断或者在这方面增添任何新东西”。

好极了！欧伦堡直言不讳地承认，在从赫德尔行刺到帝国国会开会这段时间里警察和侦查机构进行的所有卑劣的迫害，没有为政府所喜爱的暗杀“理论”提供任何一点点**犯罪构成**！

欧伦堡及其同伙如此亲切地“考虑”到“普鲁士司法当局”的权限，于是在赫德尔已被斩首，诺比林业已身亡因而审讯也永远结束以后，便把司法当局当做向帝国国会提供“案卷”的假想的障碍——可是在审理诺比林案件一开始，即在暗杀发生的当天，他们却公然用一条有倾向性的关于所谓第一次审讯诺比林的“电讯”来激起德国庸人的 *delirium tremens*^①，并借助自己的报刊造起一座谎言大厦！对司法当局，尤其对那些被政府指控为同谋的人，是何等尊重！

欧伦堡先生声明，就这两起暗杀事件来说，没有发现任何足以指

① 拉丁文医学名词，意为（因酒精中毒引起）震颤性谵妄。——编者注

控社会民主党的**犯罪构成**——所以他甚至拒绝提供案卷,因为提供案卷会把这种讨厌的局面弄得更加离奇,接下去他又说,法案实际上只是以一种“理论”,即政府的如下理论为根据:

“**社会民主党的学说**,以及通过狂热鼓动传播这一学说的方式方法大概适合在**变野了的人身上**结出我们不得不深感遗憾地尝到过的那种苦果。

[泽费洛盖、切希、施奈德、贝克尔、库尔曼、科恩(又名布林德)之类的苦果?]

而且在这一看法上,先生们,我相信我同**全部德国报刊**直到今天也还是一致的

[所谓**全部德国报刊**,就是所有那些拿政府津贴的爬虫报刊,惟独各派**独立报纸**除外],

惟独社会民主党报刊除外。”

(又是纯粹的**谎言!**) [诺比林参加的那几次集会,像所有集会一样,都是在**一名警察的监视**下进行的;可见,会上没有发生任何可指责的事情;他在会上听到的**学说**只能是与集会**日程**上的议题有关的东西。]

在讲过这些实际上是谎言的关于“**全部德国报刊**”的话之后,欧伦堡先生

“**确信在这方面不会遇到异议**”。

针对倍倍尔,他必须

“**提醒人们**,社会民主党报刊对这些事件采取了什么立场”,以便证明“社会民主党对**谋杀**,不论是以何种形式出现的”,都并非像该党所说,“**深恶痛绝**”。

证据:

(1)“社会民主党报刊最先企图证明这两次暗杀案是蓄意制造的。”(皇储①语)

〔《北德总汇报》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具有合法性表示不满。〕

(2)“当他们看出,此路不通……他们就改口说两名罪犯都是无责任能力的,企图把他们说成是孤立的白痴,而把他们的行为说成是一向常见的现象,

[难道不是这样?]

其责任不能由任何别的人来负。”

〔(证明爱好“谋杀”)(许多非社会民主党刊物都这样写。)]

欧伦堡先生不提供“案卷”,他先前说过,他对案卷一无所知;或者说,关于案卷,考虑到“普鲁士司法当局”,他“不便”透露他知道的情况——他现在却要求人家根据这些被隐匿起来的“案卷”相信他的如下说法:

“先生们,已进行过的审讯没有发现丝毫的根据,可以认为这两个人在某种程度上不能预见其行为的后果和意义。相反,已查明的一切都说明,他们是在完全有责任能力的状况下行动的,而且后者是由于恶毒无耻的预谋,

[那么,被斩首的赫德尔就不是这样了?]

前所少见的恶毒无耻的预谋。”

(3)“许多社会民主党报刊现在又转而为这种行为开脱罪责,为行为者辩解。不是要他们,而是要社会

[是政府为他们辩解,因为政府不是把责任加于他们,而是加于‘社会民主党的学说’和工人阶级的鼓动——因而是加于一部分社会及其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即后来的弗里德里希三世。——编者注

‘学说’]

为他们犯下的罪行

[这样说来倒是没有为行为辩解,否则就不会把行为看作‘罪行’,也就根本不会讨论什么‘罪责’问题了]

承担责任。”

(引证了《前进报》,谈的是赫德尔,完全正确)

在这样胡说了一通之后又说:

(4)“先生们,他们还同样评论了在俄国对高级官员未遂的或已遂的罪恶行为。涉及的是维拉·查苏利奇的行刺

[彼得堡法院和全世界的报刊!]

和梅津措夫将军被暗杀¹⁹⁹

[后来俾斯麦也谈到这一点]

你们看到此间出版的一家报纸的提问吗:‘他们还有什么办法呢?除此之外,他们还能干些什么呢?’”

(5)最后,“国外的社会民主党非常明确地而且直截了当地表示他们同情这些行为。今年7月在弗赖堡召开的汝拉联合会代表大会²⁰⁰断然宣称,赫德尔和诺比林的行动是革命行动,代表大会完全同情这种行动,云云。”

难道说德国社会民主党还要为与它敌对的集团¹³³的言论和行动“承担责任”?那个集团直到目前为止在意大利、瑞士、西班牙[还有俄国:涅恰也夫]所搞的暗杀和……^①都是针对“马克思派”的成员。

① 此处有一个词辨认不清,可能是 Versuch(e)(各种图谋)。——编者注

〔欧伦堡先生前边在谈到无政府主义者时就说过：他们只好放弃这样一种看法，即

“暗杀案是蓄意制造的”，“要知道，就连国外的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我在下面将从中拿出一份样本——也声称它们确信不会有这种事情”；

他忘记了拿出“样本”。〕

接下来的高论讲的是“马克思派”和“所谓无政府主义派”（第50页第I栏）。他们是不同的，但

“不能否认，所有这些帮派都处于某种”（什么样的？敌对的）“关系之中”，

就像同一时代的所有现象实际上都有某种关系一样。如要将这种“关系”变成 *cas pendable*^①，那就必须首先证明它的特定性质，而不能满足于一句对宇宙间任何事物都适用的空话。要知道，宇宙间万物都处于“某种”关系之中。“马克思派”倒是证明了，“无政府主义派”的学说与行动同欧洲“警察”的学说与行动之间存在着特定的“关系”。当《同盟》一文⁸⁶的发表把这种关系揭露无遗的时候，所有拿政府津贴的爬虫报刊和善意的报刊都默不作声了。“揭露”的这些东西同它们所杜撰的“关系”不相符。（这个集团到目前为止所搞的暗杀都是针对“马克思派”的成员。）

在讲过这一番 *faux fuyant*^②之后，欧伦堡先生用一个不显眼的“而且”缀上了一句话，企图用虚伪的，表述形式还好像特别具有批判性的 *locus communis*^③来证明这种“关系”：

① 意为“该判死刑的罪行”。——编者注

② 拉丁文，意为“废话”。——编者注

③ 拉丁文，意为“套话”。——编者注

“而且——他继续说——在这样的运动中，基于重力定律的经验表明

[运动可以是基于重力定律的，例如降落运动，但经验显然仅仅是基于降落这个现象]，

极端派

[例如，在基督教中——自残肢体]

是逐渐占上风的，而温和派无法与之抗衡”。

第一，说什么在历史运动中所谓的极端派占上风，压倒合乎时代的运动：路德对托马斯·闵采尔、清教徒对平等派、雅各宾派对阿贝尔派，这是一种**虚伪的** *locus communis*。历史证明恰恰相反。第二，“无政府主义”派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极端派”，——欧伦堡本来应当证明这一点，而他却从这一点出发。一派从事的是工人阶级的实际历史运动；另一派是一批妄想创造历史的找不到出路的青年在追求一个幻影，结果不过表明，法国社会主义思想表现在上等阶级的潦倒没落的人们身上是多么滑稽可笑。因此，无政府主义实际上到处碰壁，只是在还没有真正的工人运动的地方混日子。这是事实。

欧伦堡先生仅仅证明，如果“警察”热中于“讲哲理”，那是多么危险。

参看接下来的一句话(第 51 页第 I 栏)。欧伦堡在这里说得好像一切顺利。

现在他想要证明“**社会民主党的学说和目的**”的危害社会之处！可是如何证明？用了三条引文。

但在这之前，他还用这样一句妙论作为过渡。

“如果你们稍微细心地研究一下社会民主党的这些学说和目的，就会看出，

并非像刚才说过的那样,和平发展是目的,其实和平发展只不过是引向最终目的的一个阶段,而要达到最终目的,除暴力途径外没有其他途径”

[大概就像“民族联盟”²⁰¹是通向以暴力实现德国的普鲁士化的一个“阶段”那样;欧伦堡先生就是这样用“铁血”来考虑问题的]。

拿前半句话来看,他讲的只不过是同义反复或糊涂话:如果这种发展有一个“目的”,又有“最终目的”,那么这种最终“目的”就是它的“目的”,而不是说发展的性质是“和平的”或“非和平的”。其实欧伦堡想要说的是:朝向目的的和平发展只是一个旨在导致目的的暴力发展的阶段,而且按照欧伦堡先生的看法,“和平”发展以后向“暴力”发展的转化是所追求的目的本身性质决定的。这里所谈到的目的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和包含在其中的社会变革(转变)。只有当该社会中的掌权者不用暴力方法来阻碍历史发展的时候,历史发展才可能是“和平的”。例如,如果在英国或美国,工人阶级在议会或国会里取得多数,那么它就可以通过合法途径来取消阻碍其发展的法律和设施,而且这也只能在社会发展为此已足够成熟的情况下进行。但是“和平的”运动遇到同旧秩序利害相关的人的反抗,仍然会变成“暴力的”,如果说这些人被暴力所镇压(像在美国内战和法国革命中那样),那就因为他们是“合法”暴力的反叛者。

但是,欧伦堡所鼓吹的是,掌权者应该用暴力对付正处在“和平阶段”的发展,目的是要防止以后的“暴力”冲突^①;这是暴力反革命对事实上的“和平”发展的战争叫嚣。实际上政府是企图以暴力镇压它所不喜欢的、而在法律上是无懈可击的发展。这就必然要导致暴

^① 作者把原来写的“(起自新兴社会阶级)的暴力发展”改为“‘暴力’冲突”。——编者注

力革命。

这是一个老故事，
可是它永远新鲜。^①

接着，欧伦堡先生就用三条引文来证实社会民主党的暴力学说：

(1)马克思在他的论述资本的著作中说：“我们的目的，云云”

[但是，“我们的”目的不是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名义，而是以共产党的名义讲的。]这句话不是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里，而是在“1847年”即“德国社会民主党”实际诞生的20年以前出版的《共产党宣言》里。²⁰²

(2)在另一处，即倍倍尔先生所著《我们的目的》^②中引用的一个地方有一句作为马克思说过的话

[欧伦堡自己从《资本论》中引用了一句该书所没有的话，现在自然还得引用一句该书确有的话，作为引自别处的话。（参看《资本论》第二版中的一段话）]而倍倍尔的书上是这样讲的：

“因此，我们看到，暴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怎样起着自己的作用，卡·马克思（在他的描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过程的《资本论》一书中）决非毫无根据地宣告：‘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3)引自倍倍尔的《我们的目的》中的一段话（第51页第I栏）；他引用的是：

① 引自亨·海涅的诗：《一个青年爱一个姑娘……》。——编者注

② 奥·倍倍尔《我们的目的》1870年2—3月作为一组文章发表在《人民国家报》上，同年11月发表了单行本。——编者注

“这一发展的进程取决于参加运动的阶层以多大的强度(力量)掌握运动,取决于运动遭到敌人什么样的反抗。有一点是无疑的:反抗越激烈,新秩序的建立就越暴烈。靠洒玫瑰水是根本不解决问题的。”

[这是欧伦堡从倍倍尔的《我们的目的》引证的。这段话在第 16 页上,见第 16 页和第 15 页标出的地方;并参看第 43 页标出的地方。] 又是“歪曲”,因为是断章取义。

在取得这些丰硕战果之后,欧伦堡儿戏般地、不能自圆其说地就俾斯麦同“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接触”胡编乱扯了一通(第 51 页第 II 栏)。²⁰³

在同一次会议上:

赖辛施佩格在施托尔贝格之后发言。他最担心的是,这项把一切都置于警察权力之下的法律,也适用于其他不合政府心意的政党;在这番话之后就是老一套的天主教式的蛤蟆叫了(见第 30—35 页标出的地方)。

在赖辛施佩格之后,冯·黑尔多夫-伯德拉发言。最幼稚可笑的是:

“先生们,我们面前的这项法律是不折不扣的预防性法律。它没规定任何惩罚条款,而只是赋予警察下禁令的权力,以及对于违反这种非常明确的禁令的行为加以惩罚。”(第 36 页第 I 栏)

[它只允许警察禁止一切,不惩罚违反任何法律的行为,而是惩罚“违反”警察命令的行为。这真是使刑法成为多余之物的非常有效的办法。]

冯·黑尔多夫先生承认,“危险”在于社会民主党人的选举胜利,这场胜利并未因暗杀案陷害而受到丝毫损伤!这必须加以惩罚。把普选权使用得不合政府的心意!(第 36 页第 I 栏)

这个家伙倒是同赖辛施佩格看法一致：“上诉法院”、“联邦议会委员会”都是胡闹。

“这里要做的只不过是决定一个警务性质的问题，给这种法院以法律保障是绝对错误的”；对付滥用权利要靠“对政治地位高的官吏的信任”（第 37 页第 I 和第 II 栏）。他要求“修正我们的选举法”（第 38 页第 I 栏）。

卡·马克思写于 1878 年 9 月
24 日前后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文库》1932 年版第 1
(VI) 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5 卷翻译

弗·恩格斯

* 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俄国的现状²⁰⁴

3月21日于伦敦

……德国社会党人在最近几次选举中所得到的结果证明，封住它的嘴巴也不能扼杀社会主义。相反，反社会党人法¹⁹⁶将产生对我们特别有利的结果。它将完成对德国工人的革命教育……

德国工人做了极大努力和重大牺牲，才取得了他们享有的这点起码的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这是持续不断的斗争，但是归根到底，胜利总是属于工人的。他们能够组织起来，并且每当举行普选的时候，工人都取得了新的胜利。

但是这种合法活动使得某些人开始觉得，为了达到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不需要再做别的事情了。在德国这样一个缺乏革命传统的国家里，这种现象可能成为危险的现象。幸亏俾斯麦的暴行和支持俾斯麦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怯懦改变了局面。德国工人体会到了，当无产阶级敢于认真对待宪法自由并用来反对资本主义的统治的时候，宪法自由有什么价值。如果对这一点还有某些幻想，那么俾斯麦

这位朋友粗暴地把这种幻想打破了。我之所以把俾斯麦称为朋友,是因为从来还没有人像他那样给德国的社会主义帮了那么大的忙。俾斯麦通过建立极端严密、不堪忍受的军国主义统治,不断增加赋税,国家与最可耻的牟取暴利的交易所结盟,回复到旧普鲁士的最露骨的封建和警察统治的传统,动辄进行迫害,公开辱骂、侮辱资产阶级(其实它也不配受到更好的待遇),总之,通过这种途径准备了革命以后,他就圆满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同时迫使德国无产阶级走上革命的道路。

我们的朋友俾斯麦可以放心。德国工人必将进行由他很好地准备了革命。在俄国发出信号的时候,他们会准备就绪的。

几年以来,我都要求欧洲的社会党人注意俄国的状况,在俄国,一个有决定意义的运动正在成熟²⁰⁵。在那里,政府和秘密团体之间的斗争非常尖锐,达到了再不能长久继续下去的地步。这个运动好像眼看就要爆发了。在那里,政府的走狗干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暴行。对付这些嗜血的野兽,只要可能,就必须用火药和子弹来自卫。俄国的政治性谋杀就是聪明、有个性和有自尊心的人们用来自卫和对付前所未闻的专制制度走狗的惟一手段。

军队、甚至宫廷人士中间出现大规模的阴谋活动,全国舆论由于战后外交失败而感到屈辱,国库空虚,信用紊乱,银行家不得到国民议会的保证就拒绝贷款,最后,还有贫困。这就是俄国的总结。

弗·恩格斯

弗·恩格斯写于 1879 年 3 月
21 日

载于 1879 年 3 月 30 日《平民
报》第 12 号

原文是意大利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5 卷翻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
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²⁰⁶

亲爱的倍倍尔：

对您8月20日的来信答复得迟了，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好长时间不在，另一方面是因为遇到了一些意外的事情：首先，“李希特尔”的《年鉴》来了，而后赫希柏格本人也来了。

我只好断定，李卜克内西没有把我最近给他的信拿给您看，而这一点我是特别嘱咐过他的。不然，有些理由，李卜克内西已经提出过，我在那封信中已经作了答复，您大概就不会再提了。

下面就来逐条分析要谈的问题。

一、同卡·希尔施的谈判

李卜克内西问希尔施是否愿意担任拟在苏黎世重新创办的党的机关报的编辑。希尔施希望了解有关报纸经费的情况：报纸能有多少经费，由谁来提供经费。这第一点是为了知道报纸会不会过上几

个月就一命呜呼；另一点是为了了解由谁掌握钱袋，也就是说，归根到底由谁来主宰报纸的立场。李卜克内西回答希尔施说：“一切安排就绪，其余情况你将从苏黎世得知”（李卜克内西7月28日给希尔施的信），这封回信希尔施并没有接到。他倒是收到了伯恩施坦从苏黎世写的信（7月24日），信中伯·通知说：“（报纸的）组织出版和监督权委托给我们了”，“菲勒克、S. ①和我们②开过会，会上有人认为：

“您担任《灯笼》编辑时和个别同志发生的分歧，会给您的地位造成一些困难，但我认为这种疑虑并非十分紧要。”

关于经费的事只字未提。

希尔施在7月26日立即回信，询问报纸的财政状况。哪些同志负责弥补亏损？钱数多少，期限多长？编辑的薪水问题在这里无关紧要；希尔施只是想知道，“能不能保证有至少使报纸维持一年的资金”。

伯恩施坦在7月31日回信说，如果有亏损，就用自愿捐款来弥补，其中有些(!)款子已经定下来了。希尔施关于他打算给报纸设定的立场的意见（这一点下面谈）引起了异议，并接到一项规定：

“监督委员会必须坚持这些意见，特别是因为它本身也是受监督的，也就是说，要承担责任。因此，关于这几点，您应当同监督委员会商议。”

最好是立即答复，尽可能用电报答复。

可见，希尔施收到的不是对他那些合理的问题的任何答复，而是

① 指辛格尔(Singer)。——编者注

② 指“苏黎世人”爱·伯恩施坦，卡·赫希柏格和奥·施拉姆。——编者注

一份通知,说他必须在设于苏黎世的**监督委员会**的领导下编辑报纸,而这个委员会的观点同他的观点是有重大分歧的,甚至连委员会的成员是谁,都没有告诉他!

希尔施完全有理由对这种态度表示愤慨,他宁愿同莱比锡人^①商议。他8月2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您一定是知道的,他曾**坚决要求**通报给您和菲勒克。希尔施甚至愿意在下述情况下服从苏黎世**监督委员会**,就是说,苏黎世**监督委员会**应向编辑部提出书面意见,并请莱比锡**监察委员会**来作出决定。

这期间李卜克内西于7月28日写信给希尔施:

“当然,事业的经费是有了,因为整个党+(包括)赫希柏格在内都做它的后盾,至于细节,我就不管了。”

李卜克内西在下一封信里,关于经费的事仍旧只字未提,而是保证说,苏黎世委员会不是编辑委员会,它只负责**管理**和**财务**。李卜克内西8月14日给我的信还是这么写的,并要求我们说服希尔施接受。直到8月20日,您本人对实际情况了解得还是很少,所以您写信对我说:

“他(赫希柏格)在报纸的编辑方面并不比其他任何知名的党员有更多的发言权。”

最后,希尔施收到菲勒克8月11日的来信,信里承认:

“住在苏黎世的三个人应当以**编辑委员会**的身份着手创办报纸,并且在三个莱比锡人的同意之下挑选一名编辑……据我的记忆,上述决议还指出,第二项所提到的(苏黎世)筹备委员会对党**既负政治责任**,又负**财务责任**……根据

^① 指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和路·菲勒克。——编者注

这种情况,我觉得,……没有住在苏黎世的、受党委托创办报纸的那三个人的协作,就休想担任编辑。”

希尔施这才至少知道了一些确实的情况,固然只是关于编辑同苏黎世人的地位的情况。他们是编辑委员会;他们还负有政治责任;没有他们的协作,谁也不能担任编辑。简单说来,就是指示希尔施同他还一直不知道姓名的苏黎世的三个人商谈。

但是,李卜克内西在菲勒克的信的下边写了一段附言,造成了彻底的混乱,他说:

“辛格尔刚从柏林到这里,他报告说,苏黎世监督委员会不是像菲勒克所认为的那样,是编辑委员会,而实质上是管理委员会,对党即对我们负责报纸的财务;其委员当然也有权利和义务同你讨论编辑问题(附带说一句,这是每个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但是他们没有受权监督你。”

三个苏黎世人和莱比锡委员会的一个委员,而且是惟一参加商谈的委员坚持要求,希尔施服从苏黎世人的业务领导,莱比锡委员会的另一个委员则根本否认这一点。在这些先生彼此取得一致意见以前,希尔施应不应当作出决定呢?希尔施有权要求了解已经作出的决议,因为那里边包括了要求他接受的条件,对这一点,丝毫没有加以考虑,特别是看来莱比锡人也根本没有想到要亲自去确实了解一下这些决议。不然,怎么会产生上述矛盾呢?

如果说莱比锡人在授予苏黎世人哪些职权的问题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那么苏黎世人对于这一点是完全清楚的。

施拉姆8月14日写信给希尔施:

“假如当时您没有写信说,遇有类似事件(如凯泽尔事件)仍然要采取同样的行动,即有可能再发表类似的书面言论,那我们就会不会对此多费唇舌。但是鉴于您提出的这个声明,我们必须保留对新报纸刊载什么文章的决定权。”

听说希尔施在给伯恩施坦的信里谈过这一点，而这封信是7月26日写的，也就是在苏黎世的那次确定了三个苏黎世人握有全权的会议以后很久。但是，苏黎世人如此陶醉于他们官僚式的独揽大权，以致在答复希尔施这封写得比较晚的信时竟要求新的权力，即刊载文章的**决定权**。编辑委员会已经成了**检查委员会**。

赫希柏格到了巴黎，希尔施从他那里才知道这两个委员会成员的名字。

这样，同希尔施的谈判破裂了，原因何在呢？

(1)由于莱比锡人和苏黎世人都顽固地拒绝告诉他任何一点有关报纸的经费基础和报纸能否维持下去——哪怕仅仅一年的确实情况。只是从我这里(根据您告诉我的情况)，他才知道定下来的款项。因此，根据以前的说法(党+赫希柏格)，几乎不能得出别的结论，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或者是报纸现在就主要由赫希柏格供给经费；或者是很快就要完全依赖他的捐款。这后一种可能现在还远没有排除。这笔——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800 马克的款子正好等于这里的协会在上半年补助《自由》周报的经费(40 英镑)。

(2)由于李卜克内西一再保证(后来证明是完全错误的)：苏黎世人根本没有在业务上监督编辑工作的权力，以及由此产生的意见不一的滑稽剧。

(3)由于最后确信，苏黎世人不仅要监督，甚至要检查编辑工作，给希尔施分派的只是傀儡的角色。

希尔施在了解这一切以后拒绝了，我们只能同意他的做法。我们从赫希柏格那里^①听说，莱比锡委员会由于两个不住在当地的委

^① 手稿原件上“从赫希柏格那里”是用铅笔写的。——编者注

员而得到了加强，因此只要三个莱比锡人之间意见一致，就能迅速作出决定。这样，真正的重心就完全转移到苏黎世了，而希尔施也同任何一个真正具有革命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编辑一样，是不能同那里的人长期共事的。关于这一点，下面再谈。

二、给报纸确定的立场

伯恩施坦早在7月24日就告诉希尔施说，希尔施在他担任《灯笼》编辑时和个别同志的分歧，会给他的地位造成困难。

希尔施回答说，他认为报纸的立场，总的说来，应当和《灯笼》的立场相同，也就是说，在瑞士要避免引起诉讼，而在德国则不应引起不必要的惊恐。他问那些同志是谁，并继续说道：

“我只知道一个人，并且我向您保证，如果再出现类似的违纪行为，我对此人将仍然照此办理。”

伯恩施坦俨然以新的官方的检查大员的姿态对此回答说：

“至于报纸的立场，监督委员会的意见自然是，《灯笼》不能作为榜样。我们认为，报纸不应当热中于政治激进主义，而应当采取原则上社会主义的立场。诸如攻击凯泽尔这样一些曾引起所有同志异口同声(!)斥责的事件，无论如何应当避免。”

如此等等。李卜克内西把抨击凯泽尔说成是“一种失策”，施拉姆则认为十分危险，因此要对希尔施实行检查。

希尔施再次写信给赫希柏格说，像凯泽尔这类事件，

“如果有正式的党的机关报存在，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议员可能不会如此

放肆地无视它的明确的陈述和善意的提示”。

菲勒克也写道：

“已经指示”新报纸“……采取冷静克制的立场，尽量不过问以往发生的一切分歧”；该报不应当是“扩大的《灯笼》”，而“人们至多可以指责伯恩施坦采取过于温和的方针，在我们不能旗帜鲜明地扬帆前进的时候，如果说这还算是一种指责的话”。

但是，这个凯泽尔事件，这个据说是希尔施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凯泽尔是社会民主党议员中惟一在帝国国会里发言并投票赞成保护关税的人。希尔施谴责他违反党的纪律，因为他：

(1)投票赞成党纲明确要求加以废除的间接税；

(2)同意拨款给俾斯麦，从而违反了我们党整个策略的首要基本准则：不给这个政府一文钱。

就这两点来说，不可否认希尔施是正确的。既然凯泽尔一方面践踏了议员们根据代表大会的决议曾宣誓遵守的党纲，另一方面又践踏了党的策略的确定不移的首要基本准则，竟投票赞成拨款给俾斯麦，以酬谢反社会党人法¹⁹⁶，那么我们认为，希尔施同样也完全有权像他所做的那样，给凯泽尔以有力的打击。

我们怎么也不能理解，在德国怎么会对抨击凯泽尔一事恼怒得这样厉害。现在赫希柏格告诉我，“党团”曾准许凯泽尔那样行动，而有了这一准许，人们认为凯泽尔便得到了庇护。

如果情况是这样，那就有点不像话了。首先，希尔施和其他人一样，不可能知道这个秘密的决定。其次，党所蒙受的耻辱，以前还可以推给凯泽尔一人承担，现在由于这种情况，这种耻辱就更大了，同

时,希尔施的功绩也更大了,因为他把凯泽尔的愚蠢以及更加愚蠢的投票行为公诸于世,从而挽回了党的名誉。难道德国社会民主党确实染上议会症了吗,以为有了人民的选举,圣灵就会降临到当选者的头上,可以把党团会议变成从不犯错误的宗教会议、把党团决议变成不容触犯的教条?

失策固然是造成了,但这不是希尔施造成的,而是以自己的决议庇护凯泽尔的议员们造成的。既然是那些比任何人都更有责任注意维护党纪的人通过了这样一个决议,公然违反党的纪律,那就更糟了。但是还要糟糕的是,人们竟然相信,不是凯泽尔通过他的发言和投票,也不是其他议员们通过他们的决议违反党纪,而是希尔施违反了党纪,因为他不顾这个决议——他也不知道这个决议——抨击了凯泽尔。

其次,毫无疑问,党在保护关税问题上,也和在迄今实际存在的几乎所有的经济问题上,如关于帝国铁路^①的问题上一样,采取了不明确、不果断的立场。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党的机关报,尤其是《前进报》特别喜欢讨论未来的社会制度的结构,而不认真地讨论这些问题。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以后,保护关税问题突然成了现实问题,于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没有一个人具备作出鲜明而正确的判断所需的条件:了解德国工业的状况及其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此外,在选民中间,保护关税的各种思潮有时还不可能绝迹,这些思潮要考虑到。摆脱这种混乱的惟一途径是从纯粹政治方面来把握问题(像《灯笼》所做的那样),但是它没有被坚决地采取;因此党不可能不在这场辩论中第一次表现出犹豫不

^① 参看本卷第420—424页。——编者注

决、缺乏自信和糊里糊涂，以致最后由于凯泽尔并同凯泽尔一起大出其丑。

对凯泽尔的抨击成了以种种调子教训希尔施的借口，说什么新的报纸万万不可仿效《灯笼》的越轨行动，新的报纸不可热中于政治激进主义，而应当采取原则上社会主义的和冷静克制的立场。在这里，菲勒克丝毫不比伯恩施坦少卖力气；菲勒克之所以认为伯恩施坦是适合的人，正是因为他过于温和，因为我们现在不能旗帜鲜明地扬帆前进。

然而，到国外来不是为了旗帜鲜明地扬帆前进，那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在国外，没有什么东西阻碍这样做。在瑞士没有德国的新闻出版法、结社法和刑法。在家里由于德国一般法律的限制，早在反社会党人法以前就不能讲的话，在瑞士可以讲，而且也有义务讲。因为在那里我们不仅面对德国，而且面对欧洲，我们有义务在瑞士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向欧洲直言不讳地阐述德国党的道路和目标。谁在瑞士还愿意受德国法律的约束，那恰好证明，他就该受制于这些德国法律，他实际上只会说在非常法颁布以前的德国所允许说的话。编辑部成员可能暂时回不了德国，对于这种可能性不应有所顾忌。谁不做好冒此风险的准备，谁就不适于担任如此引人注目的光荣岗位。

不仅如此。德国党之所以被非常法宣布为非法，正是因为它在德国是惟一严肃的反对党。如果党在国外的机关报上放弃这个惟一严肃的反对党的角色，表现温顺，以冷静克制的态度忍受脚踢，以此来向俾斯麦表示感谢，那么它只是证明，它该挨脚踢。1830年以来，德国流亡者在国外出版的所有报刊中，《灯笼》无疑是最温和的刊物之一。要是连《灯笼》都算过于狂妄无理，那么新的报纸只会在非德意志国家的同志们面前损害党的名誉。

三、三个苏黎世人的宣言

这时我们收到了赫希柏格的《年鉴》，里面载有《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①一文。这篇文章，如赫希柏格本人对我所说的，正是苏黎世委员会的三个委员^②写的。这是他们对过去的运动的真正批判，因而也就是他们为新机关报的立场所提出的真正纲领，既然这一立场是由他们来决定的。

文章一开头写道：

“拉萨尔认为有巨大政治意义的运动，即他不仅号召工人参加、而且号召一切诚实的民主派参加的、应当由独立的科学代表人物和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领导的运动，在约翰·巴·施韦泽的领导下，已堕落为产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的片面斗争。”

我不去考察，这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和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事实。在这里，专对施韦泽提出的谴责是在于：施韦泽使这里被看作资产阶级民主博爱运动的拉萨尔主义**堕落为**产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的片面斗争；因为他**加深了**运动作为产业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性质。^③其次谴责他“把资产阶级民主派拒之于门外”。但是资

① 载于《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1879年苏黎世第1年卷第1册第75—96页。——编者注

② 卡·赫希柏格、爱·伯恩施坦和卡·奥·施拉姆。——编者注

③ 本段开头这两句话作者在改动以前原来是这样写的：“施韦泽是一个大无赖，但又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他的功劳正是在于他戳穿了原始的狭隘的拉萨尔主义及其有限的国家帮助的万应灵药…… 不管他从

产阶级民主派在社会民主党中有什么事情可做呢？如果资产阶级民主派都是“诚实的人”，他们就根本不可能有参加该党的愿望；如果他们竟然希望加入这个党，那也只是为了挑起争吵。

拉萨尔的党“宁愿以极片面的方式充当工人党”。讲这种话的先生们，自己就是以极片面的方式充当工人党的政党中的党员，他们现在正在这个党中占据显要的地位。这是一件绝对说不通的事。如果他们所想的正是他们所写的，那么他们就应当退出党，至少也应当放弃他们的显要职位。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就是承认他们想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来反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所以，党如果还让他们占据显要的地位，那就是自己出卖自己。

可见，在这些先生看来，社会民主党应当不是片面的工人党，而应当是“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为了证明这一点，它首先必须抛弃无产者粗野的热情，在有教养的博爱的资产者领导下，“养成良好的趣味”和“学会良好的风度”（第 85

卑鄙的动机出发干了些什么，也不管他为了维持自己的领导权怎样坚持拉萨尔的国家帮助的万应灵药，但是他戳穿了原始的狭隘的拉萨尔主义，扩大了他那个党的经济视野，从而为这个党后来合并为德国统一的党作了准备，这毕竟是他的功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任何革命社会主义的核心——拉萨尔就鼓吹过。既然施韦泽更强调这一点，那从实质上来说总还是前进了一步，不管他是如何以此来制造借口，使那些对他的专权来说是危险的人物受人怀疑。他把拉萨尔主义变成产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的片面斗争，确实如此。但是之所以说片面，那完全是因为他从自私的政治动机出发，对于农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反对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根本没有兴趣。但是，指责他的并不是这一点，而是他加深了运动的性质，即作为产业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性质。”——编者性

页)。那时，一些领袖的“有失体统的举止”也就会让位于可以很好调教出来的“资产阶级的举止”（好像这里所指的那些人外表上有失体统的举止，并不是最不值得谴责的东西似的！）。那时也就会

“在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阶级中出现许许多多拥护者。但是这些人必须先争取过来……以促使宣传工作获得显著的成绩”。德国的社会主义“过于重视争取群众，而忽略了在所谓社会上层中大力(!)进行宣传”。因为“党还缺少适于在帝国国会中代表它的人物”。但是，“最好甚至必须把全权委托书给予那些有足够的时间和可能来认真研究有关问题的人。普通的工人和小手工业者……只是在极少的例外情况下才有必要的空闲时间来做这种事情”。

因此，选举资产者吧！

总之，工人阶级是不能靠自己来解放自己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它就应当服从“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资产者的领导，因为只有他们才“有时间和可能”来研究有利于工人的东西。其次，千万不要反对资产阶级，而要通过大力宣传把它争取过来。

如果我们打算争取社会上层或者仅仅是他们中怀有善意的分子，我们就千万不要吓唬他们。于是三个苏黎世人以为，他们作出了一个令人宽慰的发现：

“正是在现在，在反社会党人法的压迫下，党表明，它不打算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的道路，而决定……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

这样，如果占选民总数十分之一到八分之一并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五六十万社会民主党选民都极其有理智，不去用脑袋撞墙壁，不去以一对十地试图进行“流血革命”，那么这就说明，他们今后永远不可能去利用重大的外部事件、由这一事件所引起的突然的革命高潮以及人民在由此发生的冲突中所争得的胜利！如果柏林在某个

时候又会重新表现得那样没有教养，以致重演三月十八日事变²⁰⁷，那么社会民主党人就不应当像“爱好街垒战的无赖”（第 88 页）那样参加斗争，而宁可“走合法的道路”，使暴动平息下来，拆除街垒，必要时就和英勇的军队一起向片面的、粗野的和没有教养的群众进军。如果这些先生们硬说他们不是这样想的，那么他们是怎样想的呢？

好戏还在后头。

“在批评现存制度和建议改变现存制度时，党越是心平气和、务实谨慎，清醒的反动派以赤色幽灵恐怖来吓唬资产阶级这一目前（在实行反社会党人法的情况下）得逞的伎俩，就越不可能重演。”（第 88 页）

为了不让资产阶级产生一丝一毫的恐惧，竟要明白无误地向它证明，赤色幽灵确实只是一个幽灵，实际上并不存在。但是，赤色幽灵的秘密如果不正是资产阶级对它和无产阶级之间必然发生的生死斗争的恐惧，对现代阶级斗争的必然结局的恐惧，那又是什么呢！只要取消了阶级斗争，那么无论是资产阶级或是“一切独立的人物”就“都不怕和无产者携手并进了”！但是上当的是谁呢？只能是无产者。

因此，就让党以温和驯顺的举止来证明，它永远放弃了各种“不适当的和过火的行为”，正是这些行为给反社会党人法提供了口实。如果它自愿地作出承诺，愿意只在反社会党人法所允许的范围内从事活动，那么俾斯麦和资产者就会大发善心，取消这个届时已经成为多余的法律！

“请大家理解我们”，我们并不想“放弃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纲领，但是我们认为，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精力用来达到某些最近的目标，达到那些在开始考虑实现长远的追求以前无论如何必须达到的目标，那么我们的工作就

够做许多年了”。

这样，“现在被我们的长远的要求吓跑了的……”资产者、小资产者和工人，就会大批地来投靠我们。

纲领不是要**放弃**，只是实现要**延缓**——无限期地延缓。人们接受这个纲领，其实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自己的有生之年，而是为了死后遗留给儿孙们。眼前应将“全部力量和精力”都用于各种琐琐碎碎的事情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补补缀缀，为的是让人看起来毕竟还在做一点什么事情，而同时又不致吓跑资产阶级。说真的，我倒更喜欢共产主义者米凯尔，他为了证实他坚信几百年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垮台，就大搞投机事业，尽力促进 1873 年的危机，从而**确实**为准备现存制度的崩溃做了一些事情。

良好的风度遭到的另一损害，就是对于“只是时代的产儿”的“滥设企业者的过分的攻击”；因此“最好是不要再……辱骂施特鲁斯堡及其同类人物”。遗憾的是所有的人都“只是时代的产儿”，而如果这是一个可以原谅的充分的理由，那么对任何人我们都不应该再去攻击，一切论战、一切斗争我们都应当停止；我们应当心平气和地忍受敌人的脚踢，因为我们是聪明人，知道这些敌人“只是时代的产儿”，他们不能不这样行动。我们不应当变本加厉回报他们以脚踢，反而应当怜悯那些可怜虫。

同样，拥护巴黎公社毕竟也有有害的一面：

“使那些本来对我们表示友好的人离开了我们，而且总的说来是加强了**资产阶级对我们的怨恨**”。其次，党“对于十月法律²⁰⁸的施行并不是完全没有责任，因为党完全不必要地增加了**资产阶级的怨恨**”。

这就是苏黎世三个检查官的纲领。这个纲领没有任何可以使人

发生误会的地方,至少对我们这些仍很熟悉 1848 年以来所有这些言词的人来说是如此。正是这些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心怀恐惧地声明,无产阶级迫于自己的革命地位,可能“走得太远”。不要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应全面地和解;不要反对政府和资产阶级,而应尝试争取他们,说服他们;不要猛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应逆来顺受,并且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一切历史地必然发生的冲突都被解释为误会,而一切争论都以“大体上我们完全一致”这样的断语来结束。1848 年以资产阶级民主派面目出现的人,现在同样可以自命为社会民主党人。正如民主共和国对前者来说是遥遥无期的一样,资本主义制度的垮台对后者来说也是遥遥无期的,因此对当前的政治实践是毫无意义的;人们可以尽情地和解、妥协和大谈其博爱。对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也是如此。在纸上人们承认这种斗争,因为要否认它简直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在实践中去抹杀、冲淡和削弱它。社会民主党不应当是工人党,它不应当招致资产阶级或其他任何人的怨恨;它应当首先在资产阶级中间大力进行宣传;党不应当把那些能吓跑资产者并且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实现的长远目的放在主要地位,它最好是用全部力量和精力来实现这样一些小资产阶级的补补缀缀的改良,这些改良会给旧的社会制度以新的支持,从而把最终的大灾难或许变成一个渐进的、逐步的和尽可能温和的瓦解过程。正是这些人在忙个不停的幌子下不仅自己什么都不干,而且还企图阻止别人做任何事情,只有空谈除外;正是这些人在 1848 年和 1849 年由于自己害怕任何行动而每一步都阻碍了运动,终于使运动遭到失败;正是这些人从来看不到反动派,而后来又十分惊奇地发现他们自己终于陷入既无法抵抗又无法逃脱的绝境;正是这些人想把历史禁锢在他们的狭隘的庸人眼界之内,但是历

史每一次都毫不理睬他们而走自己的路。

至于他们的社会主义的内容，在《共产党宣言》中《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那一节里早已受到了充分的批判。在阶级斗争被当作一种令人不快的“粗野的”现象放到一边去的地方，留下来充当社会主义的基础的就只有“真正的博爱”和关于“正义”的空话了。

在至今的统治阶级中也有人归附斗争着的无产阶级并且向它输送教育因素，这是发展的过程所决定的不可避免的现象。这一点我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清楚地说明了。但是这里应当指出两种情况：

第一，要对无产阶级运动有益处，这些人必须带来真正的教育因素。但是，参加运动的大多数德国资产者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的。无论《未来》杂志或《新社会》杂志，都没有带来任何能使运动前进进一步的东西。这里绝对没有真正的实际教育材料或理论教育材料。相反，这里只有把领会得很肤浅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这些先生们从大学或其他什么地方搬来的各种理论观点调和起来的尝试；这些观点一个比一个更糊涂，这是因为德国哲学的残余现在正处于腐朽的过程。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不是自己首先钻研新的科学，而宁可按照搬来的观点把这一新的科学裁剪得适合于自己，匆促地为自己制造自己的私人科学并且狂妄地立即想把它教给别人。所以，在这些先生当中，几乎是有多少脑袋就有多少观点。他们什么也没有弄清楚，只是造成了极度的混乱——幸而几乎仅仅是在他们自己当中。这些教育者的首要原则就是拿自己没有学会的东西教给别人。党完全可以不要这种教育者。

第二，如果其他阶级出身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先

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可是,正像已经证明的那样,这些先生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观念。在德国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国家中,这些观念无疑是有存在的理由的,然而这只能是在社会民主工党以外。如果这些先生组成社会民主小资产阶级党,那么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那时我们可以同他们进行谈判,视情况甚至可以结成联盟等等。但是在工人党中,他们是冒牌分子。如果有理由暂时还容忍他们,那么我们就应当仅限于容忍他们,而不要让他们影响党的领导,并且要清楚地知道,和他们分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这个时间看来是已经到了。党怎么能够再容忍这篇文章的作者们留在自己队伍中,这是我们完全不能理解的。但是,既然连党的领导也或多或少地落到了这些人的手中,那党简直就是受了阉割,而不再有无产阶级的锐气了。

至于我们,那么,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制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没有教养,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必须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如果党的新机关报将采取符合这些先生们的观点的立场,即采取资产阶级的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立场,那么很遗憾,我们就没有别的路可走,而只好公开对此表示反对,并结束我们在同国外的关系方面一向代表德国党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和你们的团结一致。但愿事情不致

于弄到这种地步。

这封信是为德国的委员会的全体五名委员^①和白拉克写的……

我们不反对让苏黎世人也看看这封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79年9月16日—18日之间

第一次发表于1931年6月15

日《共产国际》杂志第12年卷

第23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25卷翻译

^① 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弗·威·弗里茨舍、布·盖泽尔和威·哈森克莱维尔。——编者注

弗·恩格斯

*评卡尔·布林德

《拿破仑亲王与欧洲民主》一文²⁰⁹

文章不应该题为《拿破仑亲王如何如何》，而应该题为《我》。文内每提一次拿破仑亲王的名字，就至少把“我”这个代名词提 20 次，以变格和派生形式提到的还不算。文中所谈有关拿破仑亲王的事情已经多次见诸报刊。文中所谈有关“我”的事情，可惜也是在英国被多次披露、报道和发表过的。各种评论性刊物，不管是已经关了门的还是正在出版的，它们的老板和编辑们对这些都很熟悉而且生厌了。²¹⁰

文章除掉其虚伪矫饰的成分，就是一篇布林德先生的旧事新编：卡尔·布林德如何由于种种不利情况的阻梗，不幸未能改变历史的进程。首先说到的就是重复过多次的那回事，这也是他的主要资本，即他如何身负奄奄一息的 1849 年南德意志起义者临时政府的外交使命，表面上被派往当时的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而实际上是被派往据估计不久将由于人民起义而建立起的赖德律 - 洛兰革命政府²¹¹。可是真遗憾！派遣布林德的那个政府被普鲁士人毫不客气地赶到瑞士去流亡了。6 月 13 日的游行示威⁷⁰本来是要建立起他实际上所出

使的那个政府,结果也同样被毫不客气地镇压了。他由一个死亡的政府出使到一个并未诞生的政府这个很有些令人哭笑不得的使命,幸运地被当时的法国政府所免除——法国政府因为他参加了6月13日非武装的巴黎国民自卫军举行的“和平”示威而逮捕了他,最后予以驱逐出境。如果派遣他的政府仍继续存在,如果他实际上所出使的政府真的成立,那么卡尔·布林德什么事情做不成啊?他从巴登某某人那里谋得了一项到巴黎某某人那里去的使命,靠了这一着,他就“以外交手段”远远地避开了同已经临近的普鲁士军队相遇的危险。到底他还是做到了一件事^①。

又一次,在1870年,普法战争开始的时候,意大利有可能与法国联合。可是卡尔·布林德在注视着此事。“倘若维克多-艾曼努埃尔国王如何如何”(第519页)然而这又是一次从一个不存在的政府派往另一个不存在的政府的使命。路易-拿破仑拒绝将罗马交给维克多-艾曼努埃尔,结果迫使他不得不强行从法国手中夺回该城,从而使意法联盟成为不可能²¹²。卡尔·布林德的效劳和建议,无论多么宝贵,又被谢绝。所以这位永远是 *in partibus*[非现实的]^②外交家未能改变历史的进程,只好满足于马志尼的“最热烈的感激”。

人们不由得想起,一个爱吹牛的人在与别人**争吵**时喊道:“朋友们,拉住我,不然我会干出可怕的事情来。”每当卡尔·布林德正要踏上历史舞台的前台时,总有某种不利的情况使他不能完成那本该

① 最后两句话是马克思写的。在恩格斯手稿前一页边上,马克思是这样写的:“他及时地弄到了一项虚构的出国使命,这就保险不会落得个卡尔·布林德巧遇入侵巴登的普鲁士大军了。”——编者注

② 直译是“在异教国家中的”。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纯粹有名无实的主教时,在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编者注

使他名垂千古的“可怕的事情”，这对整个世界说来是不幸，可是对卡尔·布林德先生说来或许是万幸吧。

但愿这是卡尔·布林德关于卡尔·布林德和为了卡尔·布林德而精心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至少是用英文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

弗·恩格斯写于 1879 年 10 月
5 日—8、9 日之间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85 年历史考证
版第 1 部分第 25 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5 卷翻译

弗·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²¹³

弗·恩格斯写于 1880 年 1 月
—3 月上半月

载于 1880 年 3 月 20 日, 4 月 20
日和 5 月 5 日《社会主义评论》
杂志第 3、4 和 5 期; 并于 1880
年在巴黎出版法文单行本:
弗·恩格斯《空想社会主义和
科学社会主义》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8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7 卷翻译

Bibliothèque de la REVUE SOCIALISTE

I.

SOCIALISME UTOPIQUE

ET

SOCIALISME SCIENTIFIQUE

PAR

FRÉDÉRIC ENGELS

Traduction française par

PAUL LAFARGUE

Prix: 50 centimes



PARIS

DERVEAUX LIBRAIRE-ÉDITEUR

23, Rue d'Argoulême, 32

1880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一书的法文第一版的扉页

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惟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①最初,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头

^① 关于法国革命,黑格尔有如下一段话:“正义思想、正义概念一下子就得到了承认,非正义的旧支柱不能对它作任何抵抗。因此,在正义思想的基础上现在创立了宪法,今后一切都必须以此为根据。自从太阳照耀在天空而行星围绕着太阳旋转的时候起,还从来没有看到人用头立地,即用思想立地并按照思想去构造现实。阿那克萨哥拉第一个说,Nûs即理性支配着世界;可是,直到现在人们才认识到,思想应当支

脑以及通过头脑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后来这句话又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同这些原理相矛盾的现实,实际上从上到下都被颠倒了。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性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理性的王国才开始出现。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²¹⁴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18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们,也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

但是,除了封建贵族和作为社会所有其余部分的代表出现的^①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游手好闲的富人和从事劳动的穷人之间的普遍的对立。正是由于这种情形,资产阶级的代表才能标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阶级的代表,而是整个受苦

配精神的现实。因此,这是一次壮丽的日出。一切能思维的生物都欢庆这个时代的来临。这时到处笼罩着一种高尚的热情,全世界都浸透了一种精神的热忱,仿佛正是现在达到了神意和人世的和解。”(黑格尔《历史哲学》1840年版第535页)难道现在不正是应当用反社会党人法去反对已故的黑格尔教授的这种危害社会秩序的颠覆学说吗?

② 在1883年德文第1版中没有“作为社会所有其余部分的代表出现的”这个短语。——编者注

人类的代表。不仅如此,资产阶级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有自己的对立物同它缠在一起:资本家没有雇佣工人就不能存在,而且,随着中世纪的行会师傅发展成为现代的资产者,行会帮工和行会外的短工便相应地发展成为无产者。虽然总的说来,资产阶级在同贵族斗争时^①有理由认为自己同时代表当时的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但是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程度不同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再洗礼派和托马斯·闵采尔^②,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²¹⁵,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伴随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的这些革命发动,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表现;在16世纪和17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²¹⁶,而在18世纪已经有了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应当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禁欲主义的、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种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后来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在圣西门那里,除无产阶级的倾向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有一定的影响。欧文在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国家里,在这种生产所造成的种种对立的影响下,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出发,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消除阶级差别的方案。

所有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

① 在1883年德文第1版中,这几个字不是黑体。——编者注

② 在1883年德文第1版中“再洗礼派和托马斯·闵采尔”是“托马斯·闵采尔派。”——编者注

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是他们的王国和启蒙学者的王国是有天壤之别的。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理性、非正义的,所以也应该像封建制度和一切更早的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500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500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

我们已经看到,为革命作了准备的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如何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作一切现存事物的惟一的裁判者。他们认为,应当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应当无情地铲除一切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恰好那时正在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知性而已。因此,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 and 这个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卢梭的社会契约在恐怖时代获得了实现,对自己的政治能力丧失了信心的资产阶级,为了摆脱这种恐怖,起初求助于腐败的督政府,最后则托庇于拿破仑的专制统治。²¹⁷ 早先许诺的永久和平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掠夺战争。理性的社会的遭遇也并不更好一些。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化为普遍的幸福,反而由于沟通这种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他特权的废除,由于缓和这种对立的教会慈善设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化了;现在已经实现的摆

脱封建桎梏的“财产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是把他们的被大资本和大地主的强大竞争所压垮的小财产出卖给这些大财主的自由，于是这种“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变成了失去财产的自由^①；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现金交易，如卡莱尔所说的，日益成为社会的惟一纽带。犯罪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增加。如果说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干出来的封建罪恶虽然没有消灭，但终究已经暂时被迫收敛了，那么，以前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资产阶级罪恶却更加猖獗了。商业日益变成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②化为竞争中的蓄意刁难和忌妒。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刀剑成了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初夜权从封建领主手中转到了资产阶级工厂主的手中。卖淫增加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法律承认的卖淫的形式，是卖淫的官方的外衣，并且还以大量的通奸作为补充。总之，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那时只是还缺少指明这种失望的人，而这种人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就出现了。1802年出版了圣西门的《日内瓦书信》^③；1808年出版了傅立叶的第一部著作^④，虽然他的理论基础在1799年就已经奠定了；1800年1

① 在1883年德文第1版中没有“现在已经实现的……失去财产的自由”这段话。——编者注

② 指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编者注

③ 圣西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1803年巴黎版。——编者注

④ 傅立叶《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1808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月1日,罗伯特·欧文担负了新拉纳克^①的管理工作。

但是,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很不发展。在英国刚刚兴起的大工业,在法国还不为人所知。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的变革,使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消除成为绝对必然的冲突——不仅是大工业所产生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且是它所产生的生产力和交换形式本身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些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因此,如果说在1800年左右,新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冲突还只是开始形成,那么,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就更是这样了。虽然巴黎的无财产的群众在恐怖时代曾有一瞬间夺得了统治权,从而能够引导一场甚至是反对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达到胜利,但是他们只是以此证明了,他们的统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持久的。在当时刚刚作为新阶级的胚胎从这些无财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还完全无力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它表现为一个无力帮助自己,最多只能从外面、从上面取得帮助的受压迫的受苦的等级。

这种历史情况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

^① 苏格兰拉纳克附近的一个棉纺织厂,创办于1784年,在工厂周围形成了一个小镇。——编者注

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这一点已经弄清，我们不再花费时间去谈论现在已经完全属于过去的这一方面了。让著作界的小贩们去一本正经地挑剔这些现在只能使人发笑的幻想吧！让他们去宣扬自己的清醒的思维方式优越于这种“疯狂的念头”吧！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倒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的思想，而这些却是那班庸人所看不见的。

圣西门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他在革命爆发时还不到30岁。这次革命，是第三等级即从事生产和贸易的国民大众对以前享有特权的游手好闲的等级即贵族和僧侣的胜利。但是，很快就暴露出，第三等级的胜利只是这个等级中的一小部分人的胜利，是第三等级中享有社会特权的阶层即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夺得政治权力。而且这个资产阶级还在革命过程中就迅速地发展起来了，这是因为它利用没收后加以拍卖的贵族和教会的地产进行了投机，同时又借承办军需品欺骗了国家。正是这些骗子的统治在督政府时代使法国和革命濒于覆灭，从而使拿破仑有了举行政变的借口。因此，在圣西门的头脑中，第三等级和特权等级之间的对立就采取了“劳动者”和“游手好闲者”之间的对立的形式。游手好闲者不仅是指旧时的特权分子，而且也包括一切不参加生产和贸易而靠租息为生的人。而“劳动者”不仅是指雇佣工人，而且也包括厂主、商人和银行家。游手好闲者失去了精神领导和政治统治的能力，这已经是确定无疑的，而且由革命最终证实了。至于无财产者没有这种能力，在圣西门看来，这已由恐怖时代的经验所证明。那么，应当是谁来领导和统治呢？按照圣西门的意见，应当是科学和工业，它们两者由一种新的宗教纽带结合起来，

而这种纽带必然是神秘的和等级森严的“新基督教”，其使命就是恢复从宗教改革时起被破坏了的各種宗教观点的统一。可是，科学就是学者，而工业首先就是积极活动的资产者：厂主、商人、银行家。这些资产者固然应当成为一种公众的官吏、社会的受托人，但是对工人据说应当保持发号施令的和享有经济特权的地位。特别是银行家应当担负起通过调节信用来调节整个社会生产的使命。这样的见解完全适应法国刚刚产生大工业以及随之产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的那个时代。但是，圣西门特别强调的是：他随时随地都首先关心“人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la classe la plus nombreuse et la plus pauvre）的命运。^①

圣西门在《日内瓦书信》中已经提出这样一个论点：

“人人应当劳动。”

在同一部著作中他已经指出，恐怖统治是无财产的群众的统治。他向他们高声说道：

“看吧，当你们的伙伴统治法国的时候，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造成了饥荒！”^②

但是，认识到法国革命是阶级斗争，并且不仅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而且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在1816年，圣西门宣布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政治将完全溶化在经济中。²¹⁸如果说经济状况

① 在1883年德文第1版中没有“圣西门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的命运。”这一整段文字。——编者注

② 圣西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的第二封信。——编者注

是政治制度的基础这样的认识在这里仅仅以萌芽状态表现出来,那么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这种思想,即最近纷纷议论的“废除国家”的思想,已经明白地表达出来了。同样比他的同时代人高明的是:在1814年联军刚刚开进巴黎以后,接着又在1815年百日战争期间,他声明,法国和英国的同盟,其次这两个国家和德国的同盟,是欧洲的繁荣和和平的惟一保障。²¹⁹在1815年向法国人鼓吹去和滑铁卢战役的胜利者建立同盟,这确实既要有勇气又要有历史远见。²²⁰

如果说我们在圣西门那里发现了天才的远大眼光,由于他有这种眼光,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所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那么,我们在傅立叶那里就看到了他对现存社会制度所作的具有真正法国人的风趣的、但并不因此就显得不深刻的批判。傅立叶抓住了资产阶级所说的话,抓住了他们的革命前的狂热的预言者和革命后的被收买的奉承者所说的话。他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他不仅拿这种贫困同以往的启蒙学者关于只是由理性统治的社会、关于能给所有的人以幸福的文明、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诱人的诺言作对比,而且也拿这种贫困同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华丽的词句作对比;他指出,同最响亮的词句相对应的到处都是最可怜的现实,他辛辣地嘲讽这种词句的无可挽救的破产。傅立叶不仅是批评家,他的永远开朗的性格还使他成为一个讽刺家,而且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他以巧妙而诙谐的笔调描绘了随着革命的低落而盛行起来的投机欺诈和当时法国商业中普遍的小商贩习气。他更巧妙地批判了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形式和妇女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他第一个表述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

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²²¹但是,傅立叶最了不起的地方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他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野蛮、宗法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即从16世纪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他指出:

“这种文明制度使野蛮时代每一以简单方式犯下的罪恶,都采取了复杂的、暧昧的、两面的、虚伪的存在形式”^①;

文明时代是在“恶性循环”^②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因此,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同它希望达到或者佯言希望达到的相反。所以,比如说,

“在文明时代,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③。

我们看到,傅立叶是和他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熟练地掌握了辩证法的。他反对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空谈,而同样辩证地断言,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上升时期^④,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时期,而且他还把这个看法运用于整个人类的未来。正如康德把地球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引入自然科学一样,傅立叶把人类将来要归

① 傅立叶《关于普遍统一的理论》第1卷和第4卷;《傅立叶全集》1843年巴黎版第2卷第78—79页和1841年巴黎版第5卷第213—214页。——编者注

② 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会的新世界,或按情欲分类的引人入胜的和合乎自然的劳动方式的发现》;载于《傅立叶全集》1848年巴黎版第6卷第27—46、390页。——编者注

③ 同上书,第35页。——编者注

④ 参看《傅立叶全集》1841年巴黎版第1卷第50页及以下几页。——编者注

于灭亡的思想引入了历史研究。

当革命的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场比较平静、但是并不因此就显得缺乏力量的变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转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飙时期。社会越来越迅速地分化为大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无产者,现在处于他们二者之间的,已经不是以前的稳定的中间等级,而是不稳定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群众,他们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是人口中最流动的部分。新的生产方式还处在上升时期的最初阶段;它还是正常的、适当的、在当时条件下惟一可能的生产方式。但是就在那时,它已经产生了明显的社会弊病:无家可归的人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的血缘关系、宗法从属关系、家庭关系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全新的环境中(从乡村转到城市,从农业转到工业,从稳定的生活条件转到天天都在变化的、毫无保障的生活条件)^①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这时有一个 29 岁的厂主作为改革家出现了,这个人具有像孩子一样单纯的高尚的性格,同时又是一个少有的天生的领导者。罗伯特·欧文接受了唯物主义启蒙学者的学说:人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社会地位和欧文相同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工业革命只是便于浑水摸鱼和大发横财的一片混乱。欧文则认为,工业革命是运用其心爱的理论并把混乱化为秩序的好机会。当他在曼彻斯特领导一个有五百多工人的工厂的时候,就试行了这个理论,并且获得了成

^① 在 1883 年德文第 1 版中没有圆括号里的话。——编者注

效。从1800年到1829年间,他按照同样的精神以股东兼经理的身份管理了苏格兰的新拉纳克大棉纺厂,只是在行动上更加自由,而且获得了使他名闻全欧的成效。新拉纳克的人口逐渐增加到2500人,这些人的成分原来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多半是极其堕落的分子,可是欧文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完善的模范移民区,在这里,酗酒、警察、刑事法庭、诉讼、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都绝迹了。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只是由于他使人生活在比较合乎人的尊严的环境中,特别是让成长中的一代受到精心的教育。他发明了并且第一次在这里创办了幼儿园。孩子们满一周岁以后就进幼儿园;他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愉快,父母几乎领不回去。欧文的竞争者迫使工人每天劳动13—14小时,而在新拉纳克工人只劳动10小时半。当棉纺织业危机使工厂不得不停工4个月的时候,歇工的工人还继续领取全部工资。虽然如此,这个企业的价值还是增加了一倍多,而且直到最后一直给企业主们带来丰厚的利润。

欧文对这一切并不感到满足。他给他的工人创造的生活条件,在他看来还远不是合乎人的尊严的,他说,

“这些人都是我的奴隶”;

他给他们安排的比较良好的环境,还远不足以使人的性格和智慧得到全面的合理的发展,更不用说允许进行自由的生命活动了。

“可是,这2500人中从事劳动的那一部分人给社会生产的实际财富,在不到半个世纪前还需要60万人才能生产出来。我问自己:这2500人所消费的财富和以前60万人本来应当消费的财富之间的差额到哪里去了呢?”

答案是明白的。这个差额是落到企业所有者的手里去了,他们除了领取5%的基本投资利息以外,还得到30万英镑(600万马克)

以上的利润。新拉纳克尚且如此，英国其他一切工厂就更不用说了。

“没有这些由机器创造的新财富，就不能进行推翻拿破仑和保持贵族的社会原则的战争。而这种新的力量是劳动阶级创造的。”^①

因此，果实也应当属于劳动阶级。在欧文看来，以前仅仅使个别人发财而使群众受奴役的新的强大的生产力，提供了改造社会的基础，它作为大家的共同财产只应当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务。

欧文的共产主义就是通过这种纯粹营业的方式，作为所谓商业计算的果实产生出来的。它始终都保持着这种面向实际的性质。例如，在1823年，欧文提出了通过共产主义移民区消除爱尔兰贫困的办法，并附上了关于筹建费用、年度开支和预计收入的详细计算。而在他的关于未来的最终计划中，对各种技术上的细节，包括平面图、正面图和鸟瞰图在内，都作了非常内行的规划，以致他的社会改革的方法一旦被采纳，则各种细节的安排甚至从专家的眼光看来也很少有什么可以挑剔的。

转向共产主义是欧文一生中的转折点。当他还只是一个慈善家的时候，他所获得的只是财富、赞扬、尊敬和荣誉。他是欧洲最有名望的人物。不仅社会地位和他相同的人，而且连达官显贵、王公大人们都点头倾听他的讲话。可是，当他提出他的共产主义理论时，情况就完全变了。在他看来，阻碍社会改革的首先有三大障碍：私有制、宗教和现在的婚姻形式。他知道，他向这些障碍进攻，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官场社会的普遍排斥，他的整个社会地位的丧失。但是，他并

① 摘自《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致全体“欧洲红色共和党人、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并呈1848年法国临时政府以及“维多利亚女王和女王的顾问”的备忘录》。

没有却步,他不顾一切地向这些障碍进攻,而他所预料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他被逐出了官场社会,报刊对他实行沉默抵制,他由于以全部财产在美洲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失败而变得一贫如洗,于是他就直接转向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中又进行了30年的活动。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进步,都是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例如,经过他五年的努力,在1819年通过了限制工厂中妇女和儿童劳动的第一个法律。²²²他主持了英国工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全国各工会联合成一个总工会。²²³同时,作为向完全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过渡的措施,一方面他组织了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这些合作社从这时起至少已经在实践上证明,无论商人或厂主都决不是不可缺少的人物;另一方面他组织了劳动市场²²⁴,即借助以劳动小时为单位的劳动券来交换劳动产品的机构;这种机构必然要遭到失败,但是充分预示了晚得多的蒲鲁东的交换银行²²⁵,而它和后者不同的是,它并没有被说成是医治一切社会弊病的万灵药方,而只是被描写为激进得多的社会改造的第一步。

空想主义者的见解曾经长期支配着19世纪的社会主义观点,而且现在还部分地支配着这种观点。法国和英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不久前都还信奉这种见解^①,包括魏特林在内的先前的德国共产主义也是这样。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

① 在1883年德文第1版中这句话是:“现在英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正热衷于这种观察方式,还在不久前法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就曾热衷于这种观察方式。”——编者注

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同时,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又是各不相同的;而因为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独特形式又是由他们的主观知性、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思维训练水平所决定的,所以,解决各种绝对真理的这种冲突的办法就只能是它们互相磨损。由此只能得出一种折衷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直到今天还统治着法国和英国大多数社会主义工人的头脑,它是由各学派创始人的比较不会引起反感的批判性言论、经济学原理和关于未来社会的观念组成的色调极为复杂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的各个组成部分,在辩论的激流中越是磨光其锋利的棱角,就像溪流中圆圆的石子一样,这种混合物就越加容易构成。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二

在此期间，同 18 世纪的法国哲学并列和继它之后，近代德国哲学产生了，并且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它的最大的功绩，就是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他们中最博学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就已经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而近代哲学虽然也有辩证法的卓越代表（例如笛卡儿和斯宾诺莎），但是特别由于英国的影响却日益陷入所谓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18 世纪的法国人也几乎全都为这种思维方式所支配，至少在他们的专门哲学著作中是如此。可是，在本来意义的哲学之外，他们同样也能够写出辩证法的杰作；我们只要提一下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子》²²⁶和卢梭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就够了。——在这里，我们就简略地谈谈这两种思维方法的实质。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所以，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总画面，其中各个细节还或多或少地隐藏在背景中，我们注意得更多的是运动、转变和联系，而不是注意什么东西在运动、转变和联系。这种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

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最先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而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生成和消逝。但是，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分别地加以研究。这首先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的任务；而这些研究部门，由于十分明显的原因，在古典时代的希腊人那里只占有从属的地位，因为他们首先必须为这种研究搜集材料。只有当自然和历史的材料搜集到一定程度以后，才能进行批判的整理和比较，或者说进行纲、目和种的划分。因此，精确的自然研究只是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²²⁷的希腊人那里才开始，而后来在中世纪由阿拉伯人继续发展下去；可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15世纪下半叶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进展。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400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各种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作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这种考察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植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

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①。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身又是别的东西。正和负是绝对互相排斥的；原因和结果也同样是处于僵硬的相互对立中。初看起来，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极容易理解的，因为它是合乎所谓常识的。然而，常识在日常应用的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碰到极为惊人的变故。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依对象的性质而展开的各个领域中是合理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迟早都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记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记它们的生成和消逝；看到它们的静止，忘记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知道并且可以肯定地说，某一动物存在还是不存在；但是，在进行较精确的研究时，我们就发现，这有时是极其麻烦的事情。这一点法学家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为了判定在子宫内杀死胎儿是否算是谋杀，曾绞尽脑汁去寻找合理的界限，结果总是徒劳。同样，要确定死亡的那一时刻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生理学证明，死亡并不是突然的、一瞬间的事情，而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同样，任何一个有机体，在每一瞬间都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在每一瞬间，它同化着外界供给的物质，并排泄出其他物质；在每一瞬间，它的机体中都有细胞在死亡，也有新的细胞在形成；经过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这个机体的物质便完全更

^①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5章第37节。——编者注

新了,由其他物质的原子代替了,所以,每个有机体永远是它本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在进行较精确的考察时,我们也发现,某种对立的两极,例如正和负,是彼此不可分离的,正如它们是彼此对立的一样,而且不管它们**如何**对立,它们总是互相渗透的;同样,原因和结果这两个概念,只有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适用;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的场合放到它同宇宙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概念就联结起来,消失在关于普遍相互作用的观念中,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的,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

所有这些过程和思维方法都是形而上学思维的框子所容纳不下的。相反,对辩证法来说,上述过程正好证明它的方法是正确的,因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运行的;自然界不是循着一个永远一样的不断重复的圆圈运动,而是经历着实在的历史。这里首先就应当指出达尔文,他极其有力地打击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因为他证明了今天的整个有机界,植物和动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延续了几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可是,由于学会辩证地思维的自然研究家到现在还屈指可数,所以,现在理论自然科学中普遍存在的并使教师和学生、作者和读者同样感到绝望的那种无限混乱的状态,完全可以从已经达到的成果和传统的思维方式之间的这个冲突中得到说明。

因此,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

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近代德国哲学一开始就是以这种精神进行活动的。康德一开始他的学术生涯,就把牛顿的稳定的和经过有名的第一推动后永恒不变的太阳系变成了历史的过程,即太阳和一切行星由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过程。同时,他已经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太阳系的产生也预示着它将来的不可避免的灭亡。过了半个世纪,他的观点由拉普拉斯从数学上作出了证明;又过了半个世纪,分光镜证明了,在宇宙空间存在着凝聚程度不同的炽热的气团。²²⁸

这种近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完成了。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这个观点看来,人类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乱七八糟的、统统应当被这时已经成熟了的哲学理性的法庭所唾弃并最好尽快被人遗忘的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而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是要透过一切迷乱现象探索这一过程的逐步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

黑格尔的体系没有解决向自己提出的这个任务,这在这里没有多大关系。他的划时代的功绩是提出了这个任务。这不是任何个人所能解决的任务。虽然黑格尔和圣西门一样是当时最博学的人物,但是他毕竟受到了限制,首先是他自己的必然有限的知识的限制,其次是他那个时代的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同样有限的知识和见解的限制。但是,除此以外还有第三种限制。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就是说,在他看来,他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或多或少抽

象的反映,相反地,在他看来,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以某种方式存在着的“观念”的实现了的反映。这样,一切都被头足倒置了,世界的现实联系完全被颠倒了。所以,不论黑格尔如何正确地 and 天才地把握了一些个别的联系,但由于上述原因,就是在细节上也有许多东西不能不是牵强的、造作的、虚构的,一句话,被歪曲的。黑格尔的体系作为体系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流产,但也是这类流产中的最后一次。就是说,它还包含着一个不可救药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它以历史的观点作为基本前提,即把人类的历史看作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来说在认识上是不能由于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结束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说它自己就是这种绝对真理的全部内容。关于自然和历史的无所不包的、最终完成的认识体系,是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但是,这样说决不排除,相反倒包含下面一点,即对整个外部世界的有系统的认识是可以一代一代地取得巨大进展的。

一旦了解到以往的德国唯心主义是完全荒谬的,那就必然导致唯物主义,但是要注意,并不是导致 18 世纪的纯粹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简单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无论在 18 世纪的法国人那里,还是在黑格尔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都认为,自然界是一个沿着狭小的圆圈循环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牛顿所说的永恒的天体和林耐所说的不变的有机物种也包含在其中。同这种自然观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新近的进步,从这些进步看来,自然界同样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天体和适宜条件下生存在天体上的有机物种一样是有生有灭的;至于循环,即使能够存在,其

规模也要大得无比。在这两种情况下,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

但是,自然观的这种变革只能随着研究工作提供相应的实证的认识材料而实现,而在这期间一些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却老早就发生了。1831年在里昂发生了第一次工人起义;在1838—1842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运动,即英国的宪章派运动²²⁹,达到了高潮。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新近取得的政治统治的发展,在欧洲最先进的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重要地位。事实日益令人信服地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和谐和人民的普遍福利的学说完全是撒谎。所有这些事实都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同样,作为这些事实的理论表现(虽然是极不完备的表现)的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也不能再置之不理了。但是,旧的、还没有被排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作“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一下。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

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由这个基础来说明。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现在,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

因此,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作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作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体系,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可是,以往的社会主义同这种唯物主义的观点是不相容的,正如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观同辩证法和近代自然科学不相容一样。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制服不了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作坏东西抛弃掉。它越是激烈地反对同这种生产方式密不可分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越是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是怎么回事,它是怎样产生的。但是,问题在于:一方面应当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应当揭露这种生产方式的一直还隐蔽着的内在性质。这已经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完成了。已经证明,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的剥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资本家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商品市场上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他的工人的劳动力,他从这种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然比他

为这种劳动力付出的多；这种剩余价值归根到底构成了有产阶级手中日益增加的资本量由以积累起来的价值量。这样就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生产的过程。

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

三

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①的日益觉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兆，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同时这还说明，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

那么，照此看来，现代社会主义是怎么回事呢？

现在大家几乎都承认，现存的社会制度是由现在的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创立的。资产阶级所固有的生产方式（从马克思以来称为

^① 见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4场（《浮士德的书斋》）。——编者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权、等级特权以及相互的人身束缚不相容的;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建立了自由竞争、自由迁徙、商品所有者平等的王国,以及其他一切资产阶级的美妙东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在可以自由发展了。自从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但是,正如从前工场手工业以及在它影响下进一步发展了的手工业同封建的行会桎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时就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限制它的桎梏发生冲突了。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这种冲突,并不是像人的原罪和神的正义的冲突那样产生于人的头脑中,而是存在于事实中,客观地、在我们之外、甚至不依赖于引起这种冲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动而存在着。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

那么,这种冲突表现在哪里呢?

在资本主义生产出现之前,即在中世纪,普遍地存在着以劳动者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小生产:小农、自由农或依附农的农业和城市的手工业。劳动资料——土地、农具、作坊、手工业工具——都是个人的劳动资料,只供个人使用,因而必然是小的、简陋的、有限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它们也照例是属于生产者自己的。把这些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加以集中和扩大,把它们变成现代的强有力的生产杠杆,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承担者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资产阶级怎样从15世纪起经过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

这三个阶段历史地实现了这种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篇中已经作了详尽的阐述。但是,正如马克思在那里所证明的,资产阶级要是不把这些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的**,即只能由**一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就不能把它们变成强大的生产力。纺纱机、机械织机和蒸汽锤代替了纺车、手工织机和手工锻锤;需要成百上千的人进行协作的工厂代替了小作坊。同生产资料一样,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而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现在工厂所出产的纱、布、金属制品,都是许多工人的共同产品,都必须顺次经过他们的手,然后才变为成品。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这是我做的,这是**我的**产品。

但是,在自发的、无计划地逐渐形成的^①社会内部分工成了生产的基本形式的地方,这种分工就使产品具有**商品**的形式,而商品的相互交换,即买和卖,使个体生产者有可能满足自己的各式各样的需要。中世纪的情况就是这样。例如,农民把农产品卖给手工业者,从他们那里买得手工业品。在这种个体生产者即商品生产者的社会中,渗入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它在整个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自发的**无计划的**分工中间,确立了在个别工厂里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分工;在个体生产旁边出现了**社会的**生产。两者的产品在同一市场上出卖,因而价格至少大体相等。但是,有计划的组织要比自发的分工有力量;采用社会劳动的工厂里所制造的产品,要比分散的小生产者所制造的便宜。个体生产在一个又一个的部门中遭到失败,社会的生产使全部旧的生产方式革命化了。但是它的这种革命性质并不为人所认识,结果它反而被用来当作提高和促进商品生产的手段。它的产生,是

① 在1883年德文第1版中没有“无计划地逐渐形成的”。——编者注

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定的已经存在的杠杆即商人资本、手工业、雇佣劳动直接联系着的。由于它本身是作为商品生产的一种新形式出现的,所以商品生产的占有形式对它也保持着全部效力。

在中世纪得到发展的那种商品生产中,劳动产品应当属于谁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发生。当时个体生产者通常都用自己所有的、往往是自己生产的原料,用自己的劳动资料,用自己或家属的手工劳动来制造产品。这样的产品根本用不着他去占有,它自然是属于他的。因此,产品的所有权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即使利用过别人的帮助,这种帮助通常也是次要的,而且往往除工资以外还得到别的报酬:行会的学徒和帮工与其说是为了吃饭和挣钱而劳动,不如说是为了自己学成手艺当师傅而劳动。后来生产资料开始集中在大的作坊和手工工场中,开始变为真正社会的生产资料。但是,这些社会的生产资料和产品还像从前一样仍被当作个人的生产资料和产品来处理。从前,劳动资料的占有者占有产品,因为这些产品通常是他自己的产品,别人的辅助劳动是一种例外,而现在,劳动资料的占有者还继续占有产品,虽然这些产品已经不是他的产品,而完全是别人劳动的产品了。这样,现在按社会方式生产的产品已经不归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和真正生产这些产品的人占有,而是归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实质上已经变成社会的了。但是,它们仍然服从于这样一种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是以个体的私人生产为前提,因而在这种形式下每个人都占有自己的产品并把这个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卖。生产方式虽然已经消灭了这一占有形式的前提,但是它仍然服从于这一占有形式^①。

^① 这里无须解释,虽然占有形式还是原来那样,可是占有的性质由于上述过程而经历的革命,并不亚于生产所经历的革命。我占有我自己的

赋予新的生产方式以资本主义性质的这一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新的生产方式越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从而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

如上所述,最初的资本家就已经遇到了现成的雇佣劳动形式。但是,那时雇佣劳动是一种例外,一种副业,一种辅助办法,一种暂时措施。不时出去打短工的农业劳动者,都有自己的几亩土地,不得已时单靠这些土地也能生活。行会条例是要使今天的帮工明天可以成为师傅。但是,生产资料一旦变为社会的生产资料并集中在资本家手中,情形就改变了。个体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他们除了受雇于资本家就没有别的出路。雇佣劳动以前是一种例外和辅助办法,现在成了整个生产的通例和基本形式;以前是一种副业,现在成了工人的惟一职业。暂时的雇佣劳动者变成了终身的雇佣劳动者。此外,由于同时发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封建主扈从人员被解散,农民被逐出自己的家园等等,终身的雇佣劳动者大量增加了。集中在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彻底分离了。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渗入了商品生产者即通过自

产品还是占有别人的产品,这自然是两种很不相同的占有。顺便提一下: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的雇佣劳动是很古老的;它个别地和分散地同奴隶制度并存了几百年。但是,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这一萌芽才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己产品的交换来实现社会联系的个体生产者的社会。但是,每个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都有一个特点:这里的生产者丧失了对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控制。每个人都用自己偶然拥有的生产资料并为自己的特殊的^①交换需要而各自进行生产。谁也不知道,他的那种商品在市场上会出现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谁也不知道,他的个人产品是否真正为人所需要,是否能收回它的成本,到底是否能卖出去。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占统治地位。但是,商品生产同任何其他生产形式一样,有其特殊的、固有的、和它分不开的规律;这些规律不顾无政府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中、通过无政府状态而为自己开辟道路。这些规律在社会联系的惟一继续存在的形式即交换中表现出来,并且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对各个生产者发生作用。所以,这些规律起初连这些生产者也不知道,只是由于长期的经验才逐渐被他们发现。所以,这些规律是在不经过生产者并且同生产者对立的情况下,作为他们的生产形式的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而为自己开辟道路。产品支配着生产者。

在中世纪的社会里,特别是在最初几世纪,生产基本上是为了供自己消费。它主要只是满足生产者及其家属的需要。在那些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地方,例如在农村中,生产还满足封建主的需要。因此,在这里没有交换,产品也不具有商品的性质。农民家庭差不多生产了自己所需要的一切:食物、用具和衣服。只有当他们在满足自己的需要并向封建主交纳实物租税以后还能生产更多的东西时,他们才开始生产商品;这种投入社会交换即拿去出卖的多余产品就成了商品。诚然,城市手工业者一开始就必然为交换而生产。但是,他们也

^① 在1883年德文第1版中不是“特殊的”,而是“个人的”。——编者注

自己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大部分东西；他们有园圃和小块土地；他们在公共森林中放牧牲畜，并且从这些森林中取得木材和燃料；妇女纺麻，纺羊毛等等。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中。因此，交换是有限的，市场是狭小的，生产方式是稳定的，地方和外界是隔绝的，地方内部是统一的；农村中有马尔克^①，城市中有行会。

但是，随着商品生产的扩展，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以前潜伏着的商品生产规律也就越来越公开、越来越有力地发挥作用了。旧日的束缚已经松弛，旧日的壁障已经突破，生产者日益变为独立的、分散的商品生产者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已经表现出来，并且越来越走向极端。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加剧社会生产中的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工具正是无政府状态的直接对立面：每一个别生产企业中的生产作为社会生产所具有的日益加强的组织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利用这一杠杆结束了旧日的和平的稳定状态。它在哪一个工业部门被采用，就不容许任何旧的生产方法在那里和它并存。它在哪里控制了手工业，就把那里的旧的手工业消灭掉。劳动场地变成了战场。伟大的地理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地的开拓使销售市场扩大了许多倍，并且加速了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化。斗争不仅爆发于地方的各个生产者之间；地方性的斗争又发展为全国性的，发展为17世纪和18世纪的商业战争²³⁰。最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个斗争成为普遍的，同时使它具有了空前的剧烈性。在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在工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之间以及国家和国家之间，生死存亡都取决于天然的或人为的生产

^① 参看本卷第565—584页。——编者注

条件的优劣。失败者被无情地淘汰掉。这是从自然界加倍疯狂地搬到社会中来的达尔文的个体生存斗争。动物的自然状态竟表现为人类发展的顶点。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它生而具有的矛盾的这两种表现形式中运动着,它毫无出路地处在早已为傅立叶所发现的“恶性循环”中。诚然,傅立叶在他那个时代还不能看到:这种循环在逐渐缩小;运动无宁说是沿螺旋线行进,并且必然像行星的运动一样,由于同中心相碰撞而告终。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推动力使大多数人日益变为无产者,而无产者群众又将最终结束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推动力,使大工业中的机器无止境地改进的可能性变成一种迫使每个工业资本家在遭受毁灭的威胁下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的强制命令。但是,机器的改进就造成人的劳动的过剩。如果说,机器的采用和增加意味着成百万的手工劳动者为少数机器劳动者所排挤,那么,机器的改进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机器劳动者本身受到排挤,而归根到底就意味着造成一批超过资本雇工的平均需要的、可供支配的雇佣劳动者,一支真正的产业后备军(我早在1845年就这样称呼他们^①),这支后备军在工业开足马力工作的时期可供随意支配,而由于必然随着这个时期到来的崩溃又被抛到街头,这支后备军任何时候都是工人阶级在自己同资本进行生存斗争中的绊脚石,是把工资抑制在合乎资本家需要的低水平上的调节器。这样一来,机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成了资本用来对付工人阶级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劳动资料不断地夺走工人手中的生活资料,工人自己的产品变

^①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109页。

成了奴役工人的工具。于是,劳动资料的节约,一开始就同时成为对劳动力的最无情的浪费和对劳动职能的正常前提的剥夺^①;机器这一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变成了使工人及其家属一生的时间转化为可以随意用来增殖资本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于是,一部分人的过度劳动成了另一部分人失业的前提,而在全世界追逐新消费者的大工业,却在国内把群众的消费限制到忍饥挨饿这样一个最低水平,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国内市场。“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马克思《资本论》第671页)^②而期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另一种产品分配,那就等于要求电池的电极和电池相联时不使水分解,不在阳极放出氧和在阴极放出氢。

我们已经看到,现代机器的已经达到极高程度的改进的可能性,怎样由于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而变成一种迫使各个工业资本家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不断提高机器的生产能力的强制性命令。对资本家来说,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的单纯的实际可能性也变成了同样的强制性命令。大工业的巨大的扩张力——气体的膨胀力同它相比简直是儿戏——现在在我们面前表现为不顾任何反作用力在质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3卷第13章,5.工人和机器之间的斗争。——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3卷第708页。——编者注

上和数量上进行扩张的需要。这种反作用力是由大工业产品的消费、销路、市场形成的。但是,市场向广度和深度扩张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规律支配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新的“恶性循环”。

事实上,自从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机爆发以来,整个工商业世界,一切文明民族及其野蛮程度不同的附属地中的生产和交换,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轨一次。交易停顿,市场盈溢,产品大量滞销积压,银根奇紧,信用停止,工厂停工,工人群众因为他们生产的生活资料过多而缺乏生活资料,破产相继发生,拍卖纷至沓来。停滞状态持续几年,生产力和产品被大量浪费和破坏,直到最后,大批积压的商品以或多或少压低了的价格卖出,生产和交换又逐渐恢复运转。步伐逐渐加快,慢步转成快步,工业快步转成跑步,跑步又转成工业、商业、信用和投机事业的真正障碍赛马中的狂奔,最后,经过几次拼命的跳跃重新陷入崩溃的深渊。如此反复不已。从1825年以来,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历了整整五次,目前(1877年)正经历着第六次。这些危机的性质表现得这样明显,以致傅立叶把第一次危机称为 *crise pléthorique* [多血性危机],即由过剩引起的危机时,就中肯地说明了所有这几次危机的实质。^①

在危机中,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剧烈地爆发出来。商品流通暂时停顿下来;流通手段即货币成为流通的障碍;商

^① 参看《傅立叶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6卷第393—394页。——编者注

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颠倒过来了。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

工厂内部的生产的社会组织，已经发展到同存在于它之旁并凌驾于它之上的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不能相容的地步。资本家自己也由于资本的猛烈积聚而感觉到这一事实，这种积聚是在危机期间通过许多大资本家和更多的小资本家的破产实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制在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失灵了。它已经不能把这大批生产资料全部变成资本；生产资料闲置起来，因此，产业后备军也不得不闲置起来。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可供支配的工人——生产和一般财富的一切因素，都过剩了。但是，“过剩成了贫困和匮乏的源泉”（傅立叶），因为正是这种过剩阻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变为资本。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要不先变为资本，变为剥削人的劳动力的工具，就不能发挥作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资本属性的必然性，像幽灵一样横在这些资料和工人之间。惟独这个必然性阻碍着生产的物的杠杆和人的杠杆的结合；惟独它不允许生产资料发挥作用，不允许工人劳动和生活。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

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作用力，要求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压力，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无论是信用无限膨胀的工业高涨时期，还是由大资本主义企业的破产造成的崩溃本身，都使大量生产资料不得不采取像我们在各

种股份公司中所遇见的那种社会化形式。某些生产资料和交通手段一开始规模就很大,它们,例如铁路,排斥任何其他的资本主义经营形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①国内同一工业部门的大生产者联合为一个“托拉斯”,即一个以调节生产为目的的联盟;他们规定应该生产的总产量,在彼此间分配产量,并且强制实行预先规定的出售价格。但是,这种托拉斯一遇到不景气的时候大部分就陷于瓦解,正因为如此,它们就趋向于更加集中的社会化:整个工业部门变为一个惟一的庞大的股份公司,国内的竞争让位于这一个公司在国内的垄断;例如还在1890年,英国的制碱业就发生了这种情形,现在,这一行业在所有48个大工厂合并后转到一个惟一的、统一管理的、拥有12 000万马克资本的公司手中了。

在托拉斯中,自由竞争转变为垄断,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当然,这首先还是对资本家有利的。但是,在这里剥削变得这样明显,以致它必然要崩溃。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容忍由托拉斯领导的生产,不会容忍由一小撮专靠剪息票为生的人对全社会进行如此露骨的剥削。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有或者没有托拉斯,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终究不得不②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这种转化为国家财

① 在1883年德文第1版中没有以下从“国内同一工业部门”起,至“无论有或者没有托拉斯”这部分文字。——编者注

② 我说“不得不”,因为只有当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达到了一个新的为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作准备的阶段。但是最近,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

产的必然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

如果说危机暴露出资产阶级无能继续驾驭现代生产力,那么,大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向股份公司、托拉斯^①和国家财产的转变就表明资产阶级在这方面是多余的。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领工薪的职员来执行了。资本家除了拿红利、持有剪息票、在各种资本家相互争夺彼此的资本的交易所中进行投机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活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初排挤工人,现在却在排挤资本家了,完全像对待工人那样把他们赶到过剩人口中去,虽然暂时还没有把他们赶到产业后备军中去。

但是,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①,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的场合,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而现代国家也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

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某些奴才气,无条件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比利时国家出于纯粹日常的政治和财政方面的考虑而自己修建国家的铁路干线,俾斯麦并非考虑经济上的必要性,而只是为了使铁路能够更好地适用于战时,只是为了把铁路官员训练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为了取得一种不依赖于议会决定的新的收入来源而把普鲁士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无论如何不是社会主义的步骤,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间接的,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不自觉的。否则,皇家海外贸易公司²³¹、皇家陶瓷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以致在30年代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时期由一个聪明人一本正经地建议过的妓院国营,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

① 在1883年德文第1版中没有“托拉斯”一词。——编者注

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归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

这种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适于社会管理之外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现在,生产资料和社会性反过来反对生产者本身,周期性地突破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并且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性地和破坏性地为自己开辟道路,而随着社会占有生产力,这种社会性就将为生产者完全自觉地运用,并且从造成混乱和周期性崩溃的原因变为生产本身的最有力的杠杆。

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只要我们固执地拒绝理解这种生产力的本性和性质(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辩护士正是抗拒这种理解的),它就总是像上面所详细叙述的那样,起违反我们、反对我们的作用,把我们置于它的统治之下。但是,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会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从魔鬼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这里的区别正像雷电中的电的破坏力同电报机和弧光灯的被

驯服的电之间的区别一样,正像火灾同供人使用的火之间的区别一样。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有计划的调节。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从而就造成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这种生产方式日益迫使人们把大规模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因此它本身就指明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持它的外部的生产条件,特别是用暴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或依附农制、雇佣劳动制)。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个体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

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应当以此来衡量“自由的人民国家”²³²这个用语,这个用语在鼓动的意义上暂时有存在的理由,但归根到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同时也应当以此来衡量所谓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的要求。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派别的头脑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掌管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欺诈和蒙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

群众的加紧剥削。

但是,如果说阶级的划分根据上面所说具有某种历史的理由,那也只是对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社会条件才是这样。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的确,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不仅某个特定的统治阶级而且任何统治阶级的存在,从而阶级差别本身的存在,都将成为时代的错误,成为过时的现象。所以,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高度发展的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 and 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这个阶段现在已经达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精神的破产甚至对他们自己也未必是一种秘密了,而他们的经济破产则有规律地每十年重复一次。在每次危机中,社会在它自己的而又无法加以利用的生产力和产品的重压下奄奄一息,面对着生产者没有什么可以消费是因为缺乏消费者这种荒谬的矛盾而束手无策。生产资料的扩张力撑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加给它的桎梏。把生产资料从这种桎梏下解放出来,是生产力不断地加速发展的惟一先决条件,因而也是生产本身实际上无限增长的惟一先决条件。但是还不止于此。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有形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无法摆脱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此外,这种占有还由于消除了现在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挥霍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

可能性现在第一次出现了,但它确实是出现了^①。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① 有几个数字可以使人们对现代生产资料即使在资本主义压制下仍然具有的巨大扩张力有个大体的概念。根据吉芬的统计²³³,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全部财富约计如下:

1814年……22亿英镑 = 440亿马克

1865年……61亿英镑 = 1 220亿马克

1875年……85亿英镑 = 1 700亿马克

至于在危机中生产资料和产品被破坏的情况,根据1878年2月21日在柏林举行的德国工业家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作的统计,在最近一次崩溃中,单是**德国铁工业**所遭受的全部损失就达45 500万马克。

最后,我们把上述的发展进程简单地概述如下:

一、**中世纪社会**:个体的小生产。生产资料是供个人使用的,因而是原始的、笨拙的、小的、效能很低的。生产都是为了直接消费,无论是生产者本身的消费,还是他的封建领主的消费。只有在生产的东西除了满足这些消费以外还有剩余的时候,这种剩余才拿去出卖和进行交换;所以,商品生产刚刚处于形成过程中;但是这时它本身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萌芽**。

二、**资本主义革命**:起初是工业通过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实现的变革。先前分散的生产资料集中到大作坊中,因而它们就由个人的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的生产资料,这种转变总的说来没有触及交换形式。旧的占有形式仍然起作用。**资本家**出现了:他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当然就占有产品并把它们变为商品。生产已经成为社会的活动;而交换以及和它相伴随的占有,仍旧是个体的活动,单个人的活动:**社会的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现代社会就在这一切矛盾中运动,而大工业把它们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a)生产者 and 生产资料相分离。工人注定要终身从事雇佣劳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相对立**。

(b)支配商品生产的规律日益显露出来,它们的作用日益加强。竞争不可遏止。**个别工厂中的社会组织 and 整个生产中的社会无政府状态相矛盾**。

(c)一方面是机器的改进,这种改进由于竞争而变成每个厂主必须执行的强制性的命令,而且也意味着工人不断遭到解雇:**产生了产业后备军**。另一方面是生产的无限扩张,这也成了每个厂主必须遵守的强制性的竞争规律。这两方面造成了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供过于

求、生产过剩、市场盈溢、十年一次的危机、恶性循环：这里是生产资料和产品过剩，那里是没有工作和没有生活资料的工人过剩；但是，生产和社会福利的这两个杠杆不能结合起来，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不允许生产力发挥作用，不允许产品进行流通，除非生产力和产品先转变为资本，而阻碍这种转变的正是生产力和产品的过剩。这种矛盾发展到荒谬的程度：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形式。资产阶级已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管理自己的社会生产力。

(d)资本家本身不得不部分地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大规模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起初由股份公司占有，后来由托拉斯占有^①，然后又由国家占有。资产阶级表明自己已成为多余的阶级；它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领工薪的职员来执行了。

三、无产阶级革命，矛盾的解决：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深入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

^① 在1883年德文第1版中没有“后来由托拉斯占有”。——编者注

L'ÉGALITÉ

ORGANE COLLECTIVISTE REVOLUTIONNAIRE

PARAISANT LE MERCREDI

<p>ABONNEMENTS 1 an 10 fr. 30 3 ans 28 fr. 50 Pour l'étranger le port en sus</p>	<p>BUREAU: 78, RUE ROYALE A SAINT-CLOUD BUREAU de vente: 19, rue du Croissant</p>	<p>PRIS DU NUMERO: 10 centimes Pour tous les pays</p>
--	---	---

弗·恩格斯

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²³⁴

一、关 税 率

在讨论那个把德国社会党人置于非法地位的著名的法律¹⁹⁶时，俾斯麦先生声言，要粉碎社会主义，仅仅采取镇压手段是不够的，还必须采取种种措施以消除不可争辩地存在的社会弊端，保证工作的秩序，防止工业危机以及其他等等。他答应要提出这些为社会谋福利的“积极”措施²³⁵。他说，因为像我这样一个领导本国事务 17 年的人，有权认为自己是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内行。这很像一个人说，只要他吃了 17 年马铃薯，他就精通农艺学了。

不管怎样，俾斯麦先生这一次履行了诺言。他赐给了德国两大“社会措施”，而且还不止这些。

其中第一项措施是以关税率保证德国工业独自开发国内市场。²³⁶

在1848年以前，德国没有真正的大工业。劳动占统治地位；蒸汽、机器很少见。德国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怯懦于1848年和1849年在政治舞台上遭受可耻的失败以后，就热心地去办大工业，从中求得安慰。德国很快就改变了面貌。1849年以后没有到过莱茵普鲁士、威斯特伐利亚、萨克森王国、上西里西亚、柏林和沿海城市的人，在1864年就认不出这些地方了。蒸汽和机器到处被采用。大工厂代替了大部分小作坊。轮船先是在沿海航行中，后来又在横渡大西洋的通商中，逐渐排挤了帆船。铁路增多了；在建筑工地、煤矿和铁矿上，到处都非常活跃，这是迟缓的德国人曾经认为自己做不到的。同英国的、甚至法国的大工业发展情况相比，这一切还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毕竟有了开端。而且在做这一切事情时，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帮助，没有出口补贴或出口奖励金，而当时的关税率，同其他大陆国家比较起来，完全可以看作是自由贸易的税率。

顺便指出，这个工业运动也没有避免它在一切地方引起的那些社会后果。在此以前，德国的产业工人一直是在中世纪保持下来的那些条件下混日子。一般说来，他们曾经还有某些机会逐步变成小资产者、独立的工匠、几台手工织机的占有者等等。现在这一切都消失了。工人变成了大资本家的雇佣工人，因而也就开始组成一个固定的阶级，即真正的无产阶级。但是，谁说无产阶级，谁就是说社会主义。同时，工人在1848年街垒战中争得的自由还残存着一些。由于这两种情况，在1848年以前只限于秘密宣传和只有人数极少的秘

密组织的德国社会主义,现在就能公开活动和深入群众了²³⁷。于是从1863年起,拉萨尔恢复了社会主义鼓动工作。

后来就是1870年的战争,1871年的和约和几十亿赔款。如果说法国决没有因为偿付了这些赔款而破产,那么德国却由于得到了这些赔款而差一点毁灭。暴发户的政府毫不吝惜地在全帝国(这个帝国本身也是暴发户)乱花赔款,这几十亿就落到了大金融家的手中,他们急忙通过交易所从中取得利益。在柏林,Crédit Mobilier²³⁸的好日子又重现了。人们滥设股份公司或两合公司、银行、土地信用和动产信用机构、铁路建筑公司、各种工厂、造船厂、以土地和建筑物进行投机的公司以及其他表面上叫做工业企业而实际上进行最可耻的投机活动的事业。所谓对贸易、交通线、消费资料等等的社会需要,无非是用来掩饰交易所强盗把手头的几十亿投入周转的不可遏止的需要而已。其实,巴黎还在贝列拉和富尔德之流的黄金时代就已见过这一切了;这也就是这些交易所投机家在柏林以布莱希勒德和汉泽曼等等名字重新出现。

1867年在巴黎发生的事情,在伦敦和纽约常常发生的事情,1873年很快地就在柏林发生了:过度的投机活动最终造成了普遍的崩溃¹¹⁰。成百家公司破产了。维持下来的那些公司的股票卖不出去。这是彻底的全线崩溃。但是,为了能够进行投机,就必须制造生产资料和交通工具、建造工厂和铁路等等,以它们的股票作为投机的对象。到了崩溃的时候才发现,作为进行这些活动的借口的社会需要,已经大大超过了限度。在4年中修建的铁路、工厂、矿场等等,比在工业正常发展时期25年中修建的还要多。

除了铁路(关于铁路下面还要谈),主要是在制铁工业中进行投机活动。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甚至建立了几个胜过勒克

勒佐的企业。不幸,在危机的时刻发现,这样大规模的生产没有消费者。一批巨大的工业公司面临破产。作为地道的德国爱国者,公司的董事们就请求政府帮助:他们请求实行进口保护关税,以便为自己保证国内市场,免受英国铁的竞争。但是,既然要求对铁实行保护关税,也就没有理由拒绝对其他工业部门以及农业实行这种制度。所以,在整个德国,人们热烈提倡保护关税,这就使俾斯麦先生有可能实行一种旨在实现这一目的的关税率。这一在1879年夏季取得法律效力的税率就是现行的税率。

但是,不管德国工业过去的情况如何,它一直都是在自由竞争的广阔天地里发展的。由于德国工业比英法工业出现得晚,它就不得限于去填补它的先行者留给它的那些不大的空白点,即大部分是提供对英国人来说过于零碎而对法国人来说又过于粗糙的商品,生产小量经常变化的产品,价格便宜而质量低劣的商品。不要认为这是我们的说法,欧洲科学界著名人士、德国政府的正式专员勒洛先生,对1876年在费拉德尔菲亚展出的德国产品官方意见的原话²³⁹就是这样。

这种工业只有在自由贸易统治它的时候,才能在中立市场上维持下去。如果要使织物、金属制品、德国的机器在国外经得住竞争,那就必须使这些产品的一切原料如棉纱、亚麻或丝、未经加工的铁、金属丝能够用同外国竞争者购买它们相等的低价购买。所以,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继续输出织物和金属加工工业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就得实行自由贸易,就要冒险让这个工业去利用进口原料。或者是依靠关税来保护德国的纺织业和粗金属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很快就可能再输出以纱和未经加工的金属为原料的商品了。

俾斯麦先生用他的著名的税率保护纺织工业和冶金业,从而消

灭了德国历来具有的向国外的销售德国织物、金属制品、针、机器的最后机会。但是在本世纪上半叶有剩余农产品出口的德国,目前却不得不进口外国农产品以补不足。如果俾斯麦先生禁止本国工业生产出口商品,那么将用什么来支付进口上述商品以及其他商品(对这些商品的需要是世界上任何税率都取消不了的)所需的费用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把俾斯麦先生的天才同他的交易所朋友和顾问们的天才结合起来。请看是这样做的。

拿铁来说吧,投机和狂热生产的时期赏给了德国两个企业(多特蒙德联合公司和劳拉冶金工厂),每个企业都能单独生产足够全国中等水平的需要的产品。此外,在埃森还有克虏伯的规模巨大的企业,在波鸿也有规模差不多的企业和无数较小的企业。因此铁的产量超过全国消费量至少两倍或三倍。可以说,这种情况绝对要求实行最无限制的自由贸易,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这么多的过剩产品有销路。人们可以这样说,但是有关人士的意见却不是这样。因为重要的、统治着其他企业的企业总共不过一打,所以就组成了美国人所说的 ring^①,即为了保持国内价格和调节出口而成立的联盟。

在通过投标订购它们工厂的钢轨或其他产品时,委员会就依次指定一个成员来接受订货,并规定该厂接受订货的价格。其他合伙人则提出较高的价格,这种价格也是预先规定的。这样一来,任何竞争都停止了,出现了绝对的垄断。在出口方面也这样做。为了保证完成这个计划,ring 的每一个成员都交给委员会一张 125 000 法郎的凭票即付的票据,一旦开票人违背自己的义务,这张票据便会投入流通和要求支付。这样一来,从德国消费者那里敲诈来的垄断价格,

① 英文,意为“集团”。——编者注

使这些工厂能够在外国以甚至英国人也拒绝出售的那种价格推销自己的剩余产品，而替别人掏腰包的则是德国的庸人（其实他们也是活该如此）。就这样，由于实行了保护关税，德国的出口事业又重新成为可能了，虽然在普通公众看来这种关税似乎是要断送出口事业的。

还用举例吗？去年一家意大利铁路公司（我们能够叫出它的名称）需要三四万吨（每吨 1 000 公斤）钢轨。经过长期商谈以后，一家英国工厂承包了一万吨；其余部分由多特蒙德联合公司以英国所拒绝的价格接受了下来。有人问一位英国竞争者为什么不提出比德国企业更优惠的条件，他回答说：世界上谁能经得起破产者的竞争呢？

苏格兰打算在爱丁堡附近的海湾上建造一座铁路桥。这座桥需要一万吨贝氏钢。谁接受了最低的价格，谁击败了他所有的竞争者，而且这都是在大规模的炼铁工业的祖国英国？——是一个德国人，是在很多方面受俾斯麦庇护的“枪炮大王”、埃森的克虏伯先生。

铁的情况就这样。不用说，这个美妙的制度只能把这些制造阴谋的大企业的不可避免的破产推迟几年而已。一旦其他生产部门也仿效它们，它们就会使本国破产，而不是使外国竞争者破产。这好像是生活在疯人国里。但是上述一切事实都是从德国资产阶级的自由贸易派报纸上引来的。在保护德国工业的名义下组织破坏这个工业——一些德国社会党人多年来就一再地说，俾斯麦先生好像得到了由他们支付的报酬似地为社会主义效劳，他们不是说得很对吗？

二、国 有 铁 路

从 1869 年到 1873 年，柏林的投机活动大肆泛滥的时候，两个时

而敌对时而联合的企业,即贴现公司和布莱希勒德银行,分掌了交易所的统治权。这就是所谓柏林的贝列拉和米勒斯之流。投机活动的对象首先是铁路,而这两家银行就想使自己成为大多数现有的或将要建设的大铁路线间接的主人。只要购买和掌握每条铁路的一定数量的股票,就能在它们的董事会中取得优势;而以这些股票作保证又可获得借款去购买新的股票,如此等等。大家可以看到,这是简单地重复一个小小的巧妙勾当,这种勾当起初给贝列拉兄弟带来了辉煌的成就,而最终,大家知道,却是 *Crédit Mobilier*²³⁸ 的破产。柏林的贝列拉之流起初也得到了这样的成就。

1873 年发生危机。我国这两家银行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它们积压着大批铁路股票,但再也不能从中抽回被这些股票吞掉的几百万了。控制铁路公司的计划失败了。于是就改变方针,想把股票卖给国家。把全部铁路集中在帝国政府手中这一方案的出发点,不是为了国家的公共福利,而是为了两家没有支付能力的银行的个人的福利。

实现这个方案不是太困难的。使相当多的国会议员对新的公司“发生兴趣”,这样在国会就完全支配了民族自由党和温和保守党,即多数派。帝国的大官们、普鲁士的大臣们曾经参与了这些公司赖以成立的诡计。要知道,布莱希勒德是一个银行家,也是俾斯麦先生的金融事务方面的经纪人。因此,钱是够多的。

同时,为了补偿向帝国出售铁路时所费的力气,必须提高股票价格。为此,于 1873 年成立了“帝国铁路局”,局长是一个有名的投机者^①,他立刻把德国所有铁路的运费提高了 20%,这样就能增加纯

① 阿·舍勒。——编者注

收入,从而使股票价格大约提高 35%。这是这位先生所采取的惟一措施,只是为了这一点他才同意担任这一职务,无怪乎他不久就推掉了这个职务。

此外,人们使俾斯麦对这个方案产生了兴趣。但是那些小王国却反对这个方案,联邦会议断然拒绝了 this 方案。因此又改变方针:决定由普鲁士先购买所有的普鲁士铁路,以便一有可能就把这些铁路转让给帝国。

而帝国政府还有一个迫使它想购买铁路的秘密动机。这个动机是同法国的几十亿相联系的。

在这几十亿中留下了很大一个数目来建立三项“帝国基金”:一项用来修建帝国国会大厦,第二项用于要塞,最后,第三项用于最近三次战争中的残废者。三项基金共为 92 600 万法郎。

在这三项基金中,最重要、同时也最奇怪的一项是残废者基金。这项基金是预定要自行取消的。这就是说,随着这些残废者中间的最后一个人的死亡,基金本身,无论是资本或资本的收入,也就要消灭。这种自行消耗的基金,可以重说一次,是只有疯子才会想出来的。但他们并不是疯子:发明这种基金的是贴现公司的那些投机者,——而且并不是没有根据的。难怪要花几乎一年的时间才说服政府接受这一主张。

但是我们的交易所投机家们觉得基金的自行消灭还不够快。不仅如此,他们认为也需要赋予其他两项基金这种自行消灭的优点。办法很简单。在法律还没有确定这些基金所要投入的证券的性质以前,一个属于普鲁士政府管辖的商业企业奉命购买相当的有价证券。这一企业去找贴现公司,公司就为三项帝国基金出售了 3 亿法郎的铁路股票,这些股票我们可以一一列举,它们都是当时卖不出去的。

在这些股票中有马格德堡—哈尔伯施塔特铁路(以及与该铁路联合的各线)的股票 12 000 万,这条铁路已经处于破产的边缘,它预期要保证投机者们得到大量的利润,但几乎没有任何可能让股东们得到丝毫的收入。如果我们了解到下述事实,这一点便可以理解了。事实就是,董事会发行了 1 600 万股票来抵补建造三条铁路支线的开支,但是,这些支线的修建工作甚至还没有开始,这笔钱已经不知去向了。而残废者基金却以握有相当多的这种并不存在的铁路的股票而感到骄傲。

由普鲁士国家购买这几条铁路线,立刻就会使帝国购买这些铁路的股票合法化,并会使这些股票具有某些实际价值。这就是这件事情对帝国政府的好处。无怪乎这里谈到的购买这条铁路的交易,是普鲁士政府提出并为两院批准的首批交易之一。

国家付给股东们的价格,大大高于甚至好的铁路线的实际价值。购买这些铁路的决定,特别是出售的条件为人们知道以后,它们的股票不断上涨,就证明了这一点。有两条大铁路线,它们的股票价格在 1878 年 12 月分别为 103 和 108,后来这两条线被国家买下了。现在它们的股票标价为 148 和 158。正因为这样,在谈论价格的时候,股东们很难隐藏自己的高兴心情。

不言而喻,这一次涨价首先给那些获悉政府的秘密意图的柏林大交易所投机者带来了好处。在 1879 年春天还是相当沉闷的交易所重新活跃起来了。投机者在最后放弃自己的宝贵的股票以前,利用它们又掀起一次投机热潮。

人们看到:德意志帝国和覆灭前的法兰西帝国一样,完全处于交易所的控制之下。正是交易所经纪人准备各种方案——对他们填满腰包有利的方案,政府则必须加以实行。但是德国还有一个为波拿

巴帝国所缺少的长处：当帝国政府受到各小邦君主反对的时候，它便变成普鲁士政府，这个政府当然不会遭到它的两院的反对，因为两院就是交易所的真正的分所。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国际总委员会在 1870 年战争刚结束的时候不是就说过：俾斯麦先生，您推翻了法国的波拿巴制度，只是为了在本国恢复这一制度！^①

弗·恩格斯写于 1880 年 2 月
底

载于 1880 年 3 月 2 日和 24 日
《平等报》第 7 号 and 第 10 号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5 卷翻译

① 参看《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于 1870 年发表的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编者注

卡·马克思

*关于《哲学的贫困》²⁴⁰

卡尔·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是在1847年,即在蒲鲁东的《经济矛盾》(副标题为《贫困的哲学》)^①一书出版后不久问世的。我们决定重新发表《哲学的贫困》(初版已售完),是因为该书包含了经过20年的研究之后,在《资本论》中阐发的理论的萌芽。所以,阅读《哲学的贫困》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可以作为研究《资本论》和现代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入门,因为像拉萨尔那样的现代社会主义者的思想,是从上述著作中吸取来的。马克思同意把他的著作重新登载在我们的机关报上,这就是表示同情我们。

关于这次同蒲鲁东论战的明显的特点,还要说几句话。一方面,蒲鲁东虽然对官方的经济学家,如杜诺瓦耶、布朗基院士和《经济学家杂志》整个集团进行了攻击,但是他又懂得迎合他们的自尊心,因此同时又以粗暴的谩骂抨击那些作为现代社会主义的先驱而受马克思尊敬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另一方面,为了给只想阐

^① 皮·约·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2卷。——编者注

明社会生产的真实历史发展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扫清道路,必须断然同唯心主义的经济学决裂,这个唯心主义经济学²⁴¹的最新的体现者,就是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蒲鲁东。

然而,蒲鲁东逝世以后,马克思在一篇发表于柏林《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文章²⁴²中,对这位战士的伟大品格、对他在1848年6月的日子以后的英雄气概以及对他这位政治著作家的才华,作了公正的评价。

卡·马克思写于1880年3月
底或4月初

载于1880年4月7日《平等报》
第12号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25卷翻译

卡·马克思

*工人调查表²⁴³

- (1)你在哪一个工业部门工作?
- (2)你所在的企业是私人资本家经营的,还是股份公司经营的?
私人雇主或公司经理的名字叫什么?
- (3)请说明雇用的人数。
- (4)请说明他们的性别和年龄。
- (5)招收童工(男童和女童)最低年龄是几岁?
- (6)请说明监工和不是一般工资劳动者的其他雇员有多少。
- (7)有没有学徒?有多少?
- (8)除了经常的和固定的工人以外,是不是在一定季节还从外面招收另外的工人?
- (9)你的老板的企业是全部或主要为当地主顾生产的呢,还是为整个国内市场或为了向外国出口而生产的?
- (10)你的工作场所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①

① 《社会主义评论》杂志上补充了如下几句话：“请写明何地”。——编者注

(11)如果你是在乡村工作,那么你的工作是不是你的主要生活来源?还是务农为主做工为辅或两者相结合?

(12)干活是完全或主要用手工,还是用机器?

(13)请说明你所在企业的分工情况。

(14)用不用蒸汽作动力?

(15)请说明工厂各个部门占用工作间的数目。谈谈你所从事的那段工序,不仅谈技术方面,而且还谈谈它所引起的肌肉和神经的紧张程度以及对工人健康的一般影响。

(16)请谈谈工作场所的卫生状况:面积大小(每个工人的活动空间),通风,温度,粉刷,厕所,一般的洁净程度,机器噪音,尘埃,湿度等等。

(17)政府或市政机构对工作场所的卫生状况有没有某种监督?

(18)你所在的企业里有没有使工人患特殊疾病的特殊的有害因素?

(19)工作场所是否摆满了机器?

(20)有没有采取防护措施来防止工人的肉体受到发动机、传动装置和工作机械的伤害?

(21)请根据你亲身的经历谈谈发生过哪些造成工人残废或死亡的重大事故。

(22)如果你在矿上工作,请说明你的雇主为保证通风、防止爆炸和其他危险事故,采取了怎样的防护措施。

(23)如果你在冶金或化学生产部门,在铁路或其他特别危险的生产部门工作,请说明你的雇主是否采取了防护措施。

(24)你的工作场所用什么照明?是煤气灯、煤油灯还是其他照明设备?

(25)一旦失火,在工作场所内外有没有足够的脱险设施?

(26)根据法律,一旦发生事故,雇主是否必须对事故的受害者或他的家属给予赔偿?

(27)如果不是,那么雇主是否用某种方式给那些为他发财致富而在工作时受伤害的人以赔偿?

(28)在你的工作场所有没有某种医疗服务?

(29)如果你在家中工作,请谈谈你的工作间的状况;你用的只是一些普通工具呢,还是也有小的机器?你是否利用你妻子和孩子们以及其他帮手(成年工或童工,男工或女工)的劳动?你是为私人主顾干活,还是为一个“企业主”干活?你同企业主之间的联系,是直接的还是经过中间人?

二

(1)请说明工作日一般有多长,一星期一般有几个工作日。

(2)请说明一年有几个假日。

(3)在一个工作日内有哪些间断时间?

(4)有没有规定一定的吃饭时间,或吃饭是不定时的?①

(5)在吃饭时间干不干活?

(6)如果使用蒸汽动力,请说明实际的开关时间。

(7)开不开夜工?

① 沙·龙格在调查表的手稿上对这一项作了下述补充:“吃饭是在室内还是在室外?”——编者注

(8)请说明童工和 16 岁以下的少年工人的工作时间。

(9)在一个工作日内,童工和少年工人是不是换班?

(10)现有的经立法机构制定的关于童工劳动的法律,政府是否付诸实施?雇主是否严格遵行?

(11)有没有为你所在工业部门里劳动的童工和少年工人设立的学校?如果有,孩子们一天里什么时间在校学习?他们学些什么?①

(12)在生产日夜进行的地方,换班——一班工人接替另一班工人——是怎样安排的?

(13)在生产繁忙时期,工作时间比平常延长多少?

(14)机器是另外专门雇一些工人来擦拭的,还是由操作机器的工人在正常工作日内无报酬地擦拭的?

(15)采用哪些规则和处罚办法来保证工人在工作日开始时和饭后准时上工?

(16)你每天从家里到工作地点以及从工作地点回家要花去多少时间?

三

(1)你同老板订的是哪一种合同?是按日、按周、按月或其他?

(2)解雇或辞职,按规定要在多长时间以前通知对方?

(3)老板如果违反合同,要受什么样的处罚?

① 《社会主义评论》杂志上补充了如下一句话:“什么人来指导他们?”——编者注

(4)工人如果违反合同,要受什么样的处罚?

(5)如果雇有学徒,请说明他们合同中的条件。

(6)你的工作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

(7)你所在的工业部门是基本上在一定的季节进行生产,还是通常比较均衡地全年进行生产?如果你的工作是有季节性的,那么在其他时间你靠什么收入生活?

(8)你的工资计时还是计件?

(9)如果是计时,是按钟点还是按整个工作日?

(10)加班是不是另给工资?给多少?

(11)如果你的工资是计件的,请说明计算方法。如果在你工作的工业部门里完成的工作量是用长度或重量计算的(例如煤矿),那么,你的老板或他的手下人是否用欺诈手段骗去你的部分工资?

(12)如果你的工资是计件的,产品质量是否被用作欺诈的借口,来克扣工资?

(13)不论是计时工资还是计件工资,你**过多长时间**领工资?换句话说,在你领到已经完成的工作的工资以前,你必须让老板对你欠多长时间的账?工资是过一个星期、一个月或更长的时间才发给?

(14)你是否感到,这样拖延发工资,就迫使你经常跑当铺,给当铺付高利,失去你需要使用的器物,或者迫使你向小铺老板赊欠,变成他们的债户,从而成为他们的宰割对象?^①

(15)工资是由“老板”直接发给,还是经过中间人或“包工头”等等?

(16)如果工资是经过“包工头”或其他中间人付给的,请列举你

① 《社会主义评论》杂志上补充了如下一句话:“据你所知,是否有过因老板的生意破产倒闭而工人拿不到工资的情况?”——编者注

的合同条件。

(17)请说明你一天或一周工资有多少钱。

(18)请说明和你在同一车间一起干活的女工和童工在同样时间内所挣的工资。

(19)请说明最近一个月内最高和最低的日工资。

(20)请说明最近一个月内最高和最低的计件工资。

(21)请说明在上述时间内你实际挣到多少钱;如果你有家,也请说明你妻子和孩子挣到多少钱。

(22)工资是付给现金,还是一部分付给别的东西?

(23)如果你的住房是向你的雇主租赁的,请说明租赁条件。雇主是不是从你的工资中扣除房租?

(24)请说明你的各种生活必需项目的价格,例如:①

(a)房租和租赁期限;有几个房间;多少人住;房屋修缮和保险;家具购置和修理;床铺;取暖、照明和用水等等;

(b)食品:面包、肉类、蔬菜(马铃薯等);乳制品、鸡蛋、鱼;黄油、食油、脂肪;糖、盐、调味香料;咖啡、茶叶、菊苣;啤酒、苹果酒、葡萄酒等;烟草;

(c)衣服(父母和孩子的);洗衣;卫生用品,洗澡,肥皂等等;

(d)其他开支,如:邮资,还债和给当铺付保管费;孩子上学的各种开支,学习技艺的费用,买报,买书等等。交给互助会、罢工基金会、各种联合会、工会②等等的会费;

① 本题从(a)至(f)各项在手稿上是用法文写的。——编者注

② 手稿上用的是 *tradesunions*(工会),《社会主义评论》杂志上用的是 *sociétés de résistance*(抵抗会)。——编者注

(e)和你从事的职业有关的开支(如有这种开支);

(f)捐税。

(25)试将你一周的、一年的收入(如果你有家,再加上你的家庭收入)和一周的、一年的支出以预算的形式开列出来。

(26)根据你的亲身体验,你是否觉得,生活必需项目的价格(如房租、食品价格等等)的上涨大于工资的增长?

(27)请说明你所记得的历次工资变动情况。

(28)请说明在萧条或危机时期工资降低的情况。

(29)请说明在所谓繁荣时期工资增长的情况。

(30)请谈谈由于时尚的改变和局部或普遍的危机而造成停产的情况。^①

(31)你生产的**产品的价格**或你提供的**服务的价格**如果改变,你的工资是**同时改变**还是不变,请以对照形式说明。

(32)在你的工作经历中,是否有过由于采用机器或其他改进而解雇工人的情况?

(33)由于机器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

(34)你是否知道,什么时候有过由于生产改进而提高工资的情况?

(35)你是否知道,有哪个普通工人在年满50岁时可以退休而靠他做雇佣工人时挣的钱过活?

(36)你所在的工业部门里一个中等健康水平的工人可以工作多

^① 《社会主义评论》杂志上补充了如下一句话：“谈谈你自己非自愿停止工作的情况。”——编者注

少年?

四

(1)在你的行业中有没有工会^①? 他们是怎样管理的?^②

(2)根据你的亲身经历,你们行业发生过多少次罢工?

(3)历次罢工的时间有多长?

(4)是局部罢工还是总罢工?

(5)罢工是为了要求提高工资,还是为了反对降低工资? 是因为工作日的长短,还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

(6)罢工的结果怎样?

(7)你们行业的工人是否支持其他行业工人的罢工?

(8)请谈谈你的老板为了管理他的雇佣工人而规定的规章以及违反规章的处罚办法。^③

(9)老板之间有没有联合成组织,以便迫使工人接受对工资的降低、对工作日的延长、对罢工的干涉,总之是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工人阶级?

(10)根据你的亲身经历,有没有政府方面滥用武装力量来帮助

① 手稿上用的是 *tradesunions*(工会),《社会主义评论》杂志上用的是 *sociétés de résistance*(抵抗会)。——编者注

② 《社会主义评论》杂志上补充了如下一句话:“请附上它们的章程和条例。”——编者注

③ 手稿上删去了如下字句:“自然,在他的工厂里,他把最高的立法权、审判权和行政权都集中在自己手里。”——编者注

老板反对工人的情况？

(11) 根据你的亲身经历，这个政府是否曾经帮助过工人反对老板们的侵犯和非法联合？

(12) 这个政府是否对老板贯彻执行工厂法（如果有这样的工厂法）？政府的工厂视察员（如果有这样的视察员）是否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

(13) 你所在的工厂或行业中有没有为应付不幸事故、疾病、死亡、短期丧失劳动力、年老等情况而组织的互助团体？

(14) 加入这些团体是自愿的还是强迫的？这些团体的基金是否完全由工人掌管？

(15) 如果交纳会费是强迫的而且会费是由老板掌管的，那么老板是否从工资中扣除这些会费？他是否支付这笔款项的利息？辞职或被解雇的工人，能不能收回自己每次所交的钱？^①

(16) 你所在的工业部门有没有工人合作企业？它们是怎样管理的？它们是否也像资本家那样从外面招雇挣工资的工人？^②

(17) 在你的行业中有没有这样做的工厂：付给工人的报酬中一部分用工资的名义，另一部分则用所谓分红的名义？请把这些工人的全部收入和没有所谓分红的工人的全部收入作一比较。请说明这种制度下的工人要受到哪些约束。是否容许他们参加罢工等活动，还是只许他们做老板的“顺民”？

① 《社会主义评论》杂志上补充了如下一句话：“据你所知，有没有工人领取由老板掌管但却是从工人工资中提留的所谓退休金的情况？”——编者注

② 《社会主义评论》杂志上补充了如下一句话：“请附上它们的章程和条例。”——编者注

(18) 在你的行业中, 男女工人的一般体力、智力和道德状况怎样?

卡·马克思写于 1880 年 4 月上半月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25 卷

原文是英文和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25 卷翻译

卡·马克思

* 弗·恩格斯的小册子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法文版前言²⁴⁴

这第一本小册子中所包含的内容是早先刊登在《社会主义评论》上的三篇文章，它们译自恩格斯最近的著作《科学中的变革》^①。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当代社会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1844年就以他最初发表在马克思和卢格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引起了注意。《大纲》中已经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在曼彻斯特（当时恩格斯住在那里），他用德文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这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其意义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了充分的估价。在他第一次

① 《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在保·拉法格出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版本中，此处有如下补充：“文章经作者校阅过，而且作者为了使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力量的辩证运动更容易为法国读者所理解，还在第三部分作了一些补充。”——编者注

旅居英国以及后来旅居布鲁塞尔的时候，他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正式机关报《北极星报》和罗伯特·欧文的《新道德世界》报的撰稿人。

在他旅居布鲁塞尔时，他和马克思建立了德意志共产主义工人协会⁶³，这个协会同佛兰德和瓦隆的俱乐部保持了联系。他们两人和伯恩施太德一起创办了《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应**正义者同盟**设在伦敦的德国委员会的邀请，他们参加了这个最初由卡尔·沙佩尔在1839年因参加布朗基的密谋而从法国逃亡以后所创立的团体。从那时起，同盟就放弃了秘密团体惯用的形式，变成国际性的**共产主义者同盟**¹⁰²了。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该团体还必须对各国政府保持秘密。1847年，在同盟在伦敦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被委托起草《共产党宣言》，《宣言》在二月革命前不久出版，并且几乎立即被翻译成欧洲的各种语言^①。

同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力于建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²⁴⁵的工作，这是一个公开的和国际性的团体，参加这个团体的有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代表和无产阶级工人的代表。

二月革命后，恩格斯成了《新莱茵报》的编辑，这家报纸是由马克思在科隆创办的，于1849年6月由于普鲁士发生政变而被查禁。恩格斯参加埃尔伯费尔德起义以后，作为志愿部队指挥官维利希的副官参加了反对普鲁士人的巴登战役²⁴⁶（1849年6—7月）。

① 在保·拉法格出版的小册子原文中还作了如下的补充：“《共产党宣言》是现代社会主义最有价值的文件之一；它现在仍然是描述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和必将结束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的形成的最有力和最鲜明的著作之一；在这一著作中，正像在早一年出版的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中一样，第一次清楚地表述了阶级斗争的理论。”——编者注

sur la guerre des paysans allemands, qui fut, 10 ans après, repris à Leipzig
avec beaucoup et pour ses traits et leur.

Après la guerre de mouvement socialiste en Allemagne, les écrits sur
Volksrecht et un Verhältnis furent les plus importants. Dans la plupart
a été réimprimé sous forme de pamphlets. Volksrecht le manifeste social de
Paris, d'origine est dans le Reichstag allemand. La question des
habitations, l'immigration cantonale en Suisse etc.

En 1870, après avoir écrit Le manifeste pour Londres et les autres dans
le conseil général de l'Internationale, on a fait change de correspondance
avec l'Espagne, le Portugal et l'Italie.

Le serio de danses articles qui ont contribué au Verhältnis, avec le libre
enseignement de l'école de la école, etc. et pour les études
théoriques nouvelles de W. Dühring en les sciences en général et la socialisme
en particulier font une œuvre et une œuvre qui ont été écrites
par les allemands. Vous trouvez dans la première partie de l'œuvre
la plus importante de la partie théorique de l'œuvre. qui font ce qui
peuvent être appelés une introduction aux sciences socialistes scientifiques

Cher Laforgue

Voilà le fruit de ma collaboration (d'hier soir) avec les Volksrecht les
autres, laissez les choses en l'état.

Tout à vous

Karl Marx.

卡·马克思为弗·恩格斯的小册子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所写的前言的最后1页

1850年,他在伦敦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撰稿,这个刊物是由马克思出版并在汉堡刊印的。恩格斯在上面发表了《德国农民战争》,该文19年后在莱比锡印成小册子重新出版并出了三版。

在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重新活跃起来以后,恩格斯成为《人民国家报》和《前进报》的撰稿人;这两家报纸所发表的最重要的论文都是他写的,其中大部分都印成了小册子:《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论住宅问题》、《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等等。

1870年恩格斯从曼彻斯特迁居伦敦以后,参加了国际¹⁶总委员会;他被委托负责同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通信联系。

他为《前进报》撰写并讽刺地题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的最近的一组论文,是对欧根·杜林先生关于一般科学、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所谓新理论的回答。这些论文已经集印成书并且在德国社会主义者中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们摘录了这本书的理论部分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一部分可以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人门。

卡·马克思写于1880年5月
4—5日前后

载于1880年在巴黎出版的恩格斯《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一书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8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27卷翻译

卡·马克思

*法国工人党纲领领导言(草案)²⁴⁷

鉴于

生产者阶级的解放是不分性别和种族的全人类的解放；

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之后才能获得自由；

生产资料属于生产者只有两种形式：

(1)个体形式，这种形式从来没有作为普遍事实而存在，并且日益为工业进步所排斥；

(2)集体形式，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为这种形式创造了物质的和精神的因素；

鉴于

这种集体所有制只有通过组成为独立政党的生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才能实现；

要建立上述组织，就必须使用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尤其包括借助于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的普选权；

法国社会主义劳动者提出其经济方面努力的最终目的是使全部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并决定以下述最低纲领参加选举作为组织和斗

争的手段。

卡·马克思写于 1880 年 5 月
10 日前后

载于 1880 年 6 月 19 日《先驱
者》第 25 期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5 卷翻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致日内瓦 1830 年波兰革命
50 周年纪念大会²⁴⁸

公民们：

一些波兰人在自己的国家遭受第一次瓜分以后，就离开了自己的祖国，远涉大西洋，去保卫刚刚诞生的伟大的美利坚共和国。考斯丘什科和华盛顿并肩战斗。1794 年，当法国革命艰难地抵抗同盟的武力时，光荣的波兰起义使它摆脱了威胁。波兰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法国革命却得到了拯救。起义失败的波兰人加入了“长裤汉”军队，帮助他们去推翻封建的欧洲。最后在 1830 年，当沙皇尼古拉和普鲁士国王^①即将对法国发动一次新的入侵以实现其复兴正统王朝的计划时，你们今天所纪念的波兰革命挡住了他们的道路。“华沙恢复了秩序”。

“波兰万岁！”这个在当时响彻整个西欧的口号，不仅表达了对遭受暴力摧残的爱国战士们的同情和钦佩，人们还用这句口号向这个民族表示敬意，这个民族所举行的各次起义，尽管对它本身说来如此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

不幸,但却总是制止了反革命的进攻,这个民族的优秀儿子从未停止过以武力回击敌人,他们到处在人民革命的旗帜下进行着战斗。另一方面,波兰的被瓜分,加强了目的在于掩饰沙皇对欧洲各国政府的霸权的神圣同盟。因此,“波兰万岁!”这个口号意味着消灭神圣同盟,消灭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好战分子,消灭蒙古人对现代社会的统治!

从 1830 年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在不同程度上掌握政权以来,无产阶级运动就开始显露出来。早在 1840 年,英国的有产阶级不得不乞灵于武力来对付工人阶级的第一个战斗组织宪章派。与此同时,在独立的波兰的最后一个角落,即在克拉科夫,于 1846 年爆发了第一次宣布社会主义要求的政治革命²⁴⁹。从那时起,波兰就失去了整个欧洲的任何虚伪的同情。

1847 年,在伦敦秘密地召开了无产阶级的第一次国际性代表大会²⁵⁰,大会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宣言结尾提出一个新的革命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波兰有自己的代表出席这次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公众集会²⁵¹上,著名的列列韦尔和他的同志们表示赞同代表大会的决议。在 1848 年和 1849 年,德国、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的革命大军都有很多波兰人。他们无论是士兵还是将军,都表现得出类拔萃。尽管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理想被淹没在六月日子的血泊中,然而 1848 年革命——决不可以忘记这一点——的熊熊火焰几乎燃遍了整个欧洲,有个时期曾把整个欧洲变成一个共同体,从而为国际工人协会奠定了基础。1863 年的波兰起义曾引起英法工人对本国政府的国际暴行一致表示抗议,这次起义成为在波兰流亡者参与下创立的国际的起点。最后,在波兰流亡者中间也有巴黎公社的真正的领袖²⁵²。公社失败以后,只要是波兰人,

就会被凡尔赛军事法庭下令枪杀。

总之,在自己的祖国以外,波兰人在争取无产阶级解放的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他们都是优秀的无产阶级国际战士。现在,当这一斗争正在波兰人民中间发展起来的时候,愿它得到流亡者的宣传和报刊的支持,愿它和我们俄国兄弟的卓绝的斗争联合起来;这将是重提“波兰万岁!”这一老口号的又一理由。

敬礼和兄弟情谊!

(签名)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保尔·拉法格 弗·列斯纳

1880年11月27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80年11月27日

载于1880年12月4日《先驱者》第49期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25卷翻译

弗·恩格斯

*不 许 通 奸²⁵³

不许通奸。——要写这个题目，关于德国的和其他国家的君主都有很多事情可谈，但是首先，老费泽在他的《德国宫廷史》中把这个题目已经谈得很详细了。在全部 40 多卷的文集里，除了君主的通奸故事之外几乎没有别的内容。再说，既然每个庸人都可以不受处罚地和随意地搞违禁的享乐，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认为这种享乐对君主来说是不道德的呢？如果说有给自己的妻子染上梅毒的皇帝（奥地利的弗兰茨-约瑟夫），那么也有不少能够以这种壮举自豪的贵族、资产者、甚至小资产者。而且就是在法国革命以前，也远不是所有君主都像巴登-杜拉赫的老侯爵那样胡作非为。这个老侯爵用抢和买的办法弄到了大约 130 个最漂亮的姑娘，把她们关在他在杜拉赫附近布莱贝格的后宫里，还派一名军士看管，如遇美人执拗不从和其他违犯纪律的情况，就赏给她们早已为人所知的那 25 鞭。

但是在这方面，霍亨索伦家族伟大的一员弗里德里希二世也是一个值得称赞的例外。他暗自思忖，男人只有借助于女人才能干通奸之事。所以，如果我用男人代替女人，那么我就不会破坏夫妇的忠诚了。

这位勇敢的普鲁士人喊道：中伤，无耻的中伤。这种谎言是卑鄙

的不信神的伏尔泰杜撰的！我们来听一听吧。

“普鲁士王国宗教局总顾问、柏林和科隆联合中学及其附属学校的校长”安东·弗里德里希·毕兴博士先生于1790年在汉堡出版了一本书《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统治时期的可靠史料》。这本书是敬献给“我的仁慈的主人和保护者”弗里德里希二世和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大臣赫茨贝格伯爵的，可见，只能写政府所喜欢的事情。宗教局顾问先生在这本书的历史附录中向著名的汉诺威医生戚美尔曼博士（《论孤独》）宣战，在附录第20页上说道：

“我（在以前的一本著作中）曾尽量简短和小翼翼地写道：国王由于避免同妇女交往而失去许多性的享乐，但从同男子交往中得到补偿。”戚美尔曼说，不对，“他同某些男人亲密交往”是另有“原因”的——他缺少一件家伙。

而宗教局顾问从清洗已故国王遗体的医生那里得到郑重的、带有十分愤懑情绪的证词：实际上一应俱全，因此同男人的交往是千真万确的。

国王这种不破坏夫妇忠诚的做法是从多么早的时候起就传播开来的、传播得多么广，证实这一点的不仅仅有舒瓦泽尔于1759年寄给伏尔泰的对国王的讽刺诗。诗的结尾是：

你怎能非难温情，
只有在你的鼓手的怀里，
你才能沉醉于其中。

特伦克的《回忆录》第1卷第36页里提供了一个更早的1745年的事例。

“一个同时充当公开的加尼米德的近卫军步兵少尉……挖苦起我的秘密恋爱来。我称他是什么什么，我们拔剑相斗，我砍伤了他的脸。在此后的第一个星

期天视察教会的场合，国王走过我的身边时说：‘上帝啊，你要留点神！’”

弗里德里希作为真正的哲学家创立了一个学派。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是他的外甥。关于他，施洛塞尔援引过的一位瑞典伯爵的手稿中有这样的话：

“在他之前，在瑞典还不知道有鸡奸。”（施洛塞尔《18世纪》第4版第3卷第134页）

看来，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弟弟亨利希亲王同样好学。

“我熟悉，

——米拉波在《柏林宫廷秘史》1789年德文版第2卷第69页上写道——

一个曾经伺候过亨利希亲王的仆人，后来由于有一套办法来满足其主人对童男的色欲，最初是宠臣，而后来成为亲王在那里当首席牧师的马格德堡的掌教。”

弗里德里希的继承人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已经不像他的叔父那样偷偷摸摸了。他既玩丈夫，也玩丈夫的妻子。米拉波在前面援引的著作的第2卷第133页上说：

“里茨（国王的近侍）这个敲诈钱财、油头滑脑的宫廷弄臣卑鄙若此：在国王还是普鲁士王储的时候，就在他妻子的床上拿他充作加尼米德，而他的妻子则是王储的情妇”。等等。

我们就此结束，暂不进一步研究以后的霍亨索伦家族的人是否破坏过夫妇的忠诚。但是，我们的民族自由党人布劳恩、卡普之流表现得多么愚蠢啊！他们声嘶力竭地谩骂18世纪德国小君主们破坏夫妇忠诚的罪恶。相反，他们却拼命地把霍亨索伦家族的美德捧到

天上。然而，他们忘记了主要的一点，那就是有确凿的证据说明至少这个家族有一位，而且是最伟大的一位，坚贞不渝地履行了“不许通奸”的诫条！

请注意。为了您正确理解那首法文诗是怎样一回事，这里讲讲详情。1759年，在七年战争²⁵⁴时期，当时住在瑞士日内瓦附近的伏尔泰，收到了途中被拆开的一包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手稿。手稿中间有一首致法国人的小诗，攻击路易十五和彭帕杜尔：

看啊，你们软弱的君主——
彭帕杜尔手中的玩物，
不名誉的爱情的印记，
他身上已有不止一处。云云。

伏尔泰同法国驻日内瓦代办磋商之后，为了免受追究而把这首署名“弗里德里希”的小诗转寄给法国的外交大臣舒瓦泽尔公爵。于是，舒瓦泽尔给他回了一首小诗，诗中说道：

从未放肆若此的批评家啊，
天性与爱情无意中的玩笑
就使得你这般烦恼。
你怎能非难温情，云云，云云。

如前所录，不再重复。转引自伏尔泰《我在柏林之时》（此书在巴黎瓦卢瓦街2号的国立图书馆可以廉价买到：《伏尔泰小说集》1876年版第5卷——《耶尼传》《我在柏林之时》。售价25生丁）。

弗里德里希二世对这本书里详细指控他搞男色一事满不在意。这从下面事实中可以看出：一位柏林书商得到一批《我在柏林之时》，曾请人询问弗里德里希如何处理。弗里德里希回答：随他去，他尽管

卖,他要靠这本书挣几个塔勒是无可非议的(施洛塞尔《18世纪》)。1783年,在伏尔泰逝世五年后这本书出版。

弗·恩格斯写于1881年2月
8日—3月12日之间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85年历史考证
版第1部分第25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25卷翻译

卡·马克思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²⁵⁵

卡·马克思写于 1881 年 2 月
18 日—3 月 8 日之间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85 年历史考证
版第 1 部分第 25 卷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5 卷翻译

[初 稿]

(1)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过,它实质上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资本论》法文版第315页第1栏),并且说过,“全部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的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同上,第2栏)。

可见,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为什么呢?请看第32章,那里写道:

“它被消灭的过程,即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这种对劳动人民的痛苦的、残酷的剥夺,就是资本的起源……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劳动即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第341页第2栏)

可见,归根到底这里所说的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但是,既然俄国农民手中的土地从来没有成为他们的私有财产,那么这一论述又如何应用呢?

(2)从历史观点来看,证明**俄国农民的公社必然解体**的惟一有力论据如下:

回顾一下遥远的过去,我们发现西欧到处都有不同程度上是古代类型的公有制;随着社会的进步,它在各地都不见了。为什么它只

是在俄国免于这种遭遇呢？

我的回答是：在俄国，由于各种情况的独特结合，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同时，它也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

如果资本主义制度的俄国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我要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难道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吗？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来呢？

如果在农民解放的时候，农村公社立即被置于正常的发展条件下，其次，如果主要靠农民来偿付的巨额国债，以及通过国家（仍然要靠农民来偿付）向那些转化为资本家的“社会新栋梁”提供的其他巨款，都用于进一步发展农村公社，那么，现在谁也不会再臆测消灭公社的“历史必然性”了，因为大家将都会承认，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和一种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

另外一个对于保存（通过发展公社）俄国公社有利的情况是：俄国公社不仅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而且经历了这种社会制度尚未受触动的时期而幸存下来；相反地，在俄国公社面前，不论是在西欧，还是在美国，这种社会制度现在都处于同科学、同人民群众以至同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相抗争的境地。总之，在俄国公社面前，资本主义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

Handwritten text in French, likely a draft of a letter. The text is dense and contains many corrections and deletions. It discusse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ssues, mentioning figures like "L'Union" and "L'Europe". The text is written in cursive and includes several lines that have been crossed out. At the bottom right, there is a small rectangular stamp or box containing the number "117" and some other illegible markings.

卡·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的手稿第3页

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告终,这种形式的所有制,或者像一位美国著作家(这位著作家是不可能有什么革命倾向的嫌疑的,他的研究工作曾得到华盛顿政府的支持)所说的,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高级的形式下(in a superior form)的复活(a revival)”^①。因此,不应该过分地害怕“古代”一词。

如果是这样,那至少应该了解这些波折。然而,关于这些波折,我们还什么都不了解。

不管怎样,这种公社是在连绵不断的内外战争的情况下灭亡的,很可能是亡于暴力之下的。在日耳曼部落占领意大利、西班牙、高卢等地时,那里的古代类型的公社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它的**天然的生命力**却为两个事实所证实。有个别的公社经历了中世纪的一切波折,一直保存到今天,例如,在我的家乡特里尔专区就有。然而更重要的是,这种公社的各种特征非常清晰地表现在取代它的公社里面,在后一种公社里,耕地变成了私有财产,然而森林、牧场、荒地等仍为公有,所以毛勒在研究了这种次生形态的公社后,就能还原出它的古代原型。由日耳曼人在所有被征服的地区引入的新公社,由于继承了古代原型的特征,在整个中世纪时期,成了人民自由和人民生活的惟一中心。

如果说,在塔西佗时代以后,我们关于公社的生活,关于公社是怎样消失和在什么时候消失的,都一点也不了解,那么,至少由于尤利乌斯·凯撒的叙述,我们对这一过程的起点还是知道的。在凯撒

^① 见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1877年伦敦版第552页。——编者注

的那个时代，已是逐年分配土地，但是这种分配是在日耳曼人的部落联盟、各氏族和部落之间，而不是在公社各个社员之间进行的。由此可见，日耳曼人的农村公社是从较古的类型的公社中产生出来的。在这里，它是自然发展的产物，而决不是从亚洲现成地输入的东西。在那里，在东印度也有这种农村公社，并且往往是古代形态的最后阶段或最后时期。

为了从纯理论观点，即始终以正常的生活条件为前提，来判断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我现在必须指出“农业公社”不同于较古的类型的公社的某些特征。

首先，所有较早的原始公社都是建立在公社社员的血缘亲属关系上的；“农业公社”割断了这种牢固然而狭窄的联系，就更能够扩大范围并保持同其他公社成员的接触。

其次，在公社内，房屋及其附属物——园地，已经是农民的私有财产，可是远在引入农业以前，共有的房屋曾是早先各种公社的物质基础之一。

最后，虽然耕地仍然是公有财产，但定期在农业公社各个社员之间进行分配，因此，每个农民自力耕种分配给他的田地，并且把产品留为己有，然而在较古的公社中，生产是共同进行的，只有产品才拿来分配。这种原始类型的合作生产或集体生产显然是单个人的力量太小的结果，而不是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结果。

不难了解，“农业公社”所固有的二重性能够赋予它强大的生命力，因为，一方面，公有制以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联系，使公社基础稳固，同时，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又使那种与较原始的公社条件不相容的个性获得发展。但是，同样明显，这种二重性也可能逐渐成为公社解体的根源。撇开敌对的环境

的一切影响不说,仅仅从积累牲畜开始的动产的逐步积累(甚至有像农奴这样一种财富的积累),动产因素在农业本身中所起的日益重要的作用以及与这种积累密切相关的许多其他情况(如果我要对此加以阐述就会离题太远),都起着破坏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的作用,并且在公社内部产生利益冲突,这种冲突先是使耕地变为私有财产,最后造成私人占有已经变成私有财产的**公社附属物**的森林、牧场、荒地等等。正由于这个原因,“农业公社”到处都是古代社会形态的**最近的类型**;由于同样原因,在古代和现代的西欧的历史运动中,“农业公社”时期是从公有制到私有制、从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的过渡时期。但这是不是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农业公社”的发展都要遵循这条道路呢?绝对不是的。“农业公社”的构成形式只可以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见第10页)

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惟一的**国家**。它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同时,它也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地块个体耕作转化为集体耕作,并且俄国农民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有助于他们从小地块劳动向合作劳动过渡;最后,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²⁵⁶,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

果用到公社中来。

如果“社会新栋梁”的代言人要否认现代农村公社上述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么,可以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俄国为了获得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呢?也可以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股份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来呢?

俄国的“农业公社”有一个特征,这个特征造成它的软弱性以及同各方面的敌对状态。这就是它的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而保持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并不到处都是这种类型的公社的内在特征,但是,在有这一特征的地方,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就使一种或多或少集权的专制制度凌驾于公社之上。俄罗斯北部各公国的联合证明,这种孤立性在最初似乎是由于领土辽阔而形成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又由于蒙古人入侵以来俄国遭到的政治命运而加强了。在今天,这个障碍是很容易消除的。也许只要用各公社自己选出的农民代表会议代替乡^①这一政府机关就行了,这种会议将成为维护它们利益的经济机关和行政机关。

从历史观点来看,一个十分有利于通过“农业公社”的进一步发展来保存这种公社的原因是:“农业公社”不仅和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这使它可以不必接受资本主义的活动方式而占有它的各种成果;而且,它经历了资本主义制度尚未受触动的时期而幸存下来;现在却相反,不论是在西欧,还是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都处于同劳动群众、同科学以至同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相抗争

^① 这个词马克思写的是俄文:волость。——编者注

的境地。总之，在俄国公社面前，资本主义制度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生产的高级形式而告终。

不言而喻，公社的进化将是逐步的，第一步可能是在它目前的基础上为它创造正常的条件。

因此，从理论上说，俄国“农村公社”可以通过发展它的基础即土地公有制和消灭它也包含着的私有制原则来保存自己；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它能够不经历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制度单纯从它可能**延续的时间**来看，在社会生活中是微不足道的），而占有资本主义生产使人类丰富起来的那些成果。但是我们必须从纯理论回到俄国现实中来。

(3)要剥夺农民，不必像在英国和在其他国家那样，把他们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同样，也不必用命令来消灭公有制。请你们试一试，从农民那里夺取他们的农业劳动产品一旦超过一定的限度，那么，你们即使动用宪兵和军队也不能再把他们束缚在他们的土地上！罗马帝国末年，各行省的十人长（不是农民，而是土地所有者）就抛弃自己的家园，离开自己的土地，甚至卖身当奴隶，只是为了摆脱那种不过成了官方无情压榨的借口的财产。

正是从所谓农民解放的时候起，国家使俄国公社处在不正常的经济条件之下，并且从那时候起，国家借助集中在它手中的各种社会力量来不断地压迫公社。由于国家的财政搜刮而被削弱得一筹莫展的公社，成了商业、地产、高利贷随意剥削的任人摆布的对象。这种外来的压迫激发了公社内部原来已经产生的各种利益的冲突，并加速了公社的各种瓦解因素的发展。但是，还不止如此。国家靠牺牲

农民培植起来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这样一些部门,它们丝毫不发展农业生产能力,却特别有助于不从事生产的中间人更容易、更迅速地窃取它的果实。这样,国家就帮助了那些吮吸“农村公社”本来已经枯竭的血液的新资本主义寄生虫去发财致富。

——总之,那些最能促进和加速剥削农民(俄国的最巨大的生产力)、并最能使“社会新栋梁”发财致富的一切技术和经济手段,都在国家的促进下过早地发展起来。

破坏性影响的这种促进作用,只要不被强大的反作用打破,就必然会导致农村公社的灭亡。

但是要问,为什么从农村公社的现状中得到好处的所有这些利害关系者(包括政府监护下的大工业企业),合谋要杀死给他们下金蛋的母鸡呢?正因为它们感到“目前这种状况”不能继续维持下去,所以感到现在的剥削方式已经过时了。由于农民的贫困状况,地力已经耗尽而变得贫瘠不堪。丰年被荒年抵消。最近10年的平均数字表明,农业生产不仅停滞,甚至下降。最后,第一次出现了俄国不仅不能输出粮食,反而必须输入粮食的情况。因此,不能再浪费时间。必须结束这一切。必须创造一个由比较富裕的少数农民组成的农村中间阶级,并把大多数农民干脆都变为无产者。正是为了这一目的,“社会新栋梁”的代言人才把公社所受的创伤说成是公社衰老的自然征兆。

撇开目前压迫着俄国“农村公社”的一切灾难而仅仅考察它的构成形式和历史环境,那么一看就很清楚,它的一个基本特征,即土地公有制,是构成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此外,俄国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使他们可能易于从小地块劳动过渡到集体劳动,而且,俄国农民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在排水工程以及其他

公益事业方面,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行集体劳动了。但是,要使集体劳动在农业本身中能够代替小地块劳动这个私人占有的根源,必须具备两样东西:在经济上有这种改造的需要,在物质上有实现这种改造的条件。

关于经济上的需要,只要把“农村公社”置于正常条件之下,就是说,只要把压在它肩上的重担除掉,只要它获得正常数量的耕地,那么它本身就立刻会感到有这种必要。俄国农业只要求有土地和用比较原始的工具装备起来的小地块农民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个时期之所以很快地成为过去,是因为对农民的压迫耗尽了农民的土地的地力,使他的土地贫瘠。现在,农民需要的是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况且,现在他们连种两三俄亩土地都还缺乏各种最必要的东西,难道把他们的耕地增加到10倍,他们的状况就会变得好些吗?

设备、肥料、农艺上的各种方法等等集体劳动所必需的一切资料,到哪里去找呢?俄国“农村公社”比同一类型的古代公社大大优越的地方正是在这里。在欧洲,只有俄国的“农村公社”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保存下来了。因此,它目前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它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为它提供了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利用机器进行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实行合作劳动的农业经营。至于最初的创办费用(包括智力上的和物质的),俄国社会有支付的义务,因为它长久以来靠“农村公社”维持生存并且也必须从“农村公社”中寻找它的“新生的因素”。

“农村公社”的这种发展是符合我们时代历史发展的方向的,对这一点的最好证明,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它最发达的欧美各国中所

遭到的致命危机，而这种危机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高级形式，回复到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而告终。

既然“农村公社”的现状有利于这么多不同的利害关系者，并且特别有利于在亚历山大二世仁慈的统治下成长起来的“社会新栋梁”，那么，为什么他们还合谋要使公社灭亡呢？为什么他们的代言人还把公社所受的创伤说成是公社自然衰老的确凿证据呢？为什么他们要杀死下金蛋的母鸡呢？

只是因为经济上的事实（我要来分析这些事实，就会离题太远）揭开了这样一个秘密：公社的现状不能继续维持下去了，并且纯粹由于事物的必然性，现在的剥削人民群众的方式已经过时了。因此，必须有点新东西，而这种新东西，虽然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但总不外是，消灭公有制，使比较富裕的少数农民形成农村中间阶级，而使绝大多数的农民干脆变为无产者。

一方面，“农村公社”几乎陷入绝境；另一方面，强有力的阴谋正等待着它，准备给它以最后的打击。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可是，那些掌握着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人正在尽一切可能准备把群众推入这一灾祸之中。

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环境是独一无二的！在欧洲，只有俄国“农村公社”不是像稀有的残存的怪物那样零星地保存下来，不是以不久前在西方还可见到的那种古代形式保存下来，而几乎是作为巨大帝国疆土上人民生活的统治形式保存下来的。如果说土地公有制是俄国“农村公社”的集体占有制的基础，那么，它的历史环境，即它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则为它提供了大规模地进行共同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因此，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

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它能够以应用机器的大农业来逐步代替小地块耕作,而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又非常适于这种大农业。因此,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开始获得新的生命。相反,作为开端,必须使它处于正常的状态。

但是,掌握着将近一半土地,而且是优等地的地产,是和公社对立的,更不用说国有领地了。正因为如此,所以通过“农村公社”的进一步发展来保存它是和俄国社会总的运动一致的,俄国社会的新生只有付出这个代价才能获得。

甚至仅仅从经济观点来看,俄国能够通过本国农村公社的发展来摆脱它在农业上所处的绝境;通过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的租佃来摆脱这种绝境的尝试,将是徒劳无功的,因为这种制度是同俄国的整个社会条件相抵触的。^①

要能发展,首先必须生存,可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农村公社”目前正处于危险境地。

撇开敌对环境的一切其他有害要素的影响不说,仅仅是个别家庭手中的动产,例如它们的牲畜、有时甚至是奴隶或农奴这样的财富的逐步增长,这种私人积累,从长远来看足以破坏原始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并且在公社内部产生利益冲突,这种冲突首先触及公共的耕地财产,最后扩展到森林、牧场和荒地等等这样一些已经变成私有财产的公社附属物的公共财产。

(4)各种原始公社(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正像

^① 初稿中原来没有这段话,这里是马克思从他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第3稿第4页上移过来的。——编者注

在地质的层系构造中一样,在历史的形态^①中,也有原生类型、次生类型、再次生类型等一系列的类型)的衰落的历史,还有待于撰述。到现在为止,我们只有一些粗糙的描绘。但是,无论如何,研究的进展已经足以证明:(1)原始公社的生命力比闪族社会、希腊社会、罗马社会以及其他社会,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力要强大得多;(2)它们衰落的原因,是那些阻碍它们越过一定发展阶段的经济条件,是和今日俄国公社的历史环境毫无相似之处的历史环境。

我们在阅读资产者所写的原始公社历史时必须有所警惕。他们是甚至不惜伪造的。例如,亨利·梅恩爵士本来是英国政府用暴力破坏印度公社行动的热心帮手,但他却伪善地要我们相信:政府维护这些公社的一切崇高的努力,碰到经济规律的自发力量都失败了!^②

(5)^③您完全清楚,现在俄国公社的存在本身由于强大的利害关系者的阴谋而处于危险境地。除了国家直接搜刮的压迫,侵入公社的“资本家”、商人等等以及土地“所有者”的狡诈的剥削以外,公社还受到乡村高利贷者以及由于它所处的环境而在内部引起的利益冲突的损害。

要剥夺农民,不必像在英国和在其他国家那样,把他们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同样,也不必用命令来消灭公有制。请你们试一试,从农民那里夺取他们的农业劳动产品一旦超过一定的限度,那么,你们即使动用宪兵和军队也不能再把他们束缚在他们的土地上!罗马帝

① “地质的层系构造”和“历史的形态”中的“层系构造”和“形态”,原文为“formation”。——编者注

② 参看亨·梅恩《东方和西方的农村公社》1871年伦敦版。——编者注

③ 马克思在这段文字旁画了一条竖线,可能是删除记号。——编者注

国末年,各行省的十人长(大土地所有者)就抛弃自己的土地,成为流浪者,甚至卖身当奴隶,只是为了摆脱那种不过成了官方压榨的借口的“财产”。

正当人们吸着公社的血、蹂躏它、耗尽它的地力、使它的土地贫瘠的时候,“社会新栋梁”的文坛奴仆却以嘲弄的口吻指出,公社所受的创伤正是它自然衰老的征兆;并宣称,公社的灭亡是自然的死亡,缩短它的临终的时间是一件好事。因此,这里涉及的已经不是有待解决的问题,而简直是应给以打击的敌人。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而且,政府和“社会新栋梁”正在尽一切可能准备把群众推入这一灾祸之中。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

[二 稿]

(1)我在《资本论》中指出,封建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转变是以剥夺生产者为出发点的,并特别指出,“**这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法文版第315页)。接着我又说:“这种剥夺(剥夺农民)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同上)

可见,我明确地把这种“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为了使人们对我的思想不致发生任何疑问,我在第341页上说:

“私有制作为集体所有制的对立面,只存在于……劳动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但是私有制的形式依这些私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改变。”

由此可见,我所分析的过程,是微不足道的少数人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代替劳动者私有的、分散的所有制形式的过程(同上,第342页),是一种**所有制代替另一种所有制**的过程。这怎么能应用到土地不是而且从来不是农民的“私有财产”的俄国呢?因此,他们有理由根据西方事态的发展做出的**惟一结论**可能就是:俄国要确立资本主义生产,就应该从消灭公社所有制、从剥夺农民即广大人民群众着手。而俄国自由派的愿望就是这样的;但是,他们的**愿望**是否比叶卡捷琳娜二世企图把西方中世纪的行会制度移植到俄国土地上来的**愿望**²⁵⁷更有理由呢?

ad(1)^①总之,西方对农民的剥夺,使“劳动者私有的、分散的所有制变为”资本家私有的、集中的所有制。但这终究仍然是一种私有制形式代替另一种私有制形式。俄国则相反,它是资本主义所有制代替共产主义所有制的问题。

(2)从历史观点来看,证明俄国共产主义所有制**必然解体**的惟一有力论据如下:共产主义所有制曾在西欧各地存在过,随着社会的进步,它在各地都不见了,为什么它只是在俄国免于这种遭遇呢?

当然,如果资本主义生产要想在俄国确立自己的统治,那么,绝大多数农民即俄国人民定将变成雇佣工人,因而也会遭到剥夺,即通过共产主义所有制先被消灭而遭到剥夺。但是,不管怎样,西方的先例在这里完全不能说明问题。

(2)关于您所讲到的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完全不知道。现在和我保持个人联系的一些俄国人,就我所知,是持有完全相反的观点的。

(3)从历史观点来看,证明俄国公社所有制**必然解体**的惟一有力的论据如下:公社所有制曾在西欧各地存在过,随着社会的进步,它在各地都不见了,而在俄国,它怎么能免于这种遭遇呢?

首先,在西欧,公社所有制的灭亡和资本主义生产的诞生之间隔着一段很长的时间,包括整个一系列依次相继的经济上的革命和进化,而资本主义生产不过是其中离我们最近的一个。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神奇地发展了社会的生产力,但是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它同自己所产生的社会生产力本身是不相容的。它的历史今后只是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的历史。结果,资本主义生产向一切人(除了因

① 对(1)的增补。——编者注

利益而瞎了眼的人)表明了它的纯粹的暂时性。欧洲和美洲的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民族,正力求打碎它的枷锁,以合作生产来代替资本主义生产,以古代类型的所有制**最高形式**即共产主义所有制来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

如果俄国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如果它要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西欧通过长期的一系列进化(从原始公社的存在到它的目前状态)才取得的那些经济成就,那么,公社注定会随着俄国社会的逐步发展而灭亡这一点,至少在我看来,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俄国公社的情况同西方原始公社的情况完全不同。俄国是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把公社所有制保存下来的欧洲惟一的**国家**,但同时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同较高的文化同时存在,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俄国吸取这种生产方式的积极成果,就有可能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坏(我顺便指出,俄国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形式是古代类型的最现代的形式,而后者又经历过一系列的进化)。如果俄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崇拜者否认这种结合的可能性,那么,就请他们来证明:要在俄国使用机器,它必须先经过机器生产的孕育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可以说是在几天之内就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引进到自己这里来呢?

(4)威胁着俄国公社生命的不是历史的必然性,不是理论,而是国家的压迫,以及侵入公社的,也是由国家靠牺牲农民扶植壮大起来的资本家的剥削。

(4)地球的太古结构或原生结构是由一系列不同年代的叠复的地层组成的。古代社会形态也是这样,表现为一系列不同的、标志着依次更迭的时代的类型。俄国农村公社属于这一链条中最近的类

型。在这种公社里面,农民已经具有了他所居住的房屋和作为房屋附属物的菜园的私有权。这正是古代形式的第一个破坏性因素,是较古的类型所没有的。另一方面,较古的类型都是建立在公社各个社员的血缘亲属关系上的,而俄国公社所属的类型已经摆脱了这种狭窄的联系。这使它有了较广阔的发展余地。农村公社的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并不到处都是这种最后的原始类型的内在特征,但是,在有这一特征的任何地方,它总是把集权的专制制度矗立在公社的上面。我认为,在俄国,这种由幅员辽阔决定的原始的孤立性,一旦摆脱了政府的桎梏是很容易消除的。

现在我来谈谈问题的实质。毋庸讳言,俄国公社所属的古代类型,包含着一种内在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会导致公社的灭亡。土地虽然是公有的,但是每个农民则和西方的小农一样,都靠自己的力量来耕种自己的土地。公有制和土地的小块耕种相结合,这在较久远的时代是有益的,但在我们时代就变成危险的了。一方面,动产这种在农业中起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的因素,促使公社社员的财产状况日益分化,特别是在国家的财政压力之下,还引起公社内部各种利益之间的斗争;另一方面,作为合作劳动和协作劳动基础的公有制,它的经济上的优越性日益丧失。可是也不应该忘记,俄国农民在使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方面,已经采用了集体方式,并且他们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就大大便利了他们从小土地耕种过渡到集体耕种;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有利于进行大规模使用机器的联合耕种;而且,长久以来靠农村公社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为公社垫付实现这一改变所必需的最初的经费。不言而喻,这里所说的只是逐渐的改变,而这一改变必须从使公社在**目前**的基础上走上

正常状态开始。

(5)把一切多少带有理论性的问题撇开不谈,那也用不着向您说明,今天威胁着俄国公社生存的危险来自共谋反对它的那些强有力的利害关系者。某种在国家帮助下靠牺牲农民哺育起来的资本主义是同公社对立的;它所关心的是公社的毁灭。并且为了地主的利益,创造出—一个由比较富裕的农民组成的农村中间阶级,而把贫苦农民即农民大众变为普通的雇佣工人,这意味着廉价的劳动!公社受国家勒索的压制、商业的掠夺、地主的剥削和高利贷从内部的破坏,那它怎么能够抵抗得住呢!

[三 稿]

亲爱的女公民：

要深入分析您2月16日来信中提出的问题，我必须钻研事物的细节而放下紧急的工作。但是，我希望，现在我很荣幸地写给您这一简短的说明，就足以消除对我的所谓理论的一切误解。

一、我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说：“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全部过程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资本论》法文版第315页）

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造成这种限制的原因在第32章的下面这一段里已经指出：“以个人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同上，第341页）

因此，在这种西方的运动中，问题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相反地，在俄国农民中，则是要把他们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人们承认还是否认这种转变的必然性，提出赞成或反对这种转变的理由，都和我对资本主义制度起源的分析毫无关系。从这一分析中，至多只能作出这样的结论：在目前俄国农民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把他们变成小私有者，不过是对他们进行迅速剥夺的序幕。

二、用来反对俄国公社的最有力的论据如下：

如果您回顾一下西方社会的起源，那么您到处都会发现土地公有制；随着社会的进步，它又到处让位给私有制；因此，它不可能在俄国一个国家内免于同样的遭遇。

我之所以注意这一推论，仅仅因为它是**以欧洲的经验为根据的**。至于比如说东印度，那么，大概除了亨·梅恩爵士及其同流人物之外，谁都知道，那里的土地公有制是由于英国的野蛮行为才被消灭的，这种行为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后退。

并不是所有的原始公社都是按照同一形式建立起来的。相反，从整体上看，它们是一系列社会组织，这些组织的类型、生存的年代彼此都不相同，标志着依次进化的各个阶段。**俄国的公社**就是通常称做**农业公社**的一种类型。在西方相当于这种公社的是存在时期很短的**日耳曼公社**。在尤利乌斯·凯撒时代，日耳曼公社尚未出现，而到日耳曼部落征服意大利、高卢、西班牙等地的时候，它已经不存在了。在尤利乌斯·凯撒时代，各集团之间、各氏族和部落之间已经每年重分耕地，但还不是在公社的各个家庭之间重分；大概，耕种也是由集团共同进行的。在日耳曼尼亚本土，这种较古类型的公社通过自然的发展而变为塔西佗所描绘的那种**农业公社**。从那时起，我们就看不到它了。它在连绵不断的战争和迁徙的情况下不知不觉地消亡了；它有可能是死于暴力之下的。但是，它的天赋的生命力却为两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所证实。零星的这类公社经历了中世纪的一切波折，一直保存到今天，例如，在我的家乡特里尔地区就有。然而最重要的是，这种“农业公社”的烙印是如此清晰地表现在从它产生出来的新公社里面，以致毛勒在辨认了新公社后能够还原出这种“农业公社”。这种耕地是农民的**私有财产**，而森林、牧场、荒地等等仍然是公

共财产的新公社,由日耳曼人引入所有被征服的国家。由于它承袭了原型的特征,所以,在整个中世纪内是自由和人民生活的惟一中心。

同样在亚洲,在阿富汗人及其他人中间也有“农村公社”。但是,这些地方的公社都是**最近类型**的公社,也可以说,是**古代社会形态**的最近形式。为了指出这一事实,所以我就谈了一些关于日耳曼公社的细节。

现在,我们必须考察一下“农业公社”不同于较古的公社的最主要的特征。

(1)所有其他公社都是建立在自己社员的血缘亲属关系上的。在这些公社中,只容许有血缘亲属或收养来的亲属。他们的结构是系谱树的结构。“农业公社”是最早的没有血缘关系的自由人的社会组织。

(2)在农业公社中,房屋及其附属物——园地,是农民私有的。相反,公共房屋和集体住所是远在畜牧生活和农业生活形成以前时期的较原始的公社的经济基础。当然,也有一些农业公社,它们的房屋虽然已经不再是集体的住所,但仍然定期改换占有者。这样,个人使用权就和公有制结合起来。但是,这样的公社仍然带有它的起源的烙印,因为它们是处在由较古的公社向真正的农业公社过渡的状态。

(3)耕地是不准让渡的公共财产,定期在农业公社社员之间进行重分,因此,每一社员用自己的力量来耕种分给他的地,并把产品留为己有。而在较原始的公社中,生产是共同进行的;共同的产品,除储存起来以备再生产的部分外,都根据消费的需要陆续分配。

显然,农业公社制度所固有的这种**二重性**能够成为它的巨大生

命力的源泉。它摆脱了牢固然而狭窄的血缘亲属关系的束缚,并以土地公社所有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为自己的坚实基础;同时,各个家庭单独占有房屋和园地、小土地经济和私人占有产品,促进了个人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同较原始的公社机体是不相容的。

但是,同样明显,就是这种二重性也可能逐渐成为公社解体的萌芽。除了外来的各种破坏性影响,公社内部就有使自己毁灭的因素。土地私有制已经通过房屋及农作园地的私有渗入公社内部,这就可能变为从那里准备对公有土地进攻的堡垒。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私人占有的源泉——小土地劳动。它是牲畜、货币、有时甚至奴隶或农奴等动产积累的根源。这种不受公社控制的动产,个体交换的对象(在交换中,投机取巧起极大的作用)将对整个农村经济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这就是破坏原始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因素。它把异质的因素带进来,引起公社内部各种利益和私欲的冲突,这种冲突,首先会破坏耕地的公有制,然后会破坏森林、牧场、荒地等等的公有制;一旦这些东西变成了私有制的公社附属物,也就会逐渐变成私有了。

农业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不言而喻,次生的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

但是,这是不是说,农业公社的历史道路必然要导致这种结果呢?绝对不是的。农业公社固有的二重性使得它只可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私有成分在公社中战胜集体成分,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

现在,我们暂且不谈俄国公社所遭遇的灾难,只来考察一下它的可能的发展。它的情况是独一无二的,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在整个欧洲,只有它是一个巨大的帝国内农村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组织形式。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又给予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它可以借使用机器而逐步以联合耕种代替小土地耕种,而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又非常适合于使用机器。如果它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

英国人在东印度就这样尝试过:他们得到的结果不过是破坏了当地的农业,使荒年更加频繁,饥馑更加严重。

可是公社受到诅咒的是它的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不正是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使它至今不能有任何历史创举吗?而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将在俄国社会的普遍动荡中消失。

俄国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这特别便于他们从小土地劳动过渡到合作劳动,并且他们在草地的割草、以及像排除积水等公社的作业中,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实行了合作劳动。完全古代类型的小土地占有制(这是现代农学家感到头痛的东西)也有利于实行合作劳动。如果您在某一个地方看到有陇沟痕迹的小块土地组成的棋盘状耕地,那您就不必怀疑,这就是已经死亡的农业公社的地产!农业公社的社员并没有学过地租理论,可是他们了解,在天然肥力和位置不同的土地上消耗等量的农业劳动,会得到不等的收入。为了使自己的劳动机会均等,他们根据土壤的自然差别和经济差别把土地分成一定

数量的地段,然后按农民的人数把这些比较大的地段再分成小块。然后,每一个人在每一地段中得到一份土地。这种直到今天还在俄国公社里实行的做法,毫无疑问是和农艺学的要求相矛盾的。除其他种种不便外,这种做法也造成人力和时间的浪费。可是,这种做法虽然乍看起来似乎和集体耕种相矛盾,但它的确有助于向集体耕种的过渡。小块土地……①

① 手稿到此中断。——编者注

[四 稿]

1881年3月8日

亲爱的女公民：

最近十年来定期发作的神经痛妨碍了我，使我不能较早地答复您2月16日的来信。承蒙您向我提出问题，但很遗憾，我却不能给您一个适合于发表的简短说明。几个月前，我曾经答应给圣彼得堡委员会²⁵⁸就这个题目写篇文章。可是，我希望寥寥几行就足以消除您因误解所谓我的理论而产生的一切疑问。

由此可见，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没有提供任何肯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东西，也没有提供否定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东西。

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对此进行的专门研究使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自然支点；可是要使它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条件。

[复 信]

1881年3月8日于伦敦西北区
梅特兰公园路41号

亲爱的女公民：

最近十年来定期发作的神经痛妨碍了我，使我不能较早地答复您2月16日的来信。承蒙您向我提出问题，但很遗憾，我却不能给您一个适合于发表的简短说明。几个月前，我曾经答应给圣彼得堡委员会就同一题目写篇文章。可是，我希望寥寥几行就足以消除您因误解所谓我的理论而产生的一切疑问。

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

“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了……全部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的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资本论》法文版第315页）

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造成这种限制的原因在第32章的下面这一段里已经指出：

“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劳动即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同上，第341页）

因此，在这种西方的运动中，问题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

种私有制形式。相反地，在俄国农民中，则是要把他们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

由此可见，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没有提供肯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没有提供否定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对此进行的专门研究使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

亲爱的女公民，您忠实的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致斯拉夫人在伦敦举行的
巴黎公社纪念大会主席²⁵⁹

(1881年3月21日)

公民：

非常遗憾，我们不得不通知您，我们无法出席你们的大会。

当巴黎公社被“秩序”卫士们所策划的残酷大屠杀摧毁的时候，胜利者难以料到，在不到十年以后，在遥远的彼得堡会发生这样一个事件²⁶⁰，这个事件最终肯定会导致一个俄罗斯公社的建立，虽然也许要经过长期而激烈的斗争。

他们也难以料到，普鲁士国王^①曾由于包围巴黎而迫使当权的资产阶级去武装人民、从而给公社做了准备，而十年以后，这同一位普鲁士国王竟在他自己的首都被社会党人包围起来，只有在他的首都柏林宣布戒严²⁶¹才能保住他的王位。

另一方面，大陆各国政府在公社失败以后采取了迫害手段来迫

① 威廉一世。——编者注

使国际工人协会放弃其正式的、外在的组织,它们以为它们能够用政令和非常法¹⁹⁴来摧毁伟大的国际工人运动,可是它们决没有想到,过了十年,这同一个国际工人运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它不但把欧洲的工人阶级,而且还把美国的工人阶级都卷了进来;为了共同利益而反对共同敌人的共同斗争,将把他们联结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规模更大的自发的国际,这个国际将越来越冲破协会的一切外在形式。

可见,被旧世界的当权者们认为已经彻底消灭了的公社,现在却表现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的生命力,所以我们可以和你们一起高呼:Vive la Commune! ①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81年3月21日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85年历史考证
版第1部分第25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25卷翻译

① 法文,意为“公社万岁!”——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致《每日新闻》编辑²⁶²

阁下：

在今天的《每日新闻》上，一篇题为《〈自由〉周报案》的文章写道，载有关于俄国皇帝^①之死的文章的那一期周报，“还隐约地提及市长官邸疑案的作案者”。鉴于这种说法可以从与有关的报道内容完全不同的意思上去解释，鉴于那篇报道与关于圣彼得堡事件的文章毫无关系，鉴于该报编辑莫斯特先生目前无法在报刊上为自己辩护，现将上述那期《自由》周报就“市长官邸疑案”所报道的，全部逐字逐句译出如下，请予刊登。

1881年3月19日《自由》周报：

“星期三晚上，不知‘何许人’把一个约15磅重的火药包放在伦敦城的市长官邸前面。它的一端已点燃，但是‘偶然’有一名警察立即发觉了这一情况，他十分勇敢，一下就把它熄灭了。我们不知道这种爆炸可能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不管怎样，国际警察看来是知道怎样在这件事上捞一笔资本的。因为第二天晚上就有人在议会中问政府打算采取什么措施，来对付在伦敦长住下来的那些社会主义帮伙。但是，内务大臣并不认为需要采取什么措施，只是耸了耸肩膀。这就是国际警察费尽心机后所得到的一切。”

①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您的忠实仆人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3月31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81年3月31日

载于1881年4月1日《每日新
闻》第10907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25卷翻译

弗·恩格斯

做一天公平的工作， 得一天公平的工资²⁶³

这句话是最近 50 年来英国工人运动的口号。在 1824 年臭名昭彰的结社法²⁶⁴废除以后工联兴起的时期，这个口号曾经起过很好的作用；在英国工人走在欧洲工人阶级前列的光荣的宪章运动²²⁹时期，这个口号起的作用更大。但是时代在前进，有许多 50 年前甚至 30 年前曾经是人们所渴望的和必要的东西，现在已经过时和完全不适用了。这个历来为人所推崇的老口号是不是也在此列呢？

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可是什么叫一天公平的工资，什么叫一天公平的工作呢？它们是怎样由现代社会生存和发展的规律决定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凭借关于道德或法和衡平法²⁶⁵的科学，也不能诉诸任何人道、正义甚至慈悲之类的温情。在道德上是公平的甚至在法律上是公平的，从社会上来看可能远不是公平的。社会的公平或不公平，只能用一门科学来断定，那就是研究生产和交换这种与物质有关的事实的科学——政治经济学。

那么，政治经济学把什么叫作一天公平的工资和一天公平的工

作呢?那不过是雇主和雇工在自由市场上的竞争所决定的工资额和一个工作日的长度和强度。既然是这样决定的,那么它们的内容是什么呢?

一天公平的工资,在正常情况下,就是保证劳动者按照他所处地位和所在国家的生活标准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以保持他的工作能力和繁衍其后代所需要的金额。由于营业的好坏,实际工资额可能有时高于这个数额,有时低于这个数额;但是在正常情况下,这个数额应当是一切变动的平均数。

一天公平的工作,是消耗工人一天的全部劳动力、但不损害他在第二天和以后完成同等数量工作的能力那样一种工作日长度和实际工作的强度。

因此,这种交易可以这样来描述:工人把他一天的全部劳动力给资本家,也就是,在不致使这种交易无法重复进行下去的条件下,工人能给多少就得给多少。他换来的正好是使他每天能够重复这种交易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不会更多。在交易性质所允许的限度内,工人付出的要尽可能多,资本家付出的要尽可能少。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公平。

但是,让我们更深入地看一下这个问题。根据政治经济学家的说法,工资和工作日是由竞争决定的,那么,似乎公平所要求的,应该是双方在平等的条件下有同样公平的起点。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如果资本家不能同工人谈妥,他能够等待得起,可以靠他的资本生活。工人就不能这样。他只能靠工资生活;因此,必须在他能够得到工作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接受工作。工人没有公平的起点。饥饿使他处在非常不利的地位。可是,按照资本家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来说,这正是公平的最高典范。

然而这还是小事。新行业采用机械力和机器,原来就采用机器的行业扩充和改善机器,从而把越来越多的“人手”^①从工作岗位上排挤出去。而排挤的速度,比国内的工厂吸收和雇用这些被排挤的“人手”的速度要快得多。这些被排挤的“人手”,形成一支真正的产业后备军供资本家利用。如果营业不好,他们就会挨饿、行乞、偷盗或者进习艺所²⁶⁶。如果营业好,他们可以随时被用来扩大生产。除非这支后备军中的最后一个男人、女人或儿童都找到工作(这只有在疯狂的过度生产时期才办得到),否则这支后备军的竞争总是会把工资压低,而且单是它的存在本身,就会加强资本家在与劳动者的斗争中的力量。在与资本家的竞争中,劳动者不仅处于不利地位,而且还要拖着钉在脚上的铁球。但是,根据资本家的政治经济学,这是公平的。

然而我们要问,资本家用来支付这笔极其公平的工资的钱,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当然是从资本中来的。但是资本并不产生价值。除土地以外,劳动是财富的惟一来源,资本本身不过是积累起来的劳动产品而已。所以劳动者的工资是由劳动支付的,工人的报酬是从他自己的产品中支付的。按照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平,劳动者的工资应该相当于他的劳动产品。但是按照政治经济学,这并不是公平的。相反,工人劳动的产品落到了资本家手里,工人从中得到的仅仅是生活必需品。所以竞争这种异常“公平”的比赛,其结果就是劳动者的劳动产品不可避免地积累在不劳动者手里,并变成他们手中最有力的工具,去奴役正是生产这些产品的人。

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 关于一天公平的工作

^① 英文原文是“hands”直译是“手”,这里指劳动力、工人。——编者注

也可以讲很多,它的公平同工资的公平是完全一样的。但这一点需要留到以后去谈。从上面所说的来看已经很清楚,这个老口号是过时了,今天已经不大适用了。政治经济学的公平真正决定着支配当今社会的规律,这种公平完全是一边倒的,是倒向资本一边的。因此,我们要永远埋葬掉这个旧口号,代之以另外一个口号:

劳动资料——原料、工厂、机器—— 归工人自己所有!

弗·恩格斯写于 1881 年 5 月
1 或 2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81 年 5 月 7 日
《劳动旗帜报》第 1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5 卷翻译

弗·恩格斯

雇佣劳动制度²⁶⁷

在前面的一篇文章^①里,我们考察了“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个历来为人所推崇的口号,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一天的最公平的工资必然等于对工人的产品的最不公平的分配,这种产品大部分进了资本家的口袋,工人只好满足于仅够保持自己的工作能力和繁衍其后代的那一部分。

这是政治经济学的规律,或者换句话说,是目前社会经济组织的规律,它比英国所有的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加在一起,包括大法官法庭²⁶⁸在内,还更有力量。只要社会还分成两个对立的阶级,即一方是资本家,全部生产资料——土地、原料、机器的垄断者,另一方是劳动者,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工人;只要这种社会组织存在,工资规律就依然是万能的,并且每天要重新锻造锁链,把工人变成他自己所生产但却被资本家所垄断的产品的奴隶。

英国工联已经同这一规律斗争了将近60年——而结果怎样呢?它有没有把工人阶级从资本——工人阶级亲手生产的产品——的奴

① 见本卷第488—491页。——编者注

役下解放出来呢？它有没有使哪怕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上升到高于雇佣奴隶的地位，成为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即他们在生产中需要的原料、工具和机器的所有者，从而也成为他们自己的劳动产品的所有者呢？大家很清楚，它不仅没有做到这一点，而且也从来没有试图这样做。

我们决不是说，工联没有做到这一点，就没有用处了。相反，工联在英国，正如在其他任何工业国一样，都是工人阶级同资本作斗争所必需的。平均工资额等于在某一国家内按照该国一般的生活标准足以使工人一代一代维持下去的生活必需品的金额。对于不同阶层的工人来说，这种生活标准可能是极不相同的。工联在保持一定的工资额和缩短工作日的斗争中的伟大功绩，在于它力图保持和提高生活水平。在伦敦东头^①有许多行业，劳动的繁重程度和所要求的熟练程度同瓦工及其下手完全一样，但是他们挣的工资还不到后者的一半。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使一部分工人能够保持较高的生活标准作为衡量他们的工资的尺度，而另一部分工人由于没有组织、没有力量，不但必须忍受雇主的不可避免的侵夺，而且还要忍受雇主的任意的侵夺，他们的生活标准逐渐降低，他们学会了怎样靠越来越少的工资生活，于是他们的工资就自然而然地降低到他们自己学会了将就的那个水平。

可见，工资规律并没有画出一条定而不移的线。它在一定限度内并不是毫无伸缩性的。在任何时期（严重的萧条时期除外），每一行业都有一个一定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工资额可以因斗争双方的斗争结果而变动。工资在一切场合，都是通过讨价还价确定的，而在

^① 东头(East-end)是伦敦的一个人口稠密的贫民区。——编者注

讨价还价中,谁能坚持得更长久和更有效,谁就最有机会得到比应得的多。如果单独一个工人试图去和资本家讨价还价,那他很容易失败,只好无条件投降。但是,如果整个行业的工人结成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在工人中间募集基金,使他们在必要时能够同他们的雇主对抗,因而能够作为一支力量去同这些雇主进行谈判,那时,而且只有那时,他们才有可能得到那一点点按目前社会经济制度可称为公平工作之公平工资的微薄收入。

工资规律并没有被工联的斗争推翻。相反,它是通过这些斗争而实现的。如果没有工联的抵抗手段,工人甚至连按照雇佣劳动制度规则应得的也得不到。资本家只是由于害怕他眼前的工联,才会不得已而付出他的工人的劳动力的全部市场价值。这需要证据吗?请看看付给大工联会员的工资,再看看伦敦东头这个贫困的死水坑中的无数小行业所付的工资吧。

所以,工联攻击的并不是雇佣劳动制度。但是,造成工人阶级经济地位低下的,并不是工资的高低,而是下面这个事实,即工人阶级得不到自己劳动的全部劳动产品,而不得不满足于自己生产的产品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就叫做工资。资本家攫取了全部产品(从中支付工人的工资),因为他是劳动资料的所有者。因此,工人阶级除非成为一切劳动资料——土地、原料、机器等的所有者,从而也成为他们自己劳动的全部产品的所有者,否则就得不到真正的解放。

弗·恩格斯写于 1881 年 5 月
15 或 16 日

作为社论载于 1881 年 5 月 21
日《劳动旗帜报》第 3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5 卷翻译

弗·恩格斯

工 联²⁶⁹

—

在本报上一号,我们考察的是工联的活动,谈到了它怎样在同雇主作斗争中实现工资的经济规律。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因为非常有必要让整个工人阶级都彻底了解它。

我们认为,目前英国每一个工人不用解释都懂得,不论整个资本家阶级还是资本家个人,都想尽量减少工资。大卫·李嘉图曾经无可反驳地证明,劳动产品在扣除一切费用以后,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构成工人的工资,另一部分构成资本家的利润。既然在每个个别场合下这种劳动净产品的量是一定的,那就很明显,如果不减少叫做工资的那一部分,叫做利润的那一部分就不会增加。否认资本家想减少工资,就等于说资本家不想增加自己的利润。

我们知道得很清楚,还有其他方法可以暂时增加利润,但它们并不改变一般规律,所以用不着在这里谈了。

既然工资额是由一个明确而具体的社会经济规律支配的,资本家怎么能够减少工资呢?有工资的经济规律在,而且推翻不掉。但

是,我们已经谈到过,它是有伸缩性的,这种伸缩性有两种表现。在一个特定的行业中,工资额可以或者直接降低,那就是使该行业的工人逐渐习惯于更低的生活标准,或者间接降低,那就是增加每天的劳动时间(或同一时间内的劳动强度)而不增加工资。

每个个别资本家对减少自己工人工资以增加自己利润的欲望,由于同一行业中资本家的相互竞争而得到新的刺激。他们每人都竭力比自己的竞争者卖得便宜些,而为了不牺牲自己的利润,他就得竭力减少工资。这样一来,每个资本家的欲望给工资额带来的压力,由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而增加了十倍。以前不过是利润多一些或少一些的问题,现在却成为必不可免的事情了。

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对这种经常不断的压力,是没有任何有效的抵抗手段的。所以,在那些工人没有组织起来的行业中,工资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工作时间有不断增加的趋势。这个过程缓慢地然而确实是地继续着。繁荣时期有时会打断这个过程,但以后营业不好的时期又更加加速这个过程。工人们逐渐习惯于越来越低的生活标准。工作日的长度越来越接近可能的最高限度,而工资越来越接近绝对的最低限度,再低工人就绝对不可能生活和繁衍其后代了。

大约在本世纪初,曾经暂时出现过例外的情形。蒸汽和机器的迅速增加跟不上增加得更快的对蒸汽和机器的产品的需求。在这些行业中的工资,除去习艺所²⁶⁶卖给工厂主的儿童的工资以外,通常都是高的。那些不可缺少的熟练手工工人的工资非常高,当时一个染匠、机械工、剪绒工、手摇走锭精纺机操作工通常的收入,现在听起来令人难以相信。同时,被机器排挤的那些行业却要慢慢饿死。但是新发明的机器渐渐又排挤了那些工资优厚的工人,人们发明了制造机器的机器,而且增长速度很快,使机器生产的商品的供应不仅跟

上而且超过了需求。1815年实现的全面和平²⁷⁰，恢复了经常的贸易，从繁荣、生产过剩到商业恐慌的十年一周期的波动开始了。工人从过去的繁荣时期保留下来的、或者在疯狂的过度生产时期甚至还增加了的任何利益，现在在商业不景气和恐慌的时期全都被剥夺了。很快，英国的工业人口就处于这样一条普遍规律支配之下，即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的工资经常趋于绝对的最低限度。

但与此同时，1824年取得合法地位的工联也登上了舞台，而且来得非常适时。资本家是一向有组织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需要正式的公会、章程、专职人员等等。他们和工人相比人数很少，他们形成一个特殊的阶级，他们之间有经常的社交和商业往来——这就代替了一切。只有在后来，某一产业部门占据了整个地区，例如棉纺织业占据了兰开夏郡，资本家的正式的同业公会才有必要。相反，工人一开始就不能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这样的组织要有明确规定的章程，并把全权交给它的专职人员和委员会。1824年的法令使这些组织有了合法地位²⁷¹。从那时起，工人在英国成了一支力量。他们已经不是从前的彼此隔绝的孤立无援的群众了。除了联合和共同行动所产生的力量以外，很快又增添了相当充足的财力——我们的法国兄弟们意味深长地把它叫做“抵抗基金”。这时的形势完全改变了。对于资本家来说，任意减低工资或增加工作时间成了一件冒险的事情。

因此，当时的资本家阶级对工联群起而攻之。这个阶级一向认为他们长期以来已成常规的压榨工人阶级的做法是既得的权利和合法的特权。这时要制止他们这样做了。难怪他们要大叫大嚷，认为他们的权利和财产受到的损害，至少和现在爱尔兰的大地主一样²⁷²。

60年的斗争经验使资本家多少学乖了一些。工联现在已经成了得到承认的机构,它作为工资的调节者之一的作用,被承认为同工厂法²⁷³作为工作时间的调节者的作用完全一样。不仅如此,兰开夏郡的棉纺织厂主们最近甚至模仿起工人来了,现在他们已经知道怎样在对他们有利的时候组织罢工,而且组织得不比任何工联差,甚至还要好。

这样,工联活动的结果是:工资规律违反雇主的意志而得到了实现;任何组织完善的行业的工人,都能获得至少接近于他们所提供给雇主的劳动力的全部价值;在国家法令的帮助下,工作时间至少不会过分超出最大限度致使劳动力过早耗尽。但这是工联按其目前的组织来说所可望达到的极限,就是这些也只有经常地斗争、大量地消耗人力和财力才能达到。而且十年至少有一次的营业波动,可以一下子把已经争得的一切破坏掉,于是斗争又得重新开始。摆脱这个恶性循环的出路是没有的。工人阶级一如既往,仍然是我们的宪章派先辈所不讳言的雇佣奴隶阶级。难道这一切努力、自我牺牲和苦难的最后结果就应该是这样的?难道这永远是英国工人的最高目的?抑或英国工人阶级最后应当努力突破这个恶性循环,从彻底废除雇佣劳动制度的运动中找到一条摆脱这个恶性循环的出路?

下个星期我们将考察工联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者的作用。

二

到目前为止,我们仅仅就工联在帮助调节工资额并保证工人在和资本作斗争时至少有一些抵抗手段方面,考察了它的作用;但是

我们的论题不只限于这一方面。

我们说的是工人反对资本的斗争。不管资本的辩护士怎样加以否认,这种斗争确实是存在的。只要减少工资仍旧是增加利润的最可靠、最简便的方法。而且,只要雇佣劳动制度本身仍旧存在,这个斗争也将存在。工联的存在本身就足以证明这一事实。如果成立工联不是为了反对资本的侵夺,那又是为了什么呢?掩饰是没有用的。含糊其词遮不住一个丑恶的事实,即当前的社会基本上分为两大对抗的阶级,一方是拥有全部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另一方是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工人。后一个阶级的劳动产品必须在两个阶级中间分配,而正是为了这种分配经常进行斗争。每个阶级都想尽量多分到一些。在这个斗争中,最奇怪的是,尽管工人阶级斗争的目的只是要得到自己产品的一部分,但他们却经常被指责为简直是在掠夺资本家!

但是,两大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必然会成为政治斗争。中等阶级即资本家阶级同土地贵族之间的长期斗争就是这样,工人阶级同上述那些资本家之间的斗争也是这样。凡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其斗争的直接目的都是政治权力;统治阶级保卫自己的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也就是说要保住它在立法机关中的牢靠的多数;被统治阶级首先争取一部分政治权力、然后争取全部政治权力,以便能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去改变现行法律。所以,大不列颠工人阶级多年来激烈地甚至采用暴力为了能赋予他们这种政治权力的人民宪章²⁷⁴而斗争。他们失败了,但是斗争留给胜利了的资产阶级的印象,却使得这个阶级从那时起,甘愿以不断向工人让步为代价来换取比较长期的休战。

在阶级对阶级的政治斗争中,组织是最重要的武器。随着纯政

治的或者说宪章派的组织的瓦解,工联组织日益壮大起来,到现在,它的力量已经达到了其他国家的任何工人组织都不能相比的程度。拥有 100 万到 200 万工人并得到较小的或地方的工联支持的几个大工联,代表着统治阶级的任何政府、不论辉格党或托利党²⁷⁵的政府都必须加以重视的一支力量。

这些强有力的组织,按照它们在这个国家里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传统,直到现在还把自己的活动几乎严格地局限于参与调节工资和工作时间以及要求废除公开敌视工人的法律这种职能上。如上面已经讲过的那样,它们这样做已经取得了它们有权期望的结果。但是它们得到的比这还多,因为统治阶级对它们的力量比它们自己了解得更清楚,自动向它们作了更多的让步。迪斯累里的户主选举法²⁷⁶至少使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中的大部分获得了选举权。如果他没有预料到这些新选民将表示他们自己的意志,而不再听命于资产阶级自由党的政客,那他会提出这样的法案吗?如果工人没有在管理他们的规模巨大的工联组织方面证明他们有从事行政和政治工作的能力,那他能使这项法案通过吗?

正是这项措施为工人阶级开辟了一个新的前途。它使工人阶级在伦敦和所有的工业城市中取得多数,这样,就使他们能够用新的武器去同资本斗争,即把本阶级的人派到议会里去。在这里,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工联忘记了自己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责任。这个新武器在它们手里已经有十多年了,但是它们几乎从来也没有拔出鞘来用过它。它们不应当忘记,如果它们不能真正走在工人阶级的前列,它们就不能继续保持它们现在所占的地位。英国工人阶级有力量派遣四五十个工人参加议会,却还是永远满足于让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办事员如律师、编辑等等来代表他们,这是违背常理的事情。

不仅如此,有许多迹象²⁷⁷表明,英国的工人阶级正在意识到,他们一些时候以来走了错误的道路,意识到当前专门为了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的运动,使他们置身于摆脱不掉的恶性循环,意识到祸根不是工资低,而是雇佣劳动制度本身。一旦这种认识在工人阶级中普遍地传播开来,工联的地位一定会大大改变。它们将不再享有作为工人阶级惟一组织的特权。在各行业联合会之外或在它们之上,一定会产生一个总的联合会,一个整个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

所以,有了组织的各行业必须好好地考虑下述两点:第一,英国工人阶级很快就会明确地要求自己在议会中有充分的代表权。第二,工人阶级也很快就会了解,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的斗争,以及今天工联所进行的全部活动,并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是一种非常必要和有效的手段,但只是达到一个更高目的的许多手段中的一种,这个更高目的就是完全废除雇佣劳动制度。

为了工人在议会里有充分的代表权,为了准备废除雇佣劳动制度,必须要有组织,但不是个别行业的组织,而是整个工人阶级的组织。这件事做得越快越好。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对组织成一个整体的英国工人阶级进行哪怕一天的抵抗。

弗·恩格斯写于 1881 年 5 月
20 日前后

作为社论载于 1881 年 5 月 28
日和 6 月 4 日《劳动旗帜报》第
4 号和第 5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5 卷翻译

弗·恩格斯

对法国的通商条约²⁷⁸

6月9日,星期四,在下院里,蒙克先生(格洛斯特)^①提出了一项决议案说:

“同法国签订的任何通商条约,如果不是以进一步减低关税来促进两国贸易关系的发展,都将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接着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辩论²⁷⁹。查·迪尔克爵士代表政府用外交礼节所要求的方式表示了温和的对抗。阿·詹·巴尔福先生(塔姆沃思)主张用报复关税来迫使外国采用较低的关税。斯拉格先生(曼彻斯特)主张甚至不用任何条约,让法国人自己去发现我们同他们的贸易对于双方有什么价值。伊林沃思先生(布拉德福德)认为不能指望通过通商条约达到自由贸易。麦基弗先生(伯肯黑德)声称:现在的自由贸易制度只是一种欺骗,因为它是由自由的进口和有限制的出口构成的。决议案以77票对49票通过了。这一失败既不会伤害格莱斯顿先生的感情,也不会有损他的地位。

① 括弧内为选区名,意指此人是代表该选区的议会议员,下同。——编者注

这次辩论是一连串翻来覆去的抱怨的很好的例子，抱怨愚蠢的外国人、甚至连同样愚蠢的殖民地臣民都那样顽固不化，拒不承认自由贸易的普遍好处及其消除一切经济弊病的能力。从来没有一种预言遭到过像曼彻斯特学派¹⁹的预言那样彻底的破产。这种预言说：自由贸易一旦在英国建立起来，就会造福全国，以致其他国家也必然会群起仿效，并向英国的商品开放自己的港口。然而，这些自由贸易使徒们的甜言蜜语依然是旷野里的呼叫。不仅欧洲大陆和美洲整个说来都提高了它们的保护关税，连英国的殖民地，一旦获得了自治，也都跟着仿效；甚至印度也在刚刚被置于国王管辖之下的时候²⁸⁰，就立即规定对棉纺织品抽5%的关税，以鼓励本地工业。

为什么会这样，对曼彻斯特学派来说，完全是一个不解之谜。其实，这是显而易见的。

约在上个世纪中叶，英国是棉纺织工业的主要中心，由于对棉纺织品的需求急剧增长，那里自然就成了发明机器的地方，这些机器借助于蒸汽发动机，首先完成了棉纺织业的革命，接着完成了其他纺织业的革命。大不列颠大片的容易开采的煤田，由于采用了蒸汽，这时成了本国繁荣的基础。伸延很广的铁矿紧挨着煤田，便于制铁业的发展，而对发动机和其他机器的需要，更使制铁业获得了一种新的刺激。以后，在整个工业体系的这场革命中，发生了反雅各宾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约有25年，战争几乎把所有竞争国家的船只都从海上赶走，从而使英国的工业品在大西洋彼岸的所有市场和欧洲某些市场上获得了实际的垄断地位。当1815年和平恢复时，拥有使用蒸汽的工厂的英国，已经能够供应全世界，而其他国家当时还几乎不知道蒸汽机。在制造业方面，英国已远远走在它们

前面了。

但是和平的恢复,很快地促使其他国家也走上英国的道路。法国靠它的禁止性关税这道万里长城的庇护,采用了蒸汽进行生产。德国也这样做了,虽然它的关税率在当时远比任何其他国家(包括英国在内)都宽松。别的国家也都这样做了。同时,英国土地贵族为了提高地租,实施了谷物法²⁸¹,从而提高了面包价格,因此也提高了工资金额。尽管如此,英国的工业仍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到1830年,英国已经是竭尽全力要想成为“世界工厂”了。反谷物法同盟²⁸²所抱的目的就是使英国真正成为世界工厂。

在当时,并不隐讳取消谷物法追求的是什么目的。减低面包价格,从而减低工资金额,能使英国的制造商们抵抗邪恶的或愚昧的外国人的一切竞争的威胁。英国由于有巨大的机器优势、有庞大的商船队、有煤和铁,应当以工业品供应全世界,而作为回报,外国应当供应英国农产品:谷物、酒类、亚麻、棉花、咖啡、茶叶等等。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吗?天意如此,你若反对,就是完全违抗上帝的旨意。最多可以让法国供应英国和世界其他各地一些不能用机器制造的、而且是先进的厂主们根本不屑于理会的嗜好品和时髦品。那时,而且只有到那时,地球上才会有和平,人类才会和睦。那时,所有国家就会由贸易和互惠的亲密纽带联结起来,和平与富裕的时代将永远长存,他们对工人阶级、对他们的“人手们”说:“伙计们,好日子就要来到了,再稍等一会儿吧。”当然,“人手们”一直就这样等待着。

然而,当“人手们”等待的时候,那些邪恶而愚昧的外国人却没有等待。他们可看不出,要把英国暂时的工业优势变成确保它永远垄断全世界工业并让别的国家都沦为它的农业附庸(换个说法,就是沦

于爱尔兰那种非常令人羡慕的地位)的手段这样一种制度有什么美好。他们知道,任何一个民族,如果被剥夺了工业,从而沦为单纯是庄稼汉的集合体,就不能和其他民族在文明上并驾齐驱。因此他们就使私人的商业利益服从于民族的迫切需要,用高额的关税来保护他们新生的工业,这在他们看来是保障自己不沦于爱尔兰有幸所处的那种经济地位的惟一手段。

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在任何情况下这样做都是对的。相反地,法国如果大踏步地走向自由贸易,就会得到巨大的利益。德国工业的现状是在自由贸易之下达到的,而俾斯麦的新的保护关税不会损害别人,只会损害德国的工业家本身²³⁶。但是有一个国家,在那里,实行一个短时期的保护关税政策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绝对必要的,这就是美国。

美国正处在推广工业已成为全国的需要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上²⁸³。这一点可以由下列事实充分证明:在发明节约劳动力的机器方面领先的已不再是英国,而是美国。美国的发明每天都在取代英国的专利品和英国的机器。美国的机器输入英国,而且几乎是所有的工业部门。此外,美国拥有世界上精力最旺盛的人民,它的煤田和英国相比,英国的煤田就显得几乎等于零,它的铁和所有其他金属也很丰富。这样一个国家,经过20年左右短时期的保护关税政策,就可以使它的工业马上达到任何一个竞争者的水平,那么能设想它会让自己年轻的正在成长的工业去同根基久已牢固的英国工业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竞争吗?但是,曼彻斯特学派说,美国的保护关税制度只会使它自己吃大亏。这样说来,一个人如果多出车费坐一小时行驶50英里的特别快车,而不坐一小时行驶12英里的旧的廉价列车,就是使自己吃了大亏。

毫无疑问,当前这一代人会看到美国的棉织品在印度和中国跟英国的棉织品竞争,并逐渐在这两个主要市场上争得地盘;美国的机器和五金在世界各处(包括英国在内)和英国货展开竞争。佛兰德^①的制造业转移到荷兰,荷兰的制造业又转移到英国的这种无法改变的必然性,不久就会使世界工业中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而且,在剩给英国的有限的活动范围里,英国还会遇到几个大陆国家的强烈竞争。

英国工业垄断迅速衰落的事实已经不能再回避了。如果“先进的”资产阶级以为隐瞒这点对他们有利的話,就让工人阶级勇敢地正视这一事实吧!因为这件事对他们甚至比对那些“上等人”利害关系更大,那些人在一个长时期内也许依然是世界的银行家和放债人,正如在他们以前的威尼斯人和荷兰人在没落的时期那样。但是,当英国巨大的对外贸易开始每年缩减而不是增长时,“人手们”将会怎样呢?如果说把铁船制造业从泰晤士河移到克莱德河^②,就足以使伦敦东头整个陷于长期的赤贫状态,那么,要是英国所有的主要行业都真正移到大西洋彼岸,会给英国带来什么影响呢?

会给英国干一件大好事:把那条仍然把英国工人阶级同英国资产阶级拴在一起的链条的最后一环打断。这一环就是他们为该国的垄断所进行的共同工作。这一垄断一旦被粉碎,英国工人阶级将被迫谋求自身的利益、自身的解放,并且结束雇佣劳动制度。我们希望

① 原文 Flemish 是 Flanders(佛兰德)的形容词形式。佛兰德是旧地区名,位于今法国西北部和比利时西部,曾是欧洲毛纺织业中心之一。——编者注

② 苏格兰的一条大河。——编者注

他们不会一直等到那个时候。

弗·恩格斯写于 1881 年 6 月
中

作为社论载于 1881 年 6 月 18
日《劳动旗帜报》第 7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5 卷翻译

弗·恩格斯

两个模范市议会²⁸⁴

我们曾答应经常向读者介绍工人运动的情况，既介绍英国的也介绍外国的。迄今我们不时地得到一些来自美国的新闻，已向读者作了报道。今天我们又可以把一些法国的情况介绍给读者了。这些情况很重要，值得在我们的社论中加以讨论。

在法国，公众投票的方法没有像英国仍然采用的那么繁多。那里一律实行普选制和秘密投票，而不像在英国，议会选举是一套选举制度和投票方式，市镇议会选举是另外一套，教区委员会选举又是一套，如此等等。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法国成立²⁸⁵之时，就决定不仅在议会选举时提出工人候选人，而且在所有市镇选举时也提出工人候选人。在今年1月9日法国各市镇举行的最近一次换届选举中，这个年轻的党在很多工业城市和乡镇，特别是矿区，真的获得了胜利²⁸⁶。它不仅有一些个别候选人当选，而且在有些地方居然取得了市镇议会中的多数，至少有一个市议会（后面我们就要提到）完全由工人组成。

就在《劳动旗帜报》创办前不久，在紧靠比利时边界的鲁贝城发生了一次工厂工人罢工。政府立刻把军队开进了该城，同时借口维持秩序（其实秩序从未受到威胁），试图挑动罢工者做出一些能为军

队干涉提供口实的事。但是工人们却沉住了气,他们之所以能顶住一切挑衅,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市议会采取了行动。这个市议会的组成多数是工人。罢工一事被提到了市议会,并且经过了详细的讨论。结果,市议会不仅宣布罢工者的行为合理,而且还采取了实际措施,通过决议,给予罢工者 50 000 法郎,也就是 2 000 英镑的援助。这笔援款未能兑现,因为根据法国的法律,省长有权推翻市议会的任何被他视为越权的决议。尽管这样,市政机关此举给予罢工的有力的道义支持,对工人来说仍是最为宝贵的。

6月8日,法国中部(阿列省)科芒特里的采矿公司解雇了 152 名工人,因为他们拒绝服从更加对他们不利的新规定。这些新规定是一整套制度的一个部分,这套制度已经实行了一段时间,为的是逐步实行更苛刻的工作条件,所以全体矿工约 1 600 人宣布罢工。政府立即照例派军队去对罢工者进行威吓或挑衅。但是,这里的市议会也立刻行动起来,站在工人方面。在 6 月 12 日(而且还是星期天)的会议上通过了几项决议,内容如下:

一、鉴于社会有责任保证那些以自己劳动使所有人得以生存的人能够生存,鉴于这种责任在国家拒绝履行的情况下,市镇必须履行,本议会决定:在取得纳税额最高的居民们同意后,举债 25 000 法郎(1 000 英镑),用以接济因 152 名伙伴遭无理解雇而被迫罢工的矿工。

一致通过,只有市长一人反对。

二、鉴于国家把宝贵的国有资产——科芒特里的矿场售予一股份公司,从而也把在那里就业的工人之祸福置于该公司的掌握之中,因此国家有责任注意使公司对矿工们的压迫不得达到威胁他们生存的地步,然而国家却在当前罢工之际以军队供该公司支配,不但连保持中立也没有做到,而且还站到了公司一边,鉴于上述情况,本议会有责任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为此吁请专区区长:

(1)立即召回军队,因为毫无理由地派军队来此,纯系挑衅行为;

(2)进行干预,务使公司经理取消引起罢工的措施。

一致通过。

在也是一致通过的第三项决议中,市议会由于担心市镇的穷困,会使前面表决的举债一事落空,决定发起公开募捐以支援罢工工人,并呼吁法国所有其他市镇议会也为支援罢工工人而捐资。

这里的情况就向我们非常清楚地证明了,工人不仅参加议会而且还参加市镇机构以及其他一切的地方机构能带来什么好处。如果英国工人也得到本地市议会的支持,那么英国很多次罢工的结局会是怎样地不同啊!英国的市议会及地方的各种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工人投票选举出来的,而其成员目前却几乎全是雇主及其直接和间接的代理人(律师等等),在最好的情况下,是小店主。一旦发生罢工或同盟歇业,地方当局立刻动用自己的全部道义力量和物质力量来维护企业主,反对工人;就连由工人掏钱供养的警察也被用来干那些正是法国军队所干的事,即挑动工人采取非法行动,以便加以迫害。济贫法²⁸⁷的执行机关对那些在它们看来只要愿意干就还能够干活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拒绝给予救济。这也是自然的事。在工人们容忍之下组成地方当局的这班人,把罢工看作是对社会秩序的公开反叛,对神圣的所有权的践踏。因此,只要工人阶级还同意把企业主及其代表选入本地民选机构,那么每当发生罢工和同盟歇业时,地方当局总是会用它全部巨大的道义力量和物质力量支持企业主。

我们希望,法国这两个市议会的行动能使许多人睁开眼睛。难道要永远让人们说,而且还是针对着英国工人说,“这些事法国干得比他们好”吗?英国工人阶级有其历史悠久和力量强大的组织,长期

以来就享有政治自由,又有多年的政治活动经验,因此它比之大陆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人都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可是德国人能够把 12 个工人阶级代表送进了国会²⁸⁸,而且像法国那样,工人也在许多市议会中占多数。诚然,在英国,选举权是受到限制的,但是至今工人阶级在所有的大城市和工业区也是占人口的多数。只要他们愿意,这个潜在的多数就会立即变成一个有效的多数,变成国家中的一支力量,变成每个工人人口集中地区的一支力量。如果工人一旦进了议会、市议会、地方济贫委员会等等,那么,你们也有工人官员能把现在经常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道勃雷^①们手脚卡住的日子,还会太远吗?

弗·恩格斯写于 1881 年 6 月
下半月

作为社论载于 1881 年 6 月 25
日《劳动旗帜报》第 8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5 卷翻译

① 道勃雷是莎士比亚喜剧《无事烦恼》中的人物,是狂傲而昏庸的官吏的典型。——编者注

弗·恩格斯

美国食品和土地问题²⁸⁹

从 1837 年秋天以来,我们对于从纽约输入到英国来的金融恐慌和商业危机已经是见怪不怪了²⁹⁰。十年一次的工业骤衰,每两次中至少有一次肇始于美国。但是,如果说美国还应该推翻英国农业中由来已久的关系、彻底改变地主同随时可以令其退佃的佃农之间的古老封建关系、消灭英国的地租、把英国的农田变成一片荒芜,那么,这幅景象是要等到 19 世纪最后 25 年里才会出现的。

现在果然如此。美国西部大草原的处女地——现正施以耕作,不是一小片一小片,而是几千几千平方英里地耕作——目前已开始决定小麦的价格,并从而决定麦田的地租。旧有的土地没有能够比得过它的。那是一种极好的土地,地势平坦,或者稍有起伏,没有陡峭的岗峦阻隔,完全和第三纪海底慢慢淤积起来时的状态一样,没有石块、岩石和树木,适合于直接耕种而不需要做任何准备工作。用不着清理和排水,你只要犁它一遍就可以播种,可以连收二三十茬小麦而不用施肥。这是适合于最大规模耕作的土地,而且也正在以最大的规模来耕种。英国的农业家过去常拿他们的大农场来和大陆上自耕农的小农场对比而感到自豪。但是,美国大草原上的农场每个占地 4 万英亩甚至更多,可以说是由真正的军队来耕作的,人、马匹和

工具都像士兵一样有训练、有指挥、有组织，比起这样的农场来，联合王国最大的农场又算得了什么呢？

美国在农业上的这种革命，加上美国人所发明的革新的运输工具，使他们运往欧洲的小麦价格非常低廉，以致任何一个欧洲农场主都不能与之竞争，至少在他必须缴纳地租的时候是不行的。请看1879年当人们第一次感觉到这个问题时的情形。那一年整个西欧的收成都不好，英国的年景坏极了。然而，由于有美国的谷物，谷物价格差不多没有变动。年成坏而同时小麦价格又低，这种情况英国农场主还是第一次遇到。于是农场主开始着急了，地主感到惊恐了。第二年，收成好了些，价格跌得更厉害。谷物的价格，现在是由在美国的生产成本加上运费决定的。而且，随着更多的草原土地转为农田，这种情况将一年比一年加剧。而耕作所需要的农业大军，都是我们自己从欧洲输送去的移民。

以前，农场主和地主总还能得到一种安慰：如果谷物无利可图，肉类会有利可图的。耕地变成了牧场，万事又如如意了。但是，现在那条出路也被截断。美国肉类和美国家畜运来的数量在日益增加。不仅如此。至少还有两个大的出产家畜的地区，正在想方设法把它们现在白白放在那里的大量过剩的肉类运到欧洲，特别是运到英国。从科学的现状及其在应用上的突飞猛进来看，我们可以肯定，最迟也等不了几年，澳洲和南美的牛羊肉，就会保藏得很妥善地大量运过来。到那时，英国农场主的兴旺，英国地主那卷长长的收租账单，还会保得住吗？种植鹅莓、草莓这一类东西倒很不错，不过，市场上这一类东西供应得已经够多了。没有疑问，英国工人还可以多多地消费这种美食——但是，要先增加他们的工资。

几乎不用说，这种新的美国农业竞争的影响，欧洲大陆也感受到

了。那些小自耕农大多深深陷于典押债务之中,他们不像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农场主那样缴纳地租,而是支付利息和诉讼费。他们对美国这种竞争感受同样沉重。美国竞争的特殊作用就是,它不仅使大地产成为无用,而且也使小地产成为无用,因为它使两者都无利可图了。

也许有人会说,像目前美国西部所实行的这种耗尽地力的制度,是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的,事情一定还会好转。当然不可能永远如此。但是地力未耗尽的土地还多得很,足以使这一过程再继续一个世纪。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地区也表现出类似的优势。有整片的南俄大草原,商人实际上已经在那里买了土地,并做了同样的事情。有阿根廷共和国广大的草原,还有其他地方。所有这些土地,都同样适合于现代这种大农业与廉价生产的制度。因此,这种制度,在它衰亡以前,还将存在很长一个时期,至少足以把欧洲所有的大小地主毁灭两次以上。

那么,所有这一切的结局将怎样呢?结局将是而且一定是:我们只好实行土地国有,土地由合作社在全民监督下耕种。到了那时,而且也只有到了那时,土地耕作才会重新使耕作者和全国都获得利益,不管美国或任何别国的谷物和肉类价格怎样。如果那时地主们真要去美国的话(他们似乎有这种意向),那我们就祝他们一路平安。

弗·恩格斯写于 1881 年 6 月
底

作为社论载于 1881 年 7 月 2 日
《劳动旗帜报》第 9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5 卷翻译

弗·恩格斯

反谷物法同盟的工资理论²⁹¹

在另一栏里,我们发表了约·诺布尔先生的一封来信,这封信是指责我们在6月18日《劳动旗帜报》社论^①中的一些论点的。当然,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社论栏变成争论历史事实或经济理论问题的场所,但是,我们还是愿意破例对这位先生作一次答复,因为他虽然在官方政党里担任职务,但显然还是真诚的。

我们说,废除谷物法²⁸¹的目的是为了“减低面包价格,从而减低工资金额”。诺布尔先生反驳说,这是反谷物法同盟²⁸²不懈地与之斗争的“保护关税论者的谬论”,并从理查·科布顿的演说和同盟总会的一篇宣言中援引了一些话作证明。

社论的作者那时住在曼彻斯特,是一位厂主²⁹²,他的周围也都是厂主。他当然十分清楚地知道同盟的正式理论的内容。把它化为最简短和最为一般所公认的表达(因为各种各样的说法很多),就是这样:取消谷物的关税将增加英国同外国的贸易,将直接增加英国的输入,作为交换,外国主顾将购买英国的工业品,从而增加对英国工业品的需求;那么,在英国,对工业劳动人口的劳动的需求也将增加,

^① 见本卷第502—507页。——编者注

因此工资也一定会提高。由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这种理论,这个同盟的正式代表们,别看他们是些浅薄的经济学家,最后竟得出了一个惊人的论断:工资的涨落不是和利润成反比,而是和食物的价格成反比;面包贵工资就低,面包贱工资就高。这样,在谷物关税取消以前和以后都存在的十年一次的营业骤衰,就被该同盟的代言人宣布为纯粹是谷物法的影响,只要这些可恨的法律一取消,它就必然消失。他们宣称,谷物法是英国厂主和那些渴望他们产品,因缺乏英国布匹而衣不蔽体、冻得发抖的可怜的外国人之间的惟一巨大障碍。所以,科布顿在诺布尔先生所援引的那段话里真的提出,1839年到1842年的营业萧条和工资下降,乃是那几年谷价太高的结果。其实那不过是至今极有规则地每十年重复一次的正常的营业萧条阶段之一,那一次肯定是由于歉收、由于贪婪的地主用立法手段进行愚蠢的干预而拖长和加剧了。

科布顿所提出的就是他的正式理论。他尽管具有十足的鼓动家的才智,但却是一个不高明的实业家和浅薄的经济学家;他当时无疑是笃信他的理论的,就像诺布尔先生直到今天还相信它一样。但是,同盟的大部分人都是务实的实业家,他们比科布顿更加关心做生意,并且一般说来也比他做得更成功。对这些人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当然,在外人面前以及在公开集会中,特别是在他们的“人手们”面前,这种正式理论一般是被当作“一回事”的。但是实业家在一心想做生意时,通常不对顾客说真话,如果诺布尔先生抱有不同的看法,那他最好远离曼彻斯特交易所。只要稍微追问一下,工资因谷物自由贸易而必然提高究竟是什么意思,就可以得到这样的解释,即这种提高是指表现为消费品的工资的提高,很可能工资金额并不会提高——然而这实际上不是提高了工资吗?当你进一步追究一下这个

问题时，得到的解释往往是，工资金额甚至可能下降，而这个减少了的金额却还能使工人生活得比未减少时更舒适。如果你对于通过什么才能达到所期望的贸易大发展再提出几个更进一步的问题，你马上会被告知，他们主要就是指望碰上最后这样一种好运气：工资金额减少，同时面包等等的价格下降，而后者的下降又足以抵偿前者的减少且有余裕。还有许多人甚至毫不掩饰他们的看法：要求廉价的面包，干脆就是为了降低工资金额，从而给外国竞争以迎头痛击。这实际上就是占同盟多数的大部分厂主和商人的目的和宗旨，任何惯于同商人打交道，因而也惯于不总是把他们的话当作真话的人，都不难看出这一点。这是我们过去讲过的，现在再把它重复一遍。关于同盟的正式理论，我们过去只字未提过。从经济学来看，那是一种“谬论”，从实践来看那不过是用以掩盖自私目的的外衣，虽然同盟的某些领袖可能由于老是重复这种理论而最后自己也相信了。

很有趣的是，诺布尔先生援引了科布顿的话，说工人阶级因看到谷物每夸特 25 先令的前景而“满意地拍手叫好”。工人阶级那时并不轻视廉价的面包；但是，他们对于科布顿及其同伙的所作所为是太“满意”了，以致在以前的几年中，他们使同盟在整个北方连一次真正公开的大会都没能举行。在 1843 年，作者曾经“满意地”参加过同盟最后一次企图在索尔福德市政厅召开的这样的大会，并看到只是由于提出了一项支持人民宪章²⁷⁴的修正案会议就差一点开不下去。从此以后，同盟的一切会议都规定要“凭票入场”，而这个票决不是每人都能得到的。自那时起，“宪章派的捣乱”停止了。工人群众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证明同盟并不像它所声称的那样是代表工人的。

最后,再简单谈一谈同盟的工资理论。商品的平均价格与商品的生产成本相等,供求的作用在于使它回到这个标准上来,它就是围绕着这个标准摆动的。如果一切商品都是这样,那么劳动(或者更严格地说,劳动力)这种商品也是这样。因此工资额是由工人日常必须消费的那些商品的价格决定的。换句话说,如果其他一切情况保持不变,工资是随着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而涨落的。这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规律,所有的佩罗内特-汤普森、科布顿和布莱特之流,都永远反对不了这个规律。然而其他一切情况并不是始终不变的,所以这个规律的作用,实际上因其他经济规律同时发生作用而有所减弱,显得模糊不清,有时甚至要花费一些力气才能察觉其踪迹。反谷物法同盟时期以来的那些起着庸俗化作用的庸俗经济学家就以此为借口,说什么首先是劳动,其次是一切其他的商品,都没有真正的可以确定的价值,只有一个上下波动的价格,这种价格受供求的调节,而同生产成本没有多大关系;并且说,要提高价格,因而也包括提高工资在内,除增加需求外,没有别的办法。这样一来,就排除了工资额和食品价格之间的令人不愉快的联系,而且可以把这一点归结为下面的拙劣而可笑的理论大胆地加以宣布,即面包贵工资就低,面包贱工资就高。

也许诺布尔先生要问,在今天面包贱的时候,工资难道不是普遍地像1847年以前面包因谷物税而贵的时候一样高,或者甚至更高吗?这要经过长时间的调查才能回答。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哪一个工业部门生意兴隆,同时工人又有坚强的组织保卫自己,那里工人的工资一般都没有下降,有时或许还提高了。这不过证明从前付给这些工人的工资过低。哪一个工业部门营业衰落,或者工人没有组成坚强的工联,那里工人的工资就一定下降,往往降到挨饿的地步。

请到伦敦东头去亲眼看看吧!

弗·恩格斯写于 1881 年 7 月
初

作为社论载于 1881 年 7 月 9 日
《劳动旗帜报》第 10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5 卷翻译

弗·恩格斯

工人政党²⁹³

朋友们和同情者们向我们不知提出过多少次这样的警告：“要远远躲开政党政治啊！”就目前英国的政党政治来说，他们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一个工人组织，既不能有辉格党性质，也不能有托利党性质；既不能有保守党性质，也不能有自由党性质，甚至也不能有真正政党意义上的激进派性质。保守党人、自由党人、激进派²⁹⁴，都只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代表在地主、资本家和零售商中占优势的各式各样的意见。如果他们真的来当工人阶级的代表，那他们肯定无疑当的是歪曲代表。工人阶级有其本身的利益，既有社会的也有政治的。他们怎样维护他们认为是自己的社会利益的东西，这从工联的和缩短工作日运动的历史中已经可以看到。但是，他们的政治利益，却几乎完全交给了托利党人、辉格党人和激进派这些上层阶级的人物。差不多有四分之一世纪，英国工人阶级好像是甘愿充当“伟大的自由党”的尾巴。

这种政治地位，是和欧洲组织得最好的工人阶级不相称的。在其他国家，工人要活跃得多。在德国，工人政党（社会民主党人）已经存在十多年了，它在国会中占有10个席位，它的成长吓得俾斯麦采取了臭名昭彰的镇压手段，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另一栏里

谈到^①。但是,不管俾斯麦怎样,这个工人政党在稳步前进。就在上星期,它在曼海姆市议会选举中取得了16席,在萨克森议会选举中取得了1席。比利时、荷兰和意大利,也都仿效德国人的榜样。在这些国家里,都有工人政党,虽然这些国家过高的选民资格使它们目前还没有可能把自己的成员派到立法机关去。在法国,工人党的组织工作目前正在全面展开。在最近的选举中,它已经在几个市镇议会里取得了多数,在今年10月的大选中无疑地将在众议院取得几个席位。甚至在美国,虽然从工人阶级转变成农场主、商人或者资本家还比较容易,工人也认为需要把自己组成一个独立的政党。工人到处都在为取得政治权力、为取得本阶级在立法机关中的直接代表权而斗争,到处都是这样,只有大不列颠例外。

然而,在英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普遍地感到,老的政党注定要灭亡,老的套语变得没有意义了,老的口号已被推翻,老的万应灵丹已经失效了。各个阶级的有思想的人,开始看到必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只能是走向民主制的道路。但是在英国,工业和农业的工人阶级占人民的绝大多数,民主制恰恰意味着工人阶级的统治。那么,就让英国工人阶级自己准备去担负它所面临的任务,去统治这个大帝国吧,让他们了解必然要落到他们肩上的责任吧。要做到这点,最好的方法是利用已经掌握在他们手里的力量,利用他们在王国各大城市中拥有的实际多数,把自己队伍中的人派到议会里去。按照目前的户主选举法²⁷⁶,要派遣四五十个工人到圣斯提芬^②

① 见本卷第524—527页。——编者注

② 暗指英国议会下院。圣斯提芬是威斯敏斯特宫里的一个小教堂,1547—1834年曾是下院开会的场所。——编者注

去是很容易的,那里确实非常需要输入新鲜的血液。只要有这样一个数目的工人参加议会,就不可能让爱尔兰土地法案²⁷²像目前这样越来越变成爱尔兰土地笑话^①,也就是说变成爱尔兰地主补偿法案;重新分配议席、切实惩治贿赂、像英国以外任何国家那样由国库负担选举费用——对诸如此类的要求,要加以抗拒也就办不到了。

此外,在英国只有工人的政党才可能是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党。其他阶级的开明人士(那样的人在那些阶级里不像人们要我们相信的那么多)可以加入这个党,在表明自己的真诚以后,甚至可以在议会里代表这个党。这在各地都是如此。例如,在德国,工人的代表并不是在每一场合下都是真正的工人。但是,任何民主的政党,无论在英国或在其他任何国家,除非具有鲜明的工人阶级性质,否则就不能取得真正的成就。抛弃这种性质,就只有宗派和欺骗了。

这在英国甚至比在外国更符合实际情况。自从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工人政党即宪章派瓦解以来,激进派的欺骗不幸是够多的了。是的,宪章派瓦解了,而且什么也没有干成。果真如此吗?在人民宪章的六点中,有两点,即秘密投票和取消财产资格限制,现在已经成为国家的法律了。第三点即普选权,在户主选举法的形式下至少是已经接近实现了。第四点即平等的选区,显然即将见诸实现,因为这是现政府答应的一项改革。所以,宪章运动²²⁹瓦解的结果却足足实现了宪章派纲领的一半。如果说,仅仅对于工人阶级过去的一个政治组织的回忆,就能导致这样一些政治改革,而且除此以外还导致了一系列社会改革,那么,一旦真的有了一个以四五十个议会代表为后盾

① 英文“bill”(法案)与“bull”(自相矛盾,荒唐可笑)的发音相近。——编者注

的工人政党,结果又将如何呢?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人都得由自己来照管自己的世界里。但是英国工人阶级却让地主、资本家、零售商等阶级及其尾巴——律师、新闻记者等等来照管它的利益。难怪有利于工人的改革进行得这样缓慢,这样可怜地一点点地实现。英国工人只要愿意,他们就能以主人的身份去实现他们的处境所要求的每一项改革,不论是社会的还是政治的。那么,何不努力干起来呢?

弗·恩格斯写于 1881 年 7 月
中

作为社论载于 1881 年 7 月 23
日《劳动旗帜报》第 12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5 卷翻译

弗·恩格斯

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²⁹⁵

英国资产阶级报纸最近对俾斯麦及其爪牙施加于德国社会民主工党^①党员的残暴行为,保持极端的沉默。只有《每日新闻》在某种程度上是惟一的例外。从前,每当外国的专制政府大施淫威残害自己的臣民时,英国的日报和周刊就大声疾呼,真是激烈得很。但是这一次受迫害的是工人,而且他们都以称为工人而自豪;“上流社会”、“贵族社会”的新闻代表隐瞒真相,而且就其顽固的沉默态度来看,简直好像是赞成这种暴行。真的,政治关工人什么事?还是让“高等人”去管吧!英国报纸的沉默还有另一个原因,这就是:要谴责俾斯麦的高压法令及其执行方式,同时又要维护福斯特先生在爱尔兰的高压措施²⁹⁶,很难办到。这是一个很痛的痛处,是碰不得的。我们不大可能指望资产阶级报纸会自己指出,现政府在爱尔兰的所作所为,使英国在欧洲和美洲的道义威望降低到了何种程度。

在每次大选中,德国工人党得的票数都在迅速增加。在上上次大选中,它的候选人得了50多万张选票,而在上次大选中,得到了

① 当时德国工人政党的正式名称,该党有时被简称为工人党或社会民主党。——编者注

60 多万张选票²⁹⁷。柏林有两人当选, 埃尔伯费尔德-巴门有一人, 布雷斯劳、德累斯顿各有一人; 尽管政府同自由主义的、保守的和天主教的政党结成了大同盟, 尽管所有其他政党异口同声归罪于工人党的两次谋刺皇帝¹⁵⁴事件引起了一片叫嚣, 工人党还是赢得了 10 个席位。随后, 俾斯麦通过了一项法令¹⁹⁶, 宣布社会民主党为非法。50 多家工人报纸被查封, 工人的团体和俱乐部被解散, 他们的基金被没收, 他们的集会被警察驱散, 尤有甚者, 竟然有这样的规定: 整个的城市和整个的地区都可以被“宣布戒严”, 就像在爱尔兰那样。但是, 甚至英国的高压法在爱尔兰从来不敢做的事情, 俾斯麦在德国也做出来了。在每个“被宣布戒严的”地区, 警察授权把他们“有理由怀疑”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任何人驱逐出境。柏林自然马上就被宣布戒严, 于是有数以百计的人(连他们的家属在内, 数以千计)被驱逐。因为普鲁士警察总是驱逐有家属的人, 而对未婚的青年一般是不去管的。对于未婚的青年, 驱逐不是什么严重的处罚, 但是对于当了一家之长的人来说, 在大多数情形下, 即使不是彻底的毁灭, 也是一场长期的磨难。汉堡选举了一名工人^①当国会议员, 于是马上就被宣布戒严。第一批从汉堡被驱逐的大约有 100 人, 另外还有他们的家属 300 多人。工人党在两天以内为他们筹妥了旅费, 解决了其他的急需。现在, 莱比锡也被宣布戒严, 惟一的借口是, 政府不这样做, 就不能摧毁党的组织。第一天被驱逐的就有 33 人, 大部分是有家属的已婚男子。名单上的前 3 名都是德国国会议员。也许狄龙先生会给他们去一封贺信, 因为他们的处境还不像他自己的那样坏。²⁹⁸

但这还不是全部。工人党一旦被正式宣布为非法, 并被剥夺了

① 乔·威·哈特曼。——编者注

其他德国人应该享有的一切政治权利,警察就可以对该党的每个党员任意处置了。在搜查违禁出版物的借口下,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受到最无礼和野蛮的对待。至于他们本身,警察想什么时候逮捕就逮捕,一星期一星期地拘押,非要在监狱里关上几个月才能释放。警察发明了刑法典中所没有的新罪名,而刑法典也被无限地加以引申。警察经常可以找到够腐败或够疯狂的行政官和审判官来给他们当助手,做帮凶。升官晋级就是以这种代价得来的!所有这一切造成了怎样的结果,从下列惊人的数字可以看出。1879年10月到1880年10月一年内,单单在普鲁士,以叛国、叛逆、侮辱皇帝等罪名被捕入狱的就不下1 108人,以政治诽谤、侮辱俾斯麦或诬蔑政府等罪名被捕入狱的不下10 094人。11 202个政治犯,这甚至超过了福斯特先生在爱尔兰的丰功伟绩哩!

俾斯麦用他的这一切高压手段得到了什么呢?正如福斯特先生在爱尔兰所得到的一样。社会民主党像爱尔兰土地同盟²⁹⁹那样蓬勃发展,拥有同样牢固的组织。几天以前举行了曼海姆市议会选举。工人阶级的政党提出了16名候选人,他们以几乎是三比一的多数全体当选。此外,代表德累斯顿的德国国会议员倍倍尔,作为莱比锡选区的议员候选人,参加了萨克森议会竞选。倍倍尔本人是一位工人(旋工),如果不能说他是德国最优秀的演说家,那也是最优秀的演说家之一。为了阻挠他当选,政府驱逐了他的整个竞选委员会。结果怎样呢?结果是,虽然选举权是受到限制的,倍倍尔还是以绝大多数票当选了。可见,俾斯麦的高压手段对他丝毫没有用处,相反,却激怒了人民。那些被剥夺了保卫自己权利的一切合法手段的人,总有一天会采取非法手段,没有人能指责他们。格莱斯顿先生和福斯特先生不总是宣扬这种理论吗?而他们现在在爱尔兰又是怎样干

的呢？

弗·恩格斯写于 1881 年 7 月
中

作为社论载于 1881 年 7 月 23
日《劳动旗帜报》第 12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5 卷翻译

弗·恩格斯

致《自由》编辑部³⁰⁰

1881年7月22日

致《自由》编辑部

有人^①从美国给我介绍了一位诺里斯·A.克洛斯先生,《纽约星报》驻爱尔兰记者,这位先生写信给我说:

如果莫斯特先生愿意向纽约公众作某种声明,我很乐意为他提供这种机会。^②

对此,我答复他说:

如果您想要和莫斯特先生建立联系,您可以按伦敦西区托登楠大院路252号的地址给《自由》编辑写信,他会告诉您在目前情况下有没有这种可能。^②

① 泰奥多尔·弗里德里希·库诺。——编者注

② 这两段话是直接引用的信的原文,原文为英文,未加引号。——编者注

特此奉告。

忠实于您的 弗·恩·

弗·恩格斯写于 1881 年 7 月
22 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35 年俄文第 1
版第 27 卷

原文是德文和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5 卷翻译

弗·恩格斯

棉花和铁³⁰¹

棉花和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两种最重要的原料。哪个国家在棉织品和铁制品生产方面占首位，一般也就在工业国中居于首位。由于英国的情况正是这样，而且只要情况不改变，英国将总是世界第一工业国。

这样，人们满可以认为英国棉纺织业和制铁业工人的生活一定非常好，以为既然英国统治了市场，这些商品的贸易该总是很兴旺的，料想至少在这两个工业部门，在鼓吹自由贸易的那个时期所许诺的富足的千年王国²⁸一定是实现了。不幸！我们都知道，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在这里，也同在其他行业中一样，如果说工人的状况没有恶化，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有所改善，那完全是由于他们自己的努力，由于坚强的组织和艰苦的罢工斗争。我们知道，在1874年前后短暂的几年繁荣时期以后，棉纺织业和制铁业彻底崩溃了³⁰²。工厂关闭，高炉停火，继续生产的，一般也都缩短了开工时间。这种崩溃时期以前也有过，平均每十年重复一次；每次都延续到被新的繁荣时期所代替为止，如此循环往复。

但是，目前这个萧条时期，特别是在棉纺织业和制铁业中表现出来的特点是：持续的时间比一般延长了几年。曾经有过几次复苏的

尝试,几次跃跃欲起,但是全都无效。虽说真正崩溃的阶段已经闯过,营业状况却还是疲软无力,而市场依旧不能吸收全部产品。

这里的原因是,在我们目前这种不仅用机器制造产品而且还用机器制造机器的制度下,生产能够奇迹般地迅速增加。如果工厂主愿意的话,可以毫无困难地仅用一个繁荣期,就使棉纺织机械和棉织品的漂白、印染设备增长到能够多生产 50% 以上产品的程度,把生铁和各种铁制品的全部产量增加一倍。实际的增长却没有达到那种程度,但已经远非过去历次扩大生产时期所能比拟的了,其结果就是慢性的生产过剩、慢性的营业萧条。企业主还可以等着瞧,他们等得起,至少可以等上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而工人却只有忍受痛苦,因为他们来说,这意味着长期贫困,随时有进习艺所²⁶⁶的可能。

这就是无限制竞争的光辉制度的结果,这就是科布顿、布莱特之流许诺的千年王国的实现! 这就是工人所要经受的磨难,只要他们还像在过去 25 年所做的那样,把掌握帝国经济政策之权交给他们的“天然领袖”,交给托马斯·卡莱尔所说的那些被赋予指挥本国工业大军之使命的“工业司令官”^①。真是工业司令官! 同他们相比,1870 年路易-拿破仑的将军们都是天才了。所有这些自命的工业司令官都相互争斗,各人只顾自己的私利,增加自己的机器设备而不管他的邻居在做什么,最后他们都大吃一惊地发现造成了生产过剩的后果。他们不可能联合起来调节生产,他们只能为了一个目的而联合起来,那就是压低他们的工人的工资。这样,由于不顾一切地把本国的生产力扩大得远远超过市场的吸收能力,他们就剥夺了工人的

① 托·卡莱尔《过去和现在》1843 年伦敦版第 361—369 页和《当代评论》(一)当前的时代》1850 年伦敦版第 42 页。——编者注

相对说来比较好过的生活,以使自己的收入达到平均水平。而这种相对好过的生活本来是一个中等繁荣时期应该给予工人的,也是经过一个很长的崩溃时期之后工人有权要求的。工厂主作为一个阶级,再也没有能力管理本国巨大的经济事业,甚至连生产过程本身都没有能力管理,这难道还不能理解吗?英国工人的最大敌人竟是他们自己双手的不停增长的生产能力,这虽然是事实,但难道不是荒唐的吗?

然而,还有另一个事实应当考虑。不只是英国的工厂主在提高自己的生产力。其他国家也是这样。现有的统计材料还不允许我们把各先进国家的棉纺织业和制铁业分别地加以比较。但是在整个纺织工业、采矿工业和金属工业方面,我们可以利用普鲁士统计局局长恩格尔博士在他的《Das Zeitalter des Dampfs》(《蒸汽时代》1881年柏林版)^①一书中提供的材料,列表进行比较。根据他的计算,这些工业部门在下列国家中使用的蒸汽机总马力(1马力等于在1秒钟内将75公斤重量提到1米高所需的力)如下:

	纺织工业	采矿工业和金属工业
英国 1871 年·····	515 800	1 077 000 马力
德国 1875 年·····	128 125	456 436 "
法国·····	约 100 000	185 000 "
美国·····	约 93 000	370 000 "

由此可见,英国的三个主要竞争国所使用的总的蒸汽动力,在纺织工业方面是英国的五分之三,而在采矿和金属工业方面几乎同它

^① 恩·恩格尔《从技术和统计说明蒸汽时代》1881年柏林版,下文中的表格是根据该书第178、180、182—184页上的统计材料制成的。——编者注

相等。既然这些国家的工业发展速度远远超过英国,它们的产量加在一起,不久就会超过英国,这是不会有什么疑问的。

再看下表,这是在生产中所使用的蒸汽马力(火车机车和轮船的发动机除外):

马力

大不列颠·····	约 2 000 000
美国·····	约 1 987 000
德国·····	约 1 321 000
法国·····	约 492 000

这个表更清楚地说明,英国在使用蒸汽的工业方面还保留着的垄断是多么微不足道,自由贸易对于保持英国工业的优势是多么不顶用。请不要说,外国工业的这种进展是人为的,是保护关税政策造成的。德国工业的巨大扩展,全部是在最自由的自由贸易制度下完成的。如果说,美国主要由于荒谬的国内消费税³⁰³制而被迫采取一种与其说是真正的、不如说是表面的保护关税政策,那么,只要废除这种消费税法令就足以让它能在自由市场上竞争了。

这就是曼彻斯特学派¹⁹的学说历时 25 年几近绝对的统治给这个国家造成的处境。我们认为,既然结果是这样,曼彻斯特和伯明翰的绅士们就应该迅速让位,在下一个 25 年中让工人阶级来干一干。工人阶级肯定不会管理得比他们差。

弗·恩格斯写于 1881 年 7 月底

作为社论载于 1881 年 7 月 30 日《劳动旗帜报》第 13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25 卷翻译

弗·恩格斯

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³⁰⁴

常常有人问：社会上不同的阶级，在什么程度上是有用的或者甚至是必要的呢？回答自然因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而不同。无疑，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土地贵族是社会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和必要的成分。不过，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然后又有一个时期，资本家中等阶级——法国人把它叫做 *bourgeoisie* [资产阶级]——以同样不可避免的必要性产生了，它与土地贵族进行斗争，摧毁他们的政权，自己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取得了统治。但是，自从阶级产生以来，从来没有过一个时期社会可以没有劳动阶级。这个阶级的名称、社会地位有过变化，农奴代替了奴隶，后来本身又被自由工人所代替，所谓自由，是摆脱了奴隶地位的自由，但也是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自由。然而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无论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什么变化，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可见，这个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要的，虽然定会有一天它将不再是一个阶级，而是包括整个社会。

那么现在，这三个阶级各自的存在的可能性如何呢？

土地贵族在英格兰至少在经济上是无用的，而在爱尔兰和苏格兰，由于其本身的灭绝居民的倾向，它已经成为地地道道的祸害了。

把人民驱往大洋彼岸或让他们饿死,以羊或鹿来代替他们,这就是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地主们可以自夸的全部功德。只要美国蔬菜和肉类的竞争稍微再加强一些,英格兰的土地贵族也会这样做,至少那些能够这样做的人,即在城市里有大房地产作后盾的人将这样做。至于其余的人,美国食品的竞争将会很快地替我们清除掉。这样清除掉很好,因为他们的政治活动,不管在上院或下院,都纯粹是国家的祸害。

但是,资本家中等阶级,这个建立了不列颠殖民帝国、树立了不列颠自由的开明自由主义阶级怎样呢?这个实行了1831年议会改革³⁰⁵、废除了谷物法²⁸¹并且减低了一种又一种捐税的阶级怎样呢?这个创建了而且仍然指挥着英国的大工厂、大商船队和日益扩大的铁路网的阶级怎样呢?肯定无疑,这个阶级至少同它指挥并领导着不断进步的工人阶级是一样必要的。

资本家中等阶级的确是履行了如下的经济职能:创立现代蒸汽工业和蒸汽交通的体系,打破一切延缓或妨碍这个体系发展的经济和政治障碍。没有疑问,只要资本家中等阶级还执行着这种职能,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是一个必要的阶级。但是,现在它还是那样吗?它还在继续履行它作为造福于全社会的社会生产的管理者和扩大者的重要职能吗?让我们来看一看吧。

先看交通工具,我们看到,电报是在政府手里。铁路和大部分远洋轮船的所有者都不是亲自经营业务的单个资本家,而是股份公司,公司的业务则是由领工资的雇员,由实际上处于工资较高的高级工人地位的职员代为经营。至于说到董事们和股东们,他们都知道,前者干预业务管理越少,而后者干预业务监督越少,则对企业就越有利。松懈的而且多半是虚应故事的监督,事实上,是留给企业所有者

的惟一职能。由此,我们看到,这些大企业的所有者资本家,实际上没有别的事可做,只是把半年一期的息票兑换成现款而已。资本家的社会职能在这里已经转移给领工资的职员,可资本家还是以股息的形式继续把这些社会职能的报酬装进自己的腰包,尽管他已经不执行这些职能了。

倒是还有一个职能留给由于上述大企业的规模太大而被迫从业务管理中“引退”的资本家。这个职能就是拿着他们的股票到交易所去投机。因为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我们那些“引退了的”或者实际上被取代了的资本家们,便到这个财神庙里赌个痛快。他们到那里是存心去捞钱,却假装说去挣钱。而且他们还要说,一切财产的来源都是劳动和俭省。说劳动和俭省是财产的来源也许还可以,但决不能说是财产的结果。强行封闭小赌场,而在同时,我们的资本家社会却不能没有一个输赢以几百万、几百万计的巨大赌场作为它的真正中心,这是何等的虚伪啊!在这里,这种“引退了的”握有股票的资本家的存在,确实不仅变得多余,而且成了一个十足的祸害。

铁路和轮船运输业中的真实情况,也日益成为一切大工商企业中越来越真实的情况了。“开公司”——把大的私人企业改为有限公司——是近十多年来的流行现象。从伦敦城的曼彻斯特大货栈起,到威尔士和北英格兰的铁工厂和煤矿以及兰开夏郡的工厂,全都已经或正在变成公司。在奥尔德姆全城,差不多已经没有一个棉纺织厂留在私人手里了,而且连零售商人也日益为“合作商店”所代替,不过,其中大多数也只是名义上的合作商店而已——关于这一点,我们另外再谈。由此可见,由于资本家的生产体系本身的发展,资本家也完全和手织机工人一样被取代了。不过有一点不一样:手织机工人注定要慢慢饿死,而被取代的资本家却注定要慢慢撑死。但有一点

他们一般说来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才好。

因此,结果就是:我们现实社会的经济发展,越来越趋于集中,趋于生产的社会化,使生产成为不能再由单个资本家来管理的大企业。只要企业达到一定规模时,什么“企业主的眼光”,什么这种眼光所创造的奇迹,立刻就变成纯粹的胡说。想像一下伦敦和西北铁路的“企业主的眼光”吧!但是企业主不能做的事情,工人、公司中领工资的职员却能做而且做得很成功。

因此,资本家再也不能把他所要求取得的利润说成是“进行监督的工资”了,因为他什么也没有监督。当资本的辩护人向我们耳中大灌此种站不住脚的辞令时,我们要记住这一点。

但是在我们的前一号周报^①里,我们已经试图说明:资本家阶级也已经变得没有能力管理本国巨大的生产体系了,他们一方面扩大生产,以致周期地以产品充斥一切市场,而另一方面,又越来越无力抵御外国的竞争。由此我们看到,不单单是我们不要资本家阶级干预就能够把本国的大工业管理得很好,而且他们的干预越来越成为一种祸害了。

我们再一次对他们说:“走开!让工人阶级来干一干吧!”

弗·恩格斯写于 1881 年 8 月
初

作为社论载于 1881 年 8 月 6 日
《劳动旗帜报》第 14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5 卷翻译

① 见本卷第 530—533 页。——编者注

弗·恩格斯

* 在燕妮·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草稿³⁰⁶

我们肃立于其墓前的这位心地高尚的女性,1814年生于萨尔茨韦德尔。此后不久,她的父亲冯·威斯特华伦男爵,被任命为特里尔的政府顾问,在那里他同马克思一家结下了亲密的友谊。两家的孩子在一起长大。当马克思进大学的时候,他和自己未来的妻子就已经知道,今后他们的命运将是不可分的。

1843年,在马克思以旧《莱茵报》编辑身份第一次在社会上崭露头角和该报被普鲁士政府查禁以后,他们结婚了。从这一天起,燕妮不仅和她的丈夫共命运、同辛劳、同斗争,而且是以高度的自觉和炽烈的热情积极投身其中。

新婚夫妇前往巴黎,起初是自愿侨居,很快就成了强制流亡。甚至在巴黎,普鲁士政府也迫害马克思。必须遗憾地指出,像亚·洪堡这样的人竟卑鄙到参与促使路易-菲利浦政府把马克思驱逐出法国。全家搬到了布鲁塞尔。后来发生了二月革命。当这一事件在布鲁塞尔引起动荡的时候,比利时警察局不仅逮捕了马克思,还一定要把他的妻子也监禁起来,而且连个表面上的借口也没有。

1848年的革命热潮,第二年就衰落了。接着又一次被驱逐,起初再次到巴黎,后来由于法国政府再次干涉,便迁到伦敦。这一次真

正是苦难重重的流亡。流亡者通常遭遇到的苦难,她都经受得住,尽管这种苦难使她失去了三个孩子——其中包括她的两个男孩。但是,一切政党,不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封建派、自由派和所谓民主派——都串通一气反对她的丈夫,对他大肆进行最卑鄙的毫无根据的诬蔑;所有报刊无一不将他拒之门外;他在他俩极端蔑视的敌人面前孤立无援,无法自卫——这一切才是使她最为痛心的事情。而且这种情况继续了多年。

但也并非永远如此。渐渐地,欧洲的工人阶级所处的政治环境终于使这个阶级有了**某些**活动余地。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了。它把文明国家一个接一个地吸引到斗争中来。在这个斗争中站在最前列的就是她的丈夫。她所经受过的许多苦难得到补偿的时候开始了。她生前终于看到:倾泻在她丈夫头上的那些卑鄙诬蔑烟消云散了;她生前终于得知:各国反动派——封建派,甚至还有所谓民主派——费尽心机企图扼杀的她丈夫的学说,在一切文明国家用一切文明语言公开地胜利地传播开了。她生前终于看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席卷了一个又一个国家,从俄罗斯到美洲,昂首阔步,充满胜利信心地前进。在她临终前最后使她感到欣慰的一件事情是:德国工人阶级冒着一切镇压性法律的迫害,在最近的选举³⁰⁷中光辉地证实了它的不可遏止的生命力。

这样一位女性,有着这样清晰而敏锐的头脑、这样精明的政治才干、这样强烈而充沛的工作热情、这样的自我牺牲精神,她为革命运动所做的事情,却没有展示于公众,报刊上也没有登载。她所做的一切只有在她身边生活过的人才了解。但是,有一点我知道:我们将会常常为听不到她的那些大胆但不虚夸、审慎但无损于荣誉的建议而惋惜。

她的个人品德,我没有必要讲了。这是她的朋友们都知道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如果说有一位女性把使别人幸福视为自己的最大幸福,那么这位女性就是她。

我们肃立的这个地点³⁰⁸就最好不过地证明了,她是满怀无神论唯物主义信念而生,满怀无神论唯物主义信念而死的。她不惧怕死亡。她知道,总会有一天她的肉体和精神都要回到生育她的大自然的怀抱。我们这些把她安放在她的最后安息地的人,都要纪念她,努力学习她的榜样。^①

弗·恩格斯写于 1881 年 12 月
2 或 3 日

第一次发表于 1979 年巴黎版
《卡尔·马克思的儿女,未发表
的书信》一书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5 卷翻译

① 手稿上最后这一整段话用铅笔画掉了。——编者注

弗·恩格斯

燕妮·马克思(父姓冯·威斯特华伦)³⁰⁹

死神又从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的老战士队伍中夺去了一个生命。

今年12月2日,卡尔·马克思的夫人受病痛长期折磨以后在伦敦逝世了。

她出生于萨尔茨韦德尔。在她出生以后不久,她的父亲便调到特里尔任政府顾问,在那里和马克思一家有了亲密的交往。两家的孩子在一块儿长大。这两个天赋很高的孩子情投意合。当马克思进大学的时候,他们两人就已经决定把未来的命运永远连结在一起。

1843年,在马克思主编过一段时期的旧《莱茵报》被查封以后,他们就结婚了。从那时起,燕妮·马克思不仅和她的丈夫共命运、同辛劳、同斗争,而且以高度的自觉和炽烈的热情投身于其中。

这对年轻夫妇自愿流亡前往巴黎,但是很快自愿流亡就变成真正的流亡了。甚至在那里,马克思也受到普鲁士政府的迫害。亚历山大·冯·洪堡竟然为促使下令驱逐马克思而效力。马克思一家被赶到了布鲁塞尔。

二月革命爆发了。布鲁塞尔也随着发生了骚乱,在这期间,比利时警察局不仅逮捕了马克思,而且还毫无理由地执意把他的妻子也

投入监狱。

1848年的革命高潮到第二年就低落了。新的流亡开始了,起初到了巴黎,后来由于法国政府再次干涉,便搬到伦敦。这一次对于燕妮·马克思说来是真正的流亡,她经受了重重苦难。物质上的困苦,她本来还可以忍受,虽然由于这种困苦,她眼看着自己的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相继被送入坟墓。但是,政府和资产阶级反对派,从庸俗的自由派到民主派,沆瀣一气,策划了一个大阴谋来反对她的丈夫;他们用大量最卑鄙最下流的诽谤来诬蔑他;所有报刊都拒不登载他的文章,他失去了为自己辩护的一切可能,在敌人面前一时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对敌人,他和她只有蔑视——这深深地伤害了她。这种情况持续了多年。

但这并不是没有尽头的。欧洲无产阶级重新获得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独立活动的生存条件。国际成立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席卷了一个又一个国家,而她的丈夫就战斗在先进战士队伍的最前列。部分地补偿她所经受的艰难痛苦的时刻来到了。她生前终于看到,曾经像密集的冰雹一样落在马克思身上的那些流言飞语已经烟消云散了,他的学说曾经遭受封建派和民主派等所有反动党派的百般扼杀,如今已经在各个文明国家用各种文雅的语言广为传播了。她生前终于看到,与她毕生血肉相连的无产阶级运动,已经从根本上震撼了从俄罗斯到美洲的旧世界,并冲破一切阻力,越来越充满胜利的信心,奋勇向前。最后使她感到欣慰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德国工人在最近一次帝国国会选举³⁰⁷中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自己不可摧毁的生命力。

这位女性有着极其敏锐的批判的智能、巨大的政治上的机警、充沛的精力和热情的性格、为自己的战友甘于奉献的精神,她在差不多

40年中为运动所做的事情,是社会公众看不到的,现代报刊的年鉴里也没有记载。这一切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感受得到。但是我深信:那些巴黎公社流亡者的妻子们还会时常回忆起她,而我们也将时常为再也听不到她那大胆而合理的意见(大胆而不吹嘘、合理而丝毫不损尊严)感到若有所失。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弗·恩格斯写于1881年12月
4日

载于1881年12月8日《社会民
主党人报》第50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25卷翻译

弗·恩格斯

*在燕妮·马克思墓前的讲话³¹⁰

朋友们：

我们现在安葬的这位品德崇高的女性，在1814年生于萨尔茨韦德尔。她的父亲冯·威斯特华伦男爵在特里尔城时和马克思一家很亲近；两家的孩子在一块儿长大。当马克思进大学的时候，他和自己未来的妻子已经知道他们的生命将永远连结在一起了。

1843年，在马克思第一次走上社会舞台担任旧《莱茵报》的主编，以及该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以后，他们就结婚了。从这一天起，她不仅和丈夫共患难、同辛劳、同斗争，而且以高度的自觉和炽烈的情积极投身其中。

这对青年夫妇动身前往巴黎；自愿的流亡很快变成了被迫的流亡。甚至在巴黎，马克思也受到普鲁士政府的迫害。我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像亚·洪堡这样的人竟堕落到和普鲁士政府合作，怂恿路易-菲力浦政府把马克思逐出了法国。马克思到了布鲁塞尔。二月革命爆发了。布鲁塞尔也随着动荡不安，比利时警察局不仅逮捕了马克思，而且毫无理由地把他的妻子也监禁起来。

1848年的革命行动，到第二年就失败了。又一次流亡开始了，起初到了巴黎，后来由于法国政府的干涉，便搬到伦敦。这次流亡历

尽重重苦难。尽管这次流亡使她的三个孩子(其中两个是男孩)死亡,她还是耐心忍受被驱逐者通常遭到的一切苦难。但是看到一切政党,不管是执政的还是在野的(封建派、自由派、所谓民主派),都联合起来反对她丈夫,对他进行最卑鄙下流的诬蔑,看到所有报刊毫无例外都不登载他的文章,他在敌人面前陷于孤立无援和手无寸铁的境地,他们两人用来对付敌人的是蔑视,——这一切却是令她痛苦的创伤。而这种情况持续了多年。

但这不是没有尽头的。欧洲的工人阶级逐渐处于稍微可能进行活动的政治条件下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了。它使文明国家相继参加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最先参加战斗的是她的丈夫。开始补偿她所经受的种种苦难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她生前终于看到,曾经落在她丈夫身上的各种卑鄙的诬蔑完全烟消云散;她生前终于听到,各国反动派曾经企图扼杀的她丈夫的学说在各个文明国家用各种文明的语言公开地胜利地传播了。她生前终于看到,充满胜利信心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席卷了从俄罗斯到美洲的一个又一个国家。最后使她感到欣慰的一件事就是,她在临终时得知德国工人阶级不顾一切镇压法令,在最近一次选举中光辉地显示了它的不可遏止的生命力。

她在革命运动中表现出的睿智的批判精神,敏锐的政治嗅觉,充沛的精力,伟大的忘我精神,是公众看不到的,在报刊上也没有记载。她所做的一切只有和她在一起生活的人才了解。但是有一点我知道:我们将不时地为再也听不到她的大胆而谨慎的意见(大胆而不吹嘘、谨慎而不失尊严的意见)而感到遗憾。

我用不着说她的个人品德了。这是她的朋友们都知道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如果有一位女性把使别人幸福视为自己最大的幸福,

那么这位女性就是她。

弗·恩格斯发表于 1881 年 12
月 5 日

载于 1881 年 12 月 11 日《平等
报》第 1 号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5 卷翻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³¹¹

巴枯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一版,60年代初^①由《钟声》印刷所出版。当时西方只能认为这件事(《宣言》译成俄文出版)是著作界的一件奇闻。这种看法今天是不可能有了。

当时(1847年12月)³¹²,卷入无产阶级运动的地区是多么狭小,这从《宣言》最后一章《共产党人对各国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一章里,正好没有说到俄国和美国。那时,俄国是欧洲全部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支庞大后备军;美国正通过移民吸收欧洲无产阶级的过剩力量。这两个国家,都向欧洲提供原料,同时又都是欧洲工业品的销售市场。所以,这两个国家不管怎样当时都是欧洲现存秩序的支柱。

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正是欧洲移民,使北美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这种农业生产的竞争震撼着欧洲大小土地所有制的根基。此外,这种移民还使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量和规模开发其丰富的工业资源,以至于很快就会摧毁西欧特别是英国迄今为止的工业垄断地位。这两种情况反过来对美国本身也起着革命作用。作为整

① 应是1869年出版。——编者注

个政治制度基础的农场主的中小土地所有制,正逐渐被大农场的竞争所征服;同时,在各工业区,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和神话般的资本积聚第一次发展起来了。

现在来看看俄国吧!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不仅欧洲的君主,而且连欧洲的资产者,都把俄国的干涉看作是帮助他们对付刚刚开始觉醒的无产阶级的惟一救星。沙皇被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现在,沙皇在加特契纳成了革命的俘虏³¹³,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

《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惟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2年1月21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82年1月21日

载于1882年在日内瓦出版的
俄文版《共产党宣言》一书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25卷翻译

弗·恩格斯

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³¹⁴

4月13日,有一位人物在柏林逝世。他过去曾经作为哲学家和神学家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多年来,几乎已销声匿迹,只是偶尔作为“文坛怪人”还吸引着公众的注意。官方的神学家们,其中也有勒南,剽窃了他的著作,因此一致绝口不提他的名字。可是,他比所有人更有价值,而且在一个我们社会主义者也关切的问题上,即在基督教历史起源问题上,他比所有人做了更多的工作。

趁他去世的机会,我们简单谈谈这个问题的目前情况和鲍威尔对解决这个问题的贡献。

从中世纪的自由思想者³¹⁵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者,这期间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一切宗教,包括基督教在内,都是骗子手的捏造。但是,自从黑格尔向哲学提出了说明世界历史中的理性发展的任务^①之后,上述观点便再也不能令人满意了。

事情很清楚,自发的宗教,如黑人对物神的膜拜或雅利安人¹⁵⁹共有的原始宗教,在它产生的时候,并没有欺骗的成分,但在以后的

① 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1840年柏林版第11—15页(参看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63年版第47—54页)。——编者注

发展中,僧侣的欺诈很快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至于人为的宗教,虽然充满着虔诚的狂热,但在其创立的时候,便少不了欺骗和伪造历史,而基督教,正如鲍威尔在考证新约³¹⁶时所指出的,也一开始就在这方面做出了可观的成绩。但这只是指出了一般现象,并没有说明这里所要谈的具体情况。

对于一种征服罗马世界帝国、统治文明人类的绝大多数达1800年之久的宗教,简单地说它是骗子凑集而成的无稽之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根据宗教借以产生和取得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去说明它的起源和发展,才能解决问题。对基督教更是这样。这里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罗马帝国的民众,在一切宗教中特别爱好这种还是由奴隶和被压迫者所宣扬的无稽之谈,以致野心勃勃的君士坦丁最后竟认为接受这种荒诞无稽的宗教,是自己一跃而为罗马世界独裁者的最好手段?

在解答这个问题方面,布鲁诺·鲍威尔的贡献比任何人都大得多。维耳克单纯从语言方面考证了的福音书的时间顺序和相互依存关系^①,鲍威尔又根据它们的内容无可辩驳地加以证实了,尽管1849年以后反动时代的那些半信神的神学家竭力反对这样做。按照施特劳斯含糊的神话论^②,人人都可以任意地把福音书的记述完全当作历史的记述,鲍威尔彻底揭露了这种理论的非科学性³¹⁷。既然福音书的全部内容中几乎绝对没有一件事情是历史事实,以致连

① 参看克·哥·维耳克《最初的福音书编述者或对头三个福音书的亲近关系的诠释性考证研究》1830年德累斯顿—莱比锡版。——编者注

② 参看大·施特劳斯《耶稣传(校勘本)》1835—1836年蒂宾根版第1、2卷。——编者注

耶稣基督在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人也可以认为是成问题的,鲍威尔就扫清了解决下述问题的基地:在基督教中被联结成了一种体系的那些观念和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而且是怎样取得世界统治地位的?

鲍威尔毕生从事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他的最卓越的研究成果是:他指出公元40年还以高龄活着的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斐洛是基督教的真正父亲,而罗马的斯多亚派塞涅卡可以说是基督教的叔父³¹⁸。在斐洛名下流传到现在的许多著作,实际上是讽喻体的理性主义的犹太传说和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亚派哲学的混合物。这种西方观点和东方观点的调和,已经包含着本质上是基督教的全部观念——人的原罪、逻各斯(这个词是神所有的并且本身就是神,它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不是通过供奉牺牲而是通过把自己的心灵奉献给神来进行忏悔,最后还有以下的本质特点,即新的宗教哲学倒转了从前的世界秩序,它在穷人、苦难人、奴隶和被排斥的人中寻找信徒,蔑视有钱人、有势力的人和有特权的人,因而也就有蔑视一切尘世享乐和禁止肉欲的规定。

另一方面,奥古斯都就已注意到,不仅要使神人,而且要使所谓贞洁的受孕也成为国家规定的格式。他不仅要求对凯撒和自己敬奉如神,而且还要求宣扬,他奥古斯都·凯撒神人(Divus)不是他父亲这个凡人的儿子,而是他母亲从阿波罗神那里受孕生下来的。但愿这位阿波罗神不是海涅所歌咏的那位阿波罗神的本家吧!³¹⁹

由此可见,整个基督教的基本轮廓已经形成,只是还缺少一块拱顶石:人格化的逻各斯体现为一定的人物,他为了拯救有罪的人类而在十字架上作出赎罪的牺牲。

至于这块拱顶石在历史上是怎样砌到斯多亚—斐洛学说里去的,我们找不到真正可靠的史料。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块拱顶石

不是由哲学家,即斐洛的学生或斯多亚派砌上的。宗教是由那些本身感到宗教的需要,并且懂得群众对宗教的需要的人创立的,而那些组成学派的哲学家通常不是这样。相反,在总解体的时期(例如现在还是这样),我们看到哲学和宗教教义都以粗俗的形式被庸俗化,并且得到广泛传播。如果说希腊古典哲学的最终形式(尤其是伊壁鸠鲁学派),发展为无神论的唯物主义,那么希腊的庸俗哲学,则发展为一神论和灵魂不死说。犹太教也是这样,它在同外族人和半犹太人的混合和交往中理性主义地庸俗化了,它忽视了法定的仪式,把过去犹太人独有的民族神雅赫维^①变为惟一的真神——天地的创造主,并且接受了原先同犹太教格格不入的灵魂不死说。这样,一神论的庸俗哲学就和庸俗宗教相遇了,后者为前者提供了现成的惟一的神。这就为犹太人准备了基地,使他们在吸收同样庸俗化了的斐洛派的观念以后,能够创立基督教,而且基督教一经创立,也就能够为希腊人和罗马人所接受。基督教起源于通俗化了的斐洛派的观念,而不直接产生于斐洛的著作,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新约几乎完全忽略了斐洛著作的主要部分,即忽略了旧约记述的那种讽喻式的哲理解释。这是鲍威尔没有充分注意到的一个方面。

基督教的最初形态究竟是什么样子,读一读所谓约翰启示录^②,就可以有一个概念。粗野的混乱的狂热,教义还处在萌芽时期,所谓

① 埃瓦尔德已经证明³²⁰,犹太人在注有元音和发音符的手稿中,在雅赫维(Jahweh)这个忌讳说出的名字的辅音底下,写上了这个名字的代称阿特乃(Adonai)一词中的元音。后来的人就把它读成耶和華(Jehovah)。可见,这个词不是某位神的名字,而只是一个重大的语法错误,因为在希伯来语中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个词。

② 《新约全书·约翰启示录》。——编者注

基督教道德只有禁止肉欲这一条,相反地,幻想和预言却很多。教义和伦理学是在较晚时期形成的,那时福音书和所谓使徒书信³²¹已经写成。其中不客气地利用了斯多亚派哲学,特别是塞涅卡哲学——至少在训诫方面是这样。鲍威尔已经证明,使徒书信常常一字不差地抄袭塞涅卡。^①实际上,这件事情正统的基督徒也已经看到了,不过他们硬说塞涅卡抄袭了当时还没有编写成的新约。教义一方面在同正在形成的关于耶稣的福音传说的联系中,另一方面是在犹太裔基督徒和非犹太裔基督徒之间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关于基督教取得胜利和世界统治地位的原因,鲍威尔也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材料。^②但是在这里,这位德国哲学家的唯心主义妨碍了他,使他不能作明晰的观察和精确的说明。往往在紧要关头,不得不用空话来代替事实。所以,我们与其逐条研讨鲍威尔的见解,倒不如谈谈我们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种看法的根据,不仅有鲍威尔的著作,而且还有自己的独立研究。

罗马的占领,在所有被征服的国家,首先直接破坏了过去的政治秩序,其次也间接破坏了旧有的社会生活条件。其办法是:第一,以罗马公民与非公民或国家臣民之间的简单区别,代替了从前的等级划分(奴隶制度除外);第二,这是主要的,以罗马国家的名义进行压榨。如果说在帝国内部,为了国家的利益,对行省总督的贪财欲望还

① 参看布·鲍威尔《基督和君主们。基督教起源于罗马的希腊文化》一书中的《新约中的塞涅卡》一章(1877年柏林版第47—61页)。——编者注

② 参看布·鲍威尔《斐洛、施特劳斯、勒南和原始基督教》1874年柏林版;《基督和君主们。基督教起源于罗马的希腊文化》1877年柏林版。——编者注

尽量加以限制,那么在那些国家代之而来的,是为了充实国库而课收的日益加重和日益烦苛的赋税,这样一种压榨行为起了可怕的破坏作用;最后,第三,到处都由罗马法官根据罗马法进行判决,这样一来,凡是与罗马法制不相符合的本地社会制度都被宣布无效。这三种办法必然产生惊人的荡平一切的作用,特别是运用于各国居民达几百年之久的时候更是如此。这些居民中间的最强有力的部分,不是在被征服前、被征服时、甚至往往在被征服后的斗争中被消灭,便是沦为奴隶。各行省的社会关系愈益接近京都的和意大利的社会关系。居民逐渐分裂为三个由极复杂的成分和民族凑合起来的阶级:富人,其中不少是被释放的奴隶(见佩特罗尼乌斯的作品³²²)、大地主、高利贷者、或大地主兼高利贷者——如基督教的叔父塞涅卡;没有财产的自由民,他们在罗马靠国家吃喝玩乐,在各行省只能自找生路;最后是广大的群众——奴隶。前两个阶级对于国家即对于皇帝,几乎同奴隶对于奴隶主一样没有权利。特别从提比里乌斯到尼禄这一时期,判处有钱的罗马人死刑以没收他们的财产,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政府的物质支柱是军队,它很像雇佣军,而不像古罗马的农民军队;政府的精神支柱是这样一种普遍信念:现状是摆脱不了的;建立在军事统治上的帝政(不是指这个或那个皇帝)是无法改变的必然性。至于这种信念究竟基于哪些纯粹的物质事实,这里就不加以分析了。

同普遍的无权地位和对改善现状的可能表示绝望的情况相适应的,是普遍的意志消沉和精神颓废。剩下的少数具有贵族气派和贵族思想的古罗马人,不是被消灭,便是死亡了。他们当中最后的一个人是塔西佗。其余的人巴不得能够完全避开社会生活;他们沉溺于聚财和斗富、诽谤和倾轧之中。没有财产的自由民,在罗马由国家供

养,在各行省则境况困苦。他们必须劳动,而且还要对付奴隶劳动的竞争。不过这些人只住在城市。除他们以外,在各行省还有农民,即自由的土地占有者(有些地方也许还同公有制有联系),或大地主的债务奴仆(如在高卢)。这一阶级最少被社会变革所触及。它反对宗教变革的时间也最久^①。最后是奴隶,他们没有权利,没有主见,他们不可能解放自己,如斯巴达克失败所证明的那样,可是其中大部分原是自由民或自由民出身者的后裔。所以他们必然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怀有极为强烈的(虽然表面上并不显露的)怨恨。

同上述情况相适应,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也是如此。哲学家们不是单纯赚钱谋生的教书匠,便是穷奢极欲的有钱人所雇用的小丑。有些甚至就是奴隶。塞涅卡先生表明,如果他们处境顺利,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位讲道德谈克制的斯多亚派,是尼禄宫廷中的头号阴谋家,不可能不阿谀奉承。他让尼禄赏赐金钱、田庄、花园、宫室。当他宣扬福音中贫困的拉撒路时,他实际上正是这个寓言里的富人。只是当尼禄要他命的时候,他才请皇帝收回一切赏赐,说他的哲学已使他感到满足。只有像柏西阿斯这样非常个别的哲学家,至少还挥动讽刺的鞭子,鞭笞他们那些蜕化的同时代人。至于另一类的思想家,即法学家,则对新秩序赞赏不已,因为一切等级差别的取消,使他们得以全面制定他们心爱的私法,因而他们就为皇帝制定了空前卑鄙的国家法。

罗马帝国在消灭各民族政治和社会独特性的同时,也消灭了他们独特的宗教。古代一切宗教都是自发的部落宗教和后来的民族宗

^① 按照法耳梅赖耶尔的说法³²³,直到9世纪,迈纳(伯罗奔尼撒)的农民还在向宙斯供奉牺牲。

教,它们从各民族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中产生,并和这些条件紧紧连在一起。宗教的这种基础一旦遭到破坏,沿袭的社会形式、传统的政治设施和民族独立一旦遭到毁灭,那么从属于此的宗教自然也就崩溃。本民族神可以容许异民族神和自己并立(这在古代是通常现象),但不能容许他们居于自己之上。东方的祭神仪式移植到罗马,只损害罗马宗教,但不能阻止东方宗教的衰落。民族神一旦不能保卫本民族的独立和自主,就会自取灭亡。情况到处都是这样(农民,特别是山地农民除外)。庸俗哲学的启蒙(我简直想说伏尔泰主义³²⁴) 在罗马和希腊所做到的事情,在各行省也做到了,其办法是罗马帝国的奴役,是用绝望的臣民和自私的无赖来代替以自由而自豪的战士。

这就是当时的物质和精神状况。现状不堪忍受,未来也许更加可怕。没有任何出路。悲观绝望,或从最猥鄙的感官享乐中寻求解脱——至少有可能让自己这样做的那些人是如此,可是这只是极少数人。其余的人就只好俯首帖耳地服从于不可避免的命运。

但是,在各阶级中必然有一些人,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得救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灵魂得救来代替,即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免陷入彻底绝望的境地。这样的安慰既不是斯多亚学派,也不是伊壁鸠鲁学派所能提供的,因为第一,这两个学派是不以普通人的思想为对象的哲学体系;第二,这两个学派的门徒的生活方式,把他们的学说弄得声名狼藉。安慰不是要代替那失去了的哲学,而是要代替那失去了的宗教,它必须以宗教形式出现,正如当时甚至直到17世纪能够获得群众的所有事物一样。

几乎用不着说明,在追求这种思想上的安慰,设法从外在世界遁入内在世界的人中,大多数必然是**奴隶**。

正是在这经济、政治、智力和道德的总解体时期,出现了基督教。它和以前的一切宗教发生了尖锐的对立。

在以前的一切宗教中,仪式是主要的事情。只有参加祭祀和巡礼,在东方还须遵守十分烦琐的饮食和洁净方面的清规,才能证明自己的教籍。罗马和希腊在这方面是宽容的,而在东方则盛行着一套宗教戒律,这在不小程度上促使它终于崩溃。属于两种不同宗教的人(埃及人、波斯人、犹太人、迦勒底人等等)不能共同饮食,不能共同进行日常活动,几乎不能交谈。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隔绝状态,是古代东方大部分衰落的原因之一。基督教没有造成隔绝的仪式,甚至没有古典世界的祭祀和巡礼。这样一来,由于它否定一切民族宗教及其共有仪式,毫无差别地对待一切民族,它本身就成了**第一个可行的世界宗教**。犹太教由于有新的万能的神,原也有成为世界宗教的趋势。但是以色列子女在信徒和行割礼的人中,依然保持着贵族身份。连基督教也必须先打破关于犹太裔基督徒的优越地位的观念(这种观念在所谓约翰启示录中早已有了),才能变成真正的世界宗教。另一方面,伊斯兰教由于保持着它的特殊东方仪式,它的传播范围就局限在东方以及被阿拉伯贝都英人占领和新移殖的北非。在这些地方它能够成为主要的宗教,在西方却不能。

其次,基督教拨动的琴弦,必然会在无数人的心胸中唤起共鸣。人们抱怨时代的败坏、普遍的物质匮乏和道德沦丧。对于这一切抱怨,基督教的罪孽意识回答道:事情就是这样,并且只能是这样,世界的堕落,罪在于你,在于你们大家,在于你和你们自己内心的堕落!哪里会有人说这是不对的呢? *Mea culpa*[罪在我]! 承认每个人在总的不幸中都有一份罪孽,这是无可非议的,这种承认也成了基督教同时宣布的灵魂得救的前提。并且,这种灵魂得救的安排,使每个旧

宗教团体的成员都易于理解。一切旧宗教都熟悉献祭赎罪这一观念,它能使被亵渎的神怒气冰释。那么,一位中间调停人牺牲自己永远赎清人类罪孽的观念,怎么会不容易获得地盘呢?这样,由于基督教把人们在普遍堕落中罪在自己这一普遍流行的感觉,明白地表现为每人的罪孽意识;同时,由于基督教通过它的创始人的牺牲,为大家渴求的、摆脱堕落世界获取内心得救、获取思想安慰,提供了人人容易理解的形式,它就再一次证实自己能够成为世界宗教——而且是适合于现世的宗教。

结果是:在荒漠中,成千上万的预言家和宣教者那时创立了无数宗教上的新东西,但只有基督教的创始人获得了成功。不仅在巴勒斯坦,而且在整个东方,麇集着这样一些宗教创始人,他们之间进行着一种可说是达尔文式的思想上的生存竞争。主要由于上述因素,基督教取得了胜利。而基督教怎样在教派的相互斗争中,在同异教世界的斗争中,通过自然选择逐渐形成为世界宗教,这已由最初三个世纪的教会史详细作了说明。

弗·恩格斯

弗·恩格斯写于1882年4月
下半月

载于1882年5月4日和11日《社
会民主党人报》第19和第20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25卷翻译

弗·恩格斯

*《布雷的牧师》译文与后记³²⁵

布雷的牧师

查理国王在位时，
忠顺之风尚可寻，
我为教会去卖命，
借此机会挣俸银。
我曾训导羊群说：
国王是由上帝定，
谁敢抗命欺国君，
打入地狱受苦刑。

有条准则我恪守，
坚持到死不变样：
不管谁来做国王，
布雷的牧师由我当。

詹姆斯即位上了台，

罗马教廷受膜拜；
过去压制天主教，
现在应该倒过来。
罗马教会和教团，
我和他们合得来；
要是革命未发生，
我已把耶稣会士当起来。
 有条准则我恪守，
 坚持到死不变样：
 不管谁来做国王，
 布雷的牧师由我当。

威廉跑来当国王，
拯救自由英名扬，
我按这种新风向，
调转帆篷再启航。
昔日恭顺奴才相，
如今迅即一扫光，
我布道时这样讲：
要同暴政斗一场！
 有条准则我恪守，
 坚持到死不变样：
 不管谁来做国王，
 布雷的牧师由我当。

安妮登基做女王，
国教此时显荣光，
形势既然变了样，
我便成了托利党。
为使教会成一体，
眼下斗志要高昂，
如果消沉和懈怠，
就同犯罪一个样。

有条准则我恪守，
坚持到死不变样：
不管谁来做国王，
布雷的牧师由我当。

乔治上台当国王，
温和政治他标榜，
我又摇身变一变，
变成一个辉格党。
变来变去大沾光，
又能得宠于君王，
我几乎天天都发誓，
反对窥位者和教皇。

有条准则我恪守，
坚持到死不变样：
不管谁来做国王，
布雷的牧师由我当。

伟大的汉诺威皇朝，
已把教皇党羽除掉，
我誓为它尽忠效劳，
只要它的王座不倒。
我的忠诚不再动摇，
除非又得换代改朝，
乔治永远是我明主，
直到有谁把他赶跑。

有条准则我恪守，
坚持到死不变样：
不管谁来做国王，
布雷的牧师由我当。

上面这首歌也许是 160 多年来在英国一直受人欢迎的惟一的一首政治民歌。其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归功于它那华丽的曲调，这支曲子直到今天还到处为人传唱。其实，对今天我们德国的情况来说，这首歌也丝毫没有过时。只不过在这段时间内，我们理所当然已经取得了进步。歌中的那位勇敢的牧师只是在每次王位更迭的时候才需要改换自己的面具。而在我们德国人这里，却有一位真正的布雷的教皇^①高踞于我国许多政治上的布雷的牧师之上，他为了证明自己的绝对正确，越来越频繁地亲自把全部政治信条彻底翻转过来。昨天主张自由贸易，今天主张保护关税；昨天主张经营自由，

① 指俾斯麦。——编者注

今天主张设立强制性的同业公会；昨天主张文化斗争²⁹，今天却扛着飘扬的旗帜向卡诺萨行进——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Omnia in majorem Dei gloriam*（一切为了上帝更大的光荣），说得明白一点，这就是：一切为了收更多的税，拉更多的壮丁。而可怜的小牧师们则不得不跟随其后，不得不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一次又一次地“恭谨效命”，而且往往得不到半点酬劳。我们那位坚强的老牧师会以何等轻蔑的神气俯视自己这些渺小的后来人，——他毕竟是以那种帮助他历经一切风暴而保住自己阵地的勇敢精神而大大自豪的呵！

弗·恩格斯写于 1882 年 8 月
底—9 月初

载于 1882 年 9 月 7 日《社会民
主党人报》第 37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5 卷翻译

弗·恩格斯
马尔克³²⁶

弗·恩格斯写于 1882 年 9 月
中—12 月 20 日之间

作为附录载于 1882 年霍廷根
—苏黎世版《社会主义从空想
到科学的发展》一书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8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7 卷翻译

在德国这样一个还有大约三分之二^①人口靠种地过活的国家里,有必要使社会主义工人,并且通过他们使农民知道,当前的大小土地所有制是怎样产生的;有必要拿古代一切自由人对于当时实际上是他们的“父辈的土地”,即祖传的自由的公有土地的公有制,同当前短工的贫困和小农受债务奴役的状况对比一下。所以,我打算对最古老的德意志土地制度,作一个简短的历史叙述。这种土地制度,今天虽然只剩下了很少的残迹,但在整个中世纪里,它却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和典范,浸透了全部的公共生活,不仅在德意志,而且在法兰西北部,在英格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可是,它完全被人遗忘了,直到最近,格·路·毛勒才重新发现了它的真正意义。³²⁷

有两个自发产生的事实,支配着一切或者说几乎一切民族的原始历史:民族按亲属关系的划分和土地公有制。德意志人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从亚洲带来了这种按部落、亲族和血族的划分,他们在罗马时代编制战斗队时就总是使有近亲关系的人并肩作战,所以,当他们占领莱茵河以东和多瑙河以北这一带新领土的时候,也受到了这种划分的支配。各个部落在这个新的居住地定居下来,但这不是

^① 在经过恩格斯修订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增补第4版(1891年柏林版)(以下简称:增补第4版)所附本文中,此处为“整整一半”。——编者注

任意的或偶然的,而是像凯撒所明白指出的那样^①,以部落成员的亲属关系为依据的。亲属关系较近的较大集团,分配到一定的地区,在这个地区里面,各个包括若干家庭的血族,又按村的形式定居下来。几个有亲属关系的村,构成一个百户[Hundertschaft](古代高地德意志语为 Huntari,古代斯堪的纳维亚语为 Heradh),几个百户构成一个区[Gau]。区的总和便是民族自身了。村没有留用的土地,都归百户支配。没有分配给百户的土地,都归区管辖。如果还有可以使用的土地(大多是很大的一个地带),则归全民族直接占有。例如,在瑞典,我们就可以看到上述各种层次的公共占有制同时并存着。每一个村都有村公有地(bys almänningar)。此外,还有百户公有地(härads)、区公有地或州(lands)公有地;最后,还有归全民族的代表者国王支配的民族公有地,在这里叫做 konungs almänningar[王有地]。不过,所有这些,连王有地在内,都统称为 almänningar^②,即公有地。

古代瑞典的这种公有地制度,就其精确的层层划分来看,无论如何是属于较晚的发展阶段的。如果它曾经以这种形态在德国存在过,那也很快就消失了。由于人口的激增,在划归每一个村的极其广阔的土地上,也就是在马尔克里面,产生了一批女儿村,它们作为权利平等或者权利较小的村,跟母村一起,构成一个单一的马尔克公社。因此,我们在德国,在史料所能追溯的范围内,到处可以看到,有或多或少的村联合成一个马尔克公社。但在这种团体之上,至少在初期,还有百户或区这种较大的马尔克团体。最后,为了管理归民族

① 凯撒《高卢战记》第4册第22章。——编者注

②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3年霍廷根—苏黎世第2版及以后各版所附本文,在此词后加上了,“Allmenden”。——编者注

直接占有的土地和监督在它领土以内的下级马尔克,整个民族在最初阶段构成一个单一的大马尔克公社。

一直到法兰克王国征服莱茵河东岸的德意志的时候,马尔克公社的重心似乎在区里,而区的范围似乎就是本来的马尔克公社。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说明,在法兰克王国划分行政区域时,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古老的大马尔克作为司法区重新出现。不过,此后不久,古老的大马尔克就开始分裂。但是,在13世纪和14世纪的《帝国法》³²⁸里还规定,一个马尔克通常包括6个到12个村。较大的马尔克的继续存在,是德国的公有制同今天俄国的公有制的根本区别;在俄国尚未因废除农奴制而剥夺农村公社的公有地并宣布归庄园主所有时,每个村社都拥有自己单独的公有地。^①

在凯撒时代,至少有一大部分德意志人,即苏维汇民族,还没有定居下来,他们的田地是共同耕作的。我们按照同其他民族的类比可以推测,这种共同耕作是这样进行的:包括若干具有近亲关系的家庭的各个血族,集体耕种分配给他们的、年年更换的土地,并把产品分配给各个家庭。但苏维汇人在公元初年在新的住所安居下来以后,这种办法很快就停止了。至少,塔西佗(在凯撒之后150年)就只知道由单个家庭耕种土地。但是,分配给这些家庭的耕地,期限也只是一年;每年都要重新进行分配和更换。

① 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个注:“我要感谢马克思,是他指出了就其历史后果来看极其重要的区别,在有关人类社会的原始状态的一切问题上,马克思无疑是首屈一指的权威。但愿《资本论》第2卷至少会将 he 研究的主要成果发表出来,因为该卷在论述地租的时候,还将论述土地所有制问题。”但在增补第4版中从“较大的马尔克”至“自己单独的公有地”这一整段话,被作者删掉了。——编者注

这是怎样进行的,我们今天还可以在摩泽尔河畔和霍赫瓦尔德山区的所谓农户公社中看得出来。在那里,虽然不再一年分配一次,但是每隔3年、6年、9年或12年,总要把全部耕种的土地(耕地和草地)合在一起,按照位置和土质,分成若干“大块”。每一大块,再划分成若干大小相等的狭长带状地块,块数多少,根据公社中有权分地者的人数多少而定;这些地块,采用抽签的办法,分配给有权分地的人。所以,每一个社员,在每一个大块中,也就是说,在位置与土质各不相同的每一个大块中,当初都分到了同样大的一块土地。现在,这些份地,由于遗产分配、出卖等种种原因,已经大小不等了,但旧有的完整的份地,仍旧是一个单位,根据这个单位来决定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八分之一份地等等。没有耕种的土地(森林和牧场),仍然共同占有,共同利用。

这种最古老的制度,直到本世纪初,还保存在巴伐利亚的莱茵普法尔茨的所谓抽签分地制中。此后,它的耕地变成了各个社员的私有财产。农户公社也越来越感觉到,停止重新分配,变交替的占有为私有,对它们是有利的。因此,在过去40年内,大多数的甚至是全部的农户公社都消失了,变成了小农的普通村落,不过森林和牧场还是共同利用。

变成个人私有财产的第一块土地是住宅地。住所的不可侵犯性,一切个人自由的这个基础,开始于迁徙队伍的大篷车,转到定居农民的木屋,逐渐变为一种对于家宅和园地的完全所有权。这在塔西佗时代早已发生。自由的德意志人的住处,必定在那时就已经从马尔克中分离出来,因而成了马尔克公职人员不能进去的地方,成了逃亡者的安全避难所,我们看到,这在后世的马尔克章程里,部分在5到8世纪的《民族法》¹⁶⁴里,就已有记载。因为,住所的神圣不可

侵犯,不是它转变为私有财产的结果,而是原因。

四五百年以后^①,我们在《民族法》中还看到,耕地是各个农民世袭的地产,它虽然不是绝对自由的地产,但农民有权通过出卖或者其他方式的转让来支配。关于这种转变的原因,我们找到了两条线索。

第一,从最早的时候起,在德意志本土除了上述耕地完全共有的闭塞的村以外,还有另一种村,在这里,不单住处,就连耕地,也从公社,即马尔克中分离出来,作为世袭财产分配给各个农民。不过,这只是发生在由于地形的限制可以说不得不这样做的地方,诸如在贝格区那样的狭谷里,在威斯特伐利亚那样的狭窄、平坦、两边都是沼泽地的山背上。以后,也发生在奥登林山和几乎全部阿尔卑斯山脉的山谷里。这些地方的村,现在还是这样,是由分散孤立的庄户构成的,每个庄户的四周是归它所有的耕地。耕地的更换,在这里不太可能实行,所以留给马尔克的,只有周围尚未开垦的土地。后来,当可以通过转让给第三者来支配家宅和园地的权利获得重要意义的时候,这类宅院的所有者便占了便宜。想同样得到这种便宜的愿望,可能使许多耕地共有的村停止了反复的^②重新分配办法,因而使社员的各种份地同样成为可以继承和转让的。

第二,征战将德意志人带进了罗马的领土,在那里,几百年以来,土地早已成为私有财产(而且还是罗马式的、无限制的私有财产),在

① 在增补第4版中,恩格斯将这句话改为“塔西佗以后四五百年”。——编者注

② 在增补第4版中,恩格斯将“反复的”(wiederholte)改为“通常的”(gewohnt)。——编者注

那里,人数不多的征服者,不可能把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占有形式完全废除。说明至少在旧日的罗马领土上耕地和草地的世袭私人占有制同罗马法之间的关联的,还有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一直保留到当代的耕地公有制的残余,恰恰存在于莱茵河左岸,即存在于被征服的但是彻底日耳曼化了的地区。当法兰克人5世纪在这里住下的时候,他们必定还保留着耕地公有制,否则我们今天在那里就无从找到农户公社和抽签分地制了。不过在这里,私有制也很快就不可阻挡地渗进来了,因为我们看到,6世纪《里普利安民族法》³²⁹在谈论耕地的时候,只提到这种私有制。在德意志内地,我已经说过,耕地不久也变成了私产。

如果德意志征服者接受了耕地和草地的私有制,也就是说,在第一次分配土地的时候,或者其后不久,就放弃了重新分配的办法(因为别无他法),那么在另一方面,他们却到处推行他们德意志人的马尔克制度,连同森林和牧场的公共占有制,以及马尔克对已分土地的最高统治权。这样做的,不仅有法兰西北部的法兰克人和英格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而且还有法兰西东部的勃艮第人、法兰西南部和西班牙的西哥特人和意大利的东哥特人及伦巴德人。不过,在最后提到的这几个国家里,据悉只有在高山地区,马尔克制度的痕迹还保存着^①。

马尔克制度放弃重新分配耕地的办法以后所采取的形态,就是我们不仅在5到8世纪的古代《民族法》里,而且在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中世纪的法律书籍里,在13到17世纪的许多德意志的马尔克

^① 在增补第4版中,恩格斯在“只有”前加了“差不多”,在“还保存着”前加了“直到今天”。——编者注

章程(即所谓判例)里^①所遇到的那种形态。

马尔克公社虽然放弃了在各个社员中间有时重新分配耕地和草地的权利,但对于它在这些土地上的其他权利,却一个也没有放弃。而这些权利都是很重要的。公社把它的田地转交给个人,只是为了把它用作耕地和草地,而不是作其他的用途。除此以外,单个的占有者是没有任何权利的。所以,地下发现的宝藏,如果埋藏的地方深到犁头所不及,那就不属于他,而当初是属于公社的。关于采矿等权利,情形也是一样。所有这些权利,以后都被地主和君主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侵占了。

但是耕地和草地的利用,也要接受公社的监督和调整,其形式如下。凡是实行三年轮作制的地方(差不多到处都实行这种制度),村的全部耕地被分成相等的三大块,其中每一块轮换着第一年用于秋播,第二年用于春播,第三年休耕。所以,一个村每年都有它的秋播地、春播地和休耕地。在分配土地的时候,就要注意到使每一个社员的份地均分在这三块土地上,以使每个人都能不受损失地适应公社的强制轮作制;按照这种制度,他只可以在他自己这块秋播地里进行秋播等等。

每一块休耕地,在休耕期间又归公共占有,供整个公社当牧场使用。而其他两块土地,收获一完毕直到下次播种以前,同样又回归公共占有,被当做公共牧场使用。草地在秋天割草以后,也是如此。在所有用作放牧的田地上,占有者必须把篱笆拆去。这种所谓强制放牧办法,当然要求播种和收获的时间不由个人决定,而要求它成为大

^① 在增补第4版中,恩格斯在此处加了“和法兰西北部的习惯法(Coûtumes)”。——编者注

家共同的时间并由公社或习惯作出规定。

其他一切土地,即除去家宅和园地或已经分配的村有地以外的一切,和古代一样,仍然是公共财产、共同利用。这里有森林、牧场、荒地、沼泽、河流、池塘、湖泊、道路、猎场和渔场。每一个社员从被分配的马尔克耕地中分到的份地,当初都是大小相等的,同样,他们利用“公共马尔克”的那份权利也是相等的。这种利用方法,由全体社员决定。当一向耕种的土地不够使用,需要从公共马尔克中划出一块土地来耕种的时候,耕地的分配方法也是如此。公共马尔克的主要用途,是放牧牲畜和采摘橡实来喂猪。此外,森林提供木料和燃料、厩舍的垫草、浆果和蘑菇;如果有沼泽地,它就提供泥炭。关于牧场、木材的利用等等的规定,构成了从各个不同时代留传下来的许多马尔克判例的主要内容。这些判例都是当那古老的不成文的习惯法开始变得有争议的时候写下来的。仍然保留下来的公有森林,是这些古老的、没有被分割的马尔克的可怜残余。还有另一种残余至少存在于德国西部和南部,这就是在人民意识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森林是公有的财产,在森林里,每一个人都可以采集花卉、浆果、蘑菇、山毛榉实等等,并且一般地说,只要他不造成损害,他便可以在里面随意行动。可是,就是在这里,俾斯麦也要打主意,用他那有名的关于采集浆果的法令³³⁰使西部各省符合于旧普鲁士容克的标准。

马尔克社员拥有平等的土地份额和平等的使用权,同样,他们当初也都拥有平等的一份权利参与马尔克内部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他们定期地或如有必要经常地举行露天集会,商定马尔克的事务,审判马尔克中的不法行为和纠纷。这是古老的德意志人的民众大会,只不过是雏形罢了,而民众大会,当初也就是一个大规模的马尔克集

会。制定法律(虽然只是在少有的十分必要的情况下),推举公职人员,检查公职人员执行职务的情形,但主要还是审判。主席只能提出问题,判决由到会的全体社员决定。

马尔克制度,在古代,几乎是那些没有君王的德意志部落惟一的制度。旧日的部落贵族(他们在民族大迁徙¹⁶⁷时代,或在其后不久,没落下去了)以及一切随马尔克制度自然产生的东西,很容易适应这种制度,正如克尔特人的氏族贵族,在17世纪还适应爱尔兰的土地公有制一样。这种制度,在德意志人的全部生活里已经扎下了深根,我们在我们民族发展史中,到处都能看到它的痕迹。古代,全部的公共权力,在和平的日子里,只限于司法权力,这种权力由百户、区和整个民族集团的民众大会掌握。但是,民众法庭不过是一个民众的马尔克法庭,它所处理的案件不是单纯马尔克的事务,而且还有属于公共权力范围以内的事情。随着区制度的形成,国家的区法庭和普通的马尔克法庭分开了,但这两种法庭里的司法权,仍保留在人民手里。只有当古老的人民自由已经大部丧失,为法庭服务和服兵役已成为贫穷了的自由民的重担的时候,查理大帝才能在大多数地方的区法庭里,用陪审员法庭^①来代替民众法庭。但这丝毫也没有触动马尔克法庭。相反,它们甚至仍然是中世纪封地法庭的典范。就是在这种法庭里,封地主也仅仅是个提问题的人,判决者则是受封地者自己。村制度无非是一个独立的村马尔克的马尔克制度;村一旦变

① 不应把这种陪审员法庭跟俾斯麦—莱昂哈特的陪审员法庭混为一谈³³¹。在后一种陪审员法庭里,判决是由陪审员和法律专家共同做出的。在古代的陪审员法庭里,根本没有法律专家,法庭庭长或审判官根本没有表决权,判决是由陪审员独立做出的。

作城市,也就是说,只要它用壕沟和围墙防御起来,村制度也就变成了城市制度。后来的一切城市制度,都是从这种最初的城市马尔克制度中发展起来的。最后,中世纪无数并不以共同的地产为基础的自由公社的规章,尤其是自由行会的规章,都是模仿马尔克制度的。人们对待赋予行会专门经营某一行业的权利,和对待一个公共的马尔克完全一样。在行会里,也跟在马尔克里一样,总是用同样的热心,甚至往往用完全相同的方法,力求每一社员完全平等地或者尽可能平等地享用共同的收益来源。

马尔克制度在公共生活极不相同的各个领域中,面对各种各样的要求所发挥出的近乎神奇的适应能力,在农业的发展进程中,在同日益发展的大土地所有制的斗争中也表现了出来。马尔克制度是在德意志人定居日耳曼尼亚时候产生的,那时畜牧还是主要的食物来源,从亚洲带来的、几乎被遗忘了的农业刚开始复苏。马尔克制度在整个中世纪时代,都是在和占有土地的贵族的不断的艰苦斗争中生存下来的。但是马尔克制度当时还是非常需要的,因此在贵族把农民土地攫为己有的地方,依附的村的制度依然是马尔克制度(虽然由于地主的侵犯已大为削弱)。关于这一点,我们到下面还要举一个例子。只要公共马尔克仍然存在,马尔克制度就能适应千变万化的耕地占有关系;在马尔克不再是自由的马尔克以后,马尔克制度同样能适应各种极不相同的对于公共马尔克的所有权。马尔克制度所以没落,是因为贵族和僧侣在君主们甘心情愿的支持下,夺去了差不多全部农民土地(不管是分配了的或没有分配的)。但是,马尔克制度在经济上落伍,作为农业经营方式已失去了生命力,这事实上是由于近百年来农业的巨大进步使种地成为一门科学,并引进了全新的经营方式。

马尔克制度的崩溃,在民族大迁徙以后不久就开始了。法兰克的国王们,作为民族的代表,把属于整个民族的辽阔土地,尤其是森林,占为己有,并把它们当作礼物,慷慨地赠送给他们的廷臣、统帅、主教和修道院院长。这些土地就构成了后世贵族和教会的大地产的基础。远在查理大帝以前,教会早就占有法兰西全部土地的整整三分之一。可以肯定,在中世纪,几乎^①整个天主教西欧都保持着这样的比例。

连绵不断的国内外战争,其通常结果是土地被没收,这就使大批农民倾家荡产,所以,早在墨洛温时代,就有很多自由人没有土地。查理大帝永无休止的战争破坏了自由农民等级的主力。当初,每一个自由的土地占有者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并且,不但要自理装备,而且在服役期间还要自理6个月的伙食。毫不奇怪,早在查理时代,在五个人中间,事实上连一个真正能服兵役的人也不大能找到了。在他的后继者的混乱统治下,农民的自由更加急速地趋于消亡。一方面,诺曼人的侵扰、国王们无尽无休的战争和豪绅显贵之间的私斗,逼迫自由农民相继寻找保护主。另一方面,这些豪绅显贵和教会的贪得无厌,也加速了这种过程。他们用欺诈、诺言、威胁、暴力,把越来越多的农民和农民土地,置于自己权力控制之下。不论在前一种场合或后一种场合,农民的土地总是变成了地主的土地,在最好的情形下,也要叫农民缴纳代役租、提供徭役,才归还给农民使用。可是,农民却从自由的土地占有者变成缴纳代役租、提供徭役的依附农民,

^① “几乎”一词是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2版(1883年霍廷根—苏黎世版)所附本文中增加的,以后的几个版本中仍保留了“几乎”一词。——编者注

甚至农奴。在西法兰克王国³³²，一般说，在莱茵河以西，这是通常现象。反之，在莱茵河以东，却还存在着相当多的自由农民，他们大多数是散居的，只有少数集聚在整个整个的自由的村里。但是，即使在这里，在 10 到 12 世纪，贵族和教会的强大势力，也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处于受奴役的地位。

一个庄园主(不论是教会的或者世俗的)得到了一块农民土地，他同时也就在马尔克内取得了与这块土地有关的权利。这些新的地主，因此就变成了马尔克社员。他们同其他自由的和依附的社员，甚至同他们自己的农奴，原先在马尔克内只是享有平等的权利。但是不久以后，他们不顾农民的顽强抵抗，在很多地方的马尔克中取得了特权，甚至往往迫使马尔克服从他们地主的统治。不管怎样，旧的马尔克公社仍然继续存在下去，虽然是在地主监护之下。

弗里西安人、尼德兰人、萨克森人和莱茵—法兰克人向勃兰登堡及西里西亚的移民，最清楚不过地表明，那时马尔克制度对于耕作，甚至对于大土地占有，还是多么必要。这些人从 12 世纪起就在地主的土地上，以村的形式被安置下来，而且是按照德意志的法律，即古代的马尔克法律进行的，只要在地主的庄园上还保留着这种法律。每个人都得到了家宅和园地，从村有地中得到了同样大小的、用抽签的老方法决定的一块份地，每个人都有利用森林和牧场的权利，这多半是地主的森林，专用的马尔克比较少。所有这些都是世袭的。土地所有权还是地主的，移民必须世代代向地主付一定的代役租，为地主服一定的徭役。但这种赋役很轻，这一带农民的境遇，比德国任何地方都好。因此，当农民战争爆发的时候，他们保持平静。他们这种对切身事业的背弃行为，使他们后来受到了严厉的惩罚。

一般说来,在13世纪中叶,发生了一种有利于农民的明显的转变。十字军远征为此做好了准备。许多出征的地主,干脆让他们的农民获得了自由。其他一些地主不在人世了,败落了,数以百计的贵族世家消失了,他们的农民也大多获得了自由。此外随着地主的需要的增加,支配农民的赋役远比支配他们的人身重要。包含着古代奴隶制的许多成分的中世纪初期的农奴制,它给予地主的权利,逐渐失去了价值。农奴制慢慢衰弱下去,农奴的地位日益接近于单纯依附农民的地位。农业的经营完全墨守旧法,庄园主要想增加收入,只有开垦新土地和建立新村。但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只有同移民好好商量,不管他们是庄园里的依附农民还是外来农民。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时期,对于农民的赋役到处都有严格的规定而且大多是适度的,他们也受到了良好的待遇,尤其是在僧侣的领地里。最后,新吸引来的移民的有利地位,又反过来影响到附近依附农民的处境,以致这些依附农民在整个德国北部,尽管还继续为庄园主提供赋役,但却获得了他们的人身自由。^①然而这一切不会保持长久。

到了14世纪和15世纪,城市迅速勃兴和富裕起来。尤其是在德国南部和莱茵河畔,城市工艺美术兴旺,奢靡之风盛行。城市贵族的豪华生活,使粗食粗衣、陈设简陋的土容克不能安眠。但是,从哪儿去弄到这些好东西呢?拦路抢劫越来越危险,越来越劳而无获。要去购买,就得有钱。钱却只有农民能够供给。于是,就对农民开始了新的压迫,增加代役租和徭役,越来越热中于再度将自由农民变成依附农民,将依附农民变成农奴,把公有的马尔克土地变成地主的土

① 在增补第4版中,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句话:“只有斯拉夫和立陶宛—普鲁士农民还是不自由的。”——编者注

地。在这些事情上面,君主和贵族得到了罗马法学家的帮助。这些法学家善于把罗马的法律条文,应用到大半他们不了解的德意志的关系中去,制造极度的混乱,但是他们善于这样制造混乱,就是使地主总是占便宜,农民总是吃亏。僧侣们的做法比较简单:他们伪造文件,在文件中缩小农民的权利,扩大农民的义务。为了抵抗君主、贵族和教士们的这种掠夺行为,从15世纪末叶起,农民经常分散地发动起义,到了1525年,伟大的农民战争席卷了士瓦本、巴伐利亚、法兰克尼亚,一直延伸到阿尔萨斯、普法尔茨、莱茵高和图林根。经过了艰苦的斗争,农民遭受了失败。从那时起,在德意志农民中间,农奴制度重新取得了普遍的优势。在斗争异常激烈的地方,一切还保留着的农民权利,现在都遭到了无耻的践踏,他们的公有地变成了地主的土地,他们自己也变成了农奴。德国北部处境较好的农民,保持了平静,为了对他们这样一种行为表示奖励,虽然使他们遭受同样的压迫,不过做得比较慢一点罢了。德意志农民的农奴制,在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西里西亚,开始实行于16世纪中叶,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开始实行于16世纪末叶,并且日益普遍地强加到农民身上。

这种新的强暴行动,也还有它的经济原因。在宗教改革时代的斗争中,只有德意志的邦君扩大了权力。贵族们进行抢劫这一高贵行业,已经过时了。如果他们不甘心没落,就必须从他们的地产里榨取更多的收益。不过,惟一的方法是仿效更大的君主、特别是寺院的榜样,自己至少负责经营一部分土地。过去这只是一种例外,现在却成为一种必要。但是,这种新的经营方法遇到了障碍,几乎所有地方的土地都分给了纳租的农民。把自由的或依附的纳租农民变成十足的农奴,老爷们才能获得自主行动的权利。一部分农民,正如专门术

语所说的被“肃清(gelegt)”，这就是说，不是被撵走，便是沦为只有一间草屋和一小块园地的无地农民(Kotsassen)，他们的田庄被合并成一个大规模的地主田庄，由新的无地农民和余下的农民以徭役劳动耕种。这样，不仅有大批农民干脆被赶走，而且留下来的农民所负担的徭役也日益大量地增加。资本主义时期，在农村中是作为以农奴徭役劳动为基础的农业的大规模经营时期，宣告开始的。

不过这种转变，在开头的时候进行得相当缓慢。这时发生了三十年战争³³³。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德意志到处都遭到历史上最没有纪律的暴兵的蹂躏。到处是烧杀、抢掠和奸淫。有些地方，除大军之外，还有小股的义勇兵，或者更确切说是土匪，他们各自为政，为所欲为，这些地方的农民受苦最多。到处是一片人去地荒的景象。当和平到来的时候，德意志已经无望地倒在地下，被踩烂撕碎，流着鲜血。然而，受苦最深的，还是农民。

占有土地的贵族，这时成了农村中惟一的主人。君主们恰巧在那时候取消了贵族在等级会议中的政治权利，为此他们便让贵族放手去对付农民。而农民最后的抵抗力，已经为战争所摧毁。这样，贵族就可以把全部农村关系安排得最适于恢复他们已经破产的财政。不但把那已经抛弃的农民田宅，直接跟地主田庄合并起来，而且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才开始大规模地、系统地肃清农民。地主的田庄越大，农民的徭役劳动自然也越重。“无限制的徭役”时代又来到了。老爷可以任意命令农民、农民的家属、农民的耕畜出多少次工，干多长的时间。农奴制度现在成了普遍的制度。自由农民像白色的乌鸦一样罕见。老爷为了将农民的任何抵抗，即使是极微弱的抵抗，也能在萌芽状态中加以扑灭，他们从邦君那里取得了领主审判权，也就是说，他们被任命为审判农民任何小过失和小纠纷的惟一法官，甚至在农

民和老爷本人争讼的时候,也是一样。于是,老爷就成了他自己案件的法官!从此以后,棍子和鞭子统治着农村。跟整个德国一样,德国农民这时受到最大的屈辱。跟整个德国一样,德国农民也精疲力竭,失去任何自救的能力,只有依靠外援才能得救。

这种外援终于来了。法国革命爆发以后,在德国和德国农民头上也出现了美好时代的曙光。革命军一占领莱茵河左岸,那里的徭役劳动、代役租、对老爷的各种贡赋等一大堆陈腐废物,连同老爷本身,就像被魔杖点了一下似地立即消失了。于是莱茵河左岸的农民便成了自己土地的主人,而且他们还得到了一部在革命时期起草的只不过被拿破仑弄走了样的 Code civil³³⁴。这部法典适合他们的新处境,他们不但看得懂,而且还可以方便地带在口袋里。

不过,莱茵河右岸的农民还需要长期等待。不错,普鲁士在耶拿遭到应有的失败³³⁵以后,若干极端可耻的贵族特权业已废除,而且根据法律,所谓赎免农民的其他赋役也有了可能。不过,这大部分在很长时间内仅仅是一纸空文。在其他的邦中变化更少。直到1830年的法国第二次革命,才开始至少在巴登和靠近法国的其他几个小邦里实行这种赎免。当1848年法国第三次革命终于也带动了德国的时候,普鲁士的赎免还远没有完成,在巴伐利亚境内,还根本没有开始!现在,事情自然进行得快一些。这一次自己也造起反的农民的徭役劳动,已经丧失了一切价值。

赎免是怎么一回事呢?是这么一回事。老爷向农民收取一笔钱或一块地以后,就应该承认农民剩余下来的土地是他的自由的不承担赋役的产业,——尽管过去属于老爷的全部土地,都是窃据的农民土地!不仅如此。在清算的时候,派来办理此事的官吏,他们在老爷那里居住吃喝,当然差不多总是站在老爷一边,所以农民所吃的亏,

甚至大大超过了法律条文的规定。

由于三次法国革命和一次德国革命,我们终于又有了自由的农民。但是,我们今天的自由农民,和古代的自由马尔克社员相比,差得多远啊!他们的田庄,一般都小得多。除了少数大大缩小了的、荒芜的公有森林以外,没有分割的马尔克已经消失了。但对小农来说,不利用马尔克就不能养家畜,没有家畜就没有粪肥,没有粪肥就没有合理的耕作。收税官和紧跟在他后面的咄咄逼人的法警,这些今日农民最熟悉不过的人物,都是古代马尔克社员没有听说过的,还有那些从事抵押放款的高利贷者,也是没有听说过的,农民的田宅^①现在正一个个地落到他们的魔爪中去。但最妙的是:这批新的自由农民(他们的田地和活动自由被大大缩小),正好出现在一切都进行得太晚的德国,出现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不单是科学的农业,而且还有那些新发明的农业机械,日益使小规模的经营变成一种过时的、不再有生命力的经营方式。正如机械的纺织业排斥了手纺车与手织机一样,这种新式的农业生产方法,一定会无法挽救地摧毁农村的小土地经济,而代之以大土地所有制,——只要给这种生产方法以这样做的必要时间。

因为,处在目前经营形式下的全欧洲农业,已经受到了美洲大规模谷物生产这个占有优势的敌手的威胁。美洲的土地天然适于耕种,天然具有长年的肥力,购买它又花不了几文钱,同这样的土地,不管是我国负债的小农,或者是我国同样债台高筑的大土地占有者,都是无法进行竞争的。全欧洲的农业经营方式,在美洲的竞争下失败

^① 在增补第4版中,恩格斯将“农民的田宅”(Bauernhof)改为“农民的土地”(Bauerngut)。——编者注

了。欧洲农业只有进行社会化经营和依靠社会去经营,才可能继续存在。

这就是我国农民的前景。一个尽管是衰落的自由农民阶级的复兴,却有**这样**的好处:使农民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在这个地位上,他们在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工人的协助下,能够自己帮助自己,只要他们愿意懂得**怎样做**。①

但是怎样做呢?采用恢复马尔克的方法,但不用其陈旧的过时的形式,而用更新了的形式;采用这样一种更新土地公有制的方法,以便使这种公有制不但能保证小农社员得到大规模经营和采用农业机械的全部好处,而且能向他们提供资金除农业以外去经营利用蒸汽动力或水力的大工业,并且不用资本家,而依靠公社去经营大工业。

经营大农业和采用农业机械,换句话说,就是使目前自己耕种自己土地的大部分小农的农业劳动变为多余。要使这些被排挤出田野耕作的人不致没有工作,或不会被迫涌入城市,必须使他们就在农村中从事工业劳动,而这只有大规模地、利用蒸汽动力或水力来经营,才能对他们有利。

这究竟怎样组织呢?德国农民们,好好地想一想吧。在这方面能够帮助你们的,只有**社会民主党人**。

① 以下三大段文字是恩格斯在1883年出版《马尔克》单行本时所作的补充,单行本的书名为:《德国农民。他过去怎样?他现在怎样?他将来会怎样?》。——编者注

弗·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德文第一版序言³³⁶

后面这篇论文是由 1878 年在莱比锡出版的我的著作《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中的三章集合而成的。我为我的朋友保尔·拉法格把这三章汇集在一起交给他译成法文，并增加了若干比较详细的说明。经我校阅过的法译文最初发表在《社会主义评论》上，后来于 1880 年在巴黎印成单行本出版，书名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根据法译文翻译的波兰文本于 1882 年刚刚在日内瓦由黎明印刷所出版，书名为《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

拉法格的译本在说法语的国家，特别是在法国，获得了意外的成功，这给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三章如果按德文印成单行本出版，是否同样有好处呢。这时，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告诉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普遍感到迫切需要出版新的宣传小册子，问我是否愿意把这三章用于这一目的。我当然同意这样做，并把我的著作交给他们处理。

可是，这一著作原来根本不是为了直接在群众中进行宣传而写

的。这样一种首先是纯学术性的著作怎样才能适用于直接的宣传呢？在形式和内容上需要作些什么修改呢？

说到形式，只有出现许多外来语这一点可能引起疑虑。但是拉萨尔在他的演说和宣传性文章中已经根本不忌讳使用外来语，而据我所知，大家并没有因此提出抱怨。从那时以来，我们的工人已经更多地和更经常地阅读报纸，因此也更多地熟悉外来语。我只限于删去一切不必要的外来语。那些必不可少的外来语，我没有加上所谓解释性的翻译。这些必不可少的外来语大部分是通用的科学技术用语，如果能翻译出来，那就不是必不可少的了。这就是说，翻译只能歪曲这些用语的含义；它解释不清楚，反而会造成混乱。在这里，口头的解释会有更大的帮助。

相反，在内容方面，我可以肯定地说，对德国工人来说困难是不多的。总的说来，只有第三部分是困难的，但是对工人，比对“有教养的”资产者，困难要少得多，因为这一部分正是概括了工人的一般生活条件。至于说到我在这里加上的许多说明，那么实际上我与其说是考虑到工人，不如说是考虑到“有教养的”读者，如议员冯·艾内恩先生、枢密顾问亨利希·冯·济贝耳先生以及特赖奇克之流的人物，他们为不可遏制的欲望所驱使，总是一再确凿无误地表明他们的惊人的无知以及因而可以理解的对社会主义的巨大的误解。唐·吉珂德手执长矛同风车搏斗，这是合乎他的身份和所扮演的角色的；但是，我们不能容许桑乔·潘萨去做这类事情。

这样的读者也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简述中提到康德—拉普拉斯的天体演化学，提到现代自然科学和达尔文，提到德国的古典哲学和黑格尔。但是，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德国的产物，而且也只能产生在古典哲学还生气勃勃地保存着自觉的辩

证法传统的国家,即在德国^①。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德国资产阶级的学究们已经把关于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及其创立的辩证法的记忆淹没在一种无聊的折衷主义的泥沼里,这甚至使我们不得不援引现代自然科学来证明辩证法在现实中已得到证实,而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却以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2年9月21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82年9月
21日

载于1882年在霍廷根—苏黎
世出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
科学的发展》一书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8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27卷翻译

① 1891年柏林版中,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条脚注:“‘在德国’是笔误,应当说‘在德国人中间’,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必须有德国的辩证法,同样也必须有英国和法国的发达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德国的落后的——40年代初比现在还落后得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阶段,最多只能产生社会主义的讽刺画(参看《共产党宣言》第三章(丙)《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有在英国和法国所产生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受到德国辩证法的批判以后,才能产生真正的结果。因而,从这方面看来,科学社会主义并不完全是德国的产物,而同样是国际的产物。”这条脚注在1883年德文第1版中是篇末注,题为“对序言作的注”,原著的第1段是对“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即在德国”这一整段话的重述。——编者注

弗·恩格斯

燕妮·龙格(父姓马克思)³³⁷

1月11日,卡尔·马克思的长女、约八年前同前巴黎公社委员、现任《正义报》编委沙尔·龙格结婚的燕妮,在巴黎附近的阿让特伊去世了。

她生于1844年5月1日。她是在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环境中长大的,同这个运动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尽管她拘谨得几乎可以被看成羞怯,但是在必要的时候,她却表现出某些男子也会羡慕的沉着和刚毅。

当爱尔兰的报刊揭露了1866年和后来被判罪的芬尼社社员在监狱中所受到的虐待,而英国报刊闭口不谈这些卑鄙行为的时候,当格莱斯顿内阁违背在选举时所许下的诺言,拒绝赦免犯人而且丝毫不改善他们的处境的时候,燕妮·马克思找到了推动这位笃信宗教的格莱斯顿先生的办法。她在罗什弗尔的《马赛曲报》上刊登了两篇文章³³⁸,以炽热的笔调描述了自由的英国是怎样对待政治犯的。她的文章发生了作用。巴黎大报的揭露是无法忍受的。几个星期以后,奥顿诺凡-罗萨和其他大多数人都被释放并启程到美国去了。

1871年夏天,她同最小的妹妹到波尔多看望妹夫拉法格。拉法格、他的妻子、他的有病的孩子和这两位姑娘从那里前往比利牛斯山脉巴涅尔-德吕雄矿泉。一天清晨,有一位先生来见拉法格,对他

说：“我是警官，但我是共和派；逮捕您的命令已下达，他们已经知道您曾经负责波尔多同巴黎公社的联络。您现在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越过国境。”

拉法格带着妻子和孩子幸运地翻越山路到了西班牙。警察局为此向两位姑娘进行报复，逮捕了她们。燕妮的口袋里有一封在巴黎附近牺牲的公社领袖古斯塔夫·弗路朗斯的信。如果这封信被搜出，它将成为她们二人到新喀里多尼亚岛³³⁹旅行的一份最有效的护照。在单独留在室内的瞬间，她打开了一本旧的、复盖着灰尘的登记簿，把信夹在中间，再把它合上。这封信可能现在还在那里。两位姑娘被带进省长办公室，这位省长，高贵的凯腊特里伯爵、老波拿巴主义者，对她们严加审问。但是这位前外交官的狡猾和前骑兵军官的粗暴，碰到燕妮的从容不迫、滴水不漏都失败了。凯腊特里对于“看来是这一家的妇女们所独具的毅力”说了些狠毒的话，就怒气冲冲地走出了房间。在同巴黎长时间的电报往来以后，他终于只好释放了这两位姑娘，她们在拘押时受到了真正普鲁士式的待遇。

燕妮一生中的这两件事情充分表明了她是怎样一个人。无产阶级失去了她这样一个英勇的战士。但是，她的悲痛万分的父亲至少还有这样一种安慰，这就是欧美千百万工人分担着他的悲痛。

弗·恩格斯

1883年1月13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83年1月
13日

载于1883年1月18日《社会民
主党人报》第4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25卷翻译

弗·恩格斯

*给《纽约人民报》的电报³⁴⁰

1883年3月16日于伦敦

卡尔·马克思于本月14日,星期三,下午三时在法国阿让特伊逝世。数星期以来马克思患支气管炎,又加上肺脓肿,最后由于内出血而逝世。他安然死去,并无痛苦。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弗·恩格斯写于1883年3月
16日

载于1883年3月17日《纽约人
民报》第66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25卷翻译

弗·恩格斯

* 马克思墓前讲话草稿³⁴¹

就在 15 个月以前,我们中间大部分人曾聚集在这座墓穴周围,当时,这里将成为一位德高望重、心地高尚的女性最后安息的地方。今天,我们又掘开这座墓穴,把她丈夫的遗体放在里面。

卡尔·马克思是百年少有的杰出人物之一。查理·达尔文发现了我们星球上有机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则发现了决定人类历史运动和发展的基本规律,这是一个浅显易懂的规律,几乎仅仅是简单地把它讲出来即足以得到人们的承认。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这个规律造成了我们的社会现状和这个社会的阶级大分化——分化成资本家和雇佣工人^①;现在这个社会就是按照这个规律组织起来、成长起来的,一直成长到差不多已经过了时,而且就是按照这个规律,这个社会最终必将像所有以前的社会历史阶段一样灭亡。由于他取得了这样的成果,所以令我们更加痛心的是^②:我们在他全力工作着的时候失去了他,虽然他已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可

① 在法译文里,紧接着还加有:“两个对抗阶级”。——编者注

② 在法译文里,这句话改为:“所以马克思的逝世给社会主义带来莫大的损失,尤其是:”。——编者注

是他还有更多的工作没有完成。

尽管他热爱科学,但是他远非完全埋头于科学。如果什么地方有了新的科学成就,不论能否实际应用^①,马克思比谁都感到莫大的喜悦。但是,他把科学首先看成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杠杆,看成是按最明显的字面意义而言的革命力量。而且他正是在此意义上,并为此目的,运用他所掌握的渊博的知识,特别是有关历史的一切领域的知识。

因为,他确实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一个革命家。为雇佣工人阶级摆脱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制度的桎梏而斗争,这是他真正的生命要素。从来还没有过一个比他更积极的战士。他这部分工作的顶峰就是建立国际工人协会,他从1864年到1872年是协会公认的领袖。就外在形式而言,这个协会已不复存在;但是欧美所有文明国家工人的兄弟般的同盟关系永远地确立了,而且即使没有任何表面上的同盟形式,它也会继续存在下去。

凡是为某种事业进行斗争的人,都不可能不树敌,所以他树敌很多。在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活中,他是欧洲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但他对诬蔑几乎从来是毫不在意。如果世界上有谁以自己一生的表现推翻了所受的诬蔑,那就是他。^②在他死的时候,他可以骄傲地看到,在欧洲和美洲的工厂里、甚至还有西伯利亚的矿井里^③,他有着

① 在法译文里,这句话改为:“不论是属于实际应用的,还是属于纯理论的”。——编者注

② 在法译文里,这句话改为:“终能使诬蔑破产者,莫过于他”。——编者注

③ 在法译文里,这句话改为:“从西伯利亚的矿井到欧洲和美洲最遥远的地区”。——编者注

千百万的追随者；他看到，他的经济理论已被看作是世界社会主义的无可争辩的信条，如果说他还有许多反对者的话，私敌恐怕连一个也没有。^①

弗·恩格斯写于 1883 年 3 月
14—17 日

载于 1883 年 3 月 20 日《正义
报》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5 卷翻译

① 在法译文里，以下还另起一段话：“马克思在私生活方面是怎样一个人，他怎样对待自己的家庭和朋友，此时此刻我已经没有力气来描述。不过也无需由我来描述，因为你们所有到这里来向他最后告别的人，都知道这方面的情况。

永别了，马克思！你的事业和你的英名将永垂不朽。”——编者注

弗·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的葬仪³⁴²

3月17日,星期六,在海格特公墓,马克思被安葬在15个月以前安葬他的夫人的同一个墓穴里。

在墓地上,哥·莱姆克代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和发行部,代表伦敦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向马克思的灵柩献上了两只系着红绸带的花圈。

随后,弗·恩格斯用英语发表了一篇讲话,内容大致如下:

“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还不到两分钟,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永远地睡着了。

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不久就会使人感觉到。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

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

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例如,他曾经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³⁴³。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最早的《莱茵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184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

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作为全部活动的顶峰,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没有别的什么建树,单凭这一成果也可以自豪。

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竞相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给以回敬。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可以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接着,马克思的女婿龙格宣读了收到的以下几篇法文挽词:

一、“俄国社会主义者

给卡尔·马克思的挽词:

我谨代表全体俄国社会主义者向当代社会主义者杰出的大师致最后的永别的敬意。一位最伟大的智者永逝了,一位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者斗争最坚决的战士与世长辞了。

俄国社会主义者正在进行曲折变化的残酷的斗争,而且在社会革命原则取得最后胜利以前决不终止这一斗争,现在,我们在这位同情我们种种努力的人物的墓前,表示深切的哀悼。俄罗斯语言是最先拥有《资本论》这部现代社会主义福音书译本的语言。俄国大学生最先听到以赞许的口吻对于这位我们现在已经失去了的伟大思想家的理论所做的介绍。甚至那些在具体组织问题上和

国际工人协会的这位奠基者意见相左的人,也无不为他那揭示现代资本的本质、揭示经济的社会形式的发展过程以及整个人类历史同这种发展形式的依赖关系的渊博知识和高度洞察力所折服。甚至那些他在革命的社会主义者队伍中所遇到的最激烈的反对者,也不能不听从马克思和他的终生的友人35年前共同提出的号召: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卡尔·马克思的逝世使一切能够理解他的思想和估价他对当代的影响的人感到悲痛。

请允许我补充一句,他的逝世使那些在亲密的交往中熟悉他的人,特别是那些像爱戴挚友一样爱戴他的人感到更加悲痛。

彼·拉甫罗夫

1883年3月15日于巴黎”^①

二、唁 电

“法国工人党巴黎联合会对这位思想家的逝世表示哀悼。他的唯物史观以及他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和革命的现代共产主义运动。巴黎联合会还对马克思的为人深表尊敬,对他的学说表示完全赞同。

书记 莱 宾

1883年3月16日于巴黎”^①

三、唁 电

“惊悉伟大的社会主义者,我们共同的导师不幸逝世,我谨以个人和西班牙工人党(马德里联合会)³⁴⁴代表的名义,向马克思的友人和女儿表示我们深切的哀痛。

^① 唁电落款的时间和地点是恩格斯根据邮戳加上去的。——编者注

何塞·梅萨-列奥姆帕特

1883年3月16日于巴黎^①

接着,李卜克内西用德语发表了演说:

“为了表达对难忘的导师和忠实的朋友的爱戴和感激,我从德国中部来到这里。忠实的朋友啊!他的最老的朋友和战友刚才说,卡尔·马克思是本世纪最遭嫉恨的人。不错,他是最遭嫉恨的人,但他也是最受爱戴的人。最嫉恨他的是人民的压迫者和剥削者;最爱戴他的是已经觉悟到本身地位的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众爱戴他,因为他热爱他们。我们对马克思的逝世感到不胜悲痛。他的爱同他的恨是一样地伟大。他的恨是由爱产生的。他不仅具有伟大的智慧,而且还有伟大的心灵。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知道这一点。

然而在这里,我不仅是他的学生和朋友,而且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党委托我表达它对自己的导师和缔造者(如果在这方面可以说缔造的话)的感情。

说漂亮话在这里是不适宜的。卡尔·马克思最讨厌空话。他的不朽的功绩正在于,他把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党从空话下面解放出来,并给了党一个坚实的牢固的科学基础。他是科学上的革命家,是运用科学的革命家,他登上了科学的最高峰,是为了从那里走向人民,使科学成为人民的共同财富。

科学是人类的解放者。

自然科学把我们从小神那里解放出来。天上的神尽管被科学消灭了,但它仍然活着。

马克思向人民揭示的社会科学正在消灭资本主义,同时也在消灭人间的偶像和权贵,而只要这些人活着,他们就不会让神死去。

科学不属于德国。科学没有任何界限,尤其没有民族界限。因此,《资本论》的创作者自然应当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的缔造者。

我们把科学基础的奠定归功于马克思,这种科学基础使我们能够反抗敌人的任何进攻,使我们能够以日益壮大的力量不断地进行我们已经开始的斗争。

马克思使社会民主主义从宗派、从流派变成政党,这个政党正在所向无前地进行斗争并将取得胜利。

而且,不仅对我们德国人是如此。马克思是属于无产阶级的。他的一生都

^① 唁电落款的时间和地点是恩格斯根据邮戳加上去的。——编者注

献给全世界无产者了。全世界能够思考的、有思想的无产者都对他表示感激和尊敬。

我们蒙受了沉重的打击,但是我们决不会耽于悲痛。他并没有死。他活在全无产阶级的**心里**,他活在全无产阶级的**思想里**。人们将永远怀念他,他的学说将会在**越来越多的人群中**产生影响。

我们不会耽于悲痛,而要本着已故伟人的精神去**行动**;我们要竭尽全力去争取早日**实现他的教导和他的志向**,这就是我们对他的最好的纪念。

虽死犹生的朋友! **我们一定沿着你所指出的道路前进,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这就是我们在你的墓前的誓言!”

除上述几个人之外,参加葬仪的还有马克思的另一个女婿保尔·拉法格、1852年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中被判处五年要塞监禁的弗里德里希·列斯纳、同是共产主义者同盟老盟员的格·罗赫纳。此外,代表自然科学界的是两个第一流的著名人士:动物学家雷·朗凯斯特教授和化学家肖莱马教授;他们两人都是伦敦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³⁴⁵的会员。

弗·恩格斯

弗·恩格斯写于1883年3月
18日前后

载于1883年3月22日《社会民
主党人报》第13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25卷翻译

弗·恩格斯

致《纽约人民报》编辑部³⁴⁶

1883年4月18日于[伦敦]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致《纽约人民报》编辑部

在你们15日那一号报纸上，你们把我打给左尔格的电报，作为打给你们的电报发表了。

在17日那一号报纸上，你们报道说，我打电报告诉你们，马克思逝世于阿让特伊^①。

我们这里不习惯于让自己如此放任地对待别人的名字，或允许别人用同样的态度对待自己。

你们这样做，就使得我今后不能向你们通报任何消息了。

如果你们的报纸再次这样滥用我的名字，那你们就迫使我不

^① 见本卷第590页。——编者注

不请求我的老朋友左尔格声明：这全是你们一手捏造的。

忠实于你们的 弗·恩·

弗·恩格斯写于 1883 年 4 月
18 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35 年俄文第 1
版第 27 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5 卷翻译

弗·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的逝世³⁴⁷

在这件令人悲痛的丧事料理完之后，我还接到一些表示哀悼的函电，这说明它引起了何等广泛的反响，而报道这些情况是我的责任。

3月20日，爱琳娜·马克思女士接到《每日新闻》编辑部转来的一份法文电报，电文如下：

“莫斯科，3月18日。伦敦《每日新闻》编辑部。敬请转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作者、已故的卡尔·马克思的挚友恩格斯先生，请他代购花圈一个献在《资本论》的不朽作者的灵柩上。题词如下：

‘献给维护劳动者权利^①的理论及争取其实现的战士。莫斯科彼得罗夫农学院学生敬挽。’

请恩格斯先生惠示地址及花圈价格，垫款即还。

莫斯科彼得罗夫农学院学生”

① 法文电文为“劳动权利”。——编者注

电报当然没有赶上3月17日举行的葬礼。

其次,3月31日,我们的朋友彼·拉甫罗夫从巴黎汇来彼得堡工艺学院学生和在大学求学的妇女寄给他的124法郎50生丁(折合4英镑18先令9便士)。这笔钱也是用来购买献在卡尔·马克思墓前的花圈的。

再次,《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周报道说,敖德萨的大学生也要求以他们的名义买花圈献在马克思的墓前。

因为从彼得堡收到的钱足够买三个花圈,我就冒昧地用这笔钱替莫斯科和敖德萨的大学生也各买了一个花圈。³⁴⁸制作题词在这里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耽误了一些时间,但是这几个花圈在下星期初总是可以献上的,那时我就可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报告我收到的这笔钱的花费情况。

通过这里的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我们还收到自索林根寄来的一个美丽的大花圈,上面写着:“献给卡尔·马克思。索林根刀剑剪业工人敬挽”。当我们于3月24日去献这个花圈时,我们发现,《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献的花圈上的长条红绸带,不知被哪个毁坟者剪下偷走了。向管理处申诉也无济于事,但也许将来会看管得好一些。

瑞士的一个斯拉夫协会³⁴⁹

“希望为纪念卡尔·马克思筹集一笔以马克思命名的国际基金,以便帮助伟大解放斗争中的受害者,并支援这一斗争”;

同时还寄来第一批捐款。这笔钱暂时保存在我这里。当然,这个倡议的命运首先取决于它能否博得赞同,所以我在这里加以公布。

为了用事实来驳斥报纸上传播的谣言,我想简单地谈一谈我们

伟大的理论领袖患病和逝世的经过。

马克思在卡尔斯巴德经过三次治疗之后,他的慢性肝脏病差不多已经痊愈,只是慢性胃病和神经衰弱仍然使他感到痛苦,他常常头痛,而特别厉害的是顽固性的失眠。在夏季经海水浴和空气浴疗养以后,这两种病没有怎么犯,只是新年过后,又更严重地复发了。一般说来,慢性咽喉疾病,影响睡眠的咳嗽和慢性支气管炎并没有什么妨害,但正是这些病症使他元气大伤。在他妻子逝世前四五个星期,他突然患了由于支气管炎和刚得的肺炎(Pneumonie)而并发的严重的肋膜炎(Pleuritis)。当时病势非常危险,但是也顺利地过去了。随后,让他先到怀特岛(1882年初),再到阿尔及尔去。一路上天气寒冷,他到阿尔及尔时,又患了肋膜炎。在通常的情况下,肋膜炎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病,但是,去年阿尔及尔的冬季和春季反常地寒冷多雨,4月,人们试图在餐厅里生火取暖,又没有生成!这样一来,整个身体状况非但不见好转,反而恶化了。

马克思离开阿尔及尔后就上蒙特卡洛(摩纳哥)去,由于渡海途中天气寒冷潮湿,到那里的时候,他第三次得了肋膜炎,但病势较轻。那里的坏天气持续不断,好像是他特地从非洲带去似的。这样,他在那里不仅没有恢复健康,反而又得同新的疾病作斗争。初夏,他去阿让特伊他女儿龙格夫人那里,用附近昂吉安硫矿泉水浴来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尽管夏季阴雨连绵,治疗还是有进展,虽然进展较慢,但医生对此感到满意。后来医生又要他到日内瓦湖畔的沃韦去疗养;在那里他的健康状况大有起色,医生虽然没有允许他回伦敦,不过还是允许他到英国南部海滨去过冬。在这里马克思终于又决定恢复自己的工作。9月他回到伦敦,那时他看来是健康的,常常同我一起爬上汉普斯特德荒阜(比他的住宅大约高300英尺)而并没有感到

什么不适。11月浓雾即将降临的时候,大家让他到怀特岛南端的文特诺去。但是,那里的气候又是多雨多雾,结果又难免伤风咳嗽等等,总之,不能在室外作健身运动,整日蛰居室内,损害了他的健康。就在这时,龙格夫人去世了。次日(1月12日),马克思回到伦敦,他的支气管炎发作了。不久,又并发喉头炎,使他几乎什么东西都不能下咽。他泰然自若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宁愿喝一升牛奶(这是他生平最厌恶的东西)而不吃某些硬的食物。2月间肺部出现脓肿。15个月来他已经服用过各种药品。现在,药物对他的身体已经失去效用,只能使他食欲不振,消化不良。他明显地消瘦,几乎一天比一天消瘦。可是整个病情相对说来还是在好转。支气管炎已几乎痊愈,吞咽也比较容易了。医生表示大有希望。但是那天下午两三点钟(这是最适宜于探望他的时间),我突然发现全家人都在掉眼泪,他们告诉我:他很虚弱,恐怕要不行了。可是那天早晨他胃口还好,喝了葡萄酒、牛奶和汤。在马克思家40年、从小抚育他所有孩子的忠实的老琳蕙·德穆特,上楼到他那里去,但立刻转回来说:“请跟我来,他快睡着了。”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他已经睡着了,但是永远地睡着了。卡尔·马克思是坐在安乐椅上去世的,没有比这样的死再安详的了。

现在,在结束本文的时候,谈一个好消息:

《资本论》第二卷的手稿全部保存下来了。目前这样的手稿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付印,我还不能断定,手稿有大开纸1000多页。但是,《资本的流通过程》和《总过程的形式》,已在1867—1870年整理完毕。以后加以整理的手稿的开头部分已经整理好了,并有大量评论性的摘录材料,特别是关于俄国土地所有制关系的材料;这些摘录大概有很多可以利用。

他亲口指定他的幼女爱琳娜和我为他在著作方面的遗嘱执

行人。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3年4月28日于伦敦

二

爱尔福特社会民主党人赠送的、题词写在红色绸带上的美丽的花圈送到了阿让特伊。碰巧找到一个人,就顺便把花圈带来了。向墓地献这个花圈时,发现索林根送来的花圈上的红色绸带又被人偷走了。

当时莫斯科、彼得堡和敖德萨赠送的三个花圈已经做好。为了不使绸带被偷,我们不得已把绸带的两边稍微剪破一点,使这些绸带不能再作别的用处。昨天献了这些花圈。一场大雨把爱尔福特花圈的绸带淋得不能再作其他用处了,因此它没有被人偷走。

这三个花圈每个价值1英镑1先令8便士,总共3英镑5先令。因此,汇给我的4英镑18先令9便士,剩下了1英镑13先令9便士,我把这些钱寄还给了彼·拉甫罗夫,让他按照赠送者的意见处理。

大人物的去世是小人物捞取政治资本、著作资本甚至现金资本的好机会。我在这里只举几个应当让大家知道的例子。很多属于私人通信的材料就不必谈了。

纽约中央劳动联合会³⁵⁰书记菲力浦·范派顿写给我的信(今年4月2日)说:

“不久以前举行了纪念卡尔·马克思的集会，一切派别在这次集会中都联合起来，向已故的思想家表示敬意，这时，约翰·莫斯特和他的朋友们大吵大嚷地宣布，他，莫斯特个人同卡尔·马克思交往密切，他在德国进行了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的通俗化工作，而马克思赞同莫斯特所作的宣传。——我们对马克思的天才和活动评价很高，我们不可能相信，他会支持莫斯特的无政府主义的破坏性的思想和活动方式。所以，我想听听您的看法：马克思对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问题抱怎样的态度？莫斯特不合时宜的荒唐胡诌已经引起一片混乱，听到像马克思这样具有极高威信的人竟会赞同这种策略，我们甚感不悦。”

我在4月18日回了一封信，我在这里把这封回信译成德文：³⁵¹

“你们在4月2日来信问我，卡尔·马克思对无政府主义者，特别是对约翰·莫斯特抱什么态度，我的答复是简短而明确的。

马克思和我从1845年起就持有这样的观点^①：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之一，将是称为国家的政治组织逐步解体直到最后消失。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从来就是依靠武装力量保证富有的少数人对劳动者多数的经济压迫。随着富有的少数人的消失，武装压迫力量或国家权力的必要性也就消失。同时我们始终认为，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的这一目的以及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阶级应当首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这一点在1847年写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章末尾已经阐明。

无政府主义者把事情颠倒过来了。他们宣称，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从废除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开始。但是，无产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于1845—1846年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者注

遇到的惟一现成的组织正是国家。这个国家或许需要作一些改变，才能完成自己的新职能。但是在这种时刻破坏它，就是破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用来行使自己刚刚夺取的政权、镇压自己的资本家敌人和实行社会经济革命的惟一机构，而不进行这种革命，整个胜利最后就一定归于失败，工人就会大批遭到屠杀，巴黎公社以后的情形就是这样。

这种无政府主义的谬论从巴枯宁用现在的形式把它提出来的第一天起就遭到马克思的反对，这难道还需要我特别证明吗？国际工人协会的整个内部的历史证实了这一点。从1867年开始，无政府主义者就企图用各种最卑鄙的手段夺取国际的领导权；他们遇到的主要障碍就是马克思。经过五年的斗争，终于在1872年9月的海牙代表大会¹⁰⁸上把无政府主义者驱逐出国际；在驱逐无政府主义者这件事情上出力最大的就是马克思。如果你们希望知道更详细的情况，我们的老朋友、出席那次大会的代表，霍博肯的弗·阿·左尔格可以告诉你们。

现在谈一下约翰·莫斯特。

如果有人断言，莫斯特在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以后，同马克思有过某种联系或得到过马克思的某种支持，那他不是受骗，就是在蓄意撒谎。在伦敦《自由》周报创刊号出版以后，莫斯特不过到马克思或我这里来过一两次。我们没有到他那里去过，也从来没有偶然遇见过他。最后我们甚至干脆不再订阅他的报纸，因为上面‘实在毫无内容’。我们对他的无政府主义和他的无政府主义策略，像对教会他这一套的那些人一样地蔑视。

莫斯特在德国的时候,就发表了马克思《资本论》的《浅说》^①。有人曾请马克思审阅一下这本书,以便出第二版。我同马克思一起做了这项工作。我们发现,如果我们不愿意从头到尾改写该书,那么只有删掉莫斯特最荒唐的谬论,没有任何别的办法。马克思只是在下述明确的条件下才容许把他的修改加进去,这个条件就是他的名字永远不能同约翰·莫斯特的拙劣著作,即使是它的修订本有任何联系。

如果愿意,你们可以发表这封信。”

上面谈了美国,下面谈意大利。

大约两年以前,有一个年轻的意大利人即曼图亚的阿基尔·洛里亚先生,把他的一本关于地租的书^②寄给了马克思,并且附了一封德文信,在信中自称是马克思的学生和崇拜者。他同马克思有一段时间还通过信。1882年夏天他来到伦敦,到我这里来过两次。他第二次到我这里时,我曾经就他在当时出版的一本小册子^③中责备马克思有意篡改引文这件事,郑重地向他提出了意见。

现在,这个从德国讲坛社会主义¹¹⁶者那里借用到智慧的小人物,在《最新集萃》上写了一篇关于马克思的文章^④,并且恬不知耻地

① 约·莫斯特《资本和劳动。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浅说》1873年茨维考—开姆尼茨版。——编者注

② 阿·洛里亚《地租和地租的自然消失》1880年米兰—那波利—比萨版。——编者注

③ 阿·洛里亚《意大利经济学家的价值理论》1882年博洛尼亚版。——编者注

④ 指阿·洛里亚《卡·马克思》,载于1883年4月1日《科学、文学和艺术最新集萃》杂志(罗马)第7号第509—542页。——编者注

把文章的单行本寄给我,称我是“自己最尊敬的朋友”(!!)。他无耻在哪里,下面我的复信的译文可以表明(我的信是用他的母语写的,因为他的德文比我的意大利文还差):

“我收到了您关于卡尔·马克思的小文。您可以随便对他的学说进行最苛刻的批评,甚至加以曲解。您可以随便全凭臆想写出马克思的传略。但是,您不可以随便诽谤我的亡友的品德,而且我也永远不允许任何人这样做。

您在过去的一篇文章中就无礼指责过马克思有意篡改引文。马克思读了以后,把他的和您的引文对了原著,他对我说,他的引文是正确的,如果说这里有人故意篡改引文,那就是您。我看到,现在您是怎样引用马克思的话,您是怎样无耻地要他在说‘**剩余价值**’的地方说‘**利润**’——而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警告过,不要把这两者误认为是同一个东西(此外,穆尔先生和我又在伦敦这里向您口头解释过这一点),——那我就知道,我应当相信的是谁,是谁有意篡改引文。

但同您下面的信念相比,这只是一件小事。您‘**坚决深信……自觉的诡辩支配着全部(马克思的学说)**’;马克思‘**不惜作出错误的结论,虽然他明明知道这些结论是错误的**’;他‘**常常是一个愿意以牺牲真理来否定现存制度的诡辩者**’,用拉马丁的话来说,他‘**玩弄谎言和真理就像小孩子玩色子一样**’。

在意大利这个古代文明的国家里,这大概可以看作是恭维。就在讲坛社会主义者中间,这一类话也可能认为是很高的赞语,因为这些堂堂的教授除非‘**牺牲真理**’就永远不能编造出自己的数不清的各种体系。我们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对事情有另外的看法。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有损名誉的指责,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捏造的,因此我们把它奉还给说这种话的人,他臆造这种说法只能败坏自己的名声。

我觉得,您的责任是告诉读者,支配着马克思的全部学说的这个了不起的‘自觉的诡辩’,究竟表现在哪里。我去找了,但是没有找到。Nagott! (很有力的伦巴第用语:根本没有。)

一个人要有何等卑鄙的灵魂,才会设想,像马克思这样的人‘经常拿第二卷来威胁自己的反对者’,而‘他根本没有想过’要写这个第二卷;这个第二卷无非是‘马克思借以回避科学论据的狡猾诡计’。这个第二卷就在我手里,不久就要发表。那时,您大概终于学会如何理解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区别。

这封信的德译文将发表在最近一号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我荣幸地怀着您所配享的种种感情向您致意。”

今天就写这些。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3年5月12日于伦敦³⁵²

弗·恩格斯写于1883年4月
23—28日和5月12日

载于1883年5月3日和17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9号和
第21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25卷翻译

附 录

*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在 1876 年 2 月 7 日伦敦工
人教育协会成立 36 周年
庆祝会上的讲话³⁵³

摘自《人民国家报》刊载的卡尔·沙尔写的报道

接下来卡尔·马克思同志谈到协会³⁶成立以来的活动。协会于 1840 年由卡尔·沙佩尔和六位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创立。在协会中有一个团体,这就是当时在许多国家活动和反对压迫人民的“正义者同盟”³⁵⁴。参加创立协会的有四五个民族。1845 年,在伦敦召开了一个代表大会,会上制定了共产主义宣言,它的口号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接着,马克思非常引人入胜地讲述了当时的种种联系并报告说当时成员达到 400—500 人。1848 年 3 月,协会被英国政府查禁,英国政府通常是不轻易采取警察措施的。查禁的原因可能是协会大力支持宪章运动²²⁹。“正义者同盟”1849 年被解散,随后它的许多成员移居美国。50 年代,协会的活动多半限于内部,但它始终是被迫害者和被压迫者的避难所。然后,马克思把话题转到当前的运动,并强调指出协会对当前运动的高涨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希望今后仍然如此。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同志首先缅怀为正义和真理而斗争的忠诚的先驱——威廉·魏特林。他实际上是第一个努力在德国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人。他被瑞士引渡给普鲁士政府，而普鲁士政府毫无理由地相当长一段时间把他关押在监狱里。魏特林在美国去世。他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是根据他的朋友们的建议出版的。另外，讲话人还缅怀了莫尔同志。莫尔是协会第一批会员，在南德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牺牲。然后，讲话人谈到德国的运动，他认为，德国的运动已经壮大到过去任何国家所不能比拟的程度。讲话人认为，因为有像俾斯麦、欧伦堡和泰森多夫这样一些鼓动家为社会主义运动出力，社会主义运动必定会继续发展。

符卢勃列夫斯基同志用法语讲了话，他说，只要波兰人一息尚存，他们就要捍卫伟大的工人运动；他们将用自己的言行来证明，哪里在为无产阶级的事业进行战斗，哪里就是他们的岗位。讲话人高呼世界各国的工人运动万岁。

恩格斯同志把符卢勃列夫斯基的讲话译成德文，然后又对他的活动作了一些介绍。他说，符卢勃列夫斯基是一位将军，1863年波兰革命期间，他机智地以一个小分队牵制住俄国的两支大部队；他被俄国政府判处死刑，克服了重重危险逃到巴黎，在那里做工谋生。巴黎公社起义时，他参加了公社的战斗，保卫巴黎南面；虽然他被凡尔赛人也判处了死刑，但却成功地逃了出来；他身上有伤，现在仍受着伤痛的折磨。

载于1876年2月27日《人民国家报》第24号

署名：卡尔·沙尔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8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25卷翻译

马尔特曼·巴里

格莱斯顿先生和俄国的阴谋³⁵⁵

格莱斯顿先生在《现代评论》11月号上写的《俄国在突厥斯坦的政策和行动》一文中讲的是，如他自己所说，“(1)斯凯勒先生著作中提出的指控，”——如《派尔—麦尔新闻》所指出，他把这一指控肆意歪曲，“所用方式之厚颜无耻令人吃惊”——还有“(2)我所见到的辩护，”——他说——“这是由最近《每日新闻》发表的一篇署名为‘一个俄国人’的通讯提出的。我从一位朋友那里获知，这篇通讯得到了俄国驻伦敦武官戈尔洛夫将军的首肯”。“一个俄国人”的通讯最可恶的一点就是，无耻地否认考夫曼将军下达给戈洛瓦乔夫将军的那道“凶狠毒辣的”命令的可信性。命令的内容是，把约穆德人及其家属所居住的村落消灭干净，并没收他们的畜群和财产。斯凯勒先生在给《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已经把“一个俄国人”最终解决掉了。还是让我们回过头来谈格莱斯顿先生吧。前面引述的他那些话显露出一种幼稚般的单纯。这种单纯表现在像他这般年纪的人身上，本来无疑很能博得人们同情，但是表现在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身上，那就很反常了。世界上大多数对俄国人为否认俄国暴行提出的证据都会投以怀疑的目光，哪怕这种证据是得到了俄国政府一个什么人“首肯”的。然而，格莱斯顿先生自己却是那么实在和坦诚，他不能想像

别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想像俄国使馆的密探——会具有欺诈之心或双重人格。因此，他号召英国人民也像他一样相信“一个俄国人”的诚实证言和**戈尔洛夫**将军的不怀私心的“首肯”。

由于此事表面之下还大有文章，我们可以毫不客气地提出以下的问题，请那些有责任回答的人直截了当地回答。

第一就是人们想知道，**格莱斯顿**先生在《现代评论》上引为依据的“一个俄国人”的通讯是否出自**戈尔洛夫**将军的手笔？如果不是出自他的手笔，是否出自他的“授意”？

第二，在通讯交《每日新闻》发表之前，**格莱斯顿**先生是否已经知道有这样一篇东西存在？

第三，得到了俄国驻圣詹姆斯宫^①武官“首肯”的这篇通讯，按其原稿，意在回答《派尔—麦尔新闻》和英国报界其他主要反俄派，这是否属实？

第四，“一个俄国人”的通讯是否曾交给**格莱斯顿**先生审阅过？

第五，**格莱斯顿**先生是否竟不惜有失身份，而在《现代评论》上的他那篇文章里利用了“一个俄国人”的通讯原稿中的什么说法，来加强自己的论据？

有一件事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真的：被认为是通讯作者的**戈尔洛夫**将军，满心要向他的皇帝主子邀宠，原本打算在这个发表后立即被许多人看穿了的有趣文件上签署他自己的名字。可是假定他曾天真地决定这样做，无疑他的那位比较小心谨慎的上司**舒瓦洛夫**伯爵肯定会循例加以制止，即使实际上也许不是因为有了**舒瓦洛夫**的

① 圣詹姆斯宫是1689—1837年间英国的旧王宫；迄今仍为英国宫廷的正式名称。此处指英国。——编者注

禁令他才没有这样做。

如果让**诺维科夫**夫人自由讲话,毫无疑问她能使这件很需要一番解释的事情变得清楚得多。例如,她会告诉我们是否曾安排好向《每日新闻》投送两篇通讯;是否决定由**戈尔洛夫**将军写一篇(“一个俄国人”),由**诺维科夫**夫人写另一篇(“另一个俄国人”)。弄清这些问题在目前这个时候是令人深感兴趣的,现在俄国正动用它全部既神秘莫测又肆无忌惮的外交手段,来掩盖它的“政策”在君士坦丁堡遭到的看来无可挽回的失败。人们尤其更想知道**格莱斯顿**先生是否被要求援引那两篇奇怪的通讯,作为他卖力地、顽固地——其顽固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解释——否认俄国在突厥斯坦的暴行的依据。而关于那些残忍的野蛮行径,我们是有客观公正的证据的,如**斯凯勒**先生和**伯纳比**上尉的证言。

不管怎样,整个这件事需要立即给以充分的解释。流传着令人厌恶的传说,即**沙皇**密探正在图谋把一部分英国报刊“拉过去”。而英国报刊的自主和自由就意味着英国人民的自主和自由。我们一刻也不相信,我国任何一家报纸会去给俄国或任何别国充当辩护者,不论它们会给什么样的贿赂。而且我们也不会轻易地相信,随便哪一个处于任何地位的英国人能这样盲目地和不计后果地钻进一个俄国间谍设下的拙劣圈套,不论这个俄国间谍是男的还是女的。

马·巴里写于1877年1月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77年2月3日《白厅评论》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25卷翻译

马尔特曼·巴里

格莱斯顿先生³⁵⁵

考虑到格莱斯顿先生在我国仍有巨大的个人影响，我们觉得应该对他最近的政治业绩进行比较仔细的考察而不必表示歉意。而且，考虑到议会关于东方问题的辩论（这位前首相在辩论中自充主角），考虑到俄国外交界的秘密行动所包藏的对欧洲和平的威胁，不论是谁，不论通过任何偶然机会获知有关这些行动的情况，都有义务把他所获知的公之于众，即使这样做在政治上会毁掉一位本来很受尊敬、很有地位的政治家。如果是在别的时候，别的条件下，或者还能够允许像通常那样以过去的功劳和个人的面子为重。现在却不行。受到威胁的不仅是全民族的利益，而且是全欧洲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听从除真理和正义以外的任何劝诫，那实在是犯罪的软弱表现。

人们记得首家大报^①不久前刊登了一封信的摘录。摘录中指责格莱斯顿先生给诺维科夫夫人——俄国驻伦敦使馆的一个臭名昭著的密探——写过几封据说是出卖原则的信。该报在这段摘录的后面还附有格莱斯顿先生给设菲尔德的一位先生的复信，那位先生曾要

^① 指《泰晤士报》。——编者注

求这位前自由党领袖^①做出解释。复信是这样写的：

“1877年1月18日。

先生：

蒙来函赐教，我有必要迅即作答。在我看来，您所惠寄的那段摘录里表现出一种对私生活的卑劣侵犯，而这种侵犯通常是伴随有轻率虚妄之结论的。同我在书信往来中议论过东方问题的什么人手里有像摘录所述的那种信件云云，纯属不实之词。涉及这样一个问题我不能在报刊上出面，但我允许对我的上述声明自由援引。

忠实于您的

威·尤·格莱斯顿”

在《泰晤士报》登出这些东西的第二天，对这些事可能并非一无所知的《每日新闻》，就指责它的高邻^②不该触及这些事。但不管怎样，“纸是包不住火的”。

应该指出的是，格莱斯顿先生一点也不否认他同一名俄国密探合作并通信，而且这时，他——一位前首相——在欧洲处于大危机之际，正在使东方问题成为一场狂热到歇斯底里地步、矛头指向英国政府首脑^③的党派斗争的工具。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而

① 格莱斯顿已于1875年辞去了自由党领袖的职务，实际上此时仍作为该党的领袖进行活动。——编者注

② 指《泰晤士报》。——编者注

③ 指当时在任的首相比肯斯菲尔德勋爵、本杰明·迪斯累里。——编者注

他所否认的一点,如果我们理解正确的话,是他的通信出卖原则。在做此否认时,什么根据也拿不出,只是廉价地嘲笑一下(所谓的)“对私生活的卑劣侵犯”和(所谓的)“轻率虚妄之结论”而已。格莱斯顿先生说,他同诺维科夫夫人的这种关系是一件他“不能在报刊上出面”涉及的事情。而我们倒倾向于同意他这一点,但是我们同意的理由却和他想表白的理由不同。谁都知道,这位达官贵人是多么热心于就任何一个问题“在报刊上出面”,从接种牛痘到教皇永无谬误说。因此,看到他在一个事关他个人荣誉的问题上竟一语不发,很令人困惑不解。而且这也不可能是由于他立过什么对这些以及类似的问题一律保持沉默的誓言。因为就在不久前的一个晚上,他曾提到一家地方报纸发表的一项荒谬言论并加以否定。这项言论的内容是说他与比肯斯菲尔德勋爵共谋废黜女王,而代之以威尔士亲王。肯定地说,如果这样显然荒谬的谣言也值得他在议会的议席上提一提的话,那么对于一条内容更丑但也更可能为人所信的指控,他总可以花上五分钟的时间,用一张售价半便士的明信片来反驳一下吧。我们认为,恐怕这位前首相在这件事情上是有些故作姿态。他提起那宗不合情理的指控,主要目的是想使他的听众觉得另外那宗他“不能在报刊上出面”涉及的指控是不可信的,其实他暗自担心的就是别人会相信。

我们称诺维科夫夫人为“俄国密探”,决没有对这位女名流不尊重的意思。她本来可能只是出于爱国的动机而在伦敦当了一个业余外交家,以便在紧要关头促进其本国政府目的的实现。但是任何一个不想被流放国外或去西伯利亚走一遭的俄国人,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如果在伦敦扮演这种角色,哪怕是一个星期,也非得服从俄国使馆的控制和指挥不可,也就是说成为一名无官方身份的俄国政府

密探。诺维科夫夫人可能就难免如此。想到她莫斯科的那些自由派朋友们,她大概倒也乐得免受前俄国秘密警察头子舒瓦洛夫伯爵的亲自造访。除同俄国驻伦敦使馆的关系以外,诺维科夫夫人从一开始就同设在基什尼奥夫的司令部^①保持着政治性的通信联系。她的同胞弟兄基列耶夫先生在那里当俄军总司令尼古拉亲王手下的副官。基列耶夫先生本人在《俄国黑书》里(第8页)被描写为“一个要把西部各省俄罗斯化的人,也就是毕生对波兰民族作战、只靠掠夺波兰人为生的人”。最后的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诺维科夫夫人同她丈夫的同胞弟兄诺维科夫先生有着某种外交事务上的关系。这位诺维科夫先生把执行其俄国驻维也纳大使的职务,和充当在奥地利、匈牙利、土耳其到处诱骗并告发各地斯拉夫委员会的无数俄国密探的总核心,二者结合得非常巧妙。

我们这位前首相在最近关于“暴行”问题的宣传鼓动中——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正是与诺维科夫夫人这样一个人结成了毫不含糊的亲密同盟,而且为了此人的政治阴谋他竟举起了“私生活”这面盾牌!肯定地说,格莱斯顿先生在这件事情上把他的同胞们估计得太简单了。只要女人们不越出她们“私生活”的正当范围,男人们满可以承认并尊重私生活中的行为不受公众批评的权利。可是如果她们敢于闯入社会政治舞台,则她们、她们的盟友以及她们的雇主就必须准备着别人把她们的行为完完全全当作男人的行为一样来对待。诺维科夫夫人在征服格莱斯顿先生以后,前几天又赶赴巴黎去援助她的忠实同事特鲁别茨卡娅,此人也正在抱着同样的目的,使用类似的手段,试图使梯也尔先生和甘必大先生转向俄国。然而,对圣彼得

^① 俄国南部驻军的司令部。——编者注

堡说来不幸而对欧洲说来却很幸运的是，法国政治家与英国政治家不同，尽管这两位高贵的女外交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就巴黎而论，恐怕她们得到的结果是爱的徒劳^①。

诺维科夫夫人在伦敦的沙龙经常高朋满座，有英国人、法国人、奥地利人等等，而这位夫人又非常喜欢在客人面前炫耀她的外交成就——有人把这种不谨慎的作风归之于女性的虚荣心，有人则认为这是精心策划的计谋——所以英国的努玛同俄国的埃吉丽亚一起干的事很快也就成了公开的秘密，无需任何“对私生活的卑劣侵犯”即可获知。说真的，就我们自己这方面而言，只需要谈诺维科夫夫人的政治活动，虽然很遗憾，她自己的本国同胞、流行小说家彼得·博博雷金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做法。

格莱斯顿先生自己太真诚了，竟达到了不谨慎的地步。诚然，他对当时还完全不相识的诺维科夫夫人第一封信的回信，是由一位第三者^②书写和签署的。可是，在后来继续通信时就把这点戒备措施也丢开了。同样，在《现代评论》上他那篇关于“俄国在突厥斯坦的政策和行动”的文章里，他一方面直接搬出戈尔洛夫将军的“首肯”，另一方面也确实是让诺维科夫夫人在普普通通的无名“朋友”名义掩盖下出现的。可是，当亲俄的宣传鼓动达到高潮，宣传鼓动的组织者们相信比肯斯菲尔德勋爵马上就要被推翻之际，格莱斯顿先生在圣詹姆斯宫“会议”结束时竟然离开座位，走到诺维科夫夫人面前，向她伸出手臂，挽着她得意扬扬地穿过困惑不解的众人，为的是让他们觉得英国和俄国之间真的终于结成了反土耳其联盟，从而也就是公开承

① 这里借用了莎士比亚一出喜剧的名称。——编者注

② 格莱斯顿夫人。——编者注

认了他同那位夫人的关系属于社会生活的范围,因而应该被当作社会关切之事来对待。我们毫不怀疑,这一点等到他们关系的性质被揭示得更清楚的时候,也会成为国人所持的意见。

马·巴里写于 1877 年 2 月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77 年 3 月 3 日《名利场》
第 435 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5 卷翻译

马尔特曼·巴里

大鼓动家的真面目³⁵⁵

按照我们上周关于格莱斯顿先生的那篇文章^①最后一句话里所包含的许诺，我们现在继续来深入考察据传发生在那位达官贵人同俄国派到我国的某些官方代理人 and 尽人皆知的密探之间勾勾搭搭的情况。这些情况有的已经公之于众，而格莱斯顿先生大概因为意识到这些都是他“不能在报刊上出面”涉及的事情，所以至今尚未敢于反驳。例如几个星期之前，一家消息灵通的报刊^②就去年11月号《现代评论》上格莱斯顿先生那篇题为《俄国在突厥斯坦的政策和行动》的文章，报道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③按照这家报刊的看法，那篇文章的神秘来历极不寻常。人们会记得，在格莱斯顿先生文章登出之前不久，《每日新闻》发表了两篇通讯，一篇署名“一个俄国人”，另一篇署名“另一个俄国人”。人们也会记得，那两篇通讯中的第一篇是企图推翻斯凯勒先生写的考夫曼将军在突厥斯坦残暴地对待约穆德人的那段历史，第二篇唱的也是同一个调子。最

① 本卷第622—627页。——编者注

② 《白厅评论》。——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619—621页。——编者注

后，人们还会记得，格莱斯顿先生在《现代评论》上他那篇也是以替俄国将军洗刷罪责为己任的文章里，就把这两篇通讯作为依据，来否定斯凯勒先生关于此事的证言的可靠性。而且，为了充分表示他有十足的把握，为了消除读者心中还可能存有的一丝一毫的怀疑，格莱斯顿先生向读者保证，他“从一位朋友那里获知”，“一个俄国人”的那篇通讯“得到了俄国驻伦敦武官戈尔洛夫将军的首肯”。很可能，格莱斯顿先生的同胞们读到这一段披肝沥胆的真情实话时，大多数人的心情首先是惊诧和惋惜。惋惜的是，一位曾经显赫一时的大政治家智力衰退得如此之快；惊诧的是，他竟愚蠢到以为可以这样明目张胆地骗过全体国民。然而，如果格莱斯顿先生的读者们知道此事全部真相的话，他们的心情就会很不同了。不论这位前首相有什么样的过错，在他的过错当中至今还没有发现虚伪矫饰这一条。真的，人所共知，他的老上级帕麦斯顿勋爵曾断定，他的过分坦率和诚实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主要缺陷之一。如果要英国人举出他们的大人物当中最真诚的人，他们很可能选中这位格林尼治的议员^①，而且看起来在这位达官贵人的政治生活中，真是再也找不出比在最近关于“暴行”问题的宣传鼓动中更使劲地表现其一片真心的记录了。那么，心地单纯、不善猜疑的英国公众得知下述这些情况，该感到怎样地触目惊心 and 出乎意料啊！（1）“一个俄国人”的通讯原来就是“俄国驻伦敦武官戈尔洛夫将军”写的，而格莱斯顿先生“获知”对那篇通讯加以“首肯”的那个人，也是这位戈尔洛夫将军；（2）“另一个俄国人”的通讯的炮制者是诺维科夫夫人，也就是让格莱斯顿先生“获知”戈尔洛夫将军“首肯”

① 格莱斯顿当时是代表格林尼治选区的议会议员。——编者注

了戈尔洛夫将军那篇通讯的那位“朋友”；(3) 这些事实，格莱斯顿先生在撰写《现代评论》上他那篇文章时都是知道的。还有一件事。格莱斯顿先生不仅知道“一个俄国人”的通讯是戈尔洛夫将军写的，他还知道戈尔洛夫将军本来想在通讯上签署自己的真名，但舒瓦洛夫伯爵不准。最后一点是，格莱斯顿先生本人竟然修改过戈尔洛夫将军的通讯，删去了意在答复《派尔—麦尔新闻》及英国其他反俄派的某些段落，而把这个任务留给他自己的文章。千真万确，格莱斯顿先生和诺维科夫人两个人精心安排了一个计划：这两篇通讯先在《每日新闻》上见报，然后他就以两篇通讯的证言为依据来否认俄国在突厥斯坦干下的暴行。这些情况透露出来已经是令人大吃一惊的了，完全可以预料这会使国人对那些慷慨激昂满口人道的政客们丧失信心。可是，看来还有更糟糕的需加以揭露。全世界进步党的口号当中，报刊的自由与独立大概是最神圣而绝对的了。在英国，我们曾以为我们祖先的祖先已经为此战斗过并且已经取得胜利。这一印象在我国同胞所有各阶级中实在是太普遍了，谁若是敢于稍稍表露一点要收买我们的第四等级的意思，那就是对全体国民的侮辱。如果说，对最神圣的报刊自由有时比别的时候还应该而且能够看得更加神圣的话，那肯定无疑就是在目前最重大的争议未见分晓，很多人的头脑被一帮权位追逐者的吵吵闹闹胡言乱语弄得糊涂起来的这样一个时刻。可是——此事简直不可思议——一位前首相竟然正是抓住我们所描述的这个时刻，给一个外国而且是历来与我们为敌的大国的密探出这样的主意——收买一部分伦敦报刊！³⁵⁶绝大多数的人都会认为，这些指控是非常严重的，必须回答。可是格莱斯顿先生在被要求做出解释的时候，竟天真地对他的太爱找麻烦的朋友们说，他们提到的事情，是他“不能在报刊上出

面”涉及①的。

马·巴里写于1877年2月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77年3月10日《名利场》第436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25卷翻译

① 见本卷第623页。——编者注

凯斯·奥克莱里

* 关于俄国对波兰的蹂躏³⁵⁷

1877年5月14日在英国下院的发言摘录

可是这些年难道没有别的基督徒遭受过凶残暴虐的可怕待遇吗？这位大人先生^①在1863年俄国对波兰迫害达到高潮的时期¹⁵⁰是政府的一位成员。而那届政府，除由罗素勋爵发出一份照会对波兰受到的待遇表示不平之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位大人先生自那以后也没有开口谴责过那次迫害。波兰在起义过后曾得到保证：其地位不变，一如起义从未发生。然而俄国破坏了向波兰做出的每一项承诺。波兰的自治毁灭了。全部官员换成了俄国人。不仅是波兰罗马天主教徒的宗教，而且还有他们的法律和财产，全部遭到策划无比周密而且决不手软的侵犯。教皇的臣民都无权出卖自己的地产。地产只能卖给俄罗斯臣民，以致土地贬值到对波兰人来说来毫无价值的程度。在过去13年里，俄国人的政府一直在侵犯人民的宗教自由。华沙大主教，还有一位主教，被投进了监狱。另一位主教被送

^① 威·尤·格莱斯顿。——编者注

往西伯利亚。罗马天主教修道院被封闭。而这一切暴行之所以产生,不过是因为这些教会领袖努力履行自己的宗教职责。懂得波兰历史的尊敬的议员先生们也都懂得,波兰的自治应为欧洲所承认对波兰说来是多么名正言顺的事,懂得波兰应当从俄国的压迫下得到解救。这位大人先生为土耳其的基督徒大声疾呼,而对波兰基督徒受到的迫害却置若罔闻,这难道可以算得是仗义执言或始终如一吗?

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
1877年伦敦版第3辑第234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25卷翻译

*关于《前进报》对法国危机的态度的简讯³⁵⁸

根据恩格斯 1877 年 7 月 2 日给
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信

有人从巴黎给我们来信说：《前进报》对法国危机的态度在这里引起极大不满，我本人并不认为这个态度与事态相符。的确(!)，麦克马洪与“共和派”之间的冲突与工人没有直接关系；工人们也知道这一点(!)他们说：A vous maintenant, M. M. les bourgeois, faites votre jeu! (资产者先生们，现在轮到你们了，你们干吧!)但是，如果要作出决定的时候，工人们是不会保持中立的。在斗争中保持政治上的中立，对法国的工人，尤其是巴黎的工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想像的。再说对法国的发展也非常重要的是：下一次工人运动到来之前的目前这个间歇时期正处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制度下，在这种制度下，甘必大之流正在败坏自己的声誉，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处在帝国压迫之下，要是在帝国压迫下，他们又会受人欢迎，并且在爆发的时候又将成为头面人物；在法国已成为毫无意义的关于国体的争论终将结束，共和制将暴露其本来面目：它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典型形式，同时也是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统治瓦解的典型形式。不过，法国反动派的胜利对

德国也不会没有消极影响的。

写于 1877 年 7 月初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77 年 7 月 11 日《前进报》第 80 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5 卷翻译

威廉·布洛斯

涅瓦河和博斯普鲁斯海峡³⁵⁹

根据恩格斯的一封信

普列夫纳在老托特列本的铁臂合围中陷落了。但是，普列夫纳这个名字对莫斯科的沙皇制度来说仍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词，无论如何，俄军大本营对胜利的喜悦不大像受卢布“文化”熏染的新闻界想说服我们相信的那样强烈。普列夫纳证明了，土耳其人在防守中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绩来。

随着普列夫纳的陷落，在东方战争的整个过程中出现了新的转折是肯定的。土耳其失去了自己的优秀将领和精锐军队。但是，普列夫纳把俄国人阻截到差不多12月中旬，这是一个事实，目前因为亟待解决冬季进军与否的问题，这一事实便有了决定性意义。假如俄国人现在仍打算开始他们如此热切期望的越过巴尔干的进军，那么，冬天就有可能对他们不客气。如果整个保加利亚大雪覆盖或阴雨连绵，如果多瑙河封冻，俄国军队的给养和供应就将困难重重，冬季进军恐怕很容易成为“鲁莽的骑兵将领们”的一个可怕的教训。

鉴于这一切，仍不排除土耳其，或者说它的政府，会让卡尔斯和普列夫纳的两次失败给吓住，并屈服于俄国的军事成就。我们认为

这后一种情况甚至是很有可能发生的,如果在君士坦丁堡掌权的仍是迄今的“主子”,即那些呆板老朽的军事委员和国家枢密官,正是这班人逼迫苏里曼向希普卡山口发起荒唐的强攻,并召回正在作战中的穆罕默德-阿里,致使土耳其军队的运动不能协调一致。在君士坦丁堡的民众中酝酿着极大不满,因此,普列夫纳的陷落将引起马茂德-达马德帕沙的垮台,并非没有可能。马茂德-达马德是老朽的皇党和塞拉尔党的主要代表,他们从以前拜占庭帝国那里继承了堕落、热衷于搞阴谋诡计、愚蠢骄横和墨守成规。马茂德-达马德及其追随者只要能在君士坦丁堡苟延他们那腐败的旧制度,宁愿牺牲四分之三的上土耳其。如果新的战争转折导致马茂德-达马德垮台,并且由一个勇于维护自己的政府掌权,那么很容易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即普列夫纳的陷落根本不会给土耳其带来多大损失。诚然,普列夫纳为完成尽可能长时间地阻截俄国人的任务付出了无比巨大的牺牲。

但是,土耳其还有君士坦丁堡,要是那里有一个自觉有能力和勇气的政府,这个庞大的城市就能自卫。君士坦丁堡比巴黎更难围攻。冯·毛奇先生无疑是这些问题的权威,他在其东方书信里说,占领君士坦丁堡需要三支陆军和两支海军。俄国人想在冬天围攻君士坦丁堡吗?这很容易使他们失去一支军队,因为他们打算靠什么活命呢?而在君士坦丁堡,土耳其人才正好可以证明,他们在防御中是多么机智灵活。

我们再说一遍,这一切并不排除,在连遭失败的可怕影响下业已气馁的土耳其政府被吓得惊慌失措而坠入“和平”的圈套。

这就是我们对于形势的看法。当然,在保加利亚和亚美尼亚战场上互相争斗的两种制度,哪一个我们都不向往。这是两种和时代

精神明显冲突的旧专制政体。我们根本不想对那些在这场恐怖的战争悲剧中出现的“主人公们”作丝毫的赞美。大屠杀就是大屠杀。

但是,这两个旧专制政体必将随着这场战争而衰亡。土耳其的宪法(尽管那么糟)、米德哈特的改革思想等等,都预示着“先知的帝国”已一去不复返了。要是普列夫纳的陷落导致旧塞拉尔制度和阉人制度的垮台,那么人们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不久还会看到另一番景象。

俄国不会落在这个改造后面。土耳其人造成了在俄国将不可避免地发生一场变革的局面——尽管这不是他们的意愿。此次战争之后,俄国不会再没有宪法;想拒绝制宪,就等于在俄国引发革命。

只有当 1789 年的风从彼得堡吹来的时候,“欧洲音乐会”上的各种小鸟才学习鸣唱别的曲调!

威·布洛斯大约写于 1877 年
12 月中

载于 1877 年 12 月 16 日《汉堡
—阿尔托纳人民报》第 150 号
附刊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5 卷翻译

*《芝加哥论坛报》发表的
卡尔·马克思访问记

卡尔·马克思

访现代社会主义柱石³⁶⁰

他就他本人及其学生们的作为和目的做了一些介绍

现今的土地和资本的制度将为“一种更高级的社会状态”所代替

流血将不可避免,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伟大运动的兴起不经过流血”

俾斯麦受到“所有政治家的嘲笑”,约瑟夫·库克牧师是“非常孤陋寡闻的人”

《论坛报》特约通讯

伦敦,12月18日。伦敦西北区哈佛斯托克小山的一座小别墅里住着现代社会主义柱石卡尔·马克思。他因为传播革命理论而于

1844年被驱逐出其祖国——德国³⁶¹。1848年他返回德国,但数月后又被驱逐。后来,他寓居巴黎,但是他的政治理论又使得他在1849年被驱逐出该市。从那一年起他的大本营就设在伦敦。他的信仰从一开始就给他招来麻烦。从他家里的状况来看,显然这种信仰没有给他带来财富。马克思在所有这些年头当中始终不渝地以一种无疑是来自坚定信念的执著精神鼓吹自己的观点。无论我们怎样不赞成这些观点的传播,我们却不能不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位现在受人尊敬的流亡者的自我牺牲精神表示敬意。

本报通讯员访问了他

两三次,每次都是在书房里见到这位博士的,他一手拿着书,一手夹着香烟。他看样子有七十开外的年纪。^①他很结实,形体宽,腰板直。他有着智者的头、文明犹太人的脸、铁灰色的长发和长须,浓眉下有一双炯炯有神的黑眼睛。他对陌生人表现出极大的戒心。外国人一般还能够获准会见他,而对来自祖国的人,那位接应来访者的仪态古板的德国女人^②却奉有指示:除带有介绍信者外一律不见。然而,只要你一进到他的书房,他就戴上他的那只单眼镜,好像要丈量一下你智力的广度和深度似的,然后他就一反那种自我约束的状态,把他关于全世界人物事物的知识展现在你面前,引人入胜。他的谈话不是直线一条,话题变化之多就像他书架上卷卷不相同的书籍一样。通常根据一个人读的书就可以评价这个人;所以如果我告诉你,我粗看

① 马克思生于1818年5月5日,接受这次采访时应为60岁。——编者注

② 海伦·德穆特。——编者注

一眼就发现了莎士比亚、狄更斯、萨克雷、莫里哀、拉辛、蒙田、培根、歌德、伏尔泰、潘恩，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蓝皮书，俄文、德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的政治和哲学著作等等，你就会做出自己的结论了。在我们谈话过程中使我惊讶的是

他对美国的问题了如指掌。

这些问题都是近二十年来美国最重大的问题。他对这些问题的了解，以及他批评我们全国的和各州的立法时所表现出的准确性，使我感到他必定是从内部来源获取消息的。但他决不是只对美国的情况这样熟悉，他对整个欧洲的情况也是同样地熟悉。当谈到他所偏爱的题目——社会主义——的时候，他并不是像人们常常描写的那样慷慨激昂地大谈一通，而是严肃认真地详细讲述他的“解放人类”的乌托邦计划，他的严肃认真的态度说明他坚信自己的理论纵使在本世纪不能实现至少在下个世纪也能实现。

卡尔·马克思博士在美国最为人所熟知的身份大概是《资本论》的作者和国际协会的创始人或者至少是该协会最主要的台柱。读者从下面的谈话中会了解到他关于这个协会目前的状况是怎样讲的。但是，我这里先给读者摘录几段公开出版的

国 际 协 会

共同章程³⁶²。该章程是1871年由总委员会公布的。从这几段摘录里读者可以对协会的宗旨和目的作出公正的判断。章程的引言提出，“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

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一切阶级统治;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为达到工人阶级的总解放的一切努力之所以至今没有收到效果,是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不够团结。”因而,引言要求“立刻把各个仍然分散的运动联合起来。”章程接着说,国际协会承认:“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这样,每个协会会员就都得参加工作。协会是在伦敦成立的,其目的“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章程还说,“国际协会的每个会员,在由一个国家迁居另一国家时,应从加入协会的工人方面得到兄弟般的帮助”。

协 会 设 有

每年召开一次的全协会代表大会和总委员会;总委员会是“沟通协会在各国的全国性组织和地方性组织之间联系的国际机关,应使一国工人能经常了解其他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情况”。这个委员会接受并审议新的支部加入国际的申请,解决支部之间发生的分歧,实际上用美国人的说法,就是“操纵机器”。总委员会的经费来自每个会员每年缴纳的一个英国便士的会费。其次,在各个国家设立联合会委员会和地方支部。联合会委员会必须至少每月向总委员会送一份报告,每三个月送一份关于它们的支部的组织情况和财务状况的报告。凡遇有公开攻击国际的东西发表时,最近的支部或委员会必须立即将这种出版物寄一份给总委员会。总委员会鼓励在工人阶级当中建

立妇女支部。

总 委 员 会

人员组成如下：罗·阿普尔加思、马·詹·布恩、弗雷德里克·布拉德尼克、G.H.巴特里、维·德拉埃、欧仁·杜邦(因公在外)、威廉·黑尔斯、乔·哈里斯、胡利曼、茹尔·若昂纳尔、哈丽雅特·罗、弗里德里希·列斯纳、罗赫纳、沙尔·龙格、孔·马丁、莫里斯·捷维、亨利·梅奥、乔治·米尔纳、查理·默里、普芬德、约翰·罗奇、吕尔、萨德勒、考埃尔·斯特普尼、阿尔弗勒德·泰勒、威·唐森、爱·瓦扬、约翰·韦斯顿。各国的通讯书记是：莱奥·弗兰克尔——奥地利和匈牙利；阿·埃尔曼——比利时；托·莫特斯赫德——丹麦；奥·赛拉叶——法国；卡尔·马克思——德国和俄国；沙尔·罗沙——荷兰；约·帕·麦克唐奈——爱尔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意大利和西班牙；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波兰；海尔曼·荣克——瑞士；约·格·埃卡留斯——美国；勒穆修——美国的法国人支部。

我在访问时向马克思博士谈到约·钱·班克罗夫特·戴维斯在其1877年的正式报告中援引过的纲领，告诉他这是我曾经看到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目的的最简明扼要的叙述。他说，那是从关于德国1875年5月哥达社会主义者合并代表大会²的报道中抄录的。³⁶³他认为翻译得不准确，并

表示愿予以纠正，

现按他所口授记录如下：

第一条——凡年满 20 岁的男子在一切选举中，不论地方的或国家的，都享有普遍的、直接的和秘密投票的选举权。

第二条——实行直接的人民立法，由人民直接投票决定宣战与媾和。

第三条——实行普遍义务民兵服役制。废除常备军。

第四条——废除一切关于新闻出版法和公众集会方面的特别立法。

第五条——实行免费诉讼。实行人民裁判。

第六条——由国家实行普遍的、义务的和免费的教育。实现科学和宗教的自由。

第七条——取消一切间接税。征收直接的累进所得税作为国家和地方的经费。

第八条——给工人阶级以结社自由。

第九条——规定男工的法定工作日。限制使用女工，禁止使用童工。

第十条——制定保护工人生命和健康的卫生法，由工人自己选出的人员来负责管理他们的住所和工作场所。

第十一条——对犯人的劳动作出适当的规定。

在班克罗夫特·戴维斯先生的报告中有

一个第十二条，

即最重要的一条：“在民主监督下由国家给生产合作社以帮助和信贷。”我问博士，他为什么略去了这一条，他回答说：

“1875 年召开哥达合并代表大会时，社会民主党人是分派的。

一派是拉萨尔的拥护者,另一派是大体上接受了国际协会的纲领的人们,称为爱森纳赫派。那个第十二条没有列入条文,而是为了向拉萨尔派让步才写入纲领的一般性前言之中。后来再没有人提到它。戴维斯先生不讲明这一条是作为一个并无特别意义的妥协而写入纲领的,反而郑重其事把它算作纲领的基本原则之一。”

我说:“但是社会主义者一般都把变劳动资料为社会的公共财产看作是运动的最高的大目标。”

“是的,我们说,运动的结果将是如此,但这将是一个时间问题,教育问题和建立一种更高级的社会状态的问题。”

我说:“这个纲领只适用于德国和一两个其他国家。”

他回答说:“啊!如果您仅仅根据这一点去做结论,那您就是根本不了解这个党的活动。纲领中的许多条在德国之外是没有意义的。西班牙、俄国、英国和美国各自都有针对本国特殊困难的纲领。这些纲领的惟一相似之处在于它们要达到的最终目标。”

“那就是劳动的统治?”

“那是

劳动的解放。”

“欧洲社会主义者是否认为美国的运动真正是一个运动?”

“是的。它是这个国家发展的自然结果。有人说,运动是外国人输入的。50年前当工人运动开始在英国招致敌视的时候,有人正是这样说的,而那是在人们谈论起社会主义很久以前。在美国,工人运动是从1857年才开始为人所瞩目的。从那时起工会顺利发展起来;后来成立了把不同工业部门的工人联合起来的工人大会,最后又成立了

全国性的工人联合会。如果您按时间顺序研究一下这一进展情况,那您就会看到,社会主义在这个国家的产生并非借助于外国人之手,只是由于资本的积聚和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关系的变化而造成的。”

本报通讯员问道:“那么到目前为止社会主义究竟做了什么?”

他回答说:“做了两件事情。社会主义者证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是普遍的,无处不有,一句话,具有

世 界 性,

因此他们力图使各国工人彼此互相了解;这一点尤其必要是因为资本家对工人的雇用越来越具有世界性,不仅在美国,而且在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利用外国工人来对付本国工人。于是各个国家的工人之间马上就产生了国际联系,这证明社会主义不仅是地方性的问题,而且是国际性的问题,这一问题应该通过工人的国际行动来解决。工人阶级的运动是自发的,他们意识不到这一运动的最终目标将是怎样的。社会主义者并没有发明运动,而只是向工人说明运动的性质和目标将是怎样的。”

我插话说:“那就是推翻现存社会制度。”

他继续说:“我们断言,这种雇主手中有土地和资本而劳动者手中只有作为商品出卖的劳动力的制度,仅仅是一定的历史阶段,它将会消亡,让位于

一种更高级的社会状态。

我们到处都观察到社会的分裂。两个阶级的对抗与现代国家的产业

资源的开发相伴随。从社会主义观点来看,对当前这个历史阶段实行革命的手段已经具备。在许多国家里,在工会的基础上已经建立起政治组织。在美国,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必要性已经显而易见。工人不能再相信政客:集团和派系把持着立法,政治变成了买卖。而这种情况并非仅仅存在于美国,只是美国人比欧洲人做事更明确果断。在美国,事情的明朗化来得更快。假话和伪善要比大洋此岸少一些。”

我请他给我解释一下德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发展快的原因。他回答说:“现在的这个社会主义政党产生得最晚。他们遵循的不是曾在法国和英国取得过某些进展的那种空想体系。德国人的头脑比别国人更习惯于理论思维。德国人从前人的经验中吸取了某些实际的东西。您不要忘记,同别的国家相比,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对德国来说是一种完全新的事物。提到日程上的都是在法国和英国几乎已经过时的问题,而支配过那两个国家的那些政治因素,在这里是在社会主义理论已经深入德国工人阶级时才产生的。因此,几乎从现代工业一开始发展的时候起,他们就建立了一个

独立的政党。

他们在德国的国会中有自己的代表。因为在德国没有同政府政策相对抗的政党,所以这个任务就落到他们的身上了。要追述党的历程会占用太多的时间。不过我可以这样说,如果德国资产阶级不是那样一些与美、英资产阶级迥异的无以复加的胆小鬼的话,全部反政府的政治活动本来是应该由他们进行的。”

我向他提了一个关于在国际的队伍里拉萨尔分子占有多大数量

的问题。

他回答说：“拉萨尔党是不存在的。当然，在我们的队伍里有一些拉萨尔的信徒，但为数不多。拉萨尔先于我们使用了我们的总原则。他在1848年反动时期以后开始活动之时曾幻想，通过鼓吹工业企业里的工人实行合作，他就可以更有效地使运动复活。鼓吹工人实行合作就是为了把工人发动起来。他把这仅仅看作是达到运动的真正目的的一种手段。我这里有他的几封信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您把这叫做他的救世良方？”

“完全正确。他拜访过俾斯麦，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俾斯麦。俾斯麦当时用一切可能的办法鼓励拉萨尔的计划。”³⁶⁴

“俾斯麦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呢？”

“他是想利用工人阶级作为同曾经煽动1848年风潮的资产阶级抗衡的力量。”

“博士，有人说，您是社会主义的首脑和旗帜，您在您的别墅这里操纵着当前所有的组织，革命等等。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这位年长的绅士笑了笑说：“这我知道。

这是很荒谬的；

但它也有有趣的一面。例如，在赫德尔行刺前两个月，俾斯麦在他的《北德报》上抱怨说什么我是同耶稣会运动首领贝克斯神父结了盟的，说我们把社会主义运动进行得让他毫无办法。”³⁶⁵

“但您那个在伦敦的国际协会不是领导运动的吗？”

“国际协会发挥作用的时候已经过去，它已不复存在。它确实存在过，领导过运动，但近年来社会主义有了迅猛的发展，所以国际协

会的存在不再有必要了。各个国家都办起了报纸,互相交换报纸,这大概是各国党彼此之间惟一的联系了。成立国际协会首先是为了使工人团结起来,并使他们懂得应该在各国工人队伍中建立组织。不同国家的各个社会主义政党的利益是不同的。国际领袖们坐镇伦敦这样一个可怖景象纯粹是臆造。不错,当国际的组织成立之初,我们曾经指挥过外国的工人协会。我们曾被迫开除过一些纽约的支部,其中之一是伍德赫尔夫人大显身手的那个支部。这是1871年的事情。在美国有几个政治家——我不说出他们的名字——想利用运动来做交易。美国的社会主义者是非常熟悉他们的。”³⁶⁶

“马克思博士,人们认为各种反宗教的煽动性言论都来自您和您的追随者,您当然是希望看到这整个体系被彻底消灭的了。”

他迟疑了一下回答说:“我们知道,对宗教采取暴力措施是没有意义的,但我们有一种看法,这就是: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

宗教将消逝。

宗教的消逝必须由社会发展来促成,而教育又必须在社会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波士顿的约瑟夫·库克牧师您知道吧?”

“我们听说过他;在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他是一个非常孤陋寡闻的人。”

“他不久前在一次关于社会主义的讲演中说:‘现在据闻卡尔·马克思说,在美国、大不列颠,可能还有法国,劳动改革将不用经过流血的革命而实现,但是在德国,还有俄国、意大利和奥地利则必须流血。’”

博士微笑着说：“无须由社会主义者来预言，俄国、德国、奥地利将发生流血革命，而且还可能有意大利，如果意大利人继续实行他们现在所实行的政策的话。法国大革命中人们的所作所为，有可能在这些国家里重演。这是任何研究政治的人都很清楚的。但是这样的革命将由多数人来完成。任何一次革命都不可能由一个政党来实现，

而是由一个民族。”

我说：“据上面提到的那位牧师先生说，他是从您于 1871 年写给巴黎公社社员的一封信中摘录了一段话。这段话：‘眼下我们最多不过 300 万人。再过 20 年，我们也许会有五千万至一亿人。那时世界将属于我们，因为起来反对可恶的资本的将不仅有巴黎、里昂、马赛，而且有柏林、慕尼黑、德累斯顿、伦敦、利物浦、曼彻斯特、布鲁塞尔、圣彼得堡、纽约，一句话，全世界。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新的起义面前，过去将会像噩梦一样消逝，因为在千百个地方同时燃烧起来的人民烈火，甚至将把过去留给人们的记忆也都烧得一干二净。’博士，我想现在您承认您是这段引文的作者吧？”

“这段话里我一个字也没有写过。我永远不会写出

这种耸人听闻的荒唐话。

我写东西是非常慎重的。这是那段时间里《费加罗报》盗用我的署名发表的东西。那时候流传过许许多多这样的信件。我曾写信给伦敦《泰晤士报》，声明这些东西是伪造的。但是，如果我要想一一驳斥有

关我的言论和文章,那我就得有 20 位秘书。”

“可您写过同情巴黎公社社员的文章啊?”

“当然,我这样做过,那是因为考虑到报刊社论上对他们的议论。其实,英国报纸上的巴黎通讯就足以驳倒这些社论所散布的谬论了。公社仅仅杀了大约 60 个人;麦克马洪元帅及其杀人不眨眼的军队杀了六万多人。从来还没有哪个运动遭到过像公社所遭到的那样的诽谤。”

“那么,好吧。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原则,社会主义的信徒是不是主张暗杀和流血呢?”

卡尔·马克思回答说:“从来没有一个伟大运动的兴起

不经过流血。

美国的独立是靠流血赢得的。拿破仑^①通过一个流血的过程夺得了法国,并且被人用同样的方法推翻。意大利、英国、德国以及任何其他国家都会证明这一点。”他继续说:“至于说暗杀,那么大概用不着我说,这并不是新鲜事。奥尔西尼谋刺过拿破仑^②,君王们杀的人比任何人都多,耶稣会士杀过人,清教徒在克伦威尔时期杀过人。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人们还不知道社会主义为何物之前干的或企图干的。可是,现在凡是谋刺帝王或政治家的行为都被归罪于社会主义。其实,要是德国皇帝^③现在死了,社会主义者会深感遗憾。他的在位很

① 拿破仑第一。——编者注

②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③ 威廉一世。——编者注

有好处,而俾斯麦为社会主义运动干的事情比任何其他政治家都要多,因为他把事情做绝了。”

我问马克思博士

他对俾斯麦有什么看法。

他回答说:“拿破仑^①在垮台之前被认为是天才;而后来他被称作蠢货。俾斯麦将步拿破仑的后尘。他开始是以统一为借口建立了专制制度。他一向奉行的政策人人都是清楚的。他最近的一着不过是搞一次类似政变的尝试,但这种尝试是要失败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像法国社会主义者一样反对 1870 年的战争^②,认为这是一场纯粹的王朝战争。他们发表了宣言,警告德国人民,如果德国人民容许把这场自称的防御战争变成征服战争,那么它受到的惩罚将是军事专制的建立和对劳动群众的无情压迫。德国社会民主党为此举行群众大会并发表宣言,要求同法国实现光荣的和平,因而立即遭到普鲁士政府的迫害,该党的许多领导人被投入监狱。尽管如此,还是只有该党的议员敢于在德意志帝国国会上反对——而且是非常坚强地反对——强行兼并法国的省份。但是,俾斯麦却以强力推行自己的政策,人们赞美俾斯麦的天才。仗打过了,当他再不能夺得更多的领土时,人们就需要他创新有术,这一点他显然没有做到。人们开始对他失去信心,他的威望日益衰落。他需要钱,国家也需要钱。他曾依据欺骗性的宪法,向人民征税以支付他的军事的和统一德意志的计划所需费

①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② 普法战争。——编者注

用,直到他无法再征为止,而现在他则企图干脆撇开宪法来征税。为了随心所欲地横征暴敛,他搬出了社会主义的鬼影,并使出了他的全部力量

企图制造骚乱。”

“您经常从柏林得到消息吗?”

他回答说:“是的,我的朋友们总是及时向我通报消息。那里平静得很,俾斯麦大失所望。他驱逐了48位著名人士,其中包括帝国国会议员哈赛尔曼和弗里茨舍,以及拉科、鲍曼、《自由报》的奥尔。是这些人使柏林工人保持了平静。俾斯麦知道这一点。他还知道,这个城市有75 000名工人濒于饿死。他确信,这些领袖们一走,骚乱就会发生,这样就可以大开杀戒了。那时整个德意志帝国将戴上枷锁,他的得意之作铁血理论就会支配一切,赋税就可以无限地征收。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生任何骚乱,他今天面对着眼前的形势和所有政治家的嘲笑,目瞪口呆。” H.

写于1878年12月上半月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79年1月5日《芝加哥论坛报》第6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25卷翻译

*蒙特斯图亚特·埃尔芬斯通·
格兰特-达夫爵士记同卡尔·
马克思的会见³⁶⁷

摘自给德国皇储妃维多利亚的信

1879年2月1日

夫人：

上次我荣幸地拜会殿下您的时候，您偶然表示对卡尔·马克思感到有些好奇，还问我是否认识他。因此我决定一有机会就与他结识。可是直到昨天才有了机会——我在一次午餐时见到了他，和他共叙了三个小时。

他身材不高，是个小个子。头发和下巴上的胡须是灰色的，唇上的胡须却还是乌黑的，看起来很奇怪。他脸形略圆，前额周正而饱满，目光严峻，但整个神态和蔼可亲，决不是一个惯于吞噬摇篮里的婴孩的人——我想那是他在警察眼中的形象。

他的谈话表明他是个见多识广的人，不，应该说是博学的人，他对比较语法很感兴趣，因而研究过古斯拉夫语和其他冷僻门类的学问。他的谈话丰富多彩，妙趣横生，间有一些冷峻的幽默，比如，在谈

到黑泽基埃尔写的俾斯麦伯爵传时,他总是与布什博士的那本书相比,称之为《旧约》。

他的谈话非常积极开朗,略带尖刻,决不慷慨激昂;讲得引人入胜,而且我认为,在讲到过去和现在时,他常常发表一些十分正确的见解。但是,在谈到未来时,则模糊不清,不能令人满意。

他并非毫无道理地期待俄国将发生大崩溃,而且为期不远。他认为,崩溃将从来自上面的改革开始,俄国腐朽的大厦将会由于承受不住改革而彻底倒塌。至于由什么取而代之,他显然没有明确的想法,只是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俄国将无法对欧洲施加任何影响。

继而他认为运动将会波及德国,在那里的表现形式将是反对现行军事制度的起义。

我问他:“可是您怎能期望军队起来反对他们的指挥官呢?”他回答说:“您忘记了在今日的德国,军队几乎就等于国民。您听到的这些社会主义者也像其他任何人一样,都是受过训练的士兵。您不能只想到常备军,还要想到后备军。况且,即使在常备军里也存在着严重的不满。从来没有一支军队里有这么多人因纪律严酷而自杀。从向自己开枪到向长官开枪这一步之差并不大,而且,此例一开很快就会有人效仿。”

我说:“可是,假设欧洲统治者之间达成谅解,实行削减军备从而会大大减轻人民的负担,那么您意料中迟早要由人民的这种负担引起的革命会怎样呢?”

他回答说:“啊!他们做不到。各种各样的恐惧和忌妒心理使他们无法这样做。随着科学对破坏手段的改良,负担将越来越沉重,二者齐头并进。花在昂贵武器上的钱将一年比一年多。这是个恶性循环,无法逃避。”我说:“可是,还从未见过没有真正深重的苦难而发生

严重的民众起义的情况。”他回答说：“您不知道德国在过去五年中经历的危机有多可怕。”³⁶⁸

我说：“那么好吧，假定您设想的革命发生了，您的共和式的政府成立了，但是，这距离把您和您朋友们的独特思想变为现实还很遥远。”他回答说：“这毫无疑问。然而，一切伟大的运动都是缓慢的，正如你们的1688年革命一样，仅仅是向好的方面迈进了一步——大路上的一站而已。”

以上这些可以使殿下清晰地了解到，他的头脑中对于欧洲近期前景都有些什么样的想法。

这些想法过于虚幻，因而不成其为危险。只是目前在军备开支疯狂增长的情况下，局势显然无疑是危险的。

如果今后十年之内，欧洲的统治者在有人起来革命从而向他们发出警告之前，找不到对付这一大害的手段，那么，我自己至少对欧洲大陆上人类的前途要丧失信心了。

卡尔·马克思在谈话中几次谈到殿下和皇储^①，而且总是表现出应有的敬意和礼貌。他即使在以决非敬重的口吻谈论某些知名人物时，也完全不是咬牙切齿或凶相毕露，而且是充满尖刻犀利、锐不可当的批评，但丝毫没有马拉的那种腔调。

谈起被同国际联系起来的那些可怕的事，他的态度也像任何正派人一样。

他提到的一件事显示了有革命名声的流亡者面临的危险。他听说倒霉鬼诺比林³⁶⁹在英国时曾想去见他。他说：“如果他来了，我肯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1888年为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皇帝，称弗里德里希三世。——编者注

定会让他进来,因为他送进的名片上一定介绍他是德累斯顿统计局的雇员,而我正干着统计工作,对跟他谈谈会很感兴趣。”马克思还补充说:“如果那时他真的来见了我,我的处境该是多么狼狈不堪啊!!”

总之,马克思作为一个观点同我们完全对立的人来看,可以说没有给我留下一点不好的印象。我很愿意再次和他相见。颠倒世界的人不会是他,不管他有没有这样的愿望。

写于 1879 年 2 月 1 日

原文是英文

第一次发表于 1949 年 7 月 15
日《泰晤士报》文学附刊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5 卷翻译

* 法国工人党最低纲领³⁷⁰(草案)

政治纲领

1. 废除一切新闻出版法、集会法和结社法,特别是反国际工人协会法。取消工资计算簿这种登记工人阶级的办法和法典中有关使工人处于不平等地位的一切条文。

2. 取消宗教经费并将所谓不能出让的属于宗教团体的动产和不动产归还给国家(1871年4月2日巴黎公社法令)。

3. 普遍武装人民。

4. 公社主管行政管理机关和警察机构。

经济纲领

1. 通过立法将成年人的工作日缩短为8小时。——禁止私营企业雇用14岁以下的童工,而14岁至18岁的工作日通过立法缩短为6小时。

2. 通过立法确定最低工资。

3. 男女工资平等。

4. 对全体儿童实施科学和技术教育,由国家和公社代表的社会

负担费用。

5. 取消雇主对工人储蓄会、互助会、保险会管理的任何干涉,重新恢复纯粹由工人管理。

6. 业主对事故的责任,应由雇主提交保证金来保障,其比例与他雇用的工人数量和工作危险性相称。

7. 工人参加制定各个不同工场的专门规则。取消被雇主据为已有的任意规定对工人罚款或克扣工资的权力。

(1871年4月27日巴黎公社法令^①)。

8. 修改一切让渡公共财产(银行、铁路、矿场等等)的契约。

一切国家工场均由这些工场的在业工人经营。

9. 废除一切间接税,并把一切直接税改为收入在3 000法郎以上和遗产在20 000法郎以上的累进税。

写于1880年5月10日前后

原文是法文

载于1880年6月19日《先驱者》第25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5卷翻译

^① 《取消罚款或克扣工资的法令。1871年4月27日于巴黎》,载于1871年4月29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巴黎)第119号。——编者注

*马克思对保尔·拉法格起草的 法国工人党宣言草案的批注

保尔·拉法格

法国工人党宣言³⁷¹

几个世纪以来,商业和工业革命震撼着社会的经济基础并改变着社会关系。在上一个世纪,它要求旧的世袭贵族让位,而在今天,它又势不可挡地要求新的金融贵族让位。

工人党是惟一代表无产阶级经济利益的政党,它将推动这场社会革命,把无产阶级分散的力量组织起来,并使能够从这场革命中得到好处的资产阶级下层成员加入它的事业,现在,它认为发表自己宣言的时刻到来了。

I

工业财产的发展

a) 工业革命的进程

从理论上描述进程——

国际竞争的影响——

证明存在着不同的发展阶段,并非所有的产业都达到同一发展阶段,因此,不同……应该有不同的解决办法。

资产阶级的事业就是剥夺工人的全部财产——革命的事业就是把工人同他的财产重新结合起来。

大家都了解工业革命的进程,并且它的各个阶段我们可能都已作过研究。最初,生产者是自己的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的主人。资本家介入生产以后,把生产者和劳动工具集中在一个公共工场里,或者让他们暂时分散在城郊或农村,就像在纺织业中那样,资本家向他们提供原料并成为产品的主人。无论是前一种情况还是后一种情况,自由生产者都成为雇佣劳动者。

在公共的或协作的工场中,集中起来的生产者之间开始了分工。

后来,机械学控制并改变了劳动工具;工具脱离了手工业者的手并成为机器不可分割的部分。起初由人、驴或马,风或水作动力的机器,现在由蒸汽来推动了。

以往简单、小型和低廉的劳动工具，现在变成了复杂、大型和昂贵的劳动工具，因而不能，也不再可能由生产者个人拥有。它暂时成为个别的和联合的资本家的财产。

这个进程是必然的——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行会师傅竭力阻止这场变革，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摧垮了他们。工人本能地预感到即将降临到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家庭头上的无穷无尽的灾难，奋起反抗并破坏机器，但是他们被国家用刺刀维持的饥饿征服了。今天，工业资产阶级只是这个变革的不自觉的工具，它以保护主义关税制度和法国的低廉工资为庇护，并不要求它的工具具有已经实现的发展水平。^① 工业的进步只有同资本

① 这里有必要举几个例子。让·多尔富斯是棉纺织业最大的工厂主之一。他在自己的小册子《废止进口棉纱的禁令》(1853年)中说，1825年发明的青锭精纺机早已在英国所有纺纱厂中使用，但是直到1853年，米卢斯产业协会才为东部各省大批生产各类棉纱颁发了第一枚奖章。他接着说：“由于法国的劳动力比英国便宜，因此我们不能从使用机器中得到和英国人同样的好处。”——路易·雷博在他的《关于棉花工场手工业制度研究》中证实，在1868年，1 700 000台纺纱机中仅有200 000台属于改进型，法国1848年以前发明的海尔曼梳毛机在兰开夏郡得到普遍使用，而1853年在法国则仅仅是试用。他指出，

家的利益相一致,才能够实现。

工业家不再让工人干更长时间的活和拿更少的工资,从而把工具落后的代价转嫁给工人,而是不得不使用一部分从工人那里窃取的利润来改善工具,不再把这些利润用于个人享受。

或者是由于愚蠢,或者是由于吝啬,资本家的个人利益几乎总是同机器工具的进步相对立。

但是,这两个原因正趋于消失。社会主义者采取了罢工和立法行动,在他

“一般说来,这场劳动方式的革命是由劳动力的条件来支配的。只要人手提供廉价的服务,人们就浪费它,而当人手的的服务费用较高时,人们就努力节省它。”他接着说:“非常精确的计算表明,法国诺曼底、佛兰德省、阿尔萨斯、孚日各省的工资分别比英国低 12%、15%、20% 和 30%。”——这种低廉的工资必然使工人遭受贫困并延缓工具的进步,但是却为工厂主创造了丑恶的财富。让·多尔富斯估计,从 1850 年到 1853 年,纺纱厂的平均利润每公斤不少于 60 生丁。“这样就可以创造 40% 的纯利润,也就是说,比全部用手工劳动多 40% 的利润……以这样高的利润,只要三年或四年就可以使整个工厂折旧……”

们的鼓动下,工资提高了,劳动时间缩短了,保护主义制度(那些无耻地进行剥削的雇主们,宣称只是为了他们的可怜的工人的利益才坚持这种制度)从根本上动摇了。它迟早要被大商人和大土地所有者的联合进攻击溃。前者从大规模的国际贸易中获得新的生命力,后者为了自己的产品而卷入自由贸易制度,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他们的经营伙伴为他们使用的机器和他们的工人穿的衣服设置进口税。

在这种情况下,工业家们不再让工人干更长时间的活和拿更少的工资,从而把工具落后的代价转嫁给工人。他们利用从工人那里窃取的一部分高额利润来改进工具,而不是用于个人享受。

尽管有这些特殊原因,在国际市场的作用下,工业工具的逐步发展过程在法国仍然完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最革命的阶段就是国内市场由于生产的增长而变得狭小,产品不得不向国外市场出口的阶段。一旦同外国产品发生竞争,法国工厂主不管他们是否愿意,都必须改进他们的工具,以降低生产费用。

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挡工业革命。

b) 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贫困

但是,资产阶级甚至在大工业建立以前就完全剥夺了手工业者对自己产品的占有。

一旦生产者不再拥有他的劳动产品和劳动工具,一旦他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不再拥有任何商品,社会贫困就像暴风雨一般向他和他的家庭猛烈袭来。

在某些产业部门,例如手工纺织业、花边制造业等等,劳动工具归生产者所有,生产仍然保留着家庭形式,这些产业往往还是农业劳动的补充。生产者力图使这两者结合起来,以便使家庭生活资料的预算达到平衡。这些产业被慈善的经济学家说成是保存被工厂劳动破坏了的工人家庭的手段,但是它们对于那些只是提供原料的资本家来说,不过是把整个工人家庭,直至工人的私人生活置于奴役的枷锁之下并减少由农业劳动来补充的工人工资的手段。手工业者们过着相互隔绝的生活,不可能就劳动力调节问题彼此协调一致,因此,他们虽然占有优势,但劳动报酬却是最低的。

加注:比卡热东司
(piquage d'once)³⁷²

然而这种劳动又是最不稳定和多变的。因为那些挂着工厂主头衔的商人,虽然他们的整个工厂不过是一张柜台,

(引证阿克索博士³⁷³孚日的花边女工)

应该阅读上半个世纪经济学家³⁷⁷西斯蒙第、维莱梅、布朗基(科

(引证奥迪冈³⁷⁵——和博利厄³⁷⁶)。(第1—3)(见第5页)

但是他们却可以随着季节和市场状况的变化,增加、减少或中断原料的分配。花边工业的历史就是工人阶级的妻子、女儿殉难的历史。为了满足统治阶级无聊可笑的趣味,她们备受折磨。据J.西蒙的说法,有125 000花边工人,而据雷博的说法,则有220 000花边工人,数年来,她们的日工资只是在40生丁到1.25法郎之间变动,而她们每天却要劳动12和15小时。^①

家庭劳动为资本家带来好处,因为他们无须为建立公共工场和购买劳动工具投入固定资本,虽然如此,这种劳动必然被协作工场这一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形式取代。只有在公共工场中,工业革命才能够完成。

由资本家指挥的公共工场是广大工人群众的营房,是对工人家庭的破坏,是对工人民族的直接的、无情的剥削,

^① 整个资产阶级伦理都反对在丝织业和毛纺业中发生的比卡热东司(piquage d'once)(见埃尔伯夫商会1862年9月4日通报³⁷⁴)。这种扣压原料的做法只是工人为了弥补自己工资的不足而采取的手段。但是我们应该怎样来形容工厂主及其代理人的可耻的盗窃行为呢?

学院院士)的著作,以便对在大机器工业的产生中起支配作用的贫困有一个概念。这就是资产阶级所说的平等的制度——人权的实现。

屈辱的和长时间的劳动使他们变得愚钝和麻木。

资本主义工场是无产阶级的地狱,我们应该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著作家那里去寻找关于贫困的描述,这种贫困是资产阶级统治下生产者必然遭受的命运。

——维莱梅——布朗基——莫利纳里 第 101 页。《新闻报》1880 年 5 月 21 日^①。——

但是,不要以为这些贫困终究会消失,下面就是最能代表官方的经济学家之一关于这一

这种贫困既不是地区性的,也不是民族性的。我们在英国的官方调查中同样可以看到这种情况。这种贫困也不是暂时的,即使它在一段时间有所缓和,也会由于工业危机或机器的进步而再度发生,并且更为严重。

^① 估计指《罢工》一文,载于 1880 年 5 月 21 日《新闻报》第 139 号。——编者注

问题的看法。《莫利纳里》^①

工人阶级的这种贫困是必然的,只要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的资本主义占有继续存在下去,任何东西,无论是政治改革还是经济改革都不可能持久地缓和这种贫困。

资本主义生产只有同时使生产者陷入贫困才能确立起来;而生产者的贫困则成为资本主义财富增长的主要条件。构成资本家财富的利润不过是没有支付的劳动,工资越低,工作日越长,利润就越高。恩格斯把工业过剩人口称作**劳动后备军**,资本家利用这种过剩人口把工人的需求压到最低水平。——为了招募工业大军,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把手工业者从农奴制和行会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把他们大批吸引到工业中心,它还从外国同法国的**毗邻地区**输入手工业者,佯称付给他们优厚的工资。米卢斯这个得天独厚的工业慈善地区还兴建了**贫民所**,接待新来的人,为他们提供食宿和工作。

(1)加注。48年以前,马赛和艾克斯的橡胶厂、榨油厂、肥皂厂的工人是从弗雷和皮埃蒙特山区招募的。这些不幸的人每月工资60和30法郎,他们在工厂吃饭和睡觉,日夜倒班。劳动异常艰苦,待遇极其

① 见古·德·莫利纳《19世纪经济发展。发展理论》1880年巴黎版第102页。——编者注

微薄,以至于当地工人拒绝做这种工作。

但是,欧洲工人已经不够了。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又转向亚洲,转向这个取之不尽的可供剥削的人力的供应地。

所有工业人口流动的地区,如索恩—卢瓦尔矿区,都设立了工人区,创办了救济站、收容所、互助会以及其他实用的慈善机构,为流动人口永久地居住下来提供了便利条件。

欧洲工人的贫困条件已不能使法国的资本家感到满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5月5日的《政治经济学学会》上认真讨论了效仿澳洲和美洲把中国工人以及苦力制度引入欧洲的可能性问题,而这种苦力制度不过是强化的奴隶制。矿山民营企业工程师西莫南先生说:“中国人用经验证明,体力劳动者用微薄的工资就可以生存和积蓄。”《法国经济学家》杂志经理保·勒-博利厄说:“欧洲工人的要求往往是过分的,这最终将导致从中国、印度和日本引进工人,这些人的节俭

《——共和国的行政官》
让这些好样的中国人来
吧——

加注。提出讨论这个问题的《法兰西报》编辑西莫南是现今世上最粗俗的人——下面就是他在1866年说过的话——我在[1880年6月9日]《平等报》上报道了这次会议³⁷⁸，有几个朋友责怪我回答的方式太粗暴了。

Lt. D. 波拿巴、J. 西蒙、甘必大的慈善药方即无息信贷、生产和消费合作社、参股分红，在政府的协助下一次又一次地实验过了，但是都遭到了失败。

是人所共知的。”

机器本身创造了过剩人口。

但是工具的改善创造了过剩人口。任何机器的发明都把一部分工人人口抛到街头。尽管他们忍饥挨饿，但也不能离开原地，因为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新机器的应用又使商品价格降低，从而扩大市场和生产并为受排挤的工人提供工作，直到新的发明或生产过剩危机把他们重新抛到街头。

资本主义生产对工人人口的作用就是吸入泵和压力泵的作用。

要想让资本家拿出消除这种症状的办法真是荒谬之极。资本家的生存、呼吸和运动都是为了赢得利润，如果可以获得一块一百苏的钱币，哪怕让全人类的血都流干，他们也在所不惜。

没有任何办法,除非[……]

工业问题就是如此

小所有制注定要消灭。

大所有制把贫困普遍化了,只要生产力被发动起来,结果只能如此。

至于大工业的无产者,他们了解自己的苦难并知道,惟一可能的解决就是用暴力来剥夺。

不过,虽然资本家本人从人民的贫困中得到好处,但是他也受到他所推动的经济力的支配。正如工业危机显示的那样,他同无产者都是经济力的工具。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

剥夺一切工业资本家,用中央行政机构来取代资本家对社会生产的非人道的、愚蠢的、欺诈性的和专制的统治。这个中央行政机构将把公共的、非资本化的工场交给联合工人经营,它将调节生产,赋予经济力以新的推动力并结束工人阶级的贫困。工人阶级的贫困并不是机器生产本身固有的,而是资本家的统治固有的。——此外,中央行政机构将取代对那些仍然保持旧习惯,用自己的工具在家庭从事劳动的手工业者进行剥削的商人,这就有利于手工业向大工业的过渡。这一转变的各个阶段已被科学地认识,而明智地加以引导则可以缩短和缓

和这一进程。——无须厌恶,这一转变是必然的,手工业者必须抉择,或者在资本主义的桎梏下,在有利于资本家的情况下,或者在由无产阶级监督的中央行政机构的协助下来实现这个转变。

宣 言 第 三 篇

(见第 2 页和最后一页)

III、金融财产的发展

在任何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业企业和农业企业都达到一定规模,因此它们的建立要求巨额资本的个别积累。而资本只有不断剥夺民众才能够积累。在许多情况下(铁路、矿山、按美洲方式经营的农场等等),个别积累的资本不够,必须通过股份的联合把个别资本集中起来。——另一方面,一切资本主义经营为购买原料和劳动力所必需的流动资本的增加、生产的迅速增长、产品销售的阻滞、市场的扩大和距离遥远、资金回收的困难迫使每一个工业资本家为了他的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断求助于信

用,即社会资本的预付。因此,社会财富即生产超过消费的不断增长的余额必须被收集和集中起来并置于随时可以支配的地位,以便按照生产和交换的需要来分配。社会储蓄的这种吸入泵和压力泵的双重职能是由现代金融来完成的。金融可以说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心脏。

社会的这两个重要职能——国民储蓄的集中和分配——没有成为仅仅为公共谋福利的社会职能,而是交给了不受监督和不负责任的人,因此,整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掌握在数百名恶棍手中,用贝里耶的话来说,这些人“什么都会干,什么也都不会干”。他们“用罪恶的手段……掠夺外省的财富,人民的生存资料和国家遗产。”他们掌握了这些东西,其中一部分用于挥霍,这种挥霍达到了闻所未闻的地步,“完全无视大部分其他公民的贫困”。^①而另一部分则不加区别地用于创办或扶持本国和国外的工业企业,其中有些企业是最没有理性的。

帝国有力地支持了金融的集中化活动。它实行了小额国债制度,比诺部长

^① 1716年发布的建立法院的通告。

把这种制度称作“公债民主化”，并为那些对自己的金融投资总是抱怀疑态度的小股资金提供国家担保。这种制度为信用机构实行的金融掠夺作了准备。它们只须用丰厚的红利、奖券和彩票作诱饵来吸引那些既愚蠢又贪心的小资产阶级和小土地所有者。^①

帝国所做的事情还不止于此。它为信用机构发放几千万法郎补贴，让这些机构像银行家那样，利用公共资金去周转。它让总税务官和特别税务官都为地产信用公司服务，收集乡村储蓄。仅仅**动产信用公司**²³⁸（它是波拿巴主义金融的代表作）一家银行，在1852年到1867

① 工人的积蓄也变成了金融家的猎物。路·雷博在《铁和煤——工场手工业制度研究》（1874年）中指出，“储蓄只是人民积蓄的很小部分，其余的都拿去投机了……在里昂、圣艾蒂安和日耶河谷，受害者主要是那些最机灵的工人，那些工资较高的人……工人所占的数额比人们估计的要大……许多人伤心地把作废的或贬值的证券拿给我看，他们的微薄财产就这样丧失了。他们选择这种不可靠的投机买卖是很自然的……这就是拥有这么多鼓吹者和同谋者的信用市场导致的结果。由于人民的储蓄被分散到冒险副业中去，这种储蓄的稳定所代表的社会保障被削弱了。谁知道这会不会使那些在这种不公正的投机事业中受害的不幸的人产生一种**报复的欲望**呢？”金融家比所有的社会主义者更好地揭露了那些鼓吹储蓄的经济学家们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年的 15 年间就从国内和国际流通中吸入和抛出了 40 亿资本。这个巨额交易活动还不包括它参与发行的国家和城市债券。在 10 年中,这个公司的 15 个经理就从他们过手的财富中提取了 8 248 445 法郎的管理费,平均每位经理得款 54 989 法郎,还不算他们以发明奖金名义获得的股票利息和红利以及他们在股票市场作弊获得的利润。^①

信用机构让金融家控制了国家的动产,从而使他们掌握了国家一部分不动产(铁路、冶金工厂、远洋航运等等)的管理权并对另一部分不动产以利息、期票等等……名义征税,因为这部分不动产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求助于信用。银行家用公众的钱来剥削工业和农业。例如,法兰西银行每年用 18 250 万股份资本就可以从近 100 亿流通资金中获利(1873 年法兰西银行的营业额高达 160 亿)。由于这种双重的信用制度——公众向信用机构提供信贷,信用机

资本输出

① 一个熟悉内情的投机者(例如经理),如果每月都从事证券交易,以最低价格买进,最高价格卖出,在 1853 年一年的时间里,就可以凭动产信用公司的 100 个股份赚得 162 250 法郎。

构又向工业和农业提供信贷——，金融家榨取了统治阶级的其他成员并把他们变成为自己的利益剥削工人阶级的单纯的开发机体。

现代金融业起源于公共信用即公债制度。威尼斯和热那亚在中世纪为这种制度奠定了基础。只是在1522年才由掌玺大臣杜普拉引入法国³⁷⁹。公债本身包含着自行增加的萌芽……“借债使政府可以抵补额外的开支，而纳税人又不会立即感到负担，但借债最终还是要求提高税收。另一方面，由于债务的不断积累而引起的增税，又使政府在遇到新的额外开支时，总要借新债。”^①但是，另一方面，公债“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而又用不着承担投资于工业，甚至投资于私人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风险和纷争。国债债权人实际上并没有付出什么，因为他们的变成了容易转让的公债券的本金，在他们手里所起的作用和同量现金一样。”^②因此，能够

① 《资本论》1872—1875年巴黎版第338页（中译本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818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337页（同上书，第817页）。——编者注

自行增长的公债把国家(无论它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君主制的或共和制的)变成了为积累的资本增加利润的机器,此外,现代国家为了维持自己的存在和完成维护统治阶级的使命,必须不断地、越来越多地从生产中抽出生产者(警察、司法、军队),而且随着阶级斗争的加剧,还必须利用对外国的远征来缓和国内的冲突,这就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额外生产费用不断增加的原因。因此,国家对国民的剥削以及金融家对国家的剥削是同金融对工业和农业的剥削成正比例增加的。

金融家对国家的剥削采取了各种不同的形式。——二月革命之后不久,临时政府的共和派,由于缺少钱而停止偿还储蓄银行的存款,但是又建议提前支付从3月22日开始计算的半年一付的公债利息³⁸⁰并勾销了路特希尔德应该向国家支付的8000万(路特希尔德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末期争得了25000万国债³⁸¹)。二月革命五个月以后,即对人民的六月屠杀一个月以后,7月27日,卡芬雅克将军,这个资产阶级第二共

(我将对法兰西银行 1869 年以来的年度报告作一分析,证明它在 1872 年、1873 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额利润。这些利润是由于国库为偿还战争赔款而向它借款所产生的。)

和国的麦克马洪,秘密批准了同一个路特希尔德发行 1 300 万公债。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期间,工商业资产阶级不断抗议法兰西银行拥有的造币和使用商人和工业家提供的信用榨取商业和工业的过分的特权。^①在 1840 年和 1847 年,众议院有人强烈要求取消法兰西银行的特权。但是小资产阶级发动的反对银行家的 1848 年革命成立的临时政府颁布了暂时强制流通的法令。这就是说,国家**毫无理由地**给予法兰西银行发行的废纸以法定的价值。资产阶级第三共和国规定了永久性的强制流通,而且总是同样地毫无理由。1857 年,立法团仅仅在一次会议上,而且是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即 5 月 28 日,悄悄地、匆匆忙忙地通过了一项法律,把法兰西银行 1867 年到期的特权延期至 1897 年。贴现率限制在 6% 以下的法律被废除了。帝国统治下

^① 众所周知,法兰西银行有权把它持有的证券的价值发行成银行券。因此,工业家和商人得到的银行券是由他们自己担保的。法兰西银行只是负责印刷银行券而已。为了有幸提供这种担保,资产者要支付百分之二三,甚至百分之十的贴现。如果说,工业资产阶级毫不留情地剥削生产者,那么他们也同样遭到金融家的剥削和愚弄。

据我所知，法兰西银行始终可以想发行多少银行券就发行多少银行券，但是它必须能够做到见票即付，即把这些银行券兑换成金或银。这个法定的发行界限自然随着强制流通而降低。但是法兰西银行非常了解发行的经济界限，而且始终谨慎从事，因此，它的银行券从未有过丝毫贬值，可见它的制度与阿西涅币制度毫无共同之处！

的法兰西银行获得了完全的剥削自由。剩下的只是摆脱它应该向国家缴纳的某些费用。1878年2月4日，共和派部长萨伊先生（现任参议院议长，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他都是银行巨头的奴仆）提出一项法律草案，免除法兰西银行按照1840年6月30日、1871年8月23日、1874年2月19日立法规定应缴纳的印花税，这样它每年就可以减轻200万税务负担。此外，萨伊先生还要求法兰西银行能够不必像先前法律规定的那样，以金属货币或商业证券作抵押来发行银行券。这种许可和永久性强制流通就是为了银行巨子的利益把阿西涅币³⁸²恢复七分之一。

在奥尔良派、波拿巴派、共和派政府统治时期，金融寡头又把铁路抓到手中：他们用国库的钱建设铁路；用国家的担保来经营。根据若·度申的统计（《工业帝国》），1868年国家对铁路建设的补贴

高达 1 536 576 544

国家担保资本

高达 3 859 000 000

5 395 576 544 法郎

在这三届政府统治期间，铁路的建设和和

必须确切说明萨伊先生的法律草案条文。我不认为法兰西银行只能通过商业票据贴现、法律确认的有价证券抵押、政府贷款以及通过用自己的银行券购买贵金属来发行银行券。此外，自从强制流通成为永久性的，法兰西银行的金属储备——无须花费它一文钱——就自动增加到这种程度，以至于这种储备总是超过法律为英格兰银行规定的水平。

经营成了最无耻的舞弊。有几条铁路是用国库的钱营造的，但是由于金融家的浪费和厚颜无耻的盗窃而遭到破产，国家把它们赎买了，

又转让给那些使它们破产的金融家，重新由他们经营，而国家则提供数额更高的担保。应该指出，对国库来说机会主义的甘必大分子签订的赎买和经营合同比波拿巴主义的鲁埃分子签订的合同要昂贵得多，这是第三共和国的荣誉。波拿巴帝国派法国军队到墨西哥收复热克尔(被公社处死)的债权。³⁸³机会主义的共和国同俾斯麦政府和托利政府结成神圣同盟，以废黜埃及总督。这位总督为

了剥夺农民(他们受到欧洲高利贷的盘剥)自己投进了路特希尔德和其他国际金融鳄鱼的口中。³⁸⁴

金融阔老们用贿金换取了对国家的直接影响,而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波拿巴派或共和派的部长、高级官员、议员、记者等等)则无耻地行贿受贿,这些人在进入政界时,囊空如洗,一副寒酸相,但是他们在政界却奇迹般地成为百万富翁。除此之外,金融阔老们还以另一种方式影响着国家的政治进程,这种影响虽然是间接的,但同样是灾难性的。他们操纵了证券交易所,而交易所的行情则成为政治上的晴雨表;他们的报刊制造和领导着公众舆论;他们利用各种罪恶手段使社会储蓄急剧集中,从而破坏了其他资产阶级成员的生存条件并为资产阶级革命作了准备。在改革呼声中爆发的二月革命就是小资产阶级反对由大银行家操纵的、交纳了选举税的议员的起义。帝国受到金融界的欢迎,就像它进入了迦南福地一样。为了平息金融投机在国内引起的愤怒和骚乱,帝国投入了法国和普鲁士的战争冒险之中。以日拉丹先生(他的宠儿奥利维埃先生在

内阁任职)为首的证券交易所经纪人只是把宣战看作为证券交易制造赢利机会的口实。屈辱地、草率签订的和约虽然使普耶-凯尔蒂埃(当时任部长)和其他法国棉纺厂主摆脱了米卢斯的竞争,使昂赞煤矿的股东(梯也尔先生是最大股东之一)摆脱了阿尔萨斯煤矿的竞争,但是这个和约却使梯也尔先生召来的欧洲高利贷者涌向法国,并把他们的受害者变成取之不尽的金融利润源泉。从来没有一个政治家像梯也尔,这个资产阶级第三共和国的华盛顿那样,对统治阶级来说,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祖国之父,因为从来没有一个政治家让无产阶级流那么多血,也从来没有一个政治家使民族遗产遭到如此破坏。从来没有一个政治家能够更好地证明,统治阶级把祖国仅仅理解为他们的阶级利益。

历史告诉我们,在统治阶级面临被高涨的民主削弱的威胁的时候,它往往把祖国交给敌人。

(引证几个古代、中世纪和现代的例子,因为必须强调这一点,这是一个有利的阵地。)

现代金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拥有的巨大力量同政治权力的形式是完全无关的。这种力量在德意志专制帝国和美利坚联盟民主共和国是同样强大的。在法国,奥尔良主义、波拿巴主义和共和主义制度相继更迭,但是金融的权力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动摇。相反,它在不断壮大。

(对舆论有益的补充)

这种恶劣的统治不是一场政治革命可以推翻的,因为它建立在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公债的基础之上。金融家从其数量、智力和勇气上说,是资产阶级毫不足取的部分,它只有在掌握政权、实现了社会共和国的无产阶级剥夺工业资本家,没收银行和其他信用机构并消灭公债以后才能灭亡。好!

这一切马克思的一行半
字说得更好。

恢复“信任”和开办——
“信用”——
秩序。

金融家虽然为政治革命作了准备并从中得到了直接的好处,但是他们在斗争中是最怯懦的,在镇压中又是最凶狠的。1848年6月,商人们在道边欢宴机动保安队,让他们高兴并怂恿他们杀人;1871年,这些人和他们的合法的、非法的娘儿们麇集凡尔赛,侮辱和折磨被解除武装的公社社员。无论是在1848年6月,还是在1871年5月,他们都要求巴黎无产阶级“流血”,以便恢复——“信用”!

保·拉法格大约写于1880年
5月中—7月初之间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85年历史考证
版第1部分第25卷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25卷翻译

*约翰·斯温顿在《太阳报》上 发表的卡尔·马克思访问记³⁸⁵

卡尔·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是当代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在过去 40 年里,他一直在革命政治中起着不可思议的然而却是强大的作用。他没有那种表现自己或追求名誉的欲望,不喜欢大吹大擂或虚张声势的作风。他从容不迫,不知疲倦,具有坚强的性格、广博的学识和高尚的精神;他满怀深远的谋略、逻辑的方法和实际的目标。正是这位卡尔·马克思,他过去和现在促成的地震般的大动荡多于包括朱泽培·马志尼在内的欧洲任何人。这些地震般的大动荡震撼了多少民族,摧毁了多少王座,如今又使多少帝王和官高爵显的骗子心惊胆战、变颜失色!作为柏林的大学生、黑格尔思想的批判者、报纸的编辑、《纽约论坛报》过去的通讯员,他都表现出了自己的才干和素质。作为曾经使人胆战心惊的国际的创始人和精神支柱、《资本论》的作者,他在欧洲半数国家遭到驱逐,几乎被所有国家宣布不受法律保护,最近 30 年来伦敦就是他的避难所。我在伦敦时,他正住在著名的伦敦人海滨疗养地拉姆斯盖特;就在那里,我在他的小别墅中见到了他和他一家两代人。一位面容端庄、语音悦耳、彬彬有礼的文雅妇女在门口迎接

我，她显然是这个家庭的主妇和卡尔·马克思的妻子。而那位高雅而亲切的60岁的长者有着硕大的头颅、和善的面孔、长而密的蓬松花白的头发，他就是卡尔·马克思吗？他与人对话的风格很像苏格拉底——那样无拘无束、那样广博、那样富于独创之见、那样尖锐犀利、那样纯真无伪，而且是冷嘲热讽，妙趣横生，奔放爽朗。他谈到欧洲各国的政治力量和人民运动——俄国精神领域的洪流，德国的思想动态，法国的积极行动和英国的停滞不前。他满怀希望地谈论俄国，富有哲理地谈论德国，欢欣鼓舞地谈论法国，忧心忡忡地谈论英国，轻蔑地提到英国议会里的自由党人花那么多时间搞的“原子般的改革”。他一国一国地评述欧洲世界，描述特点、事件和幕前幕后的人物，从而表明事态的进程是朝着肯定会实现的目标发展的。当他谈话之际，我时时感到惊奇。显然，这位很少出头露面的人却深刻通晓当今现实，从涅瓦河到塞纳河，从乌拉尔山到比利牛斯山，他到处在为新的纪元准备条件。他现在付出的心血并不是徒劳的，正像过去一样，那时曾经产生了那么多合人心愿的变化，有过那么多英勇的战斗，法兰西共和国大厦在高地上建立了起来。在他谈话的过程中，我发现，我提出的“您现在为什么没有从事任何工作？”这一问题是无知者提的问题，是一个他不能直接回答的问题。当我问为什么他那硕果累累的巨著《资本论》已经从德文原文译成俄文和法文却没有译成英文时，他好像回答不出，但是他说纽约曾有人向他表示要搞一个英文译本出来。他说，这本书只是一本未完成的著作，是一部三卷本著作的一卷，其余两卷尚未出版，整个三部曲是“土地”、“资本”、“信用”；马克思说，最后的一卷将用大量美国实例来说明问题，因为在美国信用已取得十分惊人的发展。马克思先生是一位美国动态的观察家，他关于某些构成美国社会的主要力量的看法很能发人深思。顺

便说一下,他在提到自己的《资本论》时说,每个愿意读它的人将会发现法文译本在许多方面大大优于德文原本。马克思先生提到法国人昂利·罗什弗尔,当他谈到他的几个已故的学生,性如风暴的巴枯宁、才华横溢的拉萨尔以及其他的人时,我可以看出,他的天才给予这些若非已经去世可能会左右历史进程的人物的影响有多么深。

在马克思先生谈话当中天色晚了下来,英国夏日傍晚长时间的黄昏来临了。他建议在这个海滨城市散散步,沿着海岸到海滨浴场去,我们看到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玩,主要是孩子。我们在那里的沙滩上看到他一家人:他的已经欢迎过我的妻子,他的两个带着小孩的女儿,还有他的两位女婿^①,其中一位是伦敦皇家学院的教授,另一位我想是著作家。这是可亲可爱的一家——总共十来个人——两个为自己孩子感到幸福的少妇的父亲,和孩子们的充满生活乐趣、富有女性之温柔的外婆。卡尔·马克思做外公的艺术之精湛,丝毫不亚于维克多·雨果做祖父的艺术,但马克思比雨果幸运,因为他有已婚的孩子们在,使他的晚年过得愉快。晚间,马克思及其两位女婿离开家人,陪着他们的美国客人度过了一小时。谈话涉及到世界、人、时代和思想,我们的碰杯声在海上回荡。火车不等人,夜幕已经临近,我思考着现今时代和过去时代的空虚和苦痛,思考着白天的谈话和晚间的活动,脑子里产生了一个涉及存在的最终规律的问题,我想从这位哲人那里得到回答。在人们沉默下来的时候,我搜索枯肠寻求最有分量的字眼,后来我用下面这样字字千钧的语句向这位革命家和哲学家提问:“什么是存在?”他眼望着我们面前咆哮的大海和海滩

① 马克思的长女燕妮和丈夫沙尔·龙格以及孩子让、昂利和埃德加尔,马克思的次女劳拉和丈夫保尔·拉法格。——编者注

上喧闹的人群，一瞬间好像陷入了沉思。对我问的“什么是存在？”这个问题他用深沉而庄重的口气回答说：“斗争！”

开始我觉得听到的似乎是绝望之声，然而也许这就是生活的规律。

约·斯温顿写于1880年9月初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80年9月6日《太阳报》
第6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25卷翻译

*关于西班牙社会主义运动的简讯³⁸⁶

社会主义的西班牙决不像有人常说的那样,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领地。尤其在巴伦西亚和在卡泰卢尼亚的一些不大的工厂城市里有一个优秀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核心,他们像人们写信给我们说的那样,正在踏踏实实地工作。

写于1881年8月20日前后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81年8月2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5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25卷翻译

威廉·李卜克内西

*评 1881 年 7 月 14—19 日伦敦
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³⁸⁷

根据恩格斯 1881 年 8 月 17 日给爱·伯恩施坦的信

关于伦敦“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的情况³⁸⁸，我们事后从可靠方面获悉：代表大会由二十几个人组成，其中绝大多数是持有外地委托书的伦敦居民。还有几个法国人、意大利人和一个西班牙人。“代表们”是公开举行会议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没有一名记者，没有一条狗，也没有一只猫去参加。白白地等了三四天听众，结果毫无好转的希望，于是他们通过了一个了不起的决议：宣布会议为**秘密的**。

在代表大会上得到证实的第一点是：对于整个无政府主义运动普遍存在着失望情绪，认识到这个运动完全微不足道，这几个空谈家无论在什么地方都确实没有任何支持者。每个人都了解自己和自己地区的这种情况，但是尽管每一个人都用关于运动在自己地区取得巨大进展的弥天大谎去欺骗别人，每一个人还是相信别人的谎话。幻想破灭得如此突然，如此彻底，失败者甚至当着外人的面也无法掩饰对其本身的微不足道感到惊讶不已的心情。

只有一次群众大会(当然他们邀请了记者参加),以及后来愚蠢的托利党人和更加愚蠢的激进派在议会提出的质询³⁸⁹,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代表大会。在目前虚无主义流行的情况下,报刊想从这个至多有 700 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来捞取资本,这是意料中的事。

所以,如果说“正式报告”谈到第 63 号“代表”³⁹⁰等等,那么,这是指**委托书**号码,委托书是由一个、两个或三个人签发的,空白的,或填有他们根本不认识的住在伦敦的某一个人的名字的,或者是由一二十个人签发给去伦敦的代表的。实际到会代表总数是二十几个,不是接近三十,到会的外地代表肯定不足十名。

这完全是**历次**“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的老传统了。这些人的无政府状态,首先表现在每个人都想当官,没有一个人想当兵。

威·李卜克内西写于 1881 年 8 月

20 日前后

载于 1881 年 8 月 25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35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25 卷翻译

卡尔·考茨基

对无产阶级的活体解剖³⁹¹

(由恩格斯倡议并参与写成)

资产阶级一向认为有必要炫耀一下人道主义,表露一种异乎寻常地发达的温情,既造成效果,又——不付出任何代价。

以前,黑奴是资产阶级的宠儿,而这些肆无忌惮地残酷对待和剥削其“自由的”白人工人的先生们,却认真周到得令人感动地力争改善他们确实自己剥削不到的那些奴隶的命运。

“同一个‘经过改革’的议会,一方面出于对工厂主先生们的温情,迫使未满 13 岁的儿童在几年内继续在工厂地狱里每周劳动 72 小时;另一方面却在那也是一点一滴地给予自由的解放法令中,一开始就禁止种植园主强迫任何一个黑奴每周劳动 45 小时以上。”(卡·马克思《资本论》,第 281 页)^①

现在奴隶解放了,于是人们便挑选出动物界当作“人道主义”的无害对象。整个“上流”社会,打先锋的是牧师、修女和老妓女们——尊敬的施特克尔也在这个社会——掀起一场运动,反对虐待动物、反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第八章第 6 节。——编者注

对食用动物性食品,尤其反对**活体解剖**。这群愚昧无知的人——贬义的人——干吗要操心,医学科学不在活的动物身上作试验就不可能取得进步;他们干吗要操心,医学正是由于这样一些试验才取得极其辉煌的成就。他们对牲畜比对人更亲近,因此,他们到处抗议活体解剖的“残忍”。

而且他们也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当然是在英国,因为统治这个国家的是一位老太婆,控制这个国家的是牧师。五年前英国议会通过一项法律:《反对残杀动物法》,根据这项法律,只有经内务大臣的许可才能对活的动物作试验,就是说,这个法律把科学交给了这样一个人去随意处置,这个人像绝大多数大臣们一样,对他们谈科学如同对牛弹琴。生理学家也一致表示,得到这样的许可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近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医学代表大会也谈到这个话题。约翰·西蒙,枢密院³⁹²的卫生视察员,他发表一篇可以说是致命的演说起来反对活体解剖的反对者。他是全不列颠卫生警察的首脑,他就是在《资本论》中被马克思如此频繁地和如此赞扬地引用的那个人;他也许是1840—1860年时代英国最后一批忠于职守、态度认真的老官吏中的一个,对他说来,资产阶级利益到处都是履行自己职务的主要障碍,因而不得不反对它。毫不奇怪,他对资产阶级的憎恨已根深蒂固。正是这种憎恨使他能够有力地抵制反活体解剖运动,这是他的作为资产阶级一员的同行们,微耳和先生之流所根本做不到的。他不像这些先生们那样,苍白无力地为自己作辩护,而是发起进攻,把自己的演说勾画成一篇对资产阶级的起诉书。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由于篇幅有限,我们不能全文转载这篇精彩的演说:列举应归功于用活的动物作试验所取得的种种医学上的进

步,分析科学进步因新的“动物保护”法而受到怎样的阻碍,最后是他对“有美学教养的”人的多愁善感和愚昧无知的辛辣讽刺。我们只想复述约·西蒙用来把资产阶级对数以百万计的活人做实验与对少数几只活的动物进行科学实验相对比的两个事实。

为了找到预防亚洲霍乱的药剂,蒂尔施教授对六只老鼠作**感染试验:极端的野蛮!**

某些股份公司为了填满自己的腰包,在1848—1849年和1853—1854年霍乱流行期间继续把污浊的水供应给伦敦南部地区,从而继续对**50万人作感染试验**,使成千上万的人成了这些试验的牺牲品。这不是野蛮,而是**盈利的经营**。

还有一种情景。**结核病**是一种传播最广的疾病。16年前,由于法国人**维尔曼**对一些动物(家兔之类)做实验,对结核病的认识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他发现,如果把从人身上取来的结核物质注入动物的皮下,动物身上就出现了致命的结核病感染现象。后来又有人对同样的课题做了进一步的实验。**塔派纳**博士发现,呼吸时飞散在空气中的结核物质也有传染性,**格尔拉赫**教授终于在12年前指出,如果用患有结核病的动物的奶喂养健康的动物,也会把结核物质传给它。

帮助获得这种认识的实验自然是“19世纪的耻辱”,必须**禁止**这些实验。

不过,这些大叫大嚷的动物爱好者们很清楚,城市里的奶牛大量患有结核(所谓的**胸膜结核**)。他们很清楚,每年有数以十万计的人因喝了这些母牛的奶而染上了一种不治之症,备受久病不愈之苦。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为了经济“自由”的利益,愤怒地拒绝**禁止**对成千上万活人做这种**感染实验**的任何尝试。是啊,不少动物爱好者自

己还在出售这些害人的牛奶。

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在工厂、在移民船上，在矿山和臭气熏天的洞穴（人们习惯这样来称呼无产者的住所）里对男人、妇女和儿童进行活体解剖。讲人道的资产者们、他们的体贴入微的妻子和女儿们，还有泪眼汪汪的牧师们，不理睬 90% 的居民所遭受的这种慢慢被折磨致死的痛苦；使一只兔子受几小时的折磨，将产生维护几百万人生命的手段，而他们却觉得，这是残酷透顶的。

当然啰！人的痛苦有益于钱袋，动物的痛苦有益于科学。但是资产者极端憎恶科学，不许为科学去牺牲一条狗命，相反，利润是一种神，为了敬重这个神却可以折磨和宰割整个民众。

这种虚假的、片面的、伪善的感伤，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也是资产阶级腐朽的一个征兆。这种古怪地夹杂着野蛮与轻浮的感伤，在法国大革命前的数十年里就已广为流传。一个如此没有任何真正的健康的感情的社会便已是病入膏肓，稍有震动就可使它死灭。

卡·考茨基写于1881年9月中

载于1881年9月2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9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25卷翻译

注 释

索 引

注 释

- 1 《哥达纲领批判》是对马克思的《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以及1875年5月5日马克思给威·白拉克的信的统称，这是一部科学共产主义最重要的纲领性文献。《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写于1875年4—5月初，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对即将合并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草案提出了批评意见，这些意见是为当时即将在哥达举行的合并大会而准备的。

《哥达纲领批判》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公开发表。1891年1月，恩格斯为了反击德国党内正在抬头的机会主义思潮，彻底肃清拉萨尔主义的影响，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制定正确的纲领，不顾党内某些领导人的反对，将这一著作发表在《新时代》杂志第9年卷（1890—1891）第1卷上，并写了序言。

恩格斯在发表《哥达纲领批判》时，删去了一些针对个别人的尖锐的词句和评语，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应《新时代》杂志的出版者约·亨·威·狄茨和编辑卡·考茨基的要求。这一著作发表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和《前进报》编辑部对它反应冷淡。但是正如恩格斯所预见的那样，无论是在德国党内，还是在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中，马克思的这一著作都受到欢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把这一著作看作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献。

《哥达纲领批判》和恩格斯写的序言在恩格斯生前没有再版过。这里所发表的中文版是按手稿全文翻译和刊印的。——3。

- 2 指1875年5月22—27日在德国哥达召开的代表大会，会上当时德国工人运动中存在的两个派别，即由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于1869年在爱森纳赫建立，并由他们领导的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和由哈森克莱维尔、哈赛尔曼和特耳克领导的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实现了合并，合并后的党命名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5,119,643。

- 3 这个声明后来没有发表,其原因见恩格斯 1875 年 10 月 11 日给威·白拉克以及 1875 年 10 月 12 日给奥·倍倍尔的信。——5。
- 4 爱森纳赫党的正式名称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于 1869 年 8 月 7—9 日在德国爱森纳赫城举行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社会民主党人全德代表大会上成立,领导人是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爱森纳赫党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关怀下建立和成长起来,它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左派。——5。
- 5 指巴枯宁 1873 年在瑞士用俄文出版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5。
- 6 德国人民党成立于 1865 年,由主要是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德国人民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宣传实行联邦制,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反映了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意图。

1866 年,以工人为基本核心的萨克森人民党并入德国人民党。人民党的这支左翼,除了反普鲁士的情绪和力求共同努力以民主方法解决国家的全民族的统一问题之外,在实质上与原来的德国人民党毫无共同之处,以后它就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后来该党的基本成员脱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于 1869 年 8 月参加了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工作。——6,29。
- 7 指巴枯宁在《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所表达的意思。马克思在对这本书作的摘要和评注中揭露了巴枯宁提出的责难是毫无根据的。——6。
- 8 1869 年 8 月 7—9 日在爱森纳赫举行了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社会民主党人全德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了德国民主工党,也称爱森纳赫党(见注 4)。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即爱森纳赫纲领,总的来说是符合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的精神的。——6。
- 9 委托书在这里是指受某个组织或党派的委托去参加某种会议或执行某种使命的证明书。具有约束力的委托书规定了受委托人必须严格遵守的要求。

拉萨尔派为了坚持他们的机会主义主张,发给他们的代表具有约束力的委托书,而李卜克内西则热中于合作,不惜作无原则的让步,他在1875年4月21日给恩格斯的复信中辩解说:“拉萨尔派事先直接举行了执行委员会会议,一些特别糟糕的条文均受委托书的约束。我们的(以及对方的)任何人都毫不怀疑,合并是拉萨尔主义的死亡。因此我们更应当对他们让步。”——6。

- 10 原来宣布哥达合并代表大会将于1875年5月23—25日召开,拉萨尔派代表大会在这以前召开,爱森纳赫派代表大会拟于5月25—27日召开,实际情况是,合并代表大会于5月22—27日召开,而爱森纳赫派代表大会和拉萨尔派代表大会都是在合并代表大会期间召开的。——6。
- 11 指马克思亲自校订的《资本论》第1卷的法文译本,这一译本于1872年9月至1875年11月在巴黎分九册出版。——7。
- 12 指出版《人民国家报》的莱比锡联合印刷所出版社,该社于1875年出版了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的新版本。——7。
- 13 指拉萨尔同普鲁士首相俾斯麦保持的秘密关系。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就已觉察到这一点,他在1865年2月23日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拉萨尔事实上背叛了党。他同俾斯麦订立了一个正式的契约。”1928年发现的材料证实,拉萨尔早在1863年5月就同俾斯麦达成了协议,彼此多次密谈,书信来往。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1864年2月。1863年6月拉萨尔写信给俾斯麦表示:“一旦工人等级能够有理由相信独裁对它有好处,它就会本能地感到自己倾向于独裁。这是千真万确的;因此,正如我最近对您说的那样,如果国王什么时候能够决定采取——当然这是难于置信的——步骤,实行真正革命的 and 民族的方针,并把自己从一个特权等级的王权变成一个社会的和革命的人民的王权,那么工人等级尽管有共和主义的信仰,或者宁可说正是由于这种信仰,就会多么倾向于把国王看作是 with 资产阶级社会的利己主义相对立的社会独裁的天然体现者!”——15。
- 14 指1874年1月10日的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在选举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有九人当选为议员(其中包括当时监禁期已满的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所获选票超过35万张,即占全部选票的6%,大大超过了1871年选举所获的票数。——22、119。

- 15 这一称谓显然是用来讽刺《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威·哈赛尔曼的。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是 1871—1876 年在柏林每周出版三次的德文报纸，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该报完全执行了拉萨尔派迎合俾斯麦制度和巴结德国统治阶级的政策，反映了拉萨尔派领导人推行的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方针。该报站在宗派主义的立场上，一贯反对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支持巴枯宁分子和其他反无产阶级流派的人们所进行的仇视国际总委员会的活动。——22。
- 16 国际工人协会，后称第一国际，是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1864 年秋由马克思创立。马克思和恩格斯主持的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了激烈斗争，巩固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在 1872 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活动，1876 年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6 卷第 290 页）。——22、133、441。
- 17 和平和自由同盟，即国际和平和自由同盟，是由一批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维·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曾积极参加）于 1867 年在瑞士的日内瓦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织，1867—1868 年米·巴枯宁参加了同盟的领导工作，同盟在巴枯宁的影响下企图利用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协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和平和自由同盟曾宣称通过建立“欧洲联邦”可以消除战争，这一思想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广大阶层的和平愿望，但在群众中散布了荒谬的幻想，诱使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马克思曾指出，这一组织是“为同无产阶级国际相对抗而创立的国际资产阶级组织”（马克思 1870 年 4 月 19 日给保·拉法格的信）。——23、29。
- 18 俾斯麦上台后，为了镇压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在国际上搞了一系列阴谋活动。1871 年，他同法国反动头子梯也尔勾结，镇压了巴黎公社；此后，1871—1872 年他企图同奥匈帝国、俄国缔结一个正式协定，以便共同镇压革命的工人运动，尤其是第一国际。1873 年 10 月 22 日，根据俾斯麦的倡议，俄、奥、德三国皇帝缔结了协定，即“三国同盟”，规定一旦出现战争或革命的危险，三国应立即协商，采取共同行动的方针。——23。

19 自由贸易派即曼彻斯特学派,是19世纪上半叶英国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19世纪20—50年代曼彻斯特是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该学派提倡自由贸易,要求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则,要求减免关税和奖励出口,废除有利于土地贵族的、规定高额谷物进口税的谷物法。1839年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派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40—50年代,自由贸易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成为自由党的左翼。——23,533。

20 指1875年3月20日《北德总汇报》在每日政治新闻栏目里就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草案发表的一篇社论,社论指出,“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在某些方面变得比较谨慎了:它在背弃国际……”。——23。

21 “铁的工资规律”是拉萨尔的一个经济学观点。

拉萨尔对他的“铁的工资规律”作了如下的表述:“这个在现今的关系之下,在劳动的供求的支配之下,决定着工资的铁的经济规律是这样的:平均工资始终停留在一国人民为维持生存和繁殖后代按照习惯所要求的必要的生活水平上。

这是这样一个中心点:实际日工资总是在它周围摆动,既不能长久地高于它,也不能长久地低于它。实际的日工资不能长期地高于这个平均数;因为,否则就会由于工人状况的改善而发生工人人口从而人手供应的增加,结果又会把工资压低到原来的或者低于原来的水平。

工资也不可能长期地大大低于这个必要的生活水平。因为,那时就会发生人口外流、独身生活、节制生育,以致最后由于贫困而造成工人人数减少等现象,这样,就会使工人人手的供应短缺,从而使工资重新回到它原来的较高的水平。因此,实际的平均工资处于运动之中,始终围绕着它这个重心上下摆动,时而高些,时而低些”。(见拉萨尔《工人读本。1863年5月17和19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所作的演说(根据速记记录)》1874年莱比锡第5版)。

拉萨尔最初是在《就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给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1863年苏黎世版第15—16页)中论述这个“规律”的。——24。

22 引自歌德《神性》中的诗句:“我们大家必须顺从永恒的、铁的、伟大的规

律,完成我们生存的连环”。——24。

- 23 弗·阿·朗格在1865年发表的《工人问题对现在和将来的意义》一书,宣扬了马尔萨斯人口论。恩格斯于1865年3月29日写信给朗格,对他书中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24。
- 24 马尔萨斯人口论是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提出来的。他在1798年出版的《人口原理》一书中认为,人口按几何级数(1、2、4、8、16……)增加,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1、2、3、4、5……)增加,人口的增加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是一条永恒的自然规律。他把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遭受失业、贫困的原因归之于这个规律,认为只有用战争、瘟疫和饥饿等办法减少人口,才能使人口与生活资料的数量相适应。——24。
- 25 指法国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菲·约·本·毕舍在19世纪40年代提出的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来消除社会弊病的主张。——26。
- 26 “狭隘的臣民见识”是广泛流传于德国的一种说法,源于1838年初普鲁士内务大臣冯·罗霍给埃尔宾城居民的信。当时有人以埃尔宾城居民名义写信支持哥丁根七教授反对汉诺威国王废除该邦宪法。罗霍在回信中写道:“臣民应当对自己的国王和邦君表示理所当然的服从……但是不应当以自己的狭隘见解为标准去度量国家元首的行为……”。——27。
- 27 爱森纳赫派也被称为“诚实的人”。——29。
- 28 千年王国,基督教用语,指世界末日到来之前,基督将再次降临,在人间为王统治一千年,届时魔鬼将暂时被捆锁,福音将传遍世界。此语常被用来象征理想中的公正平等,富裕繁荣的太平盛世。——29、530。
- 29 文化斗争这一概念是由左翼自由派医生鲁·微耳和提出的,是对19世纪70年代以俾斯麦政府与资产阶级自由派为一方,以具有资产阶级分裂主义倾向的教会中央党和天主教会为另一方展开的政治论战的概括。由于内政和外交上的原因,俾斯麦与天主教教权主义势力处于敌对状态。中央党与其他分裂主义势力,其中包括进入帝国国会的波兰人结成了联盟,俾斯麦认为这一联盟危及具有普鲁士特征的以新教为主的帝国的进一步巩固,因而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法律措施。在反对天主教的借口下,俾斯麦政府在普鲁士统治下的波兰地区加强民族压迫,同时利用煽起宗教狂热的办法使一部分工人脱离阶级斗争。80年代初,在工人运动发展

的形势下,俾斯麦为了纠集反动力量把这些措施中的大部分取消了。——31、563。

30 这句话原文是拉丁文:Dixi et salvavi animam meam,源于《旧约全书·以西结书》,意思是,我已经尽了责任。——33。

31 恩格斯于1874年5月中旬至1875年4月撰写了《流亡者文献》一组文章。这组文章的第五篇是恩格斯在对俄国,首先是对1861年以来俄国农村社会发展的新文献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恩格斯认为俄国国内政治和经济的矛盾迅速激化,革命运动高涨,俄国社会的发展对国际工人运动,尤其是对德国工人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以后又于1875年6月底到7月初以《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为标题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人民国家报》编辑部成员海·朗格于1875年5月24日将小册子清样随信寄给了恩格斯。本文就是恩格斯于1875年5月下半月为单行本写的序言。恩格斯在序言中特别强调指出了俄国革命的国际意义,尤其指出了革命的工人运动与波兰人民争取恢复波兰的独立的斗争之间存在联系。

恩格斯写的这篇序言于1894年被收入《〈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序言的波兰译文于1894年在伦敦出版的波兰社会主义杂志《黎明》第7期上发表;本文的第一个俄文译本连同恩格斯的《论俄国社会问题》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俄国》的标题下于同年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

恩格斯的手稿没有保存下来。——34。

32 指在沙皇尼古拉一世调停下,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和普鲁士首相勃兰登堡伯爵弗里德里希·威廉为调整普奥两国的关系于1850年10月在华沙举行的谈判。——35。

33 克里木战争是1853—1856年俄国对英国、法国、土耳其和撒丁的联盟的战争。这场战争是由于这些国家在近东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发生冲突而引起的,又称东方战争。克里木战争中俄国的惨败重挫了沙皇俄国独占黑海海峡和巴尔干半岛的野心,同时加剧了俄国国内封建制度的危机。——36、154、182。

34 1875年6月21日恩格斯收到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寄给他的信以及

若干份关于在费城召开国际代表会议的机密通告,责成他将这些通告寄发给欧洲大陆和英国的各支部。

恩格斯于1875年8月13日给纽约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这封信报告了他寄发机密通告的情况以及他所采取的有关措施,同时也汇报了关于欧洲各国际支部的情况。

这封信首次用原文发表在《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人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选集》1906年斯图加特版第145—146页。——38。

- 35 指国际总委员会1875年5月16日的关于在费城召开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机密通告。这个文件使国际的成员对即将正式解散组织这一点有了思想准备。——38。

- 36 指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该协会是1840年2月由正义者同盟成员卡·沙佩尔、约·莫尔等人成立的。

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和维利希—沙佩尔少数派之间的斗争中,协会大多数成员站在少数派一边,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许多拥护者于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50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国际成立之后,协会成为国际在伦敦的德国人支部。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38,617。

- 37 这是恩格斯于1876年1月22日在1863年波兰起义的国际性纪念会上的演说。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数十人,主要是波兰、捷克、塞尔维亚、俄国、德国、法国的流亡者。主持会议的是波兰社会主义者、国际委员瓦·符卢勃列夫斯基,他在会上发表了简短的致词并转达了马克思和拉甫罗夫对与会者的问候。恩格斯在会上用德语发表了演说。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对波兰人民的解放事业倾注了极大的关心和热忱。1847年11月29日在伦敦举行的纪念波兰起义17周年的国际性会议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波兰的问题第一次公开发表了演说。从那以后30多年来,马克思和恩格斯采用了发表演说,撰写文章,书信往来等多种形式支持波兰人民反对沙皇俄国、普鲁士以及奥地利的压迫,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恩格斯指出:“波兰人民的解放是欧洲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特

别是其他斯拉夫民族解放的基础之一。”(恩格斯 1875 年 12 月 4 日给瓦列里·符卢勃列夫斯基的信)马克思也认为:“波兰的解放是欧洲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条件之一。”(马克思 1875 年 12 月 3 日给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的信)

有关这次会议的详细报道发表在 1876 年 2 月 15 日、3 月 1 日《前进!》第 27 号和第 28 号上,报道中用俄文刊登了恩格斯在会上的演说。

因为符卢勃列夫斯基不懂德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25 卷收入的现有的这篇文章是由恩格斯本人将他自己在会上的演说转译成法文的,《前进!》第 27 号上刊登的俄文译文可能是由符卢勃列夫斯基从恩格斯的法文译文逐字逐句转译成俄文的。

法文译文的手稿和信封一直保存完好,从信封上的邮戳日期可以推断,恩格斯这篇演说词的法文本完成的时间为 1876 年 1 月 22 日—2 月 1 日之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25 卷是第一次以法文原文发表这篇演说。——41。

- 38 指 1848 年 5 月 15 日巴黎人民的革命行动。这一行动是在进一步推动革命和支持意大利、德国、波兰的革命运动的口号下进行的,参加游行的有 15 万余人,其中主要是以布朗基等为首的巴黎工人。游行向当天讨论波兰问题的制宪议会走去,闯进了波旁王宫的会议大厅,要求议会兑现诺言,要求对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波兰给予军事援助,要求采取断然措施消除失业和贫困,给工人以面包和工作,成立劳动部;当这些要求遭到拒绝以后,他们便宣布驱散制宪议会,成立新的临时政府。但是,5 月 15 日的示威运动被镇压下去了。运动的领导人布朗基、巴尔贝斯(他曾提出向富人征收 10 亿税款)、阿尔伯、拉斯拜尔等人遭逮捕。这次革命行动失败后,临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废除国家工场的措施,实施了禁止街头集会的法律,封闭了许多民主派俱乐部。1849 年 3 月 7 日—4 月 3 日,在布尔日对 1848 年 5 月 15 日事件的参加者进行了审判。巴尔贝斯被判处无期徒刑,布朗基被处以 10 年的单独监禁,德弗洛特、索布里埃、拉斯拜尔、阿尔伯等人各被判处有期徒刑不等的徒刑,有的被流放到殖民地。——41。
- 39 《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是恩格斯撰写的一篇揭露和批判普鲁士军事国家反动本质的文章。1876 年 2 月 4 日,德意志帝国国会就烧酒政策问题进行了辩论,普鲁士容克的政治代表们在辩论中竭力维护本阶

级的利益,掩盖自己通过酿制和兜售劣质烧酒剥削和毒害人民的罪恶行径。次日,《科隆日报》摘要报道了辩论的实况。恩格斯随即以《科隆日报》披露的材料为依据,以普鲁士酿酒业的历史和现状为例证,撰文剖析普鲁士容克赖以生存的“真正物质基础”,抨击俾斯麦政府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实行的反动政策,指出普鲁士军事国家日益走向灭亡的必然趋势。这一切,在当时对于提高德国工人政党的政治水平、屏弃拉萨尔在国家问题上散布的幻想,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还在本文中开始批驳杜林的所谓“社会主义理论”。

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俾斯麦政府的强烈仇恨,正如恩格斯在1884年5月22日给爱·伯恩施坦和卡·考茨基的信中所说:“从《普鲁士烧酒》以来,凡是有我署名的东西一律被查禁。”

本文的写作时间大概是1876年2月5—20日,最初刊载于1876年2月25、27日和3月1日《人民国家报》第23、24和25号,是恩格斯在该报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同年5月,莱比锡联合印刷所印行了这篇文章的单行本。根据恩格斯本人的意见,文章发表时没有署名。直到1876年8月13日,《人民国家报》在刊登新书目录时才第一次标明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恩格斯。后来,恩格斯在1884年5月22日给爱·伯恩施坦和卡·考茨基的信、1884年5月23日给卡·考茨基的信以及1888年1月23日给海·施留特尔的信中曾一再提到自己写的这篇文章。——43。

- 40 杂醇油是用发酵法制造酒精时产生的少量有毒的油状挥发性混合物。——45。
- 41 指拿破仑第一退位后,法国同第六次反法同盟成员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英国等)于1814年5月30日在巴黎签订的和约。——46。
- 42 旧普鲁士是指在维也纳会议(1814.9—1815.6)决定扩大普鲁士领土以前,德意志境内原属普鲁士统辖的东北部地区(即东部各省)。狭义的旧普鲁士指波美拉尼亚、普鲁士和勃兰登堡三省;广义的旧普鲁士还包括西里西亚、波森和萨克森省的部分地区。——46。
- 43 指1830年法国推翻波旁王朝的七月革命。——50。
- 44 根据古希腊神话,希腊人在进军特洛伊城时,错误地同保持中立的密西亚国泰列夫(海格立斯的儿子)的军队交战。在战斗中,阿基里斯击伤了泰

- 列夫,后者只是在伤口敷上从阿基里斯的长矛上刮下的铁屑以后才痊愈。——54。
- 45 这句话相传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柯雷齐在拉斐尔的画幅“圣契奇利娅”前面说的,它表达了一种自尊与自负的心情。——54。
- 46 专区法指普鲁士政府于1872年12月13日为实施“行政改革”而颁布的《普鲁士、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波森、西里西亚和萨克森省专区法》。这项法令宣布废除地主在农村中的世袭警察权力,允许各地在一定程度上实行自治。可是,这场“改革”的最终目的仍然是巩固国家机构、强化中央集权,以维护容克的利益。经过“改革”,容克及其代理人占据了专区和省的大部分行政职位,因此,那些地区的权力实际上依然掌握在他们手中。——55、91。
- 47 1849年5月中旬,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地区爆发了武装起义。参加起义的群众要求实施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帝国宪法,以捍卫1848—1849年革命的成果。这次起义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组成部分。起义者最后遭到了普鲁士军队的血腥镇压。——56。
- 48 普鲁士在1866年普奥战争中取得胜利以后,于1867年成立了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其成员有19个德意志邦和三个自由市。1870年,北德意志联邦又吸收了德国西南的四个邦(巴登、黑森、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并于1871年成立德意志帝国。历史上把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联合的德意志邦称为“小德意志”。——56。
- 49 指德意志关税同盟于1865年12月31日与意大利签订的通商条约。——59。
- 50 自由保守派是指奉行保守政策、维护大资产阶级和容克的利益、坚决拥护俾斯麦统治的政治派别。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后,自由保守派主要是指普鲁士众议院的自由保守党;当时在德意志帝国国会中,这一政治团体被称作“帝国党”。——60。
- 51 普法战争结束后,德意志帝国和法国于1871年5月10日在法兰克福签订了正式和约。在此之前,法德两国已在凡尔赛签订了初步和约,根据初步和约的规定,法国应把阿尔萨斯和洛林东部割让给德国,并交付50亿法郎的赔款,在付清赔款后德军才从法国领土完全撤退。正式和约最后

确认了初步和约中的条款。——60。

- 52 神圣同盟是欧洲各国专制君主镇压进步运动、维护封建制度的反革命联盟。这个同盟是拿破仑失败以后，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倡议下于1815年9月26日建立的。参加同盟的除了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以外，还有几乎所有的欧洲君主国家。这些君主负有在镇压革命时互相支援的义务。

1815年的神圣同盟到20年代末业已瓦解，1830年革命和1848—1849年革命后曾多次试图恢复。——60。

- 53 “溶化在德国里面的普鲁士邦”一语，最初出自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之口。1848年，这位国王为了保护自己的王位，曾于3月21日发布的《告我的人民和德意志民族》中宣称：“今天，我已经对德意志旗帜的传统色彩表示认可，我和我的黎民已经站在庄严的德意志帝国旗帜之下。从今以后，普鲁士将溶化在德国里面。”——62。

- 54 《威廉·沃尔弗》是恩格斯应李卜克内西的请求为其所主编的杂志《新世界·大众消遣画报》撰写的一篇传记文章。沃尔弗是德国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亲密战友。1864年春，沃尔弗逝世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打算撰写沃尔弗的传记。1864年6月9日恩格斯致信马克思说：“关于哀悼鲁普斯的文章。我们应该写点传记一类的东西；我以为或许可把它用小册子的形式在德国印出来，并附上全部议会报告（指沃尔弗在1849年5月26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会议上的发言。然而，这一计划未能实现，因为当时缺少沃尔弗早年生活的有关材料；后来，到了1867年，当《资本论》第1卷完成时，马克思便把自己这部重要著作献给了他。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扉页上写道：“献给我的不能忘记的朋友，勇敢的忠实的高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威·沃尔弗”。

在本篇传记文章中，恩格斯除了记叙沃尔弗的生平而外，还特意从沃尔弗的重要著作《西里西亚的十亿》中摘录了大量引文，以此来表现沃尔弗本人的思想和性格。沃尔弗的这部著作于1849年3月和4月陆续发表在《新莱茵报》上，他以大量确凿的事实和统计资料对1848年以前除莱茵省之外的整个普鲁士农民深受剥削的状况作了全面而具体的描绘。他要求骑士对农民作出赔偿，无偿地废除一切徭役和货币租税，把豪绅们的地产分给农民。西里西亚农民协会曾将报纸上刊登的这部著作翻印了10 000份，免费散发给农民。沃尔弗的这部著作在吸引农民参加革命运

动中起到了极大的鼓动作用。

恩格斯写作这篇传记文章的时间大约开始于1876年5月。1876年2月26日李卜克内西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告诉恩格斯,他打算在他主编的《新世界·大众消遣画报》上刊登一幅沃尔弗的木刻肖像画,并询问恩格斯能否为沃尔弗写一篇传记。1876年4月7、26日以及5月16日李卜克内西给恩格斯的书信完全可以证实这一点。1876年6月10日李卜克内西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还这样写道:“这么说来,你已经动笔写鲁普斯的传记了,这下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这期间,恩格斯曾去海德堡旅行,去拉姆斯盖特度假,又因收集资料准备与杜林论战,这篇传记文章的写作一度中断,最后完成的时间大约是1876年9月中旬,全文共分11个部分,写好后陆续寄给李卜克内西。李卜克内西曾于1876年9月19日致信恩格斯说,他收到了这篇传记全文的最后一篇。

从1876年7月1日起文章以连载的形式陆续发表在《新世界·大众消遣画报》第27期(7月1日),第28期(7月8日),第30期(7月22日),第31期(7月29日),第40期(9月30日),第41期(10月7日),第42期(10月14日),第43期(10月21日),第44期(10月28日),第45期(11月4日),第47期(11月25日)。1876年7月1日传记的第一部分发表时还刊登了沃尔弗的木刻肖像以及他亲笔签名的手迹。

1886年,恩格斯把这篇传记作为沃尔弗《西里西亚的十亿》一书的导言的第一部分刊印出来,刊印时作了许多补充,并删去了原来介绍沃尔弗《西里西亚的十亿》一书的有关章节。——63。

- 55 联邦议会是根据1815年维也纳会议决议成立的德意志联邦的中央机关。联邦议会由德意志各邦的代表组成,会址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由奥地利代表担任主席。这一机构并不履行中央政府的职能,实际上是德意志各邦政府推行反动政策的工具。在1866年普奥战争时期,联邦议会和德意志联邦一起不复存在了。——67。
- 56 蛊惑者是对19世纪20年代德国知识分子中反政府运动参加者的称呼。他们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组织政治性的示威游行,提出统一德国的要求,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1819年8月德意志各邦大臣在卡尔斯巴德(今捷克的卡罗维发利)召开联席会议,通过一项对付所谓蛊惑者阴谋的专门决议,从此蛊惑者这一名称便流传开来。1819年大学生桑

- 德刺杀神圣同盟的拥护者和沙皇代理人科策布,这一事件便成了镇压蛊惑者的借口。在30年代,由于受法国1830年革命的影响,德国及欧洲各国的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又高涨起来,所谓的蛊惑者又受到新的迫害。——67。
- 57 威·沃尔弗于1834年7月20日被捕;1835年7月30日他被关进了银山要塞,但直到1835年12月17日才判处他8年要塞监禁。1836年12月17日的减刑证书把对威·沃尔弗服刑的时间减至3年,但并未指出沃尔弗健康状况不佳是减刑的原因。因为执行监禁一开始,他就被关进了银山要塞,因此于1838年7月30日沃尔弗被释放出狱。——67。
- 58 威·沃尔弗于1863年12月30日给弗·洛伊特的信首次发表在1957年《历史科学问题杂志》第6期第1244—1245页。——67。
- 59 暗指当时普鲁士政府关于只有通过相应的考试才能获得较高职位的规定,如同中国的科举制度一样严格。——68。
- 60 旧普鲁士立法指《普鲁士国家通用邦法》,包括私法、国家法、教会法和刑法,自1794年7月1日开始生效。由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及其对德国的影响,邦法明显地反映出资产阶级改良的萌芽,然而就其实质来说,它仍然是一部带有封建性质的法律。——69。
- 61 威·沃尔弗本人在1863年12月30日给弗·洛伊特的信中写道,由于他的一篇文章手稿落到普鲁士的警察手中,这篇手稿便成了对他提出违反新闻出版法的起诉理由。——69。
- 62 指维尔穆特和施梯伯合编的一本书:《1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1853—1854年柏林版第1—2册。该书的第一册叙述了工人运动的“历史”(它是警察的指南),该书的附录转载了若干落到警察手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文件。第二册的全文是一份同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有联系的人的“黑名单”以及他们的履历表。——69。
- 63 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即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该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们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并同佛兰德和瓦隆工人俱乐部保持着直接的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

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之后不久,由于协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71、438。

- 64 指柏林群众反对普鲁士政府的三月革命。1848年3月初,柏林群众举行集会,要求取消等级特权,召开议会和赦免政治犯。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调动军队镇压,发生流血冲突。3月13日,维也纳人民推翻梅特涅统治的消息传到柏林,斗争形势进一步激化。国王慑于群众威力,企图拉拢资产阶级自由派,阻止革命发展,于17、18日先后颁布特别命令,宣布取消报刊检查制度;允诺召开联合议会,实行立宪君主制。资产阶级自由派遂与政府妥协。柏林群众要求把军队撤出首都,在遭到军警镇压后,于3月18日构筑街垒举行武装起义。最终迫使国王于19日下令把军队撤出柏林。起义获得了胜利,但成果却被资产阶级窃取。3月29日普鲁士成立了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72、75。
- 65 民主协会指科隆民主协会,该协会于1848年4月25日成立;1848—1849年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城市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组织,其成员除了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之外,还有工人和手工业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加入民主协会,目的在于影响加入该协会的无产阶级分子并促使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坚决行动。除威·沃尔弗外,马克思积极参加了协会的领导工作,他们同时又是科隆工人联合会的成员。这两个团体都属于德意志民主协会联合会,一直到1849年春,这两个组织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为了创建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群众性的政党,马克思和威·沃尔弗以及其他一些人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断绝了组织联系,并于1849年4月16日退出了民主协会。——73。
- 66 指丹麦普鲁士停战协定,丹麦和普鲁士于1848年8月26日在马尔默签订了为期七个月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战争的停战协定。从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起义开始的反对丹麦的战争,是德国人民争取德国统一的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德国各邦政府,其中包括普鲁士政府,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参战。但是,普鲁士的统治集团采取了虚张声势消极应付的态度,并于1848年8月在马尔默签订了停战协定。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不顾德国民主力量的反对于1848年9月16日批准了这个停战协定,激起了抗议的怒潮并导致法兰克福人民起义(见注67)。1849年春天,石

勒苏益格 荷尔施泰因战事再起,但是,普鲁士政府无视德国的民族利益又于1850年7月和丹麦签订了和约。——73。

- 67 1848年9月18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爆发了人民起义。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9月16日批准马尔默停战协定是这场起义的导火线。当时曾有1000多人参加了街垒战,起主要作用的是工人协会和体操协会的成员。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在取得议会中占多数的自由派的同意后镇压了这次起义。——73。
- 68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普鲁士国民议会称为“协商议会(Vereinbarungsversammlung),其原因在于,议会的大多数议员是资产阶级和普鲁士官僚的代表,是所谓的“自由派”,他们完全站在普鲁士国王的立场上,按照国王在1848年5月22日国民议会开幕致辞中,向议员们提出“同国王协商”制定宪法的要求行事,从而放弃了主权属于人民的原则。——73。
- 69 沃尔弗指的是1846年2—3月间在西加利西亚爆发的乌克兰农民起义。当时在奥地利所辖的波兰地区,恰好也爆发了以克拉科夫为中心的波兰民族解放的起义。奥地利当局利用乌克兰农民与当时准备进行反奥暴动的波兰贵族之间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多次使起义农民将矛头指向波兰起义者的队伍。起义农民一开始就解除了波兰小贵族起义部队的武装,随后大规模摧毁地主庄园,短短几天之内400多处地主庄园被捣毁,千余名波兰庄园主及管家被打死。奥地利政府在平息了小贵族起义以后,又镇压了加利西亚乌克兰的农民起义。——78。
- 70 “抱怨派”(Heuler)是德国1848—1849年革命期间民主共和派给资产阶级立宪派起的绰号。——86、101。
- 71 “煽动者”(Wühler)是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立宪派对民主共和派的称呼。——101。
- 72 1849年6月13日,法国的山岳派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议政府派遣军队去镇压意大利的革命,因为共和国宪法规定,禁止动用军队干涉别国人民的自由。这次示威被军队驱散,它的失败宣告了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破产。6月13日以后,当局开始迫害民主主义者,也包括外侨在内。——102、131。

- 73 指在《皇室文件和通信》(两卷集)1870—1871年巴黎版(1—2卷)第2卷第161页上记载了付给福格特40 000法郎一事。——104。
- 74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拒绝接受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献给他的帝国皇冠,此后普鲁士和奥地利召回了各自的代表,德意志其他各邦的代表也离开了法兰克福,留下来的左翼资产阶级少数派于1849年5月30日便将国民议会迁往斯图加特。然而这个代表人数减少到只有130名的国民议会不久便被符腾堡政府派军队强行解散。——105。
- 75 瑞士联邦委员会即瑞士政府。根据1848年9月12日的宪法规定,它同时行使立法权和行政权。——106。
- 76 从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夫人燕妮·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沃尔弗在1853年9月已迁往曼彻斯特。——107。
- 77 本文是恩格斯在读完法国新闻记者、共和主义者、巴黎公社的参加者普·利沙加勒的著作《1871年的公社史》(1876年布鲁塞尔版)后写成的一篇笔记。

利沙加勒在研究了大量的实际材料的基础上写成了这部著作。马克思称它是“对于我们党具有重要意义和德国读者普遍感兴趣的著作”,是“第一部真实的公社史”(马克思1876年9月23日给威·白拉克的信)。

利沙加勒作为马克思女儿爱琳娜·马克思的未婚夫在当时与马克思有过密切的接触。可以推测,利沙加勒首先是在交谈中表示了要修改这部著作的愿望,于是恩格斯在一封没有保留下来的信中谈了自己的见解。从利沙加勒1877年2月9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获知,恩格斯的这篇笔记写于1877年2月初。保存下来的是这一笔记的原稿,因为这份原稿没有作为信件寄出时的折痕,恩格斯很可能是另外誊写了一份寄给利沙加勒。利沙加勒在回信中由衷地感谢恩格斯就1870年秋天军事事件所发表的“十分内行的见解”,并强调在修改自己著作时,将无条件地吸收恩格斯的这些观点。利沙加勒还直接向恩格斯提出了与围攻巴黎有关的问题,这说明他们有可能还进一步交换过意见,但这方面的情况尚无保存下来的材料加以证实。

恩格斯发表的这些见解依据的主要材料是他于1870年7月—1871年6月为伦敦《派尔—麦尔新闻》撰稿时所作的有关战争问题的笔记。

由于恩格斯这篇笔记是作为对《1871年的公社史》的修改意见而提供

给利沙加勒的,因此,它不是以一篇完整的文章的形式留传下来,而是经改写后散见于利沙加勒的著作中。1877年经马克思校阅的《1871年公社史》德文译本在不伦瑞克出版,1891年在斯图加特由迪茨出版社再版;1894年又作为《国际文库》第10卷在斯图加特由斯·门德尔松重新刊印第2版,并附有插图和跋。

这篇笔记于1933年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360—365页。第一次以原文的形式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5卷第83—86页。——109。

- 78 1870年9月19—20日茹·法夫尔和俾斯麦在上迈松和费里耶尔举行的谈判因没有结果而中断以后,国防政府又准备于同年10月重新进行停战谈判。10月30日国防政府委派梯也尔(当时尚未进入政府,实际上却起着政府秘密领导人的作用)以他本人和茹·法夫尔拟定的草案为基础在凡尔赛与俾斯麦谈判。梯也尔于当日抵达凡尔赛,谈判从11月1日开始,于11月6日结束。然而谈判依然没有结果。——109。
- 79 1870年9月4日,色当会战法军被普军围歼,法军司令官在投降书上签字和皇帝被俘的消息传来后,巴黎工人涌进了波旁王宫,解散了正在那里开会的议会,并宣布成立共和国。——109。
- 80 自由射手(法文 francs-tireurs),即志愿游击队员。他们分成小股队伍,参加抗击敌军对法国的侵犯。自由射手队伍最初是在1792—1815年与反法同盟作战时期,当敌军侵入法国时组织起来的。在这一传统的基础上,于1867年,法国建立了自由射手协会。在普法战争爆发,普鲁士军队侵入法国领土以后,自由射手们拿起武器,采用了一切他们可以采用的手段与敌人奋战。当法国正规军被击溃并被困于各要塞的时候,自由射手部队的数量曾急剧增加。——110。
- 81 1796—1797年波拿巴远征意大利时期,1796年6月波拿巴开始围攻曼图亚要塞。当时曼图亚由奥地利守备部队镇守。为了解围,一支由武尔姆泽尔将军率领的奥地利军队从蒂罗尔向曼图亚进发,法军为阻止这支军队前进所作的种种努力均告失败。在这种形势下拿破仑决定改变自己的策略:他撤销封锁,让武尔姆泽尔的军队开进曼图亚,他不留任何后备部队,全力对付在那一带作战的奥军并将它们逐一击败,以此诱使武尔姆泽尔的军队进入开阔地带作战。1796年8月5日在斯蒂维耶雷堡,奥军遭

到毁灭性的打击。曼图亚守军于1797年2月2日被迫投降。——111。

- 82 恩格斯给恩·比尼亚米的这封信写于1877年2月13日,这封信中有关德国社会民主党参加国会选举的内容,被作为通讯,刊登在1877年2月26日《平民报》第7号上。

早在1871—1872年间,恩格斯作为国际意大利通讯书记就与恩·比尼亚米有过通信往来。并开始为《平民报》和《共和国年鉴》撰稿,“直到巴枯宁主义者在意大利实行最残酷的专政时期才停止”(恩格斯1877年3月24日给约·菲·贝克尔的信)。

1877年初形势有了新的变化,恩格斯才又恢复了与《平民报》的联系。由于意大利工人运动的中心转移到北部的工业城市,1876年无产阶级革命势力开始形成。1876年10月15日在米兰成立了上意大利联合会。紧接着该联合会于1877年2月17—18日在米兰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表声明,正式与意大利各巴枯宁主义团体断绝直接的联盟关系。

上意大利联合会成立以后,恩·比尼亚米与恩格斯取得联系,希望他能继续为已迁至米兰的《平民报》撰稿,从1877年2月底开始,恩格斯撰写的文章就作为通讯在该报陆续发表。本文则是恩格斯当时撰写的这批通讯的第一篇。文中报道了德国社会民主党1877年1月在国会选举中获胜的消息,其目的在于宣传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意义,鼓励《平民报》及其拥护者坚持自己的立场。这篇通讯以恩格斯本人的署名刊登出来。可以断定《平民报》并没有采用恩格斯给比尼亚米原信的全部内容,因为恩格斯的信还涉及其他事情。——114。

- 83 后备军是普鲁士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由正规军中服满现役和规定的预备期限的年龄较大的应征人员编成的一支武装部队。按照普鲁士法律的规定,只有在战时才能征召后备军。——115。
- 84 第一国际解散以后,巴枯宁宗派组织继续进行分裂活动,并竭力拉拢和欺骗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鉴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领导成员对巴枯宁主义者的企图缺乏明确的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6—1877年间一方面直接写信给该党领导人,向他们阐明自己的观点,一方面搜集材料,准备发表文章,以便向全党揭露巴枯宁主义者的阴谋。1877年1月和2月,恩·比尼亚米在他编辑出版的意大利《平民报》上发表了批驳无政府主义者的文章,报道了上意大利联合会正式同巴枯宁宗派组织决裂的消息,并

把刊载这些文章和通讯的报纸陆续寄给恩格斯。1877年2月23日,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摘引并评论了该报的文章,指出巴枯宁宗派集团的活动必将彻底破产。3月3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建议他利用《平民报》刊登的材料撰写文章,并争取尽快在《前进报》上发表。恩格斯在3月6日的复信中表示接受这一建议,并立即着手撰写了《意大利的情况》一文。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揭露了巴枯宁主义者的阴谋,指出了他们在意大利社会主义运动中必然遭到失败的命运。这篇文章还澄清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对巴枯宁宗派组织存在的模糊认识并帮助他们及时认清了国际工人运动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本文的写作时间为1877年3月6—11日,最初曾以通讯的形式发表在1877年3月16日《前进报》第32号上。——117。

- 85 1868年9月25日,米·亚·巴枯宁在伯尔尼创建了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同年11月,同盟向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加入国际。鉴于同盟坚持无政府主义立场,否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它的纲领和章程与国际的章程相抵触,总委员会于同年12月15日拒绝了它的申请。1869年,巴枯宁组建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并被接纳加入了国际,但仍继续暗中进行阴谋活动,只是形式和名称不同而已。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公开宣布自己是当代的耶稣会”,是一个“独裁的、教阶制的秘密组织”。同盟内部分为三级:一、国际兄弟会;二、民族兄弟会;三、半秘密半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其中国际兄弟会是总揽大权的最高机构,由它“组成神圣的红衣主教会议”,充当“独裁者巴枯宁的禁卫军”。各级组织的领导人均由上级任命,并严格实行“耶稣会的纪律”。(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在保·拉法格的参与下写于1873年4—7月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文)。——117。
- 86 指马克思恩格斯于1873年4—7月在保·拉法格的参与下撰写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这一著作于1873年8月用法文印成单行本发行,1874年译成德文以《一个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为题在不伦瑞克出版。恩格斯直接参加了德译本的审订工作。——117、336。
- 87 恩格斯在这里和下面引用了巴枯宁1872年4月5日给西班牙社会主义者弗·莫拉的信,巴枯宁在信中写道:“意大利在西班牙之后并且和西班牙

牙一起,也许是现在最革命的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文的第十一部分公布了巴枯宁这封信的全文。——118。

- 88 1876年米·巴枯宁死后,詹·吉约姆继任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领导职务,吉约姆的住地瑞士纽沙特尔成了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中心。——120。
- 89 加尔文教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由著名宗教改革活动家约·加尔文(1509—1564年)创立的基督教新教流派之一,该派严格奉行的宗教信条完全符合当时资产阶级的要求。——120。
- 90 瑞士工人联合会是1873年6月1—3日在奥尔滕举行的瑞士全国工人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其宗旨是根据国际的原则把各种工人组织联合起来。这个联合会一直存在到1880年。——120。
- 91 恩格斯在这里显然是借用普鲁士政府官方报纸的名称来称呼无政府主义宗派的机关报,其目的在于揭露巴枯宁宗派组织及其喉舌妄图实行独裁统治的反动本质。——120。
- 92 上意大利联合会是1876年10月15日在米兰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成立的。——120。
- 93 1876年10月底,无政府主义者在伯尔尼召开国际代表大会,决定于1877年在布鲁塞尔召开世界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后来于1877年9月9—15日改在比利时的根特召开(见注138)。——121。
- 94 本文是恩格斯于1877年恢复了与《平民报》的联系(参看注82)之后应恩·比尼亚米的请求为《平民报》撰写的有关英国农民组织活动的两篇文章之一。文章在《平民报》上发表时没有署名,从文章的结构和内容来看,与恩格斯1872年为《平民报》撰写的文章无原则性区别;文章中谈及的英国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状况的观点与后来恩格斯对英国工人运动的评价原则上相一致,因而可以推断两篇通讯出自恩格斯的手笔。
- 本文的写作时间是1877年6月5日,发表在1877年6月8日《平民报》第18号上。——123。
- 95 1877年5月16日,在伦敦的埃克塞特会堂举行了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数达2594人,其中有1218人是农业工人工会的会员,会议由约·布莱

特主持,有20名以上的国会议员出席了会议。——123。

- 96 本文是恩格斯为《平民报》撰写的有关英国农民组织活动的两篇文章之一,这一篇是对上一篇文章的补充(参看注94)。

本文的写作时间是1877年6月14日,匿名发表在1877年6月18日《平民报》第19号上。——126。

- 97 《卡尔·马克思》一文是恩格斯应威·白拉克的请求为他主编的《人民历书》丛刊撰写的马克思的传略,写作时间为1877年6月中旬。

德国社会民主党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以后,党内的意识形态斗争一直没有停止。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1877年初陆续在《前进报》上发表以后,在党内起到了进一步澄清理论和思想的作用。以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首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增强了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的决心和信心,决定广泛地宣传马克思的生平和事业。威·白拉克主编的《人民历书》在德国农村居民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因此,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对在农村扩大党的影响,进一步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抵制机会主义分子过高评价拉萨尔,抵制杜林等人贬低甚至歪曲马克思的行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878年《人民历书》上。由于这一丛刊的通俗性,文章发表以后,迅速得到广泛地传播,到1877年10月15日止,刊有本文的《人民历书》已销售2万册。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柏林的资产阶级民主周刊《天平》1877年8月31日第35号予以转载并加了按语;1879年1月26日、2月2日和9日,布达佩斯《工人纪事周报》第4—6号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此后许多介绍马克思生平事业的文章绝大多数都是依据了恩格斯这篇文章的事实材料,就连马克思逝世以后,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发表的文章也是着重以本文为依据;一些比较有影响的回忆录,比如保·拉法格的《回忆卡尔·马克思》以及弗·列斯纳的《一个工人对卡尔·马克思的回忆》,其中的事实材料以及某些观点,也充分吸收了本文的内容和思想。因此,恩格斯这篇文章的意义是广泛而深远的,正像他1892年指出的那样:“过去出版的马克思传记大多数都是错误满篇。惟一可靠的传记是发表于白拉克在不伦瑞克出版的1878年《人民历书》中的那篇传记(作者恩格斯)。”(恩格斯《马克思,亨利希·卡尔》)——128。

- 98 1840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逝世,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继位后,拒绝实践先王早在1813年和1815年就许诺的颁布宪法,实行新闻出版自由,成立陪审法庭,从而激起了资产阶级同王国政府政治上的强烈对立。恩格斯曾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指出,德国资产阶级公开宣告反对政府,可以说是从1840年开始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6—17页)。——128。
- 99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辩论于1841年5月23日—7月25日在杜塞尔多夫举行。马克思原打算针对这次议会辩论分四个专题写四篇评论文章,即关于新闻出版自由问题;关于普鲁士国家和天主教之间的宗教纠纷问题;关于林木盗窃法问题以及关于莱茵省限制地产析分的法律草案问题。从现有的材料来看,马克思共写出三篇文章,其中第一篇和第三篇连续刊登在《莱茵报》上,第二篇文章因书报检查未能发表,第四篇文章马克思是否写了,具体情况不明。
- 马克思的文章在《莱茵报》上发表以后,在各界人士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128。
- 100 指法国政府在普鲁士政府的压力下于1845年1月11日下达的将马克思和《前进报》某些撰稿人驱逐出法国的命令。——129。
- 101 恩格斯在这里提到亚·冯·洪堡扮演中间人的角色,是因为此人当时负有普鲁士秘密外交使命,曾于1845年1月4日—3月19日在巴黎逗留,并于1月7日接受法王路易·菲力浦的召见。当时报界盛传他的巴黎之行与马克思等人被驱逐有关,对此他曾公开予以反驳。但毫无疑问的是,文中未提到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阿·伯恩施太德参与了告密和驱逐马克思的卑劣行动。——129。
- 102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随着形势的发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终于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正确,并认识到必须使同盟摆脱旧的密谋传统和方式,遂于1847年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正义者同盟,协助同盟改组。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

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民主原则作为同盟组织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代替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巴黎以后,巴黎于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驻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1848年3月下半月—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当时,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和指导中心。

虽然革命的失败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它仍然于1849—1850年进行了改组并继续开展活动。1850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提出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反对它无视客观规律和德国及欧洲其他各国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年9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终于导致了同盟与该集团的分裂。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陷于停顿。1852年11月17日,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相当多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工作。——129、438。

103 钦博拉索山是南美科迪勒拉山脉的最高峰之一。“粗卤无礼的钦博拉索山”,意即粗卤无礼到了极点。——131。

104 这里指的是1848年2月7日和8日的两个审判案。

第一次是因为1848年7月5日《新莱茵报》第35号刊登《逮捕》一

文,被指控污辱和诽谤了国家权力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被推上陪审法庭。

第二次是1848年11月因报纸号召人民抗税,被指控煽动叛乱,马克思和沙佩尔等人被推上陪审法庭。——131。

- 105 指1849年5月3—9日在德累斯顿爆发的武装起义以及因后备军反对应征加入普鲁士军队在莱茵省爆发的起义。

萨克森国王拒绝承认帝国宪法并且任命极端反动分子钦斯基担任首相是德累斯顿起义的导火线,起义遭到政府军队和开抵萨克森的普鲁士军队的镇压,这次起义为1849年5—7月爆发的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揭开了序幕。

莱茵省的起义于1848年5月9日首先从埃尔伯费尔德开始,继而席卷杜塞尔多夫,伊瑟隆及索林根等地,街垒战一直持续到5月中旬。——131。

- 106 1849年5月初,在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巴登和普法尔茨掀起了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巴登和普法尔茨起义在这一运动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地当时已经成立了临时政府,并组织了自己的武装力量。1849年6月初,两个普鲁士军团约六万人与一个联邦军团开始对两地实行武力干涉,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对起义者不作任何援助,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于1849年7月被镇压下去。——131。

- 107 指第二帝国。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派发动政变,这次政变的结果是1852年12月2日在法国建立了第二帝国(1852—1870年)的波拿巴政体。——132。

- 108 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于1872年9月2—7日在荷兰的海牙举行。和历次代表大会相比,海牙代表大会按其组成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各国的15个全国性组织的65名代表。这次代表大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领导并亲自参加下,从理论上、组织上彻底揭露和清算了巴枯宁等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破坏国际工人运动的种种罪恶活动,并把巴枯宁等人开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后来建立各国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133。

- 109 19世纪的所谓欧洲强国有六个:俄国、英国、德国(1871年起为德意志帝

- 国)、奥地利、法国(1818年起)和意大利(1861年起)。——134。
- 110 指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于1873年席卷了奥地利、德国、北美、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俄国和其他国家,这次危机的特点是猛烈而深刻。——137、417。
- 111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是在该杂志于1877年10月登载了俄国民粹派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祖国纪事》第10期“时评”第320—356页)一文后不久写的,估计是1877年10—11月。米海洛夫斯基的这篇文章针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庸俗经济学家茹柯夫斯基对马克思的攻击,从民粹派的立场出发,为马克思进行辩护,但是对《资本论》却作了错误的解释。马克思的信“看来是准备在俄国发表的,但是没有把它寄到彼得堡去,因为他担心,光是他的名字就会使刊登他的这篇答辩文章的刊物的存在遭到危险”。(恩格斯1884年3月6日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从他的文件中发现了这封信抄写了三个副本。恩格斯将其中一份和1884年3月6日的信一并寄给了日内瓦的“劳动解放社”成员维·伊·查苏利奇。

马克思的这封信原文是法文,最初可能是由查苏利奇译成俄文的,曾于1885年以石印的形式在俄国出版,同年12月以胶版誊写版的形式再次出版,但这两次的出版物大部分都落入警察手中;后来,这封信又用俄文发表在1886年《民意导报》(日内瓦)第5期上;这封信还于1888年10月用俄文发表在俄国合法刊物《司法通报》杂志上,译者是尼·弗·丹尼尔逊。1886年还出版过两种波兰文本;刊登在《民意导报》上的这封信的德译文发表在1887年5月3日《纽约人民报》第5号上,同年6月3日又转载于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3号上。——140。

- 112 在马克思的手稿上,第2节第一段有两个文稿,这里译出的是第二稿,第一稿全文如下:

“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因此,这一章说明了使生产者同他的生产资料分离,从而把他变成雇佣工人(现代意义上的无产者)而把生产资料变成资本的运动。在这一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

但是,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

在那一章末尾,我论述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并断言,资本主义积累的最后结果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社会所有制。”——144。

113 指美国南部蓄奴州的自由的、但依附于奴隶主的无地居民。由于棉花生产为大农场主带来了巨大的利润,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种植业经济阻碍了小商品生产的发展,农民中的大部分人因此而遭到破产并沦为“白种贫民”,他们耕种贫瘠的土地,住在破旧的茅屋里,甚至连农奴都鄙视他们。大奴隶主统治着奴隶和好几百万“白种贫民”。——145。

114 这封信的收信人和写作的具体经过情况无从获知,但信显然是马克思写给伦敦的一家德文报纸的。——147。

115 1877年以来,《平民报》就作出种种努力,使读者了解其他欧洲国家革命的工人运动的发展状况并通过这种方式把意大利的工人运动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就是应《平民报》的请求于1878年1月12日撰写的,文章简要而恰如其分地介绍了德国、法国、美国和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

这篇文章作为通讯发表在1878年1月22日《平民报》第3号上,未署恩格斯的名。——148。

116 讲坛社会主义是19世纪70—90年代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流派。该流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德国的大学教授,他们在大学的讲坛(德文为Kathed-er)上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讲坛社会主义的代表(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威·桑巴特等)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组织,因而鼓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和平,主张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逐步实行“社会主义”。因此,讲坛社会主义的纲领仅局限于提出一些社会改良措施,如设立工人疾病和伤亡事故的保险等,其目的在于削弱阶级斗争,以便消除革命以及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使工人同反动的普鲁士国家和解。——148、611。

117 恩格斯在这里是指反对保皇势力,保卫法兰西共和国的斗争。19世纪70年代保卫共和国是法国政治生活的头等大事。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保皇派反动势力复辟君主制的企图更加迫切。1873年5月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之一麦克马洪出任总统后,立即着手准备发动保皇派政变,由于得

不到军队的支持而未敢贸然行动。1877年,麦克马洪强迫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茹尔·西蒙领导的政府辞职。同年5月16日他命布罗伊公爵组织保皇派内阁,363名共和派议员对新内阁投不信任票,并向全国发出了保卫共和国的呼吁,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6月25日麦克马洪解散众议院。10月14日共和派在新的选举中又获多数票,经过反复的斗争,麦克马洪于1879年1月辞职,温和的共和派代表茹尔·格雷维接任总统,保皇派复辟君主制的阴谋终未得逞,共和国得以巩固。——149、178。

- 118 1877年7月,美国铁路工人大罢工是美国工人阶级同企业主之间斗争中的重大事件之一。这次罢工是因三条通往美国西部的铁路干线(宾夕法尼亚铁路、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纽约中央铁路)上工人的工资被减少10%而引起的。这次罢工由于政府军队和资产阶级武装队伍的联合出动而被镇压下去。——149。

- 119 《论东方问题》一文是马克思应威·李卜克内西的请求于1878年2月4日和11日写的两封信的部分内容。为了给1878年2月19日帝国国会辩论东方问题时发表演说作准备,李卜克内西于1878年1月22日致信马克思,请求为他提供评论东方问题的素材。

本文是作为李卜克内西的小册子《论东方问题,或欧洲是否应该是哥萨克的?对德国人民的警告》1878年莱比锡第2版的附录发表的,未署马克思的名。本文发表时,李卜克内西加了一个按语,当时注明的日期是1878年2月27日。按语写道:“作为结尾我要引用一位朋友的两封来信,他研究东方问题胜于任何别人。见解之深刻,观点之锐利,知识之渊博——这一切表明他是一位大师。见利爪而识雄狮。”

马克思这两封信的原稿未保存下来。——152。

- 120 大科夫塔是在18世纪卡利奥斯特罗伯爵(朱泽培·巴尔萨莫)的头衔,此人是招摇撞骗的巫师的化身。“科夫塔”原本是对一位神秘莫测的埃及智者的称呼。卡利奥斯特罗伯爵于1782年创建了共济会埃及分会,他宣称,他在埃及旅行时,发现了埃及人智慧的秘密,他本人的行动体现了全能全知的大科夫塔精神。卡利奥斯特罗曾激起了歌德创作的灵感,写出了喜剧《大科夫塔》。——153。

- 121 在以迪斯累里为首相的英国保守党政府中,印度事务大臣索尔兹伯里,外

交大臣德比以及殖民大臣克纳文主张采取比较温和的对俄政策。

在 1876 年 12 月和 1877 年 1 月君士坦丁堡会议上,索尔兹伯里同与会的俄国代表伊格纳季耶夫一唱一和。迪斯累里并不赞同索尔兹伯里提出的一些措施,于是通过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埃利奥特对会谈施加影响。德比和克纳文曾反对英国政府于 1878 年 1 月 28 日向下院提交的给政府追加拨款的议案。当时出于这一原因克纳文于 1 月 27 日退出了内阁,而德比则于同年 3 月底辞去内阁职务,由索尔兹伯里接任。——153。

- 122 三帝同盟是 1873 年由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三国的皇帝建立的,它试图恢复俄、奥、普三国于 1815 年建立的反动的神圣同盟(见注 52)。三帝同盟纠集了欧洲的反动势力,旨在巩固和加强统治阶级在同革命运动作斗争中的阵地。——153。
- 123 色当会战是 1870 年 9 月 1—2 日在色当(法国东北部城市)附近进行的普法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会战。这次会战中,法军全部被击溃,按照法军司令部 1870 年 9 月 2 日签字的投降书,以拿破仑第三为首的 10 万余名官兵全部成为俘虏。法军在色当会战中的惨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灭亡,促使法兰西共和国于 1870 年 9 月 4 日宣告成立。——153、165。
- 124 在 1814 年 9 月—1815 年 6 月召开的维也纳会议上,同俄、英、奥等国甚至同法国相比,普鲁士扮演的是一个次要的角色,它的盟国都不把它放在眼里。在俄、英、奥三国的领土或多或少都有所扩张的情况下,普鲁士的领土要求只得到部分的满足。——154。
- 125 罗马尼亚于 1877 年 5 月向土耳其宣战,但是,自 7 月底以后,在俄国政府的催促下,才积极参战。在罗马尼亚军队的支援下,俄军粉碎了奥斯曼帕沙 1877 年 8 月 31 日从普列夫纳突围的企图。在 9 月 7—14 日,土军最后一次突围未获成功,当时参战的 83 000 名士兵中有 32 000 名罗马尼亚人。——154。
- 126 由于爆发经济危机,许多矿井倒闭,大批工人失业,南威尔士矿工处于特别贫困的境地。——155。
- 127 1878 年 2 月 7 日和 8 日英国下院就干预俄土战争时给政府追加拨款问题进行了辩论。以福斯特和布莱特为首的自由党领袖们,原先激烈地反对拨款,甚至根本反对任何针对俄国的行动,这时却改变了自己的策略,不

参加最后的表决,致使保守党政府获得了可观的多数。——155。

128 指 1828—1829 年俄土战争的两个战役,1828 年夏(4—9 月)进行了第一个战役,1829 年夏(5—8 月)进行了第二个战役。——156。

129 出自石勒苏益格的牧师亨·哈里斯于 1790 年为丹麦国王生日而作的一首歌词的第一句——“戴着胜利者的花冠,你值得赞扬”,他当时是按《主佑吾王》的曲谱填的歌词。

1793 年,由于普鲁士军队在同法国革命军的战斗中旗开得胜,巴·格·舒马赫于是用普鲁士的语言将歌词移植过来。

1813 年 10 月 24 日莱比锡会战后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前往柏林,当他出现在剧院的时候,全场曾起立高唱这首歌以示对他的欢迎。

1840 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逝世以后,这首歌被定为普鲁士的国歌。——156。

130 伦敦公约是英国、俄国和法国于 1827 年 7 月 6 日在伦敦缔结的。公约确认希腊有自治权,三国强调在外交上承认希腊并规定了它们在希土冲突时的调解地位。公约强制性地要求土耳其政府承认希腊的自治权,但土耳其政府并不执行。——158。

131 指 1828—1829 年俄土战争中,俄国获胜后于 1829 年 9 月签订的阿德里安堡和约。和约规定:多瑙河口和附近岛屿以及黑海东岸自库班河口以南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划归俄国;土耳其必须承认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自治,给予它们独立选举国君的权利,这种自治由俄国负责保证;此外,土耳其政府还必须承认希腊为独立的国家,并颁布敕令使塞尔维亚的自治合法化。——159。

132 《1877 年的欧洲工人》一文是恩格斯为美国的一家周报《劳动旗帜》撰写的一组文章。

《劳动旗帜》是美国的工人报纸,它的出版者约·帕·麦克唐奈自 70 年代初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他曾多次写信约请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其报纸撰稿。恩格斯撰写的这篇文章当时分成五个部分于 1878 年 3 月 31 日在《劳动旗帜》上连载。

恩格斯在这组文章里向美国工人介绍了国际工人协会解散以后欧洲工人运动的总趋势和主要任务,介绍了法国的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对正在

走向成熟的俄国革命及其对欧洲社会进步将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富有远见的预测。恩格斯还分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壮大及其在国会选举中取得的胜利对欧洲大陆的工人运动所起的极大的示范和推动作用,他指出:在德国榜样的鼓舞下,许多国家的工人克服了无政府主义和宗派主义,建立了全国性的无产阶级政党。

本文曾于1931年用德文发表在《社会》杂志第8年卷第2册上,用俄文发表在《阶级斗争》杂志第6—7期上。——161。

133 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该同盟成立于1869年,其前身是巴枯宁于1868年在瑞士伯尔尼建立的国际性无政府主义组织。同盟的盟员宣布以无神论、阶级平等和取消国家为自己的纲领,否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同盟的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纲领得到了意大利、瑞士和其他一些国家工业不发达地区的支持,并在这些地区建立了支部。1869年同盟向总委员会申请加入国际。总委员会同意在解散同盟这个独立组织的条件下接受同盟的那些支部。实际上,同盟盟员参加国际之后,仍然在国际内部保持着自己的秘密组织,并在巴枯宁的指挥下进行反对总委员会的活动。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同盟反对国际的斗争更加激烈。马克思恩格斯和国际总委员会对同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揭露了这个力图分裂工人运动的宗派集团的真面目。1872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将同盟领导人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国际的决定。参看注85。——163、322、335。

134 在1877年1月10日的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得票总数是493 288张,占选举总票数9%以上。在基本选举中有9名社会民主党人当选议员,取得的议席本来是10个,因为其中威·哈森克莱维尔一人同时取得了阿尔托纳和柏林两个选区的两个席位。在复选中,哈森克莱维尔放弃了前者保留了柏林选区的席位。此外,社会民主党候选人还在二十个选区中参加了因候选人中无人得票超过半数而进行重新投票的补选,当选的有3人。在这次国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取得的议席总计为12个。

1874年1月10日的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得票总数是351 952张,占选举总票数6%,取得9个议席。

1877年之后的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不是于1880年举行的。反社会

- 党人非常法于1878年5月24日在国会里被否决之后,俾斯麦政府于6月11日宣布解散国会。1878年7月30日举行了新的国会选举。在这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得票总数是437 158张,取得9个议席。——164。
- 135 1870年12月,一个由30名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在凡尔赛经过两天的等待,于18日向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呈递了要求他接受德国皇位的劝进书。俾斯麦正是利用了资产阶级表现出的这种卑躬屈膝的态度,实行了加强其专制统治的帝国宪法,国会的立法权受到了极大的限制。——166。
- 136 1874年,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计划于8月7日夜至8日凌晨在博洛尼亚发动起义。由于事先缺乏充分的准备,不具备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群众基础,起义的领袖人物之一安·科斯塔在8月3日就被警方逮捕,起义当夜集合起来的起义者尚未来得及行动,警察便将他们驱散,其中有许多人被捕,巴枯宁于8月12日逃往瑞士。——168。
- 137 1877年4月5日,26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在那不勒斯附近占领了两个小镇——列亭诺和加洛。他们废除了村镇的现行法规,认为这就是他们进行的所谓“社会革命”。这次行动很快就被军队和警察镇压下去。——168。
- 138 世界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是由比利时社会主义者发起,于1877年9月9—15日在比利时的根特举行的。召开这次大会的目的在于把国际范围内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联合起来。出席大会的有比利时、丹麦、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士、西班牙等国的代表共45名,其中有四分之一是巴枯宁派的代表。代表大会在所讨论的基本问题上,通过了反对处于少数地位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决议。决议强调,工人阶级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政治手段来争取社会的解放。大会否决了一项同无政府主义者订立“团结公约”的提议,但作出了以下决定:“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应互相尊重,在原则斗争中要排除个人的敌对情绪。”——169。
- 139 1868—1874年西班牙第五次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国王于1873年2月退位,议会宣布西班牙共和国成立。1873年7月西班牙小资产阶级激进的联邦共和派,即所谓的“不妥协派”发动了武装起义,反对由共和派左翼领导的政府,主张把全国划分为许多小的自治州,因而这次起义也被称为自

- 治州起义。起义主要发生在西班牙境内靠近地中海的地区。起义者夺取了瓦伦西亚、塞维利亚、科尔多瓦以及其他许多城市,并在这些城市成立了独立的州政府。西班牙的国际工会会员也卷进了这次起义。在国际西班牙各支部占绝对优势的巴枯宁派参加了几乎所有在起义中成立的州政府。——171。
- 140 据传说,伦敦土利街的三个裁缝有一次曾向英国下院递交了一份申诉书,申诉书开始即称:“我们,英国的人民……”,此话流传下来成为笑谈。——171。
- 141 这里指帕·伊格列西亚斯,何·梅萨、弗·莫拉、维·帕赫斯、莫·卡列哈和伊·保利。他们是1871年瓦伦西亚会议上选出的国际的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委员,1872年3月因反对巴枯宁创建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西班牙的活动而被无政府主义多数派开除出马德里联合会。他们于1872年7月8日成立了新马德里联合会,在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拒绝接纳它之后,他们便向总委员会提出申请,总委员会于1872年8月15日承认它是国际的一个联合会。《解放报》成了新马德里联合会的机关报,恩格斯曾为其撰稿。新马德里联合会同无政府主义影响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为争取在西班牙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伊格列西亚斯和梅萨是1879年成立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组织者。——171。
- 142 指1877年2月1—4日在里斯本举行的葡萄牙第一次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1875年组建的葡萄牙社会主义政党最终形成并通过了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哥达纲领相似的党纲、党章,选举了党的中央委员会,社会主义周刊《抗议报》为其机关报。马克思和恩格斯应该报编辑格内科的请求为大会发了贺信。与葡萄牙社会主义者保持通讯联系的恩格斯曾高度评价了他们在同巴枯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斗争中所坚持的政治立场。——172。
- 143 以朱·马志尼为首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在意大利宣扬通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调和来解决意大利的社会问题,其目的在于阻挠意大利的国际各联合会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巴黎公社失败以后,马志尼派在意大利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中的影响走向衰落。——172。

- 144 格留特利联盟是瑞士的一个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组织,1838年5月6日成立于日内瓦。该组织的宗旨是宣传和教育手工业者和工人,之所以采用“格留特利”作为名称,是为了表现其瑞士的民族性。

“格留特利”是瑞士中部乌里湖边的一片草地。据传说,1307年湖周围三个州的代表曾在草地集会并缔结了联盟,宣誓共同反对奥地利的统治。——173。

- 145 正统派是法国代表大土地贵族和高级僧侣利益的波旁王朝(1589—1792年和1814—1830年)长系的拥护者。1830年波旁王朝第二次被推翻后,正统派结成为政党。在反对以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为支柱的当政的奥尔良王朝时,一部分正统派常常抓住社会问题进行蛊惑宣传,标榜自己维护劳动者的利益,使他们不受资产者的剥削。1877年,正统派把波旁王朝复辟的希望寄托在自称亨利五世的尚博尔伯爵身上。

奥尔良派是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保皇党,是1830年七月革命到1848年二月革命这段时期执政的波旁王朝幼系、奥尔良公爵的拥护者。奥尔良公爵统治时期在历史上称为奥尔良王朝。1877年,奥尔良派把奥尔良王朝复辟的希望寄托于路易·菲利浦之孙巴黎伯爵路易·菲利浦·阿尔伯身上。

波拿巴派指拿破仑第三路易·波拿巴的拥护者。1877年,波拿巴派把帝国复辟的希望寄托于拿破仑第三之子欧仁·路易·约瑟夫·波拿巴身上。——178。

- 146 恩格斯在这里讲的实际上是1877年10月14日的选举。在这次选举中共和派获321个席位,保皇派仅获208个席位。保皇派所获席位中波拿巴派占108个。至于下文谈及的省、市选举和补选则是在11月举行的。——178。

- 147 1872年法国军队推行了改革措施,实行了普遍义务兵役制,废除了可以雇人代服兵役的做法。——179。

- 148 指俄国利用巴尔干半岛各斯拉夫民族为摆脱土耳其统治而斗争的形势,于1877年4月24日对土耳其发动的战争。战争以土耳其的失败而告结束。俄土两国于1878年3月签订了圣斯蒂凡诺和约。和约的签订打破了土耳其在巴尔干的统治加强了俄国在这一地区的势力。——182。

- 149 60年代初,沙皇在波兰王国的残暴统治稍有缓和。许多参加过民族解放斗争的波兰人从西伯利亚流放地放回,流亡国外的波兰人得到赦免。此时,沙皇政府还逐步实行了一些改革措施以笼络波兰贵族。——182。
- 150 1863年1月22日在沙皇俄国统治下的波兰王国境内爆发了民族解放起义。领导起义的是由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小贵族分子组成的中央民族委员会,后来改称临时民族政府。起义的参加者有手工业者、工人、青年学生、农民等。临时民族政府颁布了宣言,为建立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提供了法律基础。宣言声明,全体公民一律平等,并宣告波兰独立,要求把农民耕种的土地转归农民所有,取消农民的一切封建徭役。在起义的过程中,代表右派力量的小贵族分子在临时民族政府中占优势,他们惧怕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在同沙皇的斗争中表现出动摇性和不彻底性,并寄希望于欧洲各国政府的干涉,同时他们还阻挠农民获得土地,争取解放,因而起义后来失去了农民群众的支持。尽管起义者作战英勇,各国进步力量也对起义在物质上和道义上给予了大力支援,但是,由于领导核心不健全,1864年4月在沙皇军队的残酷镇压下,起义终于失败。——183、632。
- 151 指1878年6月13日—7月13日在柏林召开的国际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俄国、德国、奥匈帝国、法国、意大利、土耳其、波斯和巴尔干各国的代表。俄国政府被迫把圣斯蒂凡诺和约提交会议复审。会议签订了柏林条约。根据柏林条约,圣斯蒂凡诺和约的条款被大幅度修改,欧洲各强国都直接或间接地从中获得了利益,而俄国原来通过圣斯蒂凡诺和约在巴尔干半岛获得的利益和地盘被缩减了。——184。
- 152 1878年5月11日和6月2日,在柏林先后发生了两起谋刺德国皇帝威廉一世的事件。这两起事件成了俾斯麦加紧迫害社会民主党人并重新要求帝国国会通过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口实,形势的发展对德国的革命工人运动非常不利。6月12日伦敦《泰晤士报》刊登了路透社的一则消息:洛塔尔·布赫尔被任命为柏林欧洲国际会议秘书兼档案官。布赫尔曾是德国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自由资产阶级中间派左翼。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于1850年流亡伦敦,于1861年普鲁士政府宣布大赦后回国,结识了斐·拉萨尔,深得拉萨尔的信任 and 赏识,1864—1886年被俾斯麦安插在外交部任参事,成为俾斯麦的一名亲信。在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迫害中,他是俾斯麦的得力帮凶。

马克思利用报纸发布这则消息的机会立即致信《每日新闻》，对布赫尔这个工人运动的阴险敌人及其主子俾斯麦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这封信刊登在1878年6月13日《每日新闻》第10030号上。

马克思的这封信发表以后，许多德文和法文报刊，如《柏林自由新闻报》、《福斯报》（柏林）、《先驱者》（巴黎）、《前进报》（莱比锡）、《马赛曲报》（巴黎）、《工人纪事周报》（布达佩斯）以及《平等报》（巴黎）纷纷予以转载，引起了舆论界极大的反应。——185。

153 这封信写于1865年10月8日，主要内容参看本卷第187—188页。——185。

154 白铁匠麦·赫德尔于1878年5月11日以及爱·诺比林博士于同年6月2日先后在柏林谋刺德国皇帝威廉一世。赫德尔是一个堕落的流氓无产者，曾在莱比锡参加过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但已被莱比锡社会民主主义协会开除；诺比林从未加入过德国社会民主党，两人都与无政府主义组织有联系。俾斯麦政府利用这两起谋刺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大肆攻击和陷害，并借此于1878年10月在德意志帝国国会通过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186、324、329、525。

155 1878年5月31日，德国大选帝侯号装甲舰在英国东南部的多佛尔海峡与德国威廉国王号轮船相撞而沉没。事故发生的地点在英国港口城市福克斯通附近。——186。

156 马克思的《答布赫尔的“声明”》一文写于1878年6月27日，发表在6月29日《法兰克福报和商报》第180号上。

马克思于1878年6月12日给伦敦《每日新闻》的信（见本卷第185—186页）发表以后，受到舆论界广泛的注意，布赫尔因此不得不表明自己的态度，他于6月21日在《北德总汇报》第145号和《法兰克福报和商报》第172号晚刊上同时发表了自己的“声明”，声称对“马克思博士的信作两点更正和一点补充”。鉴于布赫尔的“声明”歪曲了事实，马克思写了这篇短文予以揭露。——186。

157 这是恩格斯为他的历史研究专著《论德意志人的古代历史》拟定的最初计划，最早是用铅笔写的。从这个计划可以看出，恩格斯原打算只写一篇关于德意志古代史的文章，但在实际写作的过程中计划有所调整。如原计

划中,第二章《马尔克制度和军事制度》,恩格斯在第一章结尾写有一行铅笔字注明“下一章讲土地制度和军事制度”,但手稿中并没有这一章。恩格斯把有关材料用到《法兰克时代》一文的第二章《区制度和军事制度》中去了。而列入这一计划注释中的3)“法兰克方言”的第三章,恩格斯也放在《法兰克时代》中。——190。

- 158 恩格斯的《论德意志人的古代历史》手稿是研究社会发展历史早期阶段的著作,与他完成的另一部著作《法兰克时代》一样是按照统一计划完成的。从恩格斯拟定的提纲,即最初的计划,可以看出本文原打算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共四章,第二部分是第一部分的注释,是从史科学,民族学及语言学方面对第一部分作进一步的补充(见本卷第190页)。

本篇著作写作的确切时间因为没有直接的证据,所以无法确定,但可以推断是在1878年中—1882年之间完成的。在写作过程中原来拟定的计划有所改变(见注157)。恩格斯生前这一著作没有发表过。——191。

- 159 雅利安人是欧洲19世纪文献中对印欧语系各民族的总称。——195、549。

- 160 海·沙弗豪森于1875年8月11日在慕尼黑举行的德国人类学、民族学和原始史第六届大会作了关于这一研究成果的报告。有关资料作为附录收入《德国人类学、民族学和原始史学会报道》1875年慕尼黑版第67和81页。——195。

- 161 恩格斯在论述时引用的有关资料均出自约·列列韦尔的著作《马赛的皮肤提亚斯和他那个时代的地理学》1836年布鲁塞尔版第59—60页。——197。

- 162 约克将军曾于1812年在俄国指挥拿破仑军队的普鲁士辅助军,1812年12月30日他擅自同俄国指挥部订立了陶罗根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普鲁士军队在对俄军的军事行动中须保持中立。

1813年10月16—19日,当俄、奥、普、瑞典联军同拿破仑的军队在莱比锡作战的时候,在拿破仑军队中作战的萨克森军,突然在战斗方酣时转到敌人方面,并掉转枪口攻打法国人。——221。

- 163 1846年在奥地利西南部哈尔施塔特城附近发现了古墓群,古墓里出土的文物证明了大约公元前700—450年的文化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因而

有哈尔施塔特文化之称。——226

- 164 《民族法》即蛮族法典(拉丁文为:Leges barbarorum),是对5—9世纪形成的,一些日耳曼部落法规的最初的文字记录的统称,其中主要记录了这些部落的习惯法,但也采用了符合当时需要的新的法律规范。这些部落于5—7世纪在随着民族大迁徙而分崩离析的西罗马帝国及其邻近的领土上逐渐定居并开始建立国家。蛮族是古希腊人和罗马人对古代其他各民族的蔑称。——237、245、570。
- 165 指拿破仑第一的军队,由将近60万人组成。1812年这支军队在拿破仑第一的率领下入侵俄国。——243。
- 166 《法兰克时代》是恩格斯在1878—1882年写的手稿,恩格斯生前没有发表过。同《论德意志人的古代历史》的手稿一样,本文也是研究德意志人历史的专门著作的一部分(见注158)。——255。
- 167 民族大迁徙指3—7世纪日耳曼、斯拉夫及其他部落向罗马帝国的大规模迁徙。4世纪上半叶,日耳曼部落中的西哥特人因遭到匈奴人的进攻侵入罗马帝国。经过长期的战争,西哥特人于5世纪在西罗马帝国境内定居下来,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日耳曼人的其他部落也相继在欧洲和北非建立了独立的国家。民族大迁徙对摧毁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度和推动西欧封建制度的产生起了重要的作用。——258、575。
- 168 这句话出自爱因哈德的《查理大帝生平》第2章,转引自保·罗特《从上古到10世纪的采邑制度史》1850年埃朗根版第352页。是恩格斯本人将其译成德文的。——261。
- 169 敕令是中世纪早期(8—9世纪)法兰克国王的立法诏书和命令。亚琛敕令为当时教会封建主和世俗封建主大规模夺取农民土地的事实提供了明证,是关于法兰克王国历史的最重要的资料之一。——262。
- 170 这里所列举的数字出自19世纪编制的圣热尔门-德-普雷修道院地产登记册(地产、人口、收入登记册)。这个登记册第一次由法国历史学家本·盖拉尔出版,并增加了注释,书名为《修道院院长伊尔米农的地产登记册》1844年巴黎版第1—2卷。恩格斯转引自保·罗特《从上古到10世纪的采邑制度史》1850年埃朗根版第254—258页。——264。

- 171 契约程式是把各种各样有关财产和其他性质的契约和协定在法律上固定下来的具体文书的标准样式。从流传到现在的几本契约程式集中,人们能够了解到6世纪末—9世纪末法兰克王国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关系。——273。
- 172 《贝坦年鉴》是关于加洛林帝国历史的重要文字资料之一。年鉴因法国北部圣贝坦修道院而得名。它收入了830—882年这段时期的有关资料,分为三部分,均由不同的作者撰写。年鉴被列入著名的《德意志历史文献》丛书出版。——275。
- 173 斯特林加暴动是841—842年在萨克森发生的封建依附农和自由农民反对法兰克贵族和萨克森贵族的暴动,暴动者自称“斯特林加”(意为“本地属民”)。暴动的目的在于恢复法兰克贵族统治之前的权力和习俗,这次暴动被残酷地镇压下去。——281。
- 174 《法兰克方言》在《法兰克时代》的手稿和《关于〈论德意志人的古代历史〉的提纲》中,恩格斯把这部研究著作称为“注释”,是于1878—1882年写成的。但是,《法兰克方言》具有完全独立的科学价值,是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语言学研究的范例。
《法兰克方言》没有写完,在恩格斯生前也未发表过。——283。
- 175 古福音诗是古代萨克森语言文学的文献(属9世纪);是把福音书大大压缩了和日耳曼化了的转叙本;据推测古福音诗的作者是鲁尔河岸韦尔登修道院的一个修士。
古福音诗的手抄本保存下来的有两个,一个是慕尼黑手稿,属9世纪,一个是柯顿手稿(因古代文物搜集者英国人柯顿而得名),属10—11世纪。手稿的名称是德国语言学家施梅累尔于1830年加的,直译为“救世主”。古福音诗首次于1866年由莫里茨·海奈出版。——283。
- 176 在盎格鲁—弗里西安方言和萨克森方言中,第三人称复数直陈式由于第三人称词尾中齿音前的“n”脱落,而和第二人称相同。这种相同大概就是上述两种方言中所有三种人称现在时直陈式复数之间的差别消失的起点。——285。
- 177 指对尼德兰语文学家尤斯图斯·利普西乌斯从赞美诗逸稿(9世纪)中抄下的不清楚的词的注解。利普西乌斯注解由莫里茨·海奈发表在1867

年帕德博恩出版的《古代低地德意志文献简编》中。——286。

- 178 指10—11世纪的帕德博恩文献,是德国历史学家保·维干德在1831—1832年出版的地方文献,载于他所出版的《威斯特伐利亚历史和考古学档案》第5卷和《威斯特伐利亚的帕德博恩和克尔佛两个公爵领地地方》第2、3卷。——288。
- 179 阿尔萨斯魏森堡修道院的修士奥特弗里德在868年前后对福音书的转述。奥特弗里德的《福音书》是古代德意志文字的最初文献之一,这部《福音书》的语言被认为是莱茵—法兰克方言的南部土语之一。——289。
- 180 指布鲁塞尔的古老喷泉中的小孩雕像,是17世纪初佛拉芒的雕塑家杜肯努阿的作品。——294。
- 181 指起初由丹·哥·雷曼后来由其他一些人出版的地图,名为《雷曼所编德意志、瑞士、东法兰西、比利时、尼德兰和波兰的地形专用图》格洛高版。地图分为若干正方形(地段),以主要居民点为名,因此,恩格斯在以下的引证中,提到了地段的名称和号码。——302。
- 182 《乔治·豪威耳先生的国际工人协会史》一文是马克思针对乔·豪威耳在1878年7月号的伦敦《19世纪》月刊上发表的《国际工人协会史》一文而写的。

豪威耳是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原国际总委员会委员。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对国际作了歪曲的介绍和分析,其中涉及马克思本人的地方也与事实不符。针对这一情况,马克思认为,他有必要立即予以反驳,澄清有关事实以正视听。

马克思的这篇文章写于1878年7月初,本打算在《19世纪》上发表,但遭到出版人的拒绝,后来发表在8月4日《世俗纪事》杂志第5期上。——319。

- 183 乔·豪威耳在他的文章中把伦敦代表会议说成是“代表大会”。

国际原拟于1865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鉴于各地方组织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还不够巩固,马克思因此建议延期召开代表大会,先在伦敦召开一次预备性的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于1865年9月25—29日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总委员会委员和一些支部的领导人。会议听取了总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批准了它的财务报告,通过了准备要召开的代表

大会的议程。代表大会后来于 1866 年 9 月 3—8 日在日内瓦举行,是国际工人协会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伦敦代表会议是以秘密会议的形式召开的,会址在朗爱克街共济酒店。阿德菲坊只举行过晚间公开集会,因此,马克思在下文中指出会议的工作并不像豪威耳文章里所说的那样在“阿德菲坊半公开大会”上进行的。——320。

184 1864 年 11 月 22 日,总委员会决定致函阿·林肯,祝贺他再度当选为美国总统。贺信由马克思起草,于 1864 年 11 月 29 日经总委员会一致通过后,由美国驻伦敦大使弗·亚当斯转交林肯。1865 年 1 月 28 日,总委员会收到以林肯的名义寄来的回信,这封信于 1 月 31 日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并于 1865 年 2 月 6 日刊登在伦敦《泰晤士报》上。马克思于 1865 年 5 月 9—25 日之间写给威·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指出,在林肯对所有贺信的回信中,只有给国际工人协会的回信“不是单纯从形式上证明他已收到了贺信”。——322。

185 芬尼社社员是 19 世纪 50 年代末爱尔兰民族主义革命组织芬尼兄弟会的参加者。这一组织首先出现在美国爱尔兰流亡者中间,随后发展到爱尔兰本土。其宗旨是为了争取爱尔兰的独立并建立爱尔兰共和国。1867 年芬尼社社员密谋发动武装起义,这里所说的“闹事”就是指这次起义。——322。

186 乡绅议会是对 1871 年 2 月 12 日波尔多召开的法国国民议会的蔑称。该议会的绝大部分议员都是保皇党人,即在农村选区当选的地主、官吏,食利者和商人。

1871 年 6 月 16 日,国民议会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巴黎公社事件。该委员会提出的总报告于 1871 年 12 月 22 日向国民议会宣读,后来与 1872 年的一些单项报告汇集在一起以《议会对 1871 年 3 月 18 日暴乱的调查报告》为题在巴黎发表。——323。

187 在波拿巴政府、国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中历任要职的茹·法夫尔曾因伪造文据图谋侵吞遗产而涉诉。由于波拿巴法庭的袒护,法夫尔得以安然无事。马克思曾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对此事作了详细的叙述。——323。

- 188 原始基督教公社是最早的基督教组织,出现在公元1世纪左右,其成分为小手工业者,奴隶及被释放的奴隶等。他们尊重贫民,重视劳动,规定所有的公社成员都必须工作。他们认为,富人如果不将自己的财产拿出来分掉就不能进入天国。他们仇视罗马帝国的统治,原始基督教公社在与强大的罗马帝国的对抗中最终失败。

在马克思看来,作为早期基督教史的著作家勒南把国际支部同摧毁罗马帝国的原始基督教公社相提并论,是在嘲笑国际工人协会的弱小无力,难有作为。——324。

- 189 指欧洲反动势力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对第一国际采取的攻击和镇压的手段。在许多国家,国际的活动被明令禁止。德奥两国皇帝于1871年8月在加施坦和伊施尔,于1871年9月在萨尔茨堡会晤时,曾专门商讨过共同对付国际的问题。这两次会晤是由俾斯麦同奥匈帝国首相博伊斯特事先通信约定的。——325。

- 190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法国政府对社会主义者进行疯狂的迫害,法国工人运动一时几乎销声匿迹。7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小组重新建立,工人运动开始复苏。1876年10月在巴黎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1878年在巴黎又举行了工人代表大会。1877年5月起,社会主义周报《平等报》在巴黎出版,茹·盖得和保·拉法格曾通过该报宣传社会主义思想。——326。

- 191 1871—1872年上西里西亚的波兰工人展开了大规模的罢工运动。1872年第一个带有民族主义和宗教色彩的工人联合会成立了。1876年在俄属波兰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小组。1877—1878年在德属波兰出现了第一个德意志工人和波兰工人的社会主义组织。

1874年波希米亚出现了工人运动的高潮;1878年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工党成立。

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民粹派运动在70年代达到了高潮。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也开展起来,首先是彼得堡的纺织业和金属加工业举行了大罢工,各大城市成立了工人小组。1875年在敖德萨成立了第一个革命工人组织南俄工人协会。1878年在彼得堡成立了北方工人协会。——326。

- 192 莉迪亚·白恩士于1878年9月12日凌晨1点半逝世。莉·白恩士是玛丽·白恩士的妹妹,玛·白恩士去世以后,1863年莉·白恩士成了恩格斯

的生活伴侣。莉·白恩士在去世前一天晚上与恩格斯结成了合法夫妻。

这一份讣告是恩格斯在莉·白恩士逝世当天写成的,1878年9月18日刊登在《前进报》上。讣告的手稿未保留下来。——327。

- 193 《帝国国会关于反社会党人法的辩论(文章草稿)》是马克思于1878年9月23日收到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威·白拉克寄给他的1878年9月16日和17日帝国国会会议速记记录之后,于9月24日动笔撰写的。

马克思在1878年9月1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指出“颁布非常法是为了把社会主义运动的表面合法性也剥夺掉。”他们两人一直关注着德意志帝国国会就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展开的辩论。1878年9月17日英国报刊报道了国会会议的消息,他们便积极地跟踪了解辩论的情况,因此,也不能排除,马克思在写这份草稿的时候,利用了英国报刊当时提供的材料。

马克思原打算把这些材料整理成文,在英国报刊,尤其是《每日新闻》上发表,但这一计划并未实现。马克思的这份草稿实际上也没有写完,其中摘录的材料仅仅涉及9月16日的会议。——328。

- 194 马克思下面摘抄的内容与《德意志帝国国会速记记录。1878年第4届第1次例会》1878年柏林版第1卷相应的文字有一些出入。——328。

- 195 指副首相施托尔贝格-韦尔尼格罗德伯爵受王储弗里德里希三世的委托,于1878年9月9日所作的为1878年7月30日新选出的帝国国会开幕而发表的陛下的演说。当时因德皇威廉一世遭诺比林行刺受伤,由弗里德里希三世临时摄政。——329。

- 196 反社会党人法,即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19日通过,并于10月21日生效的一项法律,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被取缔,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查禁,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日益壮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329、342、352、415、525。

- 197 在1878年9月13日帝国国会会议上就大选帝侯号装甲舰沉没事件(见注155)进行了辩论,海军大臣冯·施托什答应敦促发表帝国国会所要求的有关装甲舰沉没情况的材料。——330。
- 198 教皇至上派是天主教的一个极端反动的派别,它反对各民族教会的独立性,维护罗马教皇干涉一切国家内政的权力。19世纪下半叶教皇至上主义影响的加强,表现在欧洲若干国家建立了天主教党,表现在梵蒂冈宗教会议于1870年通过了教皇“永无谬误”的信条等等。在德国1870—1871年之后,那些拥护梵蒂冈的政治主张,由于新教普鲁士领导下实现了帝国统一而感到各方面的利益,尤其是经济上的特殊利益受到威胁的势力统统被称为“教皇至上派”。中央党是“教皇至上派”政治上的中坚力量,它站在反对俾斯麦政府的立场上,具有广泛而成分复杂的群众基础。俾斯麦曾试图采取“文化斗争”(见注29)的手段来对付这个反对派。这里所说的企图把暗杀威廉一世的罪责加于教皇至上派,是因为这一时期俾斯麦政府与天主教教会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332。
- 199 1878年2月5日维·查苏利奇行刺彼得堡行政长官特烈波夫,同年8月16日,谢·米·斯捷普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杀死了宪兵司令美津策夫。1878年4月12日维·查苏利奇被彼得堡陪审法庭宣判无罪释放。俾斯麦在9月17日的讲话中,在指责社会民主党“用虚无主义者的匕首和诺比林的猎枪”威胁政府的同时也谈到了俄国革命者的这些行动。——335。
- 200 无政府主义的法拉联合会代表大会于1878年8月3—5日在瑞士的弗赖堡举行。——335。
- 201 民族联盟是德国北部和中部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原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个组织,主张把德国统一成为以君主制普鲁士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奥地利除外),从而实现“德国的普鲁士化”。该联盟于1859年9月15—16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意志各邦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代表会议上成立。联盟的基本核心是1849年6月从法兰克福议会退出的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和左翼自由派——哥达派。1866年普奥战争和北德意志联邦成立后,该联盟于1867年11月宣布解散。

俾斯麦在普鲁士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第94次会议上曾经说过:“德意志所瞩目的不是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是它的威力;……时代提出的重大问

题,不能靠演说和多数派的决议来解决,而要靠铁与血。”(1862年10月2日《柏林总汇报》第458号)由此可以看出他是怎样看待普鲁士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作用的。——338。

202 指《共产党宣言》里的如下一段话:“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339。

203 在1878年9月16日的德意志帝国国会会议上,倍倍尔谈到俾斯麦同拉萨尔有过密切联系。对此,欧伦堡说,政府有责任从工人运动的“领袖们”那里了解这一运动的目的和动机,并尽可能把运动“引导到合法发展的和平轨道上”。欧伦堡还对过去在拉萨尔及其追随者“领导”下的运动表示赞赏,为拉萨尔派“被所谓的国际派压倒和清除”感到惋惜。——340。

204 《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俄国的现状》是恩格斯为意大利《平民报》撰写的最后一篇通讯。本文对德国和俄国的反动势力扼杀革命运动的种种企图作了分析,指出了反动派的这些手段都是徒劳无益的,因此恩格斯的这篇文章有利于增强意大利工人的斗志。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写于1879年3月21日,发表在1879年3月30日《平民报》第12号上,署名弗·恩格斯。文章开头加了一则编者按,以便引导读者注意本文所具有的特殊意义。——342。

205 指俄国的民粹派运动,在19世纪60—70年代对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运动的参加者主要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运动的宗旨是发动农民群众反对沙皇的专制统治。民粹派认为农民是革命的主力,俄国的农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并幻想通过建立在共同占有土地的基础上,从农村公社过渡到社会主义。

1876年,俄国民粹派革命分子在彼得堡成立了秘密组织“土地和自由社”;1879年8月“土地和自由社”中多数激进分子分裂出去,在彼得堡成立了秘密的恐怖组织“民意党”,指望通过少数人采取恐怖手段刺杀沙皇政府的重要人物或沙皇本人使革命获得成功。——343。

206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这封通告信虽然是寄给奥·倍倍尔的,但是却具有党内文件的性质。信的内容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声明都证明了这一点。马克思在1879年9月19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中,把这个文

件叫作通告信,指定“在德国党的领袖中间内部传阅”。这封通告信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极其重要的文件之一。

这封通告信是恩格斯在9月11日之后起草的,是对奥·倍倍尔8月20日信的回复。9月17—18日马克思一回到伦敦,他们两人就立即共同讨论起草通告信,并将最后方案确定下来。

这封通告信第一次发表在1931年6月15日《共产国际》杂志第12年卷第23期上。——344。

207 指3月18日在柏林发生的街垒战,是德国1848—18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当王宫前广场上的示威群众被驱散时,军队突然开枪。普鲁士军事当局的这种挑衅行为遂成了全城进行武装街垒斗争的导火线,这场斗争以王室军队的失败而结束。在同军队进行的战斗中,柏林居民有400多人被打死,1000多人被打伤。起义者接管了王宫的警备事宜以后,于3月19日晨强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走上阳台向在街垒战中的牺牲者脱帽致礼。——358。

208 指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196。——359。

209 1879年10月《弗雷泽杂志》(伦敦)第10号刊登了卡尔·布林德《拿破仑亲王与欧洲民主》一文。从表面上看,文章是在评述日罗姆·波拿巴(拿破仑亲王,系拿破仑第三的堂弟)在欧洲政治中的作用,要求法兰西共和国防范波拿巴家族有可能施展的阴谋诡计,但是实际上,布林德却在文章里以大量的篇幅进行自我吹嘘。布林德在马克思反对波拿巴暗探卡·福格特的论战中扮演了为后者帮凶的可耻角色,并于60年代在德国和美国的报刊上自我吹嘘,散布诬蔑工人运动活动家的言论(参看1864年11月28日马克思《致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编辑》)。普法战争期间,他在英国和德国的报刊上宣传民族主义的、泛日耳曼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在1870年8月1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强调指出了布林德言论的危害性,并建议恩格斯利用和《派尔-麦尔新闻》的关系,对这些言论进行批判。马克思也采取了措施,在《人民国家报》上向德国工人揭露布林德。

本文最初是由恩格斯撰写的草稿,写作时间是1879年10月5日和8—9日之间,马克思曾做过修改和补充。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英国朋友马·巴里同英国报界有广泛的联系,当时巴里正好向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就布林德的文章写一篇评论,但评论后

来并未见诸英国报端,其原因尚不清楚。

本文第一次是以俄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上,但写作的日期注明的是1870年8月22—3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和中文第1版发表时,写作时间也与俄文版一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5卷以英文原文收入,并对写作时间作了更正。——364。

- 210 卡·布林德除了在德国、奥地利、法国和美国的报刊上发表文章外,在流亡伦敦期间还在许多英国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总是理所当然地首先吹嘘自己的政治作用和功绩。马克思曾在1871年4月6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指出:“这个骑士每星期把自己炮制的关于卡尔·布林德的活动的报道分送给所有的伦敦报纸,有两三家报纸竟愚蠢到刊登卡尔·布林德关于卡尔·布林德和为了卡尔·布林德而写的一些报道。”——364。
- 211 1849年5月,德国南部和西部为维护帝国宪法举行起义的时候在巴登成立了以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布伦坦诺为首的临时政府。临时政府看到普鲁士准备派兵前往巴登和普法尔茨进行武装干涉,决定向法国求援,布林德因而被派往巴黎。可是在1848年六月起义失败之后,法国的反革命势力更加猖獗,而巴登政府所属望的法国以赖德律-洛兰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被这些联合起来反对他们的资产阶级“秩序党”和波拿巴派的势力所压倒。因此,本来就没有基础的布林德的使命必然失败。——364。
- 212 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被镇压后,法国在1849年派赴教皇领地恢复教皇世俗权力的军队继续占领罗马。路易-拿破仑拒绝从意大利的首都撤军,激起了要求国家统一的意大利各阶层人民对法国政府的敌对情绪,这一点特别表现在1870年普法战争之初法国陷于外交孤立的时期,当时意大利政府由于法军继续占领罗马而拒绝了法国关于结成反普同盟的建议。意大利政府利用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的形势,于1870年9月20日派兵收复了罗马。——365。
- 213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由恩格斯于1877—1878年写成的著作《反杜林论》中的三章编成的。

1880年恩格斯应保·拉法格的请求把《反杜林论》中的三章(《引论》的

第1章、第3编的第1章和第2章)改写成为一篇独立的通俗的著作。这一著作由保·拉法格译为法文经恩格斯本人校阅后,起初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题发表在法国社会主义杂志《社会主义评论》1880年第3—5期上,同年又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根据法文本于1882年在日内瓦出版了波兰文本;于1883年在贝内文托出版了意大利文本。1883年,这一著作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了德文本,书名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扉页上标的是1882年);紧接着于同年也在该地出版了德文第2版和第3版。这部著作的俄文译本最初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标题于1882年12月发表在秘密杂志《大学生》第1期上;1884年“劳动解放社”又在日内瓦出版了单行本,标题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丹麦文译本于1885年在哥本哈根出版。在恩格斯生前,这一著作就从德文译成了欧洲各种文字,在工人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对宣传马克思主义起了巨大的作用。恩格斯生前这一著作的最后一个德文本(第4版)是1891年在柏林出版的,中文译本依据的即是这一版本。这一著作在材料安排上与《反杜林论》的有关章节有所不同,并且对《反杜林论》的本文作了一些补充和改动。——367。

- 214 社会契约论是卢梭关于人从自然状态过渡到市民状态的相互关系的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人们最初生活在自然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下,人人都是平等的。私有财产的形成和不平等的占有关系的发展决定了人们从自然状态向市民状态的过渡,并导致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国家的形成。政治上的不平等的进一步发展破坏了这种社会契约,导致某种新的自然状态的形成。能够消除这一自然状态的,据说是以某种新的社会契约为基础的理性国家。

卢梭在1755年阿姆斯特丹版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以及1762年阿姆斯特丹版的《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这两部著作中详细阐述了这一理论。——372。

- 215 恩格斯在这里是指真正平等派,又称掘地派。他们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极左派,代表城乡贫民阶层的利益,要求消灭土地私有制,宣传原始的平均共产主义思想,并企图通过集体开垦公有土地来实现这种思想。——373。
- 216 这里首先是指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托·莫尔的著作《乌托邦》(1516

年出版)和托·康帕内拉的《太阳城》(1623年出版)。——373。

- 217 恐怖时代指雅各宾派的革命民主专政时期(1793年6月—1794年7月),当时雅各宾派为了对付吉伦特派和保皇派的反革命恐怖实行了革命的恐怖。

督政府(由5个督政官组成,每年改选一人)是法国执行权的领导机关。它根据雅各宾派革命专政于1794年失败后通过的1795年宪法建立,存在到1799年波拿巴政变。它支持反对民主力量的恐怖制度,并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374。

- 218 指《昂·圣西门给一个美国人的信》第八封信中的一段话。这些信被收入昂·圣西门论文集《实业,或为贡献出有用和独立的劳动的一切人的利益所作的政治、道德和哲学的议论》1817年巴黎版第2卷。——378。

- 219 参看圣西门和他的学生奥·梯叶里合著的两本书《论欧洲社会的改组,或论欧洲各民族在保持各自的民族独立性的条件下联合为一个政治统一体的必要性和手段》1814年10月巴黎版和《关于应当用来对付1815年同盟的措施的意见》1815年巴黎版。

1814年3月31日第六次反法同盟参加国(俄国、奥地利、英国、普鲁士等国)的同盟国军队进入巴黎。拿破仑帝国垮台,拿破仑本人宣布退位后被流放到厄尔巴岛。

百日指拿破仑恢复帝制的短暂时期,自1815年3月20日他率军从流放地重返巴黎时起,到同年6月22日在滑铁卢失败后第二次退位时止。——379。

- 220 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的军队在滑铁卢(比利时)被威灵顿指挥的英荷联军和布吕歇尔指挥的普鲁士军队击败。这次战役在1815年的战局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预先决定了第七次反法同盟(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瑞典、西班牙等国)的彻底胜利和拿破仑帝国的崩溃。——379。

- 221 这一思想在傅立叶《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中已作过阐述,该书包含这样一个总的论点:“某一时代的社会进步和变迁是同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相适应的,而社会秩序的衰落是同妇女自由减少的程度相适应的。”傅立叶的下述公式中概括了这个论点:“妇女权利的扩大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则。”(见《傅立叶全集》1841年巴黎版第1卷第195—196页)——380。

- 222 1815年1月,罗·欧文在英国格拉斯哥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一系列改善童工和成年工人状况的措施,遭到工厂主们的反对。根据1815年6月欧文的倡议提出的法案直到1819年7月才被议会通过形成法律,而且还大大地打了折扣。调整棉纺厂劳动的法律禁止9岁以下的儿童做工,限定18岁以下的工人的工作日为12小时,规定所有工人有两次工间休息作为早饭和午饭的时间,共一个半小时。——384。
- 223 1833年10月,由罗·欧文主持在伦敦举行了合作社和职工会的代表大会,会上正式成立了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全国产业部门大联盟;联盟的章程于1834年2月被通过。按照欧文的想法,这个联盟应当把生产管理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且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对社会的彻底改造。但是这个空想的计划遭到了失败。由于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的强烈反对,该联盟于1834年8月宣告解散。——384。
- 224 指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是由英国各城市的工人合作社创办的。第一个这样的交换市场由罗·欧文于1882年9月在伦敦创办,一直存在到1834年。在这些交换市场上,劳动产品用以一小时劳动时间为单位的劳动券来进行交换。这些企图在商品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建立不用货币的交换,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做法,很快就失败了。——384。
- 225 指约·蒲鲁东于1849年1月31日尝试成立的人民银行。银行在开始正常业务活动之前就于4月初宣告关闭。——384。
- 226 德·狄德罗的对话《拉摩的侄子》写成于1762年前后,后又经作者修改了两次。最初由歌德翻译的德译本于1805年在莱比锡出版。第一个法文版发表在1821年巴黎版《狄德罗轶文集》上,该文集实际上1823年才出版。——386。
- 227 亚历山大里亚时期是指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7世纪的时期。这个时期因埃及的一个港口城市亚历山大里亚(位于地中海沿岸)成了当时国际经济关系最大中心之一而得名。在这一时期,许多科学,如数学和力学(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地理学、天文学、解剖学、生理学等等,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387。
- 228 根据康德的星云假说,太阳系是从原始星云(拉丁文:nebula——雾)发展而来的。康德在1755年柯尼斯堡和莱比锡出版的著作《自然通史和天体

论,或根据牛顿原理试论宇宙的结构和机械起源)中阐述了这一假说。这本书是匿名出版的。

拉普拉斯关于太阳系的构成的假说最初于法兰西共和国四年(1796年)在巴黎出版的《宇宙体系解说》第1—2卷最后一章中得到了阐述。由他生前编好,死后即1835年出版的此书的最后一版(第6版)中,这个假说是在第七个注中阐述的。

宇宙空间存在着类似康德—拉普拉斯星云假说所设想的原始星云的炽热的云雾体,是由英国天文学家威·哈金斯于1864年用光谱学方法证实的,他在天文学中广泛地运用了古·基尔霍夫和罗·本生在1859年发明的光谱分析法。恩格斯在这里参考了安·赛奇《太阳》1872年不伦瑞克版第787、789—790页。——390。

- 229 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种种条件。按照列宁所下的定义,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2页)。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其衰落的原因在于英国工商业垄断的加强以及英国资产阶级用超额利润收买英国工人阶级上层(“工人贵族”),造成了英国工人阶级中机会主义倾向的增长,其表现就是工联领袖放弃对宪章运动的支持。——392、488、522、617。
- 230 指欧洲各大国之间为争夺同印度和美洲通商的霸权以及殖民地市场而在17世纪和18世纪进行的一系列战争。最初主要的竞争国家是英国和荷兰(1652—1654、1664—1667和1672—1674年的英荷战争是典型的商业战争),后来决定性的战争是在英国和法国之间展开的。所有这些战争的胜利者都是英国,到18世纪末,它手中已经集中了几乎全部的世界贸易。——401。
- 231 海外贸易公司是1772年在普鲁士成立的贸易信用公司。该公司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额贷款,实际上起了政府的银行老板和财政部门经纪人的作用。1904年正式成为普鲁士国家银行。——407。
- 232 “自由的人民国家”是7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纲领性要求和流行口号。对这个口号所作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见本卷第27—33页以及

1875年3月18—28日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并见列宁的著作《国家与革命》第1章第4节和第4章第3节(《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14—20、61—63页)。——410。

- 233 这里关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全部财富的材料引自罗·吉芬的报告《近来联合王国的资本积累》。这个报告是1878年1月15日在统计学会上宣读的,发表在1878年《统计学会杂志》(伦敦)3月号。——412。

- 234 恩格斯的《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一文写于1880年2月底,于1880年3月2日和3月24日分两部分发表在茹·盖得创办的法国社会主义周报《平等报》第7号和第10号上。

撰写本文的原因,恩格斯没有直接谈到过,但是他在写作本文时,也正在撰写《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因此,可以说,恩格斯的这篇文章是与形形色色的非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论战的一个补充;对于当时正筹备建立工人政党的法国工人运动以及促使某些领导人克服机会主义思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恩格斯在撰写本文时利用了鲁·迈耶尔《德国政界的滥设企业者和营私舞弊》1877年莱比锡版一书所提供的事实。

1882年秋,恩格斯打算在现有的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写一系列论述现在在德国流行的假社会主义的文章(其中每篇文章将自成一个非常完整的整体);以后这些文章可以出单行本。第一部分:俾斯麦的社会主义——(1)保护关税,(2)铁路国有化,(3)烟草垄断,(4)工人保险。……”(1882年9月13日恩格斯给爱·伯恩施坦的信),但是,这一计划未能实现。——415。

- 235 指俾斯麦1878年9月17日和10月9日在帝国国会辩论时的发言,载于《德意志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1878年第四届第一次例会》1878年柏林版第1卷第70、125页。——415。

- 236 在1873年世界经济危机和1876年世界农业危机的背景下,德国的大工业资产阶级和容克们纷纷要求实行保护关税政策。1879年7月帝国国会通过了俾斯麦提出的新关税法。新关税法规定对输入的铁、机械、纺织品、谷物、木材、牲畜、咖啡、茶叶和酒类等商品征收高额的进口税。——416、505。

- 237 指正义者同盟以及在这一同盟基础上成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参看注102。——417。
- 238 动产信用公司(Crédit Mobilier, 全称 Société générale de Crédit Mobilier)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由贝列拉兄弟于1852年创办并为同年11月18日法令所批准。动产信用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充当信贷的中介和参加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创立。该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用它所开办的股份公司在交易所进行的有价证券投机买卖。动产信用公司同拿破仑第三的政府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并在它的保护下进行投机活动。1867年,该公司破产,1871年清算完毕。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仿效法国的动产信用公司建立了类似的机构。马克思曾于1856—1858年间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不少文章来分析动产信用公司的活动,评价股份联合公司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417、421、674。
- 239 指弗·勒洛在他的《费城来信》(1877年不伦瑞克版)一书中的见解。——418。
- 240 《关于〈哲学的贫困〉》一文是马克思应法文报纸《平等报》编辑部的请求而写的,写作时间是1880年3月底—4月初。

为了帮助正在筹备成立的法国工人政党,“把法国工人从空话的云雾中拉回到现实的土地上来”(1880年11月5日马克思给弗·阿·左尔格的信),掌握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马克思不可避免地要与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理论,要与无政府主义者,改良主义者,以及以蒲鲁东的理论为基础的激进分子展开论战,为此重新发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文是极为适时的。这篇文章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撰写的,它作为《平等报》发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文的引言首次刊登在1880年4月7日《平等报》第2套丛刊第12号上,但有几处和本文的手稿有出入。手稿首次刊登在1858年《年鉴》(米兰)杂志第一年卷第204—205页。

这篇引言发表以后,显然被人们遗忘了,甚至连恩格斯本人也是如此。后来几次出版《哲学的贫困》,两个德文版,俄文版,法文版,都没有提到过这篇引言,恩格斯总是建议“马克思在柏林《社会民主党人报》(1865年)上发表的一篇《论蒲鲁东》的文章,可以用来作为序言”。(1884年3月6日恩格斯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旧《社会民主党人报》上那篇《论蒲鲁东》的文章……也许可以把它整个加到序言里去。”(1884年2月5日恩格

斯给爱·伯恩施坦的信)——425。

- 241 唯心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在英国大·李嘉图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经济理论,在法国,继圣西门和傅立叶之后蒲鲁东是这一理论最激进的体现者。——426。
- 242 指《论蒲鲁东》一文,这篇文章是马克思因蒲鲁东逝世应《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施韦泽的请求于1865年1月24日写成的,刊登在1865年2月1、3、5日该报第16—18号上。——426。
- 243 《工人调查表》是马克思应法国《社会主义评论》杂志的主编贝·马隆的请求,于1880年4月上半月编写的,4月20日在该杂志上发表,未署名。此外,这份调查表还印成25 000份传单在全法国散发。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法国工人运动大大衰落,70年代又慢慢得以恢复。当时的法国70%的人口仍然从事农业生产。工厂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和机器的普遍使用却越来越恶化。90年代以前,没有社会立法,没有疾病和养老保险,工会处于不合法的地位,工人每天工作10—12小时,而所得的工资甚至不够维持温饱。1879年底和1880年初,巴黎、里尔、兰斯等城市都曾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斗争。

《社会主义评论》杂志编辑部为发表《调查表》写了下述前言。

“任何一个政府(君主政府或资产阶级共和政府)都还不肯对法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作认真的调查。可是,关于农业危机、金融危机、工业危机、商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调查却有多少啊!

英国政府的官方调查对资本主义剥削的丑恶行径的揭露,以及由这些揭露引起的某些法律的制定(如法律许可的工作日限制为10小时,关于女工和童工的法律等等),使法国资产阶级更加害怕由于进行公正和系统的调查而带来的危险。

我们希望也许我们能促使法国共和政府仿效英国君主政府的榜样,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所作所为及其罪行进行广泛的调查;因此我们利用自己的一点有限的款项,试图为这件事作出一个开端。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得到所有城乡工人的支持。他们懂得:只有他们才能非常熟悉地描述他们所忍受的苦难;只有他们,而不是上帝派来的拯救者,才能坚决地采取有效措施来对付他们遭受的社会灾难。我们也期望得到各种派别的社会主义者的帮助,既然他们想进行社会改革,那就应该愿意准确而清楚地

了解工人阶级这个未来正是属于它的阶级进行工作和活动的条件。

这种收集劳工资料的工作是社会民主派为了准备社会革新所应该做的第一件事。

下面列举的一百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回答问题时必须写明所答问题的顺序号码。不一定要回答全部问题,但我们建议尽可能回答得具体和详细些。回答问题的男女工人的名字,如果没有得到特别许可将不予公布,但是名字和地址仍须写明,以便在必要时进行联系。

请将答复寄交巴黎近郊圣克鲁,罗伊亚尔街28号《社会主义评论》杂志负责人累克吕兹先生。

收回的答复将进行分类整理,以便为专题著作提供材料。这些专题著作将由《社会主义评论》发表,以后还将汇集成册出版。”

马克思早在1866年为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写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就提出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对各国工人阶级状况进行统计调查,同时还拟定了一个工人阶级状况统计调查大纲。大纲经代表大会一致通过。此后,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都强调了进行这种统计调查的必要性。但是,由于经费不足等原因实行起来十分困难。

《工人调查表》实际上是把统计调查大纲的内容作了进一步的扩充。《调查表》的手稿是用英文写成的,共开列了99个问题,分成四组,每组问题分别单独编号。《社会主义评论》上发表的法文译文则不分组,总计101个问题统一编号,其中第88个问题“请说明劳资调解委员会是怎样工作的”和第101个问题“总的看法”在马克思的手稿里是没有的。此外,在个别问题的内容后面,法文译文作了一些补充。

《工人调查表》曾被其他社会主义报刊转载,其中有:1880年《先驱者》(日内瓦)第22—24、26—27期;1880年《平等》第10—11期副刊;1880年《斗争》(米兰)第1和第2期;1880年10月30日《人人权利报》(海牙和阿姆斯特丹)。

1880年9月16日,维也纳成衣工工会联合会在会上散发的关于成衣工人现状的调查表与马克思编写的《工人调查表》,其内容和基本精神都是一致的。——427。

- 244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前言》写于1880年5月4—5日左右,在这篇前言上署名的是恩格斯这一著作的法文本译者保·拉法格。

手稿中有马克思给拉法格的附言,其中说,前言是在他和恩格斯商量以后撰写的,请拉法格“在词句上加以修饰,但是不要修改内容”。——437。

- 245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 1847 年秋成立于布鲁塞尔,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所领导的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对该协会的成立起了积极的作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把无产阶级革命者(其中主要是德国的革命流亡者)和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进步分子团结在自己的队伍中。1847 年 11 月 15 日,马克思当选为该协会的副主席,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吕·若特兰被推选为主席。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了国际民主主义运动的中心之一。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时期,民主协会的无产阶级革命势力曾设法武装比利时工人开展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但在 1848 年 3 月初,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以及比利时当局镇压了协会中最革命的分子以后,比利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就没有能力领导劳动群众反对君主政体的运动了,民主协会的活动成了纯地方性的活动,到了 1849 年协会的活动实际上已告停止。——438。
- 246 这一时期的事件详见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10 卷第 3—109 页)。——438。
- 247 1879 年在马赛举行的工人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成立法国工人党的决议以后,以茹·盖得为首的一批法国社会主义者决定通过保·拉法格请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帮助制订工人党的竞选纲领草案。1880 年 5 月盖得抵达伦敦,5 月 10 日左右在恩格斯的寓所内与马克思、恩格斯和拉法格一起共同制订了法国工人党纲领。纲领分为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或称最低纲领),纲领的理论部分导言是马克思对盖得口授的。至于纲领的其余部分,恩格斯在 1881 年 10 月 25 日给伯恩施坦的信中曾谈到:“接下去就讨论纲领的其他内容,在这里我们提出了某些增减”,“盖得硬要把那一套最低纲领的谬论放到纲领里去,……我们只得随他的便,虽然他也承认这一点在理论上是荒谬无稽的。”纲领连同导言首次发表在由约·菲·贝克尔主编,在日内瓦发行的 1880 年 6 月 19 日《先驱者》第 25 期上,后来又发表在 1880 年 6 月 30 日《平等报》第 24 号,7 月 10 日《无产者报》第 93 号以及 7 月 20 日《社会主义评论》第 10 号上。——442。
- 248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封也有保·拉法格和弗·列斯纳签名的贺信,是 1880 年 11 月 29 日在日内瓦召开的 1830 年波兰起义纪念会上宣读的。

纪念会是由波兰流亡者创办的月刊《平等》杂志编辑部发起的。参加纪念会的约有500名社会主义者,是各民族革命运动的代表,其中有波兰人、俄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瑞士人。

为使更多的人参加这次纪念会,《平等》杂志编辑部事先散发了传单,并在报刊上发了启事,向有关人士专门寄送请柬。恩格斯于1880年11月收到了用法文书写的请柬,上面有斯·门德尔松的签名。马克思、保·拉法格、弗·列斯纳很可能也受到了邀请,因此才会以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前委员的身份在这份贺信上一起签名。贺信落款的日期是1880年11月27日,可以证实,贺信完稿的日期是同一天,很可能也是在同一天寄出的。当时居住在伦敦的保·拉法格和弗·列斯纳也一起签了名,从内容和格式上看,这封贺信无疑是出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笔。这一点可以从1882年2月7日恩格斯给考茨基的信中得到证实。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的情况来看,这封贺信很可能是由恩格斯起草的。

贺信是用法文写的,原件没有保存下来。贺信第一次以原件的文字发表在1880年12月4日《先驱者》第49期上。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贺信中从分析蓬勃发展的国际工人运动入手,得出了有关波兰无产阶级应采取的策略的崭新观点,指出了正在兴起的波兰工人运动以及波兰工人运动与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是波兰人获得解放的必不可少的前提。这封贺信实际上间接地介入了波兰流亡者中各派组织就斗争方式和目的,尤其是与民族和社会解放的关系而展开的辩论。贺信要求并支持波兰的工人运动和俄国的革命运动实行必要的联合。1880年波兰的革命组织无产者与俄国民意党的一部分人正式完成了联合,为争取恢复波兰的独立开创了新局面。

贺信被译成波兰文收入了《纪念十一月起义50周年国际大会的报告集》1881年日内瓦版;贺信后来被译成德文发表在1880年12月19日《工人纪事周报》(布达佩斯)第51号上。——444。

- 249 克拉科夫是由1815年维也纳会议决定宣布成为“自由城市”的,但实际上一直被奥地利军队占领。1846年2月20日,在克拉科夫首先爆发反对奥地利占领的起义。起义的主要参加者有工人、小手工业者及克拉科夫附近乡村的农民。起义的发起人是以埃·邓波夫斯基为首的波兰革命民主主义者,他们在纲领中不仅提出争取把波兰从外来势力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要求,同时还准备满足农民反封建的种种要求。

1846年2月22日,奥地利军队撤离了克拉科夫城,同一天克拉科夫的起义者宣布波兰独立并成立了波兰共和国民族政府。3月初,奥地利军队重新占领克拉科夫,起义被镇压下去,当年11月,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签订了把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帝国的条约。——445。

- 250 指1847年11月29日—12月8日在伦敦召开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大会的工作。——445。
- 251 指1848年2月2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纪念克拉科夫起义二周年的集会,参加集会的波兰公民大约有1000人。——445。
- 252 大约有400名波兰流亡者参加了巴黎公社的战斗。波兰革命者瓦·符卢勃列夫斯基和雅·东布罗夫斯基曾是巴黎公社的军事领袖。——445。
- 253 《不许通奸》一文是恩格斯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撰写的。为了揭露统治阶级的思想家和政客们利用宗教作为剥削和统治的思想基础,《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爱·伯恩施坦打算发表总标题为《十诫》的一组文章。1881年1月30日和2月13日该报发表了这组文章的头两篇。恩格斯在2月2日给伯恩施坦的信中认为这组文章中的第一篇《不许偷盗》写得很好。伯恩施坦在2月6日的回信中报告说,这组文章将继续连载,同时写道,他不愿触及第六诫(《不许通奸》),因为“在他看来,关于‘不道德的’生活的一切辱骂总是俗不可耐的”。他在这封信中还请求恩格斯寄一些可供报纸在威廉一世诞辰(3月22日)临近之际抨击霍亨索伦王朝使用的材料。3月12日,恩格斯把自己的文章连同给编辑部的补充说明(也一并收入本篇)寄给了伯恩施坦,他在附信中写道:“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所以您应当考虑好,谈这一问题是否弊多利少。无论如何,我愿意告诉您一种谈论这个戒律而又不陷于庸人劝善的办法;……”(见恩格斯1881年3月12日给爱·伯恩施坦的信)。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估计写于1881年2月8日—3月12日之间,具体时间目前尚不得而知。这篇文章未曾在报纸上刊登出来,而且这组以《十诫》为总标题的文章,除了头两篇以外,以后均未见诸报端。——447。

- 254 七年战争是1756—1763年欧洲两个国家联盟的战争:一方是英国和普鲁士,另一方是法国、俄国、奥地利、萨克森和瑞典的同盟。这场战争反映了欧洲各封建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英法之间主要是为了争夺对北美和亚

洲殖民地的统治权；普奥之间主要是为了占领西里西亚。1763年，战争以缔结巴黎和约和胡贝尔茨堡和约而告结束。——450。

- 255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 1881 年 2 月 16 日来信的复信注明的日期为 1881 年 3 月 8 日。查苏利奇代表后来加入“劳动解放社”的同志们，请求马克思谈谈他对俄国历史发展的前景，特别是他对俄国农村公社命运的看法。

查苏利奇在信中谈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俄国极受欢迎以及这部著作在革命者关于土地问题及农村公社问题的争论中所起的作用。她说：“你比谁都清楚，这个问题在俄国是多么为人注意……特别是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党所注意……最近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见解，认为农村公社是一种古老的形式，历史、科学社会主义，——总之，一切不容争辩的东西，——使它注定要灭亡。鼓吹这一点的人都自称是你的真正的学生，‘马克思主义者’。”查苏利奇还表示：“假如你能说明，你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以及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给予我们的帮助会是多么大。”查苏利奇在信中表示，期待马克思写出一篇较长的文章，或者一本小册子，实在不可能则写一封信，对他们提出的问题给予回答。从马克思当时与其他人的通信来看，可以肯定马克思一接到查苏利奇的信就着手准备回答她所提出的问题，况且马克思早在 1880 年 12 月就曾许诺俄国民意党执行委员会代表、该党机关报《民意报》编辑尼·亚·莫罗佐夫对有争议的俄国农村公社前景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而这一许诺一直未能兑现。

马克思在准备给查苏利奇回信的过程中曾拟了四个草稿，把这四个草稿综合起来，就是一个内容极其丰富的关于俄国的农村公社、农业生产的集体形式的综合性概述。——453。

- 256 公元前 321 年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时期，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今蒙泰萨尔基奥）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包围并击败了罗马军队。按照意大利双方交战的惯例，罗马军队必须在由长矛交叉构成的“轭形门”下通过。这被认为是对战败军的最大羞辱。“通过卡夫丁峡谷”一语由此而来，意即遭受奇耻大辱。——461。

- 257 1785 年 4 月 21 日颁发的给俄罗斯帝国各城市的权利和利益的文件中反映了叶卡捷琳娜二世建立行会组织的意图，文件中包括详细确定行会组

织的手工业特别条例。规定各城市手工业者必须在行会中登记注册,禁止从事非行会手工业生产。——470。

258 指俄国民意党执行委员会。民意党是1879年8月成立的俄国最大的民粹派组织。——481。

259 1881年3月21日,在伦敦的俄国人、波兰人、捷克人、塞尔维亚人举行了巴黎公社十周年纪念大会。大会的组织者是俄国的民粹派列·尼·加特曼和格·亚·洛帕廷,加特曼任大会主席。

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到了邀请,但未能出席大会。本文是马克思恩格斯写给纪念大会主席的贺信。——484。

260 指1881年3月13日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彼得堡被民意党人刺杀一事。——484。

261 1878年11月28日俾斯麦政府援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196)在柏林实行了“小戒严”。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家被驱逐出首都,党的刊物被查禁,德国工人运动遭到残酷镇压。——484。

262 1881年3月13日,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彼得堡被民意党人刺杀。3月19日伦敦的德文版《自由周报》第12号刊登了该报编辑约·莫斯特的文章《终有此日!》和一篇以《英国》为标题报道当时伦敦发生的一起图谋炸毁市长官邸事件的文章。英国政府以上述文章的发表为由,于3月30日逮捕了莫斯特并查封了他的印刷所。

1881年3月31日,伦敦的《每日新闻》第10906号发表文章,转述了莫斯特关于沙皇遇刺文章的内容,同时文章的作者把市长官邸事件同沙皇遇刺事件联系起来,这实际上为俾斯麦政府迫害流亡伦敦的革命者和社会主义者提供了借口。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反对莫斯特及其周报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但仍然认为有必要为莫斯特进行辩护,因此,于1881年3月31日给《每日新闻》编辑部写了这一封信。

保存下来的这封信出自恩格斯的手笔,此信写于1881年3月31日,发表在1881年4月1日《每日新闻》第10907号上。——486。

263 1881年5—8月,恩格斯应英国工联的机关报《劳动旗帜报》创办人兼编辑乔·希普顿之邀成为该报的撰稿人,他先后为该报撰写的11篇文章,均作为社论在该报发表,发表时未署名。本文即是这些文章中的第一篇。

恩格斯之所以同意为该报撰稿是因为他看到了英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人表现出了一定的政治积极性,他希望自己的文章有助于引导英国工人运动冲出仅仅为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的狭窄经济斗争的范围,而进行独立的政治斗争并建立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由于英国工联的影响,报纸推行的机会主义方针使恩格斯不得不于1881年8月停止了撰稿。恩格斯曾在1881年8月11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比较详细地谈到了他停止撰稿的直接原因。

本文写作的时间是1881年5月1或2日,作为社论刊登在1881年5月7日《劳动旗帜报》第1号上。——488。

- 264 1799年7月,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禁止工人非法结社的法令。法令禁止工人成立任何组织,举行集会或进行以联合为目的的任何活动。1824年6月议会宣布将该法令废除。1825年,议会通过了一项新的结社法,允许建立工会组织,但对其活动严加限制。——488。
- 265 衡平法是英国法律传统中与普通法相对而言的一种法律。英文原文是“equity”,本文为“公平”。过去在英国,涉诉臣民如得不到普通法院的公平审理,最后可向国王提出申诉,由王室顾问,大法官根据“公平原则”加以处理。15世纪前后逐渐形成所谓衡平法,并建立了衡平法院,亦称大法官法庭。1873—1875年,英国实行了司法制度的改革,大法官法庭与高等法院合并,依据衡平法审理案件。案件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是继承权,契约义务,股份公司等方面带有专门性的问题。——488。
- 266 习艺所是依据1834年英国通过的新的济贫法(见注287)而设置的“救济”贫民的机构。法案规定,对有劳动能力的人及其家属所提供的惟一救济,就是让他们在习艺所里从事强制性的劳动。习艺所里生产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大,那里实行的制度与强迫囚徒从事苦役的牢狱制度不相上下,因此,有“穷人的巴士底狱”之称。——490、496、531。
- 267 《雇佣劳动制度》是恩格斯应《劳动旗帜报》创办人兼编辑乔·希普顿之邀为该报撰写的11篇文章中的一篇(参看注263)。恩格斯写作本文的时间为1881年5月15或16日,作为社论发表在1881年5月21日《劳动旗帜报》第3号上。——492。
- 268 大法官法庭即衡平法院,参看注265。——492。

- 269 《工联》是恩格斯应《劳动旗帜报》创办人兼编辑乔·希普顿之邀为该报撰写的 11 篇文章中的一篇(参看注 263)。恩格斯写作本文的时间为 1881 年 5 月 20 日左右。文章分成两部分作为社论分别发表在 1881 年 5 月 28 日和 6 月 4 日《劳动旗帜报》第 4 号和第 5 号上。——495。
- 270 欧洲各国在击败拿破仑帝国后,1814 年 9 月—1815 年 6 月断断续续地举行了维也纳国际会议,1815 年 6 月 9 日签订了最后决议,从而结束了 1792 年以来各国屡次结盟对法国作战的局面。维也纳会议的召开使欧洲的和平得以恢复,但同时也加强了各国君主的反动统治。——497。
- 271 19 世纪 20 年代初,英国克服了反拿破仑战争以后的经济困难,进入了工业繁荣的时期,国内紧张的政治局势有所缓和。1824 年议会废除了 1799 年的禁止结社法,尽管后来又通过了新的法令对工会加以种种限制,但工人毕竟在一定程度上争得了结社和维护自己利益的权利。参看注 264。——497。
- 272 格莱斯顿政府慑于爱尔兰农民开展的革命运动,于 1881 年颁布了新的有关爱尔兰土地的法案。按照这项法案,只要佃农按时缴纳地租,地主不得任意赶走佃农,地租金额 15 年不变。这项法案实际上是为了维护大地主的利益,缓和其与爱尔兰农民的矛盾,所规定的地租租额仍然很高,而且还允许大地主们以对自己有利的条件将土地卖给国家。尽管如此,在爱尔兰拥有土地的大地主们仍然不满,竭力阻挠这项法案的实施。——497、522。
- 273 在英国,有关工人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等问题的法律或法令,通称为工厂法。最早的工厂法是英国议会于 1802 年 6 月 2 日通过的对某些工种的学徒工加以保护的律;1819 年通过的法律完全禁止在棉纺织行业使用童工,把 16 岁以下的青少年工人的工作时间限定为 12 小时。由于缺少监督,这些法律实际上很少起作用。1833 年通过的法律把 18 岁以下的青少年工人的工作时间减少到 10 小时,并设置工厂视察员负责监督法律的实施;18 世纪末即已开始的争取法定 10 小时工作日的斗争到 19 世纪 30 年代以后有了更大的发展。1847 年 1 月 8 日,议会通过了对女工和青少年工人实行 10 小时工作日的法律。——498。
- 274 人民宪章是英国宪章运动中的纲领性文件,1837 年由下院 6 名议员和 6

名伦敦工人协会会员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提出,并于1838年5月8日作为准备提交议会的一项草案在各地群众大会上公布。人民宪章包括了宪章派的下列六项要求:普选权(年满21岁的男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发给议员薪金。1839、1842和1849年宪章派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都被议会否决了。——499、517。

275 辉格党和托利党是17世纪末80年代初在英国形成的两大政治集团。1679年,在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上,议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反对詹姆斯继承王位的议员与拥护詹姆斯继承王位的议员互相讥称为辉格和托利。“辉格”(Whig)为苏格兰语,原意为盗马贼。“托利”(Tory)为爱尔兰语,原意为天主教歹徒。17世纪时,辉格党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以及新兴的资本主义农场主的利益;托利党代表旧土地贵族和高级教士的利益;大约1840年以后,“辉格”是对自由党党员的称呼;大约1830年以后,“托利”是对保守党党员的称呼,这两个政党曾长时期轮流执政。——500。

276 户主选举法指1867年英国保守党人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实行的选举改革,国际总委员积极参加了选举改革运动,同年8月议会通过的新选举法。根据这项新的法律,降低了选民的财产资格限制。在农村选区,租佃者的财产资格限制降低到每年缴纳12英镑以上的租金,而在城市里,所有的房主和房屋租赁者,以及在当地居住满一年并缴纳房租10英镑以上的住户,都有选举权。1867年改革的结果,选举权仅仅扩大到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上层,工人阶级的基本群众仍然处于政治上无权的地位。尽管如此,英国的选民人数还是增加了一倍多,相当一部分熟练工人也取得了选举权。——500、521。

277 19世纪80年代初,英国工人运动逐渐摆脱了自由党的影响。工人队伍中的先进分子投身于激进的组织和俱乐部的活动,并为爱尔兰的民族自决权进行斗争,英国社会主义者的数量开始增多。1879年在伯明翰成立了中部社会民主协会;1881年在伦敦成立了英国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组织劳动解放同盟;1881年6月在伦敦创建的民主联合会是80年代在英国工人运动中发挥作用极大的组织,它把工人中的社会主义者和激进民主主义者联合在一起,1884年改组后更名为社会民主联合会,公开承认马克思主

义原则。——501。

- 278 《对法国的通商条约》是恩格斯应《劳动旗帜报》创办人兼编辑乔·希普顿之邀为该报撰写的11篇文章中的一篇(参看注263)。恩格斯写作本文的时间为1881年6月中旬。文章作为社论发表在1881年6月18日《劳动旗帜报》第7号上。——502。
- 279 1881年5月8日,法国政府公布了新的关税税则。新税则从保护法国工业的目的出发,对进口方面作出了一些限制。英国议会就与法国签订新的通商条约展开了辩论。
英法两国之间为签订这项新的条约反复进行了多次谈判,直到年底也未能取得任何结果。——502。
- 280 指1858年撤销东印度公司以后,印度转归不列颠国王直接管辖。——503。
- 281 英国的谷物法是历届托利党(见注275)内阁为维护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法令,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谷物法规定,当英国本国的小麦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1822年对这项法律作了某些修改,1828年实行了调节制,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谷物进口税就提高,反之,英国谷物价格上涨时谷物进口税就降低。谷物法的实行严重影响了贫民阶层的生活,同时也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因为它使劳动力涨价,妨碍国内贸易的发展。谷物法的实施导致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领导,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进行的。1846年6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504、515、535。
- 282 反谷物法同盟是曼彻斯特学派的代表人物、曼彻斯特的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见注281),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工人的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自由贸易的口号曾被同盟广泛用来进行所谓工人和工业家利益一致的蛊惑性的宣传。1846年废除谷物法后,同盟宣布解散,实际上同盟的某些分支一直存在到1849年。——504、515。
- 283 美国在1865年结束内战以后,工业和科学技术有了巨大的发展。1860—

1890年间仅登记的专利就有44万项。运输工具的改进,电话、无线电报、打字机、缝纫机、收款机等问世,农业机械的发明,这一切都迅速提高了美国的生产力。——505。

- 284 《两个模范市议会》是恩格斯应《劳动旗帜报》创办人兼编辑乔·希普顿之邀为该报撰写的11篇文章中的一篇(参看注263)。恩格斯写作本文的时间为1881年6月下半月。文章作为社论发表在1881年6月25日《劳动旗帜报》第8号上。——508。
- 285 1879年10月20—31日,法国工人在马赛举行第三次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关于成立法国工人党的决议,还通过了工人党的党章。1880年,茹·盖得和保·拉法格制订了党纲。纲领的理论性导言是由马克思口授的(见本卷第442—443页),纲领的实践部分也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参与下起草的。1880年勒阿弗尔代表大会通过了这个党纲,法国工人党宣告正式成立。本文提及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即指法国工人党而言。——508。
- 286 在1881年1月9日法国的市镇选举中,法国工人党第一次参加竞选。工人党的候选人总共得票4万张,并夺得了科芒特里市议会的全部席位。——508。
- 287 1834年英国通过了新的济贫法,即《关于进一步完善和更好地实施英国和威尔士济贫法的法案》。根据这一法律,只允许用一种方式来“救济”贫民,即把他们安置在从事强制性劳动的习艺所(见注266)中。——510。
- 288 1879年9月—1881年6月第四届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共占九个席位,其中有三个席位因故易人。——511。
- 289 《美国食品和土地问题》是恩格斯应《劳动旗帜报》创办人兼编辑乔·希普顿之邀为该报撰写的11篇文章中的一篇(参看注263)。恩格斯写作本文的时间为1881年6月底。文章作为社论发表在1881年7月2日《劳动旗帜报》第9号上。——512。
- 290 1837年美国出现了持续很久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引起的经济萧条一直延续到1843年;1855年以及1873—1879年美国又两次出现经济危机,这几次经济危机都给欧洲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消极的影响。——512。

- 291 《反谷物法同盟的工资理论》是恩格斯应《劳动旗帜报》创办人兼编辑乔·希普顿之邀为该报撰写的 11 篇文章中的一篇(参看注 263)。
- 恩格斯《对法国的通商条约》一文作为 1881 年 6 月 18 日社论在《劳动旗帜报》上发表(见本卷 502—507 页)之后,英国的自由贸易论者,反谷物法同盟的拥护者约·诺布尔写信给希普顿,表示不同意恩格斯文章的某些观点。希普顿将此事转告了恩格斯,并将诺布尔的信复制了一份于 1881 年 6 月 29 日寄给了恩格斯。恩格斯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对自由贸易运动进行分析,遂于 1881 年 7 月初撰写了本文。诺布尔的信以《反谷物法同盟和工资》为标题与恩格斯撰写的本文同时发表在 1881 年 7 月 9 日《劳动旗帜报》第 10 号上。——515。
- 292 1842 年 11 月—1844 年 8 月,恩格斯居住在曼彻斯特并在他父亲开设在当地的“欧门—恩格斯”公司工作,在这期间他对这一英国棉纺织工业中心的各种情况是非常了解的。——515。
- 293 《工人政党》是恩格斯应《劳动旗帜报》创办人兼编辑乔·希普顿之邀为该报撰写的 11 篇文章中的一篇(参看注 263)。恩格斯写作本文的时间为 1881 年 7 月中。文章作为社论发表在 1881 年 7 月 23 日《劳动旗帜报》第 12 号上。——520。
- 294 激进派在历史上指主张以激烈手段推翻封建主义及专制政体的派别,代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左翼。在 19 世纪的英国,激进派曾被用来泛指一切支持议会改革的人。——520。
- 295 《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是恩格斯应《劳动旗帜报》创办人兼编辑乔·希普顿之邀为该报撰写的 11 篇文章中的一篇(参看注 263)。恩格斯写作本文的时间为 1881 年 7 月中。文章作为社论发表在 1881 年 7 月 23 日《劳动旗帜报》第 12 号上。——524。
- 296 英国议会在 19 世纪曾经数次通过了镇压爱尔兰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压法。1881 年 3 月,下院又通过了两个关于在爱尔兰实行高压法的法案。根据这些法律,在爱尔兰境内实行了戒严,禁止自由集会并设立了军事法庭。——524。
- 297 指 1877 年 1 月 10 日和 1878 年 7 月 30 日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社会民主党人在这两次选举中得票总数分别为 493 288 张和 437 158 张,参看注

134。——525。

- 298 1881年6月27日德意志帝国国会闭幕以后,莱比锡宣布了小戒严。第一批被驱逐出莱比锡的30余人中有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及威·哈森克莱维尔。

约·狄龙是爱尔兰人,英国议会议员,爱尔兰土地同盟的领导人之一。他于1881年5月2日在爱尔兰发表演说,英国当局按1881年3月通过的高压法将其逮捕入狱。——525。

- 299 爱尔兰土地同盟,又称爱尔兰民族土地同盟,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迈·戴维特于1879年建立的农民运动组织,代表了爱尔兰佃农的利益。

同盟得到了城市贫民和资产阶级进步分子的支持,很快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地主反政府的运动。这场运动除提出了土地要求以外,还提出了在爱尔兰实现民族自治的政治要求。该同盟于1881年被查禁,但事实上它一直活动到80年代末。——526。

- 300 这是恩格斯1881年7月22日写给约·莫斯特在伦敦创办的德国无政府主义周报《自由》编辑部的一封信。

从这封信的内容可以看出,恩格斯认为自己有责任让《自由》编辑部了解诺·克洛斯提出的要求。同一天恩格斯还写了一封信回复克洛斯。从这两封信的措辞都可以看出,恩格斯明确地将自己与莫斯特和《自由》周报划清了界限,他显然不愿意再就这件事情与他们打交道。莫斯特及其创办的这份报纸所进行的无政府主义宣传屡次遭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恩格斯在信中表现出这种态度,其原因是十分明显的。

这封信未曾在《自由》周报上发表过。——528。

- 301 《棉花和铁》是恩格斯应《劳动旗帜报》创办人兼编辑乔·希普顿之邀为该报撰写的11篇文章中的一篇(参看注263)。恩格斯写作本文的时间为1881年7月底。文章作为社论发表在1881年7月30日《劳动旗帜报》第13号上。——530。

- 302 1873—1874年英国发生了一次经济危机,接着进入一个很长的萧条时期。1878—1879年又由萧条转入一场新的严重的经济危机,受影响最大的是重工业和出口工业。此后,英国经济未见有明显的回升趋势,到了1882年底,新一轮危机爆发的同时又伴随着一场农业危机。——530。

- 303 消费税是资本主义国家征收的间接税中的一种,大多征自日常消费品和生活服务项目,是国家预算中的一项重要收入。美国于1791年首先对威士忌酒征收了消费税。——533。
- 304 《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是恩格斯应《劳动旗帜报》创办人兼编辑乔·希普顿之邀为该报撰写的11篇文章中的一篇(参看注263)。恩格斯写作本文的时间为1881年8月初。文章作为社论发表在1881年8月6日《劳动旗帜报》第14号上。——534。
- 305 指1831年由英国下院通过,并于1832年6月由上院最后批准的选举法改革。这次改革旨在反对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因此取消了一批所谓的“腐败的选区”,设立了不少新的选区,主要是以前没有选举权的新兴的工业城市,如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和设菲尔德,为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打开了进入议会的大门。为实现改革而斗争的主力军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却被自由资产阶级所欺骗,因为获得选举权的仅仅是那些缴纳高额所得税的有产者。——535。
- 306 1881年12月2日,马克思夫人燕妮逝世。12月5日燕妮的遗体安葬仪式在伦敦的海格特公墓举行,马克思因身患重病未能亲自参加。恩格斯在葬仪上用英语发表了讲话。本文是恩格斯讲话的英文草稿。——538。
- 307 指1881年10月27日的帝国国会选举,在这次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人得到了30多万张选票。——539、542。
- 308 指海格特公墓,位于大伦敦的北部,在过去的城郊海格特(Highgate)的区域内。该公墓是一些无神论唯物主义者于19世纪上半叶为埋葬拒绝任何宗教仪式的自由思想者而修建的。这个公墓里葬有马克思及其家庭的几名成员,还有英国的科学文化界的著名活动家(斯宾塞、法拉第等人)。——540。
- 309 这篇悼念马克思夫人的文章写于1881年12月4日,发表在1881年12月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0号上。这是恩格斯在该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这篇悼念文章的基本内容与恩格斯在马克思夫人安葬仪式上用英文发表的讲话的草稿是一致的(见本卷第538—540页),但与讲话草稿相比较有几处作了补充和删节。

这篇悼念文章曾于1881年12月18日全文刊登在布达佩斯出版的

匈牙利社会民主党人的机关报《工人纪事周报》第 51 号上,编辑部加了一则简短的按语,指出这篇悼念文章原来刊登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同时还向马克思表示了深切的哀悼。——541。

- 310 1881年12月11日,巴黎《平等报》第1号对燕妮·马克思的葬仪作了报道,刊登了恩格斯在墓前的讲话,讲话前面是《平等报》编辑部写的序言。报道注明的时间是1881年12月5日,这篇报道有可能是在马克思的女婿保·拉法格的参与下完成的。

这篇悼词的法文本肯定出自恩格斯的手笔。因为在编辑部的序言中已经明确指出了写作的时间和地点以及恩格斯的作者身份。

这篇法文本的悼词是在英文草稿、德文本以及在葬礼现场讲话的基础上写成的。法文本与英文草稿更接近,只是最后一段被删去,但其基本思想由《平等报》编辑部的序言表达出来了。

这篇悼词后来又被收入拉法格本人撰写的卡·马克思的回忆录;发表在1890—1891年《新时代》第9年卷,文字上与《平等报》上发表的略有差别。拉法格的这篇文章连同这篇悼词曾被译成保加利亚文发表在1890年7、8月《时代》杂志第3、4号上。——544。

- 311 《〈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82年1月21日或在此之前不久写的,发表时注明的日期为1882年1月21日。

1880年12月,俄国革命者尼·亚·莫洛佐夫在伦敦逗留期间,通过列·尼·加特曼的介绍与马克思结识。据莫洛佐夫本人叙述,马克思当时交给他几部适合在日内瓦作为《俄国社会革命丛书》出版的著作,并表示愿意为这些著作的俄译本作序。莫洛佐夫把从马克思那里得到的书转交给了他在瑞士的朋友,于是普列汉诺夫通过这种途径得到了《共产党宣言》,并决定立即着手由他翻译成俄文(俄文第一版译者是巴枯宁)。

普列汉诺夫大约于1882年1月初或中旬写信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彼·拉甫罗夫,要求他出面请求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的俄文第二版撰写序言。拉甫罗夫很快就收到了马克思1月23日的复信及所附的用德文写成的这篇序言的原件。

这篇序言曾第一次用俄文单独发表在1882年2月5日《民意》杂志第8—9号上。附有这篇序言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单行本于1882年在日内瓦作为《俄国社会革命丛书》出版。恩格斯对普列汉诺夫的俄译文评

价很高。

1882年4月,爱·伯恩斯坦曾向恩格斯索要这篇序言的德文原稿,打算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恩格斯去信要求拉甫罗夫将序言的德文原稿寄还给他,直到4月17日左右,拉甫罗夫才将原稿的副本寄给恩格斯,而在4月13日,序言就已经根据《民意》杂志发表的俄文文本,由爱·伯恩斯坦的朋友帕·波·阿克谢尔罗德再转译为德文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6号上了,这是序言第一次用德文单独发表。

恩格斯在为1890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第4版撰写的新序言中,全文引用了由俄文转译成德文的这篇序言,但表达上略有差别。

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篇序言的德文手稿才被重新发现。1939年,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德文版《共产党宣言》首次按德文原文发表了这篇序言。——547。

312 1847年11月29日—12月8日,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伦敦举行,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了作为同盟纲领的《共产党宣言》。——547。

313 1881年3月1日民意党人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以后,亚历山大三世因害怕民意党人采取新的恐怖行动,终日躲在彼得堡附近的加特契纳行宫内,因而被人们戏谑地称为“加特契纳的俘虏”。——548。

314 《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一文写于1882年4月下半月。1882年4月13日布·鲍威尔的逝世是恩格斯撰写本文的直接原因。

恩格斯在文中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肯定了布·鲍威尔对研究基督教历史起源问题所作的贡献,分析了基督教发展成为世界宗教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批判了资产阶级官方神学家在基督教历史研究领域散布的唯心主义观点。

恩格斯早在1841—1842年在柏林服役期间就对基督教历史问题发生了兴趣,此后的数十年内他仍不断进行研究(参看恩格斯1894年7月28日给卡·考茨基的信)。恩格斯在本篇文章中,第一次公开阐述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后来,他在《启示录》(1883年)和《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1894年)这两篇文章中对本文的观点又作了进一步的阐发。

本文最初刊登在1882年5月4日和1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9和20号上。——549。

- 315 自由思想者指那些对宗教信条持怀疑和批判态度,坚持用理性来评价宗教教义、主张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捍卫理性自由的人。早在10世纪,就有一些自由思想者在巴格达对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进行比较,指出这三种宗教的创立者摩西、耶稣和穆罕默德都是骗子。这种观点后来传到欧洲,直到启蒙运动时期仍然在产生影响。——549。
- 316 布·鲍威尔对新约进行考证的著作主要有:《约翰福音故事考证》1840年不来梅版;《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故事考证》1841年莱比锡版第1、2卷;《符类福音作者和约翰的福音故事考证》1842年不伦瑞克版第3卷;《福音书及其起源的史实考证》1850—1852年柏林版第1—4卷;《使徒行传。保罗教义和犹太教在基督教会内部的调和》1850年柏林版以及《保罗书信考证(分三个部分论述)》1850—1852年柏林版。——550。
- 317 布·鲍威尔在《福音书的神学解释》一文中批驳了大·施特劳斯的理论;这篇文章被收入《福音书及其起源的史实考证》1852年柏林版第4卷。——550。
- 318 恩格斯提到的这一事实,布·鲍威尔在下列著作中作了阐述:《斐洛、施特劳斯、勒南和原始基督教》1874年柏林版及《基督和君主们。基督教起源于罗马的希腊文化》1877年柏林版。——551。
- 319 指海涅的讽刺诗《阿波罗神》中的主人公(见诗集《罗曼采罗》),这是一个年轻的浪荡鬼,是阿姆斯特丹犹太教堂里扮演阿波罗的歌手。——551。
- 320 亨·埃瓦尔德《以色列民族史》1864年格丁根第3版第4卷第254—257页。——552。
- 321 使徒书信是对《圣经·新约》中称为“书信”的各卷书的泛称,相传为使徒保罗、雅各、彼得、约翰和犹大所写;从《罗马人书》到《犹大书》,共计21卷。——553。
- 322 指佩特罗尼乌斯创作的小说《萨蒂里孔》。这部作品通过描写一个发了财的被释放的奴隶特里马希昂所举行的宴会,真实地再现了罗马帝国早期的社会状况。——554。
- 323 参看雅·菲·法耳梅赖耶尔的著作《摩里亚半岛中世纪史》1830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版第1册第227页。——555。

324 伏尔泰主义这一概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是指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所持的充满矛盾的思想观点和政治态度。当时,这个阶级一方面从自然神论的立场出发,反对宗教狂热和封建教权主义,另一方面又认为,为了对“贱民”实行统治,宗教的存在是必要的。——556。

325 《布雷的牧师》是18世纪最初30年间产生于英国的一首政治民歌。恩格斯非常喜爱这首民歌,于1882年8月底—9月初将这首民歌译成德文并撰写了后记发表在1882年9月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7号上。

恩格斯之所以决定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这篇译文和后记,主要是为了用事实来“回答梅林的荒谬行动”,表明在该报和马克思、恩格斯之间“不存在任何敌对情绪”(参看恩格斯1882年11月15日给卡·考茨基的信)。1882年7月2日,弗·梅林在卡·希尔施的怂恿下,在《韦塞尔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同《社会民主党人报》保持距离。1882年7月15日,恩格斯致信爱·伯恩施坦,建议《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刊登一则有关他为该报撰稿的简讯,认为这是对谣言的“最好的回答”;8月9日,恩格斯在给爱·伯恩施坦的信中再次提到此事,并表示要向《社会民主党人报》副刊寄送稿件,以便证明希尔施“向梅林编造了些什么样的胡说八道”。恩格斯提供的稿件就是这篇译文和后记。

在此期间,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机会主义势力正在竭力改变党的中央机关报的革命立场。1882年8月19—21日,在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发行部共同召开的苏黎世秘密会议上,机会主义势力力图实现他们的目的,特别是企图剥夺该报对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中的机会主义代表人物进行批判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如此坚决地表明他和马克思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态度,这对当时的斗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559。

326 《马尔克》一文是恩格斯于1882年9月中旬至12月20日撰写的,同年,《马尔克》作为德文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小册子的附录第一次公开发表;1883年由《社会民主党人报》连载并印成了单行本。

《马尔克》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过程中的一部重要文献,文章阐述了德国土地所有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是恩格斯“研究德国历史的第一个成果”(1882年12月22日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在写作过程中,恩格斯利用了他研究德意志人原始历史所收集的材料,尤其

是对格·路·毛勒的著作反复进行了批判性的研究,获得了不少新的认识。初稿完成后,他曾通篇修改,三易其稿,最后又寄给马克思过目,马克思对本文作了很高的评价。

本文的写作目的,正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指出的那样:“附录《马尔克》是为了在德国社会党内传播关于德国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和发展的一些基本知识而写的。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当时党在团结城市工人的工作方面已经完成在望,又要着手进行农业工人和农民的工作。”

恩格斯生前,本文曾作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附录用德文出了4版。此外,本文经恩格斯修订,于1883年底专门为农民读者出版了单行本,书名为《德国农民。他过去怎样?他现在怎样?他将来会怎样?》。——565。

- 327 指格·路·毛勒研究中世纪德国土地制度、城市制度和国家制度的著作。这些著作是:《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1854年慕尼黑版、《德国马尔克制度史》1856年埃朗根版;《德国领主庄园、农户和农户制度史》1862—1863年埃朗根版第1—4卷;《德国乡村制度史》1865—1866年埃朗根版第1—2卷;《德国城市制度史》1869—1871年埃朗根版第1—4卷。——567。
- 328 《帝国法》指中世纪德意志皇帝颁布的法律,即罗马法和全帝国法律。《H. E. 恩德曼博士根据1372年手稿(同其他手稿校订过)并附有注释的帝国法》1846年卡塞勒版是这些法律最完备的汇编之一。恩格斯引用的材料载于《关于森林法》部分。——569。
- 329 《里普利安民族法》是对古代日耳曼部落——里普利安的法兰克人的习惯法的记录。这些法兰克人于4—5世纪居住在莱茵河和马斯河之间。《里普利安民族法》是研究里普利安的法兰克人社会制度和封建化过程的主要材料。《里普利安法》第82节(表A)和第84节(表B)谈到了耕地的私人占有制。《里普利安和法兰克—哈玛维法》1883年汉诺威版是最完备的版本之一。参看此书第104页。——572。
- 330 指1878年4月15日颁布的林木盗窃法,该法律规定,未经警察的特别允许不准采集药草、浆果和蘑菇。——574。

- 331 陪审员法庭是德意志帝国的最低级的法庭,于1848年革命以后在许多德意志邦内建立,自1871年以后则在整个德国建立。法庭当时由一个皇室法官和两个代表(陪审员)组成,和革命前的陪审员不同,他们参与全部审判过程,不仅参与量刑,而且同法官一道确定惩处的办法。其成员是从统治阶级的代表中特别挑选出来的,要求具备一定的年龄条件、定居期限以及相当数量的财产。陪审员法庭一般受理较轻的罪案。
俾斯麦—莱昂哈特的陪审员法庭是在70年代末,依据1877年1月27日的审判制度法成立的。——575。
- 332 西法兰克王国是在查理大帝帝国瓦解后建立的,该帝国是一个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动联盟。843年帝国在查理的三个孙子之间发生了最后的分裂。其中秃头查理得到了帝国的西部领土,包括现代法国的大部分,建立了西法兰克王国。莱茵河以东的土地(未来德国的核心部分)交给了德意志人路易。从北海到中意大利之间的狭长地带则归查理大帝的长孙洛塔尔掌管。——578。
- 333 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是一次全欧范围的战争,是各欧洲国家集团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它采取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斗争形式。德国是这次斗争的主要场所,是战争参加者进行军事掠夺和侵略的对象。战争于1648年以缔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结束,和约的签订加深了德国政治上的分裂。——581。
- 334 Code civil 指在1804年民法典的基础上于1807年产生的拿破仑第一的民法典,基本上保持了1789—1795年法国大革命的成果。这一法典也曾在法国人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实行;1815年莱茵省归并普鲁士以后,这一法典在该省仍继续有效。——582。
- 335 1806年10月14日普鲁士军队在耶拿近郊的溃灭,迫使普鲁士向拿破仑的法国投降,这次失败彻底暴露了霍亨索伦封建君主政体的腐朽性。——582。
- 336 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1版出版时间为1883年,扉页上标明的时间是1882年。本文是恩格斯为德文第1版写的序言(参看注213)。——585。
- 337 《燕妮·龙格(父姓马克思)》是恩格斯在马克思的长女燕妮·龙格于1883

年1月12日去世之后第二天写的一篇悼念文章。

燕妮·龙格去世的时候,马克思因身患重病正在英国怀特岛的文特诺疗养。马克思在得到这一噩耗的当天便返回了伦敦。长女的早逝对马克思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恩格斯在这种情况下义不容辞地承担了照顾马克思及其家人的责任。

几十年来恩格斯与马克思一家一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燕妮的早逝也使恩格斯万分悲痛。为使人们缅怀这位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英勇战士,恩格斯写下了这篇悼文,以燕妮·龙格经历的两件事情为例赞颂了她优秀的品质和崇高的人格。

这篇悼文刊登在1883年1月1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苏黎世第4号上。悼文的手稿没有保存下来。——588。

- 338 燕妮·龙格撰写的有关爱尔兰问题的文章总计为8篇,刊登在1870年3月1日—4月24日《马赛曲报》第71、79、89、91、99、113、118和125号上。——588。

- 339 新喀里多尼亚岛是太平洋西南部的一些岛屿,自1853年起为法国殖民地,那里的气候对人的身体极其有害,1863—1896年间为罪犯流放地,1871年以后专门用来作为巴黎公社社员的流放地。——589。

- 340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在伦敦逝世,恩格斯将这一噩耗向朋友、熟人和战友作了通报。1883年3月16日恩格斯起草了给《纽约人民报》编辑部的电报。然而《纽约人民报》编辑部并未如实地将它刊登出来,擅自在电报中加进了马克思在法国的阿让特伊逝世等字样。对于该报编辑部这种武断的作法,恩格斯曾在1883年4月18日给《纽约人民报》编辑部的信(见本卷第602—603页)以及4月24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中表示了强烈的抗议。

这封电报刊登在1883年3月17日《纽约人民报》第66号。电报的手稿未保存下来。此次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发表的《纽约人民报》刊载的电文校订的。——590。

- 341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3月17日马克思的遗体安葬仪式在伦敦郊外的海格特公墓举行。恩格斯在安葬仪式上发表了讲话。本文是他用英文起草的讲话稿。

实际上,恩格斯在讲话时并未完全按照讲稿宣读,而是脱离讲稿讲

的。他在以《卡尔·马克思的葬仪》为题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写的报道中,又把自己在葬礼上的讲话重新用德文写过(见本卷第594--601页),因此,恩格斯这篇讲话的英文草稿与后来收入报道的讲话有明显的差异。

这篇讲话草稿写作的时间是1883年3月14—17日,原文曾经首次收入《作为人、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卡尔·马克思》1927年伦敦劳伦斯出版社版第43—46页。

1883年3月20日巴黎《正义报》第27号对马克思的葬礼进行了报道,恩格斯发表的讲话作为报道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发表在该报上。法译文是依据英文草稿翻译的。法译文中有几处在表述上与英文原文有差异,末尾新增加了一段话。——591。

- 342 《卡尔·马克思的葬仪》是恩格斯应爱·伯恩施坦的请求,于1883年3月18日,即马克思安葬后的第二天为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撰写的一篇报道。

这篇报道的重要部分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恩格斯最初是用英文起草的,但他并未完全按照英文稿宣读。因此,后来发表的讲话的法文译本及本篇报道中的德文文本与英文草稿的内容不完全一致(见注341),但是本篇讲话保留了英文草稿的基本内容,对个别部分作了进一步具体的阐述。

本篇报道发表以后,1883年4月1日布达佩斯的《工人纪事周报》第13号立即予以转载,但删去了由马克思的女婿龙格宣读的挽词和唁电。1883年4月5日《纽约人民报》第82号全文转载了这篇报道。纽约的《先驱者。人民历书画刊(1891年)》在征得恩格斯的同意后,将本篇通讯中恩格斯的讲话作为对恩格斯于1877年撰写的《卡尔·马克思》(见本卷第128—139页)的补充收入了这一年鉴,个别地方只作了极其微小的改动。

弗·梅林在撰写《历史唯物主义》(1893年作为《莱辛传奇》的附录发表)一文时引用了恩格斯讲话的部分重要段落。——594。

- 343 1882年在慕尼黑举办的国际电气技术展览会上,法国物理学家马·德普勒展示了自己的一项研究成果,他利用普通的电报用电缆成功地在米斯巴赫与慕尼黑之间架设了第一条实验性输电线路,将电力输送到57公里以外的地方。这次远距离输电的成功在当时颇为轰动。——597。
- 344 西班牙工人党即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马德里联合会)成立于1879年5

月2日,其创始人是何·梅萨-列奥姆帕特和帕·伊格列西亚斯。该党于1881年取得了合法地位,并于1888年在巴塞罗纳召开了第一次合法的党代表大会。——599。

- 345 伦敦皇家学会即伦敦科学院,成立于1660年,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以推动自然科学研究为宗旨的学术中心。——601。

- 346 恩格斯的这封信涉及到他为通报马克思逝世一事于1883年3月14日给弗·阿·左尔格以及3月16日给《纽约人民报》编辑部的两封电报。《纽约人民报》十分武断地对这两封电报作了歪曲的报道,这使恩格斯十分不满,这封信就是对该报表示的强烈抗议(参看本卷注340)。

这份草稿的原件现存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602。

- 347 马克思的逝世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引起了深切的关注和同情,而科学共产主义的敌人则蠢蠢欲动,放肆地攻击马克思的事业并诽谤他的人格。在这种形势下,恩格斯撰写了本篇文章。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完稿于1883年4月23—28日;第二部分的完稿日期,恩格斯注明的是1883年5月12日。这篇文章先后发表在1883年5月3日和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9和21号。文章的第一部分曾由1883年5月19日《纽约人民报》第120号转载;第二部分由1883年6月3日布达佩斯的《工人纪事报》第22号转载,但删去了前面三段文字;1883年5月31日在日内瓦出版的波兰文的社会主义杂志《黎明》第18号以及1883年6月在纽约出版的《社会工人运动公报》均转载了本文中恩格斯于4月18日给纽约中央劳动联合会书记给菲·范派顿的信。

恩格斯写的这篇文章的手稿未保存下来。——604。

- 348 关于放德萨大学的学生希望向马克思墓献花圈的消息,载于1883年4月19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7号。根据他们的要求,花圈的题词是:“献给《资本论》的作者和国际工人协会的缔造者卡尔·马克思。他的学生和追随者放德萨大学的一群社会主义者敬挽”。——605。

- 349 指斯拉夫社会主义大学生协会“斯拉维亚”。恩格斯应该协会主席的请求,没有说出协会的名称是为了防止会员们返回俄国后遭到迫害。——

605。

350 纽约中央劳动联合会是纽约各工会的联合会,成立于1882年,80年代发展成为群众性的工人组织,联合了白人和黑人以及美籍和外籍工人。领导这个联合会的社会主义者们认为,为了有效地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既需要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又需要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608。

351 恩格斯1883年4月18日给菲·范派顿的信是用英文写的。英文原本未能保存下来,现存的草稿注明的日期是“1883年4月18日”。——609。

352 保存下来的恩格斯给阿·洛里亚复信的原件中注明的日期是“1883年5月20日”。——613。

353 1876年2月7日在伦敦工人教育协会成立三十六周年的庆祝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讲话以示祝贺,这是当时发表在1876年2月27日《人民国家报》第24号《英国消息》栏中一篇报道的摘录,涉及马克思恩格斯讲话的内容。这篇报道的作者是卡尔·沙尔。

这个庆祝会表现出真正的国际性,会上采用三种语言,除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前巴黎公社社员、波兰革命者、巴黎公社将军瓦·符卢勃列夫斯基以外,发表讲话的还有S.F.考夫曼,埃利·梅,加·朗维埃以及安·谢尔策尔,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弗·列斯纳因病未能参加,他给庆祝会寄去了贺信。

《人民国家报》的这篇报道中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准确之处,如《共产党宣言》问世的时间以及涉及工人教育协会,正义者同盟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关系等,这很可能是由于卡·沙尔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不太熟悉造成的。——617。

354 正义者同盟是1836—1838年间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流亡者联盟分裂而产生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组织,后来这个组织逐渐具有了国际性。该同盟成员的观点反映了当时德国无产阶级的半手工业性质,受魏特林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的影响,后来又受“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空想的影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起决定性作用的影响下,正义者同盟于1847年6月初在伦敦举行代表大会,实行了改组,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617。

355 1876年下半年,马克思从一些秘密材料中获悉英国自由党领袖、前首相格

莱斯顿与一名负有秘密外交使命的俄国女人诺维科娃往来的情况,于是两次写信给他的英国朋友科·多·科勒特,请求在《外交评论》杂志上公开予以披露,但未能成功。马克思遂又写信给马·巴里,希望通过他在英国报刊上披露这些材料。巴里于1877年2月3日在英国保守派周刊《白厅评论》上匿名发表了《格莱斯顿先生和俄国的阴谋》一文;同年3月3日和10日,另一家英国保守派周刊《名利场》又先后匿名发表了两篇文章《格莱斯顿先生》和《大鼓动家的真面目》。这三篇文章在内容上和上述马克思写给科勒特的两封信完全一致,甚至有的用语和词句都相同。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曾提到过巴里的文章,因此,可以断定,巴里的文章是在马克思掌握的内部材料的基础上,也可以说是在马克思的参与下写成的。但是,马克思是以何种方式将这些材料提供给巴里,或者是由科勒特转交的,已无从查考。——619、622、628。

356 马克思在1876年12月9日给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的信中提到,格莱斯顿曾“写信给诺维科夫夫人,告诉她《晨邮报》已经受了奥地利政府的收买,俄国政府也应当收买几家伦敦的报纸,以便影响英国舆论。”——630。

357 1876—1877年,巴尔干半岛形势紧张,形成了后来导致1877—1878年俄土战争的所谓“东方危机”。俄国借口支持土耳其统治下信奉基督教的各斯拉夫民族改革和独立的要求,企图在这一地区扩张自己的势力。英国政府出于同样的目的,通过对土耳其政府的支持和控制而与俄国抗衡。这期间,英国议会就东方问题经常展开激烈的辩论。自由党领袖格莱斯顿采取亲俄立场,反对以迪斯累里为首的保守党政府的亲土耳其政策。

1877年5月14日爱尔兰籍的英国下院议员凯斯·奥克莱里在下院作了题为《关于俄国对波兰的迫害》的长篇发言,本文是发言的一段摘录,其中涉及的具体事实是由马克思提供的。马克思曾在1877年3月16日给彼·拉·拉甫罗夫的信中专门讲到了这件事情,并告诉说,他已经把俄国政府迫害波兰基督教徒的详细情节告诉了凯·奥克莱里。

英国报界对议会辩论的情况作了报道,奥克莱里的发言在英国舆论界广为传播。1877年5月15日《泰晤士报》第28942号逐字逐句刊登了这篇发言,但本篇发言摘录中间有一句话及最后一句话被省略了。——632。

358 1877年6月10日起,针对法国众议院的保皇派集团和共和派多数之间发

生的冲突以及对共和国总统麦克马洪发动保皇派政变的企图,《前进报》连续发表了一系列评论这些事件的文章,文章的作者是《前进报》的两个编辑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克莱维尔。他们对在法国开展的争取共和制的斗争采取了错误的立场,尤其在1877年7月1日《前进报》第76号上发表的威·哈森克莱维尔执笔撰写的《打倒共和国!》一文露骨地宣扬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无产阶级无论是在资产阶级共和制还是在君主制的条件下进行活动都没有任何区别。恩格斯曾指出,这些“关于法国危机的言论,充满了巴枯宁主义的气味”(恩格斯1878年1月11日给约·菲·贝克尔的信)。恩格斯与马克思对《前进报》的立场取得了一致的认识,恩格斯在1877年7月2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批评了《前进报》所持的这种立场,指出“我们认为,《前进报》对待法国事件过于轻率”。接下来恩格斯详细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言简意赅地阐明了国家形式与无产阶级斗争的关系。威·李卜克内西为了挽回威·哈森克莱维尔文章的错误观点产生的影响,在《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组文章《红色的反对蓝色的》,但恩格斯认为,威·李卜克内西“不过是重复哈森克莱维尔的胡说八道”(恩格斯1878年7月24日给马克思的信)。

1877年7月11日《前进报》第80号在《社会政治评论》栏中发表了一则短评,短评中,以“巴黎消息”为引子几乎一字不差地刊登了恩格斯7月2日给威·李卜克内西信中的这段论述。——634。

- 359 这是一篇根据恩格斯的书信写成的文章,发表在1877年12月16日《汉堡—阿尔托纳人民报》第150号附刊上。作者是威·布洛斯。

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应是1877年12月中旬,威·布洛斯从1873年5月起就与恩格斯建立了通信联系,从1878年1月8日威·布洛斯给恩格斯的信中 can 断定,这篇文章的素材是恩格斯提供的。——636。

- 360 这篇《卡尔·马克思访问记》作为通讯发表在1879年1月5日《芝加哥论坛报》第6号上。标题是:《卡尔·马克思。访现代社会主义柱石》,作者未署真名,仅以字母“H”代替。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手稿或书信里都没有任何记载或提及这次访问的有关材料,也未发现任何其他可供查证的线索。但访问记作者所记述的马克思的谈话内容,同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以及谈话前后一段时间所写的著作、文章及书信中所表述的思想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肯定这

篇访问记是真实可信的。

马克思的谈话涉及了1878年11月30日才披露的柏林社会民主党领袖被驱逐一事,而作者注明的这篇访问记的发稿时间是1878年12月18日,据此可以推断,访问大约是在1878年12月上半月进行的。

马克思当时已经是公认的国际无产阶级的理论家、领袖和顾问,越来越广泛地引起美国资产阶级报刊某些代表人物的注意。《芝加哥论坛报》是美国一家亲共和党的报纸,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进行诬蔑诽谤,并把马克思描绘成世界阴谋活动的首领。马克思接受采访,显然是想利用这一机会,通过这家发行量很大的资产阶级报刊,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革命工人运动的性质,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巴黎公社的真相以及世界社会政治发展的趋势。马克思在谈话中着重谈到了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通过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真实内幕,从而揭露了其反动的面目,这无疑对当时处于反社会党人法高压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是一个有力的支持。

访问记的作者显然持资产阶级立场,对马克思的生平、工人运动的历史以及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的名词术语也不熟悉,因此,在介绍马克思生平和转述马克思的谈话时有许多不准确之处,但总的说来,访问记仍不失为一篇比较客观的报道。由于上述种种情况,尤其是迄今为止尚未发现马克思本人或恩格斯在任何时候谈及或记述过此次采访,因此,访问记只能看作是一份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资料,而不能视为具有权威性的文献。

1879年1月5日《芝加哥论坛报》发表了这篇访问记后,同年1月10日《纽约人民报》第10号,1月11日芝加哥《先驱报》第2号发表了这篇访问记的德译文,但很不准确,部分段落顺序颠倒,原话也有所改动。1月11日芝加哥的一家工人周刊《社会主义者》还转载过访问记的最后一段。同年4月9日和10日哥本哈根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84号和85号发表了这篇报道的丹麦文译文,是从芝加哥《先驱报》的德译文转译的。——639。

361 马克思不是在1844年被驱逐出德国的,他是在1843年10月底为了创办《德法年鉴》杂志而离开德国迁居巴黎的。——640。

362 以下的引文及后面总委员会人员组成和通讯书记的名单均引自1871年12

月在伦敦以小册子形式出版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引文和名单中的人名的拼写法在个别地方同原文件略有出入。——641。

- 363** 正式报告指美国驻柏林大使约·钱·班克罗夫特·戴维斯1877年2月10日给美国国务卿汉密尔顿·菲什的工作报告。这一报告中有关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那部分发表在官方出版物《美国。国务院。有关美国对外关系的文件》1877年华盛顿版第175—180页。

纲领指1875年5月哥达合并代表大会通过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正式报告中援引的纲领不是按原顺序逐条从德文译成英文的。原纲领中具体的要求有14条,正式报告将其合并成12条,本文下面提到的第十二条内容在原纲领中是写在前言部分的。马克思口授的11条,其先后顺序及措词均与报告所引内容接近。——643。

- 364** 1863年5月至1864年2月,拉萨尔与俾斯麦有过多私人会谈和书信往来。拉萨尔幻想通过同俾斯麦的会谈实现直接普选制和他的所谓由国家贷款建立工人生产合作社的计划。俾斯麦作为普鲁士军国主义和容克地主反动势力的主要代表人物,对拉萨尔的设想表示支持,其目的在于拉拢工人阶级以反对新兴的德国资产阶级。俾斯麦把这种生产合作社视为对工人阶级的一种周济,以为工人阶级得到了这种周济就能轻而易举地受他的摆布。——648。

- 365** 耶稣会是自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兴起之后,天主教内以反对宗教改革运动为宗旨的宗教集团。耶稣会以各种形式渗入社会各阶层进行活动,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在欧洲声誉不佳。比·贝克斯于1853—1884年任耶稣会会长。

1877年9—11月间,俾斯麦的半官方报纸《北德意志总汇报》曾多次发表社论,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同耶稣会,把马克思同耶稣会会长贝克斯相提并论。

赫德尔行刺事件见注154。——648。

- 366** 1871年,国际美国各支部相继出现了意见分歧。主要是以主张推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美国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田·克拉夫林和维·伍德赫尔为首的国际第九支部、第十二支部和德国人支部、法国人支部以及爱尔兰人支部之间产生了分歧。第十二支部要求总委员会承认其在美国各支部中的领导地位,其要求遭到拒绝后仍继续进行分裂活动,因此导致了1871

年12月国际在美国分裂成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两派,形成了两个委员会,一个是由左尔格和波尔特等人组成的临时联合委员会以及另一个以伍德赫尔与第十二支部其他资产阶级改良派组成的第二委员会。1872年5月28日,总委员会承认临时联合委员会是国际在美国的惟一领导机关,同年7月在北美联合会代表大会上选出了正式的联合委员会,临时联合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进入了这个新选的机构。第十二支部于同年9月在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国际。——649。

- 367 这是蒙·埃·格兰特-达夫爵士1879年2月1日写给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长女、德国皇储弗里德里希-威廉之妻维多利亚一封信的摘录,讲述了他同马克思的谈话和他本人对马克思的印象。

蒙·埃·格兰特-达夫是英国议会中的自由党议员,在政府中长期担任印度和殖民地事务方面的要职,他于1879年1月31日有机会见到了马克思,并与马克思进行了交谈。

格兰特-达夫同马克思会见一事以及他给维多利亚的信件一直不为人所知。也未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或他们的友人对此事有任何记载。到了1945年,维多利亚的女儿玛格丽特打算把包括格兰特-达夫书信在内的一批文献转送给英国皇家档案馆,由英国皇家图书馆馆员欧·莫斯赫德爵士从德国带到英国。伦敦的马克思纪念图书馆从新闻报道中得知此事后进行了查询,经英王乔治六世以及玛格丽特同意后,格兰特-达夫的这封信得以公诸于世。此信在1949年7月15日伦敦《泰晤士报》(文学附刊)第464版刊登的安·罗特施坦《同卡尔·马克思的会见》一文中首次发表。——654。

- 368 指19世纪德国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于1873年10月初爆发,是早些时候从维也纳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的一部分(参看注110),一直持续到1878—1879年。这次危机导致了大部分工厂的生产出现大倒退从而使工人的处境恶化,阶级矛盾更加尖锐。——656。
- 369 1878年6月2日,爱·诺比林在柏林向德国皇帝威廉一世行刺(参看注154),行刺后向自己头部开枪企图自杀,9月10日死于狱中。他曾在德累斯顿的皇家统计局当过辅助性工作人员。——656。
- 370 《法国工人党纲领》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参与下于1880年5月制订的(见注371),纲领分为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本文是纲领的实践部分,亦

称最低纲领。——658。

- 371 1880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保·拉法格和茹·盖得共同起草了法国工人党纲领。为了对这一纲领进行科学的阐述,拉法格于1880年5月中至6月初撰写了《法国工人党宣言》,马克思对全部手稿进行了审阅,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都写在手稿的页边和正文中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马克思本人直接作的批注(在本文中用黑体字表示);另一种是由马克思口授的,对如何修改纲领草案提的建议,以及拉法格根据他同马克思谈话的内容记下的文字(在本文中放在左边)。

马克思写下的批注及口头表述的意见分以下几方面内容:

1. 要求在具体叙述所讨论的事物的发展过程及其与其他事物的联系时,论证要有依据,要比较细致;
2. 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大工业的发展对于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层的影响;
3. 为使打算进行的叙述行文更加严谨,给以准确的表达;
4. 为做到上述1.2两点而提供的参考文献;
5. 用着重号或加评语“好”所表示的对叙述的评价。

本文首次发表于《马克思与19世纪国际工人运动的若干问题》莫斯科俄文版1970年合订本第454—480页。——660。

- 372 比卡热东司(Piquage d'once)19世纪法国棉纺织业和丝织业工人为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而采取的一种作法,他们偷窃一部分加工原料作为对自己工资不足的补偿。——665。
- 373 阿克索《法国的工业人口。织边业和孚日的织边女工。孚日地区织边业现状以及这一行业对工人健康的影响一瞥》1856年埃皮纳勒版第25页。——666。
- 374 指埃尔伯夫商会1862年9月4日致该地区企业主的信,信中强调要采取措施,制止对工厂的盗窃行为。这封信发表在1862年9月21日《埃尔伯夫报》第75号上。——666。
- 375 大概是指阿·奥迪冈的著作《19世纪社会运动中的法国工人人口和工业》。作者站在资产阶级伦理和法制的立场上,对“比卡热东司”这种工人保护自身经济利益的行为进行了指责。——666。

- 376 指 C. 博利厄的著作《里昂的贸易、工业、工厂从发端到现在的历史》。作者认为“比卡热东司”是一种“几乎是公开进行的、有组织的盗窃制度”，它“阻碍了里昂地区丝织工业的进一步发展”。——666。
- 377 这里提到的19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法国工人状况的著作包括：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1837年布鲁塞尔版；路·勒·维莱梅《棉纺织业、毛纺织业、丝织业工场手工业工人的物质和精神状况》1840年巴黎版；布朗基《1848年的法国工人阶级》1849年巴黎版；古·德·莫利纳里《19世纪的经济进化。发展理论》1880年巴黎版。——666。
- 378 拉法格针对1880年5月5日政治经济学学会讨论的问题写了一篇题为《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和中国人》的论战性文章，发表在1880年6月9日《平等报》第2辑，第21号上。——670。
- 379 法国弗朗索瓦一世的财政部长安·杜波拉于1522年首次发行支付利息的国债。此后，类似的国债曾多次发行，因此在法国形成了一个食利者阶层，他们靠国债利息生活，同时，国债也就成了法国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特点。——676。
- 380 1848年2月24日法国七月王朝被推翻时，法国国债高达87200万法郎，其中，35500万法郎是拖欠储蓄银行的债务。由于储户挤兑存款，临时政府财政部长路·安·加尔涅-帕热斯下令每位储户仅允许支取100法郎，如果储户要求支取剩余的部分，那么这部分的一半付给利率为5%的国债，另一半付给国库券。但是，由于当时国债和国库券都不断贬值，因此，这种支付方式不过是对储户的欺骗。同这种情况相反的是，临时政府的第一任财政部长米·古德肖却建议提前支付国家贷款的利息。——677。
- 381 1847年11月巴黎路特希尔德银行承担了一笔高达25000万法郎的国债。其中第一批贷款8200万法郎已经向国库支付，但是由于发生了1848年革命，债券大大贬值，因此，詹姆斯·路特希尔德提出放弃国家支付的担保金并拒绝支付1848年2月28日到期的剩余的16800万法郎贷款。拉法格此处所列的数字有误，他把路特希尔德银行已经向国库支付的贷款数目同应该支付的数目颠倒了。——677。
- 382 阿西涅币是根据1789年12月19—21日立法议会颁布的法令发行的国家

债券。债券的价值由没收的教会和贵族的土地担保。由于阿西涅币大量发行,它的名义价值不断降低,同时物价也不断上涨,在这种情况下,雅各宾派对日用必需品采取了最高限价政策,以达到控制通货膨胀,减少货币发行量的目的,但是这项措施于1794年12月23日被重新上台的大资产阶级取消了。于是阿西涅币重又大量发行,到1796年,它的总额已达4 557 900万利弗尔,而它的价值只有它的金属货币名义价值的 $\frac{1}{833}$ 。1796年2月19日,阿西涅币停止流通,按其名义价值的 $\frac{1}{30}$ 与用国家财产担保的芒达券兑换。——679。

- 383 让·巴蒂斯特·热克尔是瑞士银行热克尔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他在1859年2月与墨西哥总统米格尔·米腊蒙签订了一项金额为375万法郎的国家贷款协定。这笔债务由墨西哥用7 500万法郎的债券分期偿还。后来,在新总统贝尼托·胡阿雷斯当政期间,墨西哥国会于1861年7月17日通过一项决议,停止支付一切外国贷款和利息。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英国和法国缔结了一项协定,目的在于通过军事力量迫使墨西哥履行它的财政义务。1862年4月初,英国和西班牙退出这一协定,法国在与此事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金融家和政治家的压力下,发动了对墨西哥的远征。这次武装干涉于1867年以失败而告终。对这次事件起决定性作用的人物是拿破仑第三的同父异母兄弟沙尔·莫尔尼公爵,他和热克尔银行的财政清理工作直接有关。如果胡阿雷斯拒绝承认1859年的高利率贷款协定,那么这家银行就得宣布破产。但是法国当时无法支持一家瑞士银行提出的要求,因此,莫尔尼设法为热克尔搞到法国国籍,在法国的协助下,热克尔于1865年8月同法国与墨西哥扶植的皇帝马克西米利安达成偿还贷款的协议,第一批偿还的数额为1 266万法郎。热克尔向墨西哥提出的进一步要求,由于莫尔尼于1865年死去而没有得到法国的支持。热克尔于1871年5月26日被巴黎公社社员处决。——680。

- 384 伊斯迈尔帕沙自1867年起任埃及总督,他所奉行的政策导致埃及债台高筑,到1879年,债务已高达1亿英镑,主要是欠英法两国银行的债务。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是贷款条件异常苛刻,短期债务延期支付要付25%的利息,新债务要支付12%或13%的利息。1876年,伊斯迈尔帕沙停止支付国债利息,因而同英法两国发生矛盾,德国皇帝也在1879年5

月 17 日的一个照会中提出抗议。在外国的强大压力下,土耳其苏丹于 1879 年 6 月 26 日罢免了伊斯迈尔帕沙的职务。——681。

- 385** 1880 年夏,美国资产阶级进步报纸《太阳报》编辑约·斯温顿前往法国和英国旅行。8 月间,他在英国的海滨城市兰兹格特拜访了与家人一道正在那里休养的马克思。1880 年 9 月 6 日《太阳报》发表了斯温顿就他的法、英两国之行所写的报道,《卡尔·马克思》就是这篇报道的一部分。这篇访问记同时还被斯温顿收进了他同年撰写的《在法国和英国四十天的观感和札记》一书,对这篇访问记所加的标题是《带来地震的人——卡尔·马克思》。美国进步杂志《群众与主流》曾在 1955 年 3 月号重新刊载斯温顿的这篇访问记,标题是《卡尔·马克思》,个别地方与原本有差异。

在斯温顿访问了马克思以后,马克思曾同他保持过一段时间的通信来往。1880 年 11 月 4 日马克思应斯温顿的请求给他寄去了《资本论》第 1 卷的法文版,并在信中写道:“谢谢您在《太阳报》上所写的友好的文章”。

1883 年 3 月 19 日,斯温顿在纽约工人哀悼马克思逝世的集会上发表了演说,演说里也包含了这篇访问记的内容。演说刊登在 1883 年 4 月 5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5 号上以及 1883 年 4 月 7 日《真理报》(旧金山)上。——684。

- 386** 这篇简讯是由威·李卜克内西于 1881 年 8 月 20 日左右撰写的,发表在 1881 年 8 月 25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35 号《社会政治评论》栏内,其内容依据了恩格斯 1881 年 8 月 17 日给爱·伯恩施坦的信,信中指出“西班牙人绝非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在马德里有一个非常好的核心(从前的“新马德里联合会”),此外有一些很好的人员,特别是在瓦伦西亚和卡塔卢尼亚的一些不大的工厂城市里;还有一些分散在各地的人员。”因此,本文应该看作是在恩格斯参与下完成的。——688。

- 387** 这篇由威·李卜克内西执笔发表在 1881 年 8 月 25 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35 号《社会政治评论》栏里的文章,几乎完全摘引自恩格斯 1881 年 8 月 17 日给爱·伯恩施坦的信中谈及的伦敦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内容。从行文的结构来看几乎未作任何改动,因此可以说本文是在恩格斯的参与下写成的。

恩格斯所提供的这些资料主要来源于保·拉法格。拉法格有机会接触到曾经出席这次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的代表,这些人给他提供了可

靠的消息。——689。

388 伦敦的无政府主义者报刊《自由》(1881年7月23日第30号)在一篇对“1881年7月14—19日伦敦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所作的报道中声称,参加这次会议的有45名持80份委托书的代表,代表了59个联合会,320个支部,和德国、奥匈帝国、瑞士、法国、比利时、荷兰、西班牙、意大利、俄国、英国、塞尔维亚、土耳其、埃及、墨西哥和美国等国家。——689。

389 这次会议于1881年7月19日在克利夫兰大厅举行。

1881年7月21和25日,议员博莱斯和贝林厄姆在下议院就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向英国政府提出质询。恩格斯可能是从1881年7月22和26日《泰晤士报》第30253和30256号上的有关报道获悉这一情况的。——690。

390 此次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在会上发言时一律不用真名实姓,而仅用编号来代替。——690。

391 1881年8月3—9日在伦敦举行了第七次国际医学代表大会。会上提出了对动物进行活体解剖的问题。一些资产阶级报刊在保护动物的幌子下发动了反对活体解剖的运动,代表大会针锋相对地捍卫活体解剖,枢密院的卫生视察员约·西蒙的发言揭露了这一运动的伪善性质。这篇讲话发表在伦敦—纽约的《自然界》杂志第24卷第616期上。

恩格斯在1881年8月27日给考茨基的信中指出“这是医学科学对资产阶级的真正的起诉书”,并指示考茨基,把这个发言摘录出来写成文章。本文经考茨基执笔写成,其中一段基本上引用了恩格斯这封信的有关内容。因此,本文被看作是在恩格斯的参与下完成的。

这篇文章完稿于1881年9月中,载于1881年9月2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9号上。——691。

392 枢密院产生于13世纪,是英国国王属下的最高咨议机构,由封建贵族的代表及宗教界的上层人士组成,在治理国家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随着议会制的发展以及内阁权力的加强,枢密院逐渐失去了作用。枢密院设有许多从事科学考察和研究的委员会。——692。

人 名 索 引

A

- 阿伯丁伯爵, 乔治·汉密尔顿·戈登(Aberdeen, George Hamilton Gordon, Earl of 1784—1860)——英国国务活动家, 托利党人, 1850年起为皮尔派领袖, 曾任外交大臣(1828—1830和1841—1846)、殖民和陆军大臣(1834—1835)和联合内阁首相(1852—1855)。——157、159。
- 阿伯特·爱德华——见爱德华。
- 阿卜杜尔·哈密德二世(Abdul Hamid II 1842—1919)——土耳其苏丹(1876—1909)。——153。
- 阿卜杜尔·卡迪尔贝伊(Abdul-Kader Bey[Abdul Kader Bey])——土耳其国务活动家, 君士坦丁堡和安纳托利亚的最高审判官, 阿德里安堡俄土和平谈判(1829)的全权代表。——158。
- 阿蒂娅(Atia)——尤利娅的女儿, 凯撒的外甥女, 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屋大维)的母亲。——551。
- 阿尔伯特(Albert 1828—1902)——萨克森国王(1873—1902)。——114。
- 阿尔米纽斯(Arminius 公元前17—公元21)——日耳曼族凯鲁斯奇人的领袖, 曾领导日耳曼部落反对罗马人的斗争, 并于公元9年在条顿堡林山中击败了罗马人。——217—222、224。
- 阿尔宁(Arnim)——勃兰登堡的贵族世家。——79。
- 阿尔诺德, 克里斯托夫·弗里德里希·威廉(Arnold, Christoph Friedrich Wilhelm 1826—1883)——德国法学家和著作家; 著有《德意志的古代》一书。——283、295、302、304、308—312。
- 阿格利巴(马可·维普萨尼·阿格利巴)(Marcus Vipsanius Agrippa 公元前63左右—12)——罗马统帅和国务活动家, 公元前21年起成为奥古斯都的共同执政者。——209、210、212。

- 阿克索(Haxo)——法国医生,从事保健和社会救济方面的工作。——666。
- 阿里奥维斯特(Ariovist 死于公元前 58 和 54 之间)——日耳曼族苏维汇人部落的首长,曾抗击凯撒。——199、200。
- 阿米亚努斯·马尔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 约 332—400)——罗马历史学家,生于叙利亚,《历史》一书的作者,该书包括公元 96—378 年的罗马历史。——258。
- 阿那克萨哥拉(克拉左门的)(Anaxagoras of Klazomenae 公元前 500 左右—428)——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371。
- 阿纳斯塔西乌斯一世(Anastasios[Anastasius]I 430 左右—518)——拜占庭皇帝(491—518)。——234。
- 阿普尔加思,罗伯特(Applegarth, Robert 1834—1924)——英国工联主义运动改良派领袖,职业是红木工,粗细木工联合会总书记(1862—1871),工联伦敦理事會理事(1863 年起),1865 年起为国际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8—1872);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代表,改革同盟和工人代表同盟的领导人之一;1871 年拒绝在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上签名;后脱离工人运动。——643。
- 阿奇,约瑟夫(Arch, Joseph 1826—1919)——英国农业工人,政治家;沃里克郡农业工人联盟和全国农业工人联盟创始人之一,1872 年起先后任全国农业工人联盟书记和主席;议会议员(1892—1902)。——123、126—127。
- 阿斯普雷纳斯(鲁齐乌斯·诺尼乌斯·阿斯普雷纳斯)(Lucius Nonius Asprenas 公元前 28 左右—公元前 30)——罗马国务活动家和统帅,曾参加对日耳曼人的历次战争;作为瓦鲁斯的副将,挽救阿利索附近罗马军队免遭覆灭。——217、220。
- 埃拉赫,弗兰茨·冯(Erlach, Franz von 1819—1889)——瑞士军官和军事著作家;1870—1871 年普法战争时期为驻德国大本营观察员。——111。
- 埃尔曼,阿尔弗勒德(Herman, Alfred 1843—1890)——比利时雕刻家,比利时工人运动活动家,国际比利时支部的组织者(1868)和列日支部领导成员(1871 年以前),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比利时通讯书记(1871—1872),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曾加入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少数派(1872)并脱离国际的活动;1885 年成为比利时工人党党员。——643。
- 埃卡留斯,约翰·格奥尔格(Eccarius, Johann Georg 1818—1889)——德国裁缝

- 和新闻工作者；国际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工人政论家；侨居伦敦，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领导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2)，总委员会总书记(1867—1871年5月)，美国通讯书记(1870—1872)，国际各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代表；1872年以前支持马克思，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后成为英国工联的改良派领袖，后为工联主义运动的活动家。——643。
- 埃瓦尔德，格奥尔格·亨利希·奥古斯特(Ewald, Georg Heinrich August 1803—1875)——德国哲学家和东方学家，圣经的研究者和批评家，“格丁根七贤”之一，国会议员(1867—1875)。——552。
- 矮子丕平——见丕平(矮子)。
- 艾内恩，恩斯特(Eynern, Ernst 1838—1906)——德国政治活动家和商人，1879年起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民族自由党人。——586。
- 艾希霍恩，约翰·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Eichhorn, Johann Albrecht Friedrich 1779—1856)——普鲁士政治家，曾在施泰因和哈登堡内阁担任多种职务，积极参与关税同盟的建立，1840—1848年任宗教事务、教育和卫生大臣，同时为书报检查三大臣之一。——86。
- 爱德华(阿伯特·爱德华)(Edward[Albert Eduard]1841—1910)——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儿子，威尔士亲王，1901年起英国国王，称爱德华七世。——624。
- 爱因哈德(爱金哈特)(Einhardus[Eginhart]770左右—840)——法兰克历史编纂学家，查理大帝传记的作者。——261。
- 安·斯图亚特(Anna[Ann, Anne]Stuart 1665—1714)——英国女王(1702—1714)。——561。
- 奥迪冈，阿尔芒(Audiganne, Armand 1814—1875)——法国政论家。——666。
- 奥顿诺凡-罗萨，耶利米(O'Donovan Rossa, Jeremiah 1831—1915)——爱尔兰芬尼社的创建人和领导人，《爱尔兰人民》报的出版者(1863—1865)；1865年被捕，被判处无期徒刑，1870年获释，不久流亡美国，在那里领导芬尼社；80年代脱离政治活动。——588。
- 奥尔，伊格纳茨(Auer, Ignaz 1846—1907)——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职业是鞍匠；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曾多次当选为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77—1878、1880—1881、1884—1887和1890—1907)，晚年为改良主义者。——5、363、511、653。
- 奥尔洛夫伯爵，阿列克谢·费多罗维奇(Орлов, Алексей Федорович, граф 1786—

- 1861)——俄国将军、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代表俄国同土耳其签订阿德里安堡条约(1829)和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1833),曾率领俄国代表团出席巴黎会议(1856),曾任国务会议和大臣委员会主席(1856—1860),农民事务秘密委员会委员和农民事务总委员会主席;反对废除农奴制。——158。
- 奥尔西尼,费利切(Orsini, Felice 1819—1858)——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争取意大利民族解放和统一的斗争的参加者;因谋刺拿破仑第三(1858)而被处死。——651。
- 奥古斯都(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屋大维)(Augustus[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公元前63—公元14)——罗马皇帝(公元前27—公元14)。——199、201、208、212、213、220—223、228、231、233、551。
- 奥雷尔·德·帕拉丹,路易·让·巴蒂斯特·德(Aurelle de Paladines, Louis-Jean-Baptiste d' 1804—1877)——法国将军,教权主义者,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1854—1855年任法军旅长,普法战争时期(1870—1871)任卢瓦尔军团司令;1871年3月任巴黎国民自卫军总司令;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110—113。
- 奥利维埃,埃米尔(Ollivier, Émile 1825—1913)——法国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帝国时期为立法团议员(1857年起);60年代末为波拿巴主义者,曾任政府首脑(1870年1—8月)。——681。
- 奥罗修斯,保罗(Orosius, Paulus 约380—420)——罗马历史学家,原系西班牙人;世界史概要《反多神教徒七书》的作者。——211。
- 奥斯本,约翰(Osborne, John)——英国工联主义者,职业是抹灰工;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7),积极参加改革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和工人代表同盟的活动,改良主义者。——155。
- 奥维狄乌斯(普卜利乌斯·奥维狄乌斯·纳佐)(Publius Ovidius[Ovid]Naso 公元前43—公元18)——古罗马诗人,公元8年因对皇帝奥古斯都的政策不满被驱逐出罗马。——221。
- 奥哲尔,乔治(Odger, George 1820—1877)——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职业是鞋匠,工联伦敦理事会创建人之一,1862—1872年为理事会书记,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和工人代表同盟盟员,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1)和主席(1864—1867),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的参加者,在争取英国选举改革的斗争期间与资产阶级有勾结;1871年拒绝在总委

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上签名并退出总委员会。——323。

B

巴贝夫,格拉古(Babeuf, Gracchus 原名弗朗索瓦·诺埃尔 François Noël 1760—1797)——法国革命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1796年是平等派密谋的组织者;密谋失败后被处死。——373。

巴尔福伯爵,阿瑟·詹姆斯(Balfour, Arthur James, Earl of 1848—1930)——英国国务活动家和哲学家;议会议员(1874—1922);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1887—1891);保守党议会党团领袖(1891—1911),首相(1902—1905)。——502。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创始人和理论家;1840年起侨居国外,曾参加德国1848—1849年革命;1849年因参与领导德累斯顿起义被判死刑,后改为终身监禁;1851年被引渡给沙皇政府,囚禁期间向沙皇写了《忏悔书》;1861年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往伦敦;1868年参加第一国际活动后,在国际内部组织秘密团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妄图夺取总委员会的领导权;由于进行分裂国际的阴谋活动,1872年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第一国际。——5、117—120、150、167、169、322、547、610、686。

巴里,马尔特曼(Barry, Maltman 1842—1909)——英国新闻工作者,社会主义者,国际会员,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1873),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巴枯宁派和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国际停止活动后仍继续参加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同时为保守党的报纸《旗帜报》撰稿,在90年代支持所谓的保守党人“社会主义派”。——628。

巴特比,昂塞尔姆·波利卡普(Batbie, Anselme - Polycarpe 1828—1887)——法国法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奥尔良党人,国民教育部部长(1873),1876年起为参议员。——149。

巴特里(Buttery, G. H.)——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643。

白恩士,莉迪娅——见恩格斯,莉迪娅。

白尔尼,卡尔·路德维希(Börne, Karl Ludwig 1786—1837)——德国政论家和批评家,革命民主主义者;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代表;写有向德国人介绍法国革命事件的《巴黎来信》;晚年成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拥护者。——316—317。

- 白拉克, 威廉(Bracke, Wilhelm 1842—1880)——德国出版商和书商, 全德工人联合会不伦瑞克支部创始人(1865), 1867年起为国际会员, 1868—1869年领导全德工人联合会中的反对派; 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创始人(1869)和领导人之一; 曾进行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 不伦瑞克白拉克出版社的创办人(1871), 《不伦瑞克人民之友》(1871—1878)和《人民历书》(1875—1880)的出版者; 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成员(1877—1879);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5、117、344、363。
- 鲍曼, 奥古斯特(Baumann, August)——德国排字工人, 社会民主党人; 1877年在柏林参加国会竞选; 1878年和1880年先后被驱逐出柏林和汉堡, 流亡美国。——653。
- 鲍威尔, 布鲁诺(Bauer, Bruno 1809—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宗教和历史研究者, 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1834年在柏林大学、1839年在波恩大学任非公聘神学教师, 1842年春因尖锐批判圣经而被剥夺教职; 1842年为《莱茵报》撰稿人; 早期为黑格尔正统派的拥护者, 1839年后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理论家, 自我意识哲学的代表; 1837—1842年初为马克思的朋友; 1842年夏天起为“自由人”小组成员; 1848—1849年革命后为《新普鲁士报》(《十字报》)的撰稿人; 1866年后为民族自由党人; 写有一些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129、549—553。
- 贝克尔, 奥斯卡(Becker Oskar 1839—1868)——莱比锡大学的学生; 1861年因谋刺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被判20年徒刑, 1866年获赦。——333。
- 贝克尔, 伯恩哈德(Becker, Bernhard 1826—1882)——德国政论家和历史学家, 拉萨尔派; 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 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大会代表, 后任主席(1864—1865); 1870年起为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党员; 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 1874年以后脱离工人运动。——7。
- 贝克尔, 海尔曼·亨利希(Becker, Hermann Heinrich 人称“红色贝克尔”der“rote Becker”1820—1885)——德国地方法院见习法官和政论家, 科隆工人和业主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 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1848—1849), 《西德意志报》发行人(1849年5月—1850年7月); 1850年底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 被判5年徒刑; 60年代是进步党人, 后为民族自由党人; 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62—1866), 国会议员(1867—1874); 1875年起为科隆市长。——74。

- 贝克尔, 约翰·菲利浦(Becker, Johann Philipp 1809—1886)——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 职业是制刷工, 1848年加入瑞士籍; 三月革命以前的民主运动和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以瑞士军队军官身份参加了反对宗得崩德的战争; 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指挥巴登民团; 1848—1849年革命后转向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立场, 瑞士“革命中央”成员(1850), 国际日内瓦第一支部的创建人(1864), 国际日内瓦支部委员会、德国和瑞士德语区中央委员会主席(1865), 国际德语区支部主席(1866年起), 在瑞士的国际德国人支部组织者, 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国际各次代表大会代表, 《先驱》杂志出版者和编辑(1866—1871)和《先驱者》杂志编辑(1877—1882);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186。
- 贝克斯, 皮埃尔·让(Beckx, Pierre-Jean 1795—1887)——比利时牧师, 耶稣会的首领(1853—1884)。——648。
- 贝里耶, 皮埃尔·安东(Berryer, Pierre-Antoine 1790—1868)——法国律师和政治家, 七月王朝时期是正统主义反对派领袖,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51)。——673。
- 贝列拉, 雅克·埃米尔(Pérelle, Jacques-Émile 1800—1875)——法国银行家, 20—30年代为圣西门主义者; 第二帝国时期为波拿巴主义者, 立法团议员; 1852年与其弟伊·贝列拉创办股份银行动产信用公司。——417、421。
- 贝列拉, 伊萨克(Pérelle, Isaac 1806—1880)——法国银行家, 20—30年代为圣西门主义者, 第二帝国时期为波拿巴主义者, 立法团议员; 1852年与其兄埃·贝列拉一起创办股份银行动产信用公司; 写有信贷方面的著作。——417、421。
- 倍倍尔, 奥古斯特(Bebel, August 1840—1913)——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 职业是旋工; 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创始人之一, 1867年起为主席; 第一国际会员, 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 1869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 《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办人之一; 曾进行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 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 捍卫巴黎公社; 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 第二国际的活动家, 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5、329—330、333、339、340、344—350、363、526。
- 比肯斯菲尔德伯爵——见迪斯累里, 本杰明。
- 比尼亚米, 恩里科(Bignami, Enrico 1844—1921)——意大利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活动家, 新闻工作者, 共和党人, 加里波第进军的参加者; 《平民报》的创办

- 人和编辑(1868—1883);1871年10月起与恩格斯通信;曾为建立意大利独立的工人政党进行斗争,反对无政府主义,1898年流亡瑞士。——114。
- 比诺,让·马蒂亚尔(Bineau, Jean - Martial 1805—1855)——法国工程师和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曾任公共工程部长(1849—1851),财政大臣(1852—1855)。——673。
- 俾斯麦公爵,奥托(Bismarck [Bismark], Otto Fürst von 1815—1898)——普鲁士和德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普鲁士容克的代表;曾任驻彼得堡大使(1859—1862)和驻巴黎大使(1862);普鲁士首相(1862—1872和1873—1890),北德意志联邦首相(1867—1871)和德意志帝国首相(1871—1890);1870年发动普法战争,1871年支持法国资产阶级镇压巴黎公社;主张以“自上而下”的方法实现德国的统一;曾采取一系列内政措施,以保证容克和大资产阶级的联盟;1878年颁布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22、23、60、67、149、153、159、165、185—187、325、328、335、340、342—343、352、354、358、415、418、419、420、421、424、505、521、524—526、562、574、618、639、648、652—653、655。
- 庇护九世(Pius IX [Pio Nono]世俗名乔万尼·马里亚·马斯塔伊-费雷蒂 Giovanni Maria Mastai - Ferretti 1792—1878)——罗马教皇(1846—1878)。——325。
- 毕洛夫-库梅洛夫,恩斯特·哥特弗里德·格奥尔格·冯(Bülow - Cumberow, Ernst Gottfried Georg von 1775—1851)——普鲁士作家和政治家;普鲁士容克的代言人。——79。
- 毕舍,菲利浦·约瑟夫·本杰明(Buchez, Philippe - Joseph - Benjamin 1796—1865)——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21年起为圣西门的学生,七月革命后是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思想家;国民议会议长(1848)。——26。
- 毕兴,安东·弗里德里希(Büsching, Anton Friedrich 1724—1793)——德国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448。
- 宾茨,卡尔(Binz, Carl 1832—1913)——德国医生和药理学家,1862年起为波恩大学编外讲师,波恩药理学院的创办人(1869)。——49。
-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
- 波拿巴(Bonaparte, D.)——670。
- 波拿巴,拿破仑·约瑟夫·沙尔·保尔,拿破仑亲王(Bonaparte, Napoléon - Joseph - Charles - Paul, prince Napoléon 又名日罗姆 Jérôme, 绰号普隆-普隆和

- 红色亲王 Plon-Plon et Prince rouge 1822—1891)——法国政治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1854年在克里木指挥一个师,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任军长;普法战争初期曾参加关于法意反普同盟的谈判;日·波拿巴的儿子,拿破仑第三的堂弟,其兄死后(1847)改名日罗姆。——132、364。
- 伯恩施太德,阿达尔伯特(Börnstedt, Adalbert 1808—1851)——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创办人和编辑(1847—1848),1848年二月革命后是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领导人;曾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后被开除出同盟(1848年3月);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组织者之一;曾与警察局有联系。——438。
- 伯恩施坦,爱德华(Bernstein, Eduard 1850—1932)——德国银行雇员和政论家,1872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代表(1875),卡·赫希柏格的秘书(1878),1880年结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后者的影响下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拥护者;《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1881—1890);1896年起成为修正主义理论的创始人。——345、349—351、354、355、689。
- 伯纳比,弗雷德里克·古斯塔夫斯(Burnaby, Frederick Gustavus 1842—1885)——英国军官和环球旅行家。——621。
- 伯特,托马斯(Burt, Thomas 1837—1922)——英国矿工;诺森伯兰矿工工会的创建人(1862)和书记(1865—1913);议会议员(1874—1918);支持自由党政策。——155。
- 柏西阿斯(奥鲁斯·柏西阿斯·弗拉克斯)(Aulus Persius Flaccus 34—62)——罗马讽刺诗人,曾斥责当时罗马社会的堕落风气,斯多亚派哲学的追随者。——555。
- 柏修斯(Perseus 公元前212—166)——最后一个马其顿王(公元前179—168)。——198。
- 勃兰登堡伯爵,弗里德里希·威廉(Brandenburg, Friedrich Wilhelm Graf von 1792—1850)——普鲁士将军和国务活动家;内阁首脑(1848年11月—1850年11月)。——98。
- 博博雷金,彼得·德米特里耶维奇(Боборыкин, Пётр Дмитриевич 1836—1921)——俄国作家,彼得堡科学院名誉院士(1900);主要侨居国外。——626。
- 博利厄(Beaulieu, C.)——法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666。

- 博伊斯特, 弗里德里希·卡尔·路德维希·冯(Beust, Friedrich Karl Ludwig von 1817—1899)——普鲁士军官,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因政治信仰退伍; 1848年是科隆工人联合会委员,《新科隆日报》的编辑(1848年9月—1849年2月); 1848年10月代表科隆工人联合会出席柏林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 在会上捍卫了几乎同《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相一致的纲领;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为军事委员会委员, 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 任教育学教授, “革命集中”的成员, 1867年国际工人协会苏黎世支部的创建人之一, 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1867)的参加者; 恩格斯的表妹安娜的丈夫。——307。
- 布恩, 马丁·詹姆斯(Boon, Martin James)——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职业是机械师; 宪章主义者奥勃莱恩的社会改良主义观点的拥护者,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9—1872), 土地和劳动同盟书记,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643。
- 布赫尔, 阿道夫·洛塔尔(Bucher, Adolph Lothar 1817—1892)——普鲁士司法推事和政论家; 1848年是普鲁士制宪议会议员, 属于中间派左翼; 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 柏林《国民报》通讯员; 后为民族自由党人, 俾斯麦的拥护者; 50年代赞同戴·乌尔卡尔特的外交观点。——185—188。
- 布拉德尼克, 弗雷德里克(Bradnick, Frederick)——英国工人,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0—1872), 伦敦代表会议(1871)代表; 海牙代表大会(1872)以后加入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的改良派, 1873年5月30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将他开除出国际。——643。
- 布莱特, 约翰(Bright, John 1811—1889)——英国政治家, 棉纺厂主, 自由贸易派领袖和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 60年代初起为自由党(资产阶级激进派)左翼领袖; 曾多次任自由党内阁的大臣。——124、155、518、531。
- 布莱希勒德, 格尔森·冯(Bleichröder [Bleichroeder], Gerson von 1822—1893)——德国金融家, 柏林一家大银行经理, 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财务方面的私人顾问和从事各种投机活动的经纪人。——417、421。
- 布朗基, 路易·奥古斯特(Blanqui, Louis - Auguste 1805—1881)——法国革命家, 空想共产主义者, 主张通过密谋性组织用暴力夺取政权和建立革命专政; 许多秘密社团和密谋活动的组织者, 1830年七月革命和1848年二月革命的参加者, 秘密的四季社的领导人, 1839年五月十二日起义的组织者, 同年被判处死刑, 后改为无期徒刑; 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法国无产阶级运动的领袖; 巴黎1870年十月三十一日起义的领导人, 巴黎公社时期被反动派囚禁在

- 凡尔赛,曾缺席当选为公社委员;一生中 有 36 年在狱中度过。——438。
- 布朗基,日罗姆·阿道夫(Blanqui, Jérôme - Adolphe 1798—1854)——法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说史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路·奥·布朗基的哥哥。——425、666、667。
- 布劳恩,卡尔(Braun, Karl 1822—1893)——德国律师、政治活动家和作家;民族自由党领导人之一,1884 年以后为自由思想党人,国会议员(1868—1887)。——449。
- 布劳纳,泰奥多尔·威廉(Braune, Theodor Wilhelm 1850—1926)——德国日耳曼语文学家,写有许多德语史方面的著作。——283、286、300。
- 布雷基尼,路易·若尔日·乌达尔·弗德里克斯·德(Bréquigny, Louis - Georges - Oudard - Feudrix de 1714—1794)——法国历史学家,中世纪文献的编辑出版者。——263。
- 布林德,卡尔(Blind, Karl 1826—1907)——德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 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1849 年为临时政府成员;与马克思同去伦敦,在那里成为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成员;1849—1850 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撰稿人;50 年代中期起是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60 年代是民族自由党人,普法战争期间和战后为极端沙文主义者。——333、364—366。
- 布卢默,威廉·卡尔·海尔曼·冯(Blume, Wilhelm Karl Hermann von 1835—1919)——普鲁士将军和军事著作家;1870—1871 年普法战争的参加者。——112。
- 布什,尤利乌斯·海尔曼·莫里茨(Busch, Julius Hermann Moritz 1821—1899)——德国神学家和作家;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1870 年为普鲁士外交部新闻编辑;普法战争中为俾斯麦的随员。——655。
- 布斯,弗兰茨·约瑟夫(Buß, Franz Joseph 1803—1878)——德国法学家、政治活动家和著作家;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右派;普鲁士霸权的反对者,教权派;国会议员(1874—1876)。——103。

C

- 查理大帝——见查理一世,查理大帝。
- 查理一世,查理大帝(Charles I, Charlemagne 742—814)——法兰克国王(768—800)和皇帝(800—814)。——258、261、262、266、267、272、274、276、278—

282、575、577

查理二世(Charles II 1630—1685)——英国国王(1660—1685)。——559。

查理二世,秃头(秃头查理)(Charles II, le Chauve[Karl der Kahle]823—877)——

西法兰克王国国王(843—877),皇帝(875—877)。——268—269。

查理十世(Charles X 1757—1836)——法国国王(1824—1830);被1830年的七月革命赶下王位。——159。

查理·马特(Karl Martell, Carolus Martellus, Charles Martel 688左右—741)——

法兰克宫相,715年起是法兰克王国的实际执政者。——261、265、267、272。

查理曼(Carloman[Karlmann]死于754年)——法兰克宫相查理·马特的长子;

奥斯特拉西亚、阿勒曼尼亚和图林根的执政者(741—747)。——290。

查苏利奇,维拉·伊万诺夫娜(Засулич, 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 1851—1919)——俄国民

粹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家,劳动解放社(1883)的创始人之一;后来转到孟什维克立场。——335、453、467、476、481—483。

车尔尼雪夫斯基,尼古拉·加甫里洛维奇(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1828—1889)——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作家和文艺批评家,经济学家,哲学家。——143。

措伊斯,约翰·卡斯帕尔(Zeuß, Johann Kaspar 1806—1856)——德国历史学家

和语言学家。——243—246、250。

D

达尔曼,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Dahlmann, Friedrich Christoph 1785—

1860)——德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者,1829年起为格丁根大学教授,“格丁根七贤”之一,因拒绝宣誓效忠而被赶出格丁根,1842年被聘为波恩大学教授,1848—1849年为预备议会议员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1850年为爱尔福特议会议员,后脱离政治生涯;写有丹麦、德国、英国和法国史方面的著作。——246。

达尔文,查理·罗伯特(Darwin, Charles Robert 1809—1882)——英国自然科学

家,科学的生物进化论的奠基人。——389、402、586、591、594。

达马德——见马茂德-吉拉尔埃丁,达马德帕沙。

戴维斯,约翰·钱德勒·班克罗夫特(Davis, John Chandler Bancroft 1822—1907)

——美国律师和外交家,伦敦《泰晤士报》美国通讯员(1854—1861),助理国务卿(1869—1871和1873—1874),美国驻德国大使(1874—1877)。——

643、644。

但丁·阿利格埃里(Dante Alighieri 1265—1321)——意大利诗人。——128。

道金斯,威廉·博伊德(Dawkins, William Boyd 1837—1929)——英国学者,地质学家,人类学家,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写有关于欧洲原始居民方面的著作。——193、226。

德比伯爵,爱德华·亨利·史密斯·斯坦利(Derby, Edward Henry Smith Stanley, Earl of 1826—1893)——英国国务活动家,保守党人,后为自由党人,曾任外交大臣(1867—1868和1874—1878)。——153、155。

德尔布吕克,马丁·弗里德里希·鲁道夫·冯(Delbrück, Martin Friedrich Rudolf von 1817—1903)——德国法学家和国务活动家;北德意志联邦首相办公厅主任(1867—1871)和德意志帝国首相办公厅主任(1871—1876);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74—1875);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78—1881);自由贸易的拥护者,1876年以前是俾斯麦的亲信之一,后反对俾斯麦的保护关税政策。——57、59—60。

德拉埃,维克多·阿尔弗勒德(Delahaye, Victor - Alfred 1838—1897)——法国工人,蒲鲁东派,1865年起为国际会员,国际巴黎第一支部委员会委员;机械工人工团主席;巴黎公社参加者,公社被镇压后流亡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代表(1871),1879年遇赦后回到法国;圣旺市议会中激进社会党议员(1883—1888)。——643。

德鲁苏斯(尼禄·克劳狄乌斯·德鲁苏斯)(Nero Claudius Drusus 公元前38左右—9)——罗马统帅,于公元前12—9年率领军队远征日耳曼人。——209—213、223。

德穆特,海伦(琳蕻,尼姆)(Demuth, Helene [Lenchen, Nim] 1823—1890)——马克思家的女佣和忠实的朋友。——607、640。

德普勒,马赛尔(Deprez, Marcel 1843—1918)——法国物理学家和电气技师,曾从事远距离输电问题的研究。——597。

狄奥·卡西乌斯(卡西乌斯·狄奥·科克策扬)(Cassius Dio Cocceianus 约150—235)——罗马历史学家,元老院贵族的代表人物,曾用希腊文写了一部八十卷的《罗马史》。——199、210、212、215、218、220、245。

狄德罗,德尼(Diderot, Denis 1713—1784)——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者,法国革命资产阶级的代表,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派领袖;1749年因自己的著作遭要塞监禁。——386。

- 狄更斯, 查理(Dickens, Charles 笔名博兹 Boz 1812—1870)——英国现实主义作家。——641。
- 狄龙, 约翰(Dillon, John 1851—1927)——爱尔兰政治活动家, 爱尔兰土地同盟的领袖之一, 英国议会议员(1880—1883); 80年代曾多次被捕入狱。——525。
- 迪尔克, 查理·温特沃思(Dilke, Sir Charles Wentworth 1843—1911)——英国政治活动家和著作家, 共和主义者, 自由党激进派的领袖之一, 议会议员; 曾任外交副大臣(1880—1882), 地方自治事务大臣(1882—1885)。——502。
- 迪斯累里, 本杰明, 比肯斯菲尔德伯爵(Disraeli[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英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 40年代参加“青年英国”; 托利党领袖, 19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 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8—1859和1866—1868), 内阁首相(1868和1874—1880)。——124、152、500、623、624、626。
- 笛卡儿, 勒奈(Descartes, René 1596—1650)——法国二元论哲学家、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386。
- 蒂尔施, 卡尔(Thiersch, Karl 1822—1895)——德国外科医生和研究者; 曾对霍乱传染进行研究试验。——693。
- 杜邦, 欧仁(Dupont, Eugène 1831左右—1881)——法国工人, 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 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参加者, 1862年起住在伦敦, 1870年起住在曼彻斯特,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2), 法国通讯书记(1865—1871), 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的参加者, 洛桑代表大会(1867)的主席,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代表; 《法兰西信使报》撰稿人, 伦敦法国人支部成员(1868年以前), 曼彻斯特法国支部创建人之一(1870), 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1873), 1874年迁居美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643。
- 杜克罗, 奥古斯特·亚历山大(Ducrot, Auguste - Alexandre 1817—1882)——法国将军, 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一军的师长, 后任第一军军长和巴黎第二军团司令; 镇压巴黎公社时曾参加组织凡尔赛军队的工作; 1817年国民议会议员; 奥尔良党人, 1872—1878年间参与保皇党人企图推翻共和制度的密谋。——149。
- 杜林, 欧根·卡尔(Dühring, Eugen Karl 1833—1921)——德国哲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形而上学者; 在哲学上把唯心主义、庸俗唯

- 物主义和实证论结合在一起;在自然科学和文学方面也有所著述;1863—1877年为柏林大学讲师;1877年因采取反政府的立场被处分;70年代曾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部分党员产生影响。——54,437。
- 杜诺瓦耶,巴泰勒米·沙尔·皮埃尔·约瑟夫(Dunoyer, Barthélemy - Charles - Pierre - Joseph 1786—1862)——法国庸俗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425。
- 杜普拉,安东(Duprat, Antoine 1463—1535)——法国国务活动家,1515年起为首相,1527年起为红衣主教。——676。
- 度申,若尔日(Duchéne, Georges 1824—1876)——法国排字工人和校对员,《人民报》的编辑和出版者。——679。
- 敦克尔,弗兰茨·古斯塔夫(Duncker, Franz Gustav 1822—1888)——德国出版商,资产阶级进步党的活动家,1868年同麦·希尔施一起创建改良主义工会(1868—1933),人称希尔施—敦克尔工会。——132。
- 多尔富斯,让(Dollfus, Jean 1800—1887)——法国厂主,经济学家;资产阶级慈善家,米卢斯市长。——662,663。
- 多米齐安(梯特·弗拉维·多米齐安)(Titus Flavius Domitianus [Domitian] 51—96)——罗马皇帝(81—96)。——225。
- 多米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鲁齐乌斯·多米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Lucius Domitius Ahenobarbus 死于25年)——罗马国务活动家和统帅,1世纪初曾数次远征日耳曼尼亚。——199,212,214。

E

- 恩格尔,恩斯特(Engel, Ernst 1821—1896)——德国统计学家,1860—1882年任柏林普鲁士王国统计局局长;国会议员(1867—1870)。——532。
- 恩格尔哈特,赫尔维希·康拉德·克里斯蒂安(Engelhardt, Helvig Conrad Christian 1825—1881)——丹麦考古学家,弗伦斯堡北欧古物博物馆馆长。——235。
- 恩格斯,莉迪娅(莉希)(Engels, Lydia [Lizzy, Lizzie] 父姓白恩士 Burns 1827—1878)——爱尔兰女工,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玛丽·白恩士的妹妹,恩格斯的第二个妻子。——327。

F

- 法耳梅赖耶尔,雅科布·菲力浦(Fallmerayer, Jakob Philipp 1790—1861)——德

- 国历史学家、旅行家、东方学家；1848年起为慕尼黑大学历史学教授；写有关于希腊历史方面的著作。——555。
- 法夫尔，克劳德·加布里埃尔·茹尔(Favre, Claude - Gabriel - Jules 1809—1880)——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之一；第二共和国时期先后任内务部秘书长、外交部副部长、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60年代为立法团议员，国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的外交部长(1870—1871)，曾同德国进行关于巴黎投降及签订和约的谈判。——109、323。
- 范派顿，菲利浦(Van Patten, Philipp)——美国资产者，曾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76年起是美国工人党全国书记，1879年起是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书记；1883年起为国家官员。——608。
- 菲拉莱泰斯——见约翰·奈波穆克·玛丽·约瑟夫。
- 菲勒克，路易(Viereck, Louis 1851—1921)——德国出版商和新闻工作者，社会民主党人，在实施反社会党人法时期是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84—1887)；机会主义派的主要代表，1886年侨居美国，脱离社会主义运动。——345、346、349—352、354。
- 菲利浦二世(Felipe [Philipp] II 1527—1598)——西班牙国王(1556—1598)。——222。
- 斐洛(亚历山大里亚的)(Philo of Alexandria, Philo Judaeus 约公元前20—公元前54)——亚历山大里亚派犹太人宗教哲学的主要代表，对基督教神学的形成曾产生很大影响。——551、552。
- 费希特，约翰·哥特利布(Fichte, Johann Gottlieb 1762—1814)——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主观唯心主义者。——587。
- 费泽，卡尔·爱德华(Vehse, Karl Eduard 1802—1870)——德国法学家和历史学家，写有四十八卷《宗教改革以来的德国宫廷史》(1851—1860)和其他著作；1852年与马克思结识，格奥尔格·维尔特的熟人。——447。
- 伏尔泰(Voltaire 原名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 François - Marie Arouet 1694—1778)——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作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448、450、641。
- 符卢勃列夫斯基，瓦列里(Wróblewski, Walery 1836—1908)——波兰革命民主主义者，1863—1864年波兰解放起义领导人，起义失败后流亡法国，1870年是国民自卫军成员，巴黎公社的将军，公社失败后流亡伦敦，被缺席判处死

- 刑；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波兰通讯书记(1871—1872)，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积极参加反对巴枯宁派的斗争，1880年大赦后回到法国。——618、643。
-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Franz-Joseph I 1830—1916)——奥地利皇帝(1848—1916)。——325、447。
- 弗兰格尔伯爵，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恩斯特(Wrangel, Friedrich Heinrich Ernst Graf von 1784—1877)——普鲁士将军，1848年11月参加普鲁士反革命政变，驱散普鲁士国民议会；1856年任陆军元帅；丹麦战争时期(1864)任普奥联军总司令。——73。
- 弗兰克尔，莱奥(Frankel, Leo 1844—1896)——匈牙利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首饰匠；60年代去伦敦，后迁居法国；1867年在里昂成为国际会员，住在巴黎；巴黎德国人支部创建人之一(1870)，巴黎联合会委员会成员和书记；巴黎公社委员，公社劳动、工商和财政委员会委员，后流亡伦敦；伦敦社会研究小组成员；1872年在巴黎被缺席判处死刑；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奥地利—匈牙利通讯书记；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1876年返回匈牙利，匈牙利全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1880)，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副主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38、643
- 弗里布尔，厄内斯特·爱德华(Fribourg, Ernest-Édouard)——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雕刻工，后为商人；右派蒲鲁东主义者；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党会议的参加者，国际巴黎支部的领导人之一，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代表；各种工人报纸编辑部成员；1867年作为记者参加洛桑代表大会；1871年出版敌视国际和巴黎公社的《国际工人协会》一书。——321。
- 弗里茨舍，弗里德里希·威廉(Fri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1825—1905)——德国社会民主运动和工会运动的改良主义活动家，职业是烟草工人；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全德雪茄烟工人联合会创始人之一，并任主席至1868年；爱森纳赫代表大会(1869)代表，1875年成为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国会议员(1868—1871和1877—1881)；1881年流亡美国，后脱离政治活动。——363、653。
- 弗里德里希二世，弗里德里希大帝(Friedrich II, Friedrich der Große 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447—450。

- 弗里德里希 - 亨利希 - 路德维希(亨利希亲王)(Friedrich Heinrich Ludwig[Prinz Heinrich]1726—1802)——普鲁士亲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弟弟。——449。
- 弗里德里希 - 威廉(Friedrich - Wilhelm 1831—1888)——普鲁士王储,德国将军,1866年普奥战争时期任普鲁士第二军团司令,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三军团司令,1870年10月起为元帅;1888年起为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皇帝,称弗里德里希三世。——334、656。
- 弗里德里希 - 威廉二世(Friedrich - Wilhelm II 1744—1797)——普鲁士国王(1786—1797)。——448、449。
- 弗里德里希 - 威廉三世(Friedrich - Wilhelm III 1770—1840)——普鲁士国王(1797—1840)。——128、156、159、407、444。
- 弗里德里希 - 威廉四世(Friedrich - Wilhelm IV 1795—1861)——普鲁士国王(1840—1861)。——41、78、86、131。
- 弗路朗斯,古斯塔夫·保尔(Flourens, Gustave - Paul 1838—1871)——法国革命家和自然科学家,布朗基主义者,曾因迫害而离开法国,1868年回国后,为《马赛曲报》撰稿人;1870年被流放,同年3月逃往伦敦,9月重回法国,1870年10月31日和1871年1月22日巴黎起义的领导者之一;巴黎公社委员,公社军事委员会委员;1871年4月3日被凡尔赛分子杀害。——589。
- 弗洛孔,斐迪南(Flocon, Ferdinand 1800—1866)——法国政治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改革报》编辑,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山岳党人;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法国。——130。
- 弗洛鲁斯(普卜利乌斯·安尼乌斯·弗洛鲁斯)(Publius Annii Florus 2世纪)——罗马历史学家,《梯特·李维论七百年来战争概要前后书》的作者。——211。
- 福尔肯贝克,马克西米利安·弗兰茨·奥古斯特·冯(Forckenbeck, Maximilian Franz August von 1821—1892)——德国法学家和政治家,1861年为德国进步党的创建人之一,1867年为民族自由党的创建人之一;国会议员(1867—1887),后任国会议长(1874—1879)。——328。
- 福格特,奥古斯塔(Vogt, Auguste)——卡·福格特的妹妹。——105。
- 福格特,卡尔(Vogt, Karl 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唯物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6月是帝国摄政之一;1849年逃往瑞士,50—60年代是路易·波拿巴雇佣的密探。——104、105、132、133。

- 福斯特, 威廉·爱德华(Forster, William Edward 1818—1886)——英国工厂主和政治家, 自由党人, 议会议员(1861年起), 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1880—1882); 奉行残酷镇压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155、524、526。
- 傅立叶, 沙尔(Fourier, Charles 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373、375、379、380、402、404、405、587。
- 富尔德, 阿希尔(Fould, Achille 1800—1867)——法国银行家和政治家, 奥尔良党人, 后为波拿巴主义者;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1849), 任财政部长(1849—1851), 财政大臣(1861—1867), 国务大臣和皇廷事务大臣(1852—1860)。——417。

G

- 盖布, 威廉·莱奥波德·奥古斯特(Geib, Wilhelm Leopold August 1842—1879)——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汉堡的书商; 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 1869年爱森纳赫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和社会民主工党创始人之一, 党的财务委员(1872—1878), 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74—1877)。——5。
- 盖尔马尼库斯(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盖尔马尼库斯)(Gaius Iulius Caesar Germanicus [Germanikus] 公元前15—公元19)——罗马统帅, 曾数次远征日耳曼人。——204、219、223—224。
- 盖拉尔, 本杰明·埃德姆·沙尔(Guéraud, Benjamin - Edme - Charles 1797—1854)——法国历史学家, 写有许多法国中古史方面的著作。——264、280。
- 甘必大, 莱昂(Gambetta, Léon 1838—1882)——法国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国防政府的成员(1870—1871), 该政府中图尔代表团团长; 各省武装反抗普鲁士的组织者, 1871年创办《法兰西共和国报》; 曾任内阁总理兼外交部长(1881—1882)。——110、112、113、625、634、670。
- 哥尔茨男爵, 泰奥多尔·亚历山大·路德维希·格奥尔格(Goltz, Theodor Alexander Ludwig Georg Freiherr von der 1836—1905)——德国农学家, 《德意志帝国农业工人状况》一书的作者。——55。
- 歌德, 约翰·沃尔夫冈·冯(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1749—1832)——德国诗人、作家、思想家和博物学家。——24、395、641。
- 戈登, 罗伯特(Gordon, Robert 1791—1847)——英国外交家, 曾任驻君士坦丁堡(1828—1831)和驻维也纳(1841—1846)特命全权大使; 阿伯丁伯爵的弟弟。——157、159。

- 戈尔洛夫, 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 (Горл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Павлович 1830—1905)——俄国将军和军事理论家, 驻伦敦使馆武官(1873—1882)。——619—621、626、629、630。
- 戈洛瓦乔夫, 尼古拉·尼基季奇 (Головачев, Николай Никитич 1825—1873 左右)——俄国将军, 1867 年为突厥斯坦的军事总督, 征服布哈拉(1868)和希瓦远征(1873)的参加者。——619。
- 戈申, 乔治·乔基姆, 霍克赫斯特子爵 (Goschen, George Joachim, Viscount of Hawkhurst 1831—1907)——英国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 原系德国人; 初为自由党人, 1863 年起为议会议员, 曾多次参加政府。——155。
- 格尔拉赫, 安德烈亚斯·克里斯蒂安 (Gerlach, Andreas Christian 1811—1877)——德国兽医, 汉诺威兽医学校校长(1859—1870), 后来任柏林兽医学校校长。——693。
- 格莱斯顿, 威廉·尤尔特 (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英国国务活动家, 托利党人, 后为皮尔分子, 19 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 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5 和 1859—1866)和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 和 1892—1894)。——30、59、153、155、502、526、588、619—632。
- 格兰特-达夫, 蒙特斯图亚特·埃尔芬斯通 (Grant Duff, Sir Mountstuart Elphinstone 1829—1906)——英国国务活动家, 自由党人; 议会议员(1857—1881), 印度事务副大臣(1868—1874 和 1880—1881); 马德拉斯总督(1881—1886)。——654。
- 格雷戈里一世 (Gregorius I 540—604)——罗马教皇(590—604)。——263。
- 格林, 雅科布·路德维希·卡尔 (Grimm, Jacob Ludwig Karl 1785—1863)——德国语文学家和文化史学家, 柏林大学教授; 温和的自由主义者; 1848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中间派; 比较历史语言学的奠基人, 第一部德语比较语法的作者; 写有德国语言史、法学史、神话史和文学史方面的著作; 1852 年与其弟威·卡·格林合力开始出版《德语辞典》。——207—208、243、245—249、251、280、283、288、290、307。
- 贡特朗 (Guntram 525 左右—593)——勃艮第国王(561—593)。——262、267。
- 古斯塔夫三世 (Gustaf III 1746—1792)——瑞典国王(1771—1792)。——449。

II

哈德良 (普卜利乌斯·埃利乌斯·哈德良) (Publius Aelius Hadrianus 76—

- 138)——罗马皇帝(117—138)。——225。
- 哈科特,威廉·乔治·格兰维尔·弗农(Harcourt, Sir William George Granville Vernon 1827—1904)——英国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1868—1880),内务大臣(1880—1885),财政大臣(1886、1892—1894和1894—1895);自由党的领袖(1894—1898)。——155。
- 哈克斯特豪森男爵,奥古斯特·弗兰茨(Haxthausen, August Franz Freiherr von 1792—1866)——普鲁士官员和作家,联合议会议员(1847—1848),后为普鲁士第一议院议员;写有描述普鲁士和俄国土地关系中当时还残存的公社土地所有制方面的著作。——140。
- 哈里斯,乔治(Harris, George)——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前宪章主义者,奥勃莱恩的信徒,全国改革同盟成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9—1872),总委员会财务书记(1870—1871)。——643。
- 哈纳肯,卡尔·奥古斯特·伯恩哈德·海尔曼·冯(Hanneken, Karl August Bernhard Hermann von 1810—1886)——普鲁士军官和军事著作家。——110。
- 哈赛尔曼,威廉(Hasselmann, Wilhelm 1844—1916)——德国编辑,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1867—1871),《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1871—1875),1875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国会议员(1874—1876和1878—1880),1878年为无政府主义小组领导人,1880年被开除出党。——653。
- 哈廷顿侯爵,斯宾塞·康普顿·卡文迪什,德文希尔公爵(Hartington, Spencer Compton Cavendish, Marquess of, Duke of Devonshire 1833—1908)——英国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1857年起为议会议员,自由党的领袖(1875—1880),后为保守党人;陆军大臣(1882—1885)。——155。
- 海奈,莫里茨(Heyne, Moritz 1837—1906)——德国日耳曼语文学家,写有许多德语史方面的著作,出版过古德语和哥特语文献;格林兄弟主编的第一部德语史辞典的编纂者之一。——283、284、293。
- 海涅,亨利希(Heine, Heinrich 1797—1856)——德国诗人,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马克思一家的亲密朋友。——118、339、551。
- 汉泽曼,阿道夫·冯(Hanseman, Adolf von 1826—1903)——德国银行家。——417。
- 汉泽曼,大卫·尤斯图斯·路德维希(Hanseman, David Justus Ludwig 1790—

- 1864)——德国政治家和银行家,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普鲁士制宪会议议员,财政大臣(1848年3—9月)。——128。
- 豪威耳,乔治(Howell, George 1833—1910)——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职业是泥水匠,前宪章主义者;工联伦敦理事会书记(1861—1862);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9),1865年国际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改革同盟书记(1865—1869),工联不列颠代表大会议会委员会书记(1871—1875);议会议员(1885—1895)。——155、319—325。
- 赫茨贝格伯爵,埃瓦尔德·弗里德里希(Hertzberg, Ewald Friedrich Graf von 1725—1795)——普鲁士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448。
- 赫德尔,麦克斯(Hödel[Hoedel], Max 1857—1878)——德国白铁工;1878年5月11日谋刺威廉一世未遂,政府借此实施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185、324、329、330、332、334、335、648。
- 赫尔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Герцен,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12—1870)——俄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政论家和作家,革命民主主义者,1847年流亡法国,1852年移居伦敦,在英国建立“自由俄国印刷所”,并出版《北极星》定期文集和《钟声》报。——140、143。
- 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 约公元前540—480)——古希腊哲学家,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自发的唯物主义者。——387。
- 赫希伯格,卡尔(Höchberg, Karl 笔名路德维希·李希特尔博士 Dr. Ludwig Richter 1853—1885)——德国作家和出版商,社会改良主义者,富商的儿子;伦理社会主义的拥护者,1876年加入社会民主党,《未来》(1877—1878)和《社会科学和福利政策》(1879—1881)的出版者。——344、346、349—352、355、357、359、362。
- 黑尔多夫(黑尔多夫-伯德拉),奥托·亨利希·冯(Helldorf[Helldorf-Bedra], Otto Heinrich von 1833—1908)——德国大地主,德国保守党的创建人之一(1876),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71—1874、1877—1881和1884—1893)。——340。
- 黑尔斯(Hales, W. K.)——伦敦《每日新闻》的出版者(1878—1881)。——185、187、486。
- 黑尔斯,威廉(Hales, William)——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7和1869—1872)。——643。

- 黑尔斯, 约翰(Hales, John 生于 1839 年)——英国工人, 工联主义运动活动家, 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及土地和劳动同盟、工人代表同盟的成员,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72)和书记(1871—1872); 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 曾参加巴枯宁的少数派, 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1 年 11 月); 从 1872 年初起领导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的改良派和分裂派; 该派伦敦代表大会(1873)的组织者; 1873 年 5 月 30 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155。
- 黑格尔,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371、380、386、390、391、393、549、586。
- 黑泽基埃尔, 格奥尔格·路德维希(Hesekiel, Georg Ludwig 1819—1874)——德国新闻工作者和作家; 《新普鲁士报》编辑(1849—1874)。——655。
- 亨利希亲王——见弗里德里希·亨利希·路德维希。
- 亨利希第七——见罗伊斯亲王, 亨利希第七。
- 亨利希第二十二——见罗伊斯亲王, 亨利希第二十二。
- 洪堡男爵, 亚历山大(Humboldt, Alexander Freiherr von 1769—1859)——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地理学家。——129、538、541、544。
- 胡利曼(Hurliman)——瑞士人,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 伦敦瑞士协会的代表。——643。
- 华盛顿, 乔治(Washington, George 1732—1799)——美国国务活动家, 将军, 在北美殖民地争取独立的革命战争时期(1775—1783)任总司令; 美国第一任总统(1789—1797)。——444、682。
- 霍亨索伦王朝——勃兰登堡选帝侯世家(1415—1701), 普鲁士王朝(1701—1918)和德意志皇朝(1871—1918)。——447、449。
- 霍罗维茨(Horovitz)——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147。

J

- 基列耶夫,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Кирее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驻基什尼奥夫俄国南方军团总司令的副官(1877—1878)。——625。
- 基佐, 弗朗索瓦·皮埃尔·吉约姆(Guizot, François - Pierre - Guillaume 1787—1874)——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 奥尔良党人; 1812 年起任巴黎大学历史系教授, 七月王朝时期是立宪君主派领袖, 历任内务大臣(1832—1836)、教育大

- 臣(1836—1837)、外交大臣(1840—1848)和首相(1847—1848);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129。
- 吉埃米诺伯爵,阿尔芒·沙尔(Guilleminot, Armand-Charles, comte de 1774—1840)——法国将军和外交家,法兰西共和国反对欧洲国家同盟的战争和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1823年是在西班牙的法国武装干涉者军队的参谋长;1824—1831年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57、159。
- 吉比奇-扎巴尔干斯基,伊万·伊万诺维奇(Дибич-Забалканский,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1785—1831)——俄国元帅,原系德国人,1828—1829年俄土战争中为俄军总司令;镇压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俄军总司令。——156—159。
- 吉芬,罗伯特(Giffen, Robert 1837—191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财政问题专家;《统计协会通报》发行人(1876—1891),贸易部统计局局长(1876—1897)。——412。
- 吉约姆,詹姆斯(Guillaume, James 1844—1916)——瑞士教师、政论家,巴枯宁的拥护者,国际会员,国际勒洛克勒支部的创建人(1866),1868年起同巴枯宁建立联系,国际兄弟会的创建人之一;《进步报》(1868—1870)、《团结报》(1870—1871)和《国际工人协会汝拉联合会简报》(1872—1878)的编辑;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洛桑代表大会(1867)、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参加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组织者之一,由于进行分裂活动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国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社会沙文主义者。——120。
- 济贝耳,亨利希·冯(Sybel, Heinrich von 1817—1895)——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1867年起为民族自由党人;主张在普鲁士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思想家;普鲁士国家档案馆馆长;所谓小德意志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586。
- 加洛林王朝——法兰克王朝,751年起统治法兰西(到987年)、日耳曼尼亚(到911年)和意大利(到887年)。——246、257、261、267、271、272—274、283。
- 捷维,莫里斯(Zévy, Maurice)——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72),匈牙利通讯书记(1870—1871)。——643。
- 居斯特尔(Küster)——普鲁士军官,公使馆参赞;1829年为驻君士坦丁堡公使馆武官。——158。
- 君士坦丁一世,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us I [Constantin, Konstantin], Magnus,

Flavius Valerius 约 280—337)——罗马皇帝(306—337)。——234、550。

K

喀德邻二世——见叶卡捷琳娜二世。

卡尔三世·威廉(Karl III Wilhelm 1679—1738)——巴登-杜拉赫的侯爵(1709—1738)。——447。

卡尔·霍亨索伦(Karl von Hohenzollern 1839—1914)——罗马尼亚公爵(1866—1881)和罗马尼亚国王,称卡罗尔一世(1881—1914);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的侄子。——154。

卡尔多夫,威廉·冯(Kardorff, Wilhelm von 1828—1907)——德国大地主,大工业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保守党(帝国党)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国会议员(1868—1906),保护关税派。——45、53—55、59、60。

卡芬雅克,路易·欧仁(Cavaignac, Louis-Eugène 1802—1857)——法国将军和政治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30—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年任阿尔及利亚总督;第二共和国时期是陆军部长(1848年5—6月),镇压巴黎六月起义;曾任政府首脑(1848年6—12月);立法会议员(1849—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因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而被捕。——677。

卡莱尔,托马斯(Carlyle, Thomas 1795—1881)——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宣扬英雄崇拜,封建社会主义的代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评者,托利党人;1848年后成为工人运动的敌人。——375、531。

卡普,弗里德里希(Kapp, Friedrich 1824—1884)——德国法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新莱茵报》驻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记者(1848);1850年流亡美国,《纽约晚报》的编辑(1850);1870年回到德国,民族自由党人,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71—1878和1881—1884);德国自由思想党人。——449。

凯腊特里伯爵,埃米尔(Kératry, Émile, comte de 1832—1905)——法国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1870年任巴黎警察局长(9—10月),后领导组织布列塔尼地方武装力量;上加龙省省长(1871),1871年4月在图卢兹镇压过公社。——112、589。

凯伦,亨德里克(Kern, Hendrik 1833—1917)——荷兰语文学家、东方学家和梵文学家。——285、289、293。

- 凯撒(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Gaius Julius Caesar 公元前100—44)——罗马统帅、国务活动家和著作家。——190、193、197、199—206、208、209、221、222、229、239、249—251、459、476、551、568、569。
- 凯泽尔, 麦克斯(Kayser, Max 1853—1888)——德国新闻工作者, 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德累斯顿人民信使报》编辑(1874—1878);国会议员(1878—1884), 属于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右翼(1878—1887)。——349、351—354。
- 康德, 伊曼努尔(Kant, Immanuel 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 唯心主义者;也以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闻名。——380、390、586。
- 康普豪森, 卢道夫(Camphausen, Ludolf 1803—1890)——德国政治家和银行家, 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1834年起任科隆商会会长, 莱茵报社股东和《莱茵报》撰稿人;1843年起为莱茵省议会城市等级的代表, 普鲁士首相(1848年3—6月), 后为第一议院议员;普鲁士驻中央政府的使节(1848年7月—1849年4月), 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议员。——42、128。
- 考夫曼, 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Кaufман, Константин Петрович 1818—1882)——俄国将军、军事和国务活动家, 积极推行沙皇侵略高加索和中亚细亚的政策, 1867年起指挥突厥斯坦边区的军队, 曾任突厥斯坦边区总督。——619、628。
- 考斯丘什科, 塔杰乌什·安德热伊·博纳文图拉(Kościuszko [Kosciuszko], Tadeusz Andrzej Bonawentura 1746—1817)——波兰将军;美国独立战争(1776—1783)的参加者;1794年波兰起义的领导人, 波兰军队总司令;1796年流亡美国, 1798年移居法国, 后迁居瑞士;曾参与波兰军团的建立;拒绝同拿破仑第一合作。——444。
- 柯顿, 罗伯特·布鲁斯(Cotton, Robert Bruce 1571—1631)——英国古代手稿、书籍、钱币等搜集家;柯顿图书馆的创建人, 该馆于英国博物馆创立时(1753)被转赠给博物馆。——284、286。
- 柯雷齐, 安东尼奥·达(Corregio, Antonio da 原名安东尼奥·阿莱格里 Antonio Allegri 1489左右—1534)——意大利画家。——54。
- 科布顿, 理查德(Cobden, Richard 1804—1865)——英国工厂主, 自由党人, 自由贸易的拥护者, 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 议会议员(1841—1864);曾参加多次国际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 如1850年8月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515—518、531。
- 科恩, 斐迪南(Cohen, Ferdinand 1842左右—1866)——德国大学生, 卡尔·布林

- 德之妻与其前夫的儿子;1866年5月7日谋刺俾斯麦未遂;在狱中自杀。——333。
- 科瑟伊恩,彼得·雅科布(Cosijn, Pieter Jakob 1840—1899)——荷兰语文学家,日耳曼语专家。——287。
- 克拉苏(马可·李奇尼乌斯·克拉苏)(Marcus Licinius Crassus 公元前115左右—53)——罗马政治活动家和统帅,曾镇压公元前71年斯巴达起义。——199、204。
- 克劳狄乌斯(提比里乌斯·克劳狄乌斯·尼禄·盖尔马尼库斯)(Tiberius Claudius Nero Germanicus 公元前10—公元54)——罗马皇帝(41—54)。——223。
- 克虏伯,阿尔弗勒德(Krupp, Alfred 1812—1887)——德国大工业家,埃森冶金厂和兵工厂厂主;曾向欧洲许多国家供应枪炮和其他军火。——419—420。
- 克伦格尔(Krengel)——19世纪40年代内辛村村长。——78。
- 克伦威尔,奥利弗(Cromwell, Oliver 1599—1658)——英国国务活动家,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领袖;1649年起为爱尔兰军总司令和爱尔兰总督,1653年起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651。
- 克洛斯,诺里斯(Clows, Norris A.)——美国新闻工作者。——528。
- 克洛维一世(Clovis I 465—511)——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国王(481—511),法兰克王国的缔造者;507年在普瓦捷会战中战胜西哥特人。——302。
- 克吕格尔,丹尼尔·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Krüger, Daniel Christian Friedrich 1819—1896)——德国法学家和外交家,1866年起为三自由市驻柏林代办,1868年起为联邦议会吕贝克的全权代表,1873年起又为帝国国会汉堡和不来梅的全权代表。——57、58。
- 克吕泽烈,古斯塔夫·保尔(Cluseret, Gustave -Paul 1823—1900)——法国军官,镇压1848年法国六月起义的参加者;曾参加克里木战争(1853—1856)和阿尔及利亚战争,1858年辞去军官职务;爱尔兰芬尼社社员的支持者;后侨居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获将军衔,1865年起在纽约成为国际会员;1867年返回法国,多家反对派报纸的出版者;欧·瓦尔兰领导的圣珀拉惹联合会成员;法国中央委员会第20选区的成员并成为该选区的代表;后返回美国,纽约第二支部的创建人;1870年9月返回巴黎,巴枯宁的追随者;1870年9月28日里昂无政府主义政变和随后的马赛革命起义的

参加者；巴黎公社社员，军事代表(1871年4月)；1871年公社被镇压后流亡瑞士；1871年在里昂被判处流放，1873年在巴黎被缺席判处死刑，1880年大赦后回到法国；1888年起是众议院社会党议员。——322。

克纳文伯爵，亨利·霍华德·莫利纽·赫伯特(Carnarvon, Henry Howard Molyneux Herbert, Earl of 1831—1890)——英国国务活动家，保守党人，曾任殖民大臣(1866—1867和1874—1878)。——153。

孔斯坦——见勒穆修，本杰明·孔斯坦。

口吃者路易——见路易二世，口吃者。

库尔曼，爱德华(Kullmann, Eduard 1853—1892)——德国木桶工人，天主教工会会员；1874年7月13日谋刺俾斯麦，以抗议他在德国实行的限制天主教教会权利的政策(“文化斗争”)，死于狱中。——333。

库克，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Cook, Flavius Josephus 又称约瑟夫 Joseph 1838—1901)——美国神学家，波士顿的传教士。——639、649。

L

拉登堡，阿达尔伯特·冯(Ladenberg, Adalbert von 1798—1855)——德国特里尔行政区长官(1834—1837)；1839年任普鲁士宗教事务、教育和卫生大臣，1848—1850年任教育大臣。——86。

拉法格，保尔(Lafargue, Paul 笔名保尔·洛朗 Paul Laurent 1842—1911)——法国医生和政论家，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大学生运动的参加者，1865年流亡英国，国际总委员会委员，西班牙通讯书记(1866—1869)，曾参加建立国际在法国的支部(1869—1870)及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支部(1871—1872)；巴黎公社的支持者(1871)，公社失败后逃往西班牙；《解放报》编辑部成员，马德里新联合会的创建人之一(1872)，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法国工人党创始人之一(1879)；1882年回到法国，《社会主义者报》编辑；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组织者之一和代表；法国众议院议员(1891—1893)；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马克思的女儿劳拉的丈夫。——446、585、588、589、601、660、670、686。

拉法格，劳拉(Lafargue, Laura 父姓马克思 Marx 1845—1911)——马克思的第二个女儿；法国工人运动的代表；曾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译成法文；1868年起为保尔·拉法格的妻子。——588、589、599、607、684、686。

拉甫罗夫，彼得·拉甫罗维奇(Лавров, Петр Лаврович 1823—1900)——俄国社

- 会学家和政论家,民粹派的思想家,在哲学上是折衷主义者;1870年起侨居国外;第一国际会员,巴黎公社参加者;《前进!》杂志编辑(1873—1876)和《前进!》报编辑(1875—1876);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副主席;从70年代初起同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599、605、608。
- 拉科,亨利希(Rackow, Heinrich 1844—1916)——德国书商;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发行人,柏林合作印刷厂和《柏林自由新闻报》的管理委员会委员;1878年被驱逐出柏林,1879年侨居伦敦,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653。
- 拉孔布莱,泰奥多尔·约瑟夫(Lacomblet, Theodor Joseph 1789—1866)——德国历史学家,原系法国人,杜塞尔多夫档案馆馆长。——301。
- 拉马丁,阿尔丰斯(Lamartine, Alphonse 1790—1869)——法国诗人、历史学家和政治家,40年代为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领袖;第二共和国时期任外交部长(1848),临时政府的实际上的首脑。——41、130、612。
- 拉普拉斯,皮埃尔·西蒙(Laplace, Pierre-Simon 1749—1827)——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不依靠康德而独立地发展了并且从数学上论证了太阳系起源于星云的假说(1796),在概率论(1812)等方面有重要贡献。——390、586。
- 拉萨尔,斐迪南(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代表,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此后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结识;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始人之一和主席(1863);写有古典古代哲学史和法学史方面的著作。——6、15—17、21、22、24—26、185、355、417、425、586、644、645、647、648、686。
- 拉辛,让·巴蒂斯特(Racine, Jean-Baptiste 1639—1699)——法国剧作家,法国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641。
- 莱奥(阿非利加的)(哈桑·伊本·穆罕默德·瓦赞)(Leo Africanus [Al-Hasan ibn Mohammed alwazzan] 1492—1526)——阿拉伯学者和旅行家;游历过北非、中非和西亚,所著《非洲游记》一书内有地理学上重要材料。——242。
- 莱奥波德一世(Léopold [Leopold] I 1790—1865)——比利时国王(1831—1865)。——71。
- 莱宾,茹尔(Lépine, Jules)——法国工人党巴黎联合会书记。——599。
- 莱姆克,哥特利布(Lemke, Gottlieb 1844左右—1885)——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594。

- 赖德律(赖德律-罗兰),亚历山大·奥古斯特(Ledru[Ledru - Rollin], Alexandre - Auguste 1807—1874)——法国政论家和政治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改革报》编辑;第二共和国时期任临时政府内务部长和执行委员会委员(1848),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49),在议会中领导山岳党;1849年六月十三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1869年回到法国。——364。
- 赖辛施佩格,彼得·弗兰茨(Reichensperger, Peter Franz 1810—1892)——德国法学家和政治家;1848年是预备议会的成员,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翼,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50—1863),国会议员(1867—1892);中央党的领导人。——340。
- 朗格,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Lange, Friedrich Albert 1828—1875)——德国社会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新康德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杜伊斯堡商会文书(1864年以前),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常设委员会委员(1864—1866),《下莱茵河信使》编辑(1865—1866);1866年前往瑞士;国际会员,洛桑代表大会(1867)代表,瑞士多家报纸的撰稿人;1870年起为苏黎世大学教授,1872年起为马堡大学教授。——24。
- 朗凯斯特,埃德温·雷(Lankester, Sir Edwin Ray 1847—1929)——英国学者,生物学家。——601。
- 勒鲁瓦-博利厄,皮埃尔·保尔(Leroy - Beaulieu, Pierre - Paul 1843—1916)——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自由贸易的拥护者;1873年创办《法国经济学家》杂志;1880年为法兰西学院政治经济学讲师。——669。
- 勒洛,弗兰茨(Reulcaux, Franz 1829—1905)——德国工程师,机械论学派的创始人,柏林工业科学院院长;1867年巴黎、1873年维也纳和1876年费城国际工业博览会评审委员会委员。——418。
- 勒穆修,本杰明·孔斯坦(Le Moussu, Benjamin - Constant [Konstant] 生于1846年)——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雕刻工,巴黎公社参加者;警监;公社被镇压后流亡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先是在美国的法国人支部通讯书记,1872年5月起为在美国的所有支部通讯书记;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巴枯宁主义;1874年脱离国际。——643。
- 朗南,约瑟夫·厄内斯特(Renan, Joseph - Ernest 1823—1892)——法国宗教史学家、哲学家和东方学家,写有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324、549。

- 雷, 泰奥多尔 (Reh, Theodor 1801—1868)——德国律师,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中间派左翼, 曾任该议会的最后一任议长(1849)。——104。
- 雷博, 玛丽·罗什·路易 (Reybaud, Marie-Roch-Louis 1799—1879)——法国著作家, 经济学家, 自由派政论家。——662, 666, 674。
- 雷曼, 丹尼尔·哥特洛布 (Reymann, Daniel Gottlob 1759—1837)——德国制图家, 德国和邻国的特种地形图的编制者。——302, 304, 305, 309。
- 雷米吉乌斯 (Remigius 约 437—533)——法国兰斯主教(459年起)。——263。
- 雷纳德伯爵, 安德烈亚斯 (Renard, Andreas Graf 1795—1874)——西里西亚地主, 1849年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 属于右派。——86。
- 雷伊斯埃芬蒂 (Reis Effendi)——土耳其外交大臣(1828—1829)。——157。
- 李卜克内西, 威廉 (Liebknecht, Wilhelm 1826—190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语文学家和政论家;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 1850年5月前往英国, 在那里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62年回到德国; 国际会员, 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之一; 《人民国家报》编辑(1869—1876)和《前进报》编辑(1876—1878和1890—1900); 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5, 157, 344—346, 349, 351, 363, 600, 689。
- 李嘉图, 大卫 (Ricardo, David 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495。
- 李希特尔博士, 路德维希——见赫希柏格, 卡尔。
- 里茨, 约翰·弗里德里希 (Rietz, Johann Friedrich)——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侍从; 1782年同威廉明娜·里茨假结婚。——449。
- 里茨, 威廉明娜, 利希特瑙伯爵夫人 (Rietz, Wilhelmine, [seit 1796] Gräfin von Lichtenau 父姓恩克 Enke 1753—1820)——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情妇; 1872年同约·弗·里茨假结婚。——449。
- 利普西乌斯, 尤斯图斯 (约斯特·利普斯) (Lipsius, Justus [Joost, Lips] 1547—1606)——尼德兰大语文学家, 拉丁语学家, 曾在耶拿、科隆、勒文、莱顿等地任教授。——286。
- 利文公爵, 赫里斯托弗尔·安德烈耶维奇 (Ливен, Христофор Андреевич, князь 1774—1839)——俄国外交家, 驻柏林公使(1810—1812), 驻伦敦大使(1812—1834)。——159。
- 利希诺夫斯基公爵, 费利克斯·玛丽 (Lichnowski [Lychnowsky], Felix Maria

- Fürst von 1814—1848)——西里西亚大地主,普鲁士军官;法兰克福国民会议员,属于右派;1848年法兰克福九月起义时与汉·阿·埃·奥尔斯瓦尔德一起被人民打死。他是海涅的诗《阿塔·特洛尔》和维尔特的著作《著名的骑士施纳普汉斯基的生平事迹》中一个讽刺人物的原型。——79。
- 列列韦尔,约阿希姆(Lelewel, Joachim 1786—1861)——波兰历史学家和革命活动家;1830—1831年波兰起义参加者,在法国和英国的波兰流亡者民主派领袖之一,1847—1848年为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副主席。——198、445。
- 列斯纳,弗里德里希(Lessner, Friedrich 1825—191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裁缝;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0年为威斯巴登工人教育协会会员;1850—1851年为美因茨工人教育协会主席和同盟美因茨支部领导人;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中被判处3年徒刑,1856年起侨居伦敦,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洛桑代表大会(1867)、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参加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在国际中为马克思的路线积极斗争,后为英国独立工党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38、446、601、643。
- 林肯,阿伯拉罕(Lincoln, Abraham 1809—1865)——美国国务活动家,共和党创建人之一;美国总统(1861—1865);美国内战时期实行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并采取革命措施进行战争;1865年4月被奴隶主的好细刺杀。——322。
- 林耐,卡尔·冯(Linné, Carl von 1707—1778)——瑞典自然科学家和医学家,植物和动物分类法的创立者;主张物种描述采用双名命名制。——391。
- 琳蕻——见德穆特,海伦。
- 龙格,沙尔(Longuet, Charles 1839—1903)——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蒲鲁东主义者,职业是新闻工作者;《左岸》的编辑(1864—1866);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67和1871—1872),比利时通讯书记(1866),国际洛桑代表大会(1867)、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委员,《法兰西共和国公报》主编;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1880年大赦后回到法国;后加入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可能派,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80—90年代被选为巴黎市参议会参议员;马克思女儿燕妮的丈

- 夫。——588、598、643、684、686。
- 龙格,燕妮(Longuet, Jenny 父姓马克思 Marx 1844—1883)——马克思的大女儿,政论家,曾写文章支持爱尔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1872年起为沙尔·龙格的妻子。——541、588、589、606、607、686。
- 娄,罗伯特(鲍勃),舍布鲁克子爵(Lowe, Robert [Bob], Viscount of Sherbrooke 1811—1892)——英国国务活动家和政论家,《泰晤士报》的撰稿人;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任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委员(1853—1855),财政大臣(1855—1858和1868—1873)和内务大臣(1873—1874)。——155。
- 卢格,阿尔诺德(Ruge, Arnold 1802—188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哈雷年鉴》的出版者,《莱茵报》的撰稿人,1842—1843年同马克思一起编辑《德法年鉴》;1844年中起反对马克思,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50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之一;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129、437。
- 卢梭,让·雅克(Rousseau, Jean-Jacques 1712—1778)——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自然神论哲学家。——13、372、374、386。
- 鲁克拉夫特,本杰明(Lucraft, Benjamin 1809—1897)——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职业是木器匠,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1),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代表,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1871年拒绝在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上签名并退出总委员会。——323。
- 鲁普斯——见沃尔弗,威廉。
- 鲁瓦耶-吕内斯,卡米耶·冯(Royer-Lühnes, Camille von 死于1830年)——普鲁士外交官;曾任驻马德里、里斯本(1823—1825)和君士坦丁堡(1829)公使。——158。
- 路德,马丁(Luther, Martin 1483—1546)——德国神学家,宗教改革运动的活动家,德国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德国市民等级的思想家,温和派的主要代表;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市贫民。——337。
- 路特希尔德男爵,詹姆斯(Rothschild, James, baron de 1792—1868)——巴黎路特希尔德银行行长。——677—678、681。
- 路西德帕沙,穆斯塔法·穆罕默德(Reshid Pasha, Mustafa Mehemed 1802—1858)——土耳其国务活动家,曾任总理大臣(1846—1852和1856—1857),

- 外交大臣(1853年5月—1855年5月)。——157。
- 路易一世,虔诚者(虔诚者路易)(Ludwig I, der Fromme[Louis le Pieux, Ludwig der Fromme]778—840)——法兰克国王和皇帝(814—840)。——277、280、281。
- 路易二世,口吃者(口吃者路易)(Louis II, le Bègue[Ludwig der Stammer]846—879)——阿基坦国王(867年起),法兰克国王(877—879)。——277。
- 路易十五(Louis XV 1710—1774)——法国国王(1715—1774)。——450。
- 路易·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
- 路易-菲力浦一世(路易-菲力浦),奥尔良公爵(Louis-Philippe I[Louis-Philippe], due d'Orléans 1773—1850)——法国国王(1830—1848)。——26、29、538、544、678。
- 路易·拿破仑——见拿破仑第三。
- 吕尔(Rühl, J.)——德国工人,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0—1872)。——643。
- 罗,哈丽雅特(Law, Harriet 1832—1897)——英国无神论运动女活动家,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7—1872)和国际曼彻斯特支部成员(1872)。——643。
- 罗伯斯比尔,马克西米利安·弗朗索瓦·玛丽·伊西多尔·德(Robespierre, Maximilien-François-Marie-Isidore de 1758—1794)——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革命政府的首脑(1793—1794)。——120。
- 罗赫纳,格奥尔格(Lochner, Georg 1824—191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细木工;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1年底流亡伦敦;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7和1871—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1871)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601、643。
- 罗奇,约翰(Roach, John)——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通讯书记(1872),曾领导联合会委员会里的改良派,1873年5月30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643。
- 罗沙,沙尔·米歇尔(Rochat, Charles-Michel生于1844年)——法国商业部门雇员,国际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战士,公社执行委员会书记,公社失败后逃往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荷兰通讯书记(1871—1872);1871

- 年伦敦代表会议代表;1872年移居比利时;1873年在巴黎被缺席判处服苦役。——643。
- 罗什弗尔,维克多·昂利,罗什弗尔-吕赛侯爵(Rochefort, Victor-Henri, marquis de Rochefort-Luçay 1830—1913)——法国政治家,新闻工作者和政论家,左派共和党人;《灯笼报》、《马赛曲报》、《口令报》的创办人和《号召报》的创办人之一;国防政府成员;巴黎公社时期谴责凡尔赛人的政策,但也反对巴黎公社采取的一些措施,公社被镇压后被判终身流放新喀里多尼亚岛,1874年逃往英国,1880年大赦后回到法国;1880年创办《不妥协派报》,1889年因参加布朗热运动被判徒刑,为逃避徒刑,1895年前一直住在伦敦。——588、686。
- 罗素伯爵,约翰(Russell, John, Earl of 1792—1878)——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领袖,议会议员,曾任内务大臣(1835—1839),殖民大臣(1839—1842),首相(1846—1852和1865—1866),外交大臣(1852—1853和1859—1865),枢密院院长(1854—1855);1855年作为英国代表参加维也纳会议。——632。
- 罗特,保尔·鲁道夫·冯(Roth, Paul Rudolf von 1820—1892)——德国法学家和历史学家,写有许多关于西欧封建制度起源问题的著作;1874年起是德国民法典制定委员会委员。——260、261—264、270、272、273、277。
- 罗伊斯亲王,亨利希第七(Reuß [Reuss], Heinrich VII, Prinz von 1825—1906)——普鲁士将军和外交家;1877年任驻君士坦丁堡特使,驻维也纳大使(1878—1894)。——157。
- 罗伊斯亲王,亨利希第二十二(Reuß [Reuss], Heinrich XXII, Prinz von 1846—1902)。——114。
- 罗伊特,弗里茨(Reuter, Fritz 1810—1874)——德国幽默作家,所谓地方色彩派的代表,用低地德意志方言写作;1833年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判处死刑,后改为30年监禁,1840年遇赦;1852年开始文学创作活动。——67。
- 罗耀拉,依纳爵(Loyola, Ignatius 1491—1556)——西班牙贵族,耶稣会的创建者。——120。
- 洛克,约翰(Locke, John 1632—1704)——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启蒙思想家,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代表。——387。
- 洛里亚,阿基尔(Loria, Achille 1857—1943)——意大利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611—613。

M

- 马布利,加布里埃尔(Mably, Gabriel 1709—1785)——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

- 家,启蒙思想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373。
- 马丁,博恩·路易·昂利(Martin, Bon - Louis - Henri 1810—1883)——法国历史学家,多卷本《法国史》的作者,共和党人;1865年加入国际,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1876年起为参议员。——320。
- 马丁,孔斯坦(Martin, Constant 人称圣马丁 Saint - Martin 1839—1906)——法国革命家,职业是职员,布朗基主义者;国际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公社被镇压后流亡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伦敦代表会议(1871)代表;1874年是革命公社的创建人之一;1874年去比利时;1880年大赦后回到法国。——643。
- 马尔齐安(赫拉克利亚的)(Marcianus of Herakleia 约5世纪)——希腊地理学家,曾撰写北海沿岸的游记。——229。
-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教士,人口论的主要代表。——24。
- 马可·奥勒留·安敦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121—180)——罗马皇帝(161—180),斯多亚派哲学家。——228、232。
- 马克里努斯(马可·马克里努斯·奥佩利乌斯)(Marcus Macrinus Opellius 164—218)——罗马皇帝(217—218)。——235。
- 马克思-艾威林,爱琳娜(杜西)(Marx - Aveling, Eleanor [Tussy] 1855—1898)——80—90年代英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政论家,社会民主同盟成员,社会主义同盟创始人之一(1884);曾在恩格斯直接领导下工作,积极参加非熟练工人群众运动的组织工作,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罢工的组织者之一;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的小女儿,爱·艾威林的妻子(1884年起)。——588、589、599、604、607。
- 马克思,燕妮(Marx, Jenny 父姓冯·威斯特华伦 von Westphalen 1814—1881)——马克思的妻子、朋友和助手。——129、538—540、541—546、591、594、606、684—686。
- 马拉,让·保尔(Marat, Jean - Paul 1743—1793)——法国政论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656。
- 马略,盖尤斯(Marius, Gaius 公元前156左右—86)——罗马统帅和政治家,曾任执政官(公元前107、104—100、86)。——199、222。
- 马罗博杜斯(Maroboduus 死于37年)——日耳曼族马可曼尼人的酋长(公元前8—公元19),在莱茵河沿岸地区建立了日耳曼各部落联盟,曾与罗马作

- 战。——201、213、220、227。
- 马茂德二世(Mahmud II 1785—1839)——土耳其苏丹(1808—1839)。——157。
- 马茂德-吉拉尔埃丁,达马德帕沙(马茂德-达马德帕沙,达马德)(Mahmud Djelal Eddin, Pasha Damat [Mahmud Damat Pasha, Damat] 1840—1884)——土耳其国务活动家,军事委员会委员,多次担任陆军大臣;1878年被贬黜和流放,1880年从流放地返回,1881年因参加杀死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尔·阿齐兹(1876年6月4日)被判死刑,后减刑为终身流放;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尔·哈米德二世的内弟。——153、637。
- 马志尼,朱泽培(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为罗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1850年是伦敦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1853年是米兰起义的主要领导人,50年代反对波拿巴法国干涉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1864年成立第一国际时企图置国际于自己影响之下,1871年反对巴黎公社和国际,阻碍意大利独立工人运动的发展。——172、365、684。
- 麦基弗(MacIver, D.)——1881年是英国议会议员。——502。
- 麦克马洪伯爵,玛丽·埃德姆·帕特里斯·莫里斯,马真塔公爵(Mac-Mahon, Marie-Edme-Patrice-Maurice, comte de, duc de Magenta 1808—1893)——法国军官和政治活动家,1859年起为元帅,波拿巴主义者;克里木战争、意大利战争的参加者,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一军军长,后任夏龙军团司令,阿尔及利亚总督(1864—1870),凡尔赛军队总司令(1871),第三共和国总统(1873—1879)。——634、651、678。
- 麦克唐奈,约瑟夫·帕特里克(McDonnell [MacDonnell], Joseph Patrick 1847—1906)——爱尔兰工人运动活动家,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爱尔兰通讯书记(1871—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1872年侨居美国,积极参加美国工人运动。——155、643。
- 曼托伊费尔(Manteuffel)——波美拉尼亚贵族世家。——79。
- 曼托伊费尔男爵,埃德温·汉斯·卡尔(Manteuffel, Edwin Hans Karl Freiherr von 1809—1885)——普鲁士将军,1873年起为元帅;石勒苏益格总督和驻石勒苏益格普军司令(1865—1866),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一军军长,后为第一军

- 团(1870年10月起)和南方军团(1871年1月起)司令,驻法国的德国占领军总司令(1871—1873);奥·泰·曼托伊费尔的弟弟。——113。
- 曼托伊费尔男爵,奥托·泰奥多尔(Manteuffel, Otto Theodor Freiherr von 1805—1882)——普鲁士国务活动家,贵族官僚的代表,曾参与宪法(1848年12月)的颁布和三级选举制的实行(1849);曾任内务大臣(1848年11月—1850年12月),首相和外交大臣(1850—1858);1849年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66年入选第一议院;埃·汉·卡·曼托伊费尔的哥哥。——75、98。
- 毛勒,格奥尔格·路德维希(Maurer, Georg Ludwig 1790—1872)——德国历史学家,古代和中世纪的日耳曼社会制度的研究者;写有中世纪马尔克公社的农业史和制度史方面的著作。——260、278、459、476、567。
- 毛奇伯爵,赫尔穆特·卡尔·伯恩哈德(Moltke, Helmuth Karl Bernhard Graf von 1800—1891)——普鲁士陆军元帅和军事理论家,普鲁士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思想家;1819年起在丹麦军队中服役,1822年转入普鲁士军队供职,1833年调任总参谋部测绘局;1836—1839年在土耳其军队中任军事顾问;曾任普鲁士总参谋长(1857—1871)和帝国总参谋长(1871—1888);普法战争(1870—1871)中任野战司令部参谋长,实际上是总司令;1867—1891年是国会议员,1872年起为普鲁士第二议院终身议员;著有《军事论文集》等军事著作。——111、112、154、156、637。
- 梅奥,亨利(Mayo, Henry)——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在联合会委员会里加入改良派,反对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1873年5月30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643。
- 梅恩,亨利·詹姆斯·萨姆纳(Maine, Sir Henry James Sumner 1822—1888)——英国法学家和法学史家,家庭和社会起源的宗法论的代表;作为印度总督参事会参事(1862—1869)和印度事务大臣参事会参事(1871年起),曾参加制定英国的地方立法和实行对印度的殖民奴役。——468、476。
- 梅津措夫,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Мезенцов, Никола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1827—1878)——俄国将军,1864年起为宪兵部队参谋长,1876—1878年为宪兵司令和第三处处长。——335。
- 梅萨-列奥姆帕特,何塞(Mesa y Leompart, José 1840—1904)——西班牙工人运动 and 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印刷工人,国际西班牙支部的组织者之一,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1—1872),《解放报》的创办人之一和编委(1871—1873),新马德里联合会创建人之一(1872),1872年国际海牙代表大

- 会代表;1873年流亡巴黎;曾积极与无政府主义进行斗争,西班牙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之一,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创始人之一(1879),曾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译成西班牙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39,600。
- 梅斯托尔夫,约翰娜(Mestorf, Johanna 1829—1909)——德国女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写有许多关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考古方面的著作,翻译了许多斯堪的纳维亚考古学家的著作。——227,232。
- 梅特涅-温内堡公爵,克莱门斯·文策斯劳斯·奈波穆克·洛塔尔(Metternich - Winneburg, Clemens Wenzeslaus Nepomuk Lothar Fürst von 1773—1859)——奥地利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809—1821)和首相(1821—1848),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407。
- 门克,亨利希·泰奥多尔·冯(Menke, Heinrich Theodor von 1819—1892)——德国地理学家和民族志学家,曾改编施普鲁纳的《中古史和近代史常用地图集》。——303。
- 蒙德拉,安东尼·约翰(Mundella, Anthony John 1825—1897)——英国国务活动家和工厂主,1868年起为议会议员,多次担任大臣职务。——155。
- 蒙克,查理(Monk, Charles 生于1824年)——英国政治家,自由党人合并主义者,议会议员(1859和1865—1885)。——502。
- 蒙田(蒙台涅),米歇尔·埃康·德(Montaigne, Michel Eyquem de 1533—1592)——法国人文主义作家和怀疑派哲学家。——641。
- 弥伦霍夫,卡尔·维克多(Müllenhoff, Karl Viktor 1818—1884)——德国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德国古迹、神话和中世纪德意志文学的研究者。——198。
- 米德哈特帕沙(Midhat Pasha 1822—1884)——土耳其国务活动家,曾任宰相(1872和1876—1877),叙利亚总督;1881年因参加杀死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尔·阿齐兹(1876年6月4日)被判死刑,后减刑为终生流放。——153,638。
- 米尔纳,乔治(Milner, George)——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爱尔兰人,职业是裁缝;奥勃莱恩的社会改良主义观点的信徒,全国改革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成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8—1872),伦敦代表会议(1871)代表,1872年起为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和通讯书记,反对脱离派。——643。
- 米海洛夫斯基,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42—1904)——俄国社会学家、政论家和文学批评家,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思想家,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的维护者;《祖国纪事》和《俄国财

富)的编辑。——140、145。

米凯尔, 约翰奈斯·冯(Miquel, Johannes von 1828—1901)——德国律师、政治活动家和金融家;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50年代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50年同盟分裂时追随马克思和恩格斯; 民族联盟创建人之一; 奥斯纳布吕克市市长(1865年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市市长(1879年起); 1867年起是民族自由党右翼领袖之一, 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 国会议员(1867—1877和1887—1890); 普鲁士财政大臣(1890—1901)。——359。

米拉波伯爵, 奥诺雷·加布里埃尔·维克多·里凯蒂(Mirabeau, Honoré - Gabriel - Victor Riqueti, comte de 1749—1791)——法国政论家, 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 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利益的代表者。——449。

米勒斯, 茹尔·伊萨克(Mirès, Jules - Isaac 1809—1871)——法国银行家和证券交易商, 《立宪主义者报》等报纸的所有人。——421。

缪弗林男爵, 弗里德里希·斐迪南·卡尔(Müffling, Friedrich Ferdinand Karl Freiherr von 1775—1851)——普鲁士将军, 后为元帅, 军事活动家和著作家, 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 1829年任驻君士坦丁堡特命公使。——157—159。

闵采尔, 托马斯(Müntzer[Münzer], Thomas 1490左右—1525)——德国神学家, 宗教改革时期和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为农民平民阵营的领袖和思想家, 宣传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思想。——337、373。

摩尔根, 路易斯·亨利(Morgan, Lewis Henry 1818—1881)——美国法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和原始社会史学家, 进化论的代表, 自发的唯物主义者。——459。

摩莱里(Morelly 1715左右—1755以后)——法国作家, 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373。

莫尔, 约瑟夫(Moll, Joseph 1813—1849)——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 职业是钟表匠; 正义者同盟领导人之一,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1848年7—9月是科隆工人联合会的主席, 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 1848年科隆九月事件后流亡伦敦, 不久改名回到德国, 在各地进行宣传鼓动;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在穆尔格河战役中牺牲。——74、618。

莫里哀(Molière, 原名让·巴蒂斯特·波克兰 Jean - Baptiste Poquelin 1622—

- 1673)——法国喜剧作家。——641。
- 莫利, 约翰 (Morley, John 1838—1923)——英国政论家, 历史学家和国务活动家, 自由党人; 1867—1882 年为《双周评论》主编; 爱尔兰事务大臣 (1886 和 1892—1895)。——155。
- 莫利纳里, 古斯塔夫·德 (Molinari, Gustave de 1819—1912)——比利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新闻工作者, 自由贸易论者;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主编 (1876) 和《经济学家杂志》主编 (1881)。——667。
- 莫纳, 弗兰茨·约瑟夫 (Mone, Franz Joseph 1796—1871)——德国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 写有许多关于德国和尼德兰的历史和古代文献方面的著作。——307。
- 莫斯特, 约翰·约瑟夫 (Most, Johann Joseph 1846—1906)——德国书籍装订工、编辑和政论家, 无政府主义者; 1868 年起参加奥地利工人运动, 1871 年起为社会民主工党和社会民主党党员; 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 (1874—1878); 1878 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以后流亡英国; 《自由》周报的创办人 (1879) 和编辑; 1880 年作为无政府主义者被开除出社会民主党, 1882 年侨居美国, 继续进行无政府主义的宣传。——486、528、609—611。
- 莫特斯赫德, 托马斯 (Mottershead [Mothershead], Thomas 1826 左右—1884)——英国织布工人, 土地和劳动同盟成员, 工人代表同盟书记,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69—1872), 丹麦通讯书记 (1871—1872), 伦敦代表会议 (1871) 和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 海牙代表大会以后领导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里的改良派, 站在脱离派一边; 1873 年 5 月 30 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155、643。
- 默里, 查理 (Murray, Charles)——英国工联领导人, 职业是鞋匠;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 (1870—1872) 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1872—1873); 诺曼底支部的代表,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曼彻斯特第二次年度代表大会代表 (1872), 80 年代是社会民主同盟的成员;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643。
- 墨洛温王朝——5 世纪中叶至 8 世纪中叶法兰克王国的第一个王朝。——257、261、263、265、271、273、277、577。
- 穆尔, 赛米尔 (Moore, Samuel 1830 左右—1912)——英国法学家, 国际会员, 曾将《资本论》第一卷 (与爱德华·艾威林一起) 和《共产党宣言》译成英文; 50 年代为曼彻斯特的厂主;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612。
- 穆罕默德-阿里帕沙 (Mechmed Ali Pasha 原名卡尔·德特鲁瓦 Karl Detroit 1827

—1878)——土耳其将军,原系德国人,1875—1876年指挥波斯尼亚独立军,1877—1878年为在保加利亚的土耳其军队总司令;曾参加柏林会议(1870),后为在阿尔巴尼亚的土耳其军队总司令。——637。

穆罕默德-萨迪克 埃芬蒂(Mechmed Sadek Effendi)——土耳其国务活动家,财政大臣,阿德里安堡俄土和平谈判(1829)的全权代表。——158—159。

穆勒,约翰·斯图亚特(Mill, John Stuart 1806—1873)——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实证论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模仿者;詹·穆勒的儿子。——127。

N

拿破仑亲王——见波拿巴,拿破仑·约瑟夫·沙尔·保尔。

拿破仑第一(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 [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法国皇帝(1804—1814和1815)。——35、111、179、374、377、383、407、582、651。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II [Louis - Napoléon Bonaparte] 1808—1873)——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国皇帝(1852—1870),拿破仑第一的侄子。——29、104、132、133、159、176、179、222、365、531、651、652。

纳德勒,卡尔·克里斯蒂安·斯特弗里德(Nadler, Karl Christian Gottfried 1809—1849)——德国律师和诗人,用普法尔茨方言写作。——315。

尼古拉亲王——见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俄国皇帝(1825—1855)。——41、156、158、183、444、548。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31—1891)——俄国大公;1877—1878年俄土战争时期为多瑙河集团军总司令;尼古拉一世的儿子。——625。

尼禄·克劳狄乌斯·凯撒(Nero Claudius Caesar 37—68)——罗马皇帝(54—68)。——228、235、554、555。

涅恰也夫,谢尔盖·格纳季耶维奇(Нечаев, Сергей Геннадиевич 1847—1882)——俄国教师,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拥护者,1868—1869年彼得堡学生运动的参加者,秘密组织“人民惩治会”的组织者,曾受该组织委托在莫斯科谋杀大学生伊万诺夫(1869年11月),后逃往瑞士;1869—1871年与巴

- 枯宁有密切联系,1872年被瑞士当局引渡给俄国政府,被判处20年要塞监禁,后死于彼得—保罗要塞。——335。
- 涅谢尔罗德伯爵,卡尔·瓦西里耶维奇(Нессельроде, Карл Васильевич 1780—1862)——俄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816—1856),总理大臣(1845年起)。——159。
- 牛顿,伊萨克(Newton, Isaac 1642—1727)——英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经典力学的创始人。——390、391。
- 努玛·庞皮利乌斯(Numa Pompilius 公元前717—679)——半传说中的古罗马第二个王。——626。
- 努蒙尼乌斯·瓦拉(Numonius Vala 死于公元9年)——昆提利乌斯·瓦鲁斯的次帅,曾指挥骑兵,在条顿堡林山罗马人溃败逃跑时阵亡。——220。
- 诺比林,卡尔·爱德华(Nobiling, Karl Eduard 1848—1878)——德国无政府主义者;1878年6月2日谋刺威廉一世未遂,后自杀。——186、324、329—335、656。
- 诺布尔,约翰(Noble, John 1827—1892)——英国政治家和政论家,自由贸易论者和反谷物法同盟的拥护者;写有许多关于财政问题的著作。——515—518。
- 诺维科夫,叶夫根尼·彼得罗维奇(Новиков, Евгений Петрович 1826—1903)——俄国作家和国务活动家,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秘书;1870年起任驻维也纳大使。——625。
- 诺维科娃,奥丽珈·阿列克谢耶夫娜(Новикова, Ольга Алексеевна 1840—1925)——俄国女政论家,长期住在英国,70年代为俄国政府的外交代理人。——621—622、624—627、629—630。

O

- 欧伦堡伯爵,博托·文德·奥古斯特(Eulenburg, Botho Wend August Graf zu 1831—1912)——普鲁士国务活动家,内务大臣(1878年3月底—1881和1892—1894),曾参加制定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执行迫害社会民主党人的政策。——330—334、336—340。
- 欧伦堡伯爵,弗里德里希·阿尔布雷希特(Eulenburg, Friedrich Albrecht Graf zu 1815—1881)——普鲁士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内务大臣(1862—1878年3月底)。——618。

欧文, 罗伯特(Owen, Robert 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373、376、381、383、384、438、587。

P

帕连, 费多尔·彼得罗维奇(Пален, Федор Петрович 1780—1863)——俄国外交家, 阿德里安堡和俄土和平谈判(1829)的全权代表, 国家参议院议员(1832年起)。——158。

帕麦斯顿子爵, 亨利·约翰·坦普尔(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Viscount 1784—1865)——英国国务活动家, 初为托利党人, 1830年起为辉格党领袖, 依靠该党右派; 曾任外交大臣(1830—1834、1835—1841和1846—1851), 内务大臣(1852—1855)和首相(1855—1858和1859—1865)。——73、132、629。

潘恩, 托马斯(Paine, Thomas 1737—1809)——美国政论家, 英国人, 共和主义者, 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和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641。

丕平(矮子)(Pépin le Bref 714—768)——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宫相(741—751), 751年得教皇之助, 夺王位, 建加洛林王朝, 成为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第一代国王(751—768); 查理·马特之子。——264—267。

培根, 弗兰西斯, 维鲁拉姆男爵, 圣奥尔本斯子爵(Bacon, Francis, Baron of Verulam and Viscount of Saint Albans 1561—1626)——英国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和法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 英国启蒙运动的倡导者。——387、641。

佩罗内特-汤普森——见汤普森, 托马斯·佩罗内特。

佩特罗尼乌斯(盖尤斯·佩特罗尼乌斯·仲裁人)(Gaius Petronius Arbiter, 死于66年)——罗马作家, 讽刺诗人, 所写长篇小说《萨蒂里孔》描绘了尼禄时期罗马社会的腐化。——554。

彭帕杜尔侯爵夫人, 让娜·安东尼达·普瓦松(Pompadour, Jeanne - Antoinette Poisson, marquise de 1721—1764)——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宠姬。——450。

皮提亚斯(马西利亚的)(Pytheas of Massilia 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地理学家和天文学家; 公元前325年左右曾航行到欧洲西北海岸。——197、198、203。

平德尔, 尤利乌斯·海尔曼(Pinder, Julius Hermann 生于1805年)——普鲁士官员, 温和的自由主义者; 1848年任西里西亚总督, 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

- 右派,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和普鲁士第一议院议员。——83。
- 蒲鲁东,皮埃尔·约瑟夫(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创始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129、384、425、426。
- 普芬德,卡尔(Pfänder, Carl 1819—1876)——德国微型画家,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1845年起侨居伦敦,正义者同盟盟员,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英国;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7和1870—1872);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643。
- 普富尔,恩斯特·亨利希·阿道夫·冯(Pfuehl, Ernst Heinrich Adolf von 1779—1866)——普鲁士将军,反动军阀的代表人物之一;1848年3月任柏林卫戍司令,4—5月指挥镇压波兹南起义;1848年9—10月任首相兼陆军大臣。——73。
- 普林尼(老普林尼)(盖尤斯·普林尼·塞孔德)(Gaius Plinius Secundus, Major 23—79)——古罗马政治活动家、作家和博物学家,《博物志》(共37卷)的作者。——205—208、226、230、243—247、250—252。
- 普卢塔克(Plutarchos 46—119以后)——古希腊著作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道德论者,柏拉图哲学的拥护者,曾与伊壁鸠鲁和斯多亚派论争;写有古希腊罗马名人传记以及哲学和伦理学著作。——198。
- 普罗布斯(马可·奥勒留·普罗布斯)(Marcus Aurelius Probus 232—282)——罗马皇帝(276—282)。——239。
- 普罗科皮乌斯(凯撒里亚的)(Procopius of Caesarea 约499—565)——拜占庭史学家;曾以维利萨里统帅顾问和秘书的身份参加许多军事远征,曾撰写《查士丁尼同波斯人、汪达尔人及哥特人的战争史》(八卷集)一书,描写这些远征,反映不满查士丁尼皇帝的专制政策的奴隶主贵族的观点。——245。
- 普耶-凯尔蒂埃,奥古斯坦·托马(Pouyer-Quertier, Augustin-Thomas 1820—1891)——法国棉纺厂主和政治活动家,保护关税派,财政部长(1871—1872),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参加同德国签订和约的谈判(1871)。——682。

Q

- 戚美尔曼,约翰·格奥尔格(Zimmermann, Johann Georg 1728—1795)——瑞士

医生和作家,1768年是英国国王去汉诺威时的首席御医,1786年曾为病危的弗里德里希二世治病。——448。

乔治一世(George I 1660—1727)——英国国王(1714—1727)。——561。

切希,亨利希·路德维希(Tschech, Heinrich Ludwig 1789—1844)——普鲁士官员,施托尔科市市长(1832—1841),民主主义者;因行刺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被处死刑。——333。

R

热克尔,让·巴蒂斯特(Jecker, Jean - Baptiste 1810—1871)——瑞士银行家,在墨西哥开办银行和矿山;1862年入法国国籍;曾参与策动法国武装干涉墨西哥(1862—1867);被巴黎公社战士枪毙。——680。

日拉丹,埃米尔·德(Girardin, Émile de 1806—1881)——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1836—1866年曾断续地担任《新闻报》编辑,后为《自由报》编辑(1866—1870);1848年革命前反对基佐政府,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50—1851),第二帝国时期为波拿巴主义者。——681。

荣克,海尔曼(Jung, Hermann 1830—1901)——国际工人运动和瑞士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钟表匠,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侨居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瑞士通讯书记(1864年11月—1872年),总委员会财务委员(1871—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副主席、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以及伦敦代表会议(1871)主席,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海牙代表大会(1872)以前在国际里执行马克思的路线,1872年秋加入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里的改良派,1877年以后脱离工人运动。——643。

茹柯夫斯基,尤利·加拉克季昂诺维奇(Жуковский Юлий Галактионович 1822—1907)——俄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政论家;国家银行行长;曾撰写《卡尔·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一书》一文,攻击马克思主义。——140、143。

若昂纳尔,茹尔·保尔(Johannard, Jules - Paul 1843—1892)——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花商;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8—1869和1871—1872),意大利通讯书记(1868—1869),1870年在圣丹尼建立国际支部;巴黎公社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拉塞西利亚将军手下的民政委员,追随布朗基派,公社被镇压后流

在伦敦；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643。

若特兰, 吕西安·莱奥波德(Jottrand, Lucien - Léopold 1804—1877)——比利时法学家和政论家；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主席(1847—1848),《社会辩论报》编辑。——71。

S

萨德勒, 迈克尔·托马斯(Sadler, Michael Thomas)——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643。

萨克雷, 威廉·梅克皮斯(Thackeray, William Makepeace 1811—1863)——英国现实主义作家。——641。

萨伊, 让·巴蒂斯特·莱昂(Say, Jean - Baptiste - Léon 1826—1896)——法国国务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 经济学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辩论日报》编辑之一；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 1871—1882年(有间断)任财政部长；1880年任参议院议长。——679, 680。

塞巴斯蒂安(Sebastianus[Sebastian]约死于287年)——天主教的圣徒。——263。

塞盖斯泰斯(Segestes 1世纪初)——日耳曼族凯鲁斯奇人的酋长, 拥护罗马人。——218。

塞吉梅鲁斯(Segimerus 公元前1世纪末—公元1世纪初)——日耳曼族凯鲁斯奇人的酋长, 阿尔米纽斯的父亲。——217, 218。

塞涅卡(小塞涅卡)(鲁齐乌斯·安涅乌斯·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 Junior 公元前4左右—公元65)——罗马政治活动家、哲学家和著作家, 斯多亚派的代表人物。——551, 553—555。

塞普蒂米乌斯·谢维路斯(鲁齐乌斯·塞普蒂米乌斯·谢维路斯)(Lucius Septimius Severus 146—211)——罗马皇帝(193—211)和统帅。——232, 234, 235。

赛拉叶, 奥古斯特·丹尼尔(Serrailier, Auguste - Daniel 1840—约1874)——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 职业是制植工人,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9—1872), 比利时通讯书记(1870)和法国通讯书记(1871—1872)；1870年9月第二帝国崩溃后, 曾作为总委员会全权代表被派往巴黎；巴黎公社委员, 劳动和商业委员会委员；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3—1874)和第二次年度代表大会

- 代表；马克思的战友。——643。
- 森提乌斯·萨土尔尼努斯(盖尤斯·森提乌斯·萨土尔尼努斯)(Gaius Sentius Saturninus 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公元1世纪初)——罗马统帅，曾参加远征日耳曼人。——213。
- 沙弗豪森，海尔曼(Schaaffhausen, Hermann 1816—1893)——德国人类学家和生理学家。——195。
- 沙佩尔，卡尔(Schapper, Karl 1812—187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之一，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创建人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案件(1849年2月8日)的被告之一；1849年2—5月为科隆工人联合会主席；《新莱茵报》撰稿人；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为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1856年起重新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接近；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617。
- 莎士比亚，威廉(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英国戏剧家和诗人。——323, 511, 626, 641。
- 舍勒，阿尔弗勒德(Scheele, Alfred)——帝国铁路局局长(1873—1874)。——421。
- 舍维奇，谢尔盖(Schewitsch, Sergej E. [Шевич, Сергей])——美国社会主义者，原系俄国人；70—80年代为《纽约人民报》编辑，1886年起为《纽约先驱报》编辑。——602。
- 圣西门，昂利(Saint-Simon, Henri 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373, 375, 377—379, 390, 587。
- 胜者威廉——见威廉一世。
- 施拉姆，卡尔·奥古斯特(Schramm, Karl August 1830—1905)——德国经济学家，保险公司官员，70年代初成为社会民主党人，改良主义者，《人民国家报》和《未来》杂志的撰稿人，《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办人之一，《社会科学和福利政策年鉴》的编辑；70年代下半期起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的主要理论家；1886年脱离工人运动。——345, 346, 349—351, 355。
- 施洛塞尔，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Schlosser, Friedrich Christoph 1776—1861)——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自由党人，德国历史编纂学中海德堡学派领袖。——449, 451。

- 施纳普汉斯基——见利希诺夫斯基, 费利克斯。
- 施奈德, 亚当(Schneider, Adam)——德国细木工; 1849年6月12日参加行刺普鲁士亲王威廉。——333。
- 施奈德, 雅科布(Schneider, Jacob 1818—1898)——德国考古学家, 写有德国古代史方面的著作。——224。
- 施派尔, 卡尔(Speyer, Carl 生于1845年)——德国细木工; 1868年为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书记; 国际会员, 1870年侨居美国, 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 1872年起为总委员会委员, 1874年9月起为纽约总委员会委员。——38。
- 施普鲁纳·冯·梅尔茨, 卡尔(Spruner von Mertz, Karl 1803—1892)——德国历史学家和地图学家, 曾编过许多历史地图集和写过许多德国历史方面的著作。——303。
- 施特克尔, 克里斯蒂安·阿道夫(Stoecker, Christian Adolf 1835—1909)——德国神学家和柏林宫廷传道师; 反犹太主义的基督教社会工党的创建人和首领(1878—1909), 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81—1893和1898—1908)。——691。
- 施特劳斯, 大卫·弗里德里希(Strauß, David Friedrich 1808—1874)——德国哲学家和政论家, 黑格尔的学生; 《耶稣传》(1835)和《基督教教义》(1840)的作者; 他对圣经的历史性批判奠定了青年黑格尔主义的理论基础; 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550。
- 施特鲁斯堡, 贝特尔·亨利(Strousberg[Stroußberg], Bethel Henry 原名巴鲁赫·希尔施·施特劳斯堡 Baruch Hirsch Strausberg 1823—1884)——德国铁路承包商; 1855年以前住在伦敦, 以后住在柏林; 1875年破产。——359。
- 施滕策尔, 古斯塔夫·阿道夫(Stenzel, Gustav Adolf 1792—1854)——德国历史学家, 自由主义者;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中间派右翼。——101。
- 施梯伯, 威廉(Stieber, Wilhelm 1818—1882)——普鲁士警官, 普鲁士政治警察局局长(1852—1860), 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策划者之一和主要原告证人; 同维尔穆特合编《1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 普奥战争(1866)和普法战争(1870—1871)时期为军事警察局局长, 在法国境内的德国情报机关的首脑。——69。
- 施托尔贝格-韦尔尼格罗德伯爵, 奥托(Stolberg-Wernigerode, Otto Graf zu 1837—1896)——德国国务活动家, 大地主, 保守党人, 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

- (1871—1878), 副首相(1878—1881)。——328、340。
- 施托什, 阿尔布雷希特·冯(Stosch, Albrecht von 1818—1896)——普鲁士将军, 1856年起任职于普鲁士总参谋部, 1871年任驻法国的德国占领军参谋长, 1872年任海军参谋长和普鲁士国务大臣; 1877年后反对俾斯麦。——330。
- 施韦泽, 约翰·巴蒂斯特·冯(Schweitzer, Johann Baptist von 1833—1875)——德国律师和新闻工作者, 拉萨尔派, 《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办人和编辑(1864—1871); 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1863年起)和主席(1867—1871); 支持俾斯麦所奉行的普鲁士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 阻挠德国工人加入第一国际, 反对社会民主工党; 国会议员(1867—1871); 1872年因同普鲁士当局的勾结被揭露而被开除出全德工人联合会。——355。
- 舒瓦洛夫伯爵, 彼得·安德烈耶维奇(Шувалов, Петр Андреевич 1827—1889)——俄国将军和外交家, 宪兵长官和皇帝办公厅第三厅厅长(1866—1873), 驻英大使(1874—1879)。——325、620、625、630。
- 舒瓦泽尔(舒瓦泽尔-昂布瓦兹)公爵, 埃蒂耶纳·弗朗索瓦, 斯坦维尔伯爵(Choiseul[Choiseul - Amboise], Étienne - François, comte de Stainville, duc de 1719—1785)——法国外交家和国务活动家,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的参加者; 曾任驻罗马大使(1753—1757)和驻维也纳大使(1757—1758); 1758—1770年任法国第一大臣, 兼外交大臣(1758—1761和1766—1770)和陆军与海军大臣(1761—1766)。——448、450。
- 斯巴达克(Spartacus 死于公元前71年)——罗马角斗士, 公元前73—71年古罗马最大一次奴隶起义的领袖。——555。
- 斯宾诺莎, 巴鲁赫(贝奈狄克特)(Spinoza, Baruch[Benedictus] 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 无神论者。——386。
- 斯凯勒, 尤金(Schuyler, Eugene 1840—1890)——美国律师和外交家; 曾任驻莫斯科领事(1867—1869)和驻圣彼得堡公使馆秘书, 驻君士坦丁堡总领事(1869—1878)。——619、621、629。
- 斯拉格(Slagg, J.)——1881年为英国议会议员。——502。
- 斯特拉本(Strabon[Strabo]约公元前63—公元20)——古希腊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203、205、221、241。
- 斯特普尼, 考埃尔·威廉·弗雷德里克(Stepney, Cowell William Frederick 1820—1872)——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 改革同盟盟员,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72)和财务委员(1868—1870), 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巴

- 塞尔代表大会(1869)和伦敦代表会议(1871)代表,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643。
- 斯维托尼乌斯·特兰克维路斯(盖尤斯·斯维托尼乌斯·特兰克维路斯)(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 约70—140)——罗马历史学家。——211。
- 斯温顿,约翰(Swinton, John 1829—1901)——美国新闻工作者,苏格兰人;《纽约时报》的编辑(1860—1870),纽约《太阳报》的编辑(1875—1883),《斯温顿氏新闻》周刊的创办人和编辑(1883—1887)。——684。
- 苏格拉底(Sokrates 公元前470—399)——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685。
- 苏里曼帕沙(Suleiman Pasha 1840—1892)——土耳其将军,1877—1878年俄土战争时期为驻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土军总司令,后指挥多瑙河军队;1878年为君士坦丁堡保卫者,当年被控告有叛国行为,被判处15年徒刑并被贬黜,被苏丹赦免。——637。
- 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阿瑟·塔尔博特·加斯科因-塞西尔(Salisbury, Robert Arthur Talbot Gascoyne-Cecil, Marquis of 1830—1903)——英国国务活动家;1881年起是保守党领袖;印度事务大臣(1866—1867和1874—1878),外交大臣(1878—1880),首相(1885—1886,1886—1892和1895—1902)。——153,155。

T

- 塔登-特里格拉夫,阿道夫·冯(Thadden-Trieglaff, Adolf von 1796—1882)——普鲁土地主,1874年为第一届联合议会议员。——79。
- 塔派纳,海尔曼·冯(Tappeiner, Hermann von 1847—1927)——德国生理学家和药理学家。——693。
- 塔西佗(普卜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 约55—120)——古罗马历史学家,《日耳曼尼亚志》、《历史》、《编年史》的作者。——190,201,204,206,207,216,222,224,227,229,232,234,236,238,239,241—245,247,250,307,459,476,554,569,571。
- 泰勒,阿尔弗勒德(Taylor, Alfred)——英国工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1873)。——643。
- 泰森多夫,海尔曼·恩斯特·克里斯蒂安(Tessendorf, Hermann Ernst Christian 1831—1895)——普鲁士检察官,柏林市法院法官(1873—1879),1885年起为

- 柏林最高法院刑庭庭长；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期间迫害社会民主党人的策划者。——116、618。
- 汤普森, 托马斯·佩罗内特(佩罗内特-汤普森)(Thompson, Thomas Perronet [Perronet-Thompson] 1783—1869)——英国将军、政治家和庸俗经济学家；议会议员, 自由党人, 自由贸易派。——518。
- 唐森, 威廉(Townshend, William)——英国工人,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9—1872), 80年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参加者。——643。
- 特卡乔夫, 彼得·尼基提奇(Ткачев, Петр Никитич 1844—1885)——俄国政论家和文学批评家, 民粹运动中的布朗基派思想家, 彼得堡学生运动的参加者, 1869年被捕, 1871年6月被判处16个月的监禁, 1873年逃往伦敦, 追随拉甫罗夫, 《前进!》的撰稿人; 1874年是苏黎世斯拉夫人支部成员。——34。
- 特赖奇克, 亨利希·冯(Treitschke, Heinrich von 1834—1896)——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 1886年起为普鲁士国家的历史编纂家, 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71—1888); 普鲁士主义、沙文主义、种族主义和德国对外扩张政策的思想家和鼓吹者。——586。
- 特鲁别茨卡娅, 伊丽莎白(Трубецкая, Елизавета)——俄国女贵族, 住在巴黎。——625。
- 特伦克男爵, 弗里德里希(Trenck, Friedrich Freiherr von der 1726—1794)——普鲁士军官和作家。——448。
- 特罗胥, 路易·茹尔(Trochu, Louis-Jules 1815—1896)——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 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30—40年代)、克里木战争(1853—1856)和意大利战争(1859), 国防政府的首脑, 巴黎武装力量总司令(1870年9月—1871年1月), 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109、113。
- 梯也尔, 阿道夫(Thiers, Adolphe 1797—1877)——法国国务活动家和历史学家, 奥尔良党人, 曾先后任内务大臣、贸易和公共事务大臣(1832—1836)、首相(1836和1840);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 第三共和国政府首脑(内阁总理)(1871)、总统(1871—1873); 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109、176、180、625、682。
- 提比里乌斯·凯撒·奥古斯都(Tiberius Caesar Augustus 公元前42—公元前37)——罗马皇帝(14—37)。——212、213、223、224、235、554。
- 秃头查理——见查理二世, 秃头。
- 图尔的格雷戈里(格雷戈里, 图尔的)(格雷戈里·弗洛伦修斯)(Grégoire de

- Tours[Gregorius Florentius]540左右—594)——基督教神学家和历史学家,573年起是图尔的主教;《法兰克人史》和《奇迹七卷》等书的作者。——262。
- 图拉真(马可·乌尔皮·图拉真)(Marcus Ulpius Traianus 53—117)——罗马皇帝(98—117)和统帅。——234。
- 托勒密,克劳狄乌斯(Ptolemaeus, Claudius 约90—160)——古希腊天文学家、星象学家、数学家和地理学家,宇宙的地球中心说的创立者。——226、227、229、232—233、236、241、243、245、247、250、252。
- 托特列本,爱德华·伊万诺维奇(Тотлебен, Эдуард Иванович 1818—1884)——俄国将军,军事工程师,1854—1855年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中领导工程作业,1877—1878年俄土战争中领导围攻普列夫纳。——636。

W

- 瓦茨,格奥尔格(Waitz, Georg 1813—1886)——德国中古史学家,马尔克制度理论的反对者;格丁根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写有中古德国史方面的著作。——248。
- 瓦拉·努蒙尼乌斯——见努蒙尼乌斯·瓦拉。
- 瓦鲁斯(普卜利乌斯·昆提利乌斯·瓦鲁斯)(Publius Quintilius Varus 公元前53左右—公元9)——罗马政治活动家和统帅,叙利亚总督(公元前7),后为日耳曼行省总督(公元7—9),日耳曼部落起义时在条顿堡林山会战中阵亡。——215—221、251。
- 瓦扬,玛丽·爱德华(Vaillant, Marie - Édouard 1840—1915)——法国自然科学家、工程师和医师,布朗基主义者,国际会员,洛桑代表大会(1867)代表,巴黎公社执行委员会委员、教育委员会委员;1871年在巴黎被判处死刑,后逃往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参加者;由于代表大会决定将总委员会迁往纽约而退出国际;1880年大赦后回到法国;布朗基派革命中央委员会创建人之一(1881),1884年起是巴黎市参议院议员,1889年和1891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01)创建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643。
- 威廉——见威廉三世(奥伦治的)。
- 威廉一世(胜者威廉)(Wilhelm I[William the Victorious]1797—1888)——普鲁士亲王,摄政王(1858—1861),普鲁士国王(1861—1888),德国皇帝(1871—

- 1888)。——67、114、156、166、325、329、484、651。
- 威廉三世(奥伦治的)(William III of Orange 1650—1702)——尼德兰总督(1672—1702),英国国王(1689—1702)。——560。
- 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Wellington, Arthur Wellesley, Duke of 1769—1852)——英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1808—1814年和1815年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任英军指挥官;历任军械总长(1818—1827),英军总司令(1827—1828和1842—1852),首相(1828—1830),外交大臣(1834—1835)。——157、159。
- 威斯特华伦,斐迪南·奥托·威廉·亨宁·冯(Westphalen, Ferdinand Otto Wilhelm Henning von 1799—1876)——普鲁士国务活动家,曾任内务大臣(1850—1858);马克思夫人燕妮的异母哥哥。——129。
- 威斯特华伦,燕妮·冯——见马克思,燕妮。
- 威斯特华伦,约翰·路德维希·冯(Westphalen, Johann Ludwig von 1770—1842)——德国特里尔行政区首席顾问(1816年起),枢密顾问(1834年起);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父亲。——129、538、541、544。
- 微耳和,鲁道夫(Virchow, Rudolf 1821—1902)——德国病理学家和人类学家,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细胞病理学的奠基人,达尔文主义的反对者;进步党的创始人和领袖;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62—1902)和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80—1893)。——195、692。
- 韦莱·帕特库尔(盖尤斯·韦莱·帕特库尔),(Gaius Velleius Paterculus 公元前19左右—公元前31)——罗马历史学家,曾参加远征日耳曼尼亚、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212、213、215、217、218、221、243。
- 韦斯顿,约翰(Weston, John)——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木匠,后为厂主;欧文主义者,1864年9月28日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2),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代表,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土地和劳动同盟领导人,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643。
- 维贝格,卡尔·弗雷德里克(Wiberg, Carl Fredrik 1813—1881)——瑞典历史学家,写有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古代史方面的著作。——227、231。
- 维多利亚-阿黛拉伊德-玛丽·路易莎(Victoria Adelaide Mary Louisa 1840—1901)——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长女,1858年起是普鲁士王储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妻子。——654、656。
- 维耳克,克里斯蒂安·哥特洛布(Wilke, Christian Gottlob 1786—1854)——德国

- 神学家,新教教徒,后改宗天主教。——550。
- 维尔曼,让·安东(Villemin, Jean - Antoine 1827—1892)——法国医生,1874年起是医学科学院院士。——693。
- 维尔穆特,卡尔·格奥尔格·路德维希(Wermuth, Carl Georg Ludwig 1803—1867)——德国警官,汉诺威警察局长,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策划者之一和原告证人;同施梯伯合编《1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69。
- 维尔琴盖托里克斯(Vercingetorix 公元前72左右—46)——高卢领袖,高卢人反对罗马统治总起义的首领(公元前52—51)。——222。
- 维尔特,卡尔·奥托(Würth, Carl Otto 1803—1884)——德国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左派。——105。
- 维干德,保尔(Wigand, Paul 1786—1866)——德国法学家和历史学家,《威斯特伐利亚历史和古代文化研究文库》创办人。——288。
- 维克多-艾曼努埃尔——见维克多-艾曼努埃尔二世。
- 维克多-艾曼努埃尔二世(维克多-艾曼努埃尔)(Vittorio Emanuele II [Victor Emanuel] 1820—1878)——萨瓦公爵,撒丁国王(1849—1861),意大利国王(1861—1878)。——365。
- 维莱梅,路易·勒奈(Villermé, Louis - René 1782—1883)——法国医生,社会学家和著作家。——666、667。
- 维利希,奥古斯特(Willich, August 1810—1878)——普鲁士军官,1847年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为志愿军团首领;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同卡·沙佩尔一起组成反对马克思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53年侨居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任将军。——438。
- 维尼齐乌斯,马可(Vinicius, Marcus 死于20年左右)——罗马统帅,执政官,曾参加远征潘诺尼亚和日耳曼尼亚。——213。
- 魏特林,克里斯蒂安·威廉(Weitling, Christian Wilhelm 1808—1871)——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正义者同盟领导人,职业是裁缝;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和鼓动家;工人同盟的创始人,《工人共和国》杂志的出版者;1849年流亡美国,晚年接近国际工人协会。——384、618。
- 沃尔弗,弗里德里希·威廉(Wolff, Friedrich Wilhelm 鲁普斯 Lupus 1809—1864)——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论家,职业是教员,西里西亚农民的儿子;1834—1839年被关在普鲁士监狱;1846—1847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始人之一和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年

3月起),《新莱茵报》编辑(1848—1849),莱茵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和科隆安全委员会委员;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左派;1849年流亡瑞士,1851年迁居英国,1853年起在曼彻斯特当教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63,65—108。

沃尔弗,玛丽亚·罗西娜(Wolff, Marie Rosine)——弗·威·沃尔弗的母亲。——66。

沃尔弗,约翰·弗里德里希(Wolff, Johann Friedrich 死于1835年)——弗·威·沃尔弗的父亲。——66。

沃尔弗,约翰娜·克里斯蒂安娜(Wolff, Johanna Christiane 死于1846年)——弗·威·沃尔弗的妹妹。——66。

沃尔索,耶恩斯·雅科布·阿斯木森(Worsaae, Jens Jacob Asmussen 1821—1885)——丹麦考古学家和博物馆馆长,温和的自由主义者;1874—1875年任教育大臣。——229。

乌尔卡尔特,戴维(Urquhart, David 1805—1877)——英国外交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亲土耳其分子;30年代在土耳其执行外交任务,曾揭露帕麦斯顿和辉格党人的对外政策,议会议员(1847—1852);《自由新闻》(1855—1865)和《外交评论》(1866—1877)的创办人和编辑。——185。

乌兰德,路德维希(Uhland, Ludwig 1787—1862)——德国晚期浪漫派诗人、政论家、文学研究者和自由派政治家,1848—1849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103,104,105。

屋大维,盖尤斯(Octavius, Gaius)——奥古斯都皇帝的亲生父亲。——551。

伍德赫尔,维多利亚(Woodhull, Victoria 1838—1927)——美国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1871年国际纽约第十二支部创建人之一,曾和自己的妹妹田·克拉夫林共同出版《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1872年被开除出国际。——649。

X

西尔蒙,雅克(Sirmond, Jacques 1559—1651)——法国牧师,教士,耶稣会士,历史学家,中世纪初期文献的出版者。——273。

西蒙,茹尔(Simon, Jules 原名茹尔·弗朗索瓦·西蒙·叙斯 Jules-François-Simon Suisse 1814—1896)——法国国务活动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1849),国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的国民教育部长(1870—1873),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反对巴黎公社;

- 内阁总理(1876—1877)。——666、670。
- 西蒙, 约翰(Simon, Sir John 1816—1904)——英国医生, 枢密院医官, 曾对英国的保健事业进行改革。——692。
- 西莫南, 路易·洛朗(Simonin, Louis-Laurent 1830—1880以后)——法国采矿工程师和旅行家; 曾发表许多游记。——669、670。
- 西斯蒙第, 让·沙尔·莱奥纳尔·西蒙德·德(Sismondi, Jean-Charles-Léonard Simonde de 1773—1842)——瑞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 政治经济学中浪漫学派的代表人物。——666。
- 西塔(西塔尔采斯), 提比里乌斯·罗比利乌斯(Sita[Sitalces], Tiberius Robilius 1世纪)——青铜器作坊主, 西塔这个名字被泰·蒙森误认为是西塔尔采斯的简写。——228。
- 希尔德布兰(Hildebrannus 8世纪)——查理·马特的受采邑者。——267。
- 希尔德布兰德, 汉斯·奥洛夫(Hildebrand, Hans Olof 1842—1913)——瑞典考古学家, 历史学家, 古钱币学家和美术史学家, 写有瑞典古代史和中古史方面的著作。——232。
- 希尔佩里克一世(Chilperich I 539—584)——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纽斯特里亚国王(561—584)。——262。
- 希尔施, 卡尔(Hirsch, Karl 1841—1900)——德国新闻工作者; 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和国际会员, 社会民主工党创始人之一(1869); 1870—1871年主持《人民国家报》工作; 1872年后为几家德国社会民主党报刊驻巴黎记者, 布鲁塞尔《灯笼》的出版者(1878—1879); 1879年住在巴黎, 1892年回到德国; 《莱茵报》编辑(1894—1895); 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联系。——344—346, 349—354。
- 希罗多德(哈利卡纳苏的)(Herodotos of Halikarnassos 约公元前484—425)——古希腊历史学家, 写有描述波斯王国和波斯战争的著作。——196。
- 希普顿, 乔治(Shipton, George 1839—1911)——英国工联领导成员, 改良主义者; 彩画匠工联书记; 土地和劳动同盟盟员, 工联伦敦理事会书记(1872—1896); 《劳动旗帜报》编辑(1881—1885)。——155。
- 席勒, 弗里德里希·冯(Schiller, Friedrich von 1759—1805)——德国诗人、作家、美学家和历史学家。——62。
- 肖莱马, 卡尔(Schorlemmer, Carl 1834—1892)——德国化学家, 有机化学的创始人, 辩证唯物主义者, 曼彻斯特的教授(1859年起); 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 国

- 际会员,60年代初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601。
- 辛格尔,保尔(Singer, Paul 1844—1911)——德国商人,1869年起为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反社会党人法时期是社会民主党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联络员,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84—1911),1885年起为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主席,1887年起为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890年起和倍倍尔一起是社会民主党的主席;1891、1893、1896和1907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345、349。
- 欣克马尔(拉昂的)(Hincmarus Laudunensis [Hincmar von Laon] 830左右—882)——法兰克王国拉昂大主教(858—879)。——269。
- 欣克马尔(兰斯的)(Hincmarus Remensis [Hincmar von Reims] 806左右—882)——法兰克王国教士,神学家和著作家,845年起为兰斯城大主教,《贝坦年鉴》第三部分(861—882)的作者。——263、278。

Y

-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 公元前384—322)——古希腊哲学家,在哲学上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按其经济观点来说是奴隶占有制自然经济的维护者,他最先分析了价值的形式;柏拉图的学生。——386。
- 亚历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 II 1818—1881)——俄国皇帝(1855—1881)。——155、181—183、325、466、486、548、620—621。
- 亚历山大三世(Александр III 1845—1894)——俄国皇帝(1881—1894)。——548。
- 叶卡捷琳娜二世(喀德邻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 1729—1796)——俄国女皇(1762—1796)。——470。
- 伊壁鸠鲁(Epikouros 约公元前342—270)——古希腊哲学家,无神论者。——556。
- 伊尔米农,(伊尔米诺)盖拉尔(Irminon [Irmino], Guérard 约死于826年)——巴黎郊区圣日耳曼-德普雷修道院院长(812—817)。——280。
- 伊格纳季耶夫,尼古拉·巴甫洛维奇(Игнатъев, Николай Павлович 1832—1908)——俄国外交家和国务活动家,1864—1877年为驻土耳其大使,在签订圣斯蒂凡诺和约(1878)时为俄国全权代表;1881—1882年任国家产业大臣,后任内务大臣。——152。

- 伊林沃思 (Illingworth, A.) ——1881 年为英国议会议员。——502。
- 雨果, 维克多·玛丽 (Hugo, Victor-Marie 1802--1885) ——法国作家, 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 (1848—1851), 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流亡泽西岛; 1855 年底被英国当局驱逐出境, 1870 年回到法国, 1871 年国民议会议员, 第二帝国时期为参议员 (1876)。——686。
- 约尔丹 (约尔南德) (Jordanes [Jornandes] 约生于 500 年) ——东哥特历史学家, 《哥特人的起源和历史》一书的作者。——230。
- 约尔南德——见约尔丹。
- 约翰 (Johann 1782—1859) ——奥地利大公, 元帅, 曾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 1809 年为奥地利军队指挥官, 1848 年 6 月—1849 年 12 月为德意志帝国摄政。——73、104、105、131。
- 约翰八世 (Joannes VIII [Johann VIII] 820 左右—882) ——罗马教皇 (872—882)。——263。
- 约翰·奈波穆克·玛丽·约瑟夫 (Johann Nepomuk Maria Joseph 笔名菲拉莱泰斯 Philalethes 1801—1873) ——萨克森国王 (1854—1873), 曾翻译过但丁的作品。——128。
- 约克·冯·瓦滕堡伯爵, 汉斯·大卫·路德维希 (York [Yorck] von Wartenburg, Hans David Ludwig Graf 1759—1830) ——普鲁士将军, 1821 年起为元帅; 曾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221。

Z

- 泽费洛盖, 马克西米利安·约瑟夫 (Sefeloge, Maximilian Joseph 1820—1859) ——德国退伍军官; 1850 年 5 月 22 日谋刺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死于精神病院。——333。
- 詹姆斯二世 (James II 1633—1701) ——英国国王 (1685—1688)。——559。
- 左尔格, 弗里德里希·阿道夫 (Sorge, Friedrich Adolph 1828—1906) ——德国教师和新闻工作者, 国际工人运动、美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家, 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1852 年侨居美国, 国际会员, 国际美国各支部的组织者, 海牙代表大会 (1872) 代表, 纽约总委员会委员和总书记 (1872—1874), 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创始人 (1876) 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602、603、610。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A

阿波罗——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和光明之神, 艺术的保护神。——551。

阿基里斯——古希腊神话中围攻特洛伊的一位最勇敢的希腊英雄, 荷马的《伊利亚特》中的主要人物, 他同希腊军队的领袖亚加米农的争吵和回到自己的营幕去, 构成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一章的情节。据传说, 阿基里斯出生时被母亲海洋女神西蒂斯握住脚跟倒浸在冥河水中, 因此他的身体除没有浸水的脚跟外, 不能被任何武器所伤害, 后来, 他因脚跟, 即他身上那个惟一致命的地方中箭而身亡。后人用“阿基里斯之踵”比喻可以致命的地方和最弱的一环。——54。

埃吉丽亚——罗马神话中的女神, 聪慧有预知能力, 常暗中向罗马王努玛·庞皮利乌斯出谋献策。——626。

埃卢——古日耳曼人的战神。——305。

F

福斯泰夫——莎士比亚的剧作《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亨利四世》中的人物, 爱吹牛的懦夫, 谐谑者, 酒徒。——323。

H

赫斐斯塔司——古希腊神话中的火神。罗马神话称之为武尔坎。掌管火、火山、冶炼技术和神奇手工艺, 被视为工匠的始祖。——403。

赫明——古代德国神话中曼努斯(相传为日耳曼人始祖)的三个儿子中的一个, 赫米诺南人的始祖。——244。

J

加尼米德——古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 被诸神窃至奥林波斯山, 成为宙斯钟爱

的人和司酒童。——448、449。

L

拉摩——德尼·狄德罗的作品《拉摩的侄子》中的人物。——386。

拉撒路——圣经《路加福音》中一个乞丐的名字。他患麻疯病，而靠生活奢侈的有钱人的残羹剩饭过活。——555。

M

曼努斯——据塔西佗说，是古日耳曼人信奉的图伊斯托神的儿子，他有三个儿子，即印格、易斯克和赫明，相传由他们三人产生了三个主要的日耳曼部落——印格伏南人、易斯卡伏南人和赫米诺南人。——244。

N

纳塔斯——据塔西佗说，是古日耳曼人的女农神。——245、247。

P

普罗克拉斯提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身材高大的强盗，他强迫所有过路的人躺在他所设置的一张床上，若比床长则砍足，短则拉长。——299。

普罗米修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狄坦神，他从天上盗取火种，带给人们；宙斯把他锁缚在悬崖上，令鹰啄他的肝脏，以示惩罚。——403。

S

桑乔·潘萨——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珂德》中的人物，唐·吉珂德的侍从。——586。

T

唐·吉珂德——塞万提斯同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586。

Y

雅赫维(耶和华)——犹太教中的主神。——552。

耶稣基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始人。——69、550—551、553。

易斯克——古代德国神话中曼努斯(相传为日耳曼人始祖)的三个儿子中的一

个,易斯卡伏南人的始祖。——244。

印格——古代德国神话中曼努斯(相传为日耳曼人始祖)的三个儿子中的一个,印格伏南人的始祖。——244。

约翰——据基督教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一,是耶稣基督最喜爱的门徒。按习惯说法是启示录、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二、三书的作者,实际上这些作品是由好多人写成的。——552、557。

Z

宙斯——古希腊神话中最高神,克伦纳士神的儿子。——555。

文 献 索 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 《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1871年[伦敦]修订第3版(The Civil War in France. Addres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3. ed., rev. [London]1871)。——133、323。
- 《福格特先生》1860年伦敦版(Herr Vogt. London 1860)。——132、159。
- 《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正式版本,经总委员会修订)》1871年伦敦版(General Rules and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Official ed., rev. by the General Council. London 1871)。——15、21、22、319、641、642。
- 《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德文正式版本,经总委员会修订)》[1872年]莱比锡版(Allgemeine Statuten und Verwaltungs-Verordnungen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ziation. Amtl. deutsche Ausg., rev. durch den Generalth. Leipzig[1872])。——15、21、22。
-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载于1870年7月28日《派尔-麦尔新闻》(伦敦)第1702号(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on the war. In: The Pall Mall Gazette. London. Nr. 1702, 28. Juli 1870)。——424。
-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载于1870年8月7日《人民国家报》(莱比锡)第63号(Manifest des Generalraths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ziation. In: Der Volksstaat. Leipzig. Nr. 63, 7. August 1870)。——652。
- 《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1848年1月9日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召开的公众大会上》[1848年布鲁塞尔版](Discours sur la question du libre échange,

- prononcé à l' Association Démocratique de Bruxelles, dans la séance publique du 9 janvier 1848. Imprimé aux frais de l' Association Démocratique. [Bruxelles 1848])。——129。
-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于 1844 年《德法年鉴》(巴黎)第 1—2 期合刊 (Zur Kritik der Hegel' schen Rechts - Philosophie. Einleitung. In: Deutsch - 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Lfg. 1/2. Paris 1844)。——129。
- 《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3 年巴塞尔版 (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 - Prozeß zu Köln. Basel 1853)。——132。
- 《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载于 1874 年 10 月 28、30 日，11 月 4、6、11、13、18、25、27 日，12 月 2、4、11、18 日，1875 年 1 月 20、22、27 日《人民国家报》(莱比锡)第 126、127、129、130、132、133、135、137、138、140、141、144、147 号；1875 年第 7、8、10 号 (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ß zu Köln. In: Der Volksstaat. Leipzig. 1874. Nr. 126, 28. Oktober; Nr. 127, 30. Oktober; Nr. 129, 4. November; Nr. 130, 6. November; Nr. 132, 11. November; Nr. 133, 13. November; Nr. 135, 18. November; Nr. 137, 25. November; Nr. 138, 27. November; Nr. 140, 2. Dezember; Nr. 141, 4. Dezember; Nr. 144, 11. Dezember; Nr. 147, 18. Dezember; 1875. Nachtr. : Nr. 7, 20. Januar; Nr. 8, 22. Januar; Nachw. : Nr. 10, 27. Januar)。——132。
- 《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75 年莱比锡新版 (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 - Prozeß zu Köln. Neuer Abdr. Leipzig 1875)。——7、132。
-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于 1852 年不定期杂志《革命》(纽约)，约·魏德迈编，第 1 期 (Der 18te [achtzehnte] Brumaire des Louis Napoleon. In: Die Revolution. Eine Zeitschrift in zwanglosen Heften. Hrsg. von J. Weydemeyer. New - York. 1852. H. 1)。——132。
-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69 年汉堡第 2 版 (Der Achtzehnte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 2. Ausg. Hamburg 1869)。——132。
- 《1864 年 9 月 28 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宣言和临时章程》1864 年 [伦敦] 版 (Address and Provisional Rules of the Working Men' 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established September 28, 1864, at a public meeting held at St. Martin' s Hall, Long Acre, London. [London] 1864)。——133、319。
- 《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1869 年 9 月

- 6-11日][1869年]伦敦版(Report of the Fourth Annual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held at Basel, in Switzerland, from the 6th to the 11th September, 1869. London[1869])。——324。
-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巴黎—布鲁塞尔版(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Réponse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de M. Proudhon. Paris, Bruxelles 1847)。——129、425、438。
-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 1859年柏林版(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H. 1. Berlin 1859)。——132。
-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第1册《资本的生产过程》1867年汉堡版(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d. 1. Buch 1: Der Produktionsprozess des Kapitals. Hamburg 1867)。——133、139、140、145、339、425、437、598、600、604、609、641、684、685、686、692。
-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第1册《资本的生产过程》1872年汉堡修订第2版(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d. 1. Buch 1: Der Produktionsprozess des Kapitals. 2. verb. Aufl. Hamburg 1872)。——133、143、339、399、403、691。
- 《资本论》[1872—1875年]巴黎版(Le Capital. Paris[1872—1875])。——6、144、455、470、475、481、482、676、685、686。
-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译自德文第1卷第1册《资本的生产过程》1872年圣彼得堡版(Капиталь. Критик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 Переводъ съ нѣмецкаго. Т. 1. Кн. 1: Процессъ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капитала. С. - Петербургъ 1872)。——598、685。
-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卷第2册《资本的流通过程》,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 1885年汉堡版(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d. 2. Buch 2: Der Cirkulationsprozess des Kapitals. Hrsg. von Friedrich Engels. Hamburg 1885)。——133、134、139、569、607、613。

弗·恩格斯

- 《德国农民战争》, 载于1850年5—10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6号(Der deutsche Bauernkrieg.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1850. H. 5/6, Mai bis Oktober)。——441。
- 《德国农民战争》1870年莱比锡第2版(Der deutsche Bauernkrieg. 2., mit einer

- Einl. verb. Abdr. Leipzig 1870)。——441。
- 《德国农民战争》1875年莱比锡第3版(Der deutsche Bauernkrieg. 3. Abdr. Leipzig 1875)。——441。
- 《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载于1876年2月25、27日，3月1日《人民国家报》(莱比锡)第23、24、25号(Preußischer Schnaps im deutschen Reichstag. In: Der Volksstaat. Leipzig. Nr. 23, 25. Februar 1876; Nr. 24, 27. Februar 1876; Nr. 25, 1. März 1876)。——441。
- 《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1876年莱比锡版(Preußischer Schnaps im deutschen Reichstag. Leipzig 1876)。——441。
- 《对法国的通商条约》，载于1881年6月18日《劳动旗帜报》(伦敦)第7号(The French commercial treaty. In: The Labour Standard. London. Nr. 7, 18. Juni 1881)。——515。
- 《[给《纽约人民报》的电报]。1883年3月16日》，载于1883年3月17日《纽约人民报》第66号([Telegramm an die "New Yorker Volkszeitung".] 16. März 1883. In: New Yorker Volkszeitung. Nr. 66, 17. März 1883)。——602。
- 《雇佣劳动制度》，载于1881年5月21日《劳动旗帜报》(伦敦)第3号(The wages system. In: The Labour Standard. London. Nr. 3, 21. Mai 1881)。——495。
- 《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载于1880年3月20日，4月20日，5月5日《社会主义评论》(巴黎—里昂)第3、4、5期(Le socialisme utopique et le socialisme scientifique. In: La Revue socialiste. Paris, Lyon. Nr. 3, 20. März 1880; Nr. 4, 20. April 1880; Nr. 5, 5. Mai 1880)。——585。
- 《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1880年巴黎版(Socialisme utopique et socialisme scientifique. Paris 1880)。——585。
- 《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1882年日内瓦版(Socjalizm utopijny a naukowy. Genève 1882)。——585。
- 《流亡者文献。——四》，载于1875年3月28日、4月2日《人民国家报》(莱比锡)第36、37号(Flüchtlings - Literatur. IV. In: Der Volksstaat. Leipzig. Nr. 36, 28. März 1875; Nr. 37, 2. April 1875)。——34。
- 《流亡者文献。——五》，载于1875年4月16、18、21日《人民国家报》(莱比锡)第43、44、45号(Flüchtlings - Literatur. V. In: Der Volksstaat. Leipzig. Nr. 43, 16. April 1875; Nr. 44, 18. April 1875; Nr. 45, 21. April 1875)。——34。

-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1875年莱比锡版(*Soziales aus Rußland. Leipzig 1875*)。——34,441。
- 《论住宅问题。1.蒲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1872年莱比锡版(*Zur Wohnungsfrage. (1. Wie Proudhon die Wohnungsfrage löst.) Leipzig 1872*)。——441。
- 《论住宅问题。第二册: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1872年莱比锡版(*Zur Wohnungsfrage. H. 2: Wie die Bourgeoisie die Wohnungsfrage löst. Leipzig 1872*)。——441。
- 《论住宅问题。第三册: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1873年]莱比锡版(*Zur Wohnungsfrage. H. 3: Nachtrag über Proudhon und die Wohnungsfrage. (Leipzig [1873])*)。——441。
- 《棉花和铁》,载于1881年7月30日《劳动旗帜报》(伦敦)第13号(*Cotton and iron. In: The Labour Standard. London. Nr. 13, 30. Juli 1881*)。——283,537。
- [《英国农民要求参加国内政治斗争》],载于1877年6月8日《平民报》(米兰)第18号([*Una riunione di delegati delle associazione agricole.]In: La Plebe. Milano. Nr. 18, 8. Juni 1877*)。——126。
- 《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1878年莱比锡版(*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 Philosophie. Politische Oekonomie. Sozialismus. Leipzig 1878*)。——437,441,585。
- 《蒲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载于1872年6月26、29日和7月3日《人民国家报》(莱比锡)第51、52、53号(*Wie Proudhon die Wohnungsfrage löst. In: Der Volksstaat. Leipzig. Nr. 51, 26. Juni 1872; Nr. 52, 29. Juni 1872. Nr. 53, 3. Juli 1872*)。——441。
-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西班牙最近一次起义的札记》,载于1873年10月31日、11月2、5日《人民国家报》(莱比锡)第105、106、107号(*Die Bakunisten an der Arbeit. Denkschrift über den letzten Aufstand in Spanien. In: Der Volksstaat. Leipzig. Nr. 105, 31. Oktober 1873; Nr. 106, 2. November 1873; Nr. 107, 5. November 1873*)。——441。
-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西班牙最近一次起义的札记》[1873年]莱比锡版(*Die Bakunisten an der Arbeit. Denkschrift über den letzten Aufstand in Spanien. (Leipzig [1873])*)。——441。
-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1845年莱比锡版(*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Nach eigener Anschauung und authentischen*

- Quellen. Leipzig 1845)。——402、437、604。
- 《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载于1873年2月8、12、19、22日《人民国家报》(莱比锡)第12、13、15、16号(Nachtrag über Proudhon und die Wohnungsfrage. In: Der Volksstaat. Leipzig. Nr. 12, 8. Februar 1873; Nr. 13, 12. Februar 1873; Nr. 15, 19. Februar 1873; Nr. 16, 22. Februar 1873)。——441。
- 《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载于1872年12月25、28日, 1873年1月4、8日《人民国家报》(莱比锡)第103、104、2、3号(Wie die Bourgeoisie die Wohnungsfrage löst. In: Der Volksstaat. Leipzig. Nr. 103, 25. Dezember 1872; Nr. 104, 28. Dezember 1872; Nr. 2, 4. Januar 1873; Nr. 3, 8. Januar 1873)。——441。
- 《做一天公平的工作, 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载于1881年5月7日《劳动旗帜报》(伦敦)第1号(A fair day's wages for a fair day's work. In: The Labour Standard. London. Nr. 1, 7. Mai 1881)。——492。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布赫尔先生》，载于1878年6月13日《每日新闻》(伦敦)第10030号(Herr Bucher. To the Editor of the Daily News.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10030, 13. Juni 1878)。——187。
- 《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手稿)(Die deutsche Ideologie. 1845/1846)。——65、609。
- 《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发表)[1848年]伦敦版(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Veröff. im Februar 1848. London[1848])。——21、22、130、339、361、425、438、445、547、548、587、609、617。
- 《共产党宣言》[1869年日内瓦版](Манифест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Женева 1869])。——547。
- 《共产党宣言。译自1872年德文版。附作者前言》1882年日内瓦版(Манифест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Переводъ съ нѣмецкаго изданія 1872. Съ предисловіемъ авторовъ. Женева 1882)。——547。
-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根据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决定公布的报告》1873年伦敦—汉堡版(L' Alliance de la Démocratie Socialiste et l'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Rapport et documents publiés par ordre du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 la Haye. Londres, Hambourg 1873)。——336。

- 《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1845年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版(Die heilige Familie, oder Kritik der kritischen Kritik. Gegen Bruno Bauer e Consorten. Frankfurt a. M. 1845)。——129。
- 《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内部通告》1872年日内瓦版(Les prétendues scissions dans l'Internationale. Circulaire privée du Conseil Général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Genève 1872)。——322。
- 《一个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1874年不伦瑞克版(Ein Complot gegen die Internationale Arbeiter - Association. Braunschweig 1874)。——117。

其他作者的著作

A

- 阿尔诺德,威·《德意志的古代》1879年哥达版(Arnold, W.: Deutsche Urzeit. Gotha 1879)。——283、295、302、308、310。
- 阿克索《法国的工业人口。织边业和孚日的织边女工。孚日地区织边业现状以及这一行业对工人健康的影响一瞥》1856年埃皮纳勒版(Haxo: Populations industrielles de la France. La broderie et les brodeuses vosgiennes. Coup d'œil sur la situation actuelle de cette industrie dans les Vosges et son influence sur la santé des ouvrières. Épinal 1856)。——666。
- 埃尔拉赫,弗·冯·《1870—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一个瑞士军人的观察与思考》1874年莱比锡—伯尔尼版(Erlach, F. von: Aus dem französisch - deutschen Kriege. 1870—1871. Beobachtungen und Betrachtungen eines Schweizer - Wehrmanns. Leipzig, Bern 1874)。——111。
- 《埃利亚德和古代萨克森起源片断:莫里茨·海奈编并作详注》1866年帕德博恩版(Héliand nebst den Bruchstücken der altsächsischen Genesis. Mit ausführlichem Glossar hrsg. von Moritz Heyne. Paderborn 1866)。——283。
- 埃瓦尔德,亨·《以色列民族史》1864年格丁根第3版第4卷(Ewald, H.: Geschichte des Volkes Israel. 3. Ausg. Bd. 4. Göttingen 1864)。——552。
- 爱因哈德《查理大帝生平》,引自保·罗特《从上古到10世纪的采邑制度史》1850年埃朗根版(Einhardus: Vita Caroli Magni. Nach: P. Roth: Geschichte des

Beneficialwesens. . . Erlangen 1850)。——261。

B

- [巴里, 马·]《格莱斯顿先生》, 载于 1877 年 3 月 3 日《名利场》(伦敦)第 435 号 ([Barry, M. :] Mr. Gladstone. In: Vanity Fair. London. Nr. 435, 3. März 1877)。——628。
- [巴里, 马·]《格莱斯顿先生和俄国的阴谋》, 载于 1877 年 2 月 3 日《白厅评论》(伦敦) ([Barry, M. :] Mr. Gladstone and Russian intrigue. In: The Whitehall Review. London. 3. Februar 1877)。——628。
- 白尔尼, 路·《巴黎记述》, 载于《白尔尼文集》1862 年汉堡—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 3 卷 (Börne, L. : Schilderungen aus Paris (1822 und 1823) .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3. Hamburg, Frankfurt a. M. 1862)。——317。
- 鲍威尔, 布·《斐洛、施特劳斯、勒南和原始基督教》1874 年柏林版 (Bauer, B. : Philo, Strauß und Renan und das Urchristenthum. Berlin 1874)。——553。
- 鲍威尔, 布·《基督和君主们。基督教起源于罗马的希腊文化》1877 年柏林版 (Bauer, B. : Christus und die Caesaren. Der Ursprung des Christenthums aus dem römischen Griechenthum. Berlin 1877)。——553。
- 《贝坦年鉴》, 引自保·罗特《从上古到 10 世纪的采邑制度史》1850 年埃朗根版 (Annales Bertiniani. Nach: P. Roth: Geschichte des Beneficialwesens. von den ältesten Zeiten bis ins zehnte Jahrhundert. Erlangen 1850)。——275, 277。
- 倍倍尔, 奥·《我们的目的》1870 年莱比锡版 (Bebel, A. : Unsere Ziele. Eine Streitschrift gegen die "Demokratische Correspondenz". Leipzig 1870)。——339, 340。
- 毕兴, 安·弗·《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统治时期的可靠史料。主要涉及人口、贸易、财政、军队方面》1790 年汉堡版 (Büsching, A. F. : Zuverlässige Beyträge zu der Regierungs-Geschichte Königs Friedrich II. von Preußen, vornehmlich in Ansehung der Volksmenge, des Handels, der Finanzen und des Kriegsheers. Mit einem historischen Anh. Hamburg 1790)。——448。
- 博伊斯特, 弗·《简明苏黎世州历史地图集》1873 年苏黎世版 (Beust, F. : Kleiner historischer Atlas des Kantons Zürich. Zürich 1873)。——307。
- [布赫尔, 阿·洛·]《[声明]》, 载于 1878 年 6 月 21 日《北德总汇报》(柏林)第 145 号 ([Bucher, A. L. :] [Erklärung.] In: 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 Berlin. Nr. 145, 21. Juni 1878)。——187。

- 布劳纳, 威·《论对法兰克语的认识和论高地德意志语辅音音变》, 载于 1874 年《德意志语言文学史资料》(萨勒河畔哈雷) 第 1 卷(Braune, W.: Zur Kenntnis des Fränkischen und zur hochdeutschen Lautverschiebung. In: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e und Literatur, hrsg. von Hermann Paul und Wilhelm Braune. Bd. 1. Halle/Saale 1874)。——283。
- 布林德, 卡·《拿破仑亲王与欧洲民主》, 载于 1879 年《弗雷泽杂志》(伦敦) 第 20 卷(Blind, K.: Prince Napoleon and European democracy. In: Fraser's Magazine. London. 1879. Vol. 20)。——364。
- 布卢默, 威·《从色当战役至战争结束时德军的军事行动, 引自大本营的战役档案材料》1872 年柏林版(Blume, W.: Die Operationen der deutschen Heere von der Schlacht bei Sedan bis zum Ende des Krieges nach den Operations - Akten des Großen Hauptquartiers dargestellt. Berlin 1872)。——112。
- 布什, 尤·海·莫·《同法兰西作战时期的俾斯麦伯爵及其追随者》(两卷集), 引自《莫·布什博士日记》1878 年莱比锡版(Busch, J. H. M.: Graf Bismarck und seine Leute während des Krieges mit Frankreich, Nach Tagebuchsblättern von D. Moritz Busch. Bd. 1. 2. Leipzig 1878)。——655。

C

- 措伊斯, 卡·《德意志人和邻近各部落》1837 年慕尼黑版(Zeuß K.: Die Deutschen und die Nachbarstämme. München 1837)。——243。

D

- 达尔曼, 弗·克·《丹麦史》1840 年汉堡版第 1 卷(Dahlmann, F. C.: Geschichte von Dänemark. Bd. 1. Hamburg 1840)。——246。
- 道金斯, 威·博·《不列颠的原始人及其在第三纪的地位》1880 年伦敦版(Dawkins, W. B.: Early man in Britain and his place in the tertiary period. London 1880)。——193, 226。
- 《德国地形专用图》(哥·丹·雷曼编) 格洛高版, 无出版年代(Topographische Special-Karte von Deutschland. Hrsg. von Gottlob Daniel Reymann. Glogau o. J.)。——302, 304—306。
- 《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评论箴言》, 载于《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1879 年苏黎世—上斯特拉斯版第 1 卷第 1 册(Rückblicke auf die sozialistische Bewe-

- gung in Deutschland. Kritische Aphorismen von * * *. In: Jahrbuch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cialpolitik. Jg. 1. 1. Hälfte. Zürich - Oberstrass 1879)。——355。
- 狄奥·卡西乌斯《罗马史》(Dio Cassius: Historia Romana)。——199、210、212、215、218、220、245。
- 度申,若·《工业帝国。第二帝国的金融和工业特许权的历史考证》1869年巴黎版(Duchéne, G.: L'empire industriel. Histoire critique des concessions financières et industrielles du Second Empire. Paris 1869)。——679。
- 杜林,欧·《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兼论财政政策的基本问题》1876年莱比锡第2版(部分修订)(Dühring, E.: Cursus der National - und Socialökonomie einschliesslich der Hauptpunkte der Finanzpolitik. 2., theilw. umgearb. Aufl. Leipzig 1876)。——54。
- 多尔富斯,让·《废止进口棉纱的禁令。关于法国棉纺织品关税制度改革利益的论述》1853年巴黎版(Dollfus, J.: Plus de prohibition sur les filés de coton. Exposé des avantages d'une réforme douanière en France pour les articles de coton. Paris 1853)。——662。

E

- 《俄国黑书》伦敦版,无出版年代(The black book of Russia. London o. J.)。——625。
- 恩格尔,恩·《从技术和统计说明蒸汽时代》1881年柏林版(Engel, E.: Das Zeitalter des Dampfes in technisch - statistischer Beleuchtung. Berlin 1881)。——532。

F

- 费泽,爱·《宗教改革以来的德国宫廷史》1851—1860年汉堡版第1—48卷(Vehse, 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Höfe seit der Reformation. Bd. 1—48. Hamburg 1851—1860)。——447。
- 傅立叶,沙·《关于普遍统一的理论》1841年巴黎第2版第3卷(Fourier, Ch.: Théorie de l'unité universelle. 2. éd. Vol. 1—4. Vol. 3. Paris 1841)。——380。
- 傅立叶,沙·《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1808年莱比锡版([Fourier, Ch.:] Thé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 et des destinées générales. Prospectus et annonce de la découverte. Leipzig 1808)。——375。

傅立叶,沙·《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或按情欲分类的引人入胜的和合乎自然的劳动方式的发现》,载于《傅立叶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6卷(Fourier, Ch.: *Le nouveau monde industriel et sociétaire, ou invention du procédé d'industrie attrayante et naturelle distribuée en séries passionnées*. In: *œuvres Complètes de Ch. Fourier*. T. 6. Paris 1845)。——380、404。

G

盖拉尔,本·埃·沙·《修道院院长伊尔米农的地产登记册》,引自保·罗特《采邑制度史》1850年埃朗根版(Guéraud, B. - E. - Ch.: *Polyptique de l'abbé Irminon*. Nach: P. Roth: *Geschichte des Beneficialwesens...* Erlangen 1850)。——264、280。

格莱斯顿,威·尤·《俄国在突厥斯坦的政策和行动》,载于1876年11月《现代评论》(伦敦)第28卷(Gladstone, W. E.: *Russian policy and deeds in Turkistan*. In: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London. Vol. 28. November 1876)。——619、626。

格林,雅·《德意志语言史》1848年莱比锡版第1—2卷(Grimm, J.: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e*. Bd. 1. 2. Leipzig 1848)。——208、243、250、280、288、290、307。

H

哈克斯特豪森,奥·冯·《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1847年汉诺威版第1—2册,1852年柏林版第3册(Haxthausen, A. von.: *Studien über die innern Zustände, das Volksleben und insbesondere die ländlichen Einrichtungen Rußlands*. Th. 1. 2. Hannover 1847. Th. 3. Berlin 1852)。——140。

[哈讷肯,海·冯·]《《梅斯之战》作者的军事思想和对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见解》1871年美茵茨版([Hanneken, H. von:] *Militärische Gedanken und Betrachtungen über den deutsch-französischen Krieg der Jahre 1870 und 1871 vom Verfasser des "Krieges um Metz"*. Mainz 1871)。——110。

海奈,莫·《古代萨克森语及古代下法兰克语简明语法》1873年帕德博恩版(Heyne, M.: *Kleine altsächsische und altniederfränkische Grammatik*. Paderborn 1873)。——284。

- 豪威耳, 乔·《国际协会史》, 载于 1878 年《19 世纪》(伦敦) 第 4 期 (Howell, G. : The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1878. Vol. 4)。——319。
- 黑格尔, 乔·威·弗·《历史哲学讲演录》1840 年柏林第 2 版 (Hegel, G. W. F. :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2. Aufl. Berlin 1840)。——372、549。
- 黑泽基埃尔, 格·路·《俾斯麦伯爵传》1869 年比勒费尔德—莱比锡版 (Heskiel, G. L. : Das Buch vom Grafen Bismarck. Bielefeld, Leipzig 1869)。——655。

K

- 卡莱尔, 托·《当代评论。(一)当前的时代》1850 年伦敦版 (Carlyle, T. : Latter-day pamphlets. Nr. 1. : The present time. London 1850)。——531。
- 卡莱尔, 托·《过去和现在》1843 年伦敦版 (Carlyle, T. :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1843)。——531。
- 凯伦, 亨·《萨利克法典注解和萨利克法兰克人的语言。德意志语言史论》1869 年海牙版 (Kern, H. : Die Glossen in der Lex Salica und die Sprache der salischen Franke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en. Haag 1869)。——285、289。
- 凯撒《高卢战记》(Caesar: Commentarii de bello Gallico)。——201、202、204、568。
- 科瑟伊恩, 彼·雅·《简明古代西萨克森语语法》1881 年莱顿版第 1 卷 (Cosijn, P. J. : Kurzgefasste altwestsächsische Grammatik. Th. 1. Leiden 1881)。——287。

L

- 拉普拉斯, 皮·西·《宇宙体系解说》法兰西共和四年[1795—1796 年]巴黎版第 2 卷 (Laplace, P-S. de: Exposition du système du monde. T. 1. 2. T. 2. Paris an IV [1795—1796])。——586。
- 雷博, 路·《棉花; 棉花制度——棉花问题; 棉花对欧洲的影响》1863 年巴黎版 (Reybaud, L. : Le coton; son régime-ses problèmes; son influence en Europe. Paris 1863)。——662、666。
- 雷博, 路·《铁和煤》1874 年巴黎版 (Reybaud, L. : Le fer et la houille. Paris 1874)。

——674。

利沙加勒, 普·奥·《1871年的公社史》1876年布鲁塞尔版(Lissagaray, P. O.: Histoire de la Commune de 1871. Bruxelles 1876)。——109。

列列韦尔, 约·《马赛的皮肤提亚斯和他那个时代的地理学》1836年布鲁塞尔版(Lelewel, J.: Pythéas de Marseille et la géographie de son temps. Bruxelles 1836)。——197。

卢梭, 让·雅·《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1755年阿姆斯特丹版(Rousseau, J. J.: 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s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 Amsterdam 1755)。——386。

卢梭, 让·雅·《社会契约论, 或政治权利的原则》1762年阿姆斯特丹版(Rousseau J. J.: Du contract social; 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 Amsterdam 1762)。——372。

罗特, 保·《从上古到10世纪的采邑制度史》1850年埃朗根版(Roth, P.: Geschichte des Beneficialwesens von den ältesten Zeiten bis ins zehnte Jahrhundert. Erlangen 1850)。——260、273。

罗伊特, 弗·《狱中生活》(Reuter, F.: Ut mine Festungstid)。——67。

洛里亚, 阿·《地租和地租的自然消失》1880年米兰—那波利—比萨版(Loria, A.: La rendita fondiaria e la sua elisione naturale, Milano, Napoli, Pisa 1880)。——611。

洛里亚, 阿·《卡尔·马克思》, 载于1883年4月1日《科学、文学和艺术最新集萃》(罗马)第7号(Loria, A.: Karl Marx. In: Nuova Antologia di scienze, lettere ed arti. Roma. Fasc. 7, 1. April 1883)。——611。

洛里亚, 阿·《意大利经济学家的价值理论》1882年博洛尼亚版(Loria, A.: La teoria del valore negli economisti italiani. Bologna 1882)。——611。

M

马丁, 昂《国际工人协会》, 载于1865年10月14日《世纪报》(巴黎)第11171号(Martin, H.: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In: Le Siècle. Paris. Nr. 11171, 14. Oktober 1865)。——320。

毛勒, 格·路·《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1854年慕尼黑版(Maurer, G. L. von: Einleitung zur Geschichte der Mark-, Hof-, Dorf- und Stadt-Verfassung und der öffentlichen Gewalt. München

- 1854)。——278, 567。
- 毛奇, 赫·卡·伯·《1828—1829年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俄土战争》1845年柏林版(Moltke, H. K. B. von: Der russisch-türkische Feldzug in der europäischen Türkei 1828—1829. Berlin 1845)。——156。
- 梅恩, 亨·萨·《东方和西方的农村公社。在牛津大学的六次演讲》1871年伦敦版(Maine, H. S.: Village-communities in the East and West. Six lectures delivered at Oxford. London 1871)。——468。
- 门克, 泰·《中古史和近代史袖珍地图集》——见施普鲁纳, 卡·冯/泰·门克《中古史和近代史袖珍地图集》。
- 弥伦霍夫, 卡·《德国考古学》1870年柏林版第1卷(Müllenhoff, K.: Deutsche Altertumskunde. Bd. 1. Berlin 1870)。——198。
- [米拉波, 奥·加·]《柏林宫廷秘史》, 译自法文, 无出版地点, 1789年版第1—2册([Mirabeau, H. G.:] Geheime Geschichte des Berliner Hofes. Aus dem Französischen übers. und mit Anm. begleitet. Th. 1. 2. O. O. 1789)。——449。
- 米海洛夫斯基, 尼·康·《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 载于1877年10月《祖国纪事》(圣彼得堡)第10期(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Н. К.: Карль Марксь передь судомъ г. Ю. Жуковскаго. In: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я Записки. С. - Петербургъ. Nr. 10. Oktober 1877)。——140, 143。
- 缪弗林, 弗·卡·斐·《我的一生》1851年柏林版(Müffling, F. C. F.: Aus meinem Leben. Berlin 1851)。——157。
- 摩尔根, 路·亨·《古代社会, 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1877年伦敦版(Morgan, L. H.: Ancient society or researches in the lines of human progress from savagery, through barbarism to civilization. London 1877)。——459。
- 莫利纳里, 古·德·《19世纪经济发展。发展理论》1880年巴黎版(Molinari, G. de: L' évolution économique du dix-neuvième siècle. Théorie du progrès. Paris 1880)。——668。
- 莫讷, 弗·约·《7世纪末以前的巴登地方古代史》(两卷集)。第1卷《上莱茵边区的罗马人》1845年卡尔斯鲁厄版(Mone, F. J.: Urgeschichte des badischen Landes bis zu Ende des siebenten Jahrhunderts. Bd. 1. 2. Bd. 1 [u. d. T.]: Die Römer im oberrheinischen Gränzland. Karlsruhe 1845)。——307。
- [莫斯特, 约·]《英国》, 载于1881年3月19日《自由》(伦敦)第12号([Most,

- J. :]England. In: Freiheit. London. Nr. 12, 19. März 1881)。——486。
- 莫斯特, 约·《资本和劳动。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浅说》(1873[大概 1874]年茨维考—开姆尼茨版)(Most, J. : Kapital und Arbeit. Ein populärer Auszug aus "Das Kapital" von Karl Marx. (Zwickau, Chemnitz 1873 [vermutl. 1874]))。——609—611。
- 莫斯特, 约·《资本和劳动。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浅说》[1876年]开姆尼茨第2版(修订版)(Most, J. : Kapital und Arbeit. Ein populärer Auszug aus "Das Kapital" von Karl Marx. 2. verb. Aufl. Chemnitz[1876])。——611。
- [莫斯特, 约·]《最终!》, 载于 1881 年 3 月 19 日《自由》(伦敦)第 12 号([Most, J. :]Endlich! In: Freiheit. London. Nr. 12, 19. März 1881)。——486。

N

- 纳德勒, 卡·哥·《快乐的帕尔茨, 上帝保佑你! 普法尔茨方言诗》1851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Nadler, K. G. : Fröhlich Palz, Gott erhalt' s! Gedichte in Pfälzer Mundart. Frankfurt/Main 1851)。——315。

O

- 欧文, 罗·《人类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 或将来由非理性到理性的过渡》1849 年伦敦版(Owen, R. : The revolution in the mind and practice of the human race; or, the coming change from irrationality to rationality. London 1849)。——382—383。

P

- 蒲鲁东, 皮·约·《经济矛盾的体系, 或贫困的哲学》1846 年巴黎版第 1—2 卷(Proudhon, P. J. : 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T. 1. 2. Paris 1846)。——129、425。
- 普林尼《博物志》, 引自《德国史前史学家……古代》1849 年柏林版第 1 卷(Plinius Caesilius Secundus, Gaius: Naturalis historia. Nach: Die Geschichtschreiber der deutschen Vorzeit... Die Urzeit. Bd. 1. Berlin 1849)。——206、226、230、243—246、252。
- 普卢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Plutarchus Chaeronensis: Vitae parallelae)。——198。

Q

戚美尔曼, 约·格·《论孤独》1784—1785年莱比锡版第1—4册(Zimmermann, J. G.; Ueber die Einsamkeit. Th. 1—4. Leipzig 1784—1785)。——448。

S

[圣西门, 昂·]《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1803年巴黎版], 引自尼·古·于巴《圣西门。他的生平和著述》1857年巴黎版([Saint-Simon, H. :] Lettres d'un habitant de Genève à ses contemporains. [Paris 1803.] Nach: N - G. Hubbard; Saint-Simon. Sa vie et ses travaux. Paris 1857)。——375、378。

施洛塞尔, 弗·克·《18世纪和19世纪史(至法兰西帝国倾覆)》1853年海德堡第4版(修订版)第1—4卷(Schlosser, F. C.; Geschichte des achtzehnten Jahrhunderts und des neunzehnten bis zum Sturz des Französischen Kaiserreichs. 4. durchaus verb. Aufl. Bd. 1—4. Heidelberg 1853)。——449、451。

施普鲁纳, 卡·冯/泰·门克《中古史和近代史袖珍地图集》1880年哥达第3版(Spruner, K. von, Th. Menke; Hand-Atlas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s und der neueren Zeit. 3. Aufl. Gotha 1880)。——303。

施特劳斯, 大·弗·《耶稣传(校勘本)》1835—1836年蒂宾根版第1、2卷(Strauss, D. F.; Das Leben Jesu, kritisch bearbeitet. Bd. 1. 2. Tübingen 1835—1836)。——550。

斯特拉本《地理学》, 引自《德国史前史学家……古代》1849年柏林版第1卷(Strabo; Geographica. Nach: Die Geschichtschreiber der deutschen Vorzeit... Die Urzeit. Bd. 1. Berlin 1849)。——203、221、241。

T

塔西佗《编年史》(Tacitus: Annales)。——219、225、227。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Tacitus: Germania)。——204、207、230、232、234、243。

特伦克, 弗·《引人入胜的传记》1787年柏林增订新版第1—3册(Trenck, F. : Merkwürdige Lebensgeschichte. Neue mit Zusätzen verm. und verb. Aufl. Th. 1—3. Berlin 1787)。——448。

《突厥斯坦的俄国人》[署名为一个俄国人], 载于1876年10月27日《每日新闻》(伦敦)第9521号(The Russians in Turkestan. [Gez. : A Russian.] In: The

- Daily News. London. Nr. 9521, 27. (Oktober 1876)。——619、628。
《突厥斯坦的俄国人》[署名为另一个俄国人], 载于 1876 年 10 月 30 日《每日新闻(伦敦)第 9523 号》(The Russians in Turkestan. [Gez.: Another Russian.]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9523, 30. (Oktober 1876)。——621。
图尔的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 引自保·罗特《采邑制度史》1850 年埃朗根版 (Gregorius Turonensis: Historia Francorum. Nach: P. Roth: Geschichte des Beneficialwesens... Erlangen 1850)。——262。
托勒密《地理学》(Ptolemaeus: Geographia)。——233、241、243、245、247。

W

- 瓦茨, 格·《德国国家制度史》1844 年基尔版第 1 卷 (Waitz, G.: 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Bd. 1. Kiel 1844)。——248。
微耳和, 鲁·〔《关于梅诺卡岛头盖骨的报道》〕, 载于 1878 年《民族学杂志》(柏林)第 10 卷《柏林人类学、民族学和原始史协会辩论》(Virchow, R.: [Mitteilung über den Schädel von Menorca.] In: Zeitschrift für Ethnologie. Berlin. Bd. 10. 1878. [Beil.:] Verhandlungen der Berliner Gesellschaft für Anthropologie, Ethnologie und Urgeschichte)。——195。
韦莱《罗马史》, 引自《德国史前史学家……古代》1849 年柏林版第 1 卷 (Velleius: Historia Romana. Nach: Geschichtschreiber der deutschen Vorzeit... Die Urzeit. Bd. 1. Berlin 1849)。——212、215、217、218、243。
维贝格, 卡·弗·《古典民族通过商业对北方各国的影响》(约·梅斯托尔夫译自瑞典语)1867 年汉堡版 (Wiberg, C. F.: Der Einfluß der klassischen Völker auf den Norden durch den Handelsverkehr. Aus dem Schwedischen von J. Mestorf. Hamburg 1867)。——227。
维贝格, 卡·弗·《希腊人和罗马人通过北方商路同北方交往的研究》1861 年耶夫勒版 (Wiberg, C. F.: Bidrag till kännedom om Grekerna och Romarnas förbindelse med Norden och om de nordiska handelsvägarne. Gefle 1861)。——227。
维耳克, 克·哥·《最初的福音书编述者或对头三个福音书的亲近关系的诠释性考证研究》1830 年德累斯顿—莱比锡版 (Wilke, C. G.: Der Urevangelist oder exegetisch-kritische Untersuchung über das Verwandtschaftsverhältniß der drei ersten Evangelien. Dresden, Leipzig 1830)。——550。

- 魏特林, 威·《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年斐维版(Weitling, W.: Garantien der Harmonie und Freiheit. Vivis 1842)。——618。
- [沃尔弗, 弗·威·]《国内新闻》, 载于1848年10月25、26、27日、11月4日、12月29、30日, 1849年1月1、3、5、11、17、18日、3月11日、4月9日《新莱茵报》(科隆)第125、126、127、134、181、182、184、185、187、192、197、198、243、268号([Wolff, F. W.:] Aus dem Reiche.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1848. Nr. 125, 25. Oktober; Nr. 126, 26. Oktober; Nr. 127, 27. Oktober; Nr. 134, 4. November; Nr. 181, 29. Dezember; Nr. 182, 30. Dezember. Beil.; 1849. Nr. 184, 1. Januar; Nr. 185, 3. Januar; Nr. 187, 5. Januar. Beil.; Nr. 192, 11. Januar; Nr. 197, 17. Januar; Nr. 198, 18. Januar; Nr. 243, 11. März. 2. Ausg.; Nr. 268, 9. April)。——73。
- [沃尔弗, 弗·威·]《(国王给农民的专利权)》, 载于1849年1月20日《新莱茵报》(科隆)第200号([Wolff, F. W.:] (Das königliche Patent an die Bauern).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200, 20. Januar 1849)。——77。
- [沃尔弗, 弗·威·]《(普鲁士的十亿)》, 载于1849年3月17日《新莱茵报》(科隆)第248号([Wolff, F. W.:] (Die preußische Milliarde).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248, 17. März 1849)。——76、79—81。
- 沃尔弗, 弗·威·《(西里西亚的十亿)》, 载于1849年3月22、25、27、29日, 4月5、12、13、14、25日《新莱茵报》(科隆)第252、255、256、258、264、270、271、272、281号(Wolff, F. W.: (Die schlesische Milliarde).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1849. Nr. 252, 22. März; Nr. 255, 25. März. 2. Ausg.; Nr. 256, 27. März; Nr. 258, 29. März; Nr. 264, 5. April; Nr. 270, 12. April; Nr. 271, 13. April; Nr. 272, 14. April; Nr. 281, 25. April)。——81—98、100。
- 沃尔弗, 弗·威·《西里西亚临时赎免法》, 载于1848年12月29日《新莱茵报》(科隆)第181号(Wolff, F. W.: Das interimistische Ablösungsgesetz für Schlesien.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181, 29. Dezember 1848)。——82。
- 沃尔弗, 弗·威·《赞美诗集》, 载于1840年7—12月《西里西亚省报》(布雷斯劳)第112卷(Wolff, F. W.: Gesangbuch. In: Schlesische Provinzial-Blätter. Breslau. Bd. 112. Juli bis Dezember 1840)。——68。
- 沃尔索, 耶·雅·阿·《当时文献中的北方各国古代史》(约·梅斯托尔夫译成德文)1878年汉堡版(Worsaae, J. J. A.: Die Vorgeschichte des Nordens nach gleichzeitigen Denkmälern. Ins Deutsche übertr. von J. Mestorf. Hamburg

1878)。——229。

X

- 希尔德布兰德, 汉·《瑞典的异教时代》(约·梅斯托尔夫译成德文)1873年汉堡版(Hildebrand, H.; Das heidnische Zeitalter in Schweden. Übers. von J. Mestorf. Hamburg 1873)。——232。
- [希尔施, 卡·]《关于关税的辩论》, 载于1879年5月25日《灯笼》(布鲁塞尔)第21期([Hirsch, C. :] Die Zolldebatte. In: Die Laterne. Brüssel. Nr. 21, 25. Mai 1879)。——351—354。
- [希尔施, 卡·]《谈谈凯泽尔的演说和投票问题》, 载于1879年6月8日《灯笼》(布鲁塞尔)第23期([Hirsch, C. :] Zur Kaiserschen Rede und Abstimmung. In: Die Laterne. Brüssel. Nr. 23, 8. Juni 1879)。——351—354。
- 《洗礼誓的程式》, 载于《古代低地德意志文献简编》1877年帕德博恩第2版(Taufgelöbniß. In: kleinere altniederdeutsche Denkmäler. 2. Aufl. Paderborn 1877)。——289。
- 欣克马尔(兰斯的)《兰斯年鉴。869年年鉴》, 引自格·路·冯·毛勒《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1854年慕尼黑版(Hincmar Remensis; Annales Remenses. Annales ad annum 869. Nach: G. L. von Maurer; Einleitung zur Geschichte der Mark-, Hof-, Dorf- und Stadt-Verfassung und der öffentlichen Gewalt. München 1854)。——278。
- 欣克马尔(兰斯的)《雷米吉乌斯传》, 引自保·罗特《采邑制度史》1850年埃朗根版(Hincmar Remensis; Vita Remigii. Nach: P. Roth; Geschichte des Beneficialwessens... Erlangen 1850)。——263。

法律、法令、条例

F

- 《反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法》[草案], 载于《德意志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1878年第4届第1次例会》1878年柏林版第2卷(Gesetz gegen die gemeingefährlichen Bestrebungen der Sozialdemokratie. [Entwurf.] In: 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Deutschen Reichstags. 4.

Legislaturperiode. 1. Session 1878. Bd. 2. Berlin 1878)。——329、330、333、340。
 《反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社会治安法》，载于1878年10月22日《德意志帝国通报和普鲁士王国通报》(柏林)第249号晚报(Gesetz gegen die gemeingefährlichen Bestrebungen der Sozialdemokratie. In: Deutscher Reichs-Anzeiger und Königlich 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 Berlin. Nr. 249, 22. Oktober 1878. Abends)。——415、525。

G

- 《关于德国关税区的关税率及关税和烟草税收益的法律》，载于1879年《帝国法令通报》(柏林)第27号(Gesetz, betreffend den Zolltarif des Deutschen Zollgebiets und den Ertrag der Zölle und der Tabaksteuer. In: Reichsgesetzblatt. Berlin. 1879. Nr. 27)。——418、419、505。
- 《关于国家财政和建设税收新机构等等的法令。1810年10月27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10年柏林版第2号(Edikt über die Finanzen des Staats und die neuen Einrichtungen wegen der Abgaben u. s. w. Vom 27. Oktober 1810. In: 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Berlin. 1810. Nr. 2)。——80。
- 《关于防止工人非法结社的法令。1799年7月12日》，载于《公众基本法规汇编。乔治三世39年。1799年》1799年伦敦版(An Act to prevent unlawful combinations of workmen. 12th July 1799. In: A Collection of the Public General Statutes. 39 George III. 1799. London 1799)。——488。
- 《关于废除工人结社法及含有其他目的的法令。1824年6月21日》，载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律汇编。乔治四世5年。1824年》1839年伦敦版(An Act to repeal the laws relative to the combination of workmen, and for other purposes therein mentioned. 21st June 1824. In: The Statut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5 George IV. 1824. London 1839)。——497。
- 《关于进一步修改英国和威尔士人民选举法的法令。1867年8月15日》，载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律汇编。维多利亚30和31年。1867年》1867年伦敦版(An Act to further amend the laws relating to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in England and Wales. 15th August 1867. In: The Statut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30 & 31 Victoria. 1867. London 1867)。——500、521、522。

- 《关于简化占有和自由使用地产,及农村居民人身关系的法令。1807年10月9日》,载于《1806—1810年10月27日普鲁士王国发表的法令和法规汇编》1822年柏林版第16号(Edikt den erleichterten Besitz und den freien Gebrauch des Grund-Eigenthums, so wie die persönlichen Verhältnisse der Land-Bewohner betreffend. Vom 9. Oktober 1807. In: Sammlung der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erschienenen Gesetze und Verordnungen von 1806 bis zum 27. Oktober 1810... Als Anhang zu der seit dem Jahre 1810 edirten 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Berlin. 1822. Nr. 16)。——66。
- 《关于实行一般营业税的法令。1810年10月28日(1810年11月2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10年柏林版第4号(Edikt über die Einführung einer allgemeinen Gewerbe-Steuer. Vom 28. Oktober. 1810. (2. November 1810.) In: 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Berlin. 1810. Nr. 4)。——90。
- 《关于调整地主和农民关系的法令。1811年9月14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11年》(无出版年代)柏林版第21号(Edikt die Regulierung der gutherrlichen und bäuerlichen Verhältnisse betreffend vom 14. September 1811. In: 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1811. Berlin. O. J. Nr. 21)。——47。
- 《关于无偿地废除各种义务和苛税法案的草案。1848年7月10日》,载于《为了商定普鲁士国家宪法而召集的会议辩论速记记录》1848年柏林版第2卷(Entwurf eines Gesetzes betreffend die unentgeltliche Aufhebung verschiedener Lasten und Abgaben vom 10. Juli 1848. In: 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zur Vereinbarung der preußischen Staatsverfassung berufenen Versammlung. Bd. 2. Berlin 1848)。——75—76。
- 《关于修改现行调整谷物进口法的法令。1815年3月23日》,载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律汇编。乔治三世55年。1815年》1815年伦敦版(An Act to amend the laws now in force for regulating the importation of corn. 23rd March 1815. In: The Statut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55. George III. 1815. London 1815)。——504,515—517,535。
- 《关于修改英格兰和威尔士人民选举法的法令。1832年6月7日》,载于《公众基本法规汇编。威廉四世2和3年。1832年》1832年伦敦版(An Act to ame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in England and Wales. 7th June 1832. In: A

Collection of the Public General Statutes. 2 & 3 William IV. 1832. London 1832)。
——535。

《关于增收注册税和印花税的法律。1874年2月19日于凡尔赛》，载于让·巴·杜韦尔日耶《法令、命令、规章和国务委员会通告汇编》1874年巴黎版 (Loi portant augmentation des droits d'enregistrement et de timbre. Versailles, le 19 février 1874. In: J. B. Duvergier: Collection complète des lois, décrets, ordonnances, règlements et avis du Conseil a'État... Paris 1874)。——679。

M

《民族法》，引自保·罗特《采邑制度史》1850年埃朗根版 (Leges nationum Germanicarum oder Leges barbarorum. Nach: P. Roth: Geschichte des Beneficialwesens... Erlangen 1850)。——237、258、273。

——《阿勒曼尼法典》(—Lex Alamannorum)。——237。

《民族法》(—Leges nationum Germanicarum oder Leges barbarorum Lex Angliorum et Werinorum, hoc est Thuringorum)。——237。

——《巴伐利亚法典》(—Lex Baiuvariorum)。——237。

——《弗里西安法典》(—Lex Frisionum)。——237。

——《萨利克法典》(—Lex Salica)。——238。

P

《普鲁士、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波森、西里西亚和萨克森省专区法。1872年12月13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72年》(无出版年代)柏林版第41号 (Kreisordnung für die Provinzen Preußen, Brandenburg, Pommern, Posen, Schlesien und Sachsen. Vom 13. Dezember 1872. In: 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1872. Berlin. O. J. Nr. 41)。——55、91、99。

《普鲁士国家宪法原本。1850年1月31日》，载于1850年《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柏林)第3号 (Verfassungs-Urkunde für den preußischen Staat. Vom 31. Januar 1850. In: 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Berlin. 1850. Nr. 3)。——31。

《普鲁士君主国各省奴仆规约。1810年11月8日》，载于1810年《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柏林)第5号 (Gesinde-Ordnung für sämtliche Provinzen der Preußischen Monarchie. Vom 8. November 1810. In: 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ssischen Staaten. Berlin. 1810. Nr. 5)。——100。

Q

[《取消罚款或克扣工资的法令。1871年4月27日于巴黎》], 载于1871年4月29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巴黎)第119号([Arrête sur L'abolition des amendes ou retenues sur les salaires. Paris, 27 avril 1871.] In: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Paris. Nr. 119, 29. April 1871)。——659。

S

《首次讨论反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社会治安法。[1878年9月16—17日]》, 载于《德意志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1878年第4届第1次例会》1878年柏林版第1卷(Erste Berathung des Gesetzentwurfs gegen die gemeingefährlichen Bestrebungen der Sozialdemokratie [16./17. September 1878]. In: 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Deutschen Reichstags. 4. Legislaturperiode. 1. Session 1878. Bd. 1. Berlin 1878)。——328—341。

X

《西尔蒙通俗叙述的图尔契约程式集》, 引自保·罗特《采邑制度史》1850年埃朗根版(Formulae Turonenses vulgo Sirmondicae dictae. Nach: P. Roth: Geschichte des Beneficialwesens. . . Erlangen 1850)。——273。

《西里西亚省地主—农民关系临时调节法令》, 载于1848年12月21日《普鲁士国家通报》(柏林)第231号(Verordnung, betreffend die interimistische Regulierung der gutsherrlich-bäuerlichen Verhältnisse in der Provinz Schlesien. In: Preussischer Staats-Anzeiger. Berlin. Nr. 231, 21. Dezember 1848)。——77。

Z

《祖宗敕令》(Capitularia maiorum domus)。

——《743年查理曼敕令》(Capitulare Carlomanni a. 743)。——290。

《法兰克国王敕令》(Capitularia regum Francorum)。——265、281。

——《811年军队晋升敕令》(Capitulare de exercitu promovendo a. 811)。——262、279。

——《813年敕令》(Capitulare a. 813)。——274。

- 《816 年敕令》(Capitulare a. 816)。——274。
- 《817 年敕令》(Capitulare a. 817)。——280。
- 《821 年敕令》(Capitulare a. 821)。——281。
- 《847 年敕令》(Capitulare a. 847)。——274。
- 《853 年敕令》(Capitulare a. 853)。——280、281。
- 《861 年敕令》(Capitulare a. 861)。——280、281。
- 《864 年敕令》(Capitulare a. 864)。——280。
- 《873 年敕令》(Capitulare a. 873)。——280、281。

文 件

D

- [《大不列颠和法兰西之间的通商决议案》], 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81 年伦敦版第 3 辑第 262 卷([Resolution on a commercial treaty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France.] In: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 3. ser. Vol. 262. London 1881)。——502。
- [《德国国民会议告德国人民书》的补充], 载于《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会议辩论速记记录》1849 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 9 卷([Zusatz zum Aufruf "Die deutsche Nationalversammlung an das deutsche Volk".] In: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m Main. Bd. 9. Nr. 228, 26. Mai 1849. Frankfurt a. M. 1849)。——103。
- 《德国工人党纲领》(草案), 载于 1875 年 3 月 7 日《人民国家报》(莱比锡)第 27 号 (Programm der deutschen Arbeiterpartei. [Entwurf.] In: Der Volksstaat. Leipzig. Nr. 27, 7. März 1875)。——5—33。
-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 载于 1875 年 5 月 28 日《人民国家报》(莱比锡)第 59 号 (Programm der sozialistischen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 In: Der Volksstaat. Leipzig. Nr. 59, 28. Mai 1875)。——352。
- 《对法国的通商(谈判)——法国新的总关税。决议案》, 载于《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81 年伦敦版第 3 辑第 162 卷(The commercial treaty with France (Negotiations) — The new French general tariff. Resolution. In: Hansard's parliamen-

tary debates. 3. ser. Vol. 162. London 1881)。——502。

F

《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会议辩论速记记录》184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9卷(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m Main. Bd. 9. Frankfurt a. M. 1849)。——103—105。

《弗雷肯霍斯特赋税登记册》,载于《古代低地德意志文献简编》1877年帕德博恩第2版(Freckenhorster Heberolle. In: Kleinere altniederdeutsche Denkmäler. 2. Aufl. Paderborn 1877)。——287、288。

G

〔《关于尽快从法律上调整农民各个阶层状况的提案》〕,载于《钦定12月5日召开的议会辩论速记记录。第二议院》第1卷:《1849年2月26日开幕至4月27日第37次会议闭幕》1849年柏林版,《普鲁士国家通报》副刊([Antrag auf baldige gesetzliche Regelung der Verhältnisse der verschiedenen Schichten der ländlichen Bevölkerung.] In: 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urch das Allerhöchste Patent vom 5. Dezember einberufenen Kammern. Zweite Kammer. Bd. 1: Von der Eröffnungs-Sitzung am 26. Februar bis zur Auflösung in der 37. Sitzung am 27. April 1849. Berlin 1849. Beil. zum preußischen Staats-Anzeiger)。——81。

〔《普鲁士内阁关于〈无偿地废除农村地主各种义务和苛税的法案〉的声明》〕,载于1848年12月13日《普鲁士国家通报》(柏林)第223号([Erklärung des preußischen Ministeriums zum “Gesetzentwurf, betreffend die unentgeltliche Aufhebung verschiedener Lasten und Abgaben der ländlichen Grundbesitzer”.] In: 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 Berlin. Nr. 223, 13. Dezember 1848)。——76。

H

《皇室文件和通信》1871年巴黎版第1—2卷(Papiers et correspondance de la famille impériale. T. 1. 2. Paris 1871)。——104、133。

K

《可能提出的对多数派草案的修正案》(《德国国民会议告德国人民书》),载于

《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会议辩论速记记录》1849年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版第9卷(Eventueller Verbesserungsantrag zu dem Entwurf der Majorität ("Die deutsche Nationalversammlung an das deutsche Volk"). In: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m Main. Bd. 9. Frankfurt a. M. 1849)。——103。

M

《曼彻斯特同盟宣言》，载于1842年8月23日《泰晤士报》(伦敦)第18069号(Address of the Manchester League. In: The Times. London. Nr. 18069, 23. August 1842)。——515。

Q

《钦定1848年12月5日召开的议会辩论速记记录。第二议院》第1卷：《1849年2月26日开幕至4月27日第37次会议闭幕》1849年柏林版，《普鲁士国家通报》副刊(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urch das Allerhöchste Patent vom 5. Dezember 1848 einberufenen Kammern. Zweite Kammer. Bd. 1; Von der Eröffnungs - Sitzung am 26. Februar bis zur Auflösung in der 37. Sitzung am 27. April 1849. Berlin 1849. Beil. zum Preußischen Staats-Anzeiger)。——81、82。

S

《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宣言。致全体德国工人!》，载于1870年9月11日《人民国家报》(莱比锡)第73号(Manifest des Ausschusses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Arbeiterpartei. An alle deutschen Arbeiter! In: Der Volksstaat. Leipzig. Nr. 73, 11. September 1870)。——652。

W

《为了商定普鲁士国家宪法而召集的会议揭露反动军官的企图的决议。1849年8月9日》，载于《为了商定普鲁士国家宪法而召集的会议辩论速记记录》1849年柏林版第1卷(Beschluß der zur Vereinbarung der preußischen Staatsverfassung berufenen Versammlung vom 9. August 1848 zu den Bestrebungen der reaktionären Offiziere. In: 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zur

Vereinbarung der preußischen Staats - Verfassung berufenen Versammlung. Bd. 1. Berlin 1848)。——73。

X

《下莱茵历史档案》1832年杜塞尔多夫版第1部分《古代语言和法》(五卷集)第1卷(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Niederrheins. Abth. 1: Sprach - und Rechtsaltertümer. Bd. 1--5. Bd. 1. Düsseldorf 1832)。——301。

Y

《1875年5月22—27日在哥达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1875年莱比锡版(Protokoll des Vereinigungs - Congresses der Sozialdemokraten Deutschlands abgehalten zu Gotha, vom 22. bis 27. Mai 1875. Leipzig 1875)。——643, 644。

《议员莫斯莱就威廉国王号和大选帝侯号装甲舰相撞一事提出质询的理由、答复和讨论》载于《德意志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1878年第4届第1次例会》1878年柏林版第1卷(Begründung, Beantwortung und Besprechung der Interpellation des Abgeordneten Mosle, betreffend den Zusammenstoß der Panzerschiffe "König Wilhelm" und "Großer Kurfürst". In: 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Deutschen Reichstags. 4. Legislaturperiode. 1. Session 1878. Bd. 1. Berlin 1878)。——83。

Z

〔致反对法德战争的各民族工人的宣言〕, 载于1870年7月17日《人民国家报》(莱比锡)第57号([Manifest an die Arbeiter aller Nationen gegen den Deutsch - Französischen Krieg.] In: Der Volksstaat. Leipzig. Nr. 57, 17. Juli 1870)。——652。

《致反对普法战争的全体欧洲人民的宣言》, 载于1870年7月27日《人民国家报》(莱比锡)第60号(Manifest an alle Völker Europas zur Protestation gegen den französisch - preußischen Krieg. In: Der Volksstaat. Leipzig. Nr. 60, 27. Juli 1870)。——652。

《致国际工人协会全体支部和成员。1875年5月16日总委员会通告》1875年纽约版(An alle Sektionen und Mitglieder der IAA. Zirkular des Generalrats vom

16. Mai 1875. New York 1875)。——38—39。

报刊中的文章和通讯

(作者不详)

B

《北德总汇报》

- 1875年3月20日第67号：(Politischer Tagesbericht. In: 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 Berlin. Nr. 67, 20. März 1875)。——23。
- 1877年9月30日、10月5、24日、11月2日第229、234、251、259号：(Politischer Tagesbericht. In: 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 Berlin. 1877. Nr. 229, 30. September; Nr. 234, 5. Oktober; Nr. 251, 24. Oktober; Nr, 259, 2. November)。——648。

D

《灯笼》

- 1879年5月25日第21号：(Die Zolldebatte. In: Die Laterne. Brüssel. Nr. 21, 25. Mai 1879)。——351—354。
- 1879年6月8日第23号：(Aus Breslau schreibt man der“Laterne”。In: Die Laterne. Brüssel. Nr. 23, 8. Juni 1879)。——351—354。
- 1879年6月8日第23号：(Zur Kaiserschen Rede und Abstimmung. In: Die Laterne. Brüssel. Nr. 23, 8. Juni 1879)。——351—354。

F

《法国经济学家周刊》

- 1880年5月15日第20期：(Les discussions de la Société d'Économie politique. Réunion du 5 mai 1880. In: L'Économiste français. Paris. Nr. 20, 15. Mai 1880)。——669。

《法兰西共和国公报》

- 1871年8月25日第236号：([Loi relatif à l'augmentation des droits de tim-

bre.]Versailles, le 23 août 1871. In: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Versailles. Nr. 236, 25. August 1871)。——670。

G

《国际工人协会汝拉联合会简报》

—1876年12月17日第51号:(Italie. In: Bulletin de la Fédération jurassienne de l'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Sonvillier. Nr. 51, 17. Dezember 1876)。——120。

J

《经济学家杂志》

—1880年5月第5期:(Société d'Économie politique. Réunion du 5 mai 1880. In: 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Paris. Nr. 5, Mai 1880)。——669。

K

《科隆日报》

—1876年2月5日第36号:《德意志帝国国会讨论实况》(Verhandlungen des Deutschen Reichstages. In: Kölnische Zeitung. Nr. 36, 5. Februar 1876)。——45。

—1876年2月8日第39号:(Vermischte Nachrichten). In: Kölnische Zeitung. Nr. 39, 8. Februar 1876)。——58。

M

《每日新闻》

—1881年3月31日第10906号:(Prosecution of the "Freiheit" journal.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10906, 31. März 1881)。——486。

—1881年6月29日第10983号:(Socialism in Saxony.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10983, 29. Juni 1881)。——524。

—1881年7月12日第10994号:(The Social Democrats in Germany.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10994, 12. Juli 1881)。——524。

—1881年7月15日第10997号:(News from Berlin.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10997, 15. Juli 1881)。——524。

P

《派尔—麦尔新闻》

—1876年11月2日第3653号：(Mr. Gladstone answered. In: The Pall Mall Gazette. London. Nr. 3653, 2. November 1876)。——620。

《平民报》

—1876年12月4日第25号：(Da Parigi. [Korrespondenz.] In: La Plebe. Milano. Nr. 25, 4. Dezember 1876)。——119。

—1877年1月21日第3号：(Quattro piccole righe. . . In: La Plebe. Milano. Nr. 3, 21. Januar 1877)。——121。

—1877年2月26日第7号：(Congresso Socialista di Milano. In: La Plebe. Milano. Nr. 7, 26. Februar 1877)。——121。

—1877年2月26日第7号：(Abbiamo ricevuto. . . In: La Plebe. Milano. Nr. 7, 26. Februar 1877)。——121。

Q

《前进报》

—1878年5月17日第57号：(Das Attentat. In: Vorwärts. Leipzig. Nr. 57, 17. Mai 1878)。——335。

X

《先驱》

—1867年9月、1871年10月第9、10期：(Empfangsbescheinigungen der für die Zentralkasse von Außen eingegangenen Beträge. In: Der Vorbote. Genf. Nr. 9, September 1867; Nr. 10, Oktober 1871)。——186。

《新闻报》

—1880年5月21日第139号：(Les grèves. In: La Presse. Paris. Nr. 139, 21. Mai 1880)。——667。

Z

《总汇通报》

—1840年5月19、20、21、22日第140、141、142、143号：([Débats sur une loi por-

- tant prorogation du privilège de la Banque de France.]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1840. Nr. 140, 19. Mai; Nr. 141, 20. Mai; Nr. 142, 21. Mai; Nr. 143, 22. Mai)。——678。
- 1840年7月9日第191号:([Loi portant prorogation du privilège de la Banque de France.]Neuilly, le 7 juillet 1840.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191, 9. Juli 1840)。——679。
- 1847年2月18日,4月11、14、15、16、17日第49、101、104、105、106、107号:([Débats sur une loi ayant pour objet d'autoriser la Banque de France à émettre des billets de 250fr.]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1847. Nr. 49, 18. Februar; Nr. 101, 11. April; Nr. 104, 14. April; Nr. 105, 15. April; Nr. 106, 16. April; Nr. 107, 17. April)。——678。
- 1848年3月16日第76号:([Décret sur le cour forcé, Paris, le 15 mars 1848.]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76, 16. März 1848)。——678。
- 1857年6月11日第162号:([Loi portant prorogation du privilège de la Banque de France.]Paris, le 28 mai 1857.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162, 11. Juni 1857)。——678。

文学著作

A

- 奥维狄乌斯《哀歌》。——221。
奥维狄乌斯《黑海零简》。——221。

D

- 但丁《神曲》。——128。
狄德罗·德·《拉摩的侄子》。——386。

F

- 伏尔泰《对人生有益的回忆》。——448。
伏尔泰《耶尼传》。——450。
伏尔泰《我在柏林之时》。——450。

G

- 歌德《浮士德》悲剧第1部。——395。
《古德意志诗歌今译》。——284—286。

H

- 海涅《阿波罗神. 1—3》, 载于《罗曼采罗》。——551。
海涅《青春的苦恼》。——118。
海涅《一个青年爱一个姑娘……》。——339。

L

- 鲁日·德·李尔, 克·《马赛曲》。——71。

P

- 佩特罗尼乌斯《萨蒂里孔》。——554。

S

- 塞万提斯《唐·吉珂德》。——586。
莎士比亚《爱的徒劳》。——626。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323。
莎士比亚《无事烦恼》。——511。

X

- 席勒《希腊之神》。——62。

圣经

- 《旧约全书·诗篇》。——69。
—《新约全书》。——550。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388。
—《新约全书·使徒行传》。——322。
—《新约全书·约翰启示录》。——552、557。

报 刊 索 引

B

《白厅评论》(The Whitehall Review)——英国保守派的周报,1876—1929年在伦敦出版。——619—621。

《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61—1918年在柏林出版;60—80年代是俾斯麦政府的官方报纸,主编是奥·布拉斯(1872年以前)和埃·弗·品特(从1872年9月1日起)。——23、187、188、334、648。

《北极星报。全国工联的报纸》(The Northern Star, and national Trades' Journal)——英国的一家周报,宪章派的机关报;1837年由菲·奥康瑞尔在利兹创刊,名称为《北极星报。利兹总汇报》(The Northern Star, and Leeds General Advertiser);1843年9月乔·米·哈尼参加报纸编辑部;1844年11月起用现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1843—1849年报纸曾刊登恩格斯的文章、短评和通讯;哈尼离开编辑部后报纸逐步转回宪章派右翼的观点;1852年停刊。——438。

《柏林自由新闻报》(Berliner Freie Presse)——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报,1876年1月1日创刊,1876年中起编辑是约·莫斯特,1878年10月23日被查禁。——653。

D

《德法年鉴》(Deutsch - 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由马克思和阿·卢格编辑;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一期双刊号;其中刊载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标志着他们在理论上完成了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彻底过渡的重要著作;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上

的意见分歧。——129、437。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 - Brüsseler Zeitung)——德国政治流亡者在布鲁塞尔创办的报纸,1847年1月3日—1848年2月27日由阿达尔贝特·冯·伯恩施太德主编和出版;起初具有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倾向,后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成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者,威·沃尔弗从1847年2月底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7年9月起成为该报的经常撰稿人,并实际领导编辑部的工作。——71、130、438、597。

《德意志帝国通报和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Deutscher Reichs - Anzeiger und Königlich Preubischer Staats - Anzeiger)——见《普鲁士国家总汇报》。

《灯笼》(Die Laterne)——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家周刊,1878年12月15日至1879年6月29日在布鲁塞尔出版,由卡·希尔施编辑;周刊曾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抨击俾斯麦的军事专制主义和反动的关税保护政策。——345、349—354。

F

《法国经济学家周刊》(L'Économiste français. Journal hebdomadaire)——法国的一家周刊,1873年4月19日至1938年7月30日在巴黎出版。——669。

《法兰克福报和商报》(Frankfurter Zeitung und Handelsblatt)——德国的一家日报,南德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1856年由路·宗内曼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创办和出版,最初的名称为《法兰克福商报》(Frankfurter Handelszeitung),1859年改名为《新法兰克福报—法兰克福商报》(Neue Frankfurter Zeitung — Frankfurter Handelszeitung),1866年起用《法兰克福报和商报》这个名称出版;报纸具有鲜明的反普鲁士和反俾斯麦的倾向,维护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工人运动中的政治和思想影响。——187。

《法兰西帝国公报》(Journal officiel de l'Empire française)——法国的一家报纸,1870—1940年先后在巴黎和凡尔赛出版,政府的官方报纸,主要刊登法律和法令;1871年3月20日至5月24日改为《法兰西共和国公报》(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先后作为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公社的正式机关报出版,但仅在3月30日的报纸上写有“巴黎公社正式机关报”字样。——670。

《法兰西共和国公报》(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见《法兰西帝国公报》。

《费加罗报》(Le Figaro)——法国的一家文学政治周报,1854年在巴黎创刊,1866年改为日报,并成为第二帝国政府的喉舌。——650。

G

《共和国》(The Commonwealth)——英国的工人报纸,国际总委员会的机关报,1866年2月10日至1867年7月20日作为《工人辩护士报》(The Workman's Advocate)的续刊在伦敦出版,每周一期;马克思曾是该报编辑监察委员会成员,出版者为阿·迈奥尔,1866年2—3月约·格·埃卡留斯任编辑,4月乔·奥哲尔被任命为总编辑。报纸曾刊登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和国际的文件以及恩格斯的文章;后来由于参加报纸领导工作的工联领袖的妥协政策,报纸在选举改革的斗争中改变了方针,从1866年9月8日起成为改革同盟的机关报,成了激进资产阶级和非国教徒雇主集团的喉舌。周报于1867年7月20日停刊。——322。

《国际工人协会汝拉联合会简报》(Bulletin de la Fédération jurassienne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瑞士无政府主义者的刊物,1872年2月15日至1875年3月25日用法文先后在松维利耶、勒洛克尔、拉绍德封等地出版,每月出两次,为半月刊,1873年7月6日起改为周刊。发行人为阿·施维茨盖贝尔,由詹·吉约姆编辑。简报经常刊登文章或短评,诽谤和攻击国际工人协会和国际的活动家。最后因经费不足而停刊。——120。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48年4月1日—1915年在柏林出版;50年代具有自由主义倾向,后为民族自由党的主要机关报;1866年以后支持俾斯麦的政策,1870—1871年曾号召兼并法国领土,主张武力镇压巴黎公社。——185。

J

《基督教读本》(The Christian Reader)——英国的一家年鉴,1842—1843年由G. B.和T.吉本斯在伦敦出版。——322。

《经济学家杂志。经济学和统计学评论》(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Revue de la science économique et de la statistique)——669。

《经济学家杂志。政治经济、农业、工业和商业每月评论》(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Revue mensuelle d'économie politique et des questions agricoles, manufacturières et commerciales)——法国的一家月刊,1841年12月15日至

1943年在巴黎出版。——425。

K

《抗议报,社会主义杂志》(*O Protesto, Periodico Socialiste*)——葡萄牙的一家社会主义周刊。1875年8月—1878年1月在里斯本出版。——172。

《科隆日报》(*Köln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世纪创刊,1802—1945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9世纪40年代初代表温和自由派的观点,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反对派持批判态度,维护莱茵地区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科隆教会争论中代表天主教会的利益;《莱茵报》被查封后,报纸成为莱茵地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要机关报;后站在民族自由党的立场支持俾斯麦的政策。1831年起报纸出版者是杜蒙,1842年报纸的政治编辑是海尔梅斯。——45、54、59、128。

《科学、文学和艺术最新集萃》(*Nuova Antologia die scienze, lettere ed arti*)——意大利自由派的文学、艺术和科学杂志;1866—1877年在佛罗伦萨出版,每月一期,1878—1943年在罗马出版,每月两期。——611。

L

《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见《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德国的一家日报,青年黑格尔派的喉舌;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莱茵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支持下在科隆出版;创办人是伯·腊韦,编辑是伯·腊韦和阿·鲁滕堡,发行负责人是路·舒尔茨和格·荣克;1842年4月起马克思为报纸撰稿,同年10月马克思成为报纸编辑之一;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报纸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并成为德国最重要的反对派报纸之一;1843年4月1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128、538、541、597。

《劳动旗帜报。工业界刊物》(*The Labour Standard. An Organ of Industry*)——英国的一家周报,工联的机关报;1881—1885年在伦敦出版,由乔·希普顿编辑;报纸具有强烈的机会主义倾向;1881年5月7日至8月6日恩格斯曾为报纸撰稿。——169、492—495、508、515—518、537。

M

《马赛曲报》(*La Marseillaise*)——法国左派共和党人的日报,1869年12月19日

- 至1870年9月9日在巴黎出版;由于反对第二帝国统治集团的行动,1870年2月10—11日被勒令停刊,5月18日至7月20日被查封,9月9日完全停刊;出版者为昂·罗什弗尔,主编为保·格鲁赛,编辑部成员有安·阿尔诺、西·德雷尔、阿·恩贝尔、昂·罗什弗尔,昂·马雷等人,撰稿人有茹·瓦莱斯、欧·瓦尔兰、古·弗洛朗斯、保·拉法格、维·罗瓦尔和燕·龙格等人;报纸经常报道国际工人协会在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活动,刊登国际总委员会的文件。——588。
-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英国自由党的报纸,曼彻斯特学派的机关报,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1846年1月21日由W.K.黑尔斯在伦敦创刊,1909年起同时在伦敦和曼彻斯特出版,1930年停刊。第一任主编为查·狄更斯,继任的编辑有约·福斯特、哈·马蒂诺(1902—1919),最后一任编辑为J.斯·霍奇森。60年代末起亨·拉布谢尔是报纸的三个所有者之一,1901年起为某公司所有,数月后归乔·卡德伯里独有。报纸支持自由贸易派的观点,1862年美国内战爆发,它是英国报纸中惟一支持北方的报纸。70—8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报纸撰稿。——185、187、188、323、486、524、604、619、620、623、628、630。
- 《民族学杂志。柏林人类学、民族学和原始史学会会刊》(Zeitschrift für Ethnologie. Organ der Berliner Gesellschaft für Anthropologie, Ethnologie und Urgeschichte)——德国的一家杂志,1869年由阿·巴斯蒂安和罗·哈特曼在柏林创刊,编辑是鲁·微耳和。——195。

N

-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 - York Daily Tribune)——美国的一家日报,由霍·格里利和托·麦克尔拉斯等创办,1841年4月10日—1924年在纽约出版,50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40—50年代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坚决反对奴隶占有制;1851年8月—1862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报纸撰稿;美国内战开始后,报纸日益离开进步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遂停止撰稿并与报纸断绝关系。除日报外,还出每周版《纽约每周论坛报》(New - York Weekly Tribune)(1841年9月起)和半周报《半周论坛报》(Semi - Weekly Tribune)(不迟于1845年),1853年5月《半周论坛报》改名为《纽约半周论坛报》(New - York Semi - Weekly Tribune)。——132、597、684。
- 《纽约人民报。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New Yorker Volkszeitung. Den Interessen des arbeitenden Volks gewidmet)——美国的一家日报,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

的机关报；由亚·约纳斯创办，1878—1932年在纽约用德文出版；出版者和主编是谢·舍维奇(1880—1881年)和阿·杜埃(1878—1888年)。——602。
《纽约星报》(New - York Star)——528。

P

《派尔—麦尔新闻。晚报和评论》(The Pall Mall Gazette. An Evening Newspaper and Review)——英国保守派的一家日报，1865年2月—1920年在伦敦出版，为晚刊；编辑为弗·格林伍德(1865—1880年)、威·托·斯特德(1883—1889年)；1870年7月—1871年6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报纸有联系，在此期间报纸刊登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和第二篇宣言(摘要)和恩格斯的关于普法战争的一组文章《战争短评》，以前还刊登过有关国际的代表大会的报道；巴黎公社失败后，鉴于报纸对公社的攻击日益增多，马克思和恩格斯遂停止撰稿并与报纸断绝关系。——619、620、630。

《平等报。革命组织的刊物》(L'Égalité. Organe collectiviste révolutionnaire)——法国的一家社会主义周报，1877年由茹·盖得创办，1880—1883年为法国工人党机关报；1877—1883年分五个专刊出版：第1、2、3三个专刊每周出一次(共出113期)，第4、5两个专刊每日出一次(共出56期)；计划出版的第6个专刊只在1886年4月出了一期；第2、3个专刊前后在1880年1月21日至8月25日、1883年2月16—25日出版；编辑部成员先后有加·杰维尔、茹·盖得、保·拉法格、卡·布伊、昂·布里萨克、莱·皮卡尔和埃·马萨尔；80年代初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报纸撰稿。——425、670。

《平民报》(La Plebe)——意大利的一家报纸，由恩·比尼亚米创办，1868年7月4日—1875年10月29日在洛迪或洛迪—米兰、1875年11月1日—1883年11月1日在米兰不定期出版；1881—1882年曾以周刊的形式出版《平民报。社会主义周刊》(La Plebe. Rivista Socialista Ebdomadria)；报纸起初采取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主义的立场，1871—1872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下成为国际意大利各支部的机关报；1876—1877年再度得到恩格斯的支持，成为正在兴起的意大利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报纸；报纸刊登过国际的文件和恩格斯的文章。——39、119—121。

《平民报。社会主义周刊》(La Plebe. Rivista Socialista Ebdomadaria)——见《平民报》。

《普鲁士国家通报》(Preußischer Staats - Anzeiger)——见《普鲁士国家总汇报》。

- 《普鲁士国家总汇报》(Allgemeine Preußische Staats-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报纸,1819年1月2日—1843年6月30日在柏林出版;1843年7月1日—1848年4月30日用《普鲁士总汇报》(Allgemeine Preußische Zeitung)的名称出版,1848年5月1日—1850年12月31日改名为《普鲁士国家通报》(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1851年1月—1871年5月改名为《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Königlich 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1871年5月4日起成为德意志帝国政府的官方报纸,并更名为《德意志帝国通报和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Deutscher Reichs-Anzeiger und Königlich 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1917年停刊。——78、185、187、188。
- 《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Königlich 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见《普鲁士国家总汇报》。

Q

- 《前进报。巴黎德文杂志》(Vorwärts! Pariser Deutsche Zeitschrift)——在巴黎出版的一家德文刊物,1844年1月创刊,原名《巴黎艺术、科学、戏剧和精神生活信号报》(Pariser Signale aus Kunst, Wissenschaft, Theater und geselligem Leben);1844年6月起用现在这个名称出版;原为一家毫无政治色彩的戏剧报,但从1844年夏天起,在马克思的影响下成为三月革命前最优秀的革命报纸之一,反对普鲁士的反动政策,刊登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的具有共产主义内容的文章;1844年12月因一些工作人员被政府驱逐出法国而停刊。——597。
- 《前进! 不定期评论》(Вперёд! Непериод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一家在苏黎世(1873—1874年)和伦敦(1875—1877年)出版的俄文杂志,总共出了五卷。1873—1876年杂志的出版者为彼·拉·拉甫罗夫;1877年,第五卷由瓦·尼·斯米尔诺夫和尼·库利亚勃科-科列茨基编辑出版。——34。
- 《前进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Vorwärts. Central-Organ der Sozialdemokratie Deutschlands)——德国的一家报纸,1876年10月1日—1878年10月26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三次,同时出版科学附刊和附刊;编辑是威·哈森克莱维尔和威·李卜克内西;反社会党人法颁布以后报纸被迫停刊;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帮助报纸编辑部;1877—1878年报纸以及它的科学附刊和附刊刊登了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论》;它的续刊为《社会民主党人报》(Der Sozialdemokrat)。——329、335、353、441。

R

- 《人民报》(Das Volk)——在伦敦出版的一家德文周报,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和其他在伦敦的德国工人团体的机关报;1859年5月7日—8月20日由埃·比斯康普在伦敦创办和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报纸撰稿,从6月初起马克思实际上成为报纸的编辑,并于7月初接任该报的领导;编辑部成员有比斯康普、威·李卜克内西和弗·列斯纳等。——132。
- 《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德国的一家报纸,1869年10月2日—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起初每周出两次,1873年7月起每周出三次;创刊时的副标题是《社会民主工党和工会联合会机关报》(Organ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Arbeiterpartei und der Gewerksgenossenschaften),1870年7月2日起改名为《社会民主工党和国际工会联合会机关报》(Organ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Arbeiterpartei und der Internationalen Gewerksgenossenschaften),1875年6月11日起又改名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Organ der Sozialistischen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报纸编辑部领导人是威·李卜克内西,出版社社长是奥·倍倍尔;报纸反映了德国工人运动中革命派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报纸创刊之日起就为之撰稿;他们认为报纸的活动具有重大意义,并密切注视它的工作,及时批评它的疏忽和某些错误,纠正它的路线,使它成为19世纪70年代最优秀的工人报纸之一。——34,441。

S

- 《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Jahrbuch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一家具有改良主义倾向的德文杂志,1879—1881年由卡·赫希柏格(笔名路德维希·李希特尔)在苏黎世出版,前后共出三册。——344,355。
- 《社会民主党人报。德语区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Der Sozialdemokrat. Organ der Sozialdemokratie deutscher Zunge)——一家德文周报,1879年9月—1888年9月在苏黎世出版,1888年10月—1890年9月27日在伦敦出版;1879—1880年编辑是格·福尔马尔,1881—1890年编辑是爱·伯恩施坦;马克思、恩格斯、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之撰稿,在他们的影响下报纸成为国际工人运动最主要的革命报纸,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战胜反社会党人法作出了重大贡献。——585,594,605,613。
- 《社会民主党人报。全德工人联合会机关报》(Der Social-Demokrat. Organ des

- Allgemeinen Deutschen Arbeitervereins)——德国的一家报纸,1864年12月15日—1871年4月21日由约·巴·施韦泽和约·巴·霍夫施泰滕在柏林出版,每周三次;马克思和恩格斯应邀为报纸撰稿,后来施韦泽在报上支持俾斯麦的政策,搞拉萨尔崇拜,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再为报纸撰稿;1871年4月底—1876年报纸用《新社会民主党人报》(Neuer Social-Demokrat)的名称出版,推行拉萨尔的政策,迎合俾斯麦制度,巴结德国统治阶级,反对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支持巴枯宁派和其他反无产阶级流派的仇视总委员会的活动。——426。
- 《社会主义评论》(La Revue Socialiste)——法国一家由贝·马隆创办的共和社会主义刊物,后为工团主义和合作社机关刊物。1880年1—4月为月刊,5—9月在巴黎和里昂两地出版半月刊;1885—1914年改为在巴黎出版。188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杂志撰稿。——427、430—435、437、585。
- 《19世纪。每月评论》(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Monthly Review)——英国自由派的月刊,创办人和主编是詹·托·诺尔兹;1877—1900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1900年后改名为《19世纪及以后》(The Nineteenth Century & After),1951年起用《20世纪》(The Twentieth Century)的名称出版。——319、320、325。
- 《十字报》(Kreuz-Zeitung)——见《新普鲁士报》。
- 《世纪报》(Le Siècle)——法国的一家日报。1836—1939年在巴黎出版,1870—1871年曾在图尔和波尔多出版;19世纪40年代代表部分仅限于要求温和的宪法改革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320。

T

- 《泰晤士报》(The Times)——英国的资产阶级报纸,保守党的机关报,1785年1月1日在伦敦创刊,报名为《环球纪事日报》(Daily Universal Register),1788年1月1日起改名为《泰晤士报》,每日出版。报纸与政府人士、教会和垄断组织关系密切,是专业性和营业性的报纸,具有强烈的帝国主义倾向;1866—1873年间曾报道国际的活动和刊登国际的文件。——619、622、650。

W

- 《威斯特伐利亚历史和考古学文库》(Archiv für Geschichte und Alterthumskunde Westphalens)——德国的一家杂志,1826—1827年在哈姆,1828—1838年在

莱姆戈出版,共出7卷;主编是保·维干德。——288。

《未来。社会主义评论》(Die Zukunft. Socialistische Revue)——德国一家具有改良主义倾向的杂志,1877年10月至1878年11月由卡·赫希伯格(笔名路德维希·李希特尔博士)在柏林出版,每月出两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杂志提出尖锐批评。——361。

X

《西里西亚省报》(Schlesische Provinzial - Blätter)——德国的一家报纸,1785—1849年在布雷斯劳(弗罗茨拉夫)、1862—1867年在格罗高出版。——68。

《先驱。国际工人协会机关报》(Der Vorbote. Organ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ziation)——一家德文月刊,1866年1月至1871年12月在日内瓦出版;主编是约·菲·贝克尔;1867年起为政治和社会经济月刊;国际德语区支部联合会中央机关刊物;杂志总的说来执行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路线,定期刊登国际的文件,报道国际各国支部的活动情况。——186。

《先驱者。人民历书画刊》(Pionier. Illustrierter Volks - Kalender)——美国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一家用德文出版的年鉴。1883—1904年在纽约发行;编辑是海·施留特尔。——129、138。

《现代评论》(The Contemporary Review)——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月刊,1866年起在伦敦出版。——619、620、626—630。

《新道德世界》(New Moral World)——见《新道德世界。合理社会的报纸》。

《新道德世界。合理社会的报纸》(The New Moral World; and Gazette of the Rational society)——英国的一家周报,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1834—1846年出版,由罗·欧文创办;1836年曾几度更换副标题;起初在利兹出版,1841年10月起在伦敦出版;1843年11月至1845年4月恩格斯曾为报纸撰稿。——438。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无产阶级第一家独立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主编是马克思,编辑有恩格斯、威·沃尔弗、斐·沃尔弗、格·维尔特、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等;报纸作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核心,实际完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任务;1848年9月26日科隆实行戒严,报纸暂时停刊;此后在经济和组织方面遇到了巨大困难,马克思不得不在经济上对报纸的出版负责,为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现金贡献出来,报纸终于获得了新生;

1849年5月马克思和其他编辑被驱逐或遭迫害,报纸被迫停刊。——35、41、72、73、74、75、77、78、79、81、82、84、85、87、90、92、94、95、98、101、105、131、438、597。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 - ökonomische Revue)——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的杂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刊物;1850年1—10月在伦敦编辑,汉堡和纽约印刷,共出6期。——132、441。

《新社会。社会科学月刊》(Die neue Gesellschaft. Monatsschrift für Socialwissenschaft)——德国改良派的杂志,1877年10月至1880年3月在苏黎世出版,创办人和主编是弗·维德;曾建议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报纸撰稿,被谢绝。——361。

《新闻报》(La Presse)——法国的一家日报,1836年在巴黎创刊,七月王朝时期具有反政府的性质;1848—1849年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是反波拿巴的报纸;1836—1857年主编是埃·日拉丹。——667。

Z

《正义报》(La Justice)——法国的一家日报,激进党的机关报,1880—1930年在巴黎出版;1880—1897年,领导报纸的是报纸创办人若·克列孟梭;在这一时期,报纸是激进党的所谓极左派的机关报,维护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纲领,代表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利益;1880年7月11日大赦以后,沙·龙格成为报纸编辑。——588。

《钟声》(Колоколь)——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报纸,1857—1865年由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用俄文在伦敦不定期出版,1865—1867年在日内瓦出版,1868—1869年改用法文出版,同时出版俄文版附刊。——547。

《芝加哥论坛报》(The Chicago Tribune)——美国的一家日报,接近共和派,1846年开始出版,每周出三次,附加晚上版。——639。

《自由》(Freiheit)——德国无政府主义派的周报,1879—1882年在伦敦、1882年在瑞士、1882—1908年在纽约用德文出版,由约·莫斯特编辑出版;起初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不久便成为以莫斯特和威·哈赛尔曼为首的无政府主义派的喉舌;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尖锐批评报纸的无政府主义言论。——350、486、528、610、689。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法国的一家日报,1789—1901年在巴黎

出版,1811年1月1日起用这个名称出版,最初用《国民报,或总汇通报》(Gazette nationale, ou Le Moniteur universel)的名称出版,1799—1814、1816—1868年是政府的官方报纸;1848年2月26日起加副标题《法兰西共和国官方报纸》;巴黎被围困期间,报纸在巴黎和图尔两地同时出版,后在波尔多出版,是甘必大领导的国防政府代表团的正式机关报。——678、680。

《祖国纪事》(Отечественныя Записки)——俄国的一家文学政治月刊,1839—1884年在圣彼得堡出版;主要撰稿人有维·格·别林斯基、亚·伊·赫尔岑、米·尤·莱蒙托夫、尼·阿·涅克拉索夫、伊·谢·屠格涅夫和米·叶·萨尔梯柯夫·谢德林;报纸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性质,后来主要倾向于民粹派。——140。

地名索引

A

- 阿道夫斯埃克 225
 阿德里安堡(埃迪尔内) 158
 阿德瑞 295
 阿尔卑斯山脉 194、195、196、220、
 226、571
 阿尔河 283、308、314
 阿尔及尔 606
 阿尔默河 211
 阿尔萨斯 302、580、663、682
 阿尔萨斯—洛林 60
 阿尔特马克(地区) 55
 阿非利加 242
 阿格河 305
 阿根廷 514
 阿哈尔齐赫 158
 阿基坦(法国西南部,原高卢西南部)
 261
 阿拉伯 156
 阿勒曼尼亚 267、299、310
 阿利斯(阿利斯-圣雷纳) 222
 阿利索(要塞) 210、213、217、219、
 220、223、251
 阿列(煤矿区) 509
 阿姆斯特丹 283、317
 阿纳帕 158
 阿让特伊 588、590、602、606、608
 阿瓦尔高 296
 埃布罗河谷地 53
 埃尔伯费尔德 101
 埃尔伯费尔德—巴门(伍珀河谷)
 48、114、314、525
 埃尔伯夫 666
 埃尔森 211
 埃弗利亚——见艾费尔高原
 埃格山 288
 埃及 680
 埃克塞特 123、124
 埃朗根 273
 埃利索河(阿尔默河或利斯河) 210
 埃林根 225
 埃姆斯(巴特埃姆斯) 225
 埃姆斯河 207、209、210、214、223、
 241、246、248
 埃森 284、287、296、419、420
 艾德河 202
 艾费尔高原(埃弗利亚) 296、304、
 311—313
 艾克斯(普罗旺斯地区的) 199、668

- 艾瑟尔河 211、224、307
 爱丁堡 420
 爱尔福特 608
 爱尔兰 96、98、100、197、383、412、
 497、505、514、524—526、528、534、
 535、575、588、643
 安格里瓦里人边境墙——见恩格恩
 昂吉安(浴场) 606
 昂赞 682
 敖德萨 605、608
 奥得河 226—228、240、245、250、
 252
 奥得河口 248
 奥登林山 571
 奥地利 35、39、41、42、52、56、57、99、
 131、148、152—154、159、165、173、
 174、325、445、447、625、643、649、
 650
 奥尔德姆 536
 奥尔登堡 246
 奥尔良 109、110
 奥尔珀 296
 奥格斯堡 227
 奥斯宁山 214、220、251、288
 奥斯特法伦 287
 奥斯特河 228
 澳大利亚 澳洲 59、126、193、513、
 669
- B**
- 巴达维亚岛 209
 巴登 101、102、106、130、131、365、
 582
 巴登—杜拉赫 447
 巴登高(吕讷堡灌木林) 242、250
 巴登维克(巴多维克) 242
 巴尔干山脉 156—158、636
 巴伐利亚(拜恩) 102、238、261、
 570、580、582
 巴勒斯坦 558
 巴黎 39、41、72、76、102、109—113、
 129—131、133、176—180、264、280、
 320、321、350、365、375、376、379、
 380、404、417、425、445、450、484、
 538、541—544、588、589、597、599、
 600、605、618、625、626、634、637、
 640、650、651、668、676
 巴伦西亚 688
 巴门——见埃尔伯费尔德—巴门
 巴门—埃尔伯费尔德——见埃尔伯
 费尔德—巴门
 巴涅尔—德吕雄 588
 巴塞尔 132、324
 保加利亚 152、157、636、637
 北阿尔宾吉亚 252
 北布拉班特 291
 北德大平原(北德的低平原) 197、
 208、228
 北德意志(北德德国北部) 99、
 195、197、213、235
 北德意志海岸(北海沿岸) 197、
 198、207
 北非 193、199、557
 北弗里斯兰(地区) 246

- 北豪森 46
北海(德意志海) 197、203、208、
211、223、228、231、233、238、241、
246、252、290、299
北美(北美洲) 53、547
北英格兰 536
贝恩卡斯特尔 303
贝格 214、284、288、296
贝格海姆 303
贝格区 48—50、286、290、293、
299—301、307、311、571
贝奇瓦河 228
彼得堡——见圣彼得堡
比德里希 303
比利牛斯山脉(比利牛斯地区)
194、261、588、685
比利时 39、59、71、130、167—169、
171、173、176、194、196、209、246、
290、291、296、305、306、312、325、
407、506、508、521、643
比奇 312
比萨 611
比萨拉比亚 154
边境墙(罗马边境墙)201、206、225、
228、238
宾根 313
波茨坦 77
波恩 49、128、211、214
波尔多 53、588、589
波尔图 52、172
波河谷地 196
波鸿 419
波季 158
波兰 35、36、41、42、52、54、102、133、
147、184、320、326、444—446、618、
625、632、633、643
波罗的海(东海) 198、208、229、
231—233、245
波罗的海沿岸 207、235、239
波美拉尼亚(地区) 47、54、79、80、
580
波森(波兹南) 47、54、68、80
波士顿 132、649
波希米亚(捷克) 154、175、198、
210、213、226—228、237、242、250、
326
波希米亚边境山脉 201
波希米亚林山 201
伯尔尼 111
伯肯黑德 502
伯罗奔尼撒半岛(摩里亚半岛) 555
伯明翰 533
柏林 22、35、56、72、73、81—83、112、
114、115、128、132、140、149、150、
154、156、164、185、186、195、198、
329、349、357、412、416、417、420、
421、423、426、448、450、484、525、
532、549、553、650、653、684
勃艮第 238
勃兰登堡 46、47、54、80、250、578、
580
勃兰登堡(勃拉尼博尔) 202、228
博恩高 296
博恩霍尔姆岛 232

- 博洛尼亚(波伦亚) 168,611
 博让西 110,112
 波斯普鲁斯海峡 636,638
 布尔加斯 158
 布拉德福德 502
 布莱贝格 447
 布莱金厄(省) 233
 布勒伊拉 158
 布雷 308
 布雷 559—562
 布雷斯劳(弗罗茨瓦夫) 66,68,69、
 101,103,107,147,164,525
 布列塔尼 131
 布龙贝格(比得哥什) 227
 布鲁塞尔 65,70—72,121,129、
 130,173,294,309,445,538,541、
 544,598,650
 布吕尔 308
 布洛涅 309
 不来梅 51
 不列颠 196,239,247,692
 不列颠海岸 233
 不列颠群岛 195
 不伦瑞克 46,114,164
- D**
- 达尔马提亚(地区) 228
 大贝尔特海峡 232
 大不列颠(不列颠帝国,联合王国)
 323,412,499,503,521,533,535、
 649
 大圣伯纳德山口 209
- 大西洋 106,233,416,444,503,506
 代特莫尔德 220,222
 丹麦 39,51,173,174,195,232,325、
 643
 丹麦群岛 208,229,232,234
 但泽(格但斯克) 229
 德国(德意志) 23,24,26—32,35、
 36,38,39,41,45—48,50,56,57、
 59,60,62,69,71,77,100—102、
 110,111,114,115,118,121,129、
 130,132,148,149,154,156,163—
 168,173,176,184,186,196,200、
 201,203,204,208,209,212,213、
 215—218,220—224,226—231,234
 —236,238,239,243,247,254,267、
 295,296,300,301,308,325,327、
 329,332—335,338,339,342,343、
 351—356,361—363,373,379,384、
 386,390,391,412,415—421,423、
 445,447,449,504,505,520—522、
 524—526,532,533,539,542,562、
 567—572,574,575,578—584,600、
 609,611,618,635,640,643,645 —
 647,649—654,656,682,685
 德国北部——见北德意志
 德国东北部地区(旧普鲁士,东部各
 省) 46,50,58,61,62,69,75,76、
 80,81,89,343
 德国西北部地区 46
 德库马特地区 227
 德勒 112
 德累斯顿 101,114,131,164,525、

- 526、550、650、657
 德伦峡谷 220
 德涅斯特河 227
 德意志海——见北海
 迪尔河 248、308
 迪克海姆 75
 迪克斯迈德 306
 地中海 195
 第聂伯河 227
 蒂宾根 550
 蒂伦豪特 306
 蒂嫩(蒂勒蒙) 306
 丁克尔斯比尔 225
 丁斯拉肯 305
 东波美拉尼亚 79
 东方 159、557、558
 东欧 184
 东普鲁士 197、198、242、580
 东印度(东印度群岛) 456、460、
 461、476、479
 杜拉赫 447
 杜塞尔多夫 301
 杜伊斯堡 305
 敦刻尔克 283、317
 多尔斯滕 305
 多拉特湾 291
 多瑙河 158、196—199、203、204、
 209、212、213、220、223、225、236、
 238、243、244、283、567、636
 多瑙河两公国 158
 多瑙河发源地 196
 多瑙河河口(多瑙河下游) 198、
 235、237、240、244、252
 多瑙河上游 227
 多瑙河下游——见多瑙河河口
 多瑙河中游 240
 多农山 312
 多特蒙德 419、420
 多伊茨 214
- ### E
- 俄国(俄罗斯) 34—36、41、42、45、
 51、59—61、73、89、102、133、140、
 143、145、148—150、152—159、181、
 183、184、186、195、320、325、326、
 335、343、445、446、455、456、461—
 476、479—481、483、486、539、542、
 545、547、548、569、598、607、618、
 619—626、628—630、636—638、
 643、645、649、655、685
 厄尔士山脉 200、211
 厄兰岛 232—234
 厄兰海峡(卡尔马海峡) 232
 厄勒海峡 232
 厄瑟尔岛(萨列马岛) 227
 恩格恩(安格里瓦里人边境墙)
 224、287
 恩格尔斯 242
 恩格尔斯高 242
- ### F
- 法国(法兰西) 7、26、29、35、36、39、
 41、52、53、59、60、71、72、77、81、83、
 109—111、118、129—132、135、136、

149、153、154、157、159、165、176—
180、194—196、237、240、305、306、
320、321、323、325、326、337、338、
364、365、371、373—379、381、383—
386、392、393、416、418、424、444、
445、447、450、497、502、504—506、
508—511、521、532、533、538、544、
572、577、582、583、590、626、634、
641、643、646、647、649—652、662—
664、668—670、675、676、678—682、
685、686

法兰克福 101、102、131、315、317

法兰克福尼亚 224、284、580

法兰克福王国 248、569、577、578

凡尔赛 111—113、323、446、683

非洲(阿非利加行省) 194、230、
242、606

菲英岛 237

费拉德尔菲亚(费城) 38—40、418

芬兰 201

芬洛 295

枫丹白露 112、113

弗拉尔丁恩 306

弗莱沃(须得海) 211

弗赖堡(弗里堡) 335

弗兰肯施泰因(希隆斯克地区,宗布
科维采) 66

弗雷 668

弗雷肯霍斯特 287、288

弗里斯兰 211、306

弗里西安海岸 224

弗利兰岛 211

弗利水道 211

弗利辛恩 306

弗林 295

佛罗茨瓦夫——见布雷斯劳

佛兰德 246、281、290、306、309、506、
663

福尔巴克 314

福格尔斯山 284

符腾堡 225

孚日(山脉) 311、663、666

G

高卢 196—199、204、206、209、211、
212、220、222、225、226、251、260—
264、278、280、282、459、476、555

高卢海岸 233

哥本哈根 235

哥达 295、302、303、308、310、643、
644

哥得兰岛 229、232—234

格拉蒙 309

格林尼治 629

格吕宁根 225

格洛高(格沃古夫) 228

格洛斯特 502

根特 169、173、292

贡比涅 113

贡岑豪森 225

H

哈尔伯施塔特 423

哈尔施塔特 226

哈弗尔兰 245
 哈勒 309
 哈雷(萨勒河畔) 283
 哈默尔恩 220
 哈瑙 225
 哈瑟尔特 306、309、311
 海尔德恩 295、304
 海尔德兰省 291
 汉堡 51、52、57—59、70、114、132、
 133、164、229、232、317、448、525
 汉诺威 46、48、99、140、448、562
 汉普斯特德 606
 豪斯贝尔格 220
 荷尔斯泰因 229
 荷兰 246、291、295—297、300、304、
 305、307、308、312、325、506、521、
 643
 黑尔韦格 305
 黑海 158、196、223、227、237、240
 黑森 283、284、298、310—313、317
 黑森-达姆施塔特 102
 洪斯吕克山 304、311、312
 琥珀海岸(在波罗的海) 197、226
 琥珀海岸(在日德兰和石勒苏益格西
 面)197、198
 华沙 35、444、632
 华盛顿 459
 滑铁卢 309、379
 怀特岛 606、607
 霍博肯 610
 霍赫瓦尔德山 311—313、570
 霍亨施陶芬(堡) 159、225

霍姆堡 210
 霍若维采 237
 霍廷根 565、568、577

J

基尔 248
 基尔湾 202
 基姆布里半岛 197、207、229、233、
 246、247、252
 基姆布里海角(斯卡恩) 233
 基普芬贝格 225
 基什尼奥夫 625
 加利福尼亚 598
 加林登 242
 加龙河 196、197
 加特契纳 548
 久尔杰沃(久尔久) 158
 旧普鲁士——见德国东北部地区
 旧萨克森 306、309
 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 153、
 156—158、621、637

K

喀尔巴阡山脉 201、214、252
 卡尔阿斯滕山 284
 卡尔斯 636
 卡尔斯巴德(卡罗维发利) 606
 卡夫丁峡谷 461、465
 卡拉法特 158
 卡农图姆 226
 卡诺萨 563
 卡斯特罗普(卡斯特罗普—劳克塞

尔) 305
 卡泰卢尼亚 688
 卡特加特海峡 198、231—233
 开姆尼茨 611
 凯尔海姆 225
 凯撒斯劳滕 312
 凯西亚森林 307
 科布伦茨 302、303
 科尔巴赫 311
 科尔贝格(科沃布热格) 78
 科隆 72—74、101、128、131、132、
 212、290、302、304、308、313、448
 科芒特里 509
 克尔特人居住的多瑙河地区 198
 克拉科夫 445
 克莱德河 506
 克雷费尔德 299
 克桑滕 295、305、308
 刻赤 237
 库尔斯克 37
 库洛米耶 112
 库维尔 110

L

拉昂 269
 拉姆斯盖特 684
 拉纳克 376
 莱比锡 54、67、111、132、164、221、
 346、349—351、375、525、526、550
 莱顿 287
 莱茵贝格 303、308
 莱茵布罗尔 308

莱茵法兰克尼亚 261
 莱茵高 248、580
 莱茵河 195、199—204、206、209—
 214、220、221、223—225、227、236、
 241—244、248—252、284、291、295、
 296、303、308、310、312—314、567、
 569、578、579
 莱茵河岸 206、212
 莱茵河三角洲(莱茵河河口) 209、
 235、248
 莱茵河右岸 200、207、214、217、
 223—225、249、251、295、305、307、
 311—313、582
 莱茵河中游 242
 莱茵河左岸 200、212、249、286、
 289、295、302—305、308、311—313、
 582
 莱茵黑森 302
 莱茵平原 214、299—301、313、314
 莱茵省 莱茵普鲁士 莱茵河各省
 79—81、99、131、159、224、296、302、
 416
 莱茵普法尔茨 570
 赖弗沙伊德(科布伦茨的) 295
 赖弗沙伊德(亚琛的) 295
 兰河 207、210、225、228、308、311、
 314
 兰开夏郡 293、497、498、536、662
 兰施图尔 303
 兰斯 263、281
 朗布依埃 112
 朗根赛芬 313

- 朗根施瓦尔巴赫 313
劳恩堡 247
劳西茨 46
勒克勒佐 417—418
勒拉赫 307
勒斯蒂恩(埃斯蒂诺蒙) 266、290
勒文 305、309
雷察特河 283
雷蒂亚 206、209、227
雷姆斯河 225
雷斯(区) 295
里昂 392、650、674
里奥哈 53
里海 196
里克斯赫夫特角(罗泽维角) 233
里普利安(区) 295、297、305、310、
313、314
里窝那 53
理森山(汪达尔山,今克尔科诺谢山)
197、199、214、245、283
科夫兰 232
利珀河 207、210、211、213、214、224、
241、248、284
利普施塔特 211
利斯河 281
利物浦 30、650
立陶宛 36、242、579
林堡省 296、311
林特尔恩 220
灵克宾(州,首府) 198
卢森堡 290、303、304、308、309、
311—314
卢瓦尔(省) 109—113
卢瓦尔河 110
鲁贝 508
鲁尔河 207、210、214、224、248、284、
289、296、307、311
鲁尔蒙德 296
鲁罗尔特 305、312
鲁米利亚 152、156
吕策尔施泰因(小皮埃尔) 312
吕克瑟伊 264
伦巴第 122
伦敦 34、38、70、106、114、123、126、
130、132、133、158、159、185、188、
193、226、320—322、324、327、342、
417、445、446、459、468、482、484、
487、493、494、500、506、519、528、
531、536、538、542、544、548、589、
590、598、602、604、606、608、610、
611、613、617、619、622、624—626、
629、639、642、648、650、684、686、
689、690、692、693
伦敦东头 493、506
罗马边境墙——见边境墙
罗马 258—260、262、263、274、365、
560
罗马帝国(罗马) 67、145、190、199、
206、209、210、213—218、220—223、
227—231、233—236、239、240、243、
249—251、281、303、304、324、463、
468—469、550、551、553—557、580
罗马尼亚 158
罗马涅(地区) 172

- 洛迪 39
 洛林(洛林省) 289、297、303、308、
 309、312—314
- M**
- 马德里 39、599
 马尔梅迪 304、308
 马尔默 73
 马尔希河 226、228
 马格德堡 423、449
 马克 48、214、224、284、288、296、301
 马里查河 199
 马其顿 198
 马赛 196、197、650、668
 马塞克 296、308
 马瑟尔(马斯沃夫) 228
 马斯河 211、291、296、299、305、308、
 309
 马斯河三角洲(莱茵河左岸的) 200
 马斯河右岸 296
 马斯河左岸 296
 马斯特里赫特 285、296、304
 玛尔斯城 305
 迈纳(马尼) 555
 曼彻斯特 107、502、503、515、533、
 650
 曼海姆 102、521、526
 曼图亚 111、611
 芒特 110
 梅克伦堡 69、70、99、114、228、229
 梅克伦堡沿岸 229
 梅纳皮地区 281
 梅斯 109、112、113
 梅特曼 305
 美国(美利坚合众国) 28—31、39、
 59、106、107、126、132、134、145、
 148、149、165、321、322、325、338、
 456、462、485、505、506、508、512—
 514、521、528、532、533、535、541、
 545、547、583、588、611、617、618、
 641、643、645—647、649、651、682、
 685、686
 美因茨 110、210、281
 美因河 197、200、201、225、315、317
 美因河上游 228
 美因河下游 210
 美因河左岸 225
 美因法兰克尼亚 283、284
 美洲 133、194、310、465、472、503、
 524、539、542、545、589、592、594、
 598、669、672
 门兴格拉德巴赫 299
 蒙塔鲍尔高地 225
 蒙特卡洛 606
 米尔海姆(鲁尔河畔) 296
 米尔滕贝格 225
 米兰 121、611
 米卢斯(米尔豪森) 662、668、682
 明登 306
 明斯特 46、287
 明斯特兰(地区) 293、317
 摩拉维亚 228
 摩纳哥 606
 摩泽尔河 58、283、289、303、312、

314、570
 摩泽尔河谷 308
 摩泽尔河上游 304、308、313
 摩泽尔河下游 304
 莫斯科 604、605、608、625、636
 墨西哥 680
 默尔斯 295
 默尔斯(伯爵领地) 295
 慕尼黑 73、650

N

拿骚 302
 那不勒斯(那波利) 53、168、611
 纳厄河 311—314
 纳海尔恩 228
 纳沙泰尔 120
 南布拉鲁普 235
 南德意志(南德 德国南部) 194、
 197、299、364、618
 南美洲(南美) 53、513
 南欧(欧洲南部) 53、199
 南威尔士 155
 南英格兰 193
 内穆尔 112、113
 内辛(涅津) 78
 尼达姆沼地 234、235、237、238
 尼德兰 222、290、295、314、317
 尼姆韦根(奈梅亨) 308
 尼诺弗 306
 尼斯特尔河 313
 涅瓦河 636、685
 牛津 284

纽伦堡 164
 纽约 129、132、138、417、512、528、
 608、649、685
 努瓦永 113
 挪威 51、233、252
 诺丁汉 306
 诺里克 209
 诺曼底(地区) 663
 诺伊法尔瓦塞尔(新港) 233
 诺伊豪斯 228
 诺伊斯 214、299

O

欧诺 112
 欧坦(科多尔行政区) 267
 欧洲(欧罗巴洲) 35、36、39、41、42、
 60、111、117、118、130、132—135、
 140、150、152—154、156、157、159、
 161、163、165、167—169、175—177、
 181—184、193、194、196、204、320、
 323、324、336、343、354、379、382、
 383、392、418、444、445、461、465、
 472、476、479、485、503、506、513、
 514、520、524、539、542、545、547、
 548、583、584、589、592、594、622、
 623、626、633、638、641、645、647、
 655、656、669、682、684、685
 欧洲南部——见南欧

P

帕德博恩 211、284、288
 潘诺尼亚 209

佩斯 175
 佩西 267
 皮埃蒙特 122、668
 皮劳(波罗的斯克) 233
 葡萄牙 39、171—173、325
 普法尔茨 75、102、131、290、302、
 317、580
 普里格尼茨(地区) 247
 普列夫纳(普列文) 153、154、636—
 638
 普鲁士 35、36、41、45、47、48、50、
 53—62、65、67—69、79—81、83、90、
 97、99—102、110、111、129—132、
 140、154、156—159、177、179、184、
 185、308、330—332、334、338、364、
 365、407、421、422、444、445、447、
 448、484、525、526、582、618、652、
 681
 普鲁士萨克森——见萨克森
 普罗旺斯 199
 普斯科夫 37
 普瓦捷 280

Q

前波美拉尼亚(前波默恩) 229
 前亚细亚 193
 乔克人居住的海岸(北海) 243
 钦博拉索山 131

R

热那亚 53、676
 日本 669

日德兰(半岛) 198、203
 日耳曼尼亚 209、212、230、241、
 242、245、310、476、576
 日内瓦 186、320—322、444、450
 日内瓦湖 606
 日耶河谷 674
 茹瓦尼 112
 汝拉(侏罗)山 168
 瑞典 51、208、229、232、234、237、
 252、449、568
 瑞典南部 229
 瑞士 28—30、39、106、111、119、120、
 130、148、165、168、171、173、174、
 194、307、325、335、351、354、364、
 450、605、618、643

S

撒克逊地区 239
 萨尔堡 210
 萨尔堡 312
 萨尔布吕肯 164
 萨尔茨堡 325
 萨尔茨韦德尔 538、541、544
 萨尔河 303
 萨尔路易 304
 萨克森 224、281、284、286、296
 萨克森(普鲁士萨克森) 46、54、
 114、164、165
 萨克森(萨克森王国) 247、250、416
 萨克森林地 202
 萨勒河 228、283
 萨利克 303、305、313

- 萨特兰(地区) 246
 塞尔维亚 175
 塞纳河 112、685
 色当 153、165、177
 色雷斯(色雷斯半岛) 196、199、204
 沙特尔 110—112
 沙托丹 109、110
 上艾费尔 308
 上艾瑟尔 291
 上巴门(伍珀河谷) 301
 上莱茵(莱茵河上游) 199
 上萨克森 298
 上施派尔 312
 上西里西亚(上希隆斯克) 96、97、
 101、236、416
 绍尔兰山 288、296、311
 设菲尔德 622
 圣艾蒂安(圣亚田) 674
 圣奥梅尔 306、309
 圣彼得堡(彼得堡) 154、335、481、
 482、484、486、605、608、625—626、
 638、650
 圣但尼 264
 圣戈阿尔 303
 圣梅达尔德 263
 圣热尔门-德-普雷(修道院) 264、
 280
 圣特勒伊登 306、309
 施莱登 295
 施莱湾 202
 施佩萨特 284
 施韦德尼茨(希维德尼察) 66
 石勒苏益格 198、229、232、235、
 239、246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73、114、
 164、232、580
 士瓦本 238、307、580
 舒姆拉(舒门) 157
 斯德丁(什切青) 51、52
 斯海尔德河 307
 斯卡恩——见基姆布里海角
 斯堪的纳维亚(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斯
 堪的亚) 195、201、206、208、229、
 230、233、237、238、254、567、572
 斯堪的亚——见斯堪的纳维亚
 斯劳厄尔瑟 232
 斯摩棱斯克 37
 斯特拉斯堡 200
 斯图加特 105
 松林山 312
 苏道恩 242
 苏格兰 100、376、382、420、506、534、
 535
 苏黎士 34、106、344—346、349—
 351、355、359、568、577、613
 苏瓦松 263
 索恩—卢瓦尔矿区 669
 索林根 164、605、608
 索斯特 307

T

- 塔尔瑙(塔尔努夫) 66
 塔姆沃思 502
 塔施贝格沼地(措斯比约沼地)

235—238
 泰尔斯海灵岛 211
 泰晤士河 506
 唐纳山 312
 陶努斯山 207、212、225、313
 特雷布尼茨(切布尼察) 228
 特里尔 128、290、303、308、312、314、
 459、476、538、541、544
 特洛伊——见伊利昂
 通厄伦 306、309
 突厥斯坦 619、621、626、628、630
 图尔 110、112、262、264
 图林根 283、284、298、580
 土尔其 152—154、156—158、183、
 184、625、626、633、636—638

W

瓦兹河 113
 瓦尔塔河 245
 瓦夫尔 309
 瓦拉几亚(地区) 158、238
 瓦林 228
 瓦隆 438
 汪达尔山——见理森山
 威尔士 536
 威拉河 228
 威尼斯 676
 威尼斯省 122
 威斯特伐利亚 164、224、252、287、
 288、296、299、300、305、307、311、
 416、571
 威斯特伐利亚平原 214

威悉河 204、207、210、211、218、241、
 251
 韦尔 110
 韦尔登 283、284、286、296、307
 韦尔切利 199
 韦瑟尔 200、295、296、312
 韦斯特林山 311、313
 韦特劳(地区) 210、214、225、302
 维德河 246
 维德河 308
 维勒库布莱 111
 维耶尔宗 110
 维也纳 35、42、73、150、175、228、625
 魏克瑟尔河(维斯瓦河) 207、226、
 228、244、245、252
 魏克瑟尔河河口 227、230、233、245
 温斯特鲁特河 283

温韦勒 303
 文特诺 607
 翁纳 307
 沃尔姆斯 200
 沃罗涅日 37
 沃韦 606
 乌当 112
 乌得勒支 291
 乌尔里希施泰因 46
 乌拉尔山 685
 伍珀河 214、224、301
 伍珀河谷——见埃尔伯费尔德—巴
 门

X

西班牙 39、53、118、119、120、167、

- 168、171、195、198、325、335、459、
476、589、643、645、688
- 西班牙北部 53
- 西伯利亚 592、598、624、633
- 西德(西部德意志 德国西部) 213、
220、223
- 西方 41、42、456、462、466、470—
472、476、547
- 西弗里斯兰 246
- 西莱茵 286
- 西兰岛 232
- 西里西亚(希隆斯克省) 54、66、72、
76、77、81—86、89、95、100、101、
227、228、245、578
- 西欧 35、143—145、194、444、455、
456、461、462、470—472、475、482、
513、547、577
- 西萨克森 288
- 西西里岛 194、227
- 西印度(西印度群岛) 51
- 希布勒斯河——见马里查河
- 希腊 67、158、196、227、241、552、
556、557
- 希普卡山口 637
- 锡格河 207、214、224、248、307、314
- 锡格兰(锡格河流域) 288、296
- 锡格马林根 105
- 锡利斯特里亚(锡利斯特拉) 157、
158
- 锡塔德 296
- 昔兰尼 227
- 下莱茵地区(下莱茵) 46、48、164、
199、217、289、299、314
- 下萨克森 299、307
- 下西里西亚(下希隆斯克) 55、228
- 小贝尔特海峡 232
- 小圣伯纳德山口 209
- 小亚细亚 156、196
- 辛克法尔湾(德洪特水道, 西斯海尔
德水道) 246
- 新喀里多尼亚岛 589
- 新拉纳克 376、382、383
- 新维德 214、225、242
- 新泻湖(维斯瓦湾) 207
- 匈牙利 41、42、102、148、165、173—
175、445、625、643
- 须得海 211、291
- 叙尔特岛 246
- 叙利亚 215

Y

- 亚琛 285、290、302、304、308
- 亚德湾 291
- 亚历山大里亚 551
- 亚美尼亚 637
- 亚速海 237
- 亚洲 亚细亚洲 亚细亚 132、196、
203、230、236、259、460、477、567、
576、669、693
- 耶拿 582
- 伊迪斯塔维索谷地 204、224
- 伊尔恩辛 225
- 伊利昂(特洛伊) 61
- 伊瑟隆 101

易北河 46、47、51、56、61、76、96、
100、199、202、206、207、211、214、
226—228、236、240、241、246、247、
250、307
易北河河口 228、246
易北河下游(下易北河) 213、242、
247、250
易北河中游 242
易斯卡伏南人的片岩山地 211
意大利 39、45、53、59、117—122、
127、132、167、168、171—173、176、
195、196、199、209、220、222、223、
226、227、231、325、335、365、420、
445、459、476、521、554、572、611、
612、643、649—651
意大利北部(北部意大利) 119、
120、199、226
银山 67
印度 59、193、503、506、669
英格兰 100、306、514、534、535、567、
572、680

英国 15、28、39、45、47、53、54、59、
71、118、123、124、126、130、132、
135、144、152、153、155、157、159、
171、194、195、237、322—324、338、
364、373、376、379、381、383—386、
392、416、418、420、445、455、463、
468、470、475、476、482、488、492、
493、495、497、498、500、501、503—
506、508、510—513、515、516、520—
525、530、532—535、547、562、588、
606、620、621、623、626、629、630、
641、642、645—647、651、656、662、
663、685、686、692
于利希 304
约纳河 112、113

Z

泽兰省(泽兰岛) 246、291
直布罗陀 194
中国 50、59、68、506、669
中欧 203

弗·恩格斯《法兰克时代》一文
中引用的拉丁文地名

A

Aerdelingen 309
Ahrweiler 304
Amstenrade 296
Andernach 303
Antunnacum 见 Andernach
Ardinghen 309

B

Bacharach 303
Ballenge 见 Bassange
Bassange(Ballenge) 309
Baulershoven 306
Benninghofen 305
Berghofen 305
Bevingen 309
Biebrich 312
Bingelrade(Bingelraede) 296
Bisterscheid 312
Bödingen 307
Bogenhoven 306
Bommershoven 306

Bonninghen 309
Boswinningen 309
Bovelingen 309
Breitscheid 312
Bremscheid 311
Brettnach 303
Britlinga 306
Büderich 312
Buisinghen 309
Büllingen 308
Buvingen 309

C

Cemplich 312
Civiraha 312
Crastlingi 306
Crettenach 303
Curange 309

D

Dallenbroich 296
Daspich 312
Destelbergen 292

Desteldonck 292
 Destrich 312
 Droenhoven 306

E

Echternach 303
 Edingahûsun 287
 Ehingen 307
 Eibertingen 308
 Ellingen 308
 Engelmanshoven 306
 Eppinghofen 305
 Ereshoven(Ereshofen) 305
 Eschweiler 304

F

Flissingha(Vlissingen) 306
 Fühlingen 308

G

Garzweiler 304
 Gellik 296
 Genderingen 307
 Gerdingen 308
 Geystingen 308
 Ghyverinckhove 306
 Gippershoven 306
 Glabach(Gladbach Glabeck) 314
 Gobertang 309
 Gravelingen 309
 Grimmsingen 309
 Grinningen 309

Grupilinga 306
 Gussenboven 306

H

Hardinghen 309
 Haspelscheidt(Haspelscheid) 312
 Hatingen 309
 Hattingen 307
 Heerlinkhove 306
 Heisingen 307
 Helshoven 306
 Herbinghen 309
 Herdange 309
 Hermelinghen 309
 Hibrich 312
 Hilsprich 312
 Hirschenbach(Hirzenowe, Hirschenau)
 见 Hirzenach
 Hirzenach 303
 Hobbelrade 296
 Hocquinghen 309
 Holzweiler 304
 Hönigen 308
 Hönningen 308
 Horsadal 287
 Huckingen 307
 Hundelingen 309
 Hünningen 308
 Husingen 307
 Huysinghen 309

I

Irmenach 303

Iveldingen 308

J

Juliacum 见 Jülich

Jülich 303

K

Kanach 303

Karninschesberg(Kaninchenberg)

314

Kellinghofen 305

Kerprich 312

Kerprich-Hemmersdorf(Kerprich)

312

Kessenich 296

Kinckhoven 305

Kippingen 308

Konings-Hoven 306

Köttingen 308

Kreuznach 303

Kruisberg 296

Krützenberg 296

Kuntzich 312

L

Langenscheid 312

Langscheid 311

Lantremange 309

Leichlingen 307

Leigelingon 见 Leichlingen

Leubringhen 309

Leulinghen 309

Libertange 309

Lirich 312

Lottinghen 309

Louvrenge 309

Lüttingen 308

M

Marspich 312

Magathaburg 287

Mederiacum(Brück) 303

Medernach 303

Meiderich 312

Melschede 311

Mellinghofen 305

Meischede 311

Merzig 见 Messancy

Meschede 311

Messancy 312

Mettecoven 306

Mettlach 303

Metzelschwander 303

Millingen 308

Montenach 303

Mopertingen 309

Mürringen 308

N

Niederhofen 305

Nieuwenhove 306

Nieuwenhoven 306

Noderange 309

Nyswiller 304

O

Odange 309
 Oderinge 309
 Ophoven 305
 Ordange 309
 Ortrange 309
 Otlinga 306

P

Penserich 312
 Peuplingue 309
 Phladirtinga(Vlaardingen) 306
 Pollinchove 306

Q

Quettingen 307

R

Raepertingen 309
 Ramscheid 311
 Ratingen 307
 Redingen 309
 Reekheim 296
 Reekhoven 306
 Revelinge 309
 Ribiniacus 见 Rügenach
 Rixingen 309
 Röcklingen 307
 Roclangen 309
 Roclenge 309
 Rodelach 303

Rödingen 308

Romaninchova 见 Rümmlingen

Rübenach 303

Rümmlingen 307

Ruykhoven 306

S

Schalkhoven 306

Scheidwald 312

Schmerikon(Smarinchova) 307

Schuerhoven 306

Schwanden 303

Selschede 311

Sentzich 312

Silva Caesia 307

Smarinchova 见 Schmerikon

Sodingen 307

Solingen 307

Soetrich 312

Stedieraburg 287

Stockheim 296

T

Tiberiacum 见 Ziewerich

Toernich(Törnich) 312

Tolbiacum 见 Zülpich

U

Ummlingen 307

V

Vellinghen 309

Vlytingen 309

Volckerinckhove 306

W

Wageningen 307

Wahenges 309

Waldrach(Waltrach) 303

Wallach 303

Walscheid 312

Walwiller 304

Wandhoven(Wandhofen) 305

Wassenach 303

Waterscheyd(Waterscheid) 311

Wehofen 305

Wellinghofen 305

Wesselingen 308

Westhofen 305

Wichlinghofen 305

Willebringen 309

Wimmertingen 309

Winethahûsen 287

Wintershoven 306

Wolvarad-inga-husun(Wolvaradinges-
hûsun) 306 309

Worringen 308

Wulverdinghe 309

Z

Ziewerich(Tiberiacum) 303 312

Zollinchovun 见 Zollikhofen

Zollikofen(Zollikhofen) 307

Zonhoven 306

Zûlpich 303